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美帝国的形成

从美西战争到伊拉克战争

（第三版）

FORMAÇÃO DO IMPÉRIO AMERICANO

Da guerra contra a Espanha à guerra no Iraque

(3ª edição revista e atualizada)

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尼斯·班代拉

（Luiz Alberto Moniz Bandeira）/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8388号

◎ 南美洲最知名的政治历史学家，多年搜集并仔细整理一手资料，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完整的帝国兴起画轴。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了解到美帝国从形成到达至巅峰是不断进行策略战争的结果，并且作者也雄辩地预测，战争最终会将美国带入权势衰落的宿命。

◎ 不同于甚嚣尘上的俗论，作者在书中以科学的分析和全球的视野对美帝国形成之后的走向做出自己的预测，预言美帝国终将衰落。爱好美国历史及国际关系史的读者不可错过此佳作。

ISBN 978-7-300-17321-4
9 787300 173214 >
定价：98.00元

ISBN 978-7-300-17321-4

013033043

D771.20
21-2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美帝国的形成
从美西战争到伊拉克战争
（第三版）

FORMAÇÃO DO IMPÉRIO AMERICANO
Da guerra contra a Espanha à guerra no Iraque
(3ª edição revista e atualizada)

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尼斯·班代拉
（Luiz Alberto Moniz Bandeira）/ 著
舒建平 / 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藏书 图书馆

北航 C1640955

D771.20
2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帝国的形成：从美西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巴西）班代拉著；舒建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17321-4

Ⅰ.①美… Ⅱ.①班…②舒… Ⅲ.①霸权主义-研究-美国 Ⅳ.①D7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4018 号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美帝国的形成：从美西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第三版）
[巴西] 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尼斯·班代拉（Luiz Alberto Moniz Bandeira） 著
舒建平 译
Meidiguo de Xingch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定　　价**	98.00 元

北航 C1640955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第二版序言

我无意把《美帝国的形成》写成一本关于美国历史或美国社会的书。叙述美国历史的书已有很多，作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对美国的历史进行美化。我的目的是从历史维度对美国的发展进程作一个结构性分析。这一进程使得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按照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的广义概念，一个国际超级国家应被理解为权力施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指其他国家）的“绝对所有权”。[1]我调查和收集了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它们都是原始资料，包括美国历任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成员的回忆录和来自其他情报机构和报纸的资料。由于资料是零散和不完整的，公众难以全面地了解这一政治现象和在国内或国际以及在其他国家发生但美国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历史事件的原因和实质。为此，我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比较和核对，以便组建一幅美帝国形成的马赛克式图像。历史是一个“呈现中的设计”。

葡萄牙政治学家安东尼奥·拉腊（Antônio de Sousa Lara）精辟地指出，美国“是一个胜利的模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成功模式的硬核，即一个处于其他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之上的已成为霸权的绝对权威”[2]。然而，拉腊认为，“没有瑕疵就不会有美丽”，美国虽然已成为“唯一对内拥有无与伦比和对外拥有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国家，地球上唯一享有主权的国家”，但在令消费型社会感到鼓舞的“可丢弃理论”中，它依然是一个物质主义、自私、享乐主义、挥霍和破坏自然的国家。它越来越不尊重弱国。在消费型社会中，一切都可以作为垃圾丢弃，如令人感到不快的宠物、不想要的胎儿、临死的病人以及“一直拖着不死”的先辈和亲属。[3]拉腊还指出，美国胜利的资本主义模式并非不存在荒诞。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认为，理解一种现象的唯一途径是弄清楚它是如何出现的。假如不了解当今社会是如何出现的，它的各种现象（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基督教、犹太教等等）是如何发展的，那么就难以理解社会本身。[4]这就是为什么说政治学家必须是历史学家的原因。

自然，如果必须从一个理论出发的话，那么没有比“帝国”能更好、更确切地反映主要是在二战后形成的美国现实及其国际政策的帝国主义特

点的概念了。显然，在历史长河中，任何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都不可能以同样的特点重复出现或加以复制。资本主义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进而产生控制整个生产过程的金融资本的结果。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现象。列宁承认，在现阶段资本主义之前，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就已经存在。[5]生产体系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并非列宁发展了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的基本概念由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约翰·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1858—1940）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提出。列宁的观点基于前两人的理论，并无太多新意。他只是指望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导致生产的各个方面彻底社会化，并无视资本家的意愿将其带入一个在完全自由竞争和彻底社会化之间过渡的全新社会体系。[6]他没有将正在为征服尚未赢得统治权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而斗争的帝国主义视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政治表现。当时，非资本主义地区包括世界的大片地区。[7]他忽视罗莎·卢森堡的贡献，并猛烈地抨击了考茨基的设想。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列强有可能建立一种卡特尔，以避免它们之间的战争，并发展到超帝国主义。但事实是，社会革命没有在欧洲蔓延。在美英两国与德国争夺世界控制权的二战后，西方工业国家卡特尔在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中得到了巩固。

必须始终记住的是，当语言的重复使概念趋于定型的同时，概念所试图反映的现实却处于变化、运动和持续蜕变之中。由于应该和必须关注与反映现实，任何概念都难以得到彻底巩固。因此，帝国主义的概念不能再基于罗马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也不能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国、德国或法国的模式作为依托，尽管可能存在看上去相同的元素和形态。它必须伴随并反映尤其是自二战以来所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譬如殖民地在20世纪60年代的正式消失和新兴工业国家的产生。今天，一个国家出口资本并在国外投资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是采取帝国主义政策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是那样的话，葡萄牙、西班牙、中国、南非和巴西等国都将被视为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在许多国家正在超越狭窄的民族国家界限。与此同时，国际化（全球化）、经济和政治世界性集权的进程日益明显，不能再将纯粹和简单的资本出口视为帝国主义的标准。当今的帝国主义已形成新的超帝国主义特点。它意味着实力政策，而美国是唯一能够实施这一政策的国家。美国通过在全世界不同地区保持军事基地，以达到保障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及其大公司投资和占领市场的战略目的。它利用媒体、情报机构的隐蔽行动、院外行动、腐败行为，并通过在其中持

有多数表决权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机构直接或间接施加的经济压力，推进其在世界各地的利益。

与其所拥有的财富相比，美国拥有很高的易损性。为了支付进口的能源、大宗商品和工业制品，它没有依托地印制美元，而沙特和中国等向其出口的国家用这些没有依托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换句话说，是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在继续为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逆差提供资金。这一逆差在2005年达到了创纪录的8 050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20.5%，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4%。[8]美国财政部的统计表明，2004年底，公众所持有的联邦债券中，外国人占44%。这一债务的大部分（44%中的64%）为各国中央银行所持有，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的央行。光中国就持有约8 540亿美元。这一数额超过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逆差。假如各国银行不再买入美国债券或开始在市场大量抛售，这将给它带来巨大风险。美国暂时能避开破产的景象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事实。它能够避开却无法消除这一威胁。美国膨胀的金融泡沫迟早会破裂。2006年3月28日，亚洲开发银行告诫其成员，要为美元可能的崩溃做好准备。该机构称，虽然这一前景并不确定，但一旦发生，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后果。[9]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认为泡沫破裂难以避免，他预计这一现象将会在2007年发生。

与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精辟阐述的标志罗马帝国没落和灭亡非常相似的迹象已在美国表现出来，并变得日益明显。没有持久的战争状态，其经济就会停止运作，和平有悖于美国的利益。同样的事情曾发生于罗马帝国，其最后形成的经济形态就是以战争作为基础的。[10]但是，如果说罗马帝国没落持续了数个世纪，美帝国衰败可能只需要短短几十年。通信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使现代文明加速，电子工具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时间加速。与其上升的过程一样，美帝国也将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戏剧性地、猛烈地坠落。

2006年6月27日
于圣莱昂

【注解】

[1] "*Tutti gli stati, tutti i dominii che hanno avuto e hanno imperio sopra gli uomini sono stati e sono o repubbliche o principati*". Machiavelli, Niccolò. *Il Principe*（*Der Fürst*）,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1986, p. 9.

[2] 为鲁斯·德乌斯（Ruth Costa Deus）的作品所写的序。*A política externa a-*

mericana e a Europa (*Dos primórdios ao final do século XX*), Lisboa: Autonomia 27 Ltda., 2004, p. 7.

[3] Id., ibid., p. 8.

[4] Kautsky, Karl. *Der Ursprung dês Christentums*. Stuttgart: J. H. W. Dieter Nachfolger, 1908, p. 14.

[5] Lenin, V. I. *El Imperialismo—fase superior del capitalismo*, in *Obras Escogidas*. Moscou: Ediciones en Lenguas Extranjeras, 1948, p. 1024.

[6] Id., ibid., p. 967.

[7] Luxemburgo, Rosa.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in *Gesammelte Werke*, Band 5, Ökonomische Schriften. Berlín: Dietz Verlag, 1990, p. 391.

[8] Trevisan, Cláudia . "Déficit americano divide analistas e dita rumo global", *Folha de S. Paulo*, 02/04/2006, B11.

[9] 在接受采访时，亚洲开发银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办公室主管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说："鉴于目前全球经常项目的不平衡，美国经济或全球市场所遭受的任何打击将改变投资者的看法。""我们给亚洲国家的建议是：不要把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持续融资视为既定事实。如果发生某些情况，东亚国家的经济必须做好准备。" ADB Official Warns: East. Asian economies must gird for possible dollar collapse. Posted: 2:37 PM | Mar. 28, 2006—Agence France-Presse—http://money.inq7.net/breakingnews/view_breakingnews.php? yyyy=2006&mon=03&dd=28&file=21.

[10] *In der form, die sie schließlich im römischen Weltreich erlang hatte, beruhte sie auf dem Kriege*. Kautsky, Karl.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 Eine historische Untersuchung*. Stuttgart: J. H. W. Dietz, 1908, p. 87.

第一版序言

布莱克（Jan Knippers Black）
蒙特利尔国际问题研究所

在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2004年美国大选后不久，当时在英国的美国著名电影演员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被问及是否是为了躲避小布什才来到那里时，他回答说，那样做没有意义，地球上无处能躲避小布什。在南美进行的长达一年之久的漫长旅行让我极为清晰地明白，小布什政府所代表的威胁绝不仅仅为“蓝色之州”（那些传统上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州）所感受。因此，分析并试图解决这一已具有全球性的问题不应单单是美国公民的事情。

面对“新美国世纪”的侵略，世界的相当一部分已处于橙色警戒状态。而仍遭受“旧美国世纪”帝国侵略的拉丁美洲人民已从中学会了很多。因而，近几十年中以反映美帝国阴暗面为目的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出自一位巴西专家之手就不足为奇了。

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尼斯·班代拉是巴西当代最高产和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潜心记录和分析巴西与邻国以及世界的关系。他始终认为，不承认和理解美国霸权无处不在的背景，就难以做好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但本书中并非只是巴西人的观点。莫尼斯进行了大量旅行，他曾作为政治流亡者客居海外。他以教授身份在德国已定居十多年。所以，其视野、其对历史的把握以及所引用的资料和启发的来源都是世界性的。

莫尼斯称，难以自制的冲动驱使他撰写了此书，以理解和解释美国扭曲的民主进程。它破坏了文明生活，代之以一个持久的战争和恐怖状态。他将小布什政府所导演的肮脏一幕视为始于15—16世纪的伊比利亚环球航海壮举的资本主义体系全球化的结果。

自由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合著的两卷《人权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于1979年出版以来，《美帝国的形成》或许是对美国穷

兵黩武的历史、其经济依托和国内政治的最全面论述。莫尼斯跟踪了自美国独立以来的全部历史，既包括作为自由明灯照亮全世界民主追求者的骄傲，也包括无数次伤害和毁灭这些人的美国国家弥赛亚主义。他描写了美帝国的系统扩张、其以虚假借口发动的战争，以及为维持战争而建立的军事工业。这些战争包括19世纪中叶对墨西哥一半领土的侵占，20世纪末吞并夏威夷和西班牙殖民地的残余，直至21世纪对伊拉克的占领。

我认为，此书急需被译成英语，以供世界各地的民族爱国者以及数量与日俱增的自视为世界公民的人们阅读。更需要阅读此书的是那些已被剥夺自身“公开性”（glasnost）很长时间的美国人，他们不明白美帝国毁灭的冲击始于自己家中，也将会在那里终结。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章 …… 9

商品资本主义　环球航行和资本主义全球化　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用　马克思眼中的美国　金融资本主义的来临　财富集中和“镀金年代”　征服夏威夷　古巴和美西战争　征服菲律宾　马克·吐温和反帝主义者

第二章 …… 27

统一的德国和俾斯麦的“世界政策”　对经济空间的争夺　德国和美国　1914—1918 年战争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　俄国革命　美国向欧洲提供信贷和军火出口　伍德罗·威尔逊的对外政策和美国参战

第三章 …… 38

战争与美国新富豪　四大帝国的毁灭　欧洲大屠杀　“阿拉伯的劳伦斯”和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拉伯人独立的沮丧　《贝尔福宣言》　巴勒斯坦冲突的由来　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　《凡尔赛和约》　威尔逊和启示录王子列宁

第四章 …… 45

《凡尔赛和约》遭美国参议院否决　世界经济政治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　美国成为欧洲债权国　超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启　俄国革命的后果　列宁与“新经济政策”　世界形势和 1929 年经济崩溃

第五章 …… 52

希特勒的崛起　夺权和建立独裁　德国对外政策的重新定位　希特勒与罗斯福经济贸易政策的对立　划分世界势力范围成为希特勒的目标　寻求“生存空间”　《莫洛托夫协定》　里宾特洛甫　斯大林对希特勒的信任

第六章 …… 60

罗斯福和美国的战备　被视为出口商品的军国主义　伯纳德·巴鲁与军工集团　希特勒和罗斯福为摆脱经济危机而扩军备战　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协议　轴心的形成　对日本进行挑衅　袭击珍珠港　美国卷入战争

第七章 …… 73

罗斯福对德国的憎恨　美国对战争爆发应承担的责任　反抗希特勒和谋害他的阴谋　罗斯福毁灭德国的目的　空中恐怖主义　广岛和长崎　苏联红军洗劫柏林　《布雷顿森林协定》　世界经济新秩序　联合国

第八章 …… 82

摩根索肢解德国计划　杜鲁门的退缩　斯大林的政策和西方的理解　丘吉尔与冷战爆发　从巴尔干延伸到里雅斯特和亚得里亚海的“铁幕”　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　苏联对德国的掠夺　马歇尔计划及其真实意图

第九章 …… 89

美国争夺英法殖民帝国　印度摆脱殖民统治和巴勒斯坦的分裂　犹太复国主义暴动和以色列的建立　共产党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和“隐蔽行动”　超帝国主义和北约　中国革命胜利和朝鲜战争　华盛顿的恐慌　冷战和反共狂想症

第十章 …… 99

艾森豪威尔的胜利　共和党军人政府　发生在美国的麦卡锡式迫害　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考虑　无果而终的战争　对外军援　中央情报局和纳赛尔在埃及的上升　伊朗针对摩萨台的政变　入侵危地马拉　《巴黎协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

第十一章 …… 111

美国经济疆界的拓宽　美国、法国与印度支那战争　多米诺理论　法国在奠边府的失败　美国反对《日内瓦条约》　古巴革命与美国　拉美的冷战

第十二章 …… 124

约翰·肯尼迪的当选　艾森豪威尔对军工集团的警告　入侵古巴　五角大楼企图实施军事干涉的借口　中央情报局的恐怖行动　谋害卡斯特罗的阴谋　肯尼迪与黑手

党的关系　美国与拉美军事政变

第十三章 …… 136

拉美的反美情绪　苏联对卡斯特罗的支持　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　封锁古巴　肯尼迪引发危机的选举目的　核战争风险　受操纵的美洲国家组织　从古巴和土耳其撤出导弹　肯尼迪遭暗杀　黑手党和中央情报局参与谋杀的嫌疑

第十四章 …… 150

美国、古巴和柏林问题　肯尼迪对游击战的担忧　作为冷战组成部分的民族解放战争　老挝战争　越南的卷入　中央情报局和吴庭艳遇害　约翰逊和越南战争升级　对北越的挑衅　东京湾事件

第十五章 …… 163

巴西军事政变和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　美国的反越战示威　法国和英国的反对　越南大屠杀　北朝鲜事件　美国经济危机　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遭暗杀　美国的骚乱　胡志明

第十六章 …… 177

军事力量的局限性　惨遭破坏的柬埔寨　美国实施化学和细菌战　“农业贸易”和大公司借越战牟利　对自由和人权的侵犯　“五角大楼文件”的披露　经济危机　抢购黄金和《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破裂

第十七章 …… 190

约旦的巴勒斯坦人起义　尼克松、基辛格及其“现实政治”　美国对中国的承认　与苏联达成谅解　美军撤离越南和《巴黎协议》　占领河内的“体面间隙”　美国与智利军事政变　“赎罪日”战争　石油危机

第十八章 …… 206

“管子工”小组　潜入水门大厦　案犯与中央情报局和白宫的关系　《华盛顿邮报》的揭露　丑闻　阻止调查的企图　尼克松及其助手罪行的败露　弹劾程序　辞职　福特总统的赦免令

第十九章 …… 216

“水门事件”背后的政治斗争　“新保守主义”遭打击

美国在越南的失败　“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胜利　西贡失守　“邱池委员会”和对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调查　中央情报局参与杀害吴庭艳、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和卢蒙巴被披露　肯尼迪与黑手党

第二十章 …… 227

中央情报局对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的干涉　“康乃馨革命”和葡萄牙独裁垮台　美国和对东帝汶的入侵　中央情报局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中央情报局支持“秃鹫行动”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治谋杀　阿根廷镇压活动和基辛格的告诫

第二十一章 …… 238

卡特对人权的承诺　与巴拿马谈判和与古巴接触　桑地诺阵线在尼加拉瓜的胜利　伊朗伊斯兰革命　美国使馆人员沦为人质　入侵阿富汗　招募“圣战者”　布热津斯基和支持分裂苏联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第二十二章 …… 260

美国人质危机持续　灾难性“鹰爪行动”　与伊朗秘密谈判　美国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　里根和老布什搭档及其对卡特营救人质谈判的破坏　《十月惊奇》——卡特的失败　里根与黎巴嫩危机　通过以色列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

第二十三章 …… 278

里根对萨达姆的期望　两伊战争中对伊拉克的支持　拉姆斯菲尔德与萨达姆　美国对外政策的双重性　“伊朗门”丑闻　里根的责任和掩盖行动　中央情报局与贩毒　美国和马尔维纳斯战争　对格林纳达的干涉

第二十四章 …… 293

里根“邪恶帝国”　对军国主义的支持　伊朗的威胁和对萨达姆的支持　美国犹太族群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　中东反美情绪　利比亚问题　支持恐怖主义的美国　苏联的解体　中国的经济改革

第二十五章 …… 307

被视为“新威胁”的恐怖主义和贩毒　维持和增加国防

预算的“理由”　美国的军国主义　美国所谓的“国际恐怖主义”　取代“红色威胁”的“绿色威胁”　历史上作为反抗手段的恐怖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恐怖主义的谴责

第二十六章 …… 323

国际恐怖主义问题　油价和入侵科威特　沙特与美国“沙漠风暴”行动　伊拉克军队遭驱逐　五角大楼“鹰派”和《防务计划指南》　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　第三世界外债重新谈判和“华盛顿共识”

第二十七章 …… 337

美国经济危机　克林顿当选总统　国防开支和军工企业的利益　人道主义干预和帝国主义目的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　干涉索马里遇挫　发生在美国的“圣战”　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　伊拉克问题和暗杀萨达姆阴谋

第二十八章 …… 355

轰炸南斯拉夫和入侵海地　克林顿的对外政策　美国与联合国　克林顿政府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冲突　美国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国家”　经济全球化　美国工业间谍活动和贸易推广　克林顿与国际金融危机

第二十九章 …… 363

北约东扩　国际军火贸易　军工企业对克林顿政策的不满　右翼和“新美国世纪计划”“邦达右翼阴谋”　摩萨德与莱温斯基　弹劾克林顿的失败　干预科索沃与“东西走廊”

第三十章 …… 375

美国在中亚和里海的地缘战略利益　巴基斯坦、沙特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资本主义　针对美国大使馆的恐怖袭击　联合国在伊拉克的核查人员和中央情报局间谍　右翼向克林顿施压　准备在哥伦比亚发动的战争

第三十一章 …… 392

哥伦比亚内战和拉美形势　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　巴勒斯坦问题的艰难谈判　“基地”组织暴动　克林顿在动武问题上的矛盾心态　政治体系的衰败　凯雷

集团　经济实力、司法阴谋和小布什的崛起
第三十二章 …… 410
“9·11”恐怖袭击　反恐战争“可用作宣传的理由”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基地”组织与本·拉登　“波金卡计划”和“9·11”恐怖袭击　伊拉克成为“新保守派”议事日程　入侵阿富汗　《爱国法案》　小布什预知本·拉登对美国的袭击　“9·11”恐怖袭击的可预见性
第三十三章 …… 433
侵占阿富汗　“邪恶轴心”　对国际法的损害　关塔那摩集中营　委内瑞拉未遂政变　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多边组织的侵犯　“路线图”与巴勒斯坦　“先发制人”战略　国防开支的提高　海湾战争综合征
第三十四章 …… 450
朝鲜对小布什威胁所作的反应　对伊战争的目的　媒体和对舆论的操纵　联合国的反应和小布什的舞弊行为　全世界对伊拉克战争的厌恶　占领巴格达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未被发现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
第三十五章 …… 466
伊拉克战争给大公司带来的生意　石油地缘政治　与小布什关系密切企业的金融丑闻　军事职能外包　五角大楼项目承包企业聘用雇佣兵　哥伦比亚战争私营化　美军在伊拉克遭遇抵抗
第三十六章 …… 478
伊拉克战争的非法性　恐怖主义加剧　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败　阿富汗被视为毒品国家　毒品产量增加　福音派与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联合和小布什连任　激进右翼　美国外债和双重赤字
结　语 …… 495
参考文献 …… 523

导　言

（……）时间的狂澜
奔流不息地永远向前，远远地冲走
我们的泡沫；旧的破灭了，新的又出现
无数世代的浮沫不停地激起；而帝国
排成起伏的坟墓，仿佛波浪滚滚而过。

——拜伦[1]

我的一位祖辈哲学家安东尼奥·德·阿拉冈（Antônio Ferrão Moniz de Aragão）系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弟子，他首次把实证论引入巴西。他在《数学基础》一书的导言中写道，“人类精神在其发展的所有时期，都需要有某一种理论把所观察的事实连接起来，以便进行新的观察”[2]。他在《人类知识条理性和百科全书式分类》中指出，实践和理论不断交替出现并共同完善。他强调，“理论是为了提示某些观点和任何自然需要所要求的某些实践意图，而实践则为理论提供新的观点。两者向前延伸，相辅相成，不断提高”[3]。

历史进程作为实践未能验证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和“垂死的资本主义”[4]，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因为它已经处于“毁灭边缘”，“它已过于成熟而将让位于社会主义”[5]。真理的标准不是比较各种理论，而是应该将理论与现实进行比较。事实验证了考茨基的预言，帝国主义被另一个新政策——超帝国主义所取代。在超帝国主义政策中，全球化金融资本展开了国际性联合，对全世界进行剥削，它取代了民族金融资本之间的争夺和借助武力在世界市场展开的竞争。[6]

1914—1918年的战争使美国赢得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地位。尽管这一地位在某一时期受到了德国的挑战，但自二战法西斯纳粹灭亡后，尽管矛盾依然存在或仍有可能出现，但谁也难以想象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帝国主义政策真正被霸主美国所制定的新的超帝国主义政策所取代。美国可以支配其他国家的意愿，根据自身利益并借助自1945年起构筑的联

盟和盟约体系主导国际政治。

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和共产主义受到削弱后，并非二战战胜国而是赢得冷战胜利的西方工业大国组成的七国集团（G7）组成了负责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安全的管理委员会。至那时为止，除为数不多的例外，一直倾向采取间接统治和维持一个非公开宣称帝国[7]的美国彻底暴露了其国际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性本质。冷战背景下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所带来的尴尬不复存在，“新保守派”、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智库的学者以及《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开始宣扬“全方位主导”，即推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必要时，可不惜付诸武力。这一意图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执政期间占据主导并被恬不知耻地加以宣扬。

美国是一个极为复杂、富有生机并充满内部矛盾的社会。一方面，科技极大发展并拥有高质量的大学；另一方面，美国普通民众并不了解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一切，认为美国法律适用于全世界。取得美国的大学学士学位只要求学一年外语，管理和贸易专业根本就不需要学外语。美国众多的中小学中只有不到10%的人学某一种外语，只有约5%的学生达到一定的流利程度。但人们必须了解美国革命——13个殖民地的独立战争（1776—1783年）——对民主文化的贡献，它最终影响了1789—1793年的法国革命。人们还应该知道，美国有一批优秀的学者、知识分子和记者，他们不断揭露和批评美国社会及其内外政策的污点。他们撰写并发表了具有真知灼见的作品，批评美国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它在伊朗政变（1953年）、入侵危地马拉（1954年）、古巴猪湾事件（1961年）、巴西军事政变（1964年）、智利军事政变（1973年）和越战等事件中所采取的政策。然而，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它们继续胡作非为、重蹈覆辙。正如黑格尔（Hegel）所指出的，尽管人们劝告“当权者、政治家和人民最好学习历史经验，但经验和历史教给人们的是，各国人民和政府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也没有以史为鉴”[8]。

《常识》的作者托马斯·佩恩（Thomas Paine，1737—1809）声称，“美国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的事业”[9]。他撰写的小册子在1776年3—6月的几个月时间内就在一个拥有不到300万人口的国家售罄了12万册。出生于诺福克的他是一位绝对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他主张政治民主。作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他不仅为13个殖民地从英国独立出来而战，也为法国革命进行了斗争。作为国家形成标志并渗透到美国人民文化中的相信救世主即将降临的民族倾向重塑了移民到美国的清教徒所秉承的犹太传统。那些迁往北美这一想象中的“希望之乡”的移民是完全接受

《圣经》的原教旨主义者。美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一样认为自己是上帝和地球人之间的沟通者和纽带。《圣经》中描述的那份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契约启发了“五月花号”乘客。1620 年 11 月 21 日，他们签署了一个公约，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法律公正和平等”的非军事组织。[10]这些人将自己视为背叛基督教的欧洲人中的例外。作为“例外论”的主角，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类型。[11]他们相信，由于自身所拥有的优势和特殊能力，他们被赋予了其他人所无法扮演的角色。伟大和高人一等的感觉从一开始就成为美国特性的一部分。宿命论是新教和那些认为自己在与上帝直接沟通并达到了洁白无瑕境地的人们的本质。迁移到美国或在那里形成的福音教派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原教旨主义新教，它有别于犹太教，但同时又与其形式相一致。他们在《圣经》中寻找灵感，以便赋予美国人民扩展疆界的“昭昭天命”和作为上帝选定的子民引领人类的使命。1850 年左右，著名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宣称：

> （……）我们美国人是非凡的、上帝选定的子民，是当代的以色列。我们乘着世界自由的方舟。70 年前，我们摆脱了奴隶制，除了接手地球上一个大陆这一与生俱来的权利之外，作为未来的遗产，上帝还给了我们大批政治异教徒。他们将会向我们走来，并躺在我们方舟的阴影下。他们不会举起沾血的双手。上帝已注定让我们这个种族去完成伟业，人类也对我们抱有同样的期待。我们在自己的灵魂中感受到这一伟业。其他民族不久定会紧随我们。我们是世界的先锋，是被派往未开垦旷野去“新世界”开辟道路的先遣部队。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新世界”。[12]

1912 年，巴西驻华盛顿大使多米西奥·达伽马（Domício da Gama）指出，美国人是由很多国家的人汇集而成的，因而它认为自己有别于和优越于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他评论说，“残酷的个体自我主义已发展到可被称为民族自我主义的地步”[13]。达伽马认为，虽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为建立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做出了努力，但美国从古至今一直倾向于不接受国际法律规章的约束。[14]

2003 年 1 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局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大使在被问及美国参与多边机构和国际协定后会授权到何种程度时断然指出：“要视情而论”。他后来又强调，最近几十年取得的一个最

重要发展就是国家主权“并非一张空白支票”这一全球共识（自然是美国与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形成。他进一步指出：

> 主权并非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当一些国家针对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国家实施和批准令人难以容忍的行动而侵犯最基本准则时，它们就丧失了一些主权的特权。[15]

从他的言辞中可以断定，唯一不能触犯的是美国主权，也只有美国有权根据自身利益决定什么东西应该或不应该得到国际遵守。主权对美国来说只是一张“空白支票”，它能为所欲为，能侵犯一切，包括人权在内。阿纳托尔·列文（Anatol Lieven）指出，按照“布什主义”，“美国主权是绝对的”[16]。其他国家，尤其是弱国的主权并非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只有作为超帝国主义的美国才能决定是否应对它们进行干涉。美国作为全球化金融资本安全的责任人，同时还扮演着法官的角色，并行使着宪兵和刽子手的职能。这样，国家主权和国家之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准则遭到了抛弃。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三百多年中，它们一直是脆弱的国际法结构基础的根本准则。

美国常常无视这些原则，只要对自己合适就可以。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它一直摇摆于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之间。它不再承认其他国家的自决权和政治独立，也不再接受各国平等的民主原则并将其作为正式纲领的事实，这清楚地表明了它企图建立金融资本全球独裁体系的意图。在这一体系中，美国作为政治和军事强国，在制定经济和贸易政策时，其他国家与其相悖的利益可不必考虑，它可以从弱国手中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协议和好处，并能毫无顾忌地向这些国家施加影响，以便把全世界变成投资区域，并保障自己的投资安全。

德国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认为，帝国都不会承认邻国享有与其同等的权利。[17]事实上，美国不承认任何国家的权利。五角大楼在《2005年国家防务战略报告》中表述的概念是，美国的民族国家实力“将继续受到那些利用国际论坛、司法程序和恐怖主义等弱者策略的人们的挑战”。对于签署这一文件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及文件制定者和五角大楼的其他极端分子来说，被用来保护弱国的国际法却成了美国的一处短板。然而，当强国轻视法律力量并强加其暴力时，受压迫的弱国人民就会被迫求助恐怖主义，在抗争过程中把它当作斗争工具。1946—1947年，犹太人正是通过恐怖主义迫使英国

终止了对巴勒斯坦的继续统治。

美国对其他国家人民主权的藐视，其国际政策中的单边主义，所推行的军国主义和盛气凌人的做法，按自己模式打造世界的企图，以及把推行民主的借口作为发动或参与战争的“理论基础”，并非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结果。它们不是突然产生的，也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美国极右翼思想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说的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18]，而是源自美国建国之初。这些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变得日益严重。当小布什被军工石油集团扶上总统位置并作为“对全世界拥有所有权”的“祭奠之王”后，它们被以偏执狂的形式表现出来。潜在的或不时表现出来的对其他国家主权的蔑视以及单边主义和军国主义变成了美国国际政策的公然行为。强势、傲慢和谎言成为小布什政府的特点。小布什上台后，文明生活遭到破坏的现象进一步加剧，并形成了一个持续战争和民主堕落的恐怖局面。为了理解和解释这一过程，我产生了写一本关于美帝国形成的书的念头，作为对始于15、16世纪环球航海的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的总结。随着世界一体化而并非各个民族经济相加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美国的历史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混为一体。因为它是唯一有足够能力扩展到地球各个地区的经济体。不了解一个人的过去、其过去的所作所为、履历或犯罪记录就不可能了解一个人。同样，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特性。具体的了解往往是对历史的了解。正如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言，了解（判断）一个事实就是思考它的本质，即在变化和演进条件下它的起源和发展。[19]这就是我写《美帝国的形成》一书时所做的努力。

这一作品是我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和几乎50年前就开始关注美国内外政策的结果。与以往一样，我依然基于了解今天取决于对过去即历史的了解这一原则。因为，我认为政治现象源自各种趋势，这些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关联和发展，出现量和质的变化，进而趋于成熟并最终瓦解。我没有忽视按年代顺序对事件的排列，它往往能揭示各种国际事件的连贯性。我试图通过它们之间的关联和因果作用对其进行解释，并揭示各国所有内外背景对那些历史事实所产生的影响。[20]假如无法揭示支配历史事件的法则和决定它们的条件，无法发现和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这些历史事件就毫无价值，无异于难以辨认的速记。必须深入事件的内部，弄清表象背后真实和理性的原因与本质。

我并非要从各种阴谋角度来看待历史，尽管它们几乎一直发生并仍在

发生，而是要揭开决定事件的不为人知的线索。正如其父亲的鬼魂出现在他面前并说出自己被杀的故事后哈姆雷特对霍拉旭（Horácio）所言，“天地之间有许多趋势是你的睿智所无法想象的”[21]。如果说没有任何事件是绝对蓄意的，那么，也没有任何事件是绝对偶然的。在国际政治中要揭开某些事件背后阴谋的困难在于围绕它的“保密”。卡特执政期间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美国海军军官加里·西克（Gary Sick）指出，中央情报局和其他作为美国国际政策机器的情报机构所进行的“隐蔽行动”中有一种“保密”文化，把行动分成各自独立的几个部分，谁也不能或不应该了解决定一场军事政变、一个恐怖行动和一场战争等政治现象的全景。[22]但是，如果把历史事实与其他各国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分析并进行比较，就能够在一个广阔体系中对其进行整理，并从中发现一些事件与另一些事件通过各种可能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连接点。在这一基础之上并根据安东尼奥·德·阿拉岗的指教，我得以进行一项更重要的研究：通过把历史哲学原理应用于具体历史来研究其原因，试图弄清那些事实和事件。[23]

在这一理论和方法论的模式内，除了可以在美国找到的文件和报刊，我还利用了大量其他文献，不仅仅是学术著作，更主要的是尤里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等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其他参与政府和华盛顿政治生活的军事和非军事人士的回忆录。我尽量把从他们那里收集到的信息进行交叉并与其他从各种文件、国会各委员会中的证词、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官员以及其他参与美国各种政治和军事事件人士的回忆录等文献进行交叉。我还利用了萨姆·吉安卡纳（Sam Giancana）和弗兰克·拉加诺（Frank Ragano）等黑手党首领的回忆录和证词。因为，包括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在内的多位美国总统与他们有联系。塞缪尔·赫什（Seymour Hersh）等优秀记者和严肃的新闻专业人员所撰写的作品对我写作此书也十分有益。

谨向我儿子埃格斯（Egas）表示谢意，他帮助我制作了一些图表。我也要感谢汉堡美国研究所的吉尔贝托·卡尔卡诺托（Gilberto Calcagnoto），我与他就经济问题交换了想法。我特别要感谢我孩童时代的好友、与我情同手足的保罗·法里亚斯（Paulo Fernando De Moraes Farias）。他是

伯明翰大学教授，谙熟伊斯兰文明，尤其是非洲的伊斯兰文明。他通晓阿拉伯语，是一位富有人文主义素养的学者。他不辞辛苦，以批判性的目光核对了我的全部手稿，并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当然，这些合作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赞同我的所有思想和观点。

2005 年春
于圣莱昂（德国）
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尼斯·班代拉

【注解】

[1] Byron, Lord George Gordon. *Don Juan*. "Canto 8th", XV, XCIX, in Byron, 1948, vol. III, p. 441.

[2] Moniz de Aragão, 1858, p. xvii.

[3] Moniz de Aragão, 1878, p. 50.

[4] Lenin, "El imperialismo, fase superior del capitalismo", in *Lenin*, 1948, tomo I, pp. 955-956, 1040-1043, 1066-1067.

[5] Lenin, "El oportunismo y la bancarrota de la II Internacional", id., ibid., tomo I, pp. 936-937.

[6] Kautsky, "Zwei Schriften zum Umlernen. Die Abwirtschaftung des Kapitalismus", (Schluß), *Die Neue Zeit*, 3/4/1915, p. 144.

[7] Ferguson, 2004, p. 12.

[8] "它指的是，当权者、政治家和人民最好学习历史经验，但经验和历史教给人们的是，各国人民和政府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也没有以史为鉴。" Hegel, 1994, Band 1, p. 19.

[9] Paine, 1997, p. 2.

[10] Johnson, 2002, p. 52.

[11] Id., ibid., pp. 52-53.

[12] Melville, 1950, p. 114.

[13] Carta de Domício da Gama ao Presidente Hermes da Fonseca, Washington, 29/12/1991. Arquivo do Instituto Histórico e Geográfico Brasileiro—CDG, L.

[14] 有意思的是，就连科奈尔俱乐部也不接受国际犬业联合会确立的犬种标准。它一直没有加入该联合会，并建立了自己的标准。这一标准只在美国有效。

[15] 理查德·哈斯就"改变主权性质"这一主题所写的文章。"Existing Rights, Evolving Responsibilities", by Ambassador Richard N. Haass, director of the State Department's Policy Planning Staff, to the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and the Mortar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 14 January 2003。

[16] Lieven, 2004, p. 13.

[17] Münkler, 2005, p. 17.

[18] Kagan, 2003, p. 93.

[19] Croce, 1942, p. 168.

[20] Moniz de Aragão, 1878, pp. 377–378.

[21] Shakespeare, *Hamlet*, Scene V, Act I, Shakespeare, 1975, p. 1080.

[22] Sick, 1991, pp. 9–10. Bainerman, 1994, pp. 157–158.

[23] Moniz de Aragão, 1878, p. 378.

第一章

商品资本主义　环球航行和资本主义全球化　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用　马克思眼中的美国　金融资本主义的来临　财富集中和“镀金年代”　征服夏威夷　古巴和美西战争　征服菲律宾　马克·吐温和反帝主义者

资本主义是历史长河中唯一具备世界性扩张的经济形式，其始于重商主义时期，是一个经济持续全球化的过程，这一进程以15世纪末的环球航行为开端。佛罗伦萨银行家巴塞洛缪·马奇奥尼（Bartholomeu Marchioni）、奇洛拉莫·弗雷斯科巴尔蒂（Girolamo Frescobaldi）、卢卡斯·杰拉尔蒂（Lucas Geraldi）、乔瓦尼·巴蒂斯塔·罗维拉斯卡（Giovanni Battista Rovelasca）、菲利波·瓜尔特洛蒂（Filippo Gualterotti）、乔瓦尼·弗朗切斯科（Giovanni Francesco de Allfaiati，佛兰德斯的代理人）和奇洛拉莫·塞尔尼奇（Girolamo Sernigi）为那些替葡萄牙和西班牙效命的航海家走向大海提供了资助，德国银行家和商人也慷慨解囊。1503年，西蒙·塞茨（Simon Seitz）、安东尼奥·韦尔泽（Antonio Welser）、孔拉德·沃林（Gonrad Vöhlin）在获得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许可后，在里斯本建立了商铺，因而得以在更自由的条件下经商。后来成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债权人的德国奥格斯堡雅各布·富格尔（Jacob Fugger）商铺所提供的资金，对佩得罗·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1500年发现巴西[1]、克里斯托弗·德·哈罗（Cristóvão de Haro）和弗雷·加西亚（Fray Garcia Jofre de Loaisa）分别于1514年和1525年远航至拉普拉塔河和马六甲[2]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犹太世家为核心的葡萄牙商业阶层，凭借着快速周转通过汇票所获得的资金和16世纪建立的能使大宗信贷从里斯本迅速转往塞维里亚、马德里、安特卫普、佛兰德斯、里昂、热那亚和布尔果斯的邮传网络，积攒了大量财富，由此确立了商业优势。17世纪荷兰银行和18

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英格兰银行已热衷于在海外开展业务。

后来成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在1714年写给一位年轻商人的告诫信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精神”[3]。他称，赚钱是品德和才干的体现，“时间就是金钱”，“信贷就是金钱”，“金钱具备繁殖和再生的特性，钱能生钱，生出的钱能再生更多钱”[4]。拜伦勋爵在1818—1919年左右创作《唐璜》时，提醒人们金钱“最纯洁的想象力，只有开始创造才能闪烁”[5]。他将英格兰银行家犹太人罗思柴尔德（Rothschild）与其同伴基督教徒巴林（Baring）称为“欧洲真正的主宰”，认为“他们控制着世界的平衡”。他说：

……每一笔贷款
不仅仅是一宗投机生意
并且足以安邦定国，或是将王位踢翻。[6]

1843年，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写道，在维也纳仅仅获得人们容忍的犹太人，凭借其货币的力量，决定着奥匈帝国的命运。他还表示，“在德国一个最小的邦中可能是毫无权利的犹太人，却决定着全欧的命运”[7]。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认为，中世纪保护了货币经济及其所依附的国王和其他贵族的犹太人，不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金钱，而且因为金钱通过他们或其他人而成了世界势力，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8]事实上，银行信贷在19世纪不仅仅具有经济和贸易目的，还带有政治功能，对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国家作为资本的另一面，其产生和发展伴随着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殖民体系确立后的国际劳动分工过程以及受商业资本推动建立世界市场的进程。信贷促使自然经济和简单市场经济时代所残存的国家形式灭亡，对适合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现代国家建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它也是英国这类老牌强国得以凌驾于新建立国家之上，控制其经济并对其外交政策、贸易和海关政策施加压力的最有效工具。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9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强调，资产阶级发挥了“非常革命的作用”[9]：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建立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德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这样伤心”[10]，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预计，旧的民族工业部门

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11]这样，自然经济和前资本主义经济将逐步消亡。资本主义把所有人民连接在一个连通管体系中，使社会变得相互依存，尽管他们的发展和文明程度各不相同。同时，作为不可或缺历史形式的民族国家被建立起来。在这一形式下，资产阶级从民族防御转入进攻状态，从自我防卫和自我民族性的积聚转为对其他民族的占有和支配政策。[12]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13]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的设想，在发展条件和文明最先进的德国，革命只是欧洲工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这一构想未能成为现实主要是因为，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导言中所论述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4]。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既没有在德国也没有在其他欧洲工业国家达到极限，美国就更不用说了。资本主义在向其他地区扩张中，积累过程得以继续，并不断淘汰其他前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方式，如自然经济和简单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利用这些市场投放其经济剩余，将其作为生产资料之源和劳动力储备库。19 世纪下半叶，重工业的发展、电能的发现以及远程传输、蒸汽轮船和铁路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国际化或者说全球化。通过贸易网络以及商品和资本的流通，相距遥远的地区被联系在一起，自然经济或者说前资本主义经济与最发达工业中心相互连接。技术的进步不仅缩短了商品的流通时间，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方法，为国家垄断武装力量提供了便利。资本主义国际扩张要求国家政治和军事的强健。始于 1873 年的经济危机持续了 20 多年。自那时起，资本集中进程加剧，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银行通过向工业提供其匮乏的资金，在促进生产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联合成为促进新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形成了托拉斯、卡特尔、企业辛迪加和银行康采恩。它们试图垄断或保留市场，以便维持国内的产品价格并参与出口贸易。[15]假如把资本集中度作为衡量标尺，即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发展程度，或者说银行对工业的控制程度，也就是所有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程度，那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典范的国家并非贸易自由的英格兰，而是那些采取贸易壁垒的国家。[16]

国内市场的垄断促使大财团寻求国外市场的垄断地位。这使得“自由放任主义”，即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支配经济时期沉睡的殖民扩张重新抬头。从前与国家对立的资本主义在其扩张中转而利用国家，寻求超越自然经济和简单市场经济时期产生的脆弱国家形态，也就是依靠作为打开市场和保证持续积累进程手段的统一国家的形成，通过加强中央权力，重组超级政治结构。随着为争夺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而展开的军备竞赛的加强，重工业已取代纺织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资本主义在获得金融特性、建立企业组织垄断形式的同时，需要强大的国家来保障国内市场并占领国外市场，以便把世界所有地区变为投资场所。1854 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hew Perry）把强大的舰队停泊在日本海岸，通过炫耀武力迫使日本向美国商人开放了两个港口。

美国从此开始实施“打开门户”战略，该战略成为其 20 世纪对外政策的主导。打开门户就是打开市场，这正是美国所追求的目的。但这意味着必须扫清英国和法国这类老牌帝国。[17]

政治和军事实力已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竞争不再仅限于价格起决定性作用的投放产品的市场，它已经以信贷形式延伸至资本市场。信贷条件是以后对工业产品的回购。工业产品也不再仅仅是布料和非耐用消费品，还包括国家现代化必需的铁路设备、大炮和其他各种军事器械。商品和资本出口导致了落后国家消费品工业的出现。受益于外来贷款的铁路和武器既成为美国用来瓦解各国统一的手段，也矛盾地揭示了经济国际化的新阶段。在落后农业国家的资本投资成为推行帝国主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建造铁路的目的是在人口稀少地区开矿和开发其他原材料供应源。为了保护和保障其争夺世界市场的行动，工业强国政府不断加强自己的武装，因而，军事实力已成为其最后的王牌。

与此矛盾的是，随着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因无法继续在本国发展而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重新抬头，民族愿望创造了现代国家，进而实现了民族统一。它承认每一个民族在其疆界内可拥有各自国家形式的权利。希法亭认为，它已成为一个民族主宰其他民族的愿望。他指出，资本已变身为“世界的征服者”。每一块新领土的占领就会建立一个新疆界，而它还必定会被超越。[18]这一进程导致了国力的加强和陆、海军以及官僚的普遍增加，巩固了金融资本与大庄园休戚相关的利益关系。[19]恩格斯在 1892 年指出，“大工业”已成为一种“政治需要”[20]，因为战争已变成“大工业”[21]的一个领域，没有战争就无法生产（坦克、大炮、子弹、自动步枪、榴弹和火药等）。军国主义已成为倾销经济剩余

至关重要的工具，它使帝国主义的到来成为可能。卢森堡把这一通过征服尚未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控制和吞并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而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定义为“帝国主义”。[22]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工业化资本主义的产物，尤其受到向农业地区出口资本体系的推动。[23]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扩张已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需要。[24]作为金融资本政策，帝国主义试图通过征服战争这一手段复制生产关系，因而导致了军国主义和毁灭性战争，不管这些战争是作为扩张政策，还是英国为保持对19世纪下半叶划定的属其势力范围的辽阔热带地区的控制。[25]1872年—1914年期间，世界列强征服了2 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欧洲面积的2.5倍。[26]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没有应验。卢森堡在《资本积累》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理论的错误是由于他做分析之时帝国主义尚未在世界舞台上出现。[27]自19世纪下半叶起，所有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帝国主义，致使恩格斯在《资本论》[28]第三卷插入注解时已提到世界市场竞争的加剧。

马克思把美国认定为“最进步的国家”[29]。他认为，如果没有美国，“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30]。19世纪中叶，美国负有巨额外债。外债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西进运动。它依靠英国巴林兄弟公司贷款，建造了首条铁路。[31]美国的铁路网从1850年的14 151公里增至1889年的85 000公里。1892年，铁路长度已达278 409公里。然而，新领土的征服、对非资本主义经济地区的控制、铁路建设和土地投机扩大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流通，使再生产和积累成为可能，并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在23年时间内，也就是从1869年至1892年期间，400多万移民来到美国并向西推进。他们在借助火器、犬、酒精饮料和梅毒等工具灭绝印第安人之后，把他们的土地占为己有。随着蒸汽犁的引入，这些新庄园主很快适应了更现代的农业技术。南方庄园主由于奴隶解放也不得不采取同样做法。1883年，为逃避俄罗斯的迫害，首次出现了成批犹太人移民潮。从那一年到1914年，共有900多万移民来到美国。[32]

在世界工业强国排名中，美国从1840年的第五位上升到1860年的第四位，1870年跃居第二位，并于1895年占据首位。[33]1856年，美国生产者以每吨20～25美元的成本从苏格兰进口煤，用来提炼煤油，同时还聘请了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 Jr.）等专家研究石油，以期从中找到某种替代品。1874年，美国已拥有20条输油管。在那一年和第二年，

80%的输油管已无法使用。亨利·劳埃德（Henry D. Lloyd）讽刺说，死亡的并不是输油管，而是建造它们的主人被更强竞争者指使的人所杀害。[34]自南北战争(1860—1864 年）结束至 19 世纪末这一被马克·吐温称为“镀金年代”的阶段，美国的钢、煤、设备、工业品、木材和黄金产量增幅巨大，使其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一变化是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劳动者与企业主之间出现最猛烈冲突的状况下完成的。[35]1914 年，在科罗拉多南部的卢德罗，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feller）雇用的枪手以及其他矿主与拥有武装的劳动者发生了激烈冲突，劳动者营地被纵火，13 名妇女和儿童窒息而死。[36]西部的暴力从 1850 年一直持续到 1920 年。以“香蕉男爵”著称的约翰·洛克菲勒（石油）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钢铁）等商人敛取了巨额财富。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所强调的“平等精神”已荡然无存。[37]1890 年，1 200 万个家庭中的 1 100 万个年收入低于 1 200 美元，而这一家庭群体的平均年收入还不足 380 美元，远远低于贫困线。前所未有的财富集中使政治进程受到腐蚀。美国记者兼作家亨利·劳埃德于 1894 年在《财富与国民的对立》一书中指出，标准石油公司不仅操纵市场，以便消除竞争，而且还贿赂国会议员，嘲弄政治民主。他还称，“自由创造富裕，但富裕毁灭自由”[38]。他承认“自由和垄断无法共存”[39]。法国外交官奥克塔夫·洪堡（Octave Homberg）认为，富庶的美国人相信自己正走在“神圣道路上”，财富是对其品德的奖赏。他指出：“在他们眼中，金钱逐渐变得神圣。”[40]当时在美国出现的大公司开始影响大的政治党派的活动以及地方、州和全国层次的决策进程。立法者经常将私人利益和公共义务相混淆。哈佛大学经济政策教授陶西格（F. W. Taussig）指出，“美国的这一变化开启了联邦议会不知廉耻的腐败。公共义务和私人利益的界线往往不复存在”。那些受自身利益驱使者通过推动法律修改大发横财。国民痛心地看到，公共人物的名誉和诚信不再纯洁[41]，他们作为大资本利益的工具，对选举、立法和新闻媒体公然大胆的操纵加剧。1872—1873 年，信贷公司丑闻爆发。该公司由奥克斯·埃姆斯（Oakes Ames）、托马斯·杜兰特（Thomas C. Durant）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的一些股东组成。他们向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克斯（Schuyler Colfax）、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James W. Patterson）、纽约州众议员詹姆斯·布鲁克斯（James Brooks）和其他一些议员提供了铁路建设的股份。这些人在批准联邦补贴时故意隐去工程成本，然后从公司分得利润。1894 年，亨利·劳埃德承认，“理论上十分公平并在第一个世纪就创造如此幸福和

富裕的美国体系”正在步所有体系的后尘，“正变成人为的、可操纵和腐败的体系”[42]。

巨大的经济空间降低了生产成本，便利了工业企业的巨大分工和系列生产，这使美国能够在保护主义体系下迅速发展，并在几十年内成为经济强国，尽管此时它尚未成为政治和军事强国。美国不仅拥有甚至足以满足帝国主义阶段的巨大经济空间，其扩张空间已被“门罗主义”[43]从地理上界定。[44]1889 年 11 月，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政府（1889—1893 年）在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 Blaine）的召集下在华盛顿举办了首届泛美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在美国庇护下的美拉贸易体，以摆脱英国和其他欧洲工业国的竞争。美国的真实意图是征服南美市场。概括为“美国人的美洲”这一口号的“门罗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事实赋予了它更大的经济实力和更广的政治影响力。但美国提出的海关联盟方案未被与会各国接受。首届泛美会议的具体成果是“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的设立。共和党费城领袖、报纸编辑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Emory Smith）1896 年宣称，“统治本半球的不是我们的旗帜就是我们的精神”[45]。

当时，美国已面临“边界关闭”问题，即本大陆最后一条边界已不复存在。它还需要更多土地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1890—1893 年的经济萧条迫使其逐渐把目光转向亚洲。为此，它需要在西太平洋建立一个基地并控制菲律宾，以便争夺广阔的中国和东南亚市场。许多商人确信国内市场已不足以吸纳大量工业品，美国的工业增长使征服海外市场不仅成为一种可能，还是一种需要，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军国主义成了帝国主义扩张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它首先以海上实力的形式体现出来。詹姆斯·布莱恩在 1879 年宣称，“我们需要海军保护贸易，但我们需要贸易增长，以便让海军保护”[46]。1893 年 1 月 16 日，“波斯顿号”在夏威夷靠岸，美国军队以“保障美国公民生命财产”为由登岸，并在伊欧拉尼皇宫前扎营，尽管夏威夷大街一片平静，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并未受到任何威胁。当时，继承 1891 年去世的兄弟卡拉卡瓦（David Kalakaua）国王[47]王位的利留卡拉尼（Lili'uokalani）女王[48]居住在皇宫内。种植菠萝和甘蔗的庄园主“豪勒”（外国白人，即美国人）于是成立了一个“公共拯救委员会”，并宣布成立共和国，来自新英格兰家族的富有菠萝种植园主桑福德·多尔（Sanford B. Dole）出任总统。1898 年，虽有内部存在一些反对意见，美国国会最终通过决议，将夏威夷并入美国。实际上，只是批准了一个既成事实。当时，美国民众对夏威夷并入美

国的要求与日俱增。支持者认为，美国需要那些岛屿以维护其在远东的商业利益，夏威夷是“通往太平洋的要冲”[49]。长老会把贸易扩展视为自己的同盟和“对外大力推广文明”的必需部分。[50]由菠萝种植园主、美国传教士之子洛林·安德鲁斯·瑟斯顿（Lorrin Andrews Thurston）担任社长的《火奴鲁鲁广告商报》宣称，“夏威夷已成为大美国首个海外据点”[51]。事实上，自从那时起，夏威夷变成了美国至关重要的军事中心。

古巴解放战争为美国发动战争夺取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残余部分提供了巨大机会。此前，从1819年并吞佛罗里达[52]到1848年通过自己一手挑起的与墨西哥的战争占领加利福尼亚[53]，美国已通过持续扩张边界占据了大量土地。1898年，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1897—1901年）向古巴派遣“缅因号”战舰，表面上是进行友好访问，实质是显示美国海军实力，逼迫西班牙从该岛撤走。自托马斯·杰弗逊和约翰·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起，美国政要一直将古巴岛视为其自然疆界。1898年2月15日，当“缅因号”正准备离开哈瓦那港时，神秘地发生了爆炸。这一或由美国人自己或由古巴反叛分子实施的意在使美国卷入战争的挑衅行动，致使舰上2名军官和266名士兵丧生，成为美国对西班牙开战的理由。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或迹象表明西班牙参与了这一事件，但美国媒体立即把炸毁“缅因号”归咎于西班牙。当时正忙于扑灭古巴独立运动的西班牙根本无意挑起与美国的冲突，不可能卷入这一事件。但“毋忘‘缅因号’”的口号却成为美国军国主义战争的动员令。麦金利于1898年4月11日致函国会，要求批准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而西班牙已在两天前同意了美国提出的所有要求，下令停止敌对行为，并同意与古巴反叛者休战。正因这一事实，詹姆斯·罗兹（James Ford Rhodes）认为，“辉煌小战”是一场“毫无需要的战争”[54]。之所以称之为“辉煌小战”，是因为美国在10周内轻松地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它并非是一场毫无需要的战争。

美国在西属岛屿中有着直接的利益[55]，这些利益并不仅仅是与蔗糖、咖啡和烟草有关的经济利益，还包括战略利益。美国政府认为，控制古巴对保护墨西哥湾和约50年前就已谋划在巴拿马地峡开凿的运河安全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在波多黎各和维京群岛之下。麦金利总统此前已从丹麦手中得到了维京群岛，目的是在那里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和煤库。同样，菲律宾群岛也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因为它能使美国在人口众多的亚洲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自1896年起，菲律宾土著居民就一直在与西班牙占领者抗争。在批准对西班牙宣战的同时，美国国会通过了《特尔勒修正案》。根

据该修正案，除非为了恢复和平，美国放弃任何对古巴行使“主权、管辖和控制”的权利。但麦金利不惜占有西班牙帝国的一切残余，不发动战争就难以实现这一目的。西班牙在1898年7月1日的卡内和圣胡安两场战役中被击败，1898年12月10日，双方签署了《巴黎条约》。西班牙除了彻底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外，还以2 000万美元的价格把包括加勒比的波多黎各在内的西印度公司剩余部分和太平洋的关岛和菲律宾群岛以殖民地形式转让给美国。中国潜在的贸易重要性是美国有意在太平洋建立海上实力的真实意图，正是这一因素最终左右了夏威夷和萨摩亚的并入以及美国继续占领菲律宾的决定。[56]

尽管《巴黎条约》签署之时[57]美国只控制马尼拉及其周边地区，但10天后（1898年12月21日），麦金利就宣布以殖民地形式占领菲律宾并推行所谓的“亲善同化”。为独立而战的菲律宾人在奥米利奥·阿吉纳尔多（Emílio Aguinaldo）的领导下占据着群岛的其余地区，并宣布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为了奴役菲律宾人民，美国发动了另一场战争，这导致了美国反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列宁将这些人称为资产阶级民众中最后的莫希干。[58]他们中最著名的当属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前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和企业家卡内基。这些反帝主义者许多是废奴运动的斗士，他们认为民主和帝国不可能真正相容。[59]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9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接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时指出：

> 帝国主义将会让军事合同商受益，让船主受益。他们把活着的士兵运往菲律宾，再将其尸体运回来。以权谋私者也将受益；它也会让军官们受益，他们的工资在这里确定，却在那里支付。但对农民、劳动者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却只能带来毫无回报的支出和毫无补偿的风险[60]。

布莱恩反对共和党所宣扬的帝国主义。他指出，当美国抛弃自我统治的方针后，就不再是世界进步的道德因素。因为，“它不能在宣扬政府来自人民理论的同时，践行政府依靠野蛮武力的理论”。在发表于《北美评论》杂志171期（1900年12月）题为“1900年选举”的文章中，他指责共和党以扩展贸易和为国家创造财富为由，无耻地宣扬贸易主义理论和推行帝国主义路线。他称，“这是捍卫帝国主义的最强借口”。他指出，以美元为借口是有影响力的，“一些保护国内工业托拉斯的强大金融利益集团

将会迫使国家参与攫取国际土地的托拉斯”。

对吞并菲律宾持反对态度的布莱恩对美国“受上帝引领去牺牲我们自己的公民并杀戮菲律宾人，以便在遥远的人民头上建立一个不受欢迎政府”的理论进行了抨击，将其与国王神权思想和遭到亚布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谴责的“应该允许低等种族尽可能多地得到他们能够享受的东西，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替他们做事”的观点相提并论。他指出，帝国主义者需要帝国主义，不仅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国外投资，而且还用以威胁他国人民。他还回忆了军队在美国国内攻击罢工者的事件。工业企业、军人、政治人物和个人利益所施加的压力已使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气氛变得极为浓重。在菲律宾，美国军队在丛林中喷洒汽油，焚烧整个村庄，男女老少均成为杀戮目标。民众对阿吉纳尔多部队的支持使美国军人十分恼火，他们在抓获俘虏后对其施以酷刑，甚至对那些与抵抗者毫不相干的人进行刑讯逼供。[61]俘虏们或被长时间灌水，或被捆绑在狂奔的马下，或被系住拇指吊起，或被吊在火堆之上。在萨马的一次武装冲突中，美军一个连的74名士兵中有47人丧生，22人受伤。于是，另一些愤怒的美军士兵来到巴拉金加（Balaginga），他们在10年前因屠杀数百名印第安人而赢得“地狱咆哮的杰克”绰号的雅各布·史密斯（Jacob W. Smith）将军的指挥下，将城市和整个岛屿彻底焚毁。史密斯的命令是：“我不要俘虏，我只要你们烧杀，你们烧杀越多，就越能让我高兴。”他命令把萨马变成一片凄凉的旷野，把10岁以上的居民统统杀死。在11天中，255座房子被焚烧，39 000名手无寸铁的菲律宾人被杀死，就连13头牛也未能幸免。岛上人口从30万降至不足25.7万。[62]

菲律宾战争是为满足大财团、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帝国主义利益而发动的首场战争，是美国镇压暴动的首次经历。美国试图证明其相对于“野蛮人”的种族优势情结，并取得位居英国之上的世界强国地位。阿吉纳尔多在1901年3月被捕，但菲律宾抵抗部队在来自巴坦加斯的米格尔·马尔瓦尔（Miguel Malvar）将军的统领下，依靠全民支持和行动的高度统一继续战斗。这一被美国官方称为“菲律宾暴动”的战争持续了4年，4 000名美军士兵付出了生命代价[63]，其中很多人死于热带疾病，包括死于圣马特奥战役（1899年12月23日）的亨利·劳顿（Henry C. Lawton）将军。战争给美国带来了极大冲击，其军费开支增至6亿美元。尽管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2年7月4日宣称“菲律宾暴动”已结束，但许多城镇的反叛仍未停息，吕宋岛一些部落的地区性游击战和零星起义一直持续到1914年

左右。

美国人民自认为是上帝选定的子民，其“昭昭天命”[64]就是通过太平洋向亚洲扩展。占领25万平方公里新土地的美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以帝国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领土扩张阶段。[65]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这样解释美国的扩张：“一个执著地往西拓展疆界以寻求新土地、新权力和以实现未开化世界完全自由为目标的人民所面临的这一巨大压力，就如同‘天命’一直主导着我们的进程，构成了我们的政策。”[66]其“昭昭天命”意味着履行上帝赋予的潜在的、不可避免的道德使命和兼并邻近土地。1898—1903年，美国正式兼并了夏威夷、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还占领了巴拿马地峡，并为便利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贸易在那里开凿运河。美国的所作所为符合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舰长的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取决于其海外贸易，贸易取决于海上力量，而海上力量则取决于殖民地。军国主义最初以海上实力的形式体现，它在帝国主义扩张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菲律宾群岛成为美国向亚洲扩张时举足轻重的保障中心。美国通过设立军事基地和煤库，建立了将自太平洋东岸至萨摩亚群岛的图图伊拉和南太平洋的关岛等属地连成一体的贸易和军事通道，为向亚洲扩张提供了便利。

19世纪90年代给美国的对外政策打上了深深烙印。扩张政策体现在其经济发展中，军国主义成为帝国形成必不可少的元素。美国军队从美西战争前拥有3万兵力增至6.5万，后又增加到8万，菲律宾战争结束后才减至5.8万。[67]军事开支从1898年前的2 000万～2 400万美元，上升到1900年的8 040万美元，1902年已超过1.15亿美元。[68]海洋是其进行帝国扩张的巨大空间。布莱恩1879年就声称，“我们需要海军保护贸易，但我们需要贸易增长，以便让海军保护”[69]。罗斯福总统认为，没有海上实力作基础，“门罗主义”难以为继。美国应该拥有“世界上最好和最强大的海军”[70]。

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 A. Hobson）1902年在发表于伦敦和纽约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中指出，在帝国主义争斗中，兼并了夏威夷并征服了西班牙帝国残余部分这一“强大并在前进中国家”（美国）的加入，不只是增加了一个可怕竞争者，而且将使许多问题发生改变并变得复杂。[71]由于其关注焦点和政治活动越来越转向与太平洋岛国和亚洲沿海国家的贸易，而欧洲列强也在该地区活动，它们之间的冲突将迫使美国实际上抛弃此前一直主导其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原则。[72]美国的工业生产力自19世纪末迅速发展，超越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其工业产品出口额从1890年的

3 140 万美元增至 1900 年的 8 820 万美元，而同期的农产品出口仅从 1.257 亿增至 1.809 亿美元。[73]霍布森称，“它的工业品充满了资金，已达到饱和。”他认为，工业品和投资对外国市场需求的剧增，是共和党把帝国主义作为政策和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大工业和金融巨头属于共和党，而共和党更属于他们。”他警告说：

> 我们不应该被西多奥·罗斯福总统及其“昭昭天命”和“文明使命”团伙的冒险热情所欺骗。洛克菲勒先生、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先生及其同伙需要帝国主义并将其捆绑在伟大的“西部共和国”身上。他们需要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指望用本国的公共资金为其资本找到能盈利的途径，否则就会过剩[74]。

霍布森认为，美国“商人”对政策行使的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控制，使它能够比英国更迅速而不用采取迂回方式驾驭对外政策。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压力的自然产物，因无法在美国找到空间，就需要到外国市场投放其产品和资金。[75]抛弃孤立主义原则已变得不可避免，取而代之的是“昭昭天命”以及美国有“把‘预先打造好的’文明带给未开化人的使命”的信念。[76]

这样，到 20 世纪初，美国的霸权已不只限于本半球。在那里，它几乎“至高无上”，它的“命令”具有法律的分量[77]，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1895 年曾如是称。事实上，尽管在 1876—1915 年期间，世界上约 1/4 的土地作为殖民地被为数不多的国家分割或重新分割，美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列强严重对抗的地区。因为，不管是英国还是其他国家，任何人都没有看到挑战“门罗主义”和仇视美国的理由。[78]“门罗主义”是单边政治的一种表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 年）用一个推理使其恢复了活力，为美国在拉美任何国家行使干涉权利找到了合理借口。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侵略性地行使这一权利，以保护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在本半球巩固非公开宣称的美“帝国”。1904 年，罗斯福重申，推行“门罗主义”使美国不得不在西半球国家“犯错或无能”情况下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尽管它不愿这样做。[79]

那一年，约瑟夫·帕德维（Joseph Patouillet）在法国第戎大学法律系的博士论文答辩中声称：

> 美国的财富使它获得了新的权力：利己主义和野心勃勃的愿望增

> 加了。其人民的所有力量被过分地用来无止境地增加财富。美国为它的贸易数字感到骄傲，这自然让它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由于无法在家里找到食物，它就梦想通过扩张来增加财富，于是就将目光投向国外。美国的外交是由其所附带的利益构成的，其动机是热衷投机、憎恨竞争，以便主宰全球贸易。这就解释了征服精神、殖民政策、寻找机会和经济扩张，说到底就是让美国变得焕然一新和适应“门罗主义”新现实的企图。[80]

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表达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其告别演说中确定的孤立主义倾向——“欧洲有一系列与美国毫不相干或关系微乎其微的基本利益”[81]。他强化了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1801—1809年）的论断：“美国拥有属于自己的半球”[82]，表明了扩张主义的企图。被称为美国第一个扩张主义浪潮的“昭昭天命”包含了上帝与其同在的思想。在1812—1814年的美英战争后，扩张其领土和控制权意味“延伸自由区域”已成为思潮。[83]

西奥多·罗斯福和其他美国领导人所表达的信念是，美国的安全取决于在本半球的真正称霸。[84]即使在开凿巴拿马运河工程完成前（1914年），美国就已拥有世界上第二强大的海军。在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巩固了世界强国的地位。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其推行帝国扩张政策的理论基础，其扩张行为被解释为文明向野蛮的推进。[85]但罗斯福抨击了“强大工业巨头”的权势，认为它们已经大踏步增长，而人民通过政府控制它们或确认是否有过度行为的方法则是过时的。[86]他指责“商业世界的反动派们以及作为他们同盟者和工具的政治人物和报纸编辑，以自由名义从观点分歧中获取好处”。他说，在所有专制形态中，最令人乏味和最平庸的是“纯富裕专制，即富豪统治的专制”[87]。他的反对未能阻止“商业世界的反动派们”日益巩固他们在美国的专制统治，并极力向世界其他地区延伸。他自己则用“门罗主义”的推理和“大棒”政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正如沃伦·齐默尔曼（Warren Zimmermann）所总结的：罗斯福的两个任期使美国“首个帝国总统”成型。因为，在美国属地中，前所未有地既拥有邻近也拥有远离其国土的地方。美国在加勒比和中美洲赢得了主导地位，已拥有世界第二强大的海军，并能使其他国家重视其警告和政策。[88]

【注解】

[1] Mathew，1997，pp. 70，151－155.

[2] “（……）弗雷·加西亚那一年出发前往马六甲时，船只装备的 3/4 来自富格尔和威尔塞商铺”。Kellenbenz，Hermann. “Os mercadores alemães de Lisboa por volta de 1530”，*Revista Portuguesa de História*，vol. IV，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1961，pp. 5－20.

[3] Weber，1988，vol. I，pp. 180－181.

[4] Benjamin Franklin，“Advice to a Young Tradesman”（1748）.

[5] Byron，Lord George Gordon. *Don Juan*，“Canto 2nd”，II，p. 347，in Byron，1948，vol. II，p. 347.

[6] Id.，ibid.，“Canto 12th”，V & VI，p. 348.

[7] Bauer，2004，p. 153. 布鲁诺·鲍威尔写的德语原句是：“*Der Jude，der in Wien z. B. nur toleriet toleriert ist，bestimmt durch seine Geldmarcht das Geschick des ganzen Reichs. Der Jude，der in den kleinsten deutschen Staat rechtlos sei kann，entscheidet über das Schicksal Europas*”。Bauer，Bruno. *Die Judenfrage*（Braunschweig，1843，），apud Marx，“Zur Judenfrage”，1981，Band 1，p. 373.

[8] “犹太人用 犹太人方式解放了自己，不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他们或者不通过他们而成了世界势力，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马克思认为，犹太教相对于基督教的实际权威（“die praktische Herrschaft des Judentums über die christlische Welt”）已在北美得到了明确无误和正常的表现。Id.，ibid.，p. 373.

[9] “Die Bourgeoisie hat in der Geschichte eine höchst revolutionäre Rolle gespielt”. Marx，Karl；Engels，Friedrich.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in Marx & Engels，1980，Band 4，p. 464.

[10] “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有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的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Id.，ibid.，p. 466.

[11] “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失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Id.，ibid.，p. 466.

[12] Luxemburg，1979，p. 66.

[13] “Proletarios de todo o mundo，uní-vos.” Marx，Karl；Engels，Friedrich.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in Marx & Engels，1980，Band 4，p. 493.

[14]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Marx，Karl.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rwort，” ——

in Marx & Engels, 1980, Band 13, pp. 8-9.

[15] Hilferding, 1968, Band II, pp. 411-420.

[16] Id., ibid, p. 411.

[17] Williams, 1972, pp. 19-27, 59-66.

[18] "获得资本是为了征服世界。每一块新领土的占领就会建立一个新疆界，而它还必定会被超越。" Hilferding, 1974, Band II, p. 457.

[19] Hilferding, 1974, Band II, p. 468.

[20] Engels an Nikolai Franzewitsch Danielson in Petersburg, Londres, 22/9/1892,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Werke*. Berlim: Dietz Verlag, 1974, Band 38, p. 467.

[21] 在恩格斯原著中为法语。

[22] "帝国主义是对通过征服尚未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控制和吞并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而进行资本积累过程的政治定义。" Luxemburg, 1990, Band 5, p. 391.

[23] Kautsky, 1915, p. 15.

[24] Hobson, 1975, p. 130.

[25] Id., ibid., pp. 17-22.

[26] Boukharine, 1928, p. 81.

[27] Luxemburg, 1990, Band 5, p. 518.

[28] Marx, Karl.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ritter Band, in Marx & Engels, Band 25, 1981, pp. 130, 453-454. 马克思未能完成《资本论》第三卷。他对该卷的最后注释完成于 1865 年。

[29] Marx an Pawel Wassiljewitsch Annenkow, Brüssel, 28/12/ [1846], in Mark & Engels Band 27, 1976, p. 458.

[30] "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 Id., ibid., p. 458.

[31] Von Schoulze-Gaevernitz, "Amerikas Überimperialismus", in Bonn & Palyi, 1925, Erster Band, p. 110. Luxemburg, 1990, Band 5, p. 371.

[32] Lloyd, 1963, p. 9.

[33] Johnson, 2002, p. 484.

[34] Ribeiro, 1970, p. 487.

[35] Foner, 1998, p. 116.

[36] Johnson, 2002, p. 494.

[37] Tocqueville, 1968, p. 121.

[38] Lloyd, 1963, p. 9.

[39] Homberg, 1929, pp. 6-7.

[40] Apud Foner, 1998, p. 17.

[41] Taussig, 1890, pp. 166-167.

[42] Lloyd, 1963, p. 170.

[43] Hilferding, 1974, Band II, pp. 445, 446.

[44] 1823 年 12 月 2 日递交国会的函中阐述的“门罗主义”受到乔治·华盛顿“欧洲有一系列与美国毫不相干或关系微乎其微的基本利益”的孤立主义思想的启发，并发展了托马斯·杰弗逊“美国拥有属于自己的半球”的思想。这一半球既可是整个大陆，也意味着自己的国家。参见乔治·华盛顿总统在 1796 年 9 月 17 日所做的告别演说，参阅 Morris, 1964, p. 98; Connell-Smith, 1966, pp. 2, 3。“门罗主义”不仅是对“神圣同盟”，也是对英国本身的严重警告，尽管它对于捍卫新的美洲国家的直接效应是纯粹道德上的，因为美国的经济利益及政治和军事能力没有超出加勒比地区。不管如何，“门罗主义”导致西班牙对美洲重新殖民计划的落空，使美国得以继续往西扩展边界，在这一过程中，当地土著居民不断遭到杀戮。

[45] Apud Schirmer, 1972, p. 20.

[46] Id., ibid, p. 27.

[47] 1887 年，美国庄园主发动了一场政变，迫使卡拉卡瓦国王接受“刺刀”宪法，国王丧失了大部分权力。

[48] 她的基督教名为利迪亚·利留卡拉尼女王（Lydia Lili'uokalani），1895 年遭囚禁，1896 年被释放，1917 年去世。

[49] Dulles, 1965, p. 185.

[50] Id., ibid, pp. 190-191.

[51] Wing, Cristine. “The United States in Pacific”, in Gerson & Birchard, 1991, pp. 123-124. Bell, 1984, pp. 8-37.

[52] 当美国 1776 年建国时，其领土从大西洋延伸到了密西西比，但不包括佛罗里达和新奥尔良港。20 年后，托马斯·杰弗逊总统将领土翻了一番。他以 1 500 万美元的价格从当时处于拿破仑统治下并迫切需要资金去对付英国的法国手中购得了整个路易斯安那 2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Moniz Bandeira, 1998, pp. 13-15.

[53] 战败的墨西哥与美国签署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把加利福尼亚和一直到得克萨斯的整个地区都让给了美国，总面积达 240 万平方公里，后来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大量金矿。它超过了德意志帝国的面积。Kautsky, 1915, p. 27.

[54] Rhodes, J. F. *The McKinley and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s*, New York, 1922, apud Jenks, 1928, p. 41.

[55] 关于俄国对美西战争的看法以及涉及当时的外交文件，参阅 Vladimirov, 1960, pp. 162-245。

[56] Dulles, 1965, p. 204.

[57] 1899 年 2 月 6 日，美国参议院以 57 票支持、27 票反对通过了《巴黎条约》。美国人民通过给予麦金利第二个任期表达了对该条约的支持。1901 年，28 岁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乔尔戈什（Leon Czolgosz）在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 1869—1940）思想的影响下，在水牛城（纽约州）举办的泛美博览会期间，用左轮手枪暗杀了麦金利（1843—1901）。

[58] Lenin, *El Imperialismo, Etapa Superior del Capitalismo*, in Lenin, 1948, tomo I,

pp. 1051－1052.

[59] Foner, 1998, p. 134.

[60] Official Proceedings of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Held in Kansas City, Mo., July 4, 5 and 6, 1900, Chicago, 1900, pp. 205－227. Vide também Schirmer, 1972, pp. 205－206.

[61] Schirmer, 1972, pp. 145－147, 233－234, 236－238.

[62] Id., ibid., pp. 237－239. 纳尔逊·迈尔斯（Nelson A. Miles）将军写信给作战部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对战争被引导到“十分残酷”的地步表示抗议。雅各布·史密斯将军和埃德温·格伦（Edwin F. Glen）上校被送交军事法庭受审。

[63] 1899 年 1 月 31 日，在菲律宾的美国远征军中有大约 20 032 名士兵和 819 名军官，但在之后几个月中有更多部队抵达。至 1902 年 4 月 16 日，超过 12 万名美国士兵曾在菲律宾持续三年的战斗中打过仗或服过役。

[64] 为美国 19 世纪中期进行的领土扩展找到正当理由的“昭昭天命”是记者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提出的。

[65] Hobsbawm, 1988, pp. 89－91.

[66] Apud Weinberg, 1963, pp. 1－2.

[67] Patouillet, 1904, pp. 150－151.

[68] Id., ibid., p. 154.

[69] Schirmer, 1972, p. 27.

[70] Apud Patouillet, 1904, p. 158.

[71] Hobson, 1975, p. 22.

[72] Id., ibid., p. 22.

[73] Id., ibid., p. 79.

[74] Id., ibid., pp. 77－78.

[75] Id., ibid., pp. 78－79.

[76] Id., ibid., pp. 74, 275.

[77] “*The United States is practically sovereign on this continent, and its fiat is law upon the subjects to which it confines its interposition*”. Nota à Grã－Bretanha, 20/6/1895, apud Hill, 1943, p. 602. Perkins, 1963, p. 175. Nevins & Commager, 1986, p. 396.

[78] Hobsbawm, 1988, pp. 90－91.

[79] Apud perkins, 1963, p. 240. Vide Weinberg, 1963, pp. 428－429.

[80] Patouillet, 1904, p. 62.

[81] 关于乔治·华盛顿以来的孤立主义倾向，参阅 Perkins, 1963, pp. 3－13。

[82] Connel-Smith, 1966, pp. 2－3.

[83] Williams, 1972, p. 60.

[84] Zimmermann, 2002, p. 496.

[85] Id., ibid., p. 458.
[86] Roosevelt, 1985, pp. 437–438.
[87] Id., ibid., p. 439.
[88] Zimmermann, 2002, p. 474.

第二章

统一的德国和俾斯麦的“世界政策”　对经济空间的争夺　德国和美国　1914—1918年战争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　俄国革命　美国向欧洲提供信贷和军火出口　伍德罗·威尔逊的对外政策和美国参战

由奥托·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统一的德国和美国一样，已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对拥有丰富铁矿储量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占领，加上法国在普法战争（1870年）色当战役失败后作为战争赔偿向德国支付的50亿金法郎，推动了德国工业化发展的水平。1874年，德国的铁路网（超过2万公里）已基本形成。它在世界市场的贸易份额仅次于英国。其人口从1873年的4 160万增至1895年的5 200万，1913年达到6 700万。[1]到1900年，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仅次于美国。1907—1913年，其煤产量增长1/3，从1.43亿吨增至1.91亿吨。钢产量增长近50%，从1 300万吨增至1 930万吨。[2]以西门子和德国通用电器公司（AEG）为代表的电力材料工业、化工工业（拜仁和赫司特）和发动机工业在同期取得了极高增长率。外贸额从1907年的156亿美元上升到1913年的209亿美元。[3]但欧洲情况与美国不同。美国广阔经济空间内的不同自然条件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欧洲，这些自然条件被众多小国所瓜分。这一事实促使英法等工业国通过占领亚洲和非洲的土地来扩展其殖民帝国。即使像比利时和荷兰这样的小国，也在其他大陆拥有数量可观的属地。与英法尤其是把整个美洲都当作自己殖民地的美国不同，德国不拥有任何重要的殖民地，没有可供其扩展资本的消费圈和扩大生产即进行再积累的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土地。为避免与英法冲突，俾斯麦反对德国殖民学会[4]领导人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提出的建立一个中非帝国的设想。因为不愿与美国对抗，他更断然拒绝了1889年巴西建立共和国之际怂恿在该国南部

建立一个独立的德国人政权的提议。[5]德国只是在1884年占据了非洲西海岸的多哥和喀麦隆，1885年又占得了印度洋边的坦噶尼喀。[6]俾斯麦的“世界政策”并非意味着征服世界，而是勒内·吉罗（René Girault）所称的“德国对外政策的世界化”[7]，即德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8]。但随着1888年俾斯麦下台和威廉二世登基，“世界政策”获得了新动力。1896年，威廉二世宣称要将德意志帝国打造成“世界帝国”[9]。德国当时已出现资本富余和工业产品过剩问题，它需要新的市场。因此，它被迫在小亚细亚、东非、西非和中国等地区推行殖民和保护国政策，以便拓展其贸易。[10]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与其所拥有的相对狭小经济空间之间的矛盾，导致处于国内社会和政治压力下的德国选择了希法亭所预见的暴力解决方式。[11]

1914年欧洲战争的责任不能归咎于某一个国家[12]，诸多复杂因素（经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导致了战争的爆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民族国家思想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上升，而贸易竞争是促使主要工业国家发动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希望战争并为之做好了准备。英国保守党领袖亚瑟·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对美国驻伦敦公使馆秘书亨利·怀特（Henry White）说：“我们的愚蠢之处可能在于，未能在德国建造如此多舰船并夺走我们贸易之前找到向其宣战的理由。”[13]英国希望战争，它想要的是一场预防性战争。另一方面，不断扩展出口市场的需要是德国渴望战争的“主导动机”。作为1870年战争的胜利者，它相信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认为自己的士兵战无不胜。于是，它试图通过武力来拓宽经济空间。克虏伯（Krupp）作为军工企业自成立至1912年，共生产了53 000门大炮。其中，26 000门卖给了德国军队，27 000门被销往其他52个国家。[14]但市场问题已显露，由于军工产品大量剩余，于是，克虏伯就为挑起战争积极活动。[15]法国社会党领导人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1914年7月5日预言，这场战争“肯定会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他警告说：

> 这将是欧洲的一场灾难：它不会仅仅是巴尔干所发生的只有30万人参与的战争[16]，而将会是一场涉及五六个国家的200万人的战争。这是多么可怕的屠杀、毁灭和野蛮！

事实正是如此。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德国立即向俄国（8月1日）和法国（8月3日）宣战并入侵比利时（8

月 4 日）。于 1904 年与法国和俄国达成诚挚协议的英国又立即向德国宣战。正如饶勒斯所预言的，战火蔓延至整个欧洲，四大洲共有 57 个国家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世界列强利用技术优势在战争中试验新武器，它们史无前例地借助恐怖手段。化学工业发达的德国在战场上使用了毒气。[17]盟国和德国均首次启用了轰炸机和潜艇。客轮也成为攻击的目标，这令平民惶恐不已。

战争爆发一个月后，“第二国际”最重要的理论家考茨基在 1914 年 9 月 11 日出版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时得出的“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18]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帝国主义。他认为，与大公司、大银行和亿万富翁间疯狂竞争以及吞并弱者并导致金融财团产生建立卡特尔的想法一样，世界大战将促使帝国主义列强建立一个联盟，并终结武器生产的竞争。[19]按照他的观点，从纯经济角度看，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以把卡特尔方法应用到国际政治为特征的超帝国主义阶段并非不可能。超帝国主义的危险性并不是军备竞赛和对和平的威胁，而是另一种危险，也应坚决抵制。[20]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竞争就如同森林法则，即通过弱肉强食实现物种进化的原则。竞争的战争通过降低价格来实现。它依赖于劳动生产力，而劳动生产力则取决于生产规模。这样，拥有更多技术手段、资金和（或）其他优势的企业将最终胜出。[21]马克思指出，“大资本消灭小资本”。他认为，竞争程度与数量成正比，与资本规模成反比。资本相互竞争总是以小资本家的失败而告终，他们的企业要么破产，要么落入胜者手中。[22]资本家对经济剩余进行货币转换的市场就是战场，也就是森林。在那里，适者或者说强者才能生存。因此，1862 年，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从植物和动物身上认知英国社会的事实表达了欣喜之情。达尔文发现，英国社会按照托马斯·马尔萨斯[23]（Thomas Robert Malthus）关于人口增长的理论进行劳动分工，展开竞争，开拓新市场，进行发明并“为生存而争斗”。那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24]。这令他想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25]。在那本书中，资产阶级社会以“精神动物王国”的形式展现。在达尔文理论中，动物王国则呈现出资产阶级社会形式。[26]与 1870 年起公司之间竞争造成资本集中并产生垄断和托拉斯、辛迪加等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一样，按照希法亭的说法[27]，在帝国主义强国中已呈现合作趋势，形成了卡特尔式结构，并具备了控制内部危机的潜能。这说明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经济过程中的国际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一个国家虽然有各种时间、技术和组织发展阶段的独特性，但它所发生的危机也会影响其他各国。[28]这一认知让考茨基预感到世界列强扩大和加深合作的可能性。它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革命或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威胁。在1915年4月30日发表在《新时代》上的题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29]的文章中，他解释说：

> 战前几年中，英国要求取消关税壁垒，美国降低关税，裁军倾向和法国、德国资本出口的急剧下跌，以及多个金融资本财团交织在一起的关系日渐繁杂，这些令我思考，当前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否会被一个新的、确立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进行共同剥削以取代民族金融资本间争斗的超帝国主义政策所取代？不管如何，金融资本的这一新阶段是可以想象的。[30]

考茨基对正在进行的世界大战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了预测，他甚至承认帝国主义向一个被称为超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可能性，尽管他承认缺乏足够前提来断言它将成为现实。其论断与马克思所作的资本集中过程的分析一致。因为1914年爆发的战争是欧洲工业强国之间以军事手段展开的经济和贸易的竞争。布尔什维克的一位主要理论家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把帝国主义列强“神圣同盟”推行对外政策卡特尔化以剥削农业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超帝国主义假设称为乌托邦。[31]然而，他在评论资本集中过程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都以国际化水平进行时承认，变成“一种国家民族托拉斯”[32]的民族经济之间竞争的经济和政治界限是一个“受到吞并其余一切的胜利者金融资本支配的世界托拉斯即唯一世界性国家的成型，即使先前最大胆的神灵也未敢梦想”[33]。他把帝国主义看作金融资本政策，即生产组织具有一定成熟水平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政策。[34]他认为，受到1914年世界大战的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随着最大民族资本主义托拉斯之一美国的参与，资本集中将加速发展。美国拥有巨大的内部组织，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垄断的集中形态，如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等托拉斯，在那里深深扎根。[35]布哈林指出，“美国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民族资本主义托拉斯巩固和发展的样板，它正在同化以前依赖于欧洲的那些国家和地区”[36]。

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I. Lenin）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37]一文中，断然否定了帝国主义将发展为超帝国主义的

设想。他认为考茨基毫无内容的议论会对“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这样的“十分错误的思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认为，“其实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38]。他的理解是，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39]。它将导致生产所有方面完全社会化，并把有不同愿望和意识的资产阶级带向某个处于完全自由竞争向完全社会化过渡的新社会体制。[40]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他认为，自 1917 年起[41]，他的这一观点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验证。与列宁观点大相径庭的考茨基并不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也不会在相对较短的历史阶段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他就帝国主义的发展提出了超帝国主义等不同设想。

列宁指责考茨基与马克思主义不可救药地彻底决裂[42]的态度并非来自以科学为基础的理论思考，而是一种政治狂热。列宁的檄文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确立。其目的并非试图说服，而是打垮和声讨持不同观点者，因为他进行的一切努力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推动俄国革命，并指望它席卷整个欧洲。考茨基承认，列宁是一个坚持不懈和坚忍不拔的斗士。他把列宁与俾斯麦相提并论。[43]因为他懂得武装力量在政治中的意义，并能在关键时刻无懈可击地将其应用。但他认为，俾斯麦悉心研究自己要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其权力以及其中存在的阶级关系。与其相反，列宁虽作为移民在西欧生活了数十年，却从来没有完全弄清那里的社会和政治特性。他那完全符合俄国特性的政策在应用到其他国家时，是基于对世界革命的期待。这在任何一个了解西欧的人看来，从一开始就只能是一个幻想。[44]事实上，列宁的政策、他对政党的理解以及他那以唯意志论为特征的政治行为反映了俄国文化的特质。1917 年 2 月 23 日（格里历 3 月 8 日）[45]，革命终于在俄国爆发，它导致代表工人士兵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并迫使沙皇尼古拉三世退位。

在作为英国和法国同盟的俄国发生革命之时，取代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将军出任德意志帝国国防军总参谋长的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正在推进一个基于绝对战争观念的战略，其手段是进行经济动员和实行无限制潜艇战，这意味着商船也难以幸免。在 1917 年年初的数周中，约 8 艘载有运往英国和法国的军火和食品的补给船被击沉，这使美国的经济利益受损。美国当时向这些国家供应铁矿石、锌、铜、棉花、羊毛、油料和武器弹药。这促使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 1917 年 4 月 2 日向国会要求对德国宣战。他认为，“针对商

船的潜艇战是一场反人类战争”。他宣称，“应建立一个使民主感到安全的世界”。他拥有比一个“立宪君主”更大的权力。[46]法国外交官奥克塔夫·洪堡（1876—1941）称，威尔逊坚信自己拥有“一个神权君主的使命”[47]。然而，美国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 W. Norris，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自由派）反对总统的要求。他在1917年4月4日发表的讲话中揭露，备战的目的是“赚钱”，华尔街不在乎牺牲生命，因为它“只认美元”。他称，“我们将在黄金的指挥下去参战”，“我们将会冒牺牲数百万国民的风险，目的是用其他国民的鲜血铸造金钱”[48]。

诺里斯认为，数百万美国人将遭受痛苦，数百万生命将逝去，数百万妇女将哭泣，数百万儿童将饥寒交迫。目的仅仅是为了“保证美国人向交战国输送战争物资的商业权利”[49]。“美国‘夏洛克’向欧洲提供了毁灭性武器”[50]。1918年，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以《威尼斯商人》中贪婪、邪恶的犹太商人之名称呼美国。[51]在另一篇也写于1918年的文章中，托洛茨基指责美国通过向欧洲出口商品来武装军国主义。他认为，美国参战一方面是为了扼杀德国，进而扼杀整个欧洲，另一方面也为满足军工企业直接利益的需要。[52]据他观察，在近三年时间中，美国一直“有条不紊地将欧洲‘疯子们’的血变成美元”[53]。只是当德国潜艇开始威胁其贸易，阻止其向英国出口大炮、子弹和步枪之时[54]，“人权斗士”[55]美国才决定直接参战。1923年4月13日，阿道夫·希特勒（Também Adolf Hitler）在向纳粹党[56]发表纲领性演讲时，也指责大资本和民主党犹太集团[57]驱使美国参战，目的是为了保证提供给“盟国”用于购买武器弹药的资金得以返还。美国向“战争市场”的供应非常大，以至于连它自己或许也不曾想到：这是一项巨大的收益。[58]

世界战争确实使美国处于极为有利和独特的条件下。除武器外，俄国停止粮食出口使得交战国对美国农产品需求增加。美国的军事工业已符合欧洲战争的需要，向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武器弹药出口为其带来了巨额利润。它的钢材出口增加了4倍，从1914年的2.5亿美元增至1917年的11亿美元；武器出口从1914年的4 000万美元增至1915年的3.3亿美元，1916年更攀升至13亿美元；炸药出口从1914年的600万美元增至1916年1月到1917年的17亿美元。[59]仅杜邦公司就向“协约国”提供了战争中使用的2/5的弹药。其股价从1914年的20美元猛升至1918年停战时的1 000美元。[60]

外部资金信贷需求也已转向纽约，美国很快从欧洲的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同时也成为加拿大、阿根廷、巴拿马、玻利维亚和哥斯达黎加等一

直寻求伦敦市场国家的债主。尽管美国表面上保持1914年8月4日威尔逊总统所宣布的中立[61]，但是，至1917年，包括摩根[62]在内的美国银行已向英国和法国提供了100亿美元用以购买武器的贷款。[63]出口和借贷造就并维持了美国的繁荣，而这一繁荣依赖于“盟国”继续向其购买军火和食品。[64]美国担心德国凭借其强大的潜艇占据大西洋控制权并最终战胜英法两国，这绝对不利于美国。华盛顿意识到，继续置身战争之外至少会造成欧洲的经济崩溃，美国的银行家和出口商将会因为难以收回向英国及其同盟所提供的贷款而变得束手无策。[65]正因为如此并考虑到其他因素，威尔逊总统再也不能保持中立而坐视交战国消失，等他去调停一个“没有胜利的和平”。只有美国参战才能使盟国的彻底胜利从技术上成为可能。[66]

【注解】

[1] Wehler, 1993, pp. 35-40.

[2] Id., ibid., p. 43.

[3] Id., ibid., p. 43.

[4] Wehler, 1993, p. 175. Westphal, 1991, pp. 61-65, 242-247.

[5] Brunn, 1971, pp. 16-18.

[6] 1900年左右，法、英、德、日、俄等国之间争斗的主要目的是给自己的剩余资本和产品找到市场，并控制原材料产地。列强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保护国和势力范围，并通过签订条约掌握了垄断权。它们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在中国采取了这一做法。当时由威廉·麦金利担任总统的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和保留市场的特权提出了抗议，称它们违反了美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自那时起，美国开始反对英、法、德等帝国所采取的市场封闭政策。

[7] Id., ibid., p. 187.

[8] Wehler, 1993, p. 165.

[9] Girault, 1997, p. 187.

[10] Hobson, 1975, p. 80.

[11] Hilferding, 1974, Band Ⅱ, p. 452.

[12] Kissinger, 1994, p. 168. Renouvin & Duroselle, 1967, p. 373.

[13] 美国历史学家阿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在其著作《亨利·怀特：美国外交三十年》一书中所重新整理的完整对话如下：

贝尔福（有点轻描淡写地）：“我们的愚蠢之处可能在于，没有在德国建造如此多舰船并夺走我们的贸易之前找到向其宣战的理由。”

怀特：“在个人生活上，你智慧出众。你怎么能考虑挑起与一个没有丝毫危害性的国家的战争这样一件政治上如此不道德的事情？他们完全有权利和你们一样建造舰船。如果你们希望与德国在贸易上比拼，就应更加努力地工作。”

贝尔福：“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水平将会降低。对我们来说，也许进行一场

战争更为简单。”

怀特：“我对你们这些人都持这样的原则感到震惊。”

贝尔福（再次轻描淡写地）：“这是正确和错误的问题吗？也许这恰恰是维持我们霸权的问题。” Apud Wedemeyer，1958，pp. 13－14.

[14] Engelbrecht & Hanighen，1934，p. 83.

[15] 通过马克西利安·布兰特（Maxilian Von Brandt）从德国国防部获得大量文件的克虏伯公司资助了法国新闻媒体对德国的攻击，其目的是煽动柏林的爱国主义和战争精神。Manchester，1968，pp. 264－268. Liebknecht，1973，pp. Ⅷ，Ⅺ，38.

[16] Jaurès 指的是 1912—1913 年和 1913 年发生在巴尔干的战争。

[17] 受 1925 年的《日内瓦公约》禁止，在二战中未被使用。

[18] Marx，K.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Dritter Band，in Marx & Engels，Band 25，1981，pp. 130，235，453－454.

[19] Kautsky，Karl. “Der Imperialismus”. In *Die Neue Zeit*，11/9/1914，Ⅱ，p. 921－o. O. u. J.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ibliothek—Signatur（en）：A 26315；FA 26315.

[20] “ Vom rein ökonomischen Standpunkt ist es also nicht ausgeschlossen，daß der Kapitalismus noch eine neue Phase erlebt，die Übertragung der Kartellpolitik auf die äußere Politik，eine Phase des Ultraimperialismus，den wir natürlich ebenso energisch bekämpfen müßten wie den Imperialismus，dessen Gefahren aber in anderer Richtung lägen，nicht in der Welttrüstens und der Gefährdung des Weltfriedens”. Kautsky，Karl. “Der Imperialismus”，in *Die Neue Zeit*，11/9/1914，Ⅱ，p. 921－o. O. u. J.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ibliothek—Signatur（en）：A 26315；FA 26315.

[21] Marx，K. *Das Kapital*，Erster Band，in Marx & Engels，Band 24，1982，pp. 654－655.

[22] Id.，ibid.，p. 655.

[23] Marx und Engels，Londres，18/6/1862，in Marx & Engels，1974，Band 30，p. 249.

[24] 原文为德语。

[25] 指黑格尔的作品《精神现象学》。Vide “Das geistige Tierreich und der Betrug oder die Sache selbst”，in Hegel，1986，pp. 294－323.

[26] Marx und Engels，Londres，18/6/1862，in Marx & Engels，1974，Band 30，p. 249.

[27] Hilferding，1974，Band Ⅱ，pp. 389－404.

[28]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经济过程中的国际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一个国家虽然有各种时间、技术和组织发展阶段的独特性，但它所发生的危机也会影响其他国家。” Id.，ibid.，Band Ⅱ，p. 389.

[29] 该文章分四次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Kautsky，Karl. “Zwei Schriften zum Umlernen”，*Die Neue Zeit*，9/4/1915；16/4/1915；23/4/1915；30/4/1915. o. O. u. J.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ibliothek—Signatur（en）：A 26315；FA 26315.

[30] Id.，ibid.，p. 144.

[31] Boukharine，1928，p. 135. Kautsky，Karl．“Der Imperialismus”，in *Die Neue Zeit*，11/9/1914，Ⅱ，p. 921－o. O. u. J.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ibliothek—Signatur (en)：A 26315；FA 26315.

[32] Boukharine，1928，p. 106.

[33] Id.，ibid.，p. 119.

[34] Id.，ibid.，p. 134.

[35] Id.，ibid.，p. 58.

[36] Id.，ibid.，pp. 146－147.

[37] 这一作品在1916年1—7月期间写于苏黎世，1917年4月首次以《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为题发表于彼得格勒。

[38] Lenin，V. I. *El imperialismo，fase superior del capitalismo*，in Lenin，1948，tomo I，pp. 1033－1035. 列宁也在名为“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的小册子中批评了考茨基的观点。Id.，ibid.，pp. 936－948.

[39] Id.，ibid.，pp. 1040－1043，1066－1065.

[40] Id.，ibid.，p. 967.

[41] Id.，ibid.，p. 956.

[42] Id.，ibid.，pp. 1035，1051－1053.

[43] 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去世后，《消息报》驻柏林记者潘斯基·索利斯基(Panski-Solski) 致函在维也纳的考茨基，请他写一篇文章以表达对列宁的敬意。考茨基的文章以1924年1月28写给索利斯基的一封信的形式刊登在《消息报》上，后来被奥地利的马克思理论刊物《斗争》(vol. 17，n° 5，May 1924，pp. 176－179) 转载。Revolutionary History/Brian Basgen，2000.

[44]Ibid.

[45] 布尔什维克政府后来用格里历取代了沙皇时期采用的儒略历。

[46] Homberg，1929，pp. IV－V.

[47] Woodrow Wilson，*War Messages*，65th Cong.，1st Sess. Senate Doc. n°. 5，Serial n° 7264，Washington，1917，pp. 3－8，passim.

[48] Congressional Record，65th Cong.，1st Sess.，vol. LV，p. I，pp. 212－214，223－236. Lens，2003，p. 260.

[49] Ibid.

[50] Extrait d'un rapport fait le 3 octobre 1918，in Trotsky，León. *Europe et Amerique*，Librarie de L'Humanité，1926，pp. 107－108. 另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革命法庭成员佐林 (S. S. Zorin) (1890—1937) 也预见到“美国是现代社会大部分毁灭的制造者。战争持续了四年，美国成了全世界的债主。这一由百万富翁组成的国家使用大棒占据了当前的位置，如同鬣狗闻着尸体的味道”。Vaucher Robert，*L'Enfer Bolchevik*，Paris：Librairie Academique Perrin，1920，pp. 389－390.

[51]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最早的喜剧作品之一《威尼斯商

人》（写于1596—1598年期间）中的人物，是生活在威尼斯的一个贪婪犹太人。他通过向基督徒商人放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夏洛克假装慷慨地借给安东尼奥3 000金币，不收任何利息，但他要求对方立下字据，假如债务到期后无法偿还，他就可以从安东尼奥身上的任意部位割下一磅肉作为处罚。债务到期后，夏洛克提出了处罚要求，他要求从安东尼奥心脏附近割下一磅肉。夏洛克憎恨安东尼奥并非因为对方是基督徒，而是因为安东尼奥无偿借钱给别人，这使得威尼斯的整体利率下降。在审判时，安东尼奥从夏洛克处所借钱的受惠者贝萨尼奥的未婚妻波尔蒂娅（Portia）提出，安东尼奥所签字据只说是一磅肉，所以割肉时就不能流血。因此，根据威尼斯法律，夏洛克如果让一个基督徒流血，他就会被没收土地和财产。Shakespeare, William.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Shakespeare, William. *Complete Works*, New York, Gramercy Books, 1990, pp. 203-228.

[52] Extrait d'un rapport fait le 18 novembre 1918, in Trotsky, 1926, pp. 108-110.

[53] Extrait d'un rapport fait le 3 octobre 1918, in Trotsky, 1926, pp. 107-108.

[54] Woodrow Wilson, *War Messages*, 65th Cong., 1st Sess. Senate Doc. n°5, Serial n°7264, Washington, D. C., 1917, pp. 3-8, passim.

[55] Trotsky, 1926, p. 23.

[56] 即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

[57] 犹太人向北美移民始于1654年。当时，荷兰人刚被从巴西逐出。约23名葡萄牙和西班牙犹太人因担心宗教迫害，从巴西的伯尔南布戈逃往新阿姆斯特丹。第二年，来自荷兰的另一批犹太人来到北美。九年后（1664年），英国人占领新阿姆斯特丹，将其更名为纽约。18世纪中期，北美有约2 500名犹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作为大陆军成员参与了美国的独立战争（1776—1783年）。一些犹太人也参加了1775年美国入侵加拿大的行动，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州民兵司令所罗门·布什（Solomon Bush）上校和刘易斯·布什（Lewis Bush）上尉。远征行动得到蒙特利尔的犹太商人利维·所罗门（Levy Solomon）的资助。1787年的美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后，前往美国的犹太移民人数增多。1820年起更迅猛增长，犹太侨团从19世纪20年代的3 000人增加了1 000倍，无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侨团。1840年左右，美国的犹太人口约为1.5万人。1850年起，德国犹太人来到北美，其中包括约瑟夫·赛林格曼（Joseph Seligman）、所罗门·洛布（Solomon Loeb）、罗思柴尔德（Casa Rothschild）公司的代表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和奥托·卡恩（Otto Kahn）等多位银行家以及商人伊斯多尔·施特劳斯（Isidor Straus）。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中有一半在美国经商。从1890年到1910年，俄国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引发了移民潮，约有150万犹太人进入美国。1897年，美国成立了首个犹太复国主义联盟。1914年，犹太移民达到顶峰。此后，由于战争而出现下降。到20世纪前十年，全世界1 300万犹太人中有300多万居住在美国，其中将近一半在纽约。这一实力雄厚的犹太侨团开始逐步控制美国的主要经济领域。

[58] Apud Schmied, Jürgen Peter. "Hitlers Amerikabild vor der 'Machtergreifung'",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GWU) 53, 2002, pp. 714-717.

[59] Pratt, 1955, p. 469. Lens, 2003, p. 241.

[60] Id., ibid., p. 241.

[61] Id., ibid., pp. 243-262.

[62] Renouvin & Duroselle, 1967, p. 104.

[63] 美国正式宣布保持中立的声明于 1914 年 8 月 4 日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发布。

[64] "*That prosperity was dependent upon a continuance of Allied purch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att, 1955, p. 470.

[65] Hudson, 2003, p. 2.

[66] Kissinger, 1994, p. 221.

第三章

战争与美国新富豪　四大帝国的毁灭　欧洲大屠杀　“阿拉伯的劳伦斯”和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拉伯人独立的沮丧　《贝尔福宣言》　巴勒斯坦冲突的由来　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　《凡尔赛和约》　威尔逊和启示录王子列宁

1918年停战协议签订之时，美国出现了21 000个新百万富翁。[1]而战争中美军仅仅损失116 000人。[2]持续4年的战争结束后，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四大帝国崩溃。如果饶勒斯还活着[3]，他会再度感叹：“多么可怕的屠杀、毁灭和野蛮!”德国、法国和英国各损失了180万、150万和80万人。土耳其屠杀了约150万或更多的亚美尼亚人。尽管英国政府作了“确切而清晰”[4]的承诺，但在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军事情报局军官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E. Lawrence）少校带领下揭竿而起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阿拉伯人，却未能实现独立和自决。劳伦斯要求英国履行承诺，却被指责为“将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特权’置于危险之中，破坏法国在东地中海的殖民政策”[5]。劳伦斯认为，“我们把他们（阿拉伯人）成千上万地推入火坑和地狱，并不是要赢得战争，而是为了霸占美索不达米亚的小麦、大米和石油”。他说，他不仅不感到荣耀，反而处于“持续而痛苦的羞耻”之中。因为，“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如果我们赢得战争，承诺将变成毫无价值的纸片”[6]。

确实，英国很快就表明在奥斯曼帝国战败后不会给予阿拉伯人独立和自决的意愿。英外交大臣詹姆斯·贝尔福（James A. Balfour）勋爵已于1917年11月2日告知罗思柴尔德（Lionel W. Rothschild）勋爵，英国政府考虑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的愿望[7]，承诺将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他明确表示，英国将不做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有非

犹太民众的非宗教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之事。盟国最高理事会在圣雷莫会议（1920 年 4 月 24 日）中对《贝尔福宣言》给予了支持，决定把美索不达米亚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8]1922 年，国际联盟批准英国对这一自 1920 年起就建立了“被占敌方领土管理政府”地区享有统治权，并为犹太移民和建立民族家园提供便利。但穆斯林人口仍占据巴勒斯坦地区的压倒性多数。当时，那里约有 568 000 名穆斯林，74 000 名基督教徒，犹太人仅为 58 000 人。[9]

在与奥斯曼帝国军队进行的游击战中煽动阿拉伯民族主义并把战术需要变成战略价值[10]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曾告诫英国驻埃及军事情报局主任吉尔伯特·克莱顿[11]（Gilbert Clayton）爵士，他预料巴勒斯坦将会有无休止的冲突，因为阿拉伯农民不会愿意把土地让与犹太殖民者。[12]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在欧洲金融界的犹太影响力也许不足以改变阿拉伯人拒绝离开的决定，情况甚至会更糟!”[13]劳伦斯的预言很快得到应验。尽管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ussayn）之子费萨尔（Faysal）埃米尔和犹太委员会负责人查姆·韦茨曼（Chaim Weizmann）已于 1919 年商定，将在建立阿拉伯国家和为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提供便利问题上进行合作，但冲突已变得不可避免。

1919 年 7 月，叙利亚国民大会宣布包括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在内的国家独立。1920 年 3 月 11 日，国民大会宣布费萨尔埃米尔为叙利亚国王。在同一个月，当英国宣布同意接纳 16 500 名犹太移民后，当地发生了首度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爆炸。4 月 4 日，当朝圣者和往年一样进入耶路撒冷前往拜谒圣祖墓地希伯伦时，居住在市内和周边其他城镇甚至纳布卢斯的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高呼要求阿拉伯统一和独立并阻止犹太人移民的口号。[14]与叙利亚交界的上加利利地区也发生了多起血腥冲突，阿拉伯人袭击并捣毁了 1918 年左右犹太复国主义者为重新征服“以色列土地”即巴勒斯坦所建立的梅图拉、哈姆拉、卡法·杰拉德和特尔海等犹太定居点。[15]1920 年 7 月 24 日，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负责托管叙利亚的法国军队在梅萨伦战役中击败阿拉伯抵抗力量，并占领了大马士革。[16]1921 年 5 月，巴勒斯坦爆发了更多血腥冲突。阿拉伯人攻击了犹太人在雅法和科德拉建立的乡村定居点。

这些袭击促使英国的巴勒斯坦问题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爵士决定展开调查。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并非宗教或种族差异，而是占 70 万巴勒斯坦居民 4/5 的穆斯林[17]对犹太人抢占自己土地的日益担忧。作为司法机关负责调查的最高官员托马斯·海克拉夫特（Thomas Haycraft）爵士的结论是：与移民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所宣扬的政策相

关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导致的阿拉伯人的不满以及对犹太人的仇视，是雅法冲突和此后其他暴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18]面对这些事件，当时在英国政府中任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决定暂时中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19]，并开始与阿拉伯执行委员会进行谈判[20]。自1918年起，已有25 000名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

多重原因促使英国发布了《贝尔福声明》。种种迹象表明，由于威尔逊总统所信奉的长老会教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21]，他在犹太复国主义成员、最高司法法院成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22]的影响下，事先就首肯了该声明，就连内阁大臣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也未被提前告知。[23]除了与军工产品外销有关的贸易问题和控制欧洲目的外，美国也希望对巴勒斯坦施加影响。因此，对已与法国签署了瓜分中东的《赛克斯-皮科协定》[24]的英国来说，有必要得到美国支持，以便将该地区作为苏伊士运河保护区的一部分保留下来。苏伊士运河对英国至关重要，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英国经济的印度和东非的运输来说也同样重要。

美国虽然未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但却乐见它以及自己在世界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解体，进而破坏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自1881年起用以在非洲和亚洲扩展经济空间的殖民体系。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8日作为和平计划提出的“十四点”中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言论，朦胧地表明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尤其是不管处于和平还是战争状况下，都要保证航行的绝对自由，尽可能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实现各国贸易条件平等，以便实现和平，使殖民要求和殖民地民众利益得到调和。它希望以此打开当时仍处于封闭状态的市场。在推销其产品和资本的同时，美国通过《国际联盟盟约》建立了所谓“集体安全”的新安全体系。该体系的意图是，不管国家大小，均应作出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相互保证。尽管威尔逊向被“中央帝国”奴役的人民示意自决，但他却有意避免提及非洲、亚洲和中东人民的独立。正如埃里克·福纳（Eric Foner）所言，自从赢得美西战争以来，对美国来说，自由的含义越来越与盎格鲁——美国的优越性概念相关联，使它部分偏离了拥有民主政治机构的民族这一原始特征，或以更鲜明的种族方式来定义这些机构。[25]

《凡尔赛和约》在欧洲确立了17个基本独立的新国家和地区以及约7 000公里的新边界。中东出现了9个新国家，但大多以托管形式交由英国（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和法国（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来统治。英法还占据了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日本和意大利也参与了瓜分。威尔逊一方面希望美国能与被托管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尽力把拉美留作美国的专有势力范围，并使之越

来越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凡尔赛和会（1919 年）期间，《国际联盟盟约》中加入的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可能“危及仲裁条约和诸如‘门罗主义’[26]这样着眼于维护和平的地区性谅解协定”的内容将不予考虑。[27]通过把泛美主义的“门罗主义”视为一个地区性谅解，威尔逊得以把拉丁美洲排除在国际联盟管辖权之外。美国历史学家盖德·史密斯（Gadd Smith）认为，将“门罗主义”看作一个地区性谅解“荒唐透顶”，它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单方面政治声明。[28]

威尔逊用“十四点”勾画了美国作为世界强国试图在国际联盟的庇护下与英、法、意一起建构的国际关系模式，它将以集体安全体系取代作为 19 世纪欧洲协作基础的同盟关系和权力平衡。通过所有盟约签署国参与的联盟大会以及由 4 个常任成员国和每 3 年通过联盟大会选举的 4 个成员国（后改为 9 个）组成的执行理事会进行运作。联盟理事会 4 个常任成员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美国后来被日本取代）的政府首脑（四巨头）[29]根据盟约第四条组成“主要盟国和联系国最高委员会”。换句话说，国际联盟理事会无异于主要国家的卡特尔。它们根据盟约第五条，承诺相互抵御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其构成反映了“真正的权力关系”，目的是在一个新模式中巩固强国的统治地位。这一新模式是“欧洲协作”的最新版本，也就是基于权力平衡的国际秩序。“大自然不会跳跃。”在战争结束约一年半后的 1920 年 7 月，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指出，美国打着国际联盟的旗帜，正在实现一个将“多民族通过联邦制实现统一的经验推销到大西洋的另一端——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捆绑到它的车上接受华盛顿统治的企图”。他认为“其实质是要把国际联盟变成一个世界垄断集团，即‘美国佬及其同伙’”[30]。

虽然列宁发动了俄国革命，但考茨基的设想似乎得到了应验。以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告终的俄国革命令华盛顿感到不安，俄国革命可能影响墨西哥革命[31]方向的忧虑的确存在。当 1917 年 3 月革命爆发，沙皇政权被推翻时，威尔逊以“美妙和令人振奋的事情”[32]表示祝贺。但他对苏维埃政权的现实持暧昧态度。根据威尔逊的命令，美国对西伯利亚进行了干预，其目的是要在国际事件中显示其影响力。但他未同意英国提出的通过摩尔曼斯克向俄国推进的计划，并撤走了军队。[33]威尔逊意识到，难以借助武力避免革命威胁。他的“十四点”原则与列宁对革命、和平和人民自决的呼吁相对立。《凡尔赛和约》强迫签署国采取社会立法。美国是该条约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它同时提议建立国际劳工组织。该组织于 1919 年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当威尔逊踏上欧洲土地前往参加凡尔赛会议之时，托洛茨基意识到正在形成的世界新格局，于是就戏谑地评论道：“列宁和威尔逊，当代历史中两个启示

录式的王子。”[34]此话并非没有道理。他预言，“布尔什维克和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历史的两个因素”[35]，它们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注解】

[1] Engelbrecht & Hanighen, 1934, p. 173.

[2] Hobsbawm, 1996, p. 26.

[3] 7月31日，战争爆发后3天，一位名为拉乌尔·维兰（Raoul Villain）的法国民族主义者在巴黎蒙马特的Café du Croissant咖啡店枪杀了饶勒斯。

[4] Lawrence, s/d, p. 21.

[5] Id., ibid., p. 21.

[6] Id., ibid., p. 22. 在1918年7月22日发表在伦敦《时代报》的一封信中，他警告说：“战争期间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人不是因为土耳其政府非常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希望独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是为了更换主人，使自己变成英国的臣民或法国公民，而是要赢得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Apud James, 1995, p. 376.

[7]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始于1896年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发表《犹太国家》。1897年，他召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赫茨尔于1906年去世。

[8] 分离通过《色佛尔条约》（1920年）成为现实。

[9] 1919年，巴勒斯坦70万人口中有约65 000名犹太人。Renouvin, Pierre & Durosell, Jean-Baptist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s. Nova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7, p. 47. Hourani, Albert.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Nova York: Warner Book, 1992, p. 323. Paul Johnson calcula, āqueke tempo, cerca de 85. 000 a 100. 000 judeus. Johnson, 1988, p. 430.

[10] James, 1995, pp. 203, 229-233.

[11] 战争结束后，晋升为少将的吉尔伯特·克莱顿爵士出任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

[12] 阿拉伯人自1 200多年前即公元7世纪就占据了巴勒斯坦。欧洲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获得土地始于19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继续以犹太人的名义，用“犹太民族基金”提供的资金购买土地。购入的土地不能再出售或租借给阿拉伯人，但此时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已能在不依靠英国军事支持的条件下实现了。

[13] James, 1995, pp. 275-391.

[14] 俄国犹太人泽夫·雅勃廷斯基（Ze'ev Jabotinsky, 1880—1940）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自卫组织，它们属于名为“哈加纳”（Haganah）组织的秘密民兵团。“哈加纳”是1948年建立的以色列军队的前身。

[15] 特尔海的缔造者是俄国犹太人约瑟夫·特伦佩尔多（Joseph Trumpeldor, 1880—1920）。他作为沙皇军队成员在战斗中阵亡，他在临终前说道：“别担心，为我们的国家牺牲是美好的。”

[16] 阿拉伯人最初的一个秘密组织是“阿拉伯青年团体”（Al Jamiyyah al Arabiyah al Fatat），当时以Al Fatat著称。麦加的谢里夫·哈桑之子费萨尔亲王是这一组

织的成员。另一组织是阿拉伯军人组成的“契约党”（Al Ahd）。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呼吁哈桑王族成员领导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起义。哈桑接受了这一请求。1916 年 6 月 5 日，希贾齐（Hijazi）部落在哈桑几个儿子的领导下发动了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劳伦斯上尉为他们出谋划策。1918 年 10 月，费萨尔作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进入大马士革。然而，在 1920 年的圣雷莫会议中，盟国以托管形式按英法之间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1916 年）瓜分了阿拉伯。法国得到了叙利亚的托管权，其军队从贝鲁特出发前往镇压阿拉伯人的抵抗，并推翻了费萨尔国王。费萨尔国王被迫逃亡欧洲，直到 1921 年英国让他出任伊拉克国王后才返回中东。费萨尔的兄弟阿卜杜勒被英国确认为外约旦埃米尔。

[17] 只有约 77 000 名巴勒斯坦居民是基督徒，其中大部分讲阿拉伯语，信奉东正教。“An Interim Report on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Palestine, during the period 1st July, 1920——30th June, 1921”, Sir Herbert Samuel, High Commissioner and Commander-in-Chief, 30th July, 1921.

[18] “Reports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Palestine, Disturbances in May, 1921”, Command # 1540, Londron, 1921 (Haycraft Report). “Statement of British Policy in Palestine”, Command # 1700, Londron, 1922 (The Churchill White Paper).

[19] 对移民的限制不仅减少了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数量，还促使许多人迁往其他国家。1926 年，约有 7 000 人离开巴勒斯坦。第二年，又有 5 000 人离开。紧张局势由此得到缓解。

[20] “ The White Paper of 1922” (*The Churchill White Paper*), British White Paper, June 1922.

[21] 1916 年，威尔逊所属的长老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决议。该决议得到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拥护。

[22] 布兰代斯生于布拉格。1914 年 8 月 30 日，他出任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临时委员会主席。该组织在一战爆发前不久从德国迁往美国。1916 年 1 月 28 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命他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借助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财力雄厚的银行家罗思柴尔德勋爵对达成贝尔福协议发挥了重要作用。

[23] 1922 年 9 月 21 日，美国国会批准了《贝尔福宣言》，承诺将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并明确不会做任何损害基督教徒和其他非犹太居民的人权和宗教权的事情，他们的宗教圣地和建筑将会得到妥善保护。*Public Resolution n°73, 67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24] 1916 年 5 月，在征得俄国同意后，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和乔治·皮科（Georges Picot）分别代表英国和法国签署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协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同盟国。根据协议，原由土耳其统治的位于黑海、地中海、印度洋和里海之间的地区将由英国和法国瓜分。（1）一区（黎巴嫩和叙利亚）由法国直接统治；（2）阿拉伯 A 区（北叙利亚和摩索尔省）属法国势力范围；（3）红区（科威特和美索不达米亚）由英国直接统治；（4）阿拉伯 B 区（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属英国势力范围；（5）灰区（St-Jean d'Acre、海法和耶路撒

冷）由国际共管。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公布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目的是消灭秘密外交。

[25] Foner，1998，p. 134.

[26]“结果是，尽管法英文本都是正式的，但两者并不一致。一个声称：‘门罗主义’‘不能被视为与现存条约的规定不相符’；另一个的表述为：‘门罗主义’‘不会受《国际联盟盟约》订立的影响’。一个将‘门罗主义’从属于《国际联盟盟约》，而另一个则将后者从属于前者”。Perkins，1963，p. 297.

[27] Carvalho，1959，p. 305. Smith，1994，pp. 30，31. Perkins，1963，pp. 296-297.

[28] Id.，ibid. pp. 30，31.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反对《国际联盟盟约》，并明确表示“门罗主义”“只能由美国来解释，（……）完全处于国际联盟管辖权之外”。

[29] 英、法、意、美四国政府首脑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和伍德罗·威尔逊被称为“四巨头”。

[30] Apud Lens，2003，p. 266.

[31] Bartlett，1984，p. 121.

[32] Woodrow Wilson，War Messages，65th Cong.，1st Sess. Senate Doc. n°5，Serial n°. 7264，Washington，D. C.，1917，pp. 3-8，passim.

[33] Kennan，1958，pp. 381-404，419.

[34] Trotsky，1926，p. 48.

[35] Id.，ibid.，p. 47.

第四章

《凡尔赛和约》遭美国参议院否决　世界经济政治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　美国成为欧洲债权国　超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启　俄国革命的后果　列宁与“新经济政策”　世界形势和1929年经济崩溃

威尔逊“十四点”并非符合美国所有权力机构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该机构还否决了《国际联盟盟约》，以免其成为约束自己为所欲为权力的承诺。[1]许多人认为《国际联盟盟约》与“门罗主义”互不相容。对集体防御的承诺一方面同意联盟干预美国所属半球的问题，另一方面迫使美国卷入本半球以外的事务，这违背了作为美国对外政策基石之一的孤立主义原则。[2]然而，尽管美国拒绝任何军事联盟或多边盟约，但它并没有把自己孤立起来，它也不能这样做。1925年，格尔哈特·格弗尼茨（Gerhart Von Schulze-Gaevernitz）指出，1914—1918年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结果不是三个王朝（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的崩溃，不是法国跃升为欧洲大陆占主导地位的强国，也不是英国自16世纪起为自身安全寻找的权力平衡的实现，而是世界重心从欧洲转向美国。[3]事实是，1914年前，美国负有40亿～50亿美元的债务。[4]它用两年的出口偿还了所有债务。1918年战争结束后，美国不仅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且成为各国政府的债主。它所提供的总贷款达250亿美元。[5]盟国所欠总额280亿美元的债务中有110亿来自美国政府，其中47亿为英国所欠。这样，随着德国的战败，美国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均压倒了英国。虽然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但它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不断推行炮舰外交和干预主义的同时[6]，继续积极推进通过“海洋自由”和“门户开放”口号体现的自由政策。20世纪20年代，宣扬

“放任主义”是美国内外政策的导向[7]，目的是保证扩张，巩固其经济和政治霸权。格弗尼茨认为，一个可被谨慎地称为“超帝国主义”的前景就这样被开启了。[8]

与美国相反，1921 年内战结束时，俄国国内产值仅相当于 1913 年的 1/3。由于缺乏钢、煤和机器设备，工业面临瘫痪，产量仅为战前的 1/5；煤产量为战前的 1/10；钢铁冶炼为正常水平的 1/40，钢产量从 420 万吨降至 18.3 万吨；铁路系统遭到彻底摧毁；农业生产也受到极大破坏，村庄荒无人烟。1921 年年底，饥民数量达 3 600 万，这使得吃人肉现象再现。[9]对外贸易从 29 亿卢布降至 3 000 万卢布。艾萨克·多伊切（Isaac Deutscher）指出，“俄国的社会结构不仅仅是垮塌，而是遭到彻底摧毁”。考茨基认为，俄国比战前更加远离社会主义。[10]列宁清楚这一点，他原本希望革命能蔓延到工业更发达的国家，尤其是德国。他曾表示，“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11]。

把资本主义比作一股随着俄国革命而出现分岔的水流说明，列宁与托洛茨基一样把世界经济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认为它是一个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所造就的活生生的、独立的强大现实，世界市场不再是民族经济的混合物，转而占领民族市场本身。[12]因此，社会革命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流产后，列宁意识到水流并没有出现分岔，于是就从内战时期建立的军事共产主义或者说战争共产主义中退出。1922 年，他通过采用“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市场经济。他这样做并非因为暂时性困难[13]，而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所需的发展生产力战略。因为，他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国家允许并掌控其运作的私有资本主义，而不是对生产资料和运作实行国有化。[14]

市场的合法化以及货币体系的重组使得生产在 1922 年和 1923 年实现了翻番，并在 1926 年左右恢复到战前水平，比 1921 年增加 5 倍。[15]但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于 1928 年以所谓的马列主义作为伪装，抛弃“新经济政策”，恢复了民粹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俄国无须经历资本主义就可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基于在苏联本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景，他采取了经济国有化政策，并实施了“五年计划”（1928—1933 年）。他推动激进的土地集体化，将消费限制在难以容忍的最低水平。经济剩余由国家拥有，以此组建工厂、电站、机器设备等资本产品工业，以便加快工业化进程。这种将社会化而非财富分配作为发展道路的原始积累，只有借助恐怖的社会化才可能实现。但苏联经济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面临一系列严重困难，原因不仅仅是过去所造成的落后，更主要是因为，孤

立使它既无法按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期望的在德国取得革命胜利的前提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也不能按资本主义原则，以正常国际信贷形式利用世界经济资源。后者对落后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16]托洛茨基在1935年前后曾指出，苏联经济的尖锐危机提醒人们，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无法与其国家模式相适应，而只能在大的个国际背景下，以社会主义形式进行协调并达到和谐。他认为，这一危机比“儿童烦恼或者说成长烦恼要严重得多”，是国际市场发出的“严重警告”。苏联从属于这一市场，不可能与之分离。[17]他预计，长期孤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恢复资本主义而不是民族共产主义。[18]

苏联未能使革命在欧洲燎原，共产国际未能深入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之中，于是就转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利用这些地区人民对英、法、美等国以帝国主义为特征的经济统治的不满。另一方面，美国表面上奉行的孤立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的表现，与其一贯反对《国际联盟盟约》和《凡尔赛和约》所代表的多边联盟、盟约和承诺的对外政策相一致。美国参议院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盟约》和《凡尔赛和约》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更多地卷入国际问题的机会。美国共和党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G. Harding）（1921—1923年）、凯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923—1929年）和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1929—1933年）继续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欧洲的各种事件，但同时保持在国际政治中不受约束，以便能在它认为对其民族利益有利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展开谈判和讨价还价。[19]因美国退出而受到削弱的国际联盟甚至难以说服其成员实施第八条规定的削减武器，以履行联盟最基本的一项宗旨。对干预中国并将先前控制的满洲里三省变成“满洲国”后退出联盟的日本，国际联盟也未能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它甚至无力控制1926年被接纳为理事会常任成员国的德国。同年，巴西放弃临时成员国资格并退出该组织。巴西这样做的理由是，国际联盟不仅不是“在为未来做准备”，而且似乎想让“过去变为永恒”，使列强得以为其打上一个“被武力控制的协会”的烙印。[20]

德国虽然被接纳为国际联盟理事会成员，但它对《凡尔赛和约》中那些战胜国用来把战争责任全部推给它的惩罚性条款（第二百三十一条）心存不满。它的所有殖民地被剥夺，本土的13%被割让，还得支付66亿英镑，折合330亿美元[21]的沉重赔款（1923年，鲁尔被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在萨尔（被法国占有）和上西里西亚（割让给波兰）的煤矿以及阿尔萨斯-洛林65%的铁矿被掠夺后，德国根本无力偿还赔款。温斯顿·

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承认，直到1931年，战胜国特别是美国一直通过屈辱性的外部控制，极力从德国身上榨取年度赔款。[22]1924—1931年间，德国以战争赔款名义共支付108亿马克。同期，它借入105亿马克，其中55%来自美国。[23]为了支付这些款项并满足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没有足够资金的德国政府被迫不断印制钞票。1922年4月，哈定执政期间的贸易部长胡佛要求美国金融业领袖制定一项多国贷款计划，以便德国能够偿还盟国（英国和法国）及其联系国（美国）[24]所要求的战争赔款。德国每年要支付的战争赔款和英法两国欠美国的战争债务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美国通过摩根集团向德国提供贷款，德国以战争赔款名义支付给美、英、法，英法再将获得的赔款转给美国，以偿还战争债务。因而就引发了超级通胀，美元在1919年与马克的兑换率是1∶10，经过一场巨大的金融投机，该比率升至1922年的1∶22 000。[25]1922年12月，可在柏林以400万马克买入1美元，再以700万马克在纽约卖出。[26]这一事实促使希特勒声称，仅在纽约就生活着200万犹太人，德国依赖于他们所进行的投机。[27]

在此种情况下，1918年11月11日至1931年6月30日，德国共支付战争赔款214亿美元。而这种支付只有依靠美国的贷款才得以实现。但1929年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暴跌，使纽约证券市场崩溃，股价跌至最低水平。3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1914—1918年的战争总投入）从美国经济中消失。数百万个人投资者沦为平民。数千家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丧失清偿能力，即使拥有巨额资金的摩根银行也受到打击而信贷枯竭。美国无法再为德国支付战争赔偿提供贷款。结果是，盟国也无力履行分期偿还欠美国债务的承诺。面对这一局面，胡佛总统别无选择，只能于1931年6月20日宣布，同意德国延付战争赔款，并同意盟国延付所欠债务。

但胡佛的行动未能避免1929年10月29日纽约金融崩溃的蔓延，它深深地打击了欧洲各国。这说明美国经济已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紧密相连。经济萧条通过金本位机制扩散并加剧。该机制自19世纪起成为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并在20世纪初便利了贸易、支付和资金转移。法国未能及时挽救奥地利最大银行[28]安斯塔特信用公司，而法国对外出口信贷的70%依赖于该银行。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金融圈的投资者也陷入了紧张和恐慌之中，这一气氛随即蔓延到德国，随着德国大银行Danat-Bank的倒闭，该国的经济危机加剧，各家银行于1931年7月13日停业直至8月5日。

英国也受到强烈冲击，它仍试图保持金本位体制。但是，1931年7

月，价值2亿英镑的黄金撤出伦敦，使英镑贬值18%，英国不得不于同年9月放弃金本位体制。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从1∶4.86贬至1∶3.40。对法郎的汇率则从1∶125贬至1∶75。[29]所有英联邦国家（除加拿大外）、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伊拉克、葡萄牙、泰国和一些南美国家（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紧随其后，于1931年放弃了金本位。贸易受英镑贬值和德国汇率失控影响的法国，为了稳定局面，只能求助于提高税率和设定进口额度。1932年年初，由“政友会”[30]犬养毅（Inukai Tsuyoshi）[31]任首相的日本政府中止了银行证券与黄金的兑换，禁止黄金出口，并最终放弃了这一货币标准。国际收支失衡，英镑贬值，在一些外国市场中的不利处境，以及在“满洲国”中国边境沿线的冲突给投资者造成的恐慌等诸多因素，导致日本政府做出上述决定。数月后，英国政府对关税体系进行了大幅调整，并在帝国经济会议（渥太华，1932年7—8月）后，按照“国内生产者第一，帝国生产者其次，外国生产者居后”的原则建立了一个新的贸易体系。根据这一体系，英国通过双边协议在英联邦范围内给予其自治领地“帝国优惠”。其他国家也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包括停止外债支付，使本国货币贬值，以增加产品竞争力，并建立汇率管制。世界贸易陷入瘫痪，资本市场崩溃。经济不稳定动摇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管理联邦储备体系[32]的美联储被迫提高利率，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经济萧条。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年）1933年上台后，禁止黄金在美国流通（买卖和持有），政府则继续向外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黄金储备法案》，使美元对黄金贬值65%，1盎司黄金从20.67美元升至35美元。金本位的废除对世界经济的破坏甚于提高关税。通过货币贬值使货币体系民族化的竞争是经济战的一种形式，它使各国对外部市场的争夺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1933年12月3—26日，在蒙得维的亚召开的第十七次美洲国际会议上，美国提议通过一个多边协定或双边协定以降低关税。但美国国务卿康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提出的条件使拉美国家感到失望，这一将“门罗主义”扩展到经济领域并试图在西半球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努力未能成功。拉美各国政府均面临严重的金融困难，无意降低关税向美国的出口产品开放市场。于是，美国转而依据1934年国会通过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试图与各国签署双边协定。[33]尽管建立了进出口银行（1934年），但效果并不明显。世界贸易的灾难揭示了自由市场体系的真正问题。经济国际化所引发的紧张局面，导致民族主义倾向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重新抬

头。在欧洲国家中，德国受“大萧条”影响最大，并在纽约证券市场崩盘后的几年中一直持续。由于德国需要将资金转移给盟国以支付战争赔偿，这使它无法拥有国内投资所需的额外资金。[34] 1933 年，其失业人数高达 600 万。与此同时，通胀重新加剧。于是，希特勒开始利用备受战败和盟国所强加惩罚侮辱的德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他不断抨击国际联盟，认为建立国际联盟是为了保证《凡尔赛和约》的履行。他指责英国企图将欧洲巴尔干化，以便使英国的权威地位不受威胁。他也指责法国试图将德国巴尔干化。希特勒在 1924 年开始撰写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宣扬，应该通过征服欧洲领土并同时争得殖民地，把德国打造成欧陆强国。尽管希特勒将法国和英国称为自己的敌人，但很显然，他所预言的领土扩张方向是往东，以牺牲波兰和苏联为代价。

【注解】

[1] 参议院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并否决了《国际联盟盟约》，主要是因为盟约第十条要求成员国做出承诺：“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政治上之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略。”

[2] Kissinger, 1995, p. 372.

[3] Schulze-Gaevernitz, “Amerikas Überimperialismus”, in Bonn & Palyi, 1925, p. 110.

[4] Id., ibid., p. 111.

[5] Hudson, 2003, pp. 49–51.

[6] 当时，美国在海地、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部署了军队并控制着古巴。

[7] Trubowitz, 1998, p. 99.

[8] “*Es eröffnet sich damit der Ausblick in eine neue Ära der Weltpolitik, welche man—mit Vorsicht—Überimperialismus nennen könnte*”. Shulze-Gaevernitz, “Amerikas Überimperialismus”, in Bonn & Palyi, 1925, p. 12.

[9] Deutscher, 1968, pp. 15–16.

[10] Kautsky, 1990, pp. 232–233.

[11] Lenin, V. I. “Informe sobre Ia Paz” pronunciado el 26 de octubre de 1917; “Informesobre Ia Paz,” discurso de conclusiòn (26 de octubre de 1917), in Lenin, tomo II. 1948. p. 371.

[12] Trotsky, 1979, p. 4.

[13] 戈尔巴乔夫也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斯大林的追随者所称的战略倒退。Gorbachev, 1999, p. 17.

[14] Fischer, vol. 2, pp. 846–847, 894.

[15] Trotsky, 1936, p. 35.

[16] Id., ibid., p. 11.

[17] Id.，ibid.，p. 12.

[18] Id.，ibid.，p. 338.

[19] Bartlett，1984，p. 117. Schulzinger，1994，p. 125.

[20] 巴西政府就放弃国际联盟理事会成员国资格理由的阐述（1926 年 6 月 10 日）；外交部报告（1926 年）；Anexo A，n°1，pp. 3-13. Apud Garcia，2000，p. 123. 这一文献对理解巴西采取的退出国际联盟的立场十分重要。巴西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英国支持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而却拒绝给予它这一资格。Vide também Carvalho，1959，pp. 385-389.

[21] 强加给德国的战争赔偿总计 1 320 亿金马克。

[22] Churchill，1995，p. 12.

[23] Truman，vol. 2，1986，p. 111.

[24] 按照美国银行家查理士·道威斯（Charles Dawes）1924 年制定的最终计划，美元将提供 2 亿美元用于稳定马克，而德国则必须每年支付 2.5 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这一计划显然难以执行，德国不可能无限期地支付这一巨额款项。1929—1930 年，一个由欧文·杨格（Owen D. Young）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提出了另一项计划（“杨格计划”）。该方案规定赔偿总额为 1 139 亿马克，分 58 年半付清。这一方案因纽约股市崩盘导致经济大萧条和时任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提议 1931—1932 财政年度缓付而未能执行。希特勒上台后宣布不再支付战争赔款。

[25] Haffner，1989，p. 186.

[26] Hitler，Rede（21. aug. 1923）；AS，Dok. 561（b），S. 987. Apud Schmied，2002，pp. 117-718.

[27] Hitler，Rede（2. nov. 1922）；AS，Dok. 416（a），S. 717. Id.，ibid.，pp. 717-718.

[28] 法国以取消奥地利和德国海关联合项目作为援助安斯塔特信用公司的条件。

[29] 7 月后半个月有 3 500 万英镑损失。Maurois，s/d，p. 439.

[30] “政友会”成立于 1900 年，曾是日本最强的党派，总体上保守，但与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的利益一致。相比军事扩张，它更倾向于经济扩张。

[31] 首相犬养毅（1855—1932）于 1932 年 5 月 15 日被一批激进民族主义海军年轻军官和士官杀害。Hall，1997，pp. 312-214.

[32] 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于 1913 年。

[33] Connel-Smith，1966，pp. 86-93.

[34] Turner Jr.，1985，p. 159.

第五章

希特勒的崛起　夺权和建立独裁　德国对外政策的重新定位　希特勒与罗斯福经济贸易政策的对立　划分世界势力范围成为希特勒的目标　寻求“生存空间”　《莫洛托夫协定》　里宾特洛甫　斯大林对希特勒的信任

托洛茨基1931年就预言，纳粹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德国与苏联发生战争。[1]他奉劝斯大林，一旦希特勒在柏林掌权，就必须把红军动员起来。[2]但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等德共领导人认为，纳粹很快就会威信扫地，无产阶级将团结在社会革命旗帜下。他们在与纳粹党的竞争中也使用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于是，这些口号同时出现在两党标语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发动了“纳粹党夺权”。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总统的任命使希特勒作为议会和政府联盟首脑合法地接管了德国政府。其政府内阁11名成员中，最初只有2人属纳粹党。[3]2月28日，他开始建立极权。“盖世太保”在纳粹头目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戈林（Hermann Goering）策划下，引诱患有精神病的共产党人范·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到国会纵火，这使得希特勒得以通过议会批准的《授权法》独揽大权，无须对《魏玛宪法》作任何修改就合法地建立了一个极权政府。[4]同时，希特勒还改变了对外政策方向，为德国建立“生存空间”的意图暴露无遗。“生存空间”的最初构想是以牺牲苏联为代价扩张领土，保证德国农业的自给自足。[5]1933年10月21日，他要求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并在不久后（1934年4月4日[6]）秘密启动了重新武装计划。1935年3月16日，他单方面废止《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队的限制条款，实行义务兵役制，将国防军增至36个师，并加强了德国在1922年4月16日《拉巴洛条约》签署后就秘密进行的军事训练。[7]

德国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对外政策也同样作出了调整。1934 年 10 月，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汉斯·路德（Hans Luther）向赫尔国务卿递交了一份照会，告知废除 1925 年生效的《德美贸易协定》。由于外汇奇缺严重地限制了德国的进口能力，德国经济部长耶马尔·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着手实施“新计划”经济战略，其目的是让德国摆脱世界市场，不受“华尔街独裁者”的束缚[8]，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并通过双边协定即易货扩大贸易。鉴于这一目的，德国力争从那些愿意为其产品出口提供便利的国家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由此建立了一个马克补偿双边支付体系（ASKI-mark）[9]，但补偿款项只能用于在德国市场的购买。失去了在非洲殖民地和被割让地区的煤矿、铁矿后，德国开始向东南欧和同样外汇短缺的拉美发展。这使得它能与许多国家达成补偿协议，以工业品作为交换，获取德国经济所需的原材料，而不必花费外汇。[10]

希特勒的政策与罗斯福实行的“新政”相抵触。“新政”意在通过实施公共项目尤其是军备项目，使美国摆脱经济萧条。其做法是以最惠国条款为基础，与各国签署贸易协议，推广自由汇率、多边贸易、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等开放政策。在致巴西外交部的备忘录中，美国政府表达了它对许多国家通过双边协议寻求“短暂幻想的好处”的担忧，并指责“补偿原则和狭隘的双边主义”是世界贸易恢复和发展的主要障碍。[11]备忘录清楚地表明，根据双边协议所进行的政府间贸易与美国试图通过其自身行为推动的多边贸易体系相冲突。它呼吁其他国家与美国合作，避免个别国家自行其是。[12]

德国与一些国家签署的双边补偿协议的确是恢复和扩张的主要障碍，但不是对世界贸易而言，而是对企图通过多边贸易巩固美元作为流通货币霸权地位的美国而言。根据美国大使馆向巴西外交部递交的一份备忘录，1935 年进行的一项对巴西进口的分析显示，马克补偿体系严重地影响了美国各类工业品的出口。该备忘录对“美巴传统贸易关系的削弱和并非由自身意愿而是强加这类措施的其他国家的单边行动所决定的巴西外贸政策”表示遗憾。[13]美国驻里约热内卢大使休·吉布森（Hugh Gibson）预计，假如马克补偿协议付诸实施，“将使德国所公布的发展计划取得明显进展，而它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14]。他称，“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德国将取代美国跃居首位，美国在巴西市场的很多项目将遭到排斥”[15]。他的预言果真得到了应验，实施马克补偿体系的结果是，在 4 年时间中，德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的最大供应国。它不仅可以从那里得到所需的农产品和原材料，而且还为其工业品的投放打开了市场。德国在巴西市场的占有率从

1934 年的 14.02%升至 1935 年的 20.44%，1938 年更增至 25%。[16]美国尽管与巴西签署了贸易协定，但它在巴西市场的占有率仅从 23.67%增至 24.02%。英国则在同期从 17.14%锐减至 10.04%。[17]

德国与巴西的贸易变化并非个案，它在拉美的贸易攻势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对德国在拉美的影响感到忧心忡忡，他请求罗斯福发起一场宣传反击战。[18]1935 年上半年，委内瑞拉对德国的出口为 580 万玻利瓦尔，这与 1934 年委内瑞拉的全年出口相比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该国同期进口额为 840 万玻利瓦尔，而前 12 个月仅为 1 120 万玻利瓦尔。[19]其他接受马克补偿体系的国家的情况也类似。秘鲁对德国的出口从 1934 年 4—11 月的 2 770 万索尔提高到 1935 年同期的 3 100 万索尔，从德国的进口则从 940 万索尔猛增到 1 850 万索尔[20]；德国与尼加拉瓜的贸易也出现了增长，尽管对德出口从 1934 年的 540 万美元降至 1935 年的 270 万美元，但进口却大幅增加，在一年时间中，从 93 万美元增至 210 万美元。[21]补偿贸易使拉美各国受益，它们可不必花费外汇而通过补偿体系进口工业品。与此同时，不仅仅与拉美的贸易，德国与世界各国的总贸易额突飞猛进，其出口从 1933 年的 49 亿马克增至 1937 年的 59 亿马克。同期的进口从 42 亿马克增至 55 亿马克。通过双边协议展开的贸易竞争可能是促使美英与德国对立尖锐化的一个因素。

种种迹象表明，希特勒的意图是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在他看来，与英国的冲突只限于贸易范围，法国则被他视为德国在争夺欧洲大陆控制权中的头号敌人。他在 1936 年 1 月的讲话中宣称，数百万德国人需要工作和吃饭，不能基于外国领导人所提供的保证或任何国际援助来建设国家的未来，而只能依靠本国生产的坚实支撑。为此，就必须找到国内外市场。不久，希特勒指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德国必须做好 1940 年左右打仗的准备。他向在西班牙针对人民阵线发动内战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将军提供了军事援助（坦克和飞机）。1938 年，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入侵奥地利并将其吞并。然后，它又占领了捷克的苏台德区。法国总理爱达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以德国不占领整个捷克为条件，认可了这一事实。这使德国得以将 1 050 万人口（700 万奥地利人，350 万苏台德区的德国居民）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22]

张伯伦和达拉第与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的目的是希望德国进攻苏联，毁灭比纳粹政权更让西方工业国家感到恐惧的共产主义政权。希特勒自从发表《我的奋斗》后，不再隐晦其勃勃野心。他不仅要恢复 1914—

1918年战争前的德国边界和地位，还要占领东欧的广大地区，并将苏联变成其殖民地。1939年3月，当德国军队占领布拉格并在2天后又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后，国际局势骤然紧张，斯洛伐克在德国的保护下正式宣布独立。张伯伦在德国占领苏台德区后做出的保证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完整的承诺已失效。他别无选择，只能宣布，假如德国进攻波兰，英国将向后者提供支持。4月1日，希特勒做出回应。他说，就像德国没有干涉巴勒斯坦一样，英国不应干涉德国的“生存空间”。他称，英国人在巴勒斯坦杀戮阿拉伯人，只是因为阿拉伯人在为建立自己的祖国而战。他质问：“是谁给了英国这样做的权利?”

罗斯福一直对德国心存疑虑。他认为，英、法、美未在1918年获胜后占领德国是一个错误。[23]4月14日，他给希特勒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24]他在电报中表达了美国人民和西半球各国人民对可能发生一场或一系列新战争的担忧，要求希特勒承诺10年内不对31个国家发动进攻，并列出了这些国家的名字。[25]4月28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大厦公开回应了罗斯福的电报。自1933年以来，那里一直被用来进行宣传演讲和播放反闪米特人的电影。他称，《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仅仅在1919—1938年就发生了14场战争，德国没有卷入其中任何一场。但罗斯福以及他所代表的西半球各国人民无疑都参与了这些战争。[26]他还指出，在同一时期，通过武力和流血发生了26起暴力干涉和制裁行动，德国没有参与任何一起，而美国却自1918年以来发动了6次军事干涉。苏联参与了10场战争和军事行动。希特勒称，假如罗斯福有这么大的兴趣想弄清德国在欧洲的意图，那么他有同样的权利反问美国，什么是它的对外政策目的？它对中美和南美有何企图？谈到美国用以独揽干涉西半球各国内部事务特权的“门罗主义”时，希特勒称，“我们德国人在欧洲也有类似方针——尤其是在涉及‘大德意志帝国’的领土和利益”问题上。[27]关于要求德国军队不攻击其他国家的承诺，尤其是罗斯福提及的那些地区或属地，希特勒讥讽道，名单中包括的叙利亚并没有自由，它处于民主国家的统治之下，因而被剥夺了自己应有的权利。[28]他强调，罗斯福显然没有注意到，巴勒斯坦不是处于德国军队而是英国军队的占领下，英国人借助暴力限制巴勒斯坦人的自由，限制了他们的独立。为了“犹太侵略者”的利益，不惜使用残酷手段。他还指出，“在那个国家生活的阿拉伯人显然没有向罗斯福先生抱怨德国的侵略，但却在向世界不断呼吁，谴责英国在镇压一个热爱自由并只想捍卫自由的人民时所使用的野蛮手段”[29]。

罗斯福发给希特勒的电报表明，美国坚定支持张伯伦向波兰做出的保

证，并隐晦地表达了美国直接卷入欧洲可能发生的战争的意图。希特勒回应他的演说意味着一个决定，等同于在道德上对美宣战，与张伯伦对波兰的承诺和罗斯福发给他的电报没有两样。尽管英国处于其中，但正在逐步形成的主要是美国与德国之间的冲突。美国试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强加和巩固其霸权地位。希特勒则意在像凯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那样，为德国“重组欧洲”并占领“生存空间”，也就是跨越继续阻碍其生产力迅猛发展的狭窄民族国家疆界，为扩大德国的经济空间而战。其宏大的超民族帝国主义构想的目的在于，把德国的统治范围从大西洋拓展到乌拉尔山，从纳维克延伸到苏伊士，使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30]成为现实，并建立“大日耳曼帝国”——第三帝国，以重组整个世界，并至少维持一千年。

面对得到美国支持的英国所采取的立场，希特勒试图与斯大林达成谅解，让苏联保持中立，以便保证物资供应，并能腾出手来入侵波兰。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征服乌克兰的肥沃土地和苏联其余部分作为德国“生存空间”的意图。对波兰的入侵是实施其意图的前奏。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述，他的目的是停止“朝南方和西方的永恒运动，将视线转向东方的土地”[31]。1939 年 8 月 22 日，希特勒向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表示，要实施进攻来引发战争。他必须给出一个“可用作宣传的理由”。他说：“人们能否接受并不重要，等战争分出胜负后，人们不会去问胜者他是否说了实话”[32]。希特勒梦想取得一个巨大胜利，但国防军的将军们则感到恐慌。[33]

次日，德国外长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和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莫斯科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按克里姆林宫的官方说法，斯大林是因为担心法英两国通过《慕尼黑协定》把希特勒的战争欲望引向苏联才接受了与德国的协议。[34]斯大林是认真的，他在协议签署后给希特勒敬了酒，并走向约里宾特洛甫，以个人名誉向其保证苏联不会背叛伙伴。[35]斯大林在给希特勒敬酒时说的并不是一句空话，他们之间的盟约实际深度要大得多，远远超过了任何维护安全与和平的需要，通过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36]（Alexander Yakovlev）称为“不道德”和“罪恶”的秘密协议，两人协调了军事行动，瓜分了波兰，把“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东欧划分为以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为界的“势力范围”。[37]

苏联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不仅通过武力侵占了波兰的部分领土以及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比萨拉比亚和芬兰，还向纳粹德国提

供了它发动战争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根据 1940 年 2 月 11 日签署的价值高达 6.4 亿德国马克的贸易协定，即使在希特勒入侵波兰引发战争后，苏联还向德国提供了约 90 万吨石油、100 万吨粮食、50 万吨面粉、10 万吨棉花、50 万吨磷以及数量可观的其他各种原材料。此外，苏联还从满洲里向德国运去了 100 万吨大豆。[38]这样，斯大林使希特勒得以打破英国对其实施的封锁，进攻法国并入侵比利时和荷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希特勒所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向纳粹表达了意识形态上的同情。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调整，要求它们转而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作斗争。NKVD（苏联安全警察的新名称）向“盖世太保”移交了德国共产党员。他们中的多数是由于政治分歧而被关押的犹太人。[39]1940 年 12 月 18 日，希特勒发布了第二十一号指令，命令国防军筹备“巴巴罗萨计划”，即入侵苏联。几天后，也就是在圣诞节前夕，斯大林还给他发电报称，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鲜血铸成的”，完全有理由“万古长青”。[40]

【注解】

[1] Trotsky, Leon. “Está na Alemanha a chave da situação internacional”, 26/11/1931, in Trotsky, 1979, pp. 30-35.

[2] Id., ibid., pp. 30-35.

[3] Payne, 1995, p. 174.

[4] Schirer, 1992, pp. 267-273.

[5] Turner Jr., 1985, pp. 74, 78, 84, 92, 208.

[6] Manchester, 1968, p. 357.

[7] 德国是首个承认苏联的国家。相对于那些向德国强加《凡尔赛和约》屈辱条款的战胜国，它的这一做法使自己的地位得到了加强。1922 年签订的《拉巴洛条约》对两国的经济和政治极为重要，柏林政府派遣前国防军优秀军官去指导苏联红军士兵和飞行员。这些军官中许多人当时依然处于失业状态。作为交换，他们被允许在苏联训练德国新兵，这一做法避开了《凡尔赛和约》的相关规定。Vide Moniz Bandeira, 2001, pp. 60-61.

[8] Hitler, Rede (17 April 1926), apud chmied, p. 718.

[9] *Ausländer Sonderkonto für Inlandszahlungen* 的缩写，意为“用于国内支付的外国人特别账户”。

[10] Rovan, 1994, pp. 678-679.

[11] *Aide-mémoire*, Rio de Janeiro, 2/6/1936. Arquivo Histórico do Itamaraty, Lata 726 Maço 10438.

[12] Ibid.

[13] *Memorandum*, Rio de Janeiro, 16/4/1936. Ibid。

[14] Telegrama de Hugh Gibson ao secretário de Estado Cordell Hull, Rio de Janeiro, 1/6/1936。Paper Relating to FRUS, 1936, p. 261.

[15]Ibid.

[16] *Le Petit Parisien*, Paris, 16/6/1936.

[17] Niemayer, s/d, 142. 关于这一问题，参阅 Moniz Bandeira, 1994, pp. 42-45; Hilton, 1977, pp. 97-100.

[18] Schoultz, 1999, p. 308.

[19] *The Financial Times*, Londres, 6/4/1936. Arquivo Histórico do Itamaraty, Lata 726, Maço 10438.

[20]Ibid.

[21] *Le Petit Parisien*, Paris, 16/6/1936.

[22] Churchill, 1995, p. 161.

[23] Beschloss, 2002, pp. 9-12.

[24] Telegram by President Roosevelt to the Chancellor of Germany Adolf Hitler. U. S. Diplomatic Mission to Germany http://www. usembassy. de/usa/etexts/ga3-390414. htm.

[25] 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英国和爱尔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瑞士、列支敦士顿、卢森堡、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俄罗斯、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伊朗。

[26] Adolf Hitlers Antwort an Roosevelt 28 April 1939. Der Führer antwortet Roosevelt. Reichstagsrede vom 28 April 1939. Zentralverlag der NSDAP., F. Eher Nachf., München.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Printed in Germany. Druck: Buchgewerbehaus M. Müller & Sohn. München, http: //81. 6. 49. 34/bibliothek1/Lifestyle%20Geschichte%20Welt/2WK/（e b o o k%20german）%20Adolf%20Hilter%20Der%20Der%20F%C3%BChrer%20a n t w w o r t e t%20Roosevelt%20Reichstagsrede%201939. pdf.

[27]“罗斯福先生的‘门罗主义’在这一背景下被援引，拒绝‘门罗主义’的要求被视为对美洲大陆内部事务的干涉。德国在欧洲有着完全相同的方针，尤其是在涉及大德意志帝国的领土和利益问题上。”Ibid.

[28] Ibid.

[29]“在那个国家生活的阿拉伯人显然没有向罗斯福先生抱怨德国的侵略，但却在向世界不断呼吁，谴责英国在镇压一个热爱自由并只想捍卫自由的人民时所使用的野蛮手段”。Ibid.

[30] 德国国歌是由诗人奥古斯特·法勒斯雷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1798—1874）写于 19 世纪。“*Deutschland über Alles*”（德意志高于一切）指的是 1871 年德国的统一。纳粹分子将其歪曲并赋予了对外扩张的含义。

[31]“我们在离开了六个世纪的地方安顿下来。我们应停止日耳曼永远朝南和朝

西前进的步伐，而是将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我们终于中止了战前的殖民贸易政策，而着眼于未来的领土政策。今天当我们在欧洲谈及一片新土地，首先只能是俄国以及与其接壤的国家。”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Zweiter Band, 13. Kapitel: Deutsche Bündnispolitik nach dem Kriege, p. 684.

[32] Fest, 1974, pp. 594-595. Fest, 1979, p. 82.

[33] Gisevius, 1947, p. 378.

[34] Autorenkollektiv, 1969, pp. 423-427.

[35] Fest, 1974, pp. 592-593. Volkogonov, 1996, p. 386.

[36] 雅科夫列夫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戈尔巴乔夫的幕僚之一，是制定“重组改革”政策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还担任人民代表议会负责调查希特勒与斯大林盟约真相的委员会主席。调查的结论是双方确实订立了秘密协议。调查结果被递交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秘密协议是二战后在德国发现的，盟国将其在西方国家公开。

[37] Gorodetsky, 1999, pp. 3-9.

[38] Shirer, 1992, pp. 685-705, 829-837, 1040-1049.

[39] Yakole, 1991, pp. 119-120. Volkogonov, 1996, p. 387.

[40] Shirer, 1992, pp. 1063.

第六章

罗斯福和美国的战备　被视为出口商品的军国主义　伯纳德·巴鲁与军工集团　希特勒和罗斯福为摆脱经济危机而扩军备战　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协议　轴心的形成　对日本进行挑衅　袭击珍珠港　美国卷入战争

尽管美国表面上试图保持中立，但它不可能置身于欧洲冲突之外。1939年11月4日，美国《中立法》被修改，这使得美国私营企业得以按“现款自运”原则出口军工产品。1940年5月31日，罗斯福实施“10亿美元防御计划”，目的是加强美国的军事能力。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美国向英国和法国运送了价值5 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1]为了绕过《中立法》，提供给英国的大量步枪和大炮于1940年6月13日通过一家钢铁公司的船只启运。为了满足新首相丘吉尔的请求，罗斯福紧接着又向英国提供了50艘驱逐舰。作为交换，英国把它在加勒比和纽芬兰的基地租借给美国，为期99年。基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因素，巴西驻华盛顿大使卡洛斯·马丁斯（Carlos Martins）在写给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总统（1930—1945年，1951—1954年）的信中得出如下结论：中立已经无法为美国领导人提供保障，他们正极力弥补的军备依旧不足，这才迫使美国依旧保持克制。“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他们高喊‘美国应该把欧洲从德国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口号，像十字军远征一样参与到‘古老大陆’的战争中去”[2]。

美国已着手大力实施重整军备计划。这样，它就能像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那样，使军国主义成为向欧洲扩张的工具。1940年9月，罗斯福为美国卷入战争迈出了头几步。他向国会提交了招募预备役人员入伍计划；动员工厂生产军工产品；召集国民警卫队；与英国谈判达成了用50艘旧驱逐舰交换百慕大、巴哈马、牙买加、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基地的租借权；投入50亿美元用来建立一支可能包括100艘

航空母舰[①]的跨洋海军。[3]罗斯福继续通过电台节目进行反德宣传，渲染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以便使人们对支持美国参战形成共识。1940 年 12 月 29 日，他再次通过电台发表讲话。他在谈到德、意、日三国于 1940 年 9 月 27 日在柏林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时说，纳粹的意图不仅仅限于奴役欧洲，而是企图通过占有其资源进而征服整个世界。他指出，历史教训已确凿表明，任何国家都无法使纳粹变成和平者，“对残忍者绝不能姑息”[4]。他认为，美国如果帮助其他国家抵御“轴心国”的进攻而不是坐视其败，那么，参战风险就会降低。他宣布，正在建立最有效的机构来引领一场意在增加弹药、大炮、飞机和其他军事设备的“巨大努力”。罗斯福扬言，“我们必须是民主的兵工厂”[5]。1941 年 1 月，他向国会提交了 175 亿美元的预算案，其中 108 亿为防务费，相比 1931 年的军费支出，增幅为 1 000%。那年，用于陆军和海军的预算为 838 547 144 美元。[6]在请求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租借计划”时，国防部长亨利·斯廷森（Henry L. Stimson）声称：

> 我们做准备之时，就是在购买自身的安全。在过去六年中，德国一直在做准备，我们却发现自己毫无准备。没有武装的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准备充分、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

斯廷森希望美国参与欧洲战争的意图昭然若揭。1941 年 3 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向被其视为与美国国防休戚相关的重要国家政府出售、转移、交换、租赁、出借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70 亿美元被预留，用于资助该计划。[7]美国在没有直接参战的情况下，通过该计划向英国提供了弹药、坦克、飞机、卡车和食品。

在 1914—1918 年战争后被托洛茨基称为“美洲夏洛克”的美国又准备通过向欧洲提供毁灭性武器敛财。20 世纪 20—30 年代期间，华尔街投机者伯纳德·巴鲁（Bernard M. Baruch）和其他企业家及军事首领们一同在美国大力发展和巩固军工合作计划。[8]他曾于 1918 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1940 年 5 月 26 日，罗斯福在电台讲话中透露，在 1933 年执政至那时的 7 个财政年度中，他已在海军身上投入约 15 亿美元，高于他执政之前 7 年的支出。[9]兵力从 7.9 万人增至 15 万人。在此期间，包括 12 艘巡洋舰、63 艘驱逐舰、26 艘潜艇、3 艘航空母舰、2 艘炮艇、7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艘辅助船只和许多小型船只在内的215艘舰艇，加入海军舰队或已订购，是他执政之前7年的7倍。罗斯福还透露：

> 我们在不断改进、重新设计和试验新武器，并从最近战争中汲取教训，将新技术和科学取得的最新成就应用到武器研制中。[10]

与希特勒在德国所采取的做法一样，在1929年危机后，罗斯福极力推行军国主义，也就是借助生产军工产品振兴美国经济。为了促进生产，政府向那些包揽政府武器需求95%～97%的私人企业预支必要资金[11]，以扩大生产，建造新厂房，雇用成千上万的工人，开拓所需数百种原料的新供应源，并寻求快速运输原料的途径。[12]罗斯福公开支持对自己自青年时代起就憎恨的德国开战。[13]法国被打败后，他积极寻求两党支持其对外政策。为此，他于1940年7月任命一位活跃的共和党人威廉·诺克斯（William Franklin Knox）出任海军部长。诺克斯对9月27日签署的作为柏林——东京——罗马轴心基础的《三国同盟条约》予以谴责，并于10月5日招募了美国部分海军预备役人员。

德国试图通过《三国同盟条约》说服美国不要参与支持英国的战争。与美国将美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样，德国在欧洲寻求其“生存空间”。1937年，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日本计划在东方建立类似“门罗主义”的所谓“共荣圈”，企图占领法国、荷兰和英国在东亚的属地，即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14]（印度尼西亚）和英属马来西亚。这些地区是石油、锡和橡胶产地。日本的目的是迫使美国承认那些它自认为属于自己的权利。[15]1941年中，在得到维希政府认可后，它入侵了法属印度支那（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并继续向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推进。罗斯福从1940年起就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铁。日本意在控制亚洲的攻势使他意识到，日本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构成巨大威胁。在宣布进行“无限期国家紧急状态”并召集武装力量预备役人员转入正规军的同时，他决定对日本实施制裁。美国与英国和荷兰一起冻结了日本在美国银行的金融资产，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这些政策意在从经济上扼杀日本，使其无法再进口对本国工业至关重要的原料，尤其是石油。这样就能使它别无选择，要么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要么通过侵略去其他地区寻找原料供应源。后一种选择势必导致与美国发生战争。

罗斯福和接替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1874—1965）保持着密切关系。在德国国防军动用550万兵力和4 300辆装甲车于1941年6月22日通过“巴巴罗萨计划”[16]入侵苏联不到两月后[17]，罗斯福与丘吉尔进

行了会晤。两人于1941年8月9—12日在布雷森莎湾（加拿大的纽芬兰）的“威尔士亲王号”装甲舰上会晤。此时，英国财政已捉襟见肘。丘吉尔对美国财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说的原话是“完全破产”。[18]英国的黄金储备已从1938年的40亿美元减至1940年的10亿美元。[19]正如《租借法案》已表明，罗斯福承诺将在对德战争中支持英国，但并非帮助其克服金融困难。罗斯福要求英国承诺，取消在其殖民地实施的“帝国优惠”体系[20]，建立“门户开放”体系，以便让美国涉足非洲、亚洲和中东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21]很可能是在那次会晤中，罗斯福与丘吉尔商定了美国对德国开战事宜。但美国将从“后门”发起攻击，也就是通过与日本宣战，参与对德国的战争。会晤结束后，两国政府首脑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即《大西洋宪章》。其第六条表述为：

> 在纳粹暴政被最终消灭之后，他们希望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22]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指出，美国作为一个理论上仍保持中立的国家，通过这一声明与一个交战国结盟这一简单事实令人吃惊。他认为，在声明中加入“暴政最终灭亡”这一表述无异于一个战争宣言。[23]向英国提供50艘旧驱逐舰也等同于对德宣战。参议员杰拉德·奈（Gerald Nye）在批评这一交易时就这样表示。这笔交易也受到其他多名议员的批评。[24]海军少将罗伯特·西奥博尔德（Robert A. Theobald）认为，谁也无法想象，哪怕是一闪而过的念头，罗斯福和丘吉尔会在高级外交官、海军和陆军顾问陪同下，在布满潜艇的大洋上航行250海里，目的仅仅是发表一项中立声明。[25]罗斯福对丘吉尔说，即使没有受到直接攻击，美国也决定在远东参战。他们在布雷森莎湾会晤中奠定了合作基础。于是，罗斯福就采取了挑衅行动。他和海军情报部远东负责人阿瑟·麦克鲁姆（Arthur H. McCollum）持相同观点，将德国视为美国的战略敌人。他担心，一旦希特勒征服英国，他就会将侵略延伸至加拿大和加勒比。[26]但在1940年大选期间，他已向美国的母亲们承诺，不派她们的孩子去国外参战。1941年2月1日，盖鲁普公司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88%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卷入与德国的战争。众议院仅以一票优势批准了恢复义务兵役制。[27]

罗斯福想扭转被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称为“大陆岛”的美国孤立主义倾向。[28]他认为，如果美国不直接参战，英国就难以依靠自

身力量战胜德国。但他需要一个感动舆论的理由，使其支持美国卷入战争。就像希特勒一样，他需要一个“可用作宣传的理由”。正如珍珠港的驱逐舰舰长西奥博尔德少将所言，“只有一起灾难性事件才能使国会批准宣战”。他还补充说，“这正是总统的麻烦”[29]。这样，罗斯福一边加强战备，不断违反中立规则，以便挑起冲突；一边经常通过电台节目《炉边谈话》与美国人民交谈，进行反德宣传。9月11日，他宣称德国潜艇攻击了一艘开往冰岛的美国驱逐舰。他说，美国人一直在为海上自由而斗争，而1941年肆无忌惮的潜艇战是对美国政治历史的侵犯。他警告说，自那时起，只要有德国或意大利船只进入被认为是美国防卫所必需的区域，“它们将会咎由自取”[30]。其目的是围绕美国安全制造“虚假恐慌”。[31]

尽管罗斯福不断违反中立立场，但德国一直不接受挑衅，并避免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32]希特勒清楚，在1914—1918年战争中，美国的参战对德意志帝国的失败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样，罗斯福只得启用麦克鲁姆舰长1940年10月7日所写备忘录中构思的外交战略，以便刺激日本，诱使它发起对美国夏威夷舰队或太平洋英属和荷属殖民地的攻击。这一挑衅行为包括1941年7月25日达到顶点的经济制裁。当日，美国与英国和荷兰一道，中止了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使其处于彻底的经济封锁之下。[33]丘吉尔在当年11月5日致罗斯福的信中称，“我们的联合禁运正在坚定地迫使日本做出和平或战争的抉择”[34]。

德国于1940年9月28日与意大利和日本签署的承诺共同防御的《三国同盟条约》，是罗斯福策略的依托。因为较易挑起的与日本的战争，也意味着与德国开战。[35]出于这一目的，罗斯福在结束与丘吉尔的会晤返回美国后，拒绝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Fumimaro Konoye）和平解决与美国分歧的努力。1941年10月16日接替近卫出任首相的东条英机（Hideki Tojo）将军也试图与美国达成谅解，以便保护日本在东亚的利益。他提议制定一个为期3个月的“暂定办法”，但谈判变得异常紧张。11月7日，罗斯福及其部长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我们在那里（东方）打击日本，人民会支持我们。”他对日本将在未能通过和平途径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向美国开战深信不疑。尽管马歇尔将军和海军行动指挥官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R. Stark）上将倾向于接受“暂定办法”，以便完成为太平洋战争所做的调整计划，但罗斯福仍于11月26日命令赫尔国务卿拒绝东条英机将军的提议，并发出要求它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和退出《三国同盟条约》的最后通牒。日本自然无法接受这些条件。面对要么投降，要么战斗的选择，日本将作何种反应显而易见。唯一的结论是，罗斯福需要对日本的战争报复有绝对把握。[36]赫尔

对斯廷森说："此事已与我无关，已交到你和诺克斯手里，交到陆军和海军手里。"

随着11月26日发出最后通牒，问题已超越外交领域而交到军人手中，也就是说，政治要通过战争手段来开展，这正是罗斯福所希望的。其班子评估了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美国等待日本来攻击自己；第二种可能是在国会宣战前攻击日本；第三种可能是罗斯福把和平和战争问题提交国会。战争已迫在眉睫。罗斯福在和赫尔、斯廷森、诺克斯、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海军上将举行的会议中预测，美国"可能于下周一（12月31日）遭到攻击"。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让他们（日本人）先开第一枪，而又不至于让我们冒太大风险。"斯廷森在日记中这样写道。[37]1941年11月27日，在向驻夏威夷、菲律宾和巴拿马运河美军指挥官通报形势和战事即将爆发的信息时，斯塔克海军上将反复强调，如果冲突难以避免，美国希望日本首先挑起战争。[38]

据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透露，11月15日，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召集多份报纸负责人，他在提出保密要求后通报说，美国已破译了日本海军密码，与日本的战争将在12月头5天打响。[39]丘吉尔本人在回忆录中证实，"自1940年年底起，美国就已掌握了日本人的关键密码，并破译了他们的大量军事和外交电报"[40]。事实上，紫码已被完全破译。美国海军情报部正在实施"魔幻"行动，其目的是截获、破译日本政府的电报，并将其转发至华盛顿。[41]据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证实，"……依靠对日本密码的破解，罗斯福、斯塔克，可能还包括马歇尔将军，预先得到了日本人将于12月7日发动袭击的警报"。毫无疑问，罗斯福以及其他美国领导人事先都知道，日本人的袭击很可能发生于12月第一周。自1941年1月起，美国驻东京大使就提醒华盛顿，公开冲突将以袭击珍珠港海军基地为开端。[42]12月3—5日，多份被美国海军情报部截获并被"魔幻"[43]破译的信息确凿地表明，日本对停泊在那里的美国舰队感兴趣。[44]12月6日，英国情报机构得到了日本舰队进行调动并经过暹罗湾的信息。[45]在一天时间内，美国密报员破译了4封电报，其中一封是向12名日本领事通知与美国断绝关系的决定。另一封电报则是指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野村吉三郎（Nomura Kichisaburo）于12月7日（周日）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一份备忘录。日本政府在这份包括14点内容的备忘录中遗憾地通知美国政府，由于它所持的态度，日本政府只能认为已无法通过谈判达成协议。[46]根据莱斯特·舒尔茨

（Lester Schulz）舰长向“国会两院联合调查委员会”的陈述，当罗斯福读到被破解电报的第14点时，他对外事助理哈里·霍普金（Harry Hopkin）说：“这意味着战争”[47]。

虽然“魔幻”未获得能确凿证明日本将于12月7日袭击珍珠港的信息，但有可靠证据表明，该日13点（华盛顿时间）左右，即夏威夷时间7点半左右，将会发生重大事件。对各种信息的比较并结合其他信息，已表明事态的走向，冲突一触即发。然而，尽管美国政府在该照会被递交国务院前就已了解其中内容（日本大使馆的解密困难耽搁了递交时间[48]），但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哈兹本德·金梅尔（Husband E. Kimmel）少将和驻夏威夷陆军司令瓦特·绍特（Walter C. Short）中将均未被告知威胁即将来临。[49]12月7日上午，当威廉·奥德博拉治（William W. Outerbridge）担任舰长的美国驱逐舰“沃德号”在夏威夷附近击沉一艘日本微型潜艇后，战争宣告爆发。一小时后，日本飞机轰炸了美军基地[50]，造成2 476名美国海员、士兵和平民丧生，1 000余人受伤，200多架飞机被摧毁，18艘舰只沉没，另有多艘舰只受损。[51]美国作战部长斯廷森表示，“日本人通过直接袭击夏威夷已解决了一切问题”。[52]这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摆脱孤立主义倾向，让美国直接与德国开战所需要的借口。次日，他致函国会请求批准对日宣战。函中写道，“昨日，1941年12月7日——一个永远令人感到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蓄意的突袭”[53]。在12月9日的电台节目中，罗斯福宣称，“美国所能接受的结果只能是最终的、彻底的胜利”[54]。他表示，如果说世界其他地区仍处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统治之下，那么，仅仅铲除日本的威胁还不够。

英国生产部长奥利弗·利特尔顿（Oliver Lyttelton）认为，“日本是因为受到挑衅才袭击珍珠港”。他表示，如果说美国被迫参战，在遭受攻击前处于真正中立，那是不正确的。[55]罗斯福寻求与日本冲突，进而挑起与德国战争的证据确凿，许多经历了那场以珍珠港遭袭而告终的危机的美国人感知了这一点。“他（罗斯福）让我们从‘后门’进入。”“美国第一委员会”[56]创始人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在得知珍珠港遭袭后对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57]（Charles Lindbergh）这样说。[58]伍德将军和林德伯格被认为同情纳粹法西斯主义而受到指责。而负责制定用于与德国作战“取胜计划”的魏德迈将军在《魏德迈报告》中指出，“日本发动袭击前受到蓄意挑衅的事实被珍珠港灾难所掩盖”[59]。“魏德迈计划”后来经过调整被用于对日作战。1941年12月7日袭击的目击者西奥博尔

德在《珍珠港的最后秘密》一书中指出，罗斯福所采取的战略在外交上“完全成功”。他对日本保持持续不断并日益加大的经济压力，同时又让美国舰队停留在珍珠港，引诱日本发动突然袭击。[60]接替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对中央情报局首任局长悉尼·索尔斯（Sidney W. Souers）说：“罗斯福总统得到了情报，他决定让袭击珍珠港事件发生，以便唤醒对战争漠不关心的民众”[61]。

记者约翰·弗林（John T. Flynn）1945 年 9 月发表了一本名为“珍珠港的最后秘密”的 15 页小册子，引起了巨大反响。他指责罗斯福招惹日本，让它在珍珠港打响第一枪，以解决美国协同英国对德作战问题。[62]弗林认为，罗斯福在 1941 年 1 月 1 日前后就做出了对日开战决定。但他在竞选运动中曾承诺，美国除非受到攻击，否则不会参与国外的战争。罗斯福曾宣称，“我有必要反复强调，你们的男孩将不会被派去参与任何国外的战争”。这正是他为何要通过各种手段激怒日本政府的原因。11 月，他加紧了行动，向日本发出了一个明知不可能被接受的最后通牒，其结果将会是两国断交，并可能招致日本向英国属地新加坡发起攻击。[63]

毫无疑问，日本将会点燃战火，而珍珠港会成为其袭击目标。[64]太平洋舰队司令詹姆斯·理查森（James O. Richardson）上将因对罗斯福坚持把舰队部署在珍珠港持反对意见，于 1941 年年初遭解职。[65]英国情报部派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大卫·奥格尔维（David Ogilvy）在回忆录中写道：英国西半球间谍行动负责人威廉·史蒂文森[66]（William Stephenson）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天给伦敦发电报称，日本即将发起攻击。在被问及消息来源时，他干巴巴地说：“美国总统”[67]。哈兹本德·金梅尔上将在接受《历史评论期刊》杂志克拉伦斯·马尼思（Dean Clarence Manion）采访时称：

> 我相信那些看过被截获并被破译的日本电报，包括那封 1941 年 12 月 6 日和 7 日收到的含有 14 点内容的电报的人都清楚，与日本的战争难以避免。最能确定的日本攻击目标应是珍珠港的舰队。攻击将会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华盛顿时间下午 1 时发生。[68]

也许罗斯福没有料到事件的后果会如此惨烈。海军部长诺克斯回忆说，当罗斯福被告知珍珠港遭到毁灭性打击时，脸色变得像一张白纸。他说：“罗斯福预料到会遭到打击，但没有想到伤亡如此惨重。”无论如何，对美国人民孤立主义倾向感到失望并被选举承诺捆住手脚的罗斯福操纵了

这一事件。他试图激怒日本，以达到使美国从“后门”参与欧洲战争的目的。托马斯·弗莱明（Thomas Fleming）、罗伯特·斯汀涅特（Robert B. Stinnet）和约翰·托兰（John Toland）等多名美国军人和历史学家均以大量文献为依据，证明珍珠港的军事灾难并非意外，并非美国情报部门的失误，也并非受人口爆炸和寻找新资源和新市场需要挤压的日本的背叛行为。[69]战争被有意识地挑起，而且在预料之内。罗斯福要营造身边的舆论，也就是需要“可用作宣传的理由”，以便把美国推向与“轴心国”的战争。珍珠港事件发生2个月后，罗斯福发布了第9066号行政令，批准作战部长明确军事区，“任何人或者说所有人均可被排除在军事区之外”。他还下令建立集中营，用以关押所有日裔美国人。

【注解】

[1] Schulzinger, 1994, p. 169.

[2] Carta de Carlos Martins, embaixador do Brasil em Washington , a Getúlio Vargas, Washington, 18/6/1940, doc. 97, vol. 33. Archivo de Getúlio Vargas.

[3] Stinnett, 2000, pp. 24-25.

[4] “On National Security” —Radio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Delivered from the White House—Fireside Chat.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 C. , December 29, 1940—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http://www. fdrlibrary. marist. edu/122940. html.

[5] Ibid.

[6] 美国拨给陆军和海军的军费1890年为6 660万美元，1900年增加到1.907亿美元，1914年达到3.48亿美元，1923年增至6.782亿美元，1930年更提高到8.385亿美元。1930年，美国为世界第三大武器出口国，列英国和法国之后。上述三国占全世界武器出口总量的55%。Engelbrecht & Hanighen, 1934, pp. 251-260.

[7] 10月23日，参议院批准为《租借法案》追加59.8亿美元。

[8] Schwarz, Jordan A. “Baruch,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in Higgs, 1990, pp. 1-19.

[9] “On National Defense” —Radio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Delivered from the White House-Fireside Chat.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 C. , May 26, 1940—http://www. fdrlibrary. marist. edu/122940. html.

[10] Ibid.

[11] Engelbrecht & Hanighen, 1934, pp. 248, 269-270.

[12] “On National Defense” —Radio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Delivered from the White House—Fireside Chat.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 C. , May 26, 1940—http://www. fdrlibrary. marist. edu/122940. html.

[13] Fleming, 2002, pp. 181, 268. Beschloss, 2002, pp. 9-11.

[14] 荷属东印度即处于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

[15] 1934 年 5 月，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斋藤博（Hiroshi Saito）向胡佛总统提出一项八点协议，其目的是确定势力范围，承认“在各自国家的邻近地区行使法律和秩序统治权是恰当和合法的权力”。Apud Pratt, 1955, p. 586.

[16] Autorenkollektiv, 1985, pp. 147-155.

[17] 罗斯福提前一周得知德国将入侵苏联的信息，因为英国秘密情报局于 6 月 14 日截获了一份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Hiroshi Oshima）男爵发给东京的紫码电报。Stinnett, 2000, p. 69.

[18] Beschloss, 2002, p2.

[19] Hudson, 2003, p. 119.

[20] Churchill, 1985, p. 395.

[21] Krippendorff, 1987, pp. 190-191.

[22] 参阅原文 Churchill, 1985, pp. 385-386 & 393-395。

[23] Id., ibid., p. 394. Vide também Churchill, 1995, pp. 564-565. Wedemeyer, 1958, pp. 17-19.

[24] Stinnet, 2000, p. 25.

[25] Theobald, 1954, pp. 16-17.

[26] Stinnet, 2000, pp. 12-13.

[27] Churchill, 1985, pp. 535-536.

[28] Aron, 1973, p. 15.

[29] Theobald, 1954, p. 3.

[30] “On Maintaining Freedom of the Seas” —September 11, 1941—Radio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Broadcast from the White House. 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122940.html. 德国不希望美国参战，因为那将对英国有利，自己可能的胜利将被推迟。德国海军司令埃里克·雷德尔（Eric Raeder）元帅命令海军避免与美国舰只发生冲突。这一命令得到希特勒的确认。然而，9 月 4 日，驶往冰岛的美国“格里尔号”驱逐舰与一艘德国潜艇发生了冲突。罗斯福在 9 月 11 日的电台节目中歪曲事实真相，没有说明是“格里尔号”首先采取了攻击行动。10 月 16 日，美国 5 艘驱逐舰从冰岛的雷克雅未克港出发，前往支援运送战争物资的英国和加拿大联合船队，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当“奇尔尼号”驶往德国潜艇与英国和加拿大战舰交火区时被一枚鱼雷击中。罗斯福对该事件的说法是，他已向美国军舰下达命令，可以向任何进入被视为对美国防务来说至关重要区域的“轴心国”舰只开火。

[31] Vide Wedemeyer, 1958, p. 18.

[32] Vide Vide Theobald, 1954, pp. 10-11.

[33] Id., ibid., pp. 3-4.

[34] Churchill, 1985, pp. 526-527.

[35] Theobald, 1954, pp. 3-4.

[36] Id., ibid., pp. 20-22.

[37]“这就是罗斯福企图发动战争策略的全貌：指望日本的行动把被战争情绪激发并团结一致的美国人民带入战争。日本的突袭完全在预料之中。假如袭击未果，日本人将被诱使开第一枪。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都完全接受了日本的突袭和诱使其开第一枪的操纵行动可能给美国带来的严重损失”。Theobald，1954，p. 77. Beard，1948，p. 517.

[38] Top Secret—Naval Message—Priority—From：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To：CinCPAC—Date：28，November 1941. “*The Army has sent the following to commander western defense*：‘*negotiations with Japan appear to be terminated to all practical purposes with only the barest possibilities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might come back and offer to continue*’ *x Japanese future action unpredictable but hostile action possible at any moment x if hostilities cannot，repeat，cannot，be avoided the united states desires that Japan commit the first overt act x this policy should not，repeat，should not，be considered as restricting you to a course of action that might jeopardize your defense x prior to hostile Japanese action you are directed to undertake such reconnaissance and other measur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so as not，repeat not，to alarm civil population or disclose intent x report measures taken x should hostilities occur you will carry out the tasks assigned in rainbow five so far as they pertain to Japan x limit dissemination of this highly secret information to minimum essential officers x unquote xx wpl52 is not applicable to pacific area and will not be placed in affect in that area except as now in force in southeast pacific sub area and panama naval coastal frontier x undertake no offensive action until Japan has committed an overt act x be prepared to carry out tasks assigned in wpl46 so far as they apply to Japan in case hostilities occur*”. Released by Admiral H. R. Stark，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Toland，1972，p. 7.

[39] Vidal，2002，pp. 87-88.

[40] Churchill，1985，p. 532.

[41] 当时已建立多个站点用于截获上海与欧胡岛之间的电报，一些操作员已在日本学习了摩尔斯码。日本用紫码系统加密的电报被解密并发至华盛顿。1941 年 11 月最后几周至 12 月初，日本的外交电报被美国的各个站点（双桥岛和切尔登汉姆等地）截获并转发至华盛顿。陆军也截获了其他一些电报。

[42] Pratt，1955，p. 660.

[43]“魔幻”通常被用作破解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使用的高级密码机紫码在内的各种密码的术语。Kahn，1996.，pp. 117，131-132. Theobald，1954，pp. 32-39.

[44] Theobald，1954，pp. 42-47. Pratt，1955，p. 662.

[45] Churchill，1985，pp. 534-535.

[46]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 V，n° 129，Dec. 13，1941.

[47] Stinnet，2001，pp. 228-231. Toland，1972，p. 5. Fleming，2002，p. 5. Flynn，1945，p. 9. 美国作家维达尔在其历史系列小说《帝国纪事》描写 20 世纪 40 年代的“黄金岁月”中再现了罗斯福读到被解密电报第 14 点时的一幕。他大声喊道：“这意味

着战争。" Vidal, 2000, p. 208.

[48] 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难以解密电报的其中一部分内容，致使野村吉三郎大使14时55分才到达国会，也就是珍珠港袭击发生一个半小时后。珍珠港袭击发生于13时25分（华盛顿时间），檀香山时间为7时55分。

[49] 自罗斯福于1941年7月起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后，金梅尔和绍特都没有接到过任何被截获并解密的紫码电报。金梅尔本人在珍珠港司令西奥博尔德海军少将著作的前言中确认，他既没有接到1941年11月26日美国发给日本照会的全部内容，也没有见到内容摘要。此外，他也不知道当日本攻击英国时美国将参战的承诺。12月6日，即日本对珍珠港发动袭击的前一天被截获、解密并转发华盛顿的电报内容也没有发给驻夏威夷的海军和陆军指挥官。Theobald, 1954, pp. iv - v. Barnes, 1968, pp. 27-31.

[50] "Sea Yields a Story of Pearl Harbor—U. S. Fired First Shot, Sinking Enemy Sub", *The Washington Post*, 31/8/2002.

[51] Stinnett, 2000, p. 244.

[52] Toland, 1972, p. 326.

[53] Joint Address to Congress Leading to a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Japan-December 8, 1941-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oddec7.html.

[54] 140 Fireside Chat. December 9, 1941—Franklin Roosevelt's Fireside Chats—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University of Califórnia.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docs/fireside/120941.php.

[55] 据 Lens, 2003, p. 322.

[56] 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公司总裁罗伯特·伍德将军曾任"第一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为右翼组织，宣扬孤立主义，反对与德国开战。他因被认为同情法西斯纳粹主义而受到指责。

[57] 林德伯格因为进行了首次跨洋飞行而闻名。1927年5月20日，他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飞机经过36个半小时飞行，在跨越3 500英里的距离后在巴黎着落。

[58] Fleming, 2002, p. 40.

[59] Wedemeyer, 1958, pp. 1-2.

[60] "这样，通过在夏威夷部署一支实力很弱的太平洋舰队，诱使日本前来偷袭，加上不向该舰队司令提供能使其挫败偷袭的情报，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12月7日为美国带来了战争。" Theobald, 1954, p. 201.

[61] Copeland, 1989, pp. 68-69.

[62] Flynn John T. *The Final Secret of Pearl Harbor*, 2ª. ed. rev. Nova York,: s/ed, 1945. 文章最初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在美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63] Flynn, 1945, p. 13.

[64] 斯蒂奈特（Stinnett）证实，罗斯福和其他美国官员一直关注日本舰队在太平

洋的调动，他们对珍珠港将成为日本的袭击目标有十足把握。Stinnett，2000，pp. 30-32，172，209-211，235-237，261-262.

[65] Toland，1972，p. 262.

[66] 战争期间，斯廷森领导了西半球情报机构的间谍行动，并协调了英美之间的情报交换。他还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信得过的中间人。

[67] Olgivy，1978，pp. 89-90.

[68] "An Interview with Admiral Kimmel"，*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Dean Clarence Manion，December 7，1958. http://www.ihr.org/cgi-bin/htsearch.

[69] 除了约翰·弗林1945年发表的小册子《珍珠港的最后秘密》之外，还有许多基于美国解密的文献写就的著作。这些作品都表明，是罗斯福对日本进行了挑衅，而且，他预见到日本将向珍珠港发动袭击。相关文献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Ogilvy，David. Blood，Brains，& Beer*（Autobiography of David Ogilvy）. Nova York：Atheneum，1978；Barnes，Harry Elmer. *Pearl Harbor Aft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Torrance，California：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1968；Beard，Charles A.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1941：*A Study in Appearances and Realitie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8；*Copeland，Miles. The Game Player*. Confessions of the CIA's Original Political Operative. London：Aurum Press，1989；Current，Richard N. *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Stinnett，Robert B. *Day of Deceit*：*The Truth about FDR and Pearl Harbor*. Nova York：The Free Press，2000；Theobald，Rear Admiral Robert A. *The Final Secret of Pearl Harbor*：*The Washington Contribution to the Japanese Attack*. Nova York：Devin-Adair Company，1954；Toland，John. *Infamy*：*Pearl Harbour and Its Aftermath*. Nova York. Berkley Books，1972. "*Since September* 1945，*many authors and historians have express the belief that Roosevelt knew of the impending attack by the Japanese. What they didn't know*（...）*what that a systematic plan had been place long before Pearl Harbor that would climax with attack*". Stinnett，2000，pp. 258，259. 斯蒂奈特的著作基于通过《自由信息法案》而获得的大量文献。

第七章

罗斯福对德国的憎恨　美国对战争爆发应承担的责任　反抗希特勒和谋害他的阴谋　罗斯福毁灭德国的目的　空中恐怖主义　广岛和长崎　苏联红军洗劫柏林　《布雷顿森林协定》　世界经济新秩序　联合国

雷蒙德·阿隆认为，“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对大西洋和太平洋爆发的双重战争应承担部分责任”[1]。美国国土远离战火，却派遣军队前往遥远的地方作战。“岛国强权”企图将它在西半球实行的霸权主义延伸到欧洲“古老大陆”和亚洲。如果希特勒没有有意回避罗斯福至少自1939—1940年起就采取的挑衅行为，美国可能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前就已公开卷入与德国的战争。美国著名作家维达尔指出：“今天，没有人会真正怀疑富兰克林·罗斯福希望美国参与对希特勒战争的意图”[2]。但他达到了目的。1941年12月11日14时30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向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临时代办利兰·莫里斯（Leland Morris）递交了战争宣言。[3]宣言称，美国政府公然且变本加厉地违反中立法规，并自1939年9月3日[4]欧洲冲突爆发以来不断对德国进行严重挑衅。[5]希特勒认为，他在德国掌权的同时，“犹太世界的候选人”罗斯福在美国执掌白宫政府的事实，是一个“灾难性事件”和“不幸的历史巧合”。“假如没有犹太人及其代理，历史进程将会不同”[6]。但希特勒操之过急，他没有等到美国主动宣战。当晚，他来到帝国国会，在其长篇演说中，他列举了美国违反中立法规的种种罪状，并将其作为对美宣战的理由。他声称，罗斯福的政策意在使美国和英国共同建立对世界“彻底的统治和专制”，并不择手段地剥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生存的自然基础。[7]

事实上，除个人动机和好恶外，罗斯福还有其他目的：打垮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这一强国；剥夺意大利和日本的属地；终结法国、荷兰和

比利时的殖民帝国；按照布雷森莎湾会晤（1941 年 8 月 9 日）中他向丘吉尔提出的要求，接管英国控制的所有领地；建立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新秩序。他在珍珠港事件后表示，美国只能接受最终的、彻底的胜利以及不仅仅是日本还包括德国和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他下达的命令是，不应以解放为目的进入德国，而应将其作为战败国加以占领。[8]在美英空军轰炸德国工厂和城市的同时，罗斯福打着德国应无条件投降的旗号，让苏联去对付希特勒军队。[9]尽管斯大林一再呼吁，但欧洲大陆的第二战场迟迟没有开辟。[10]

苏联虽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但至 1941 年 10 月，它的抵抗行动阻止了纳粹对莫斯科的占领[11]，并在 1942 年 7—12 月间阻止了德国军队的前进步伐，使其既未能推进到高加索，侵占巴库的石油，也未能占领列宁格勒。1943 年 1 月，红军通过“天王星行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一举歼灭 1942 年 11 月以来一直遭围困的德国第六集团军、第四装甲军以及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和意大利军团，并转入反攻，向德国方向推进。[12]美英的战略是以牺牲苏联为代价，尽可能削弱德国的实力。德国国防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才于 1943 年 7 月 9—10 日在西西里岛登陆。那也仅仅是一次规模有限的行动，斯大林并不满意。[13]一年后，在 1944 年 6 月 6 日这一决定性日子，美英军队才登陆法国海岸的诺曼底，在西部开辟第二战场。当时，苏联红军已进入罗马尼亚境内，朝德国方向推进，并接连摧毁德国国防军。

希特勒指望德国抵抗到只剩最后一名士兵，但战争已接近尾声。自 1943 年起，包括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在内的许多军官和文职人员[14]十分担心苏联红军向柏林推进，导致共产主义在中欧取得胜利[15]，他们开始认真地考虑囚禁或暗杀希特勒。一些人试图向美英提议停火，但继续与苏联作战。[16]与路德维·贝克（Ludwig Beck）将军和莱比锡前市长卡尔·戈德尔（Carl Friedrich Goerdeler）相反，那些更保守者如海宁·特莱斯科夫（Henning von Tresckow）将军、克劳斯·斯托芬博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上校和法比安·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律师与社会党人尤里乌斯·雷伯（Julius Leber）联合，试图按照弗里茨·休伦博格（Fritz von der Schulemberg）伯爵的建议，建立一个更接近苏联的社会民主性质的政府。[17]这一在很大程度上由德国贵族出身的军官策划的谋反行动在诺曼底登陆（1944 年 7 月 6 日）后加紧了步伐。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了解这一情况。他在瑞士与德国负责情报工作的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Wil-

helm Canaris）的代表汉斯·克斯维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进行了接触。卡纳里斯自1938—1939年起就与汉斯·欧斯特（Hans Oster）、赫尔穆特·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汉斯·多纳伊（Hans Dohnanyi）和彼得·瓦尔登堡（Peter von Wartenburg）等多名部下一起与反对希特勒的国家结成了同盟。

1943年4月，卡纳里斯通过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弗兰茨·巴本（Franz von Papen）和库特·莱斯纳（Kurt von Lesner）与宾夕法尼亚前州长、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兼罗斯福私人代表乔治·厄尔（George H. Earle）建立了联系，并向他通报说，德国军队高层已意识到希特勒在把国家引向毁灭，提议让国防军体面投降。罗斯福接到了报告但却未予答复。两三个月后，卡纳里斯在与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Stoewart Menzies）和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威廉·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的会晤中，要求在希特勒下台后停止在西面的战争，以便德国能继续与苏联作战，避免红军占领中欧。[18]这一提议得到贝克将军的支持[19]，但盟国同样也未做出回应。一年后，也就是1944年7月初，杜勒斯在接到克斯维乌斯通报后对罗斯福说，“今后几周是我们向德国人表明让他们自己去实现让德国摆脱希特勒的机会”[20]。20日，斯托芬博格上校实施了“华尔基利暗杀计划”，在希特勒前往开会的东普鲁士的拉斯登堡司令部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暗杀计划未能成功，斯托芬博格上校和其他同谋的高级军官为了掩盖自己参与暗杀事件，下令柏林司令部迅速将他们处决。贝克将军被迫自杀，隆美尔元帅也于1944年10月14日遭遇同样下场，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于1945年4月9日美军抵达前不久在福洛森堡集中营被绞死。

暗杀行动的失败使罗斯福避免了一个难题，他不想接受一个后希特勒政府可能向西方盟国提出的任何和平协定，并始终将德国视为美国的最大威胁。[21]但是，一方面，他很难说服丘吉尔去拒绝一个能拯救成千上万生灵并能阻止苏联向中欧推进的协议。另一方面，如果拒绝投降提议，摆脱希特勒的德国可能与苏联结盟来对付美英两国。罗斯福的想法是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以便能如愿将其分割为3个或更多不拥有军工设施或任何军事活动的国家。与希特勒一样，他也以极其野蛮和残酷的方式引导着战争，使用空中恐怖主义手段，猛烈轰炸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军事目标，还包括众多城市。他们使用燃烧弹制造恐慌，以摧垮民众士气。[22]在1940—1945年的5年时间中，英美两国在德国投下了成千上万颗炸弹，使德国70%～80%的城市遭到破坏，3 000万人遭殃，42万～57万平民、妇女和儿童丧生[23]，他们中大部分人被大火烧焦或窒息而死。对科隆的一次轰

炸就摧毁了 10%～12%的房屋[24]。1944 年 5 月对该市的袭击，造成 25 000 人无家可归，664 人死亡，其中 411 人为妇女和儿童。1945 年 1—5 月间，当盟军胜利在望并已挺进德国之时，轰炸更加猛烈。1945 年 2 月，对普福尔茨海姆的轰炸使该市 1/3 的民众丧生，死亡率高于原子弹对长崎的轰炸，长崎的死亡率为 1/7。2 月 21 日，在对拥有 5.8 万人口的沃尔姆斯市的袭击中，6 490 座房屋遭到破坏，35 000 人流离失所，239 人死于非命。[25]一个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犹太人墓地在德国投降后仍然遭到毁灭。

距战争结束尚有相当时日，美国就与英国达成了默契，着手建立以它为主导的战后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1944 年 7 月 1—22 日，在布雷顿森林（新罕布什尔州）举行了联合国货币和金融会议，目的是重建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避免 1914—1918 年战争后所犯的错误，那些错误包括强加给德国的远远超出其支付能力的高额战争赔偿，从而引发了 19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这使盟国自身受到损害，并促使德国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新的经济和金融秩序自然反映了美国自 1914—1918 年战争后一直试图实施的政策：多边贸易、商品和投资的自由流通以及货币的可兑换性和自由汇率。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诞生了确立自由贸易的“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规定，签署国必须与其他任何国家保持自由贸易，把最惠国条款延伸到所有其他国家。同时还建立了保证国际货币体系运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主要功能是向那些存在国际收支逆差和储备不足的成员国提供金融和技术援助。“关贸总协定”的关注点是货币的可兑换性和稳定性，它规定每个成员国必须用被确定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和英镑保持国际储备，并使汇率固定“票面价值”在 1%范围内浮动。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点并非它决定哪些国家应得到帮助，而是它的有条件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接受帮助的国家必须满足在减少公共赤字、通胀和实现工资增长等方面的特定目标。这一原则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内政十足的干涉权。它的要求通常都十分严厉，各国必须执行“良好政策”。以“世界银行”著称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的，其主要目标是支持成员国的重建和发展，使遭受战争毁灭或破坏的经济得以恢复；通过提供担保或参与贷款，促进外国私人投资；促进国际贸易均衡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但这两个机构的总部均设在华盛顿的事实，使得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能对它们的决定施加关键性影响，以便符合美国利益及其国际政策目标。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教授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为“美国财政部一只不受国会监督的隐蔽手臂，因为形式上它是一个国际组织”。他指出：“其投票规则保证了美国及其盟友对它的控制。”[26]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避免类似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萧条，并通过自由贸易促进富裕。德国战败后，罗斯福和丘吉尔着手构建一个由积极寻求消除战争因素的战胜国组成的卡特尔领导下的政治新秩序。[27]美国和英国正变得默契，但它们显然不能忽视苏联在打垮德国国防军并占领东欧后所形成的新现实。罗斯福重拾国际联盟的方案，构思了一个由“四个警察”即美国、英国、苏联和尚处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指挥的国际组织。根据1944年7月14日美国国务院致巴西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这几个集中一切执行权的大国将担负起维护和平的责任。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这些国家的代表即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苏联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ery Gromyko）、英国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在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胶园会晤，拟订了《联合国宪章》草案，同意建立一个安理会、一个大会、一个秘书处和一个国际司法法庭。但他们既没有就大会和安理会的权力分配、安理会成员国数量及其特殊权力，也没有就否决权问题达成协议。[28]

该方案到1945年2月才最终成型。在布雷顿森林会议6个月后，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组成的“三巨头”，在刚刚从纳粹侵略者占领下获得解放的克里米亚海滨城市雅尔塔举行会议。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的孤立状况，因而试图让它的两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安理会成员。[29]美国表示反对，理由是它们并非主权国家。但罗斯福也未能使参战并出兵参与占领意大利的巴西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30]他听从了下属的建议未再坚持。苏联意识到巴西是美国忠实的附庸[31]，因而反对该提议[32]，英国也不同意巴西加入[33]。联合国安理会最终由5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成员组成。除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外，在美国最终承认了流亡伦敦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政府后，法国也跻身五大常任理事国行列。“三巨头”在那次会议上决定了“世界的分割”[34]。欧洲被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苏联红军控制的国家，另一部分为与美英所代表的西方结成某种同盟的国家。[35]罗斯福恳求苏联从德国带走“任何可能的人力和工厂设备”[36]。他认为，德国应支付战争赔偿，但不能承担战争的一切责任，以免给盟国带来麻烦。斯大林则希望在10年内得到100亿美元。[37]

罗斯福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纳粹政权被埋葬在柏林和被美英轰炸几乎完全摧毁的德国城市废墟下，他于1945年4月12日死于脑溢血。4月25日，其继任者哈里·杜鲁门总统召集50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旧金山会议，与会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4月30日15时30分，希特勒自杀。[38]

次日，两名红军士兵把苏联旗帜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柏林被苏联占领，抵抗进入尾声。5月8日，纳粹德国宣布投降。对纳粹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苏联红军。但红军士兵的行为并不像解放者。1945—1946年间，他们在德国东部抢劫、掠夺和强奸了数十万妇女，被强奸者人数或许超过200万。她们中既有难民，也有城镇居民。[39]在苏联红军占领的头几年中，强奸成为德国东部社会历史的一部分。[40]苏联没有考虑到德国无产阶级也饱受战争严重后果带来的苦难，它表现出极大的民族自私自利，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更疯狂地掠夺德国。因为首先进入柏林，苏联红军迅速实施了彻底的抢劫。两个月后，当美英军队到达时，红军已将城市工厂中至少50%的重型机器搬走。[41]德国通用电气公司98%的机器遭拆卸，使得这一拥有8 500名工人的工厂陷入瘫痪。戴姆勒——奔驰飞机发动机工厂莱因金属——波斯格的约400台机器、雷达设备、打字机和电话机等也均未能幸免。[42]在短短2个月内，也就是1945年5—6月间，柏林约460家企业被拆迁到苏联。[43]在7月17日至8月1日举行的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以铲除德国战争潜能和新的战争危险为借口，向丘吉尔和杜鲁门总统提议彻底瓦解德国工业，即使在某种情况下，这一政策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并给经济带来问题。[44]他希望控制鲁尔，其讲话的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特别是来自美英占区的赔偿。[45]

如果说欧洲由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已出现了麻烦，那么，担心斯大林向亚洲挺进，进而向苏联刚刚与之宣战的日本提出赔偿要求，很可能是促使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后不久即下令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原因。[46]这使得美国空中恐怖主义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从26万增至59.8万。广岛和长崎分别有14万人和7.4万人当场丧生，12万人之后死于核辐射。[47]一直将原子弹当作战争武器的杜鲁门辩解说，按照马歇尔将军的估计，入侵日本并通过在其境内开展战役迫使其投降，将使美国付出50万人的生命代价。[48]然而，一切迹象表明，除了在实战中试验这一可怕武器的需要[49]，杜鲁门的意图是迫使日本裕仁天皇投降，尽快结束战争，以便只有美国才能在战后向日本强加自己的意愿，而将其他盟国排除在外。[50]杜鲁门通过这一行动开启了“核威胁外交”时代。[51]他试图震慑苏联，以便美国以强势地位与之谈判[52]，他无意与苏联和解。对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不仅标志着二战的结束，也意味着东西方对抗的开始。[53]

【注解】

[1] Aron, 1973, 29.

[2] Vidal, 2002, p. 89.

[3] 在同一时间（华盛顿时间 9 时 30 分），德国临时代办汉斯·汤姆森（Hans Thomsen）向国务院欧洲司司长雷·阿瑟顿（Ray Atherton）递交了战争宣言的复印件。原件已在柏林交给利兰·莫里斯。

[4] German Declaration of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11, 1941—*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December 13, 194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1. 罗斯福政府对《中立法》的违反远不止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签署的《德国战争宣言》提到的。其最主要的违反行动有：(1) 1940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4 日，当 35 万名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后，美国立即向英国运送了大量军事物资；(2) 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格陵兰岛、拉布拉多、纽芬兰和冰岛等地建立军事基地；(3) 在英国与德国和意大利处于交战状态期间，向英国提供了 50 艘旧驱逐舰；(4) 罗斯福通过一个电视节目声称，“没有独裁者和独裁团伙会削弱我帮助英国的决心”；(5) 于 1941 年 3 月 11 日颁布《租借法案》，并在战争期间对其进行单方面延伸，以便帮助英国、苏联、中国、希腊、荷兰、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6) 作为对德国袭击向欧洲运送武器船只的报复，关闭了德国和意大利领事馆，并冻结了它们在美国的金融资产；(7) 罗斯福于 1941 年公开宣称，美国占领冰岛是为了防止德国人可能抢先采取行动；(8) 1941 年 7 月，宣布美国将保证通往冰岛和其他所有前沿阵地航道的畅通，这意味着美国向大西洋的德国潜艇开战；(9) 1941 年 9 月 11 日，罗斯福公开宣称美国军舰和战机将攻击进入美国要害区域的“轴心国”舰只。

[5] Apud Maser, 1981, p. 319.

[6] “*Ohne die Juden und ihren Repräsentaten hätte di Geschichte einen anderen Verlauf genommen*”. Id., ibid., pp. 319–320.

[7] Rede vor dem Großdeutschen Reichstag (Adolf Hitler) 11. Dezember 1941. *Der großdeutsche Freiheitskampf* (1943—Der großdeutsche Freiheitskampf. 3. Bd.: Reden Adolf Hitlers vom 16. März 1941 bis 15. März 1942. Zentralverlag der NSDAP., Franz Eher Nachf. /München: 1943. Band Ⅲ-p. 113.

[8] Beschloss, 2002, p. 169.

[9] Id., ibid., p. 287.

[10] Autorenkollektiv, 1985, pp. 374–376. Churchill, 1995, pp. 548–549, 659, 709–710.

[11] “[……] 尽管莫斯科三面被围并遭受空中轰炸，但到了十月底，苏联的抵抗显然加强，德军推进明显受阻。” Churchill, 1985, p. 557.

[12] 1942 年 8 月至 1943 年 2 月间，德军死伤、失踪和被俘人数约为 150 万，相当于入侵苏联总兵力的 1/4。1942 年 11 月 19 日至 1943 年 2 月 2 日，德军又损失了 80 万兵力。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 29 万“轴心国”士兵（包括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意大利士兵）中，只有 9.1 万名被俘人员保住了性命。被俘人员中有 2 500 名军官、24 名将军，其中包括阿图尔·施密特（Arthur Schmidt）将军和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von Paulus）元帅。Autorenkollektiv, 1985, pp. 257–259. Beevor, 1999, pp. 281, 396.

[13] Churchill, 1985, p. 781. Autorenkollektiven, 1985, pp. 263–265.

[14] 密谋者大部分来自普鲁士的旧贵族。

[15] Beschloss, 2002, p. 5. Shirer, 1992, pp. 1340-1341.

[16] Id., ibid., pp. 1340-1341. Beschloss, 2002, pp. 35-36.

[17] Id., ibid., p. 36. Fest, 1974, p. 702. Gisevius, 1947, pp. 482-483, 487-488.

[18] Wedemeyer, 1958.

[19] Id., ibid., pp. 415-418.

[20] Beschloss, 2002, p. 5.

[21] Gaddis, 1997, p. 87.

[22] Friedrich, 2002, pp. 66, 86-88, 93-97. 根据另一些估计，平民死亡人数达60万，其中包括8万名儿童。Frey, 2004, pp. 92-94.

[23] Friedrich, 2002, pp. 63-64.

[24] Id., ibid., p. 437.

[25] Id., ibid., p. 277.

[26] Johnson, 2001, p. 210.

[27] Gaddis, 1997, p. 36.

[28] Sobre o tema, Vide Gromyko, 1989, p. 120.

[29] Gowan, Peter. US: UN. *New Left Review*, Second Series, November-December 2003, p. 10.

[30] 苏联的反对可能是由于巴西与美国持相同立场，这样，美国就可能在安理会中多得一票。

[31] Gowan, Peter. US: UN. *New Left Review*, Second Series, November-December 2003, pp. 14-15.

[32] R & A Report 4314, "Analysis of Policies Followed by the Other American Republics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pt. 15, 1947, RG 59, National Archives; R & A Report 7433, "Brazil-Recent Development and Probable Trends", Feb. 20, 1957, RG 59, National Archives. Apud Haine, 1987, p. 34. Vide Carvalho, 1959, p. 396; Garcia, 2000, p. 120.

[33] Stettinius, 1975, pp. 111-114.

[34] Aron, 1973, p. 45.

[35] Smyser, 1999, p. 17.

[36] Beschloss, 2002, p. 184.

[37] Stettinius, 1949, pp. 166-167.

[38] 关于希特勒最后的日子，参阅 Trevor-Roper, 1992, pp. 226-240, 279-281; Read & Fisher, 1995, pp. 452-453。

[39] 强奸行为一直持续到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Naimark, 1987, pp. 79-80, 85-89, 114-129, 133-140.

[40] Id., ibid., pp. 106-107.

[41] *Jornal do Commercio*, Rio de Janeiro, 16-17/7/1945, p. 1. Moniz Bandeira, 2001.

[42] Id., ibid., p. 1.

[43] Dennis, 1988, p. 128. Moniz Bandeira, 2001, pp. 75-76.

[44] *Jornal do Commercio*, Rio de Janeiro, 16-17/7/1945, p. 1.

[45] Smyser, 1999, pp. 21-23.

[46] 据杜鲁门透露，研制原子弹的想法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向罗斯福提议的。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始于 1939 年。Truman, vol. 1, 1955, pp. 419-420.

[47] Frey, 2004, pp. 94, 101-103.

[48] Truman, vol. 1, 1955, p. 417.

[49] 通过曼哈顿计划研制的原子弹在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的监督下于 1945 年 7 月 16 日首次在美国的沙漠中引爆。试验结果超出预期，产生了相当于 15 000～20 000 吨级 TNT 的当量。

[50] Beschloss, 2002, p. 258.

[51] Aron, 1973, pp. 53-54.

[52] Id., ibid., pp. 53-54. Gaddis, 1997, p. 88. Ambrose, 1985, p. 49.

[53] Moniz Bandeira, vol. Ⅱ, 1998, p. 247. Aron, 1973, p. 53.

第八章

摩根索肢解德国计划　杜鲁门的退缩　斯大林的政策和西方的理解　丘吉尔与冷战爆发　从巴尔干延伸到里雅斯特和亚得里亚海的“铁幕”　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　苏联对德国的掠夺　马歇尔计划及其真实意图

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计划的实质是肢解德国，破坏其重工业，使其成为一个农牧业占主导的国家，并使鲁尔和周边地区国际化。[1]东普鲁士将由苏联和波兰瓜分，萨尔和邻近地区划归法国。[2]他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表示，德国部分人口将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北非落户。[3]美国军方决意采取这一行动[4]，企业家们的愿望更为强烈，他们不想在世界市场面对一个强劲对手。[5]罗斯福起初同意这一提议，他也希望把德国分割为3个或更多没有“任何军事活动”和“兵器工业”而仅仅通过服务体系相连的主权国家。他在魁北克会议（1943年）期间与丘吉尔敲定了那些措施，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他对国务卿康德尔·赫尔说，尽管无法想象英国的金融崩溃，但德国一旦重新武装，就能在20年后引发一场新的战争。但他反对“彻底铲除”鲁尔和萨尔的工业。1944年，他对作战部长亨利·斯廷森说：“关于保留以农牧为主导的德国，完全是一派胡言。我未批准过任何这类东西，我肯定没有这样做过。”斯廷森则出示了他与丘吉尔谈话的备忘录复印件，该文件中有他写的“O. K. F. D. R.”[6]。事实上，美国舆论强烈反对该政策，认为如果消灭德国这一强国，会导致中欧的“可怕真空”，共产主义必将在那里横行。[7]

罗斯福与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会议（1943年11月）期间，曾考虑把德国分割为5个自治国家：（1）普鲁士（缩小的）；（2）汉诺威及其西北；（3）萨克森和莱比锡地区；（4）黑森-达木斯特、黑森-卡塞尔和莱茵河南边区域；（5）巴伐利亚、巴登和巴登-符腾堡地区。[8]苏联

占据欧洲“真空”的可能使罗斯福感到犹豫并从摩根索计划中后退。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前对该计划进行了重新评估后未批准其实施。摩根索被迫辞去财长一职。[9]杜鲁门明白，“这一计划将扼杀德国”[10]，那将是一种“报复行为”。除非让德国恢复工业并重新获得失去的部分市场，否则，它无力以现金或实物支付战争赔偿。没有德国的钢和煤，要使西欧复兴，尽管不是不可能，但将会十分困难。因此，杜鲁门不想犯与1918年同样的错误。当时，盟国要求德国支付现金，但后来又不得不长期向其提供贷款，以便它有条件履行义务。杜鲁门清楚地将这一点告诉了要求得到200亿美元赔偿的斯大林。[11]英国支持他的观点，也认为德国工业的破坏将使其完全丧失支付赔偿的可能。这些经济原因与美英的政治和战略考虑交织在一起，使得罗斯福和丘吉尔最终承认了苏联扩展其边界的权利，明确表示不反对苏联在邻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建立“友好”政府，这意味着他们同意苏联把统治区域延伸至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12]，但必须阻止其影响向西欧扩展。假如德国被完全搞垮，那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

事实上，斯大林无意利用1939—1945年战争所创造的条件，去鼓励、支持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或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和丹麦等其他西欧国家的发展。要是符合苏联利益的话，那里的共产党人本来能够采取完全夺取政权的行动。他也反对希腊革命。只是因为约瑟普·铁托（Josip Broz Tito）不愿从命，才未能避免南斯拉夫革命。铁托在南斯拉夫领导了抵抗纳粹占领军的游击战争。[13]斯大林担心西方革命的成功会削弱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他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当作其对外政策和实现苏联国家利益的工具，其对外政策与布尔什维克革命起初的战斗精神大相径庭。接替托洛茨基担任对外关系委员的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i Chicherin）1920年宣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时间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资本主义制度客观存在，因此，就应该找到一个“权宜之计”。[14]从那个时期起，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破灭，苏联开始寻找一个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的“权宜之计”。因为担心卷入一场给自己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它于1930年参与了欧洲集体安全体系。1939年，它甚至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以《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著称的《互不侵犯条约》。在希特勒撕毁条约下令入侵其领土后，斯大林为了向西方同盟国表明其无意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于1943年5月解散了共产国际。他在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范畴内，以“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名义，领导了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

这一“伟大的卫国战争”尽管给苏联造成了大量物资损失，并使其付出了2 000万人的生命代价，但却缓解了其经济落后所导致的某些困难。苏联经济落后既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亦因为它所采取的孤立政策使其既无法走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1919年间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原则之路，也难以按资本主义原则执政，通过对落后国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正常资金信贷，利用世界经济资源。[15]但希特勒军队对苏联领土的入侵及其所犯下的暴行，特别是对平民尤其是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系统性灭绝，不仅促使苏联人民捍卫斯大林主义[16]，而且使苏联能够在赢得战争胜利后成为政治和军事强国，并将东欧国家纳入其经济空间。[17]斯大林利用这一胜利来巩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以救世主和一贯正确的领袖、“全世界人民的天才引路人”、“照亮全人类的太阳”自居。他所推行的外交既不道德，也从政治上背离革命原则[18]，而是“现实政策”。他以捍卫和发展“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必将推动世界无产阶级事业为由，始终将苏联的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任何革命观点之上。苏联曾向美国分两次申请贷款60亿和10亿美元。[19]对与美英发生冲突的担忧促使“政治理由”打造的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变得极具防御性。他确实有意履行雅尔塔会议（1945年）期间对罗斯福和丘吉尔所作的承诺。即使在那些依靠苏联红军支持进行农业改革并铲除了大工业垄断的东欧国家，纳粹灭亡后，斯大林也未试图建立苏联体系，而是建立经济多元（公共和私有企业）、政党组织自由和选举自由的所谓“人民民主”[20]，尽管事实上共产党在那些对苏联有好感或对其俯首听命的政府中或明或暗地行使着主导作用。

斯大林由地缘政治利益所决定的意图，并非要推广社会主义，而是要巩固对巴尔干、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控制，使它们的经济符合苏联资本积累的需求，并通过重新确定1939年《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所征服的边界和战略位置，建立一个防御和安全体系。按照其在1940年希特勒提出签订四国条约（德、意、日、苏）时所采取的做法，斯大林也在波茨坦会议中向杜鲁门和丘吉尔提出苏联和土耳其共同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要求，这是沙俄的夙愿。他还要求参与分配意大利在非洲拥有的殖民地。[21]尽管斯大林声称无意分割或消灭德国，但他的确有意瓦解德国的工业大国地位，利用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壮大苏联，并逐步将其控制权向西欧推进。鉴于这一原因，即便德国有可能处于社会主义庇护之下，他也不愿让其恢复工业强国的地位。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斯大林把马克思国际主义和沙皇帝国主义融合在一起，试图将苏联国家影响力的扩

张与世界革命的前进纳入同步轨道。[22]俄国历史学家德米特里·伏尔科戈诺夫（Dmitri Volkogonov）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观点是基于国际共产主义和苏联作为大国“地位”这一对“孪生支柱”的。[23]斯大林的目的是利用打败德国的机会，确立苏联作为强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斯大林格勒这一史诗般的战役（1942年8月—1943年2月）决定了苏联的胜利。那场战役使100万人付出了生命代价，红军消灭了德国国防军第六集团军，俘虏了包括22名将军在内的约9万名德军士兵。[24]但是，主导一部分欧洲的苏联作为军事强国的简单崛起，给国际权力体系带来了深刻和难以调和的矛盾，其基于国家所有、计划经济和官僚集体主义，以及一党执政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实行的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化、自由经营、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体制相对立。在抵抗纳粹军队侵略斗争中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在南斯拉夫、波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部分地区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和丹麦政府中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在法国，他们赢得了500万张选票，在意大利获得了20%选民的支持。最使美英两国感到恐慌的是斯大林对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和伊朗石油所表现出的地缘政治企图。

在这一形势下，从来不掩饰对苏联仇视的丘吉尔在1946年3月5日的演说中采取了引发“冷战”的行动。他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道跨越整个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他要求美国和英国这两个讲英语国家的人民在联合国之外联合起来，以原子弹为工具，迫使红军从包括伊朗和土耳其在内的所有国家后退并打破“铁幕”。[25]

成为资本主义权力体系中唯一一极的美国，试图推动资本和商品的完全自由流通及货币的自由兑换，以此作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支柱。美国的保守派也担心共产主义可能会席卷整个欧洲，他们不会允许苏联占据德国崩溃后在中欧形成的“真空”。美国战略情报局开始积极保护和招募包括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和阿洛伊斯·布伦纳（Alois Brunner）在内的前德国国防军高级军官以及“盖世太保”、“党卫军”和阿勃维尔（德国情报机构）人员，以扩充打击共产党的间谍网。[26]

杜鲁门清楚，美国拥有原子弹的事实作为恫吓工具不会有太大效果。美国一共只拥有12枚原子弹。[27]苏联红军拥有人数和武器上的绝对优势和强大军事机器，可以通过占领一直到伊比利亚半岛的整个西欧来弥补莫斯科和其他苏联城市被炸毁的损失，美国无法阻挡它的前进。此外，

杜鲁门承认，他“始终明白，现代史上没有一支西方军队能够征服俄国和中国”。他还表示，“试图通过武力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到那片广大地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愚蠢的行为”[28]。国务院规划小组组长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29]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美国采取任何针对苏联的政策，要点必须是长期和耐心，但又必须能坚定而有效地遏制俄国人的扩张倾向”[30]。但如果说通过军事手段“击退”苏联不足取[31]，那么，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意味着，在一系列与苏联政治变化相对应的多变地理和政治问题中，不断巧妙而敏锐地运用反作用力。这要求使用经济手段，而美国在这方面拥有明显优势，它是唯一能从资金上帮助西欧重建，以免其迟早落入苏联轨道的国家。

德国美占区司令卢西乌斯·克雷（Lucius D. Clay）将军单方面决定中止从德国西部转移资本货物作为苏联所要求的战争赔付。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James F. Byrnes）提议统一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包括含鲁尔（英占区）在内的德国工业最集中区域。虽然这一建议以德国国家统一为代价[32]，但其目的是推进德国的经济重建计划，使其能自给自足和发展出口，并获得必要资金，维持遏制苏联红军所必需的军队，这样就能减轻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得到英国支持的美国的最大功绩在于，它没有像苏联在德国东部所做的那样，肢解德国西部的工业，并通过赔偿实施掠夺，这使德国西部的生产力得以恢复。统一西部的方针意味着撕毁把整个德国认定为一个经济体的《波茨坦条约》（1945 年）。杜鲁门和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该条约中商定，将德国工业限制在 1936 年水平的 50%～55%，以战争赔偿名义，将所有剩余机器设备搬走。1947 年 1 月 11 日，美国和英国统一了各自军队在德国所占区域，形成“两国共管区”。后来，法国占领区也被并入。

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鲁门宣布，美国愿意从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方面支持“自由人民”，也就是任何受到叛乱、外来入侵或者外交压力（如土耳其）的反共政府（是民主或独裁并不重要）。他还推出了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名字命名的“欧洲重建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向欧洲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帝国，是历史上首个不提取利润，反而自愿为其统治地位付出，并且的确已付出的国家。[33]这纯属误解，美国人不会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或支付高额赋税在欧洲维持一支庞大军队，用来打消苏联入侵西欧的念头，并遏制杜鲁门眼中的任何想象或真实的共产主义扩张。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共和党获得了 1946 年 11 月国会选举的胜利。此前，它已开始向政府施压，要求削减公共开支，推动武装部队裁员。假如美国

能在欧洲经济重建中予以配合，那么，“遏制”主张将会更可行和有效，会让欧洲，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消除革命威胁，使“本大陆最大工业国家”德国[34]和其他国家不仅能够重建并维持武装力量，而且可以至少部分承担驻扎在其境内的美军的费用，这样就能减轻美国纳税人的高额经济负担。

事实上，“马歇尔计划”对德国重建的贡献并不大。在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政府任经济部长的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949—1969年）称，1945—1952年，美国以经济援助名义向西欧国家提供的320亿美元中，联邦德国只得到45亿[35]，其中一半为无偿援助。国务院参与“马歇尔计划”制定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教授也承认，美国的援助虽然是必要的，但不足以推动西欧经济的恢复，而且，1946—1953年间，德国总共只得到36亿美元的援助。[36]虽然“马歇尔计划”没有公开歧视被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但斯大林将其视为敌对行为，尤其是因为1947年5月共产党人被排除在法国和意大利政府之外。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 Molotov）退出了在巴黎举行的外交部长理事会会议（1947年7月），他指责美国有意将欧洲分为两组国家。他警告说，从炮灰中重生的德国将最终统治西欧。[37]

【注解】

[1] Truman, vol. 1, 1955, pp. 235-236.
[2] Beschloss, 2002, pp. 115-117.
[3] Gromyko, 1989, p. 44.
[4] Id., ibid., p. 44.
[5] Beschloss, 2002, p. 148.
[6] Id., ibid., pp. 148-149.
[7] Wedemeyer, 1958, p. 95.
[8] Stettinius, 1949, pp. 40-41, 121-122.
[9] Truman, vol. 1, 1955, p. 327.
[10] Id., ibid., pp. 235-236.
[11] Truman, vol. 2, 1956, p. 111.
[12] Gaddis, 1997, p. 16.
[13] Bartlett, 1984, p. 143. Abendroth, 1977, p. 119.
[14] Apud Kissinger, 1994, p. 260. Gorodetsky, 1999, p. 2.
[15] Trotsky, 1936, p. 11.
[16] Beevor, 1999, p. 402.

[17] Kagarlitsky, 1993, p. 36.

[18] Gorodetsky, 1999, pp. 4-9.

[19] Ambrose, 1988, p. 6.

[20] Id., ibid., p. 57.

[21] Id., ibid., pp. 68-69.

[22] Gaddis, 1997, p. 29.

[23] Volkogonov, 1999, p. 138.

[24] Beevor, 1999, pp. 396-399.

[25] Ambrose, 1988, pp. 74-75.

[26] Trento, 2001, pp. 22-31.

[27] 1945 年年底，约 20 个苏联城市被确定为核打击目标。但直到 1947 年年中，美国拥有的原子弹数量不超过 12 枚。Bartlett, 1984, p. 270.

[28] Truman, vol. 2, 1956, p. 91.

[29] 乔治·凯南基于“威慑”理论提出了“遏制”一词，遏制的目的是使两个拥有各自势力范围的超级大国保持永久对抗。由于面临一场难以取胜的核战争威胁，双方都希望维持和平。

[30] X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 (July 1947), pp. 566-582.

[31] 当时，美国陆军从 800 万裁减为 100 万，海军从 350 万减至不足 100 万，空军从 200 个战斗群减为不足 50 个。Ambrose, 1988, pp. 79-80.

[32] 关于两个德国（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建立，参阅 Moniz Bandeira, 2001, pp. 73-85。

[33] Toynbee, 1962, p. 34.

[34] Kindleberger, 1987, pp. 13-23.

[35] Erhard, 1988, p. 848.

[36] Kindleberger, 1987, pp. 196 , 246.

[37] Ambrose, 1988, pp. 91-92.

第九章

美国争夺英法殖民帝国　印度摆脱殖民统治和巴勒斯坦的分裂　犹太复国主义暴动和以色列的建立　共产党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和“隐蔽行动”　超帝国主义和北约　中国革命胜利和朝鲜战争　华盛顿的恐慌　冷战和反共狂想症

战后的紧张局势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美国打垮了世界贸易中的主要对手德国，建立了世界军事霸权，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彰显了这一地位。它进而着手瓦解英法两国所维持的殖民帝国。美国从未掩饰这一意图，在《大西洋宪章》强调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所希望的政府形式的同时，罗斯福要求加入“希望看到那些被‘强行剥夺’主权和自决权的人民恢复其权利”的字句，在之后的一个段落中又强调，所有国家，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均应能“在同等条件下享受贸易权，并从世界各地获得其经济繁荣所需的原材料”[1]。美国所施加的压力始终以瓦解英国的关税体系为目标，迫使它同意在全世界“开放门户”后与美国竞争。这样，美国就能主宰世界经济。二战期间，美国在没有贸易竞争对手而自身市场又受到高度保护的情况下，获得了巨额利润，变得更加富裕。美国人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以贯之。一方面他们强烈反对英国的“帝国关税特惠制”，另一方面则肆无忌惮地捍卫自己的高额关税壁垒，其所作所为就是想把英国挤出其传统市场。[2]

1944—1947 年间，英美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并不仅仅是因为印度的去殖民地化，更主要的是围绕巴勒斯坦所产生的矛盾。两国间自《大西洋宪章》所建立的同盟关系产生了动摇。在镇压海法地区爆发的由穆夫提·侯赛尼（Mufti Hajj Amin al-Husseini）所领导的阿拉伯人起义（1936—1937 年）后，拥有 1922 年国际联盟赋予的“巴勒斯坦托管权”的英国意

识到，不能以损害阿拉伯人的利益来施惠犹太人，中东和平和安全取决于阿拉伯人，他们不能失去和阿拉伯人的友谊。英国人已为之经营多年并投入大量英镑，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保证途经苏伊士运河的帝国运输线的安全。这些考虑促使英国通过了一份白皮书（或称《麦克唐纳白皮书》[3]），确定从1939年起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该白皮书指出，《贝尔福宣告》对建立“民族家园”做出了承诺，但并非要将其变成一个犹太国家。白皮书不仅将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数限制在75 000人以内，而且还限制他们在该地区购买土地的权利。[4]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放宽限制，特别是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集中营遭受迫害之后，这一压力愈加强烈，但这一政策一直维持至1947年。更大的压力来自美国，在纽约举行了犹太执行机构会议（1942年5月）后，犹太复国组织积极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该会议提出了《比尔特摩纲领》，支持通过向巴勒斯坦无限制移民建立犹太国家，“作为融入新的世界民主体系的犹太联邦”。

罗斯福对犹太复国主义颇有好感。[5]他曾这样表示：“……它（巴勒斯坦托管权）有意使巴勒斯坦变成犹太家园，并很可能在相对较短时间内成为犹太人占多数的地方……”[6]他对身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施加的压力十分敏感。面对1944年总统选举前景，他承诺将把公道还给“那些寻找犹太民族家园的人们”。“我们政府和美国人民对他们永远怀有深深的好感……”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与总统选举紧密相连。杜鲁门在接替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后保持了同样政策。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1945—1951年）外长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虽同意从印度撤出，但希望保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影响，反对建立犹太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于是就系统地发动了一波恐怖行动，在巴勒斯坦许多城市袭击英国军队和警察、铁路、公共汽车、桥梁以及海法的炼油厂等各种目标。[7]1946年7月22日，经宾·古龙（Ben Gurion）批准，他们在巴勒斯坦政府秘书处和英国军队司令部所在的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引爆炸弹，炸死92人，炸伤58人。[8]7月30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埃策尔[9]在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n Begin）的领导下，发动了多起恐怖袭击，绞死英国士官默文·拜斯（Mervyn Paice）和克利福德·马丁（Clifford Martin），因为此前该组织两名成员被英国判处死刑。作为报复，英国军队袭击了帕尔德斯·哈纳犹太定居点，并侵入特拉维夫，捣毁商店并杀死5名犹太人。但恐怖袭击并未因此停息。1948年4月9日，埃策尔和另一组织（斯特恩）成员包围了迪尔亚辛镇，杀死254名

阿拉伯人，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另造成300多人受伤。

犹太复国主义暴动以及随之发生的恐怖袭击，使英国在1945—1947年间付出了1亿多英镑的代价，加剧了它的财政危机，并使舆论意识到，英军要想继续留在那里战斗困难重重，或者说已难以为继。杜鲁门的做法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只有美国政府才同情犹太难民。但同时他却拒绝准许更多犹太人进入美国，也不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供帮助。在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均不想成为英国国际专员署计划组建的联邦中的少数，该计划是在英美委员会提议基础上制定的。[10]此时（1946年年底），巴勒斯坦总人口约180万，为1922年统计人数的3倍，这意味着增长了184%。穆斯林人口因为出生率高于死亡率增加了一倍稍多，犹太人则增加了7倍，从1922年的8.379万增至1946年的60.822 5万，这主要是由于欧洲，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反闪米特倾向上升。

按宗教划分的巴勒斯坦人口

年份	穆斯林	犹太人	基督徒	其他	合计
1922	486 177	83 790	71 464	7 617	649 048
1931	493 147	174 606	88 907	10 101	966 761①
1941	906 551	474 102	125 413	12 881	1 518 947
1946	1 076 783	608 225	145 063	15 488	1 845 559

资料来源：Nações Unidas。[11]

在1947年6月7日印度次大陆一分为二计划公布和当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后，海法港对英国失去了战略重要性。因此，艾德礼政府决定从巴勒斯坦撤出，让美国去应对中东政治现实。美国有意控制那里的石油等利益，石油已显得至关重要。[12]美国国务院中东专家不倾向于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他们认为，英国人在那里时，一直与阿拉伯人保持良好关系，美国应效仿其做法。[13]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危险在于，阿拉伯人有可能与苏联联合。但希望在1948年选举中得到犹太侨民选票的杜鲁门没有被外交专家们的理由所说服。这样，在不惜使用贿赂和讹诈等各种手段的犹太委员会负责人魏兹曼的强大压力下，由巴西大使奥斯瓦多·阿拉尼亚（Oswaldo Aranha）担任主席的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批准了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关于将巴勒斯坦分为阿拉伯和以色列两个独立国家的方案。[14]1948年5月15日，英国托管权到期。同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杜鲁门政府立即予以承认，尽管国务院不建议他采取这一做法。以埃及为首

① 本行第2至第5列数字之和为766 761，疑原书有误。——译者注

的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立即侵入以色列，一场时断时续的战争爆发了。

英国在联合国投了反对票。但苏联站到了美国一边，同意分割巴勒斯坦。虽然动机和利益不同，但美苏两国都仇视欧洲国家仍试图挽救的旧殖民主义，因此，它们竞相鼓励民族解放运动。美国企图非正式地取代英法等传统强国，建立“门户开放”体系，并极力遏制苏联在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影响。强调反帝斗争的共产国际革命思想在这些国家比起在西方工业国家更能为人们所接受。旧殖民体系开始在中东瓦解，作为法国属地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于1945年获得独立。第二年，美国保证了菲律宾的正式独立地位，1898年美国曾拒绝给予它这一地位。1947年，印度独立，其领土一分为二，另一半形成了巴基斯坦。次年，缅甸和锡兰（斯里兰卡）获得独立。荷属东印度独立后建立了印度尼西亚。英国人撤出巴勒斯坦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宣布建立以色列。从1954年起，民族解放斗争在阿尔及利亚和非洲其他地区掀起。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宣告了越南的独立。日本战败后，法国在英国和美国的相继支持下，一直期望恢复对越南的统治。

正是在这一国际背景下，斯大林试图重建共产国际。共产党情报局于1947年9月成立。尽管没有像共产国际那样形成一个由在不同国家开展活动的分部组成的世界性组织，但共产党情报局的目的是要将世界所有共产党统一在莫斯科的领导下，这些共产党作为游击支队活跃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15]当斯大林意识到难以避免中国革命运动在与蒋介石斗争中取得节节胜利时，转而大力支持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写给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6]（Palmiro Togliatti）的信中，斯大林对意大利共产党未能在占领军撤离后趁机在意大利夺取政权表示遗憾。[17]意共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意大利出现希腊那样因爆发内战而导致英国干涉的局面。此时，共产党不仅在匈牙利彻底击败了与之对立的民主派，而且通过政变全面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权（1948年2月）。同时，东欧国家拒绝了美国的任何经济援助。美国则启动了“隐蔽行动”，干涉其他国家，其范围并非只限于共产党国家，那些不符合或不愿执行美国的冷战战略方针的国家也难以幸免。“隐蔽行动”将由正在组建的中央情报局负责实施。[18]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克拉伦斯·布朗（Clarence J. Brown）在众议院向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V. Forrestal）表达了对这一机构作用的担忧。他说：

我对美国可能拥有优秀的陆军和海军对外情报机构颇感兴趣，但对

在美国设立任何隶属于总统的私人情报机构毫无兴趣。这只能让总统按自己的意愿拥有一个“盖世太保”。[19]

佐治亚州民主党议员亨德森·兰汉姆（Henderson L. Lanham）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1947 年 12 月，经杜鲁门批准，刚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了 NSC 4-A 文件，在和平时期推出了“隐蔽行动”，专属政府职能，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负责，在正处于形成中的二极权力体系中推广心理战。“隐蔽行动”的目的在于操纵各类政治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的感觉，以便在事件参与者未意识到受操纵的情况下达到结果，或在被怀疑的情况下，巧言否定真相。1948 年 6 月 18 日，发布的新指令 NSC 10/2 文件，除“隐蔽行动”和心理战外，扩大并确定了其他秘密行动，授权中央情报局进行宣传、经济战和直接预防性行动，包括破坏、清除、撤离措施、颠覆敌对国家、支持抵抗运动、游击战、“难民解放组织”① 以及对“受威胁的自由世界国家本土反共成员”的支持。[20]这样，在随后几年中，美国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和情报机器。“国家安全”成为其为防御和中央情报局秘密部队在国外进行“隐蔽行动”大量开支的借口，也成为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操控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为在美国国内找到“颠覆分子”从事各种非法行动的上方宝剑。

1940—1945 年，美国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多，从 810 亿美元增至 1 810 亿美元，1950 年达 2 419 亿美元。[21]它开始成为一个与苏联非常相似的专制国家。尽管美国在整个二战期间一直批评基于权力平衡和势力范围的国际政治观念，并宣扬以联合国集体安全为基础的新和平时期，但它的所作所为与苏联如出一辙。如果说苏联在东欧国家建立了所谓的“人民民主”，为避免人们挑战政权而不允许自由选举，那么，美国不仅把它的主导权延伸至西欧、日本和东南亚，而且还把拉美留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多数情况下，它借助军事独裁政府达到目的，因为自由选举也同样会导致反美势力执政。[22]罗斯福为使美国在道义上压倒苏联而努力推广的民主，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时代以来的民主没有什么两样，它以不尊重公共自由和个人权利而维持稳定的“好政府”概念为标识。[23]不干涉原则意味着美国放弃对拉美各国的军事干预，但保留通过“隐蔽行动”干涉其内部事务的权利。[24]

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加上了全球性的称谓。1947 年，美国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与西半球各国签订了以《里约热内卢条约》著称的《美洲国家互助条约》。杜鲁门和美国国会领袖自 1945 年年底起就预先批准了该条约所议定的内容。[25]通过这一把从北极直至巴塔戈尼亚的西半球区域界定为安全区的盟约，签字国承诺，处理对外关系时，在寻求联合国调停之前，不使用威胁和武力来解决相互间的争端。各国一致同意，任何国家对一个美洲国家的武装侵略，将被视为对所有其他国家的侵犯，它们将行使《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认可的个人和集体合法防卫固有权利，进行共同反击。通过建立集体防御的《美洲国家互助条约》，美国获得了在与苏联发生战争情况下把西半球国家组织起来的法律外壳，并于 1948 年 5 月 2 日在波哥大举行的第九届美洲国家会议期间，以美洲国家组织为名，着手泛美联盟的重建。当时，哥伦比亚正处于自由派领导人豪尔赫·盖坦（Jorge Eliécer Gaitán）被暗杀所引发的严重骚乱中。与国际联盟建立时的情况相同，拉美国家基本被排除在联合国管辖范围之外。

此时，德国局势重新变得紧张。在苏占区司令索科沃夫斯基（W. D. Sokolowski）将军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后，该机构于 1948 年实行了货币改革，在德国西部成为“三国共管区”的三个区中引入德国马克。同时，经美、英、法三国批准，西部三“州”政府领导人于 1948 年 9 月 1 日召集立宪大会，筹备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些因素促使苏联引发了柏林危机。苏联对处于苏占区的这座城市实施了全面封锁。其理由是，当西方各国试图建立一个分裂国家时，已抛弃德国重新统一的想法，破坏了雅尔塔和波茨坦签署的条约。这样，它们就不应该再在那里维持占领区。[26]苏联的行动促使美国加速参与布鲁塞尔的军事同盟。1949 年 4 月 4 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尽管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1945 年 2 月）上向斯大林表示不会在欧洲长期驻扎军队，说“期限应该会是两年”，但美国军队依旧留在那里。[27]

美、英、法参与的北约是西方大国和其他一些小国所建立的军事卡特尔，成员国做出了互不侵犯的承诺，并确定了安全领域的合作以及在遭第三国侵略时的互助。这意味着实施集体化防御。防御不再是各国本国的事情，而是联盟的利益。在德国瓦解后，资本主义已按考茨基的设想发展为超帝国主义，美国成为霸主并建立了一个联盟体系，该体系内的盟约有条件维持并得到履行。美国能够按照自身的短期和长远利益支配其他国家的意愿。列宁所想象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它们有可能发生在体系边缘，如在朝鲜爆发战争或资本主义国家直接与苏联和中国发生战争。战争的可能性确实已近在眼前，特别是柏林在被封锁长

达一年的时间中。然而，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一些政治人士认为，不值得为柏林发动一场世界战争。美英尽管无意让步，但它们还是选择建立一条空中走廊来保障对西柏林的物资供应。同时，它们对整个德国东部实行了反封锁。苏联别无选择，只能于 1949 年 5 月 12 日下令中止封锁。5 月 23 日，《基本法》颁布后，联邦德国宣告成立。作为反击，10 月 7 日，在苏占区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同一时期，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武装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根据苏联间谍提供的情报，杜鲁门认真考虑过使用核武器阻止中国共产党可能的胜利。[28]斯大林确信五角大楼也已筹划了用原子弹攻击莫斯科的计划，因此，他避免与美英发生直接对抗，没有接受前同盟国的挑衅。尽管苏联于 1949 年 8 月实施了首次核爆炸，但核武器即使能打到美国，办法也不是很多。因为这个原因并考虑到其他因素，斯大林对 1950 年 6 月朝鲜军队入侵韩国反应谨慎。[29]在得到与美国发生战争风险很小的承诺后，他才同意金日成开战。[30]世界革命的目标早已从共产党议事日程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为和平而奋斗的口号。共产党情报局报纸的标题是：“为持久和平而奋斗！为人民民主而奋斗!”在巴西，巴共一方面采取左倾路线，寻求建立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全国解放民主阵线；另一方面，通过发表 1950 年的“八月宣言”[31]，开始创建诸如“禁止核武器全国运动”和“巴西争取和平大会”等组织，还征集了约 300 万个捍卫和平的公民签名，并递交联合国大会。[32]拉美和资本主义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采取了同样路线。这一模棱两可的行为是冷战高潮的体现。苏联认为美国正准备向其发动进攻，因而，它一方面鼓动西方国家共产党走激进路线，另一方面则推动世界和平运动。

斯大林的担忧是有根据的。1949 年 8 月苏联进行的首次核试验和同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杜鲁门政府感到恐慌。接替乔治·凯南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局长的保罗·尼兹（Paul Nitze）提议，美国应在共产主义从内部腐蚀“自由世界”之前采取行动，用优势兵力包围苏联。他的战略观念是极端的善恶对立。他制作了一幅地图，上面只有“自由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33]他积极为冷战推波助澜，加紧自 1947 年起就已见端倪的美国国内镇压活动。众议院于 1938 年成立的用以调查不忠诚和颠覆组织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加强了调查工作。1947 年 7 月 24 日，助理国务卿约翰·普里弗伊（John Peurifoy）大使告知参议院，国务院辞退了 10 名工作人员。1948 年，参议院成立了一个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以继续执行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原专门委员会的职能是调查二战期间的国家防御计划，其主席是当时代表密苏里州

的参议员亨利·杜鲁门。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把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军队从大陆驱逐，是对“遏制和威慑”政策的沉重打击。美国极右、好战阶层于是将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的责任归咎于政府。1949 年 1 月 25 日，民主党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指责说：“这是中国的悲惨故事。我们曾努力捍卫它的自由，而我们的外交官和我们的总统却毁掉了我们的年轻人所拯救的一切。”一年后的 1950 年 2 月，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发表的演说中，把美国在外交政策中遭受的挫折归咎于渗透到国务院的莫须有的共产党人。一个专设的对外关系小组委员会对这一指责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那是“一个骗局和愚弄行为”，必须加以拒绝。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科学家朱利叶斯·卢森堡（Julius Rosenberg）及其妻子艾瑟尔·卢森堡（Ethel Rosenberg）被指控为替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而遭逮捕，使麦卡锡的说法有了可信度。他甚至指控乔治·马歇尔将军参与了庞大的共产党阴谋。

这些事实煽动了反共狂想症。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高层的确存在要求使用原子弹打击中国的巨大压力，包括来自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压力。[34]当美国军队逼近中朝边境时，中国军队于 1950 年 11 月初越过鸭绿江，发起了反攻并推进到汉城。虽然杜鲁门曾承认这一可能，但他顶住了压力，没有接受麦克阿瑟的建议，并最终以违抗命令为由将其解职。[35]杜鲁门不希望在朝鲜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并演变成一场亚洲大战，也不想让苏联卷入战争。然而一旦中国遭到攻击，那就会成为事实。[36]地理和政治因素也对核武器的使用构成了严重制约，即使它造成的破坏再大，也难以使美军随后占领中国和苏联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美国既没有方法，也没有条件去征服它们。美国的军力即使进一步提高也毫无用处，它不能转化为政治和外交胜利。美国武装部队参谋长奥马尔·布莱德雷（Omar N. Bradley）指出，那将是“在错误地方、错误时间和与错误敌人发生的错误战争”[37]。其所言并非没有道理。

【注解】

[1] 将丘吉尔的提议与 1941 年 8 月 12 日最终公布的内容相比，可看出所增加的部分。Churchill, 1987, pp. 383-394.

[2] Sked & Cook, 1979, pp. 58-60.

[3] 白皮书使用这一名称是因为它由英国政府殖民大臣麦可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提议。他得到了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Lord Halifax）勋爵的支持。

[4] 1939 年的白皮书宣称，“巴勒斯坦不能被变成一个犹太国家的要求已暗含在

1922年的命令文件中。该文件称，‘未经批准的谈话是为了表明，期望达到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属于犹太人的巴勒斯坦’。类似‘像英格兰属于英国人那样，使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之所’这样的句子也在文件中出现。女王陛下政府认为，任何这种期望都是不可行的，政府并无此目标。从来没有考虑过……使阿拉伯人口、语言或文化在巴勒斯坦消亡或使其依附于别人。他们希望提醒人们注意，《贝尔福宣言》的表述中，未包括整个巴勒斯坦应该变成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内容，而是提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家园”。Palestine. Statement of Policy. Present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to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is Majesty. May. The Avalon Project at Yale Law School. http://www.yale.edu/lawweb/avalon/mideast/brwh1939.htm.

[5] Truman, vol. Ⅱ, 1956, pp. 132-133.

[6] Apud Arakie, 1973, pp. 24-25.

[7] Truman, vol. Ⅱ, 1956, pp. 149-153.

[8] Sked & Cook, 1979, p. 63. Truman, vol. Ⅱ, 1956, pp. 152-153. 按照阿拉基(Arakie)的说法，有41名犹太人、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丧生，43人受伤。Arakie, 1973, p. 49.

[9] 民族军事组织。

[10] Truman, vol. Ⅱ, 1956, pp. 152-153.

[11]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364—3 September 1947 Supplement No. 11 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 Repor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 volume 1. Lake Success, Nova York, 1947. 当杜鲁门1947年秋决定美国的政策是成立以色列国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为12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2/3。Arakie, 1973, p. 70.

[12] Truman, vol. Ⅱ, 1956, pp. 132-133.

[13] Id., ibid., p. 162.

[14] 联合国代表大会没有批准分治计划，只批准了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原则。

[15] Volkogonov, 1999, pp. 131-132. Peralva, 1960, p. 94.

[16]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17] Volkogonov, 1996, pp. 538-539. Volkogonov, 1999, pp. 129-130.

[18] 根据1947年9月18日生效的《国家安全法案》，美国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

[19] Apud Wise, 1976, p. 187.

[20] NSC 4-A, December 17, 1947 & NSC 10/2, June 18, 1948, 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Documents 257 e 292.

[21] Lens, 2003, p. 336.

[22] Ambrose, 1988, p. 63.

[23] Schoultz, 1999, p. 317.

[24] Weis, 1993, p. 15.

[25] 8月15日至9月2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美洲国家维持大陆和平与安全会议。Preparations-710 Consultation.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merican Republic Affairs (Spruille Braden)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 Washington, May 29, 1947. F R U S-1947, vol. Ⅷ, The American Republic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p. 1-3.

[26] Autorenkollektiv, 1978, pp. 168, 172, 173. Autorenkollektiv, 1971, 2. Teil, pp. 112-117. Autorenkollektiv, 1981, pp. 93-96. Heitzer, 1987, pp. 73-75. Ambrose, 1988, pp. 99-104. Bartlett, 1984, pp. 273-278.

[27] Stettinius, 1949, p. 127.

[28] Gilbert, 1994, p. 147.

[29] 1945年二战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协定》，朝鲜被分为两个占领区：南方为美占区，北方为苏占区，以北纬38度线为界。1947年，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准备通过在两个占领区的选举来重组国家。苏联不承认该委员会，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在苏占区建立政权。统一谈判以失败告终。1948年，朝鲜半岛出现了两个国家：北朝鲜（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南朝鲜（大韩民国）。前者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后者倒向了西方。两个政府均认为自己对整个朝鲜半岛拥有管辖权，双方边界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冲突事件频发。苏联和美国军队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撤出。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军队以对方军队越过“三八线”为由入侵南方，目的是把朝鲜统一在共产主义政权之下。联合国安理会利用苏联代表的缺席，宣布北朝鲜为入侵者，并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为联合国军队司令，率领实际上全数由美国士兵组成的联合国部队开始向北朝鲜推进。当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后，中国参与了战争并发动反攻，迫使麦克阿瑟的军队撤退。1951年1月4日，中国军队攻占韩国首都汉城。苏联没有直接卷入战争。1951年2—3月间，美军迫使中朝联军退回“三八线”。战争在之后两年中一直处于僵持状态。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根据协议，南北双方将维持1948年确定的边界，并在两国之间建立一个非军事区。

[30] Kissinger, 1994, p. 483. Volkogonov, 1996, p. 540.

[31] Falcão, 1988, pp. 378-381. Chilcote, 1973, pp. 58-60.

[32] Id., ibid., p. 60.

[33] Kupchan, 2002, p. 39.

[34] Ambrose, 1988, pp. 125-126. Schulzinger, 1994, pp. 228-229.

[35] Kissinger, 1994, pp. 484-485. Truman, vol. 2, 1956, pp. 449-450.

[36] Id., ibid., pp. 381-393. Ambrose, 1988. Pratt, 1955, pp. 742-743.

[37] Id., ibid., p. 742.

第十章

艾森豪威尔的胜利　共和党军人政府　发生在美国的麦卡锡式迫害　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考虑　无果而终的战争　对外军援　中央情报局和纳赛尔在埃及的上升　伊朗针对摩萨台的政变　入侵危地马拉　《巴黎协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

1952年11月1日早上7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珊瑚礁上，美国引爆了第一颗1 050万吨当量的氢弹，其威力相当于摧毁广岛和长崎那两枚原子弹的600倍。几天后，在国内外一片紧张气氛中，指挥诺曼底登陆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作为共和党候选人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曾担任巴西瓦加斯总统第一任期（1930—1935年）外长的奥斯瓦多·阿拉尼亚在写给瓦加斯总统的函中作了以下评论和预测：

> 这将是一个共和党军人政府，不知道两者哪个更糟。华尔街将成为参谋部，世界将看到的是一个拥有前所未有强大实力国家的两种力量结合后所产生的反应。然而，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来说，这是一个最不确定、最不安全的时刻。资本主义的权力扩张没有止境，尤其是在国际秩序之中。努力恢复世界秩序是我们将会看到的场景。以各国人民摆脱殖民统治为开端的新秩序将会重新遭受挫折，但最终会赢得胜利。我认为，即使这一人民（美国人民）也并非一致支持这一剧烈的国际历史倒退，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与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发生战争。[1]

阿拉尼亚的担忧是有根据的。事实上，共和党显得十分保守，比民主

党更能代表华尔街和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这些大公司的网络已遍布所谓的“自由国家”，即资本主义的西方及其边缘的亚洲和非洲。它们不希望改变现状，不愿看到二战结束后随着纳粹法西斯失败而正成为可能的真正去殖民化。持善恶两极对峙“世界观”的艾森豪威尔把国际问题理解为“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基本冲突。但他是一个明智的人，而且相信民主。选举运动之初，他就试图远离麦卡锡参议员，极力与其划清界限。麦卡锡以打击共产主义这一已遍及全美的狂热为借口，加紧了对公众的审查和迫害。艾森豪威尔反对麦卡锡对那些被认为是反美的书籍进行篡改和焚毁的提议。他认为，不能也不应该用非美国的方式去镇压反美活动，要保护民主就必须使用民主工具。[2]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卡锡主义现象的存在早于威斯康星州麦卡锡参议员的出现，并会比他的权力和宣传持续更长时间”[3]。

作为军人，艾森豪威尔明白，朝鲜战争徒劳无益。20万中国人在那里战斗，而美国也正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即便不是毫无利益可言，图的也仅仅是小利”[4]。1952年11月他当选总统时，美国军队已有大量伤亡：21 000人死亡，91 000人受伤，另有13 000人失踪。[5]这些数字使朝鲜战争成为美国人员伤亡第四多的战争，仅次于1860—1864年的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他甚至考虑用核武器袭击朝鲜和中国东北。麦克阿瑟将军早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前就向其建议过。[6]但联合参谋部的指挥官们考虑到中国人建造的工事过长，对使用战术核武器表示悲观。英国人认为使用核武器将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而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美国没有核武器或者在必要时没有使用它的愿望，那么就不可能保证对世界各地的军事承诺。[7]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将会在美国国内及其盟友中造成强烈抵触情绪。而且，还可能使得同样拥有大量原子弹并即将试爆氢弹的苏联参战。政治约束了军事力量。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干预朝鲜是执行一项“警察行动”，目的只是把共产党人驱逐出朝鲜半岛南部，而不是想使其统一。于是，他就寻求战争的“体面结束”。1953年7月27日，美国、朝鲜和中国签订了休战协议。战争停息了，但和平并未确立。

美国未能赢得朝鲜战争，它所取得的成果有限，这说明美国并非无所不能。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把这场造成15万美国人伤亡和失踪[8]的战争定性为“没有结果的战争”。他认为这场战争对杜鲁门的政治目的而言过大，对其战略思想来说则过小。因为他努力保存力量，用以阻止苏联对欧洲的进攻。而麦克阿瑟则想摊牌，哪怕需要与中国发生冲突。[9]艾森豪威尔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正如克劳塞维茨（Von Clausewitz）

所言[10]，如果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也同样制约着战争，并使战争服从其目的。因此，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不管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考虑，美国都不能把战火引向中国本土。朝鲜战争仅仅巩固了美国军方和企业家的联合，他们利用这一事件来促进相互间利益的实现。1947 年美国推出的用以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援助计划”，于 1949 年扩充后成为《共同防御援助法案》，把伊朗、韩国、菲律宾和北约纳入其中，它最终被《共同安全法令》所整合。这一系列“综合性法案”共耗资 70 亿美元，主要用于对外国的军事援助。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是遏制苏联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侵略，以防权力的天平向共产党倾斜。这就是向美国盟友提供军事援助（武器和训练）的理论基础。其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抵御外来侵略，维持国内秩序，控制颠覆破坏活动。尽管经济方面特别是农业领域困难重重的苏联更关心自身安全，并没有任何实质性扩张计划，但它却一直支持和推动落后国家和（或）仍处于殖民桎梏国家的反帝运动。

为了实施《共同安全法令》，美国开始与各国广泛签订军事盟约，使各国军队处于一个“军事援助顾问团”的控制之下，成为五角大楼的客户。这一关系使得美国能够以十分有效的方式，直接干预对方国家的内政，在一些情况下使那些国家的军队失去民族特征。美国与约 40 个国家签订了军事条约，按照“遏制和威慑”方针，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充当宪兵角色。它的军费开支增加了 3 倍。大西洋联盟从政治同盟变成由美国最高司令统率的一体化军事组织。[11]美国记者兼历史学家弗雷德·库克（Fred J. Cook）认为，舆论宣传是“军国主义国家的支撑点”[12]。1946 年苏联向土耳其和伊朗施压，1947 年希腊内战，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变和苏联对柏林的封锁，1949 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和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及 1950 年朝鲜战争的爆发，都成为美国的宣传武器，政府和媒体均高调并不厌其烦地揭露共产党的威胁。这些宣传很快使美国民众相信，苏联红军将很快侵占整个西欧并向美国发起攻击，继而毁灭“自由世界”。美国所指的“自由世界”甚至还包括以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元帅和葡萄牙萨拉查（Antônio de Oliveira Salazar）为首的以及遍布拉美和其他地区的法西斯独裁政权。

在这种背景下，正如奥斯瓦多·阿拉尼亚所预料的，当时正风起云涌并已深入发展的去殖民化进程遭受了新的挫折。在军事援助顾问团中安插人员的中央情报局，不仅进行情报搜集工作，还作为美国对外政策和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广泛、系统地进行各种类型的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其

成员在贿选、散布反共信息、操纵工人罢工、破坏电站、炸毁港口、引导秘密打击和策划暗杀等方面接受了专门训练。[13]简而言之，正如1950年作为交给胡佛委员会的《杜利特尔报告》附件的一份秘密文件所建议的，[14]中央情报局的任务是，“通过比用来对付我们的更清晰、更先进和更有效的方法，去颠覆、破坏和毁灭我们的敌人”[15]。随着库尔齐奥·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1930年所说的“一个现代国家的征服和防御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技术问题”[16]成为现实，中央情报局大肆发展技术，策划和推动政变，以推翻那些有可能违背美国利益和方针的政府。这一技术根据国家性质而有所不同。[17]

美国支持去殖民化进程的目的是为了动摇英法殖民体系，但它希望在可控范围内进行，以免激发有利于共产主义发展进而被苏联利用的民族主义。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向穆罕默德五世（Muhammad V que o Marrocos）国王承诺，战争结束后，将允许当时还处于法国保护下的摩洛哥独立。这使丘吉尔明显感到不悦，他感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同样受到了威胁。[18]二战结束后，虽然英国实行了准许帝国成员国独立的计划，但在世界某些地区，它却显得犹豫不决，包括由它行使保护权的埃及。当时，埃及国内的民族主义正处于上升势头。1951—1952年间，英国军队不得不数次猛烈镇压暴乱和示威。美国国务院对这一做法不满，向英国政府和埃及的法鲁克国王（Farouk）提出了抗议。[19]据中央情报局派驻中东的成员迈尔斯·柯普兰（Miles Copeland）称，自那时起，该组织开始执行一个名为“寻找一个穆斯林比利·葛雷厄[20]姆”的计划，目的是找到一位有号召力的领导人，帮助把埃及国内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敌对情绪转移到其他国家身上。[21]同时，柯普兰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孙子、时任中央情报局驻该地区行动组长的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与穆斯林教友会伊赫瓦尼尔·艾尔穆斯林组织的成员建立了联系，并与迦玛尔·纳赛尔（Gamal Abd al-Nasser）上校和阿卜杜勒·拉乌夫（Abdel Moneim Ra'ouf）上校等“自由军官”进行了多次会面，策划针对得到英国支持的法鲁克国王的阴谋。[22]

纳赛尔实际上并不亲美，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与美国就建立一个策略性联盟进行了谈判，其目的是依靠美国支持，推翻被中央情报局称为“肥蛋”的法鲁克国王的低效、无能和腐败政府。纳赛尔认为，在君主制垮台后，任何迫使埃及进行自由选举建立立宪政府的做法都将是草率的。克米特·罗斯福务实地接受了他所做的评估。纳赛尔和克米特·罗斯福唯一没有达成一致的是巴勒斯坦问题。但纳赛尔向他表示，1948年让他和其他军人吞

下失败苦果的与以色列发生的战争并非目前考虑的重点，处于第一位的问题是英国军队撤离苏伊士运河。这一要求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支持。这样，1952 年 7 月 23 日，“自由军官”推翻了法鲁克国王，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交给了由兵变真正策划者纳赛尔选定的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eguib）将军。1953 年 6 月 18 日，埃及共和国建立。同年，在中央情报局协助下，埃及情报机构“穆克哈巴拉特”（Mukhabarat）重组。美国于是就鼓励埃及与英国就苏伊士运河达成协议。[23]1954 年 11 月，艾森豪威尔向埃及提供了 4 000 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发展经济。[24]自那个时期起，“自由军官”政变得到中央情报局部分资助这一事实在开罗已不是任何秘密。[25]

但纳赛尔要巩固其政府，就不得不考虑埃及人民中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他在开罗电台所做的反美演讲大部分是中央情报局人员柯普兰协助起草的。[26]让他保住政权是优先任务。[27]柯普兰承认，美国“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都不受欢迎”，中央情报局的大部分工作都必须秘密进行，这并非自己的需要，而是客户的需要。[28]他认为，即使最亲美的政府，如果无法使其本身利益也得到满足，并威胁到它对国家的控制，那么它也难以满足美国的要求。他承认，他和克米特·罗斯福未能就这一点说服华盛顿。国务院不顾他的提醒，继续抱怨纳赛尔所采取的行动，认为他这样做会导致政治自杀。[29]柯普兰认为，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不懂得首要规则，那就是，如果不清楚自己是否处于其中，就难以赢得一场游戏。[30]

纳赛尔与美国的默契没有持续多久。1955 年 9 月 27 日，他宣布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了购买武器的协议。此前，美国拒绝按他提出的条件向其出售这些武器[31]，原因是担心这会威胁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克米特·罗斯福避免了一起严重外交事件，他劝纳赛尔不要把杜勒斯的信件内容当真，那封被走漏的信件措辞十分强硬。这才使转交信件的美国中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乔治·艾伦（George W. Allen）未被逐出纳赛尔的办公室。[32]但随着捷克的坦克、大炮等武器开始运抵，埃及和美国的关系迅速恶化。埃及承认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 年 7 月 19 日，杜勒斯中止了对兴建阿斯旺大坝的资金援助（1 亿美元）。该大坝的建设将能控制尼罗河下游水量并为埃及提供电力。英国和世界银行响应了华盛顿的决定。一周后，作为报复，纳赛尔把属于英国资本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10 月 29 日，以色列军队越过西奈沙漠入侵埃及。与此同时，英法伞兵在苏伊士运河区空降。英法对埃及的进攻遭到了两国国内外的严厉批评。美国尽管不赞成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行动，但它依然和苏联一起对英法军事行动进行了谴责。两个超级大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通过

了一项要求停火的决议。数日后，当依靠人民起义建立的艾姆瑞·纳吉（Imre Nagy）政府试图让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并宣布中立时，苏联对布达佩斯进行了血腥干涉。此前，苏联曾发出过入侵波兰的威胁。

被艾森豪威尔称为“带毒的民族主义”，不仅在纳赛尔正逐渐成为泛阿拉伯领袖的埃及爆发，在北非和亚洲各国，革命运动、政变和起义也正在摧毁旧殖民主义。共产党和苏联试图从中获益。美国则以中央情报局为工具加以遏制和控制，以免其突破资本主义体系的界限。当再次出任首相的丘吉尔同意从苏伊士运河基地撤军后，埃及问题得以平息。英国同意撤军的条件是，一旦任何一个阿拉伯联盟国家或土耳其遭到攻击，英军将重新出兵。1951 年 3 月 15 日，伊朗议会通过了把英国所属的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法律。伊朗总理哈吉·拉兹马拉（Haji-Ali Razmara）因反对这一决定，于 1951 年 3 月 7 日遭到了极端组织“伊斯兰敢死队”成员哈利勒·塔赫马斯比（Khalil Tahmasebi）的暗杀。经议会选举，得到民众广泛支持并握有重权的民族阵线领导人穆罕默德·摩萨台（Muhammad Mossadeq）继任。穆罕默德·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别无选择，只能任命他为总理。摩萨台所采取的头几项行动之一是，实施把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法律。于是，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就着手策划，并授意法兹卢拉·扎赫迪（Fazlollah Zahedi）将军推翻得到伊朗共产党支持的摩萨台政府。代号为“大埔-阿贾克斯”的“隐蔽行动”采取了低级招数，如散布虚假消息，由装扮成共产党人的中央情报局成员执行针对伊朗领导人的谋杀行动。紧接着，发生了要求在罗马自愿流放的巴列维国王回归的民众“自发”游行。示威人群中出现了无数事先准备的带有巴列维国王画像的标语，扎赫迪将军假称顺应民意，于 1953 年 8 月 19 日命令军队游行，解除了摩萨台的职务，建立了独裁政权。中央情报局立即向他提供了 500 万美元，用于巩固其政权。[33]摩萨台遭羁押，一些伊朗共产党领导人被处决。在这一政变中，英国的石油利益与因伊朗共产党向伊朗政府提供帮助而担心其亲近苏联的担忧交织在一起。[34]它开启了美国在和平年代进行的“隐蔽行动”，其“蓝本”被用来服务于其他事件，特别是在拉美地区。这一成功令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深受鼓舞[35]，于是，他们批准了以推翻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为目的的“普布瑟克赛斯”（PBSUCCESS）行动。此前，阿本斯总统为了推动农业改革，没收了联合果品公司 3/4 的土地。[36]他还对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进行了干预，并威胁要把美国和外国电力公司的分公司国有化。[37]美国国务院于 1954 年 3 月 1—28 日召集了第十次美洲国家会议，干涉行动得到美洲国家的集体同意。华盛顿的“政策

制定者”认为，有必要为阿本斯政府进行的干预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气氛。[38]由杜勒斯提议并得到第十次美洲国家会议批准的《加拉加斯声明》使“门罗主义”延伸到意识形态领域。该声明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任何美洲国家政治机构的支配和控制，以及把“外大陆国家的政治体系延伸至本大陆”，是对美洲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的威胁，将使美洲和平面临危险。因此，“就要求召开磋商会议，根据现存条约考虑适当的措施”[39]。美国的目的未能完全达到，因为大会接受了哥伦比亚提出的对声明内容的修改，在“要求”和“根据现存条约考虑适当的措施”之间，加入了“磋商会议”的表述，把杜勒斯所希望的批准一个单独行动改为召集一次新的磋商。[40]

美国政府试图以美洲国家外长磋商会议决议为依据，用合法外衣来掩盖对危地马拉的干涉，但它做好了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准备。对由于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和智利反对[41]而不能在美洲国家磋商会议上获得对危地马拉采取集体制裁所需 2/3 多数的担忧，以及阿本斯得到武器援助的可能，促使艾森豪威尔批准由中央情报局执行行动。此前，中央情报局已投入约 2 000 万美元。[42]1954 年 6 月 18 日，一支由雇佣军组成的军队，由曾在利文沃斯堡（堪萨斯）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接受训练的危地马拉军官卡洛斯·阿尔玛斯（Carlos Castillo Armas）上校统率，经洪都拉斯边界侵入危地马拉，并在埃斯基普拉斯扎营。与此同时，一批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 B-26（或 C-46）轰炸机和 P-47 雷霆式战机在对太平洋沿岸的巴里奥斯港和圣何塞港实施轰炸后，在危地马拉城进行了超低空飞行，用机枪扫射并抛撒传单，甚至还投下了零星炸弹。开展这一心理战的目的是希望促使军队倒戈。当时，危军方已与负责协调行动的美国大使约翰·普里弗伊（John Peurifoy）串通，阿本斯被迫辞职。两个月后，1954 年 8 月 24 日，在一场尖锐的军事危机之中，巴西总统瓦加斯自杀。种种迹象表明，那场危机是由美国煽动引起的。瓦加斯总统的民族主义行动与美国在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推崇的政策发生了碰撞。他在遗书中揭露了国际团伙的“地下运动”和为迫使他让步而对巴西经济施加的“粗暴压力”。胡安·贝隆（Juan Domingo Perón）也仅在阿根廷总统位置上支撑了一年。在海军和陆军发动的联合血腥暴动 4 天后，他于 1955 年 9 月 19 日辞职，并躲到“巴拉圭号”炮艇上避难。

中央情报局对与美国经济利益背道而驰或不服从华盛顿政治方针的政府发起秘密战争的行为，目的在于营造一个对美国在世界各地投资有利的氛围。美国在拉美的主要目的是保住战略资源，如委内瑞拉的石油、玻利

维亚的锡矿、智利的铜矿，并保障其供给线畅通。[43]当时，美国石油委员会认为，美国参与世界石油开发符合各国利益，对它们的安全尤为重要。[44]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简·布雷克（Jan K. Black）的精辟言论：美国对外政策传统上侧重推动市场开放、自由经营和欢迎外来投资，这些通常都被作为全人类利益加以倡导。[45]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的共生一直被服务于大银行、财团和政府高层的“旋转门”所强化。[46]美国的拉美政策一直被有条不紊地用来为专门的私人利益服务。[47]

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拉斯·舒尔茨（Lars Schoultz）在其撰写的《国家安全和美国对拉美政策》一书结语中写道，他相信“人权成了美国对拉美政策中的残余类别”，只有在看不到安全问题之时，才会和经济发展一起予以强调。[48]他告诫说：“如果有人试图了解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精髓，那他就应该研究国际安全。”[49]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魏斯（W. Michael Weis）指出，关税壁垒的消除以及经济的发展为美国企业在拉美投资提供了无限机会。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的是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的稳定，而不是拉美的发展。[50]

1940—1950年，美国国民收入增加了3倍，从810亿美元提高到2 419亿美元。[51]凭借约29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占全世界储备的77%），美国加强了资本出口。英国则在战争中损失了70亿英镑，占其全国财富的25%～30%。[52]作为蓄意政策行为，它牺牲了大约2/3的出口贸易，其经济被军事努力极大地扭曲，战争成本超出其国民收入的50%，导致货币流通增加，结果是英镑贬值。与此同时，人们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外债增加了3倍。英国由于牺牲出口贸易，因而完全陷入了依赖美国的处境。一向对英联邦采取敌视态度的美国，十分希望巩固二战期间所取得的成果。作为原料出口国，英联邦中很多国家开始从英镑区外购买工业品的事实使英国经济雪上加霜，加剧了它的国际收支逆差。1949—1950年间，英国国际收支逆差达7亿英镑，这招致了对英镑的投机，导致其贬值。英国为获得进口所需美元，不得不向美国资本出售它在美国以及非洲和南美等地的大部分投资。

与英国不同，联邦德国则具备重振经济的条件，因为它是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国。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希望苏联继续将其影响扩大到西欧。联邦德国主要依靠劳动文化和人民高水平的技术素质等因素从废墟中重生。在重建年代（1945—1952年），它在经济援助名义下仅从美国获得了45亿美元（其中2/3为无偿提供）。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共向欧洲提供了320亿美元。[53]1949年10月31日，联邦德国加入负责协调“马歇尔计划”实施的欧

洲经济合作组织。此后，它接受了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于1950年5月9日提出的建立一个为联邦德国和法国煤钢工业制定规章的共同机构的提议，以此结束两国敌对状态，为西欧和平创造了条件。该机构被延伸至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1951年4月18日，上述六国签署了《巴黎协定》，建立了煤钢经济共同体。该协定于1952年7月25日生效，它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奠定了基础。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罗马协定》于1957年3月25日创立，其目的是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构筑“一个欧洲国家间没有缝隙和更加紧密联盟的基础”。

与此同时，朝鲜军队入侵韩国增加了人们对苏联因柏林问题试图在欧洲挑起战争的担忧。面对这一可能，美、英、法于1951年3月6日给予了联邦德国某些自主权，允许它拥有自己的外交部并在其他国家设立大使馆。1952年5月26日，上述同盟国通过签订《契约协议》和《波恩公约》恢复了联邦德国主权，尽管某些限制依然被维持。这使联邦德国得以重返国际社会。当晚在巴黎签订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使驻扎在联邦德国境内的占领军变成了防御力量。同时，该条约还要求联邦德国为欧洲提供一支50万人的部队。1952年7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协定》生效，联邦德国加入欧洲防御共同体已不可避免。杜鲁门认为，西方军事同盟中如果没有联邦德国，欧洲防线就要推移至大西洋沿岸。[54]这样，在冷战加剧背景下，尽管有来自国内外尤其是法国的抵触，与其说是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美国更希望看到一个虽然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却重新武装的德国。1955年5月5日，随着《巴黎协定》的生效，西方盟国给予了被定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德国西部地区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的权利。[55]随着联邦德国的加入，工业国家卡特尔的经济和军事水平均得到了提升。数日后，作为回应，苏联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东部地区）晚些时候加入了该条约。[56]

【注解】

[1] Carta de Oswaldo Aranha ao presidente Getúlio Vargas, Washington, 2/12/1952. Pasta de 1952. Arquivo de Oswaldo Aranha.

[2] Eisenhower, 1963, pp. 321, 331.

[3] Id., ibid., p. 321.

[4] Id., ibid., pp. 178-179.

[5] Id., ibid., p. 171.

[6] Id., ibid., p. 180.

[7] Id., ibid., p. 180.

[8] 共有29 557名军人阵亡，另有4 184人死于其他原因。有92 934名军人受伤后

撤离。这一数字不包括那些伤愈后重返战场的士兵。此外还有 7 245 名军人被俘，13 000 余人失踪。

[9] Kissinger, 1994, p. 489.

[10] Von Clausewitz, 1998, p. 674.

[11] Kissinger, 1994, p. 491.

[12] Cook, 1964, p. 84.

[13] Johnson, 1996.

[14] 美国政府文官事务委员会通过 1947 年 7 月 27 日的 P. L. 80－162 条款设立，依据此条款还建立了一个由费迪南德·埃伯斯塔特（Ferdinand Eberstadt）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他拟就了 1947 年的《安全法案》草案。U. S. War Dept. Board on Officer-Enlisted Man Relationships. The Doolittle Report: Th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War's Board on Officer-Enlisted Man Relationships. 27 May 1946.

[15] Apud Johnson, 1996, p. 60.

[16] Malaparte, 2002, p. 31.

[17] Id., ibid., p. 47.

[18] Hassan II, 1993, pp. 17－18. 摩洛哥的去殖民化在穆罕默德五世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并得到民族主义者的同情。

[19] Copeland, 1989, p. 145.

[20] 一位福音教牧师的名字。此人与美国保守势力关系密切并与中央情报局联手。

[21] Copeland, 1989, pp. 142－157.

[22] Id., ibid., pp. 152－153.

[23] 尽管纳赛尔倾向中立主义，但他极端反共。因此，约翰·杜勒斯决定仍让他执掌政权。1957 年，作为对阿斯旺大坝撤资的回应，他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因而招致英国和法国的联合打击。艾森豪威尔支持纳赛尔，并迫使联军中止敌对行动。

[24] Eisenhower, 1963, p. 427.

[25] 当纳赛尔做出了一个挑战行动，从克米特·罗斯福掌控的款项中挪用 1 200 万美元用于在扎马雷克岛建造开罗塔时，这一秘密被公之于众。1957 年落成的开罗塔以中央情报局纪念碑著称，或被戏谑地称为“罗斯福的勃起”，指的是那位帮助军事政变的中央情报局成员克米特·罗斯福。

[26] Copeland, 1989, p. 167.

[27] Id., ibid., p. 169.

[28] Id., ibid., p. 169.

[29] Id., ibid., pp. 169－170.

[30] Id., ibid., p. 170.

[31] Wise & Ross, 1965, pp. 118－122.

[32] “……在华盛顿流传着一个令人不快的说法，说的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 X 先生绕过美国官方的对外政策，抢在艾伦之前，劝纳赛尔不要在乎他将收到的

信件。” Id., ibid., p. 120. 1956 年 7 月 26 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的一次演讲中证实了这一说法。

[33] 政变最初由英国军情六处提出，中央情报局成员克米特·罗斯福负责指挥。他还在埃及从事活动，并帮助军人推翻了法鲁克国王。他后来写了一本名为“反政变：控制伊朗的战斗”的书，讲述这段历史。2000 年，《纽约时报》获得了一份未解密文件的副本并予以发表，揭露了那场阴谋的细节。该文件由“中央情报局首席政变规划师”唐纳德·威尔伯（Donald N. Wilber）博士于 1954 年 3 月起草。巴列维因担心失去王位而拒绝解除摩萨台的职务。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Ashraf Pahlavi）和诺曼·施瓦茨科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将军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中间人向其施压，阻止他退缩。James Risen, “Secrets of History: The CIA in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16 April. 2000. 据当时任巴西驻德黑兰特命全权公使并卷入那场阴谋的雨果·哥西埃尔（Hugo Gouthier）称，“天性自由并接受自由思想的巴列维最终妥协了，他被将军们所包围，他们要求政府采取强硬立场”。Gouthier, 1982, pp. 101－110. 摩萨台指责哥西埃尔为美国人效力，要求巴西外交部将其撤换。Relatório apresentado pelo ministro Hugo Gouthier (Defesa); Telegrama da Delegação do Brasil à Assembleia Geral da ONU, a João Neves da Fontoura, Nova York, 15/11/1952. Minuta sobre o afastamento de Gouthier, datada de 12/11/1952, e bilhete do embaixador Mario de Pimentel Brandão, 12/11/1952. Pasta de 1952. Arquivo de Getúlio Vargas.

[34] Wise, 1965, pp. 114－115.

[35] Immerman, 1982, p. 135.

[36] 实行农业改革一年后，阿本斯政府通过用农业改革津贴支付赔偿，分配了 29.6 万公顷国有土地（二战时被没收的原属德国的财产）和 15.1 万公顷私有土地，使 11 万农民受益。一些学者估计的受益者人数为 13.8 万。Gleijeses, 1992, p. 156. 属于联合果品公司的 119 680 公顷中的 83 929 公顷荒芜土地通过发放农业改革津贴被没收。1953 年 3 月，阿本斯没收了联合果品公司在蒂基萨特的 234 000 英亩闲置的土地。1954 年又在巴纳尼拉没收了该公司 173 000 英亩土地。根据联合果品公司报税时的估算，这些土地估值为 1 185 000 美元。但该公司却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报出了 19 355 000 美元的金额。美国国务院认同了这一金额。Gleijeses, 1992, p. 164.

[37] Gleijeses, 1992, p. 87. 关于这一主题，参阅 Moniz Bandeira, 1998, pp. 118－138。

[38] Immerman, 1982, p. 143.

[39] 1954 年 3 月 1—28 日，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十次美洲国际会议通过了《维护美洲国家政治完整、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团结宣言》。In OEA—Segunda Conferência Interamericana Extraordinária—Coletânea de Documentos preparada para a Imprensa, 1° vol., Rio de Janeiro, pp. 8－11. 决议以 17 票赞成、1 票反对（危地马拉）和 2 票弃权（墨西哥和阿根廷）获得通过。

[40] Smith, 1994, p. 81.

[41] 美国、巴西、尼加拉瓜、秘鲁、古巴、洪都拉斯、巴拿马、海地、多米尼加

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签署了磋商会议要求，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墨西哥坚决不同意签字。

[42] Powers，1979，p. 108. 葛雷杰西（Gleijeses）认为，“普布瑟克赛斯”行动原定于6月实施，但武器运抵使其提前。Gleijeses，1992，pp. 296，297.

[43] Black，1986，p. 10.

[44] Id.，ibid.，p. 10.

[45] Id.，ibid.，p. 10.

[46] Id.，ibid.，p. 11.

[47] Schoultz，1998，p. 373.

[48] Schoultz，1987，p. xi.

[49] Id.，ibid.，p. xi.

[50] Weis，1993，p. 15.

[51] Lens，2003，pp. 336-337.

[52] Sked & Cook，1979，pp. 27-28. Lens，2003，p. 337.

[53] Erhard，1988，p. 848. 联邦德国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认为，“马歇尔计划”与其说是物质上的，不如说更多是道义和政治上的。国务院参与“马歇尔计划”制定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教授也承认，美国的援助虽然是必要的，但不足以推动西欧经济的恢复，而且，1946—1953年间，德国总共只得到了36亿美元的援助。Kindleberger，1987，pp. 196 & 246. Horne，1956，p. 286. 巴西驻波恩大使也认为，尽管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进行的援助很重要，但只占那个时期联邦德国投资总额的6%。Ofício nº 200，embaixador Luiz de Faro Jr. ao chanceler Vicente Rao，Bonn，24/8/1953，Arquivo Histórico do Itamaraty—Missões Diplomáticas Brasileiras—7/5/1956.

[54] Truman，1956，vol，2. p. 253.

[55] 西方盟国保留在联邦德国出现国内外紧急情况的状况下接管其政府职责的权利。直到1968年6月28日《紧急状态法》在联邦德国生效后，它们才放弃这一权利。

[56] 关于德国的重新武装，请参阅 Moniz Bandeira，2002，pp. 86-108。

第十一章

美国经济疆界的拓宽　美国、法国与印度支那战争　多米诺理论　法国在奠边府的失败　美国反对《日内瓦条约》　古巴革命与美国　拉美的冷战

冷战达到巅峰之时，美国已把经济疆界扩展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各个地区，东南亚被视为重点之一。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国外资源。法国进行的印度支那战争彰显了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对殖民主义所采取的双重态度。1944年，罗斯福曾对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说过，一旦战争结束，印度支那不应重新回到法国统治之下，而应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管理。蒋介石和斯大林对此予以支持。[1]罗斯福在写给国务卿康德尔·赫尔的信中这样写道："法国已有过在近百年时间中占据这一3 000万人口国家的机会，但人们的经济状况却比当初更糟。"[2]然而，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政策从执意清除旧殖民主义，变成了有助于巩固法国在东亚地位的军事援助。1951年，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来到印度支那，亲眼目睹了美国与"没有任何民众支持的殖民政权"结成的同盟。美国已在那里投入10亿美元，占整个战争开支的40%。[3]1952年12月17日，杜鲁门卸任前一个月，还在"共同安全总署"项目框架内，批准向法国提供3 050万美元的援助。[4]肯尼迪在国会演说（1954年4月6日）中重申，当法国依然把印度支那作为殖民地，控制其整个政治体系，100%的外贸、海岸、国际运输、橡胶出口，以及66%的大米之时，他反对美国参与拯救奠边府的法国远征军行动。[5]他认为，在印度支那丛林中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希望，此时大肆投入资金、物资和人员，"这是毫无益处的自我毁灭行为"[6]。他公开声称，美国不管提供多大的军事援助，都难以战胜得到民众同情和暗中支持的敌人。[7]

尽管艾森豪威尔对法国依然通过控制印度支那的外贸、汇率、外交和军事等保留"从前殖民时期的某些象征"表示不满，但他也不希望印支半

岛落入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手中。胡志明又名阮爱国，是一个老战士，此人具备领袖的所有品质。按1955年逃离北越的《从殖民主义到共产主义》一书作者黄文志的说法，他有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8]胡志明被推选彰显了“遏制”政策的失败。视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一对孪生恶魔的艾森豪威尔把东南亚看作排好的多米诺骨牌，推倒一块意味着其余所有骨牌也都将倒下。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你面前有一排竖起的骨牌，当你推倒第一块，最后一块也将很快倒下。因此，你面临的将是带来最深刻影响的瓦解的开始。”他认为，一旦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手中，“对我们和你们全球战略地位的最终效应（……）可能会是灾难性的”[9]。艾森豪威尔认为，越南和老挝、柬埔寨一起丢失，意味着除了值钱的橡胶和大米供应，还把2 400万人口交由“共产主义奴役”[10]。他预计，一旦失掉印度支那，不仅泰国，还有缅甸和马来西亚也将面临威胁，东巴基斯坦、南亚和整个印度尼西亚都会处于危险之中。[11]

艾森豪威尔的观点符合其作为一名正在挑起战争的军人的身份。在征求国会领袖们的意见后，他派遣约翰·奥丹尼尔（John W. O'Daniel）将军作为军援顾问团团长，带领200名顾问前往印度支那。[12]很多议员担心，这项行动将为美国向该地区派遣地面部队打开大门。[13]艾森豪威尔还向法国人提供了一批B-26战机，并试图通过空中打击提供支援。尽管他曾于1954年年初考虑向印度支那派遣地面部队，但却一直犹豫不决。只有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行动，他才愿意出兵。美国于1951年与这些国家签署了安全条约。[14]美国的出兵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加强法国人的地位。[15]也只有在美军作为包括英国、东南亚其他国家和菲律宾在内的联合部队的组成部分，且法国同意加快联系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独立[16]，即取消殖民体系一切残余条件下，国会才会批准派兵。但法国坚持要维持其在印度支那的领导地位，保留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殖民帝国。只是因为担心中国干涉，它才希望美国公开参与战争。但它对联系国的完全独立问题避而不谈。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份备忘录，提醒他说，“我们不能为了保证美国的声誉而承受如此之多，并遭受一场会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失败”[17]。不久后的1954年4月16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副总统尼克松在美国报业协会发表了一个演说。他在演说中暗示，美国有一天可能会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而向越南派兵。[18]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长范文同（Pham Van Dong）在日内瓦大会（1955年）发言中揭露，美国一方面把法国当作其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通过这场自己为之推波助澜的战争，试图把法国驱逐出印度支那，将其削弱并在欧

洲对其实行高度奴役。[19]他言之有理，美国的政策确实有其两面性。艾森豪威尔在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反映了他在逼迫法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即终结其殖民体系，打开封闭市场，以及阻止多米诺骨牌倒塌和遏制共产主义前进之间的矛盾心理。即便如此，美国依然为支持法国白白浪费了 25 亿美元。这一支持政策始于杜鲁门政府末期。[20]当时，美国已投入 2 亿美元（相当于 1993 年的 10 亿美元）[21]，占印度支那战争成本的 1/3 到一半。[22]尽管从美国获得了武器和资金支持，但法国仍然无法战胜 1950 年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承认的越南民主共和国。[23]越盟军队[24]在被中央情报局前局长[25]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称为“军事天才”[26]的武元甲（Vo Nguyen Giap）将军统率下，攻击了法国“远征军团”（16 000 人）最后一个被视为坚不可摧的堡垒——奠边府。位于越南西北部与老挝接壤处的奠边府是一个被群山环抱、延绵 18 公里的平原。战斗从 1954 年 3 月 17 日开始到 5 月 7 日结束，共持续了 55 个昼夜。美国的 B-52 轰炸机对该地区进行了不间断轰炸，甚至投下凝固汽油弹，用以烧毁植被[27]，但仍未能拯救法国人。表现出巨大牺牲精神和坚定取胜意志的越盟军队[28]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尽管自己损失巨大，但他们使“远征军团”遭受了惊人的失败。[29]

在奠边府战役中，法国 3 000 名士兵阵亡，6 000 人受伤，1 万人被俘。[30]这场战役的失败使法国不得不坐到日内瓦大会（1954 年）谈判桌前，被迫向胡志明领导的越盟交出河内和大港口海防以及整个北越。[31]在整个战争中，法国付出了约 17 万人（其中 1/3 的人死亡和失踪）和 50 亿美元的代价。[32]停战协议确定了将于 1955 年进行的选举和印度支那的统一。各国均对协议表示满意，“唯独只有美国……”。它在大会结束前就派出了一个由美国人组成的小组。该小组在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上校率领下，前往执行针对越盟的行动使命。[33]为应对共产主义威胁而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写于 1954 年 4 月 5 日的一份备忘录指出，挫败越盟是阻止共产主义影响在东南亚扩散的关键，在东南亚取得胜利是唯一能让美国接受的政策。[34]在另一份于 1954 年 5 月 26 日提交给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的名为“对美国在印度支那可能采取的行动认真研究”的备忘录中，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甚至考虑过，在针对印度支那和中国海南岛以及其被共产党用来支持越盟行动的沿海岛屿等军事目标的空中打击中，“只要时机有利，就使用核武器和其他各种武器”。[35]

五角大楼的研究表明，艾森豪威尔认为，日内瓦达成的协议是一个

“灾难”。于是，他决定批准意在防止共产主义在越南扩张的行动。[36]他想拖延选举，因为他清楚，胡志明会赢得选举，成为统一后越南的主席。[37]于是，他立即着手破坏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拒绝参与法国和越盟最终声明的签署。10月8日，吴庭艳将军宣布，越南有可能和朝鲜、德国一样，从北纬17度无限期分裂。[38]他在美国支持下取消了选举，并通过发动政变建立了一个独裁政府。7月1日，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成员抵达西贡。鉴于法国军队几乎已全部于1955年2月撤离越南，美国顾问于是就着手组建和训练越南共和国（南越）的军队。国务卿杜勒斯说服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泰国、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签署了《马尼拉条约》[39]，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一军事同盟。其成员通过另一协议吸收南越加入。该协议的明确目的是保护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使其免遭共产党侵犯。威廉·富布赖特[40]（J. William Fulbright）所称的“亚洲主义”和“门罗主义”如出一辙，也就是，任何对东南亚的干预，“对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将是危险的”[41]。艾森豪威尔政府按与杜鲁门相同的观点在东南亚明确了美国的义务。这一观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之手，美国的安全就将受到威胁。越南选举被推迟后，一名仅以兰登（Landon）署名的美国驻河内外交官在1956年2月27日发给国务院的一封电报中称，不管共产党以何种形式控制东南亚，其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短期是严重的，而长期则是致命的。[42]

此时美国的安全已包括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这意味着美国要保护其利益和特权安全、原料和市场安全、财产和资本安全、企业经营权以及设在世界各地工厂的安全。不管在哪里，中东或拉美，欧洲或亚洲，只要有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个平台、可口可乐的一个工厂、联合果品公司的一个庄园、Wilson & Sons公司的一个冷库、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的一家商店，或任何美国企业一个设施的存在，那里便是美国的边界。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技术进步使得美国和经济迅速恢复的德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特别是在欧洲地区。这使得它们有能力遏制苏联的影响，避免共产主义的推进。同时，它们通过压低用来交换工业品的原料价格，把资本积累的大部分负担转嫁到原料出口国。这样，通过推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经济盈余据为己有，卡特尔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得以为美国和西欧的劳动阶层提供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社会福利以及舒适和安全的社会条件。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尽管能促进工业国家内部市场的扩大，但也会导致利润比例的下降。这就促使资本被转移到有丰富劳动力和原料储量的资本主义体系边

缘，并向落后国家搬迁工厂，以便能降低生产成本，恢复平均利润率。资本密集型技术取代劳动力的同时，欧洲和美国的失业率也在上升。这些因素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在超越民族国家疆界，促使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确立，导致跨国企业的形成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试图维持其技术垄断、资本产品生产和金融核心地位的同时，把它们的工厂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工厂转移到一些不发达国家。

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继续按照自己的利益和目的塑造世界经济结构，迫使经济彻底自由化。这是造成各国发展不平等日益显著的罪魁祸首。作为资本集中进程所导致的结果，贫困在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步扩大。这两个机构从未违背美国政府确立的议程。自它们成立之日起，美国一直控制着理事会 17%的票数，拥有否决权。这一事实给了它在提供信贷或确定某一国需执行金融调整计划时的主导地位。每个国家的投票数与它所提供的资金成正比。这样，决定权和影响力就存在明显的不平等。这一体系所基于的原则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是一个金融机构，因此就把大的决定权交给那些为其提供更多资金支持的国家。与《联合国宪章》一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协定的宗旨，是为美国提供掌握主导权的便利。在所有成员国中，只有美、日、德、法、英五国，也即组成超帝国主义卡特尔的大国，有权指派理事。其余 19 位理事则通过假象选举产生，来代表其他成员国的利益。美国的政策是拒绝向第三世界国家的任何经济活动提供政府支持，它坚持自由企业、自由市场，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其理由是，私人资本已绰绰有余，应最大程度地予以使用。

事实上，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政府指定，由世行理事会核准。它所提供的资金也是为了促进私人资本的扩张，与申请贷款的穷国政府希望在对自身经济至关重要的石油和矿业等项目中进行公共投资的意愿相违背，其政策通常都是为了顾及商人群体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所建议的调整项目都基于自由市场这一护身符，就好像的确存在完美竞争[43]，可能导致的社会紧张则丝毫不被考虑。对公共开支的更大控制体现为在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入政策受到影响，或取消对必需品的价格补贴，并要求货币贬值，以便从理论上达到减缓进口、增加出口和保障资金流入的目的。但由于国际市场对穷国大部分出口产品需求弹性的不足，穷国出口没有足够的增加。外来资金的进入意味着经济越来越失去民族性，利润转移即资金流往国外越来越多，这就造成国际支付经常项目的逆差以及为弥补逆差而背负的外债。这些因素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大部分由美国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提供的国际贷款成为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掠夺并迫使其屈从的主要工具，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拉美地区受美国政策危害尤为严重，美国通过服务于商人群体利益的军政府政治集权，在这一地区推行自由经济政策。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拉美地区的反美情绪十分高涨，以至于在巴拿马首都的一次会晤（1957年）中，当艾森豪威尔询问巴西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面对高涨的反美情绪，他是否相信不久将会在南美出现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时，库比契克回答说："假如美国继续支持和偏袒右倾独裁政府和军国主义，我相信会的"[44]。事实上，拉美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在玻利维亚，革命持续高涨。在秘鲁，曼努埃尔·奥德里亚（Manuel A. Odría）虽然打压了民众起义，但被迫于1955年12月辞职并交权给曼努埃尔·普拉多-乌加特切（Manuel Prado y Ugarteche）。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亚（Gustavo Rojas-Pinilla）于1953年在哥伦比亚建立的军政府也在1957年另一次得到民众支持的政变中垮台。1958年1月，委内瑞拉爆发的民众起义，推翻了同样得到美国支持的马科斯·希门内斯（Marcos Pérnz Jiménez）将军的独裁政府。

1958年5月，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对拉美数国进行礼节性访问时遇到的强烈群众示威，说明了拉美人民对美国的反感程度。尼克松的拉美之行始于阿根廷。他在乌拉圭、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均受到敌视。他抵达利马时，情况一片混乱，学生们阻止他进入圣马科斯大学，一些人向他吐口水并投掷石块。[45]尼克松访问引发的反美示威在委内瑞拉达到高潮，劳动者和学生占领了迈克蒂亚机场和国家公墓，并在公墓悬挂了一面黑旗，以示哀悼。他们阻止尼克松向玻利瓦尔表达敬意，愤怒的群众还向尼克松夫妇的座车投掷石块，他脸部被砸伤。尼克松不能上街，也无法进行任何参观，在加拉加斯停留的所有时间（22小时）只能一直躲在美国大使馆内。[46]美国政府向那里派遣了军舰和4个空运连，用以对他实施保护和必要时的营救。[47]美国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斯诺（William Snow）认为，多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引发了这些示威活动，其中包括美国与这一地区独裁政府过去和现在所保持的关系，以及同意委内瑞拉的希门内斯等独裁者到美国进行政治避难。[48]巴西外交部政策司也认为，让委内瑞拉仍在支付"沉重代价"的希门内斯独裁统治和"国务院对拉美国家明显错误的政策"是引发针对尼克松示威的"间接原因"。[49]"一直关注美国在拉美名声日益下降"的库比契克，对发生在利马和加拉加斯的事件并不感到吃惊。他借机给艾森豪威尔写了封信。他在对尼克松

遭受侮辱表示同情的同时，劝告艾森豪威尔应“对本半球采取的政策进行彻底审视”，进而“对在一切方面维护泛美主义思想的所作所为进行一次检查”[50]。然而，最让美国感到恐慌的是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的胜利。它由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已以“切”[51]闻名的埃尔内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和其他“七二六”运动成员所领导。《纽约时报》在次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告诫美国人不要生活在自我幻想之中，因为国务院、五角大楼、哈瓦那的美国使馆以及相当一部分美国商人群体所奉行的政策，已造成很大的对立情绪，这一地区类似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所存在的压倒性反美情绪，使“外交形势极为艰难”[52]。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所预见的与美国的冲突已变得不可避免，革命政府实施的农业改革触及了联合果品公司的大庄园。与危地马拉的情况相同，那里40%以上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53]这样，在反美情绪高涨背景下，古巴革命在拉美得到了巨大的民众支持，因为它反映了与美国悬而未决的矛盾。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虽然都赞同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没有参加任何共产党或对其做出承诺，他们也不遵循莫斯科的政治方针。古巴革命向斯大林主义及其政府形式发展并非不可避免，但是，在农业改革最初所采取的措施触及联合果品公司之时，美国向古巴所施加的压力，使卡斯特罗及其伙伴们把苏联视为支持其捍卫古巴主权和自决的唯一国际选择。美国政治学家科尔·布莱齐尔（Cole Blasier）指出，“苏联是这些激进民族主义者所能转向的一个替代权力”[54]。另一位旅居美国的政治学家马丁·尼德勒（Também Martin C. Needler）认为，古巴革命发展到认同共产党理论及其政府形式的地步并非不可避免。[55]苏联从来不曾把卡斯特罗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仅以非常规方式执行共产党的国际政策方针，而且在因中国持不同政见而发生分裂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注入了新的不和谐因素。[56]客观地说，是艾森豪威尔把卡斯特罗推向了共产主义阵营。他减少了购买古巴蔗糖的配额，中止了对古的石油供应，对其实行武器禁运并筹划入侵行动。苏联坚持和平道路的社会主义被毛泽东斥为修正主义，苏联与中国发生的意识形态冲突等，促使赫鲁晓夫更坚定地支持尽管并不正统的卡斯特罗革命政权。事实上，正如科尔·布莱齐尔所言，并不是卡斯特罗受共产党人支配，反而是他们受卡斯特罗的支配。[57]

与二战后东欧国家发生的革命不同，古巴革命并不是苏联红军干预或克格勃采取“隐蔽行动”的结果。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支持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残酷的独裁政权。古巴一经独

立，美国就对其主权进行侵犯。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的侵略威胁增加了古巴人民对美国的积怨，这成为古巴内外政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美国阻止西欧国家向古巴出售武器等敌视做法使古巴别无选择，只能越来越认同共产主义及其政府形式，以便保证苏联对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支持。尽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不信任卡斯特罗[58]，也不指望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古巴的主要贸易伙伴，但他不能在那种情况下抛弃古巴。距迈阿密仅90英里之遥和在美国势力范围内建立的唯一共产党国家的事实，使古巴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价值，并成为苏联的一张重要战略牌。赫鲁晓夫尽管起初犹豫不定，但最终在冷战背景下将其利用。在艾森豪威尔决定取消给予古巴的70万吨配额而不再进口其蔗糖6天后，赫鲁晓夫不仅宣布把这些蔗糖买下，而且承诺，将用自己的全部核力量支持卡斯特罗革命政府抵御美国的任何武装干涉。他警告说，美国不应忘记，它不再像从前那样让苏联遥不可及。“形象地说”，假如五角大楼“侵略势力”胆敢对古巴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携带弹道导弹的苏联大炮必要时将对古巴人民予以支持。[59]

得到这一尽管是口头的支持后，卡斯特罗有了对抗美国的底气。1960年6月初，他宣布埃德文·斯威特（Edwin L. Sweet）和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 F. Friedman）这两名美国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而将其驱逐，因为两人在与反革命成员会面时被古巴情报机构抓获。[60]6月29日至7月1日，卡斯特罗决定对德士古、埃索（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的工厂进行干预，因为它们拒绝提炼来自苏联的石油，违反了1938年5月9日颁布的《矿产燃料法》。[61]几天后，7月4日，运载7万桶石油的苏联货轮“切沃基号”停泊在哈瓦那港。这是4月17日以来运到的第二船石油。[62]另有17艘货轮尚在途中，它们会在随后的日子里抵达古巴，运来130万桶汽油和石油衍生品，以保证古巴的供应。[63]这样，卡斯特罗挫败了华盛顿政府让德士古、埃索和壳牌公司不接受苏联石油的阴谋。7月6日，艾森豪威尔根据《糖税法》，决定削减给予古巴的310万吨蔗糖配额中的70万吨，这实际上意味着中止古巴对美国的蔗糖出口，因为，此前古巴已向美国运送了230吨。[64]

当1960年3月艾森豪威尔请求国会批准改变蔗糖配额之时，这一措施就在预期之中。削减蔗糖配额是为了促使古巴经济崩溃，动摇其革命政府，为正在准备的军事入侵取得成功创造条件，并对在埃斯卡姆布莱山活动的准军事小组予以支持。但卡斯特罗并没有被吓倒，他在此前就警告说，假如古巴失去部分蔗糖配额，美国将失去在古巴的部分投资，假如古

巴失去全部配额，美国就将失去其约 8 亿美元的全部投资。[65]他说："我们将反击美国采取的措施。我们并不是那样不堪一击，事实恰恰相反。"[66]事实上，就在艾森豪威尔中止进口古巴蔗糖的当天，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Oswaldo Dorticós）总统签署了第 851 号法令，批准革命政府可根据捍卫国家利益的需要，没收属于美国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和企业。[67]通过这一法令，革命政府做好了与美国经济战升级的准备。

第 851 号法令于 1960 年 7 月 6 日生效。面对欣喜若狂的人群，卡斯特罗宣布把包括具有象征意义的联合果品公司在内的 36 家糖厂、两个炼油厂（埃索和德士古）以及电话和电力公司收归国有。它们全部属于美国资本。[68]作为对美国向古巴采取的每一项经济措施的回应，没收进程持续不断。1960 年 10 月 13 日颁布的第 890 号和第 891 号法令，批准革命政府没收制糖企业、酒厂、饮料厂和所有其他工业部门，还批准对银行体系实行国有化。[69]8 月 5 日至 10 月 13 日期间，约 382 家本国和外国私人企业被收归国有。[70]采取这一做法是为了防止它们抵制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10 月 19 日，艾森豪威尔动用《出口管制法》，对向古巴出口的商品（药品和食品除外）实行禁运，这是他采取的首项经济封锁措施。10 月 24 日，卡斯特罗收回了莫阿和尼加罗这两座矿井，这是美国在古巴的最后两份资产。美国损失的投资总额高达约 10 亿美元[71]，比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对它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72]，相当于它在整个美洲投资的 10%[73]。参加下一任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称，艾森豪威尔是让共产主义在古巴扎根的罪魁祸首。面对国内压力，也许是由于不能再竞选连任的处境，艾森豪威尔虽感犹豫，但仍做出了与古巴断交的决定。此前几天，即 1961 年 1 月 2 日，也就是古巴革命胜利的第二个纪念日，卡斯特罗指责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是一个颠覆和间谍中心，要求其将工作人员从几十人减至 11 人，以便与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人数相当。

【注解】

[1] Hull, 1948, vol. 2, p. 1597.

[2] Id., ibid., p. 1597.

[3] Kennedy, 1960, pp. 57–65. Kennedy, 1964, pp. 284–294. Vide também Kissinger, 1994, p. 648. Walton, 1972, p. 13.

[4] Eisenhower, 1963, p. 167.

[5] Kennedy, 1964, p. 289.

[6] Id., ibid., p. 287. Kennedy, 1960, p. 59.

[7] Kennedy, 1964, p. 287.

[8] Ambrose, 1988, pp. 142-144. Hoang Van Chi, 1964, pp. 29-33.

[9] Apud Schlesinger Jr., 1965, pp. 536-537. Kissinger, 1954, pp. 647-649. McNamara, 1996, p. 31.

[10] Eisenhower, 1963, p. 333.

[11] Id., ibid., p. 333.

[12] Id., ibid., p. 341.

[13] Id., ibid., p. 343.

[14] ANZUS（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

[15] Eisenhower, 1963,

[16] Id., ibid., pp. 346-347.

[17] Id., ibid., p. 345.

[18] Id., ibid., p. 353.

[19] 范文同在日内瓦大会上的演讲。*American Imperialism's Intervention in Vietnam*, Hanói, The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5, p. 12.

[20] Karnow, 1997, p. 148.

[21] Kissinger, 1994, p. 628.

[22] Truman, vol. 2, 1956, p. 519.

[23] Giap, 1962, p. 18.

[24] 越盟即越南劳动党，1951 年印度支那共产党采用这一名称。Viet Minh 是 Viet Nam Doc Lap Dong Minh Hoi 的缩写，意为越南独立联盟。它首先抗击日本的占领，二战后又发起针对法国重新统治越南企图的抵抗运动。越盟由胡志明于 1941 年在中国建立。尽管共产党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是一个包含各种倾向的民族主义阵线。1943 年年底，越盟军队在武元甲将军统率下进入越南开始游击战，并占领了北越大部分地区。日本军队被驱逐后，越盟占领河内，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起初承诺对其予以承认，但未履行诺言。1946 年 11 月 23 日，法国舰队攻击海防港，印度支那重燃战火。在乡村拥有广泛支持的越盟改组为越南人民民族阵线这一新组织。越盟军队后来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中与越共联合抗击美国。

[25] 科尔比于 1959—1962 年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后任该机构远东处处长。1968——1971 年，他在越南领导了以杀害共产党人（越共）为目的的“凤凰计划”。据估计，约 6 万人遭杀害。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数字是 20 587 人。1973 年 9 月 4 日，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1975 年，他在弗兰克·邱池担任主席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作证时称，中央情报局的某些行动是“可悲的”、“错误的”，应加以制止。

[26] Colby, 1978, p. 161.

[27] Giap, 1962, p. 185

[28] Id., ibid., pp. 86, 181-185.

[29] 武元甲认为，在所有战线上，法国军队共减员 12 万，177 架飞机被击落或损毁。Id., ibid., p. 187.

[30] 武元甲所指的是在奠边府被俘的 2 000 多名士兵。Id., ibid., p. 186.

[31] 日内瓦大会终结了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占领，承认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独立。后者以北纬 17 度为界分为亲苏联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亲西方的越南共和国。会议决定于 1956 年通过全民公决实现越南的统一。

[32] Eisenhower, 1963, p. 337,

[33] *Pentagon Papers*, 1971, pp. 15-21.

[34] Ibid., pp. 35-38.

[35] Ibid., pp. 44-46.

[36] Ibid., pp. 1, 13-19.

[37] Id., ibid., pp. 22-23. Eisenhower, 1963, pp. 337-338.

[38] Declarção ao *Press Trust India*, 8/10/1954, apud "Statement of the Lawton Collins Mission", Pham Van Dong, in *American Imperialism's intervention in Vietnam*, Hanói, The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5, p. 12.

[39] 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 (Manila Pact), 8/9/1954.

[40] Fulbright, 1982, pp. 141-144.

[41] *Pentagon*, 1971, pp. 26-38.

[42] Ibid., p. 27.

[43] 当每一个企业的生产是完全弹性时，"完美竞争"就能占据主导。这一假设首先要求有很多买主，每一个买主只占该商品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其次要求买主正好对应相互竞争的卖主的选择，也就是说市场是完美的。Robinson, 1969, p. 45.

[44] Kubitschek, vol. III, 1978, p. 64.

[45] *Correio da Manbã*, *Rio de Janeiro*, 9/5/1958, p. 1. Memorandum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 (Sno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May 9, 1958, subject: Vice President Nixon's Trip to South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Files, 003. 1100-NI/5-958, en FRUSS, 1958—1960, vol. V, American Republics, pp. 224, 225.

[46] Memorandum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Among the Minister-Counselor of the Embassy in Venezuela (Burrows),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 (Rubottom) in Caracas,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merican Affairs (Sanders) in Washington, May 13, 1958, 2 p. m.; subject: Attack on Vice President Nixon and His Party.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Files, 033. 1100-NI-1358. Ibid. Memorandum n° Dpo/181, confidencial, Raymundo Nonato L. De Castro, 2° Secretário, chefe da Divisão Política, 17-61958, 600 (45) Situação Política Interna—Venezuela—1951/62—6279. AMRE-B.

[47] Memorandum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Among Capitain Bettinger and Admiral Miller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Navy and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 (Snow), Washington, May 13, 1958, 10: 55 p. m.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Files, 033. 1100-NI/5-858 in FRUS, vol. V, American Republics, pp. 233-235.

[48] Memorandum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 (Sno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ubject: Vice-President's trip to South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 Presidential Cabinet Meetings: Lot 68 D 350, CP-7, Eisenhower Cabinet Material-1958. Ibid. pp. 236-238.

[49] Memorandum, Dpo/181, confidencial, Raymundo Nonato L. De Castro, 2° Secretário, chefe da Divisão Política, 17/6/1958, 600 (45) Situação Política Interna—Venezuela—1951/62—6279. AMRE-B.

[50] Carta de Kubitschek a Eisenhower, Rio de Janeiro, 28/5/1958 in Kubitschek, 1978, vol. Ⅲ, pp. 210-212.

[51]"切"(*Che*)是一个印第安人的称呼，在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的南里约格朗德州很常见，意为"敬爱的"。

[52]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January 2, 1959.

[53] Discurso de Raúl Roa na ONU, 18/7/1960, in Castro et al., 1981, p. 173.

[54] Blasier, 1987, p. 134.

[55] Needler, 1977, p. 33.

[56] Id., ibid., p. 34.

[57] Blasier, 1987, p. 106.

[58] Andrew &Gordievsky, 1991, p. 468

[59]Trecho do discurso in FRUS, vol. Ⅵ, 1958-1959, Cuba, p. 996. Vide taambém Lévesque, 1978, p. 17.

[60] Escalante Fon, 1993, p. 64.

[61] 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政府有需求时，各公司有义务提炼国家的石油。需求额将采取摊派形式。Entrevista de Castro ao Canal 2, em 25 de junho de 1960, in Castro et al., 1981, p. 100.

[62] Cotayo, 1992, p. 45.

[63] Entrevista de Eidel Casrto ã TV Revolución , em 8 de julho de 1960, in Castro et. al., 1981, p. 132.

[64] Notes o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taff Meeting,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July 5, 1960, 9:15 a. m.; Memorandum of a Discussion, White House, Washington, July 6, 1960, 11 a. m.. Subject: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on Cuban Sugar, 11:00 a. m., Wednesday, July 6 1960. FURS, vol. Ⅵ, 1958-1960, Cuba, pp. 976, 979.

[65] Entrevista de Castro ao Canal 2, em 25 de junho de 1960, in Castro et al., 1981, p. 103, 204.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资料，1954 年，美国在古巴的投资迅速增加。据初步估算达 7.13 亿美元，这一金额没有包括在尼加罗（Nicaro）镍厂的投资。分布情况如下：农业 2.72 亿美元，石油 2 700 万美元，工业 5 500 万美元，公共服务 3.03 亿美元，商业 3 500 万美元，其他行业 2 100 万美元。" Id., ibid., p. 103.

[66] Id., ibid., p. 104.

[67] Miranda Bravo, 1996, pp. 31, 103-107.

[68] 国有化通过 1960 年 8 月 6 日颁布的第一号行政令实施，它只涉及 26 家美国企业。Vide Miranda Bravo，1996，Apêndice 2，pp. 103－108.

[69] 第 891 号法令确定了一个补偿体系，通过发行可在 15 年内支付的津贴来实现，这样就把加拿大银行排除在外，对它们所采取的是购买其资产的做法。

[70] Faya & Rodríguez，1996，p. 108.

[71] 1959 年，美国的投资总额大约为 8.5 亿美元。Hansen，1994，p. 22.

[72] Welch Jr.，1985，pp. 61 ，62.

[73] Text of speech by Major Ernesto Guevara，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Bank of Cuba and head of the Cuban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Economic Delegation，Peking，Nov. 21，1960. Report from FBIS（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Ratner & Smith，1997，pp. 57－60. 关于这个主题，可参阅 Moniz Bandeira，1998，pp. 217－295。

第十二章

约翰·肯尼迪的当选　艾森豪威尔对军工集团的警告　入侵古巴　五角大楼企图实施军事干涉的借口　中央情报局的恐怖行动　谋害卡斯特罗的阴谋　肯尼迪与黑手党的关系　美国与拉美军事政变

美国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两周后，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其竞争对手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始终认为，肯尼迪通过在芝加哥、得克萨斯、伊利诺伊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舞弊，才得以在大选中胜出。[1]在告别演说中，艾森豪威尔对“军工集团主动或被动对政府决策机构所施加的不当影响”予以强烈警告。他揭露说，“权力错位灾难性增加的潜力”一贯存在，并仍将继续存在。他认为，“我们不能让军事和工业两者的结合把自由和民主进程置于危险之中”[2]。但美国经济已依赖于1880—1890年间所诞生的军工集团。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加强舰队实力，向重工业和冶金工业订购了数艘战舰。1904—1905年间，海军部得到了7.2亿美元军事总预算中的2.4亿，而当时美国的武装力量还是由一支常设部队和民兵联合组成的混合体。[3]军国主义已成为变卖经济剩余即进行资本积累的最有效途径，而这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和扩张举足轻重。自20世纪初以来，不断为军方和企业家共同经营的军工企业和大宗生意注入养料已成为一种需要，他们刻意制造一种威胁气氛和恐怖环境，以便国会同意向五角大楼和其他与防务有关的机构划拨巨额资金。军工集团“主动或非主动的不当影响”极为强大，以至于为人正直、头脑清醒的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在很多年后怀疑，推动冷战的各种事件背后都有某种奇怪的力量，它们阻碍了美国与苏联达成谅解。富布赖特称，每当两个超级大国要改善关系之时，“就会出现某种不寻常的事情”。他指出：

> U-2事件[4]、肯尼迪之死、冻结核武器运动时期大韩航空公司飞机被击落[5]、“水门事件”，都是为了破坏任何朝着缓和或者控制武器方向的运动。我很难接受这些事件永远是巧合的观点。[6]

富布赖特指出，这不过是他的怀疑，难以证实。但即使那些事件都是巧合，事实上它们都被那些“所谓保守者”所利用。他们认为俄国人是邪恶的化身，向他们做出承诺或与他们发生任何联系就是死罪。[7]他回忆，杜鲁门本人曾评论说，每当与苏联的谅解开始取得某种进展，“某种事情似乎就会发生”[8]。

肯尼迪上任时（1961—1963年），美国拥有大约3万兆吨的核储备，相当于每人10吨TNT炸药。此外，还拥有数百枚洲际和中程导弹、80枚北极星导弹、1 700架洲际轰炸机、300架携带核弹头的舰载战机、1 000架携带核弹头但部署在地面的超音速战机。[9]尽管艾森豪威尔发出了“主动或非主动不当影响”的警告，而且情报机构研究也显示，美国相对苏联已不存在任何“导弹力量的差距”，但肯尼迪仍在两周后向国会提出了追加60亿美元国防预算的请求。6个月后，他再次要求追加35亿美元，并召集15万陆军预备役及10万海军和空军预备役人员。[10]1961年的军费高达496亿美元。五角大楼计划1961—1962财政年度的军费预算为523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的最高军费开支。假如国际紧张局势不出现缓解，军费还会在此后几年中进一步增长。[11]肯尼迪希望美国具备足以让对手打消任何核进攻的念头，或在先遭到核进攻情况下生存下来的战略能力，尽管这种威胁并不存在。肯尼迪通过这一军国主义做法让舆论感到恐慌，促使冷战升级，其目的是为军工集团提供养料。

多个地区冲突导致了与苏联关系的紧张，它们均被肯尼迪加以利用。他通过实施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制定的用一支由中央情报局招募、训练、武装并安置在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秘密基地的流亡古巴人部队入侵古巴的计划，恶化了与卡斯特罗的关系，将其进一步推向苏联怀抱。但他希望对古巴的入侵从表面看是一起内部暴动。他指示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提供由美国飞机、军舰和补给支持的“全方位入侵”的替代方案。同时，他还保留了提前24小时取消古巴“远征军”在猪湾[12]登陆的权力。他决定让“远征军”指挥官们得到美军不会在任何情况下被授权参与入侵的通知。根据这一方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Lyman L. Lemnitzer）指示大西洋舰队司令罗伯特·丹尼森（Robert L. Dennison）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保证美国海军对古巴“远征军”的支

持不被暴露，使政府能“巧言否认”[13]，即令人信服地否认参与入侵行动。

中央情报局所策划的入侵古巴计划事先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首肯。[14]而肯尼迪采取了模棱两可态度。他曾于1958年声称，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是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拉美政策的“根本信条”。但假如任何一个拉美国家落入共产主义之手，那么“不干涉”态度“将会在一夜之间改变”[15]，不干涉原则在美国决定不再遵守它时就不复存在。肯尼迪认为，这一不干涉原则“仅仅是为了掩盖‘非行动政策’（policy of non-actions），或为其寻找借口”。他进一步指出：

> 如果本半球国家不能履行反对外来共产主义渗透的承诺，那么，我要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履行基本责任，以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16]

肯尼迪通过发出这一威胁清楚地表明，拉美人民只有在排除共产党政权或不违背美国利益的情况下，才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府。这样，世界就分割成了明确的势力范围。1957年，苏联在没有联合国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入侵匈牙利，美国未就此做出真正反应，实际上已心照不宣地认可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但肯尼迪还不能下令对古巴进行单边干涉。因为，这样美国就会失去冷战两极并存背景下与苏联对抗中引以为傲的道义和政治权威。美国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曼（Thomas Mann）认为，美国如果采取军事干涉，将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和第五十条、《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十八和第二十五条，以及《里约热内卢条约》第一条。上述条约禁止使用武力，除非是为了抵御武装侵犯的正当自卫。卡斯特罗可依据《里约热内卢条约》第三条第一款，向其他拉美国家求援，以抗击入侵，也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请求安理会干预，以便恢复国际安全与和平。如果这一切付诸现实，那么美国所建立的整个条约和同盟体系将名声扫地、分崩离析。美国如果采取单边军事行动，将公然违背它在推动建立美洲国家组织时在《波哥大纪要》中做出的承诺，使美洲国家体系以及它与各国签订的条约和建立的军事同盟体系受到打击。把对古巴采取军事干涉变成既成事实的可能并不存在，它将在整个拉美掀起以推翻亲美政府为目标的示威活动。此外，美国违反国际法公开卷入对古巴的入侵会给苏联提供报复机会，苏联将会入侵西柏林，或者甚至会侵占土耳其。这样，事态就会失控。[17]肯尼迪一直在寻求与苏联维持现状，他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了艾森豪威尔基于“大规模报

复”威胁的军事主张。因为，他认为核战争将会是自杀行为。鉴于上述考虑，他没有允许美国空军公开卷入对古巴的入侵，美国直接干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官员所希望的局面没有出现。

在卡斯特罗为让苏联对保卫古巴做出更多承诺而宣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61 年 4 月 16 日）并在短短几天内粉碎对猪湾的入侵后，美国感到更为不安。组成 2506 旅的 1 400 名反卡斯特罗古巴人中有 100 人死亡，包括“恢复革命运动”首领曼努埃尔·阿蒂姆（Manuel Artime）和所有高级指挥官在内的 1 189 名入侵者[18]集体向卡斯特罗部队投降。格瓦拉戏称，那是“世界上唯一几乎没有伤亡而整体投降的军队”[19]。美国是最大的输家，招募参加入侵行动的古巴人的方式与中央情报局在推翻阿本斯政府时招募危地马拉人的做法如出一辙。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制定计划并选定了指挥官，然后把他们软禁在奥帕卡洛军事基地（佛罗里达州），与外界隔绝直至入侵之日。皮埃 罗·葛雷 杰西（Piero Gleijeses）精辟地指出，“当我们谈论猪湾时，我们是在谈论美国对古巴的入侵，就像我们从前谈论危地马拉一样”[20]。

当猪湾登陆战失败后，担任总检察长的总统弟弟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提议，政府可以谎称，卡斯特罗政府获得的一两架苏制米格战机攻击了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以便为直接干预古巴找到借口。[21]被美国超级爱国者戏称为“不赢的首脑”[22]的肯尼迪认为，2506 旅的失败是美国的耻辱。在惩罚卡斯特罗的想法的支配下并在极右翼的压力下[23]，他于 4 月 20 日要求五角大楼制定一个美军直接干预古巴的计划。[24]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制造一起事件，以便美军以推翻哈瓦那革命政府为目的的军事介入成为合法战争行动[25]，这样就启动了肯尼迪于 1961 年 11 月批准的“猫鼬计划”。他指定特别行动局副局长兰斯代尔将军设计和统领“遏制和渗透行动”，也就是在其总检察长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的指导下，对古巴发动经济战，实施破坏和渗透，并执行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26]作为反暴动专家，兰斯代尔拥有在菲律宾和越南的丰富经验。他对“猫鼬计划”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央情报局尽管热衷于在古巴开展准军事和破坏行动，但未能营造一个古巴人民能够接受这些行动的氛围。[27]于是，他组建了以策划“猫鼬计划”为目的的 W 行动小组［W 是为了纪念 19 世纪对古巴和中美洲国家发起数次袭击的美国冒险家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这也是美国制定的史无前例的最大秘密行动计划。[28]作为“古巴项目”（“猫鼬计划”）的一部分，五角大楼以“北木行动”为代号，制定了一系列用来作为对古巴进行直接干预借口的方案，其中之一为

制造：

> 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表明古巴飞机攻击并击落了一架从美国飞往牙买加、危地马拉、巴拿马或委内瑞拉民用包机的事件。

将由中央情报局通过无线电引爆这架从美国飞往牙买加、危地马拉、巴拿马或委内瑞拉的飞机。飞机搭载着“一群去度假的中学生或任何有搭乘非固定航班包机共同兴趣的人”[29]。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考虑过将卡纳维拉尔角火箭引爆导致约翰·格伦（John Glenn）死亡的可能。同时，还应制作“数个明显证据证明古巴方面进行的电子干扰”[30]。这样，在美国航天局准备向太空发送首名航天员的同时，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策划利用约翰·格伦之死发动对古巴的战争。[31]在多个借口中也包括五角大楼提议导演一场由一些“友善的”用叛军制服伪装的古巴人对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攻击。[32]这无异于希特勒入侵波兰时“可用作宣传的理由”。也有人提议把在关塔那摩的一艘美国舰只炸毁，并把责任推给卡斯特罗政府。这样就将再现1898年美国用作向西班牙宣战并干预古巴借口的“缅因号”沉没事件。詹姆斯·班福德（James Bamford）认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将军及其所有成员批准的“北木行动”是“……美国政府制定的最腐朽计划”[33]。为欺骗本国舆论，引导它们支持对古巴发动“认识上错误”的战争，军方首领们以反共为幌子，企图进行一场“针对美国本国的秘密血腥恐怖战争”[34]。在美国广播电视公司《夜线》栏目1998年1月29日播出的“如何发动战争：‘猫鼬计划’的弥天大谎”节目中，参与“猫鼬计划”并曾担任里根政府国务卿的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已退役）在接受阿伦·布朗（Aaron Brown）采访时说：

> 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的总统们幻想以将他人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为代价推进其傲慢计划，却向民众隐瞒事实，不向美国人民作任何交代。我认为这是荒谬的行为。[35]

肯尼迪否定了该计划。他向兰尼兹尔将军表示，美国公开对古巴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实际上并不存在。[36]也许因为这一原因，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在其回忆录中恬不知耻地写道，尽管五角大楼制定了各种行动计划，但1962年夏天，肯尼迪政府并无哈瓦

那和莫斯科所想象的入侵那个岛国的意图。[37]但事实上，肯尼迪以及那些提议调整政策以追求亚瑟王圣殿卡米洛特理想的人们，对把“新疆界”延伸至非道德的极限毫不迟疑。消灭哈瓦那革命政府的目的，成为从事各种犯罪活动的借口。曾作为中央情报局高官参与“猫鼬计划”的塞缪尔·哈尔彭（Samuel Halpern）认为，在策划最卑鄙、无耻的阴谋中，想象力无止境可言。“高层们如果不知道总统及其弟弟也卷入其中，就不会参与这些荒唐透顶的行动。”“隐蔽行动”启动时间定于1962年3月，秘密活动将在4—7月逐步展开，8—9月就会出现抵抗和游击行动，10月的头几周将发生全面暴动，月底将有可能建立新政府。[38]兰尼兹尔将军和兰斯代尔将军主张美军公开使用武力，认为应该尽早做出这一至关重要的决定，以便确定美国用以支持古巴起义的部队。[39]

“猫鼬计划”如同一场未宣布的战争。美国政府高层行为如同黑手党家族，他们使用最肮脏和无耻的手法，面对任何犯罪行径毫不犹豫，甚至包括各种恐怖活动，其目的是在古巴造成混乱，引发内部起义，以便为美国进行武装干涉找到借口。美国有意让古巴内部的不满情绪达到极限。为此，它继续支持对古巴境内的恐怖袭击，譬如从“阿尔法66”炮艇向工厂发射炮弹，让反叛小组频繁登陆，送去从事破坏活动的材料并建立地下无线电站点。[40]

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选择是与黑手党头目萨姆·吉安卡纳[41]、约瑟夫·菲斯凯蒂（Joseph Frischetti）和迈耶·兰斯基（Meyer Lansky）[42]等匪帮勾结，目的是暗杀卡斯特罗。据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证实，从1960年起到猪湾登陆和“猫鼬计划”时期，中央情报局一直借助“黑社会人物”从事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43]它在国际走私和洗钱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4]，其首次行动发生于当年7月。从表面看，主意出自中央情报局西半球组长J.C.金（J.C.KING）上校。中央情报局规划部主任助理特雷西·巴恩斯（C.Tracy Barnes）按照他的命令，通过电报告知哈瓦那站，位于兰利的司令部正认真考虑清除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和切·格瓦拉“这三位古巴主要领导人的可能”，批准他们与一位愿意“安排”一起涉及劳尔·卡斯特罗事故的古巴人联系。[45]8月，中央情报局医务部分支机构也接到指示，要求他们把一种致命毒素放入卡斯特罗最喜欢的雪茄盒中。卡斯特罗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可能会收到该盒雪茄。[46]1975年，美国参议院建立的用以调查政府从事的情报活动的专门委员会，至少发现中央情报局参与了8起暗杀卡斯特罗阴谋的具体证据。[47]种种迹象表明，暗杀卡斯特罗的企图和阴谋多达

数十或数百起。[48]

约翰·肯尼迪和鲍勃·肯尼迪一直与黑手党成员及其合作者保持接触，对“斩首行动”或任何其他恐怖行为毫无成见。在其短暂的执政期内，肯尼迪批准的“隐蔽行动”可能多于任何一位二战以来的总统，包括在中美洲挑起战争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49]在其任期头几年，中央情报局向企图刺杀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的反对派提供了步枪、手枪和机枪等各种武器。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还策划了针对海地独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çois Duvalier）的阴谋，以便把入侵古巴作为一个更广泛运动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本大陆所有由独裁政府执政的国家恢复代表性民主。[50]但史蒂芬·拉贝（Stephen C. Rabe）教授认为，肯尼迪政府已意识到军事力量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局限性。美国尽管在那里投入了相当兵力，但“炮舰外交”的遗风未能使那两个加勒比国家避免专制政权。[51]与此同时，美国尽管表面上认为民主、发展经济和社会变革是稳定和抵制共产主义的关键，它却试图推翻阿根廷、巴西和英属圭亚那的立宪政府。[52]

肯尼迪及其领导班子把第三世界国家看作阻止苏联推进的防线，而拉美是“最关键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在肯尼迪执政期间，作为实施对外政策的工具，美国在和平时期开始广泛实施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时，它还着手培养反暴乱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让其接受军事、准军事战术和游击战技术训练，以便对拉美、东亚尤其是非洲各国进行干预。中央情报局在非洲的站点增加了约55.5%。[53]1961年，在肯尼迪知情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参与了对刚果（扎伊尔）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的暗杀行动。中央情报局秘密成员和当地雇佣军肩负着秘密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任务。[54]20世纪60年代，准军事行动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主导性活动，其获得的预算超过心理战和政治行动，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67年。[55]

“隐蔽行动”成为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一种方法。最野蛮、最直接的干涉被称为“特别行动”。这些大多属于准军事或军事性质的活动，由中央情报局聘用的外国和（或）美国雇员或雇佣兵负责实施。[56]中央情报局还在对阿根廷、秘鲁等国的政治犯审讯中，培训拉美国家军人和警察（尽管无须这样做）的审讯技术。他们根据1963年7月的《库巴克反间谍审讯手册》传授被委婉地称为“对抵抗分子强制反情报审讯”的刑讯技术。该手册第24页关于使用电击的内容这样写道：“应该事先了解电流。如有需要，还应持有变压器和其他调节设备。”[57]

古巴革命后，发生在拉美各国的政变并非因为拉美国家固有的内生因素。与其说是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巴西等国的国内政治现象，毋宁说它们更多地代表了冷战背景下的大陆国际政治现象，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推行的西半球安全战略调整的结果。美国对威胁进行了重新定义，以美洲防务委员会1960年12月通过的第47号决议确定的反暴动和“公民行动”主张为依据，把内部敌人作为优先考虑对象。鉴于军队被认为是拉美最稳定的专业群体和现代化的推进者，美国西半球安全战略建议其更多参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巴西常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团团长伊尔马尔·马里尼奥（Ilmar Penna Marinho）大使警告说，在美国施压下建立的美洲防务学院有可能变成一所“政变学院”。[58]在那里，美国实习生和教员极力影响拉美同学和同事，他们公开表示，有必要建立一个集体行动常设体系，以便能够对那些仅依靠本国内部手段难以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进行干预。[59]这样，军国主义开始泛滥，在美洲防务委员会启发下的政变频频发生。事实上，美国推动军事政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配这些国家的外交决策，改变其外交政策方针，以便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政变往往发生在拒绝与古巴断绝关系的国家。尽管肯尼迪将不承认那些通过军事政变或革命、不符合代表性民主政体规章（即不进行自由、定期选举）的政府的方针作为“进步联盟”的前提之一，但恰恰在他执政期间，美国积极鼓励作为最稳定社会组织和现代化推进者的军队，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及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内部扩张为借口，通过爱国和反暴动行动，更多地干预各国内政。美国国防部赋予拉美军人的警察角色，使此前基于“外大陆入侵”假设的西半球安全战略改为反暴动战略。这一新战略把“内部敌人”当作主要威胁，以消灭任何地方出现的颠覆活动并阻止更多卡斯特罗式政体在本大陆出现为目的。因此，不管从治疗还是从预防来看，都应该更富有活力。随着颠覆活动即作为对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内部敌人”的出现，爱国行动和反暴动主张使各国军队受到鼓舞，它们起而反对各自的政府。在它们看来，政府的对外政策要么与共产主义同谋，要么对其推进采取容忍态度。尽管肯尼迪认为代表性民主是打击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并对政变进行谴责，但不久，他便在五角大楼压力下采取了放任态度。根据罗伯特·坎波斯（Roberto Campos）担任大使的巴西驻美国使馆分析，肯尼迪不仅转而承认那些“最糟糕的右翼独裁政权”，还与其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依照军方观点，这些政府比起立宪政府对大陆安全利益更加有用”[60]。

肯尼迪向军政府施压，要求它们在五角大楼支持下建立的政权至少在

表面上保存代表性民主的外壳，其目的是为继续打击古巴和本半球可能出现的任何社会革命寻找借口，同时创造道义条件。美国政府的这一双重性在对待阿根廷（1962年）、秘鲁（1962年）、危地马拉（1963年）和厄瓜多尔（1963年）的军事政变中暴露无遗。

【注解】

[1] Haig, 1992, pp. 329-330. Nixon, 1979, p. 334. Dallek, 2003, pp. 312-313.

[2] “我们必须让政府的各委员会免遭军工集团的不当影响之害，不管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权力错位灾难性增加的潜力一贯存在，并仍将继续存在。我们不能让两者的结合把自由和民主进程置于危险之中。”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Farewell Address, January 17, 1961.

[3] Liebknecht, 1973, pp. 24 e 109.

[4] 1960年5月1日，一架能在不易被监测到的高度飞行的U-2间谍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这一事件导致美、法、英、苏在巴黎举行的首脑会议流产。艾森豪威尔起初否认知晓此类飞行。但苏联把被俘虏的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Francis Gary Power）公之于众。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道歉。后者接受了对方的要求，并下令取消了此类飞行，他表示对那些飞行承担责任。但赫鲁晓夫仍不满意，巴黎首脑会议因此取消。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被判处3年监禁，另加7年强迫劳动。但他只服刑了9个月零9天，因为他被与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Rudolph Ivanovitch Abel）作交换。

[5] 富布赖特指的是从纽约飞往汉城的载有243名乘客和23名机组人员的波音747飞机。飞行员并未注意到侵入了苏联领空，飞机被苏-15和米格-23歼击机击落，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这一事件发生于1978年9月。苏联辩称歼击机飞行员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架民用飞机。苏联与美国的关系因此严重受损。

[6] Fulbright, 1989, p. 24.

[7] Id., ibid., p. 24.

[8] Id., ibid., p. 24.

[9] 他上任时，美国的导弹是苏联的三倍以上，洲际轰炸机比对方多出十多倍。Walton, 1972, pp. 7, 62-67.

[10] Walton, 1972, pp. 87, 92-93.

[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n° 1173-61—Oxford 53201-53176—Address by Roswell L. Gilpatric,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Before the Business Council, Saturday, October 21, 1961. 9:00 P. M. (Est.)—10:00 P. M. (Edt).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2] 这一名称是因为在海湾周围的萨巴塔沼泽中有经常攻击人的野猪。在数百年时间中，在大滩和西隆滩出现了许多渔民的茅屋。西隆滩得名于法国上尉吉尔伯特·西隆（Gilbert Girón）。西班牙人打败他的部队后，将其斩首并将其首级示众以示胜利。美国人不了解萨巴塔半岛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喜欢垂钓的地方。革命胜利后，这里得

到了很多好处。

[13] Memorandum from the Chairman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 (Lemnitzer)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Atlantic (Dennison), CM-197-61. Subject: "Bumpy Road". Washington, April 7, 1961. FRUS, vol. X, pp. 192-193.

[14] McNamara, 1996, pp. 25-26.

[15] Apud Walton, 1972, p. 35.

[16] Id., ibid., p. 50.

[17]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Mann)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Washington, February, 15, 1961. Subject: The March 1960 Plan. Ibid., pp. 95-99.

[18] 古巴革命委员会成员们称，中央情报局所训练和动员的士兵总数达 2 400 人。其中 1 200 人未能登陆就返回了基地，5 名反革命分子逃脱后躲到巴西使馆，仅有 14 人被营救出去，另有数人失踪。古巴政府将其称为“雇佣军”。他们确实领取每月 175 美元的薪水，加上其每个子女 25 美元的额外补助。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ubject: Meeting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ary Council. Washington, May 19, 1961, 4 p. m. FRUS, vol. X, 1961—1962, Cuba, p. 551.

[19] Discurso en Ia Conferencia del Consejo Interamericano Económico y Social de la OEA, Punta del Leste, 8 de agosto del961. in Guevara, vol. Ⅱ, 1991, p. 430.

[20] Blight & Kornbluh, 1998, p. 72.

[21] Memorandum from the Attorney general (Kennedy) to President Kennedy, Washington, April 19, 1961. Ibid., pp. 302-304.

[22] Bamford, 2002, p. 82.

[23] Notes on the 479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otes on Cuban Crisis, Washington, April 27, 1961. Ibid., p. 397. Bamford, 2002, pp. 82-83.

[24] Memorandum from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 to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Lemnitzer), Washington, April 20, 1961. FRUS, vol. X, 1961-1962, Cuba, pp. 396-407.

[25] Memorandum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Earle G. Wheeler)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 JCSM-278-61. Subject: Cuba. Washington, April 26, 1961. Appendix A—Analysis of Courses of Action, ibid., pp. 371-376.

[26] Colby, 1978, p. 190.

[27]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J. S. Earman—Executive Officer), Washington, December 14, 1961. Ibid., pp. 696-699.

[28] 关于这一主题，可参阅 Moniz Bandeira, 1998, pp. 373-409。

[29] Top Secret Special Handling Noform,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13/3/1962; Subject: Justification for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Cuba (TS), L. L. Lemnitzer, Chairman, Joint Chief of Staff. 1 Enclosure—Memo for the Chief of Operations, Cuba Project.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http://www.gwu.edu/~nsarchiv/

news/20010430/doc1. pdf.

[30] Bamford, 2002, p. 84.

[31] Id., ibid., p. 84.

[32] 古巴情报机构已挫败了一起在1961年7月26日庆祝活动中暗杀劳尔·卡斯特罗然后炮击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阴谋。Discurso de Che Guevara en la Cinferencia del Consejo Interamericano Económico y Social da OEA, 8 de agosto de 1961. in Guevara, vol. Ⅱ, 1991, p. 429.

[33] Bamford, 2002, p. 83.

[34] Id., ibid., p. 83.

[35] "How to Start a War: The Bizarre Tale of Operation Mongoose", reportagem apre-sentada no programa de televisão Nightline, da rede ABC nos Estados Unidos, por Aaron Brown, no dia29/1/1998. Cf Ferreira, Argemiro. "Documentos secretos revelam mais truques sujos planejados nos Estados Unidos para derrubar Fidel", *Tribuna da Imprensa*, Rio de Janeiro, 5/1/1998.

[36] Bamford, 2002, p. 87.

[37] McNamara, 1996, p. 339.

[38] Program Review by the Chief of Operations—Operation Mongoose (Lansdale)—The Cuba Project, Washington, February 20, 1962. FRUS, vol. X, 1961-1962, Cuba, pp. 745-747.

[39] Ibid., p. 747.

[40] Telegrama nº 201, confidencial, da Embaixada do Brasil em Havana (Bastian Pin-to), 21-21/18/1963—12hs15. Tekegranas—Recebidos—Havana—1962—1964.

[41] 吉安卡纳在1975年6月20日被暗杀，可能是为了阻止他到调查中央情报局搜集情报和暗杀外国领导人活动的"邱池委员会"作证。

[42] Hersh, 1997, pp. 303-312. Thompson, 1992, p. 141.

[43] U. S. Senate—*Alleged Assassinations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An Interim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November 20, 1975,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 125.

[44] Giancana & Giancana, 1992, p. 310.

[45] U. S. Senate—*Alleged Assassinations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An Interim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November 20, 1975,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72-73.

[46] Powers, 1981, p. 186.

[47] U. S. Senate—*Alleged Assassinations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An Interim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November 20, 1975,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 71.

[48] 根据古巴政府的说法，中央情报局、流亡的古巴人和黑手党卷入了600多

起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阴谋。CountryWatch. http://aol. countrywatch. com/aol_print. asp? vCOUNTRY = 45&SECTION = FREE&TOPIC = POPCO&TYPE = TEXT. Steffan, Heinz Dieterich. "Saramago, Galeano and Fidel Castro". Gramma Internacional Havana. April 24, 2003. http://www. granma. cu/ingles/abril03/jue24/17saram-i. html.

[49] Rabe, 1999, pp. 198-199.

[50]Melo Franco, 1968, pp. 83-84. U. S. Senate—*Alleged Assassinations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 —An Interim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November 20, 1975,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 5.

[51] Rabe, 1999, p. 196.

[52] Id., ibid., pp. 196-199.

[53] *Supplementary Detailed Staff Reports on Foreign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Book IV, 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U. S. Senate. April 23 (under authority of the order of April 14), 1976.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67-68.

[54] Johnson, 1996, p. 38.

[55] *Supplementary Detailed Staff Reports on Foreign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Book IV, 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U. S. Senate. April 23 (under authority of the order of April 14), 1976.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66-68.

[56] Marchetti & Marks, 1974, p. 108.

[57] 中央情报局用1963年的《库巴克反间谍审讯手册》和1983年的《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手册》向拉美和越南军人及安全人员教授各种酷刑。当丑闻在国会和媒体曝光后，中央情报局于1984年重新编写了该手册。应《巴尔的摩太阳报》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的要求，这些文件于1997年被解密。Cohn, Gary; Thompson, Ginger & Mathews, Mark. "Torture was taught by CIA: Declassified manual details the methods used in Honduras; Agency denials refuted". *The Baltimore Sun*, 27/1/1997, Final Edition.

[58] Telegrama nº303. confidencial, da Delegação do Brasil junto à OEA a) embaixador Ilmar Penna Marinlo, Washington, 25-25/6/1962, AHMRE-B, junta Interamericana de Defesa, América, 1961/65.

[59] "Política Externa Norte-Americana, Análise de Alguns Aspectos", Anexo 1 e único ao Ofício nº 516, secreto, da Embaixada em Washington, loc. cit.

[60] "Política Externa Norte-americana—Análise de Alguns Aspectos", Anexo 1e único ao Ofício nº516/900. 1 (22), secreto, Embaixada em Washington ao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Washington, 13/6/1963, AHMRE-B, 900.1(00),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10) a (98), 1951/66.

第十三章

拉美的反美情绪　苏联对卡斯特罗的支持　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　封锁古巴　肯尼迪引发危机的选举目的　核战争风险　受操纵的美洲国家组织　从古巴和土耳其撤出导弹　肯尼迪遭暗杀　黑手党和中央情报局参与谋杀的嫌疑

怀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美国领导人和政治人物从来不承认拉美各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民族主义，总是将其归咎于外来影响（如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并将其看作对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1]他们没有意识到，拉美人民所表现的反美情绪，是美国先前奉行的令中美洲各国和墨西哥首先成为牺牲品的“大棒”政策、“标准石油公司和联合果品公司等美国公司在与拉美各国政府和人民打交道时的傲慢行为，以及为实现垄断目的建立腐败体系”的结果。[2]巴西驻危地马拉的卡洛斯·拉莫斯（Carlos Ramos）公使早在1950年就表达了这一观点。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麦肯（Frank McCann）指出，“美国民族主义变得对其自身和世界如此危险的原因是，它不承认其他国家人民民族主义的合法性”[3]。事实上，由于美国在两极并存的冷战背景下将拉美各国的民族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而不予接受，并对其进行打击，这对拉美各国人民的反感和敌对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拉美各国人民反对肯尼迪在入侵猪湾后以美洲国家组织为掩护试图发动对古巴军事干涉，说明他们对“大棒”政策的不满和对美国政府所作所为的敌对情绪甚于对共产主义影响的恐惧。入侵古巴的威胁未能成为现实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得到大部分拉美国家特别是巴西和墨西哥的支持。它未敢擅自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原因是，它既担心苏联对西柏林或伊朗或土耳其采取报复行动，也担心古巴从社会主义阵营获得的武器和经受革命洗礼的古巴人民的抵抗会使美国付出高昂的生命代价。

1962年，苏联开始在距迈阿密90英里之遥的古巴部署带有核弹头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发射基地，使冷战达到高潮。这些导弹的射程能达到美国主要城市和美加边境。除了保护古巴，苏联的主要目的是，取得与在土耳其和意大利部署“丘比特”导弹的美国的战略平衡。古巴已成为苏联的一张重要战略牌，而在冷战背景下的柏林则构成了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这一原因并考虑到其他因素，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弹道导弹。当时，美国正加紧进行在加勒比海的海上行动。1962年4月9—24日，美国进行了*Lantphibex*1-62海军演习，5月前几周又进行了名为“快速打击”和“鞭打”的两次军演。其中“快速打击”演习共动用79艘舰只、300架飞机和4万多人员，“鞭打”演习是在兰斯代尔将军督导下完成的。

“阿纳德尔行动”包括部署拥有140枚S-75防空导弹的5个导弹团——3个R-12导弹团和2个R-14导弹团。R-14导弹团共拥有70枚导弹和40个弹道导弹发射架。作为苏联军队一个完整兵团的一部分，它还包括4个摩托化团、2个拥有最先进T-55坦克和250辆装甲车的坦克营、最先进的米格—21歼击机、42架伊尔—28轰炸机、带有战术核武器的火箭、12个SA-2导弹编队（144个发射架）和4万名士兵。[4]苏联计划中还包括建造一个可停泊11艘潜艇的海军基地，其中7艘携带100万吨级核弹头的火箭。8月2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架U-2侦察机发现了8个已投入使用的SA-2导弹基地，这清楚地表明了古巴防御能力的巨大提高。这一防御体系还包括建立另外16个SA-2导弹基地。[5]一个带有地对空导弹的海岸防御体系显然只能解释为用于掩护和保护引入地对地弹道导弹的目的。肯尼迪在得到了苏联部署萨姆导弹的首个具体证据后[6]，决定向莫斯科发出警告[7]。

中央情报局增加了对古巴的空中侦察密度。[8]10月14日，理查德·海泽（Richard D. Heyser）少校驾驶U-2侦察机拍摄的928张照片显示了正在皮纳尔·德里奥省罗萨里奥山建设的3个SS-4系列中程弹道导弹基地，这些导弹射程能达到美国东海岸城市。[9]次日，由战略空军司令部军官驾驶的另几架U-2侦察机在瓜纳哈伊发现了中程弹道导弹的第四个基地和2个中短程导弹基地。这些照片经国家照片解读中心分析并与苏联军事情报局上校奥列·佩尼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i）向美国提供的文件对比，确认了那些火箭的存在，同时还显示装有21架伊尔—28中程轰炸机（北约称之为“猎兔”）的箱子的存在。

肯尼迪在得知这些情况后，决定引发一场国际危机。[10]他组建了一个

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小组。他声称，苏联飞机在古巴的出现并不令他感到特别担忧，50 架苏联飞机在古巴的存在不足以危及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实力平衡。但中央情报局认为，如果美国不对苏联在古巴部署战略导弹做出反应，将对拉美产生强烈冲击。因为，这将会造成世界权力平衡已被真正打破而苏联扩张将不可避免的印象。[11]肯尼迪选择了一条后果难以预料的危险道路并非因为出现了对美国实质的威胁，而只是导弹在古巴的出现会让人们觉得，权力平衡已发生改变。[12]

即使部署在古巴的中程弹道导弹能毁灭数个美国城市，但执行委员会中很少有人认为它们会改变世界战略平衡。苏联已拥有能发射弹道导弹的潜艇，这些导弹能打到纽约、华盛顿和其他美国目标。所有人都相信，美国在古巴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弹道导弹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让美国打消进攻古巴的念头，而是指望改变其军事实力的战略劣势。[13]肯尼迪清楚，不管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占有很大优势。美国拥有 400 枚左右，而苏联仅为 78 枚左右。美国还拥有相当数量能够发射导弹的潜艇。它在战略轰炸机上也拥有相当大优势，共有约 1 300 架，而苏联仅有 200 架。[14]苏联完全有权利尝试建立战略平衡，它并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条约或国际法。美国已开了先例，它通过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圈，对苏联形成了包围。这一事件的外交解决方案是存在的，如肯尼迪愿意，可按麦克纳马拉的建议，与赫鲁晓夫通过秘密谈判把导弹撤走，作为交换，美国则撤销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基地。但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或者说，为了弥补入侵猪湾的失败，并使民主党在 11 月国会选举中处于有利地位，肯尼迪做出了把世界推向核屠杀边缘的决定。他把引发导弹危机当作选举中的宣传行动，以便以强势地位与对手展开谈判，来摆脱危机。美国驻印度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承认，国内政治是做出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决定时的更重要的因素。[15]

当执行委员会开会之时，肯尼迪甚至没有中断在美国内地进行的民主党竞选活动，直到 10 月 22 日他才返回华盛顿。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向全国发表讲话的他，看上去“神情疲惫，黑眼圈深陷，嗓音凝重，一副要宣布重大决定的神态”[16]。他在介绍了苏联无视其警告在古巴部署弹道的情况后宣布，美国舰队将不再允许苏联船只在未经检查的情况下驶往古巴岛[17]，以便阻止更多武器运往那里。他下令把各军种国防战备警戒状态级别提高到最高的 3 级。同时，他致函赫鲁晓夫称，美国做好了把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所构成的威胁从西半球清除出去的准备，对古巴封锁是达到这一目的“最基本需要”。[18]赫鲁晓夫回复的语气较为缓和，没有明确

苏联将采取的态度，而只是表示，肯尼迪的做法威胁到各国的和平和安全。他指责美国肆无忌惮地干涉古巴、苏联和其他各国内政，违背《联合国宪章》和规定不允许在国际水域对他国船只进行限制的国际法。[19]

巴西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马里尼奥认为，出于策略考虑，肯尼迪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让那些“不想了解或假装不明白其‘战略迟钝’准确含义的国会议员、极右反动分子和美国部分舆论感到满意”[20]。为了使对古巴的封锁表面上具有合法性，美国政府立即启动了美洲国家组织协商机制。21 日下午，国务卿戴维·鲁斯克（David Dean Rusk）邀请拉美各国大使到国务院，向他们通报了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的决定，并请求各国政府支持美国的行动。显然，在古巴被驱逐出美洲国家组织后，美国能够得到 2/3 的票数，即批准该措施所需的 14 票。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秘鲁和哥伦比亚为美洲国家中的“极右、反动和侵略性国家”，它们甚至支持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以便清除卡斯特罗，阻止共产主义在西半球的渗透”[21]。但是，巴西、智利、墨西哥，可能还包括厄瓜多尔，对封锁古巴投了反对票。[22]但肯尼迪希望以绝对多数通过。为了达到一致同意的目的，他写信给巴西总统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和其他拉美国家领导人，请求得到他们的支持。

古拉特在回信中“坦率和真诚地”表达了巴西的立场，对危机的处理方式和美国操纵美洲国家组织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应“最大程度地”维护各国人民自决的原则。他强调，“以与自己的政体不一致为借口，对美洲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干涉，并通过外部强制方式剥夺其民主特征和合法性，进而把代表性制度强加于人的做法，令巴西人民反感”[23]。

除了对“通过外部强制性方式”强加政体形式做法的反民主性甚至专制性提出批评外，古拉特还对美国“在没有预先进行调查或至少对调查进行商议，也没有尝试巴西在埃斯特角会议（1962 年）上所提议的通过谈判保证互不侵犯以实现古巴非军事化的情况下”，提出封锁古巴并寻求美洲国家组织批准的做法表达了“疑虑和不满”[24]。古拉特直言：“我担心，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已濒临令巴西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感到忧虑的核战争边缘。”他表示不希望对古巴采取军事措施，“使目前已过度严重的事态进一步加剧”[25]。记者塞缪尔·赫什在《卡姆洛特的黑暗一面》一书中表达了类似观点。他指出，“肯尼迪为了赢得政治胜利，去羞辱一个从前曾羞辱自己的对手，把世界推向核战争的边缘”[26]。他强调，“肯尼迪兄弟企图把争端转化为政治资本才使世界濒临战争”[27]，其目的是提高民主

党在11月6日国会选举中的地位。[28]

古拉特的批评并不仅仅限于肯尼迪处理与苏联危机的方法。危机本可以通过与赫鲁晓夫的秘密谈判找到外交解决方案。事实上，最后结局也是如此。古拉特利用这一时机指出了拉美的特有问题，表达了“对美洲国家组织不远将来的担忧”。他认为，随着该组织的决定“以机械多数和毫无理由的仓促”做出，加上“反动性质的另类政体”反而得到“更好待遇”这样一个“不能容忍的意识形态阵营”的趋势，它做出的决定失去了权威性。[29]古拉特在信的结尾对滥用埃斯特角决议表示反对。他指出，该决议并没有赋予美洲国家组织“对任何国家内部事务进行调查”的权力，也没有批准10月12日建立的美洲防务学院。他认为，如果以内部安全名义探讨“属于各国个体范畴的问题”，其效果必将是负面的。在这类问题上，军人应该接受纯属本国的培训和指导。[30]

尽管对肯尼迪的行为提出批评，但古拉特也表达了与美国合作的良好意愿。他指示巴西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马里尼奥同意封锁决议，但只允许对船只是否装运进攻性武器进行检查，任何其他军事性质的行动都必须预先经联合国相关委员会的调查，证据必须确凿无疑。[31]古拉特还在美国国务院的请求下，派遣总统府军办主任阿尔比诺·席尔瓦（Albino Silva）将军到哈瓦那。与此同时，巴西外交部指示巴斯琴·平托（Bastian Pinto）大使立即去做卡斯特罗的工作，呼吁他停止建造导弹发射场，因为巴西政府得到确切情报，美国政府准备在48小时内对古巴动武。停止工程是阻止战争的唯一选择。[32]卡斯特罗立即致函赫鲁晓夫，向他建议，一旦美国入侵古巴，苏联应该对美国发动一次预防性打击。虽然后来他否认有此意图。[33]但赫鲁晓夫的确这样理解，并自然感到吃惊。[34]但卡斯特罗并不知道苏联相比美国的军事劣势巨大。[35]正如罗伯特·坎波斯大使向古拉特报告的那样，即使苏联首先发动攻击，并破坏美国60%的核能力，美国剩余的核能力仍足以彻底摧毁对方。[36]

然而，不管美国事实上拥有多大优势，一场核战争的风险完全超出其预料的可控范围。当代价为完全摧毁一个社会或更准确地说一个文明时，即使只有5%的风险，也难以容忍。[37]中央情报局证实，古巴的24个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已完全处于运作状态，可能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能对古巴进行报复性打击的发射场。[38]据估计，在古巴部署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占苏联所拥有洲际战略导弹能力的一半。照片显示，所有导弹都对准美国的一些城市。如果发射，能在短短几分钟内造成8 000万美国人丧生。[39]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沃尔特·斯威尼（Walter Sweeney）将军认为，即便美

国空中打击获得“成功”，但美国所了解的部署在古巴岛的导弹可能还不足总数的60%。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认为，美军只能摧毁部署在岛上的90%的导弹。[40]

斯威尼将军和总统当时的军事顾问泰勒将军以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致认为，在发起第一轮攻击后的几天中，打击行动应持续进行，直至攻入古巴。华盛顿一些军方和非军方人士有意发起的入侵古巴行动，不仅会使无数美国士兵丧生，核战争也将在所难免。古巴政府从来没有排除美国入侵的可能性。至1962年7月，它共进口3.5亿美元的武器和弹药，包括超音速米格战机、坦克、30艘反鱼雷艇和用于海岸防卫的大炮。这使它拥有整个拉美地区最好和最训练有素的军队，它由30万左右的民兵（有可能达到50万）和包括3.5万前“起义军”在内的4万正规军组成。[41]苏联则必须在发射已部署的导弹和让其落入美国人手中之间做出抉择。[42]苏联用核武器进行报复的可能使肯尼迪陷入了极大矛盾。[43]射程达1 100英里的苏联导弹能打到一个拥有9 200万人口的区域。[44]美国人将会首次看到炮火“雨点般落到他们头上”[45]，那将使美国遭受在之前参与的所有战争中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破坏。即便最终获胜，美国也将付出极高的生命和财产代价。这肯定不是肯尼迪想推出的节目，他的主要目的是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保证1964年连任。可能他还有让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接班的打算。因此，他强调，眼前的目标不是让卡斯特罗下台，而是让苏联撤走部署在古巴的战略导弹。[46]

与肯尼迪一样，赫鲁晓夫也无意挑起核战争。他没有采纳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里·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和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Vassily Kuznetsov）让他首先关闭西方各国与西柏林陆路通道作为报复的建议。[47]赫鲁晓夫在答复库兹涅佐夫时表示，“我们正在这里努力摆脱这一可怕的游戏，而你则想把我们推向另一个游戏”[48]。10月24日，他命令向古巴运送R-14导弹的“阿尔梅特夫斯克号”、“尼库拉耶夫号”、“杜布纳号”和“迪温诺戈尔斯克号”继续留在航线上，但减缓航速，以免触及可能导致与美军发生摩擦的封锁线。他还要求其余船只返回苏联。装载军火的“波尔塔瓦号”和“基莫夫斯克号”也没有挑战美军封锁而改道航行。肯尼迪允许民主德国的一艘客轮和罗马尼亚的一艘油轮通过，没有对它们进行登船检查。同时，他尝试通过秘密谈判解决危机。在经历13天的煎熬后，部分通过非官方途径进行的秘密谈判[49]为打破僵局找到了出路。赫鲁晓夫同意拆除发射平台，从古巴撤走弹道导弹。肯尼迪则承诺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并不再发动对古巴的侵略。[50]此外，虽

然因担心造成北约分歧而不能公开宣布，但肯尼迪还是做出了在四五个月内把部署在土耳其的丘比特导弹（约 30 枚）撤走的承诺。[51]在执行委员会中只有四五个人了解讨价还价的条件。[52]肯尼迪有潜在的对手，如副总统林登·约翰逊（Lydon B. Johnson）、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克恩（John McCone），也许还包括麦克斯维尔·泰勒等，这些人会通过向新闻界透露信息而毁掉他的政治生涯。[53]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所达成的协议以牺牲卡斯特罗为代价，撤走导弹一事甚至未征求他的意见。入侵古巴计划虽被束之高阁，但破坏和其他恐怖活动并未因此停息。1963 年 10 月 3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小组批准了另外 9 项“隐蔽行动”，其中多项为破坏行动。10 月份批准的 22 项恐怖行动包括破坏一个电站、一个炼油厂和一个糖厂，目的是动摇卡斯特罗政权。[54]谋害卡斯特罗的阴谋也没有停息。10 月 28 日，中央情报局“W 古巴行动小组”组长代斯蒙·菲茨杰拉德（Desmond Fitzgerald）作为肯尼迪私人的代表，与古巴革命领导委员会前领导人、古巴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罗兰多·库贝拉（Rolando Cubela Secades）在巴黎会晤[55]，策划代号为 AM/LASH 的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56]肯尼迪对记者塔德·肖尔茨（Tad Szulc）表示，一些助手向他施压，让他下令清除卡斯特罗。但他认为，“由于道义上的原因”，美国不应参与暗杀。[57]他也对助手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N. Goodwin）说过，“我们不能卷入此类事情，否则我们所有人都将成为目标”。肯尼迪这番言论也许是为了掩饰其真实意图。中央情报局策划推翻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特鲁希略政变（1961 年）时，他曾亲口说过，“作为总体政策，美国不能宽恕暗杀行为”[58]。

种种迹象表明，在考虑到政治和生命代价而与苏联达成协议放弃入侵计划后，肯尼迪使用了一切手段来解决古巴问题。在中央情报局保留暗杀计划的同时，他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的副手威廉·爱特伍德（William Attwood）大使探讨与卡斯特罗维持现状的可能性，目的是让余下的苏联军人撤离，使其停止在拉美的颠覆活动，实现古巴中立。[59]他还委托途经华盛顿前往哈瓦那的法国记者、《快报》国际编辑让·丹尼尔（Jean Daniel），在采访卡斯特罗时探其口风，看他是否有意像南斯拉夫那样走不结盟路线，以便实现古美关系正常化。[60]丹尼尔 11 月 19 日首次采访了卡斯特罗。11 月 22 日，他进行了第二次采访。巧合的是，就在这一天，中央情报局人员费兹杰罗在巴黎把一支带有毒镖的钢笔交给罗兰多·库贝拉，用于射杀卡斯特罗。同日，肯尼迪在达拉斯遭李·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暗杀。此时距

他下令处决南越总统吴庭艳才过去 20 天。当时正在巴拉德罗与丹尼尔共进午餐的卡斯特罗感慨道："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情报局和黑手党参与了暗杀肯尼迪这一个体恐怖主义阴谋。[61]据黑帮头目萨姆·吉安卡纳称，凶手奥斯瓦尔德曾是中央情报局成员，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他参加过一系列情报方面的强化训练，并在苏联从事过间谍活动。他自青年时代起就与黑手党有关系。[62]这些背景使他成为在暗杀肯尼迪阴谋中扮演恐怖分子角色最合适的人选。[63]他当时已与苏联人玛丽娜·普鲁萨科娃（Marina Prusakova）结婚，并已在几年前定居明斯克。公开表示拥护卡斯特罗的他，不仅在美国散发"争取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64]的宣传材料，而且在返回苏联时，在墨西哥坚持要求获得访问哈瓦那的签证（尽管数次遭拒签）。[65]他与范·卢贝有相似特征。后者曾参加共产党，是纳粹头目戈培尔和戈林策划的国会纵火案的主犯。[66]该事件使希特勒在未对《魏玛宪法》作任何修改的情况下就大权独揽，并建立独裁政府。坚持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的众议院遇刺案特别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布莱基（G. Robert Blakey）和《委员会之家》杂志主编、《生活》杂志前社长理查德·比林斯（Richard N. Billings）也得出了相似结论。他们认为，奥斯瓦尔德与反卡斯特罗积极分子和有组织犯罪团伙关系密切。他们声称："我们通过调查得出结论，犯罪团伙插手了肯尼迪总统的谋杀案。"[67]

肯尼迪遭暗杀后，中央情报局所做的一个备忘录中的信息表明，凶手奥斯瓦尔德 9 月 23 日—10 月 2 日曾到过墨西哥，拜访过副领事柯斯蒂柯夫（Kostikov）。[68]此人是有名的克格勃成员和破坏活动专家。中央情报局在该备忘录中预言，假如奥斯瓦尔德确实卷入了一场外来阴谋，那么他将遭暗杀，以避免他向美国当局说出真相。预言得到了应验。11 月 24 日，奥斯瓦尔德被杰克·鲁比（Jack Ruby）杀害。鲁比是达拉斯赌场老板，与芝加哥犯罪集团有关系[69]，并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独裁期间为黑手党工作，从古巴走私钞票。枪杀就发生在警察局。目光冷酷的调查人员拽住奥斯瓦尔德，似乎要阻止他的反抗。将其清除显然是阴谋策划者不想让他揭穿整个阴谋。[70]萨姆·吉安卡纳向为他写回忆录的兄弟查克（Chuck）透露，他亲自选定杰克·鲁比来完成使命，这一选择是鉴于他在入侵猪湾期间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并与达拉斯警方关系密切。[71]吉安卡纳称，参与暗杀肯尼迪阴谋的每一个人均获得 5 万美元，而他本人则"从富裕的得克萨斯右翼石油商那里"得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石油。[72]然而，这一阴谋不仅仅局限于特拉菲坎特（Santo Trafficante）、

吉米·霍法（Jimmy Hoffa）、萨姆·吉安卡纳和约翰尼·罗塞利（Johnny Roselli）以及配合他们的富兰克·斯特吉斯（Frank Fiorini Sturgis）。后者曾在猪湾入侵中为中央情报局效力，并招募玛丽塔·洛伦茨（Marita Lorenz）去对卡斯特罗下毒。[73]吉安卡纳称，“恰恰是中央情报局高层”策划了这场阴谋，包括“6位得克萨斯狂热右翼分子、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和猪湾行动中地位仅次于艾森豪威尔的尼克松”。[74]

种种迹象表明，与犯罪团伙同样保持密切关系的奥斯瓦尔德，被有意塑造成为卡斯特罗工作的人员，这样就能造成舆论一片哗然，为美国实施报复和入侵古巴找到借口。这是黑手党、中央情报局“古巴项目策划者”和五角大楼的共同梦想。[75]他们难以接受肯尼迪通过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的副手爱特伍德大使所进行的与卡斯特罗达成维持现状的努力。肯尼迪遗孀杰奎林·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与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等人的观点不同，她确信自己的丈夫并非死于共产党之手，而是一起国内阴谋的牺牲品。罗伯特·肯尼迪没有深究哥哥死亡背后的真相。假如他能在1968年成为美国总统，他也不会那样做。谁也不想揭开肯尼迪与黑手党的关系和谋害卡斯特罗的阴谋，因为那样做会使中央情报局受到损害。约翰逊则确信苏联和古巴参与了杀害肯尼迪的行动，他担心更深入的调查会揭示这一点，从而使一场核战争无法避免。[76]

据黑格将军回忆，约翰逊[77]临终前依然坚信，罗伯特·肯尼迪希望清除卡斯特罗的“着魔念头”致使肯尼迪遭暗杀。黑格认为，沃伦委员会和公众舆论都不知道策划暗杀古巴领导人行动秘密组织的存在。“这是真正要掩盖的根源，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已故总统的名声。”[78]记者塞缪尔·赫什认为，一场“全面调查”的代价“太高”，因为它会使有关肯尼迪和肯尼迪家族的真相公之于众[79]，会揭露肯尼迪与萨姆·吉安卡纳、约翰尼·罗塞利和那些因遭总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调查而觉得被出卖的黑帮们之间的关系。这肯定是罗伯特·肯尼迪拒绝到沃伦委员会作证的原因。[80]

不管如何，如果肯尼迪暗杀行动策划者[81]的目的是促使美国入侵古巴，那么，他们的打算落空了。副总统林登·约翰逊（1963—1968年）继任总统。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他没有像2506旅在猪湾遭到耻辱性失败后充满强烈报复情绪的肯尼迪兄弟那样过多关注与古巴的冲突。1964年4月7日，他下令中央情报局停止破坏行动，不再参与对古巴的“袭击”，还取消了肯尼迪时期制定的在1964年3—6月第二次入侵古巴的计划。[82]

【注解】

[1] Black，1986，pp. 9-10.

[2] Ofício nº 221. secreto，Ministro Carlos da Silveira Martins Ramos ao chanceler Raul Fernandes，Guatemala，26/8/1950. MD Secretos—A-K—Ofícios Recebidos—1950-1957. AMRE—B.

[3] 2002 年 6 月 4 日与作者的通信。

[4] 古巴中央委员会委员豪尔赫·瓦尔德斯（Jorge Risquet Valdés）于 1995 年 12 月在哈瓦那接受作者的采访。Fursenko & Naftali，1997，p. 189. May & Zelikox，1997，pp. 676 e 677.

[5]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Director for Intelligence (Cline) to Acting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Carter. Subject：Recent Soviet Military Activities in Cuba. Washington，September 3，1962. FRUS，vol. X，1961-1962，Cuba，pp. 1033 a 1034.

[6] Walton，1972，p. 109.

[7] Schlesinger Jr.，1965.

[8] CIA—Information Report. Subject：Possible Missile Site in Havana，27 Sep 62；CIA—Information Report. Subject：Soviet and Rebel Army Convoy，1 Oct 62. I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Document*，Brassey's (US)，McLean，Virginia，1994，pp. 38-40.

[9]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Memorandum：Probable Soviet MRBM in Cuba，16 October，1962. Ibid.，pp. 127-137. McNamara，1996，pp. 338-339.

[10] 更多细节可参阅 Moniz Bandeira，1998，pp. 425-454。

[11] May & Zelikow，1997，pp. 196 e 230. Walton，1972，pp. 121-123.

[12] Kennedy，*Public Papers*，1962，p. 898. Vide também Walton，1972，pp. 122-123.

[13] Garthoff，1989，pp. 45-46.

[14] Gates，1997，pp. 28-29.

[15] Lechuga，1995，p. 70.

[16] 阿丰索·佛朗哥（Afonso Franco）的叙述。他作为巴西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收看了肯尼迪的电视讲话。Melo Franco，1968，p. 254.

[17] Radio -TV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Nation from the White House—October 22，1962，in Chang & Kornbluh，1992，pp. 150-154.

[18]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Chairman Khrushchev，Washington，October 22，1962. FRUS，vol. VI，Kennedy—Khrushchev Exchanges，1961 - 1963，pp. 165 e 166.

[19] Telegram n° 1042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oscow，October 23，1962—5 p. M. Ibid.，pp. 166 e 167.

[20] Telegrama nº 469，confidencial da Delegação do Brasil junto à OEA—Washington (Ilmar Penna Marinho)，28/9/1962—15h30. 961—Organização dos Estados Ameri-

canos—1961-1963. Ibid.

[21] Telegrama nº457, confidencial, da Delegação do Brasil junto à OEA—Washington (Ilmar Penna Marinho), 22-23/11/1962. 600 (24h) Siruação Política—Cuba—abril-setembro de 1962-6221. Ibid.

[22] May & Zelikow, 1997, p. 146.

[23] Carta do presidente Goulart ao presidente Kennedy, Brasília, 24/10/1962, Secreto MRE/SSE/124/920. (42)(22), cópia. Anexo único, AHMRE-B, 600. (24h), Situação Política—outubro de 1962. Uma cópia da catra bem como a minuta elaborada por San Tiago Dantas encontram-se em AN-ASTD-AP 47 (36) pac. 03 As anotações iniciais, do próprio punho de Goulart, estão na DJG, com o autor.

[24] Carta do presidente João Goulart ao Presdente John Kennedy, Brasília, 24/10/1962. AP47—APFCSD—SDP—AN.

[25] Ibid.

[26] Hersh, 1997, p. 345.

[27] Id., ibid., p. 369.

[28] 民主党在参议院获得4个席位，但在众议院丢掉了6个席位，这是1934年以来最好的表现。其中一位获胜者是爱德华·肯尼迪。代表马萨诸塞州的他成为最年轻的参议员。落选者中的一位是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霍默·卡佩哈特（Homer Capehart），他一直批评肯尼迪对卡斯特罗采取温和态度。

[29] Carta do presidente João Goulart ao presidente John Kennedy, Brasília, 24/10/1962. AP47—APFCSD—SDP—AN.

[30] Ibid.，关于美洲国家组织的更多细节，可参阅 Moniz Bandeira, 1998, pp. 462-465. Moniz Bandeira, 2001, pp. 87-93。

[31] Integra das instruções do próprio punho de Goulart in Lima, 1974, p269.

[32] Telegrama nº 169, secreto—urgentíssimo, do Itamaraty para a Embaixada do Brasil em Havana, 26/10/1962. Telegramas—Expedidos—Havana—1962. AHMRE-B

[33] Entrevista de Fidel Castro a Maria Shriver, a NBC, in Castro, 1993, pp. 51-53.

[34] Khruchchev, 1990, pp. 224 e 225.

[35] Entrevista de Fidel Castro a Maria Shriver. da NBC, in Castro, 1993, pp. 59-61.

[36] Campos, 1994, p. 495.

[37] Kissinger, 1994, p. 586.

[38]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Memorandum, The Crisis USSR/Cuba, 27 Oct. 1962, prepared fo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upplement 8 to Joint Evaluation of Soviet Missile Threat in Cuba, 28 Oct. 1962, prepared by Guided Missile and Astronautics Intelligence Committee—Joint Atomic Energy Intelligence Committee—National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Center. In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Document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rassey's (US), 1994, pp. 327-329 e 337-340.

[39] Kennedy, 1969, pp. 35 e 36.

[40] May & Zelikow, 1997, pp. 205 e 206.

[41] Ofício nº 239, secreto, de Bastian Pinto ao embaixador Carlos Alfredo Bernardes, ministro de Estado (Interin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Havana, 15/9/1962. 600 (24h) —Situação Pilítica—Outubro—1962. AHMRE-B.

[42] McNamara, 1996, pp. 340-341.

[43] Bamford, 2002, p. 115.

[44] Id., ibid., p. 115.

[45] Khrushchev, 1991, pp. 222 e 223.

[46] May & Zelikow, 1997, p. 476.

[47] Zubok & Pleshakov, 1996, p. 260.

[48] Id., ibid., pp. 260 e 261.

[49] 细节可参阅 Moniz Bandeira, 1998, pp. 455-492.

[50] Telegram n° 1050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October 27, 1962—8:05 p. m. FRUS, vol. VI, Kennedy—Khrushchev Exchanges, 1961—1963, pp. 81 e 182. Texto também transcrito in May & Zelikow, 1997, pp. 603 e 604.

[51] Kennedy, 1969, pp. 101 e 102. Nash, 1997, p. 136.

[52] Id., ibid., pp. 107-109. McNamara, 1996, p. 96. Dobrynin, 1995, pp. 89-91. Nash, 1997, pp. 141-142. Moniz Bandeira, 1998, pp. 468-475.

[53] Thompson, 1992, pp. 329 e 330.

[54] Ibid., pp. 173-176.

[55] 库贝拉是一名医生，在反对巴蒂斯塔运动中，他指挥了古巴中部山区革命领导委员会的游击队。古巴政府对他十分信任，任命他为古巴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代表。中央情报局于 1961 年对他进行了策反。即使在肯尼迪死后，该阴谋仍继续进行。Szulc, 1987, pp. 59 e 60. Garthoff, 1989, p. 138.

[56] U. S. Senate—*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 pp. 174-180. Powers, 1979, pp. 191-194. Hersh, 1997, pp. 440, 447 e 448.

[57] 记者肖尔茨认为，中央情报局的 AM/LASH 计划极为保密，以至于肯尼迪本人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 (Dean Rusk) 和麦克乔治·邦迪 (McGeorges Bundy) 在参议院作证时均认为，很难想象当威廉·阿特伍德 (William Attwood) 大使正努力使古美关系正常化之际，肯尼迪会允许用阴谋手段谋害菲德尔·卡斯特罗。U. S. Senate—*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 pp. 205, 173-176.

[58] Ibid., p. 205.

[59] Memorandum by William Attwood, Washington, September 18, 1963; Memo-

randum for the Record. Subject: Minutes of the Special Meeting of the Special Group, 5 November 1963. Washington, November 5, 1963; Memorandum from William Attwood to Gordon Chas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New York, November 8, 1963. Ibid. pp. 868-870, 878 e 879.

[60] Schlesinger Jr., 1965, pp. 998 - 1000. U. S. Senate—*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 pp. 173 e 176.

[61] Ibid., pp. 173 e 174 e 176. Schlesinger Jr., 1965, p. 1029.

[62] Giancana & Giancana, 1992, pp. 330-333.

[63] 吉安卡纳解释说，奥斯瓦尔德自始至终效力于中央情报局，从来就没有对卡斯特罗有好感。他是海军陆战队队员，曾为打入苏联接受了俄语培训。Hinckle & Turner, 1992, pp. 271 e 272.

[64] 美国国内声援古巴的运动大多得到社会工人党（托洛茨基派）和共产党的支持。种种迹象表明，是哈瓦那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

[65] Hinckle & Turner, 1992, p. 241. Dobrynin, 1995, p. 112.

[66] 1933年，“盖世太保”按纳粹头目戈培尔和戈林的授意，引诱患有精神病的共产党人范·卢贝到国会纵火，这使得希特勒无须对《魏玛宪法》作任何修改就合法地建立了一个极权政府。

[67] Blakey & Billings, 1981, pp. 177-180.

[68] U. S. Senate—*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Performance of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Book V, 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pril 23, 1976, pp. 91 e 92.

[69] Hersh, 1997, pp. 450 e 451. Hinckle & Turner, 1992, p. 246.

[70] Vide Bakley & Billings, 1981, p. 279.

[71] Giancana & Giancana, 1992, pp. 330-333.

[72] Id., ibid., p. 332.

[73] 斯特吉斯是1962年闯入位于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5人之一。

[74] Giancana & Giancana, 1991, p. 333.

[75] Hinckle & Turner, 1992, p. 239.

[76] Trento, 2001, pp. 265-270.

[77] 约翰逊在肯尼迪遭暗杀后评论说：“肯尼迪试图要卡斯特罗的命，但卡斯特罗先干掉了肯尼迪。” Haig, 1992, p. 114.

[78] Id., ibid., p. 115.

[79] Hersh, 1997, p. 456.

[80] 调查肯尼迪总统遇刺案的沃伦委员会是通过约翰逊总统的一项行政令设立，它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担任主席。它做出的肯尼迪遇害是奥斯瓦尔德个人行为的结论无法令人信服，争论一直不断。

[81] 几天后，奥斯瓦尔德当着警察的面被杰克·鲁比杀害。联邦调查局的结论

是，两人所为均属独立行动，不存在任何国内和国际阴谋。沃伦委员会也认可这一结论。但约翰逊一直没有被说服。他继续对奥斯瓦尔德杀害肯尼迪的原因进行调查。赫鲁晓夫也不相信，认为官方说法是造假。迈克尔·贝斯洛斯（Michael Beschloss）评论说，假如美国人民在1963年的最后几周得知中央情报局与黑手党联手企图谋杀菲德尔·卡斯特罗，而这一行动可能导致了肯尼迪总统的死亡，那么有人可能要求将中央情报局成员碎尸万段，并将他们从窗户扔出去。Beschloss，1997，p. 687.

[82] 约翰逊做出这个决定并非因为尊重古巴主权，而是因为他所憎恨的罗伯特·肯尼迪策划了这一计划。

第十四章

美国、古巴和柏林问题　肯尼迪对游击战的担忧　作为冷战组成部分的民族解放战争　老挝战争　越南的卷入　中央情报局和吴庭艳遇害　约翰逊和越南战争升级　对北越的挑衅　东京湾事件

苏联未能让美、英、法三国放弃深入到后来成为民主德国的苏占区约110英里的西柏林。同样，美国也未能实施“全面入侵”古巴的单边行动。自托马斯·杰弗逊和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起，美国人就一直想把古巴纳入美国版图，将其视为北美大陆的组成部分和美国的“天然疆界”。此外，古巴对美国在墨西哥湾的战略安全来说也必不可少。[1]有三个重要因素制约了肯尼迪，使他未屈从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压力：缺乏美洲国家组织的合法庇护，尤其是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国的反对；担心未经美洲国家组织首肯采取单边入侵行动，会招致苏联对柏林和（或）土耳其采取报复；古巴人民得益于革命胜利并依靠获得的武器将进行的抵抗，会让美国人付出难以估量的生命代价。围绕1961年8月13日建造的把城市一分为二的柏林墙的冲突和1962年10月的导弹危机，使两个超级大国的庞大军事实力的政治局限性暴露无遗，并成为冷战的巅峰，此后冷战逐步趋缓。古巴革命政权已是既成事实，但华盛顿需要寻找新的幽灵和新的威胁，使美国能保持并扩大国防预算，以便让五角大楼和军工企业受益。此时，美国的关注点已越来越从古巴转向越南。曾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服役的海军陆战队上校威廉·科森（William R. Corson）指出，自肯尼迪上台后，五角大楼首脑们就在“推动一场大表演和大战争”[2]。

肯尼迪早就意识到，苏联和中国的扩张不会通过常规战争或核战争，而是借助游击战。因此，不管美国的战略实力有多强，它也会被“颠覆、

渗透、恐吓、间接或非公开侵略、内部革命、外交讹诈和游击战等力量”所侵蚀。这些威胁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和政治改革，使受害者提高自卫能力加以克服。[3]他明白，游击战争主要是政治战争，与苏联的争夺和民族解放战争，是冷战的两个战场。他自执政起就以治疗和预防并用战略打击共产主义，使其上升到新的军事层面，以便提高美国对付“自1945年以来已构成对自由世界最常见威胁”的低强度冲突，包括游击战形式的地方冲突或有限战争的能力。[4]事实上，技术发展取得的极强毁灭能力，使两个超级大国处于相持状态，双方之间的直接冲突可能已基本不存在。按麦克纳马拉的说法，已“不可想象”。因而，冷战呈现了不同特点，如低强度战争和内部战争，即民族解放战争。尽管共产党在每个国家内部支持和（或）领导民族解放战争，但这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反殖民主义的战争。理查德·沃尔顿（Richard J. Walton）认为，肯尼迪踏上了比艾森豪威尔批准的任何政策危险得多的反共进程。[5]他应对了古巴问题，加深了美国在东南亚的“过度承诺”。在那里，美国人违反日内瓦达成的协议，试图让老挝成为它在冷战中的走卒。自1954年起，美国向老挝提供了价值3亿多美元的武器，使其成为世界上人均接受军援最多的国家。[6]

20世纪6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让人民相信，当贡勒（Kong Le）将军发动推翻得到美国资助的诺萨万（Boun Oum-Phoumi Nosavan）将军的政变，并让1958年下台的梭发那·富马（Souvana Phouma）亲王组建一个中立政府时，共产党入侵了老挝。从此，中央情报局在该国的活动更加频繁，它不仅向反对富马亲王的部落提供支持，还进入北越境内，从事破坏、暗杀和其他各种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对在万象扎营的诺萨万将军的支持，促使贡勒将军和富马的中立政府与北越和苏联支持的巴特寮[7]结成同盟。力量平衡被打破，天平开始倾向共产党。种种迹象表明，当肯尼迪1961年1月20日就任总统时，只有美国军队直接介入才能阻止巴特寮占领万象和位于老泰边境正发生“秘密战争”的湄公河谷地区。诺萨万将军的军队在南塔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同意参加和其他两派（富马和巴特寮）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由包括北越和美国在内的14个国家签署的《老挝中立宣言》使冲突停息，但那只是暂时的停息。北越和美国均未履行在日内瓦所作的承诺。北越没有撤出驻扎在老挝的7 000名士兵。[8]美国政府除了继续向老挝王国提供支持外，还通过泰国的乌隆他尼基地继续资助和组织“地下武装”。这支由30 000～36 000名非正规军人组成的秘密军队[9]包括由美军特种部队训练、由王宝将军统率的9 000名苗族游击队员。中央情报局还出资招募了泰国飞行员，让他们驾驶涂有老挝空军标志的老

式 T-28 轰炸机攻击本国境内的目标。

肯尼迪政府的决策者们得出结论，老挝似乎对遏制共产主义没有太大价值。美国在老挝右翼势力身上花费 5 亿美元后，与苏联在日内瓦达成了一项协议，承认富马领导的老挝政府的独立和中立。但更复杂的问题开始在南越呈现。美国此前已承诺将促进越南共和国（南越）的发展，并使其成为“一个强大国家，能够抵御试图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颠覆或侵略”[10]。南越由美国一手扶持，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签署《日内瓦协议》，他自 1955 年起大力扶持吴庭艳将军领导的专横、腐败政府，向其提供资金，并帮助他建立自己的军队。兰斯代尔接受了这一使命。作为反暴乱专家，他很快招募了一批秘密成员去虐待、抓捕和杀害南越政权的反对者。[11]与此同时，集中在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美国专家负责培训当地警察，指导他们如何“监控人群、检查护照和审讯可疑人员”[12]。

但美国在南越所从事的一切“国家重建”工作，未能阻止反抗吴庭艳专制政权暴动的发生。1961 年，由越共[13]成员组成的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游击战迅猛开展。尽管美国在 1955—1962 年间已在印度支那投入 70 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南越政权的巩固已变得十分困难。[14]小施勒辛格（M. Schlesinger Jr.）认为，肯尼迪别无选择，只能安于从前任接手下来的现状，继续推进艾森豪威尔在 1954 年通过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所构建的政策。[15]1961 年 1 月 28 日，他担任总统不久，就批准了“反暴动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扩大了对南越的军事援助，向吴庭艳政府提供了约4 0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以打击游击活动。他还计划派遣 10 000 名士兵前往越南镇压游击队。[16]

自 1962 年 10 月起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麦克斯维尔·泰勒将军认为，越南是试验以从事反暴动、破坏和恐怖活动为目标的特种部队即“绿色贝雷帽”的最佳场所。肯尼迪 1961 年 1 月上任时，在南越的美军为 900 人，当年年底增至 3 164 人，1963 年 11 月 22 日他遭暗杀时，已达 16 263 人。[17]1960 年，美军死亡人数为 5 人，1961 年增至 16 人，1963 年为 123 人。[18]美国飞行员对越共控制区进行轰炸并实施“落叶行动”，另一些以顾问为名的军人直接参与战斗和“战略村行动”，并指挥对北越的偷袭。

美国士兵越来越多的参与并没有改变南越的形势。越共武装斗争得到民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而吴庭艳却十分不得人心，民众抵抗运动风起云涌。1963 年 8 月，一群僧侣在西贡街头自焚，以示抗议。面对这一形势，美国国务院一个由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rel Harriman）、罗杰·希尔斯

曼（Roger Hilsman）和迈克尔·福雷斯特尔（Michael Forrestall）组成的小组得出结论：应考虑其他选择来取代吴庭艳政府。1963 年 5 月，由吴庭艳弟弟吴庭儒统领的安全部队竟然向西贡街头庆祝佛祖诞生 2 527 周年活动的僧侣开枪。但副总统约翰逊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等人则认为吴庭艳不可替代。[19]时任中央情报局远东处处长并直接负责越南事务的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也认为没有更好人选。美国并不想破坏西贡的政治结构。[20]肯尼迪意识到，吴庭艳已备受打击，加上缺乏与叛将们达成妥协的能力，因而已难以继续领导南越政府。[21]

事实上，从根本上促使肯尼迪做出除掉南越政府吴庭艳和吴庭儒兄弟决定的原因是，后者通过法国大使罗杰·拉鲁艾特（Roger Lalouette），与国际控制委员会[22]在西贡的成员、波兰外交官米泽斯洛·马纳里（Mieczyslaw Maneli）秘密探讨通过和北越达成一项协议以和平方式解决战争的可能。戴高乐总统宣布支持南越的中立和越南可能的统一，这使美国感到不快。马纳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透露[23]，他甚至与包括胡志明和总理范文同在内的北越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们于 1963 年年中表示，愿意与南越和解。马纳里在回忆录中称，范文同当着胡志明的面承诺要与南越组成一个联邦或某种联合政府。范文同表示，“在维护越南独立和主权基础上，任何东西都可以商谈”[24]。和南越发展关系将从邮政、经济和文化入手，北越不会迫使越南迅速统一，而是愿意建立一个由吴庭艳和吴庭儒参加的联合政府。[25]但任何外国军队，包括苏联和中国的军队，也包括美国军队，都不准留在越南。河内领导人知道吴庭艳、吴庭儒与美国之间的不和。美国人要换掉他们是因为，他们已不再为美国的利益服务。马纳里认为，吴庭艳是一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时常在西方高级外交官面前发表支持社会主义的言论[26]，从不隐晦排外情绪和对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不满。[27]他希望限制美国人在越南的作用和影响。

美国驻西贡大使弗雷德里克·诺廷（Frederick Nolting）支持吴庭艳。肯尼迪于是就用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取而代之。洛奇向记者塞缪尔·赫什证实，美国支持南越军事政变的“最大原因”是，“吴庭艳正试图达成协议”，以确立南越的中立[28]，而这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为根据肯尼迪善恶对立的世界观，中立是共产主义的代名词。吴庭艳怀疑洛奇的使命是推翻他的政府。他没有猜错。主意来自肯尼迪本人[29]，他没有接受中央情报局的反对意见。洛奇和中央情报局西贡站负责人鲁希安·科奈恩（Lucien Conein）以通过变革挽救南越政府为借口，批准和支持了杨万明将军于 1963 年 11 月 1 日发动的军事政变。美国向他

提供了手枪、手榴弹和相当于 42 000 美元的越南币。[30]被罢免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及其弟弟吴庭儒于政变次日被处决。他们遭此下场是因为已不再符合美国利益。[31]赫什认为，肯尼迪对 1963 年 11 月 1 日政变和处决吴庭艳及其弟弟的个人责任，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始终对他保持忠诚的弟弟鲍勃的谎言所掩盖。[32]小施勒辛格就是其中一位替肯尼迪开脱责任者。他声称，11 月 1 日南越发生的政变，完全由越南人策划和实施，“美国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均没有参与煽动和实施”[33]。但赫什却这样写道：“吴庭艳被杀是因为他想在 1963 年做一些事情，让美国人离开越南，而肯尼迪希望在选举后才这样做”[34]。事实上，肯尼迪可能已在考虑 1964 年赢得连任后的撤军问题。[35]他意识到，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应更多依靠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但和以往一样，选举进程左右着军事领域的决定，肯尼迪不想被指责与共产党媾和。正如赫什所言，肯尼迪使美国继续卷入越南战争，更多的是因为选举时间表，也就是保证 1964 年的连任。[36]但他已意识到，越南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最大失败。对于越南问题，他从来没有给予真正的关注。[37]

然而，接替肯尼迪的约翰逊总统使美国更深地陷入了越南战争。派往越南的 16 263 名军人每天要消耗美国纳税人 150 万美元的税款。[38]阵亡的美军已超过 200 人，但游击战却未能得到遏制。美国的经费均通过秘密途径提供，一方面是因为它违反美国未签字的《日内瓦协议》，另一方面是为了欺骗美国舆论。[39]以战争为生的军工集团则力图促使战争升级。[40]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从 1964 年前几个月起就加强了针对北越的秘密行动，中央情报局凭空捏造的一个机构与越南航空运输公司合作执行“空运干草行动”。他们使用无任何标识的 C-54 和 C-123 飞机，向北越空投准军事人员，从事炸毁公路、铁路和桥梁等破坏活动。[41]中央情报局准军事人员和海军军官成为越南航空运输公司从西贡运往岘港的乘客，他们前往非军事区以北的地区执行使命。

被称为 34-A 的秘密行动始于 1964 年 2 月 1 日，其目的是让配备电台的人员潜入北越，从事破坏、恐怖活动和搜集情报，并用由南越人或雇佣兵驾驶的快艇袭击海滨设施。[42]这些行动的借口是要迫使河内政府停止支持越共。这些秘密行动由约翰逊总统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通过参谋部一个名为“反暴动和特别行动特别助理办公室”的分支机构进行。[43]袭击行动完全由中央情报局资助和组织，尽管成员大多为南越或其他国家的雇佣兵，但南越政府没进行任何参与。这些针对北越的行动始于 1961 年肯尼迪派遣特种部队作为顾问前往南越平息暴乱之时。1963 年 12 月，约翰逊总

统成立了由威廉·苏利文（William H. Sullivan）任组长的越南工作组后，美国的行动得到了加强。越南工作组的目的是协助战争指挥和战略规划。它的一项建议是，由南越飞行员夜间驾驶无美国标志的超音速战机，在河内和海防等大城市进行超低空飞行，使共产党领导人和民众无法入睡。此外，越南工作组还建议对海防港进行封锁，必要时使用武力，阻止苏联船只进入，并用南越鱼雷艇袭击北越岛屿和海滨设施。

这些攻击行动符合阮庆将军的愿望。作为推翻吴庭艳的军人委员会首领，他希望把战争推向北越。1964 年 3—6 月，特种部队人员协同中央情报局开始实施“三角洲计划”，空运军事小组渗透到老挝，侦察和搜集“胡志明小道”的情报并训练南越士兵，以便在那里建立永久游击队基地。军事小组由 2 名“绿色贝雷帽”和 4 名南越士兵组成。但 1964 年总统选举前夕，美国军人的参与被中止，原因是他们可能被俘虏，这将使约翰逊在竞选中面临尴尬处境。一度被指定为小组成员的士官唐纳德·邓肯（Donald Duncan）这样理解：

> 取消美国士兵参与，不是基于我们去老挝正确与否，最大的担忧是可能使约翰逊总统在竞选运动中处于难堪。我们要执行的是成功可能性非常小，或根本无法成功的使命。[44]

事实确实如此，这一使命与许多其他使命一样没有取得成功。40 名南越志愿者中，只有 6 名返回，其余要么被杀，要么被俘。1964 年 8 月 6 日，河内国际电台报道了对 5 月 19 日被空投至义安省葵州县间谍小组的审判结果，组长阮玉平（Nguyen Ngoc Binh）被判终身监禁，副组长阮文生（Nguyen Van Sinh）因反抗被判处死刑，其余人员被判 20 年监禁。[45]

在这些行动进行的同时，美国海军实施了以获取“电子情报”[46]为目的的“德索托巡逻计划”，即截获共产党国家海岸或边境发出的电子信号，对其雷达进行定位。在北越，军事小组还要掩护具有明显挑衅意图的 34-A 行动的实施。1964 年 7 月 30 日，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命令南越的 4 艘船只（PTF-2、PTF-3、PTF-5 和 PTF-6）从岘港出发[47]，前往东京湾[48]攻击两个岛屿——离清化省海岸 4 公里的宇岛和 12 公里的另一岛屿。这两个岛均归属北越。[49]7 月 31 日，北越政府发电报给国际控制委员会，对这一“极为严重违反”《日内瓦协议》的行动提出正式抗议。[50]次日上午，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DD-731）游弋在这些岛屿附近，其目的是进行电子侦察和挑衅。[51]舰长声称遭到攻击，

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船只也未受损。[52]尽管如此，在詹姆斯·斯托克代尔（James B. Stockdale）少将指挥下，4架战机从“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起飞，前往保卫“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它们击沉一艘北越鱼雷艇，另有数艘北越舰只受损。约翰逊总统接到报告后表示：“那个地区有我们进行的一些‘隐蔽行动’，如炸毁桥梁和道路等，我估计他们想加以制止。”[53]

尽管约翰逊在回忆录中试图回避这一问题[54]，但他心里清楚，北越的反应是针对中央情报局进行的“隐蔽行动”的正当自卫。他要找一个“可用作宣传的理由”，公然把战争推向北越，轰炸海防和河内等城市。这一意图十分清晰，因此，他的一名顾问、中央情报局成员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早在1964年5月25日就写好了要递交国会的决议草稿。[55]6月10日前后，尽管存在一些疑问和不同意见，政府负责制定对外政策的所有部门均支持将决议草案递交国会表决。12日，邦迪就政府各机构第二次会议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政府立即将决议提交国会表决，以便“在未来政治月份中继续显示美国的坚定，并给予政府完全的灵活度”[56]。这样，为了继续挑衅北越，约翰逊下令留在北越附近的“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驱逐舰[57]以保障海上自由权利为由，再次进入东京湾。[58]美国准备实施报复。停泊在中国香港的“星座号”航空母舰接到命令，前往南中国海与“提康德罗加号”会合，更多的轰炸机被派往南越和泰国。泰国虽然不是战场，但却被用作美国第七航空队的基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尤利塞斯·夏普（Ulisses Grant Sharp）上将在北越地图上标明了美军将要轰炸的各个目标。

与此同时，34-A秘密行动继续进行。8月3日，四艘舰只（PTF-1、PTF-2、PTF-5和PTF-6）从南越岘港出发，炮轰了荣山市的雷达设施和距非军事区90英里的一个安全站。8月4日，“马多克斯号”舰长约翰·赫里克（John J. Herrick）上尉截获了北越无线电通信信号，并向第七舰队发出信息，告知2艘不明国籍船只有可能发动“敌对行动”。“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派战机去为美军舰只护航，美国军舰迅速向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越南巡逻舰开火。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认为，“马多克斯号”遭攻击是河内对34-A入侵行动的回击。8月4日晚，当约翰逊在白宫会议上问他北越为何要攻击在东京湾的美国船只时，他回答说：“不！北越是防御性地回击我们对其近海岸岛屿的攻击……他们的进攻向我们表明，北越人有继续战斗的意愿和决心。”[59]

事实上，8月4日晚上没有发生任何来自北越的袭击行动。斯托克代尔少将在返回“提康德罗加号”时，再次在该水域上空飞行，他声称没有

发生任何交火事件。韦斯利·麦克唐纳（Wesley L. McDonald）舰长所在的第56分队的飞行员也声称，除了“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东西。[60]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中称，当晚云层很低，雷电交加，没有月光，能见度非常低。但不管如何，美联社和合众社报道了这一谣言，好像真的发生了针对“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的第二次进攻。约翰逊对新闻界发表的谈话内容完全是臆想的结果。根据麦克纳马拉的提示，他大概作了以下表述：

> 夜间……两艘驱逐舰遭到巡逻艇攻击，进攻被击退，驱逐舰没有伤亡和损坏。我们相信有数艘巡逻艇被击沉。等天亮才能提供细节。[61]

麦克纳马拉在其回忆录中怀疑事件的真实性，承认那则消息不实。他写道：“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意，假如第二次袭击得到确认，就要求进行迅速和有力的回击。”他接着说：“然而问题是，第二次袭击真的发生了吗?”[62]1965年，罗伯特·肯尼迪亲口对一位助手说：“据我所知，我们的海军是在向那里的鲸鱼开火。”[63]

第二次攻击确实没有发生[64]，也没有证据加以确认。河内否认8月4日对“马多克斯号”发动了任何袭击，将其称为“厚颜无耻的捏造”。[65]尽管如此，美国媒体受五角大楼官员的启发，对这一捏造的事件进行了戏剧性报道。[66]原因是，美国的选举日程表几乎总是决定华盛顿的战争行动。约翰逊利用国内政治危机的潜在效应，以便获得将于1964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相对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有利地位。虽然缺乏证据，他仍下令进行“迅速而坚决的报复性打击”，即对北越实施轰炸。8月5日，“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航空母舰上的A-1“空中袭击者”和A-4“天鹰”攻击机，对北越4个基地进行了60次袭击，击毁北越25艘巡逻艇和一些石油设施。约翰逊迫不及待地让国会通过对“马多克斯号”莫须有袭击前就已拟订的决议草案。1964年8月7日，众议院以416票全票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参议院则以88票同意2票反对通过决议[67]，批准政府可采取一切措施，包括使用武力，帮助任何寻求支持“以保卫其自由”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68]俄勒冈州参议员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和阿拉斯加州参议员埃纳斯特·格里宁（Ernest Gruening）是仅有的投反对票的议员。

基辛格后来承认了约翰逊诱使国会通过决议的这一舞弊行为。该决议

无异于使越南战争升级的空白支票。基辛格称，“即使那场战斗扑朔迷离，但《东京湾决议案》并非在呈现全部事实后获得通过”[69]。基辛格认为，约翰逊所采用的策略及其诚恳度，与促使美国逐步卷入二战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无太多两样。罗斯福对被用作美国参与1941年大西洋海战借口的“格里尔号”驱逐舰遭鱼雷袭击事件的叙述也并非诚恳。[70]基辛格没有提及罗斯福挑起珍珠港袭击并等待与日本的同盟德国公开宣战的事实。但事实上，不管是约翰逊、麦克纳马拉，还是国防部副部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都没有透露美国是通过实施34-A行动向北越发起挑衅并实施侵略的事实。

约翰逊与希特勒和罗斯福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他捏造了“可用作宣传的理由”，并有效利用电视达到欺骗国会和蛊惑美国舆论以支持其扩大战争的目的，这是军工集团推销其产品和他在1964年11月夺取美国总统职位的需要。1965年2月，越共对美军军营的一次袭击成为美国实施“滚雷行动”的借口，美军开始对北越进行系统轰炸。据约翰逊后来向《新闻周刊》记者查尔斯·罗伯茨（Charles Roberts）所作的坦白，这一决定实际上在1964年10月，也就是他当选总统前就已做出。[71]与此同时，他向南越派遣了75 000名军人。[72]尽管他采取了与罗斯福在1940年相同的做法，在竞选运动中保证“我们不想让美国男孩去为亚洲男孩而战”[73]，但7月，他又增派了125 000名士兵。[74]然而，此时越共已对南越40%的领土拥有控制权或主导性影响。[75]推翻吴庭艳将军也未能使形势得到改观，西贡政府已摇摇欲坠。领导1963年11月1日政变的杨万明将军于1964年1月被阮庆（Nguyen Khanh）将军推翻。阮庆当总理时间也不长，他于1965年流亡法国。阮绍基（Nguyen Cao Ky）将军取而代之，并执政至1967年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当选。尽管1965年约翰逊曾宣称那场战争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并不困难，因为“财富增长了，生活优裕了，国家繁荣了”[76]，但到1967年，麦克纳马拉已确信，美国在越南的所有努力将是一个“失败”。他开始怀疑轰炸是否道德，于是请一名叫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Gelb）的助手搜集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所有历史资料[77]，汇编成《美国制定对越南政策过程史》。该文献共约7 000页，充分揭示了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秘密军事决定与公开立场之间的反差，以及为欺骗公众舆论所进行的舞弊行为。麦克纳马拉对派遣地面部队越来越感到犹豫。1967年11月，鉴于轰炸毫无成效（从3月起，美军每月向北越进行10 000次轰炸行动[78]），他建议停止轰炸行动。由于建议未被约翰逊采纳，他于1968年11月29日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正如约翰逊向他的一名顾问所抱怨，美

国的将军们只知道两个词："轰炸和花钱"[79]。事实上，当轰炸北越开始时，美国的国防预算从1961年的496亿美元增至1965年的506亿美元，1966年上升至580亿美元，1968年达到819亿美元。[80]

【注解】

[1] Weinberg, 1963, pp. 65 e 67.

[2] Apud Trento, 2002, p. 327.

[3] Kennedy's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Defence Policies and Principles, March 28, 1961, in *Kennedy Papers 1961*, 1961 (1962), pp. 229ss, apud Kissinger, 1954, p. 653. Schlesinger Jr., 1965, pp. 540-541.

[4] Ibid.

[5] Walton, 1972, p. 10.

[6] Id., ibid., pp. 21-22.

[7] 该党的名称为Neo Lao Hac Sat，意为老挝爱国阵线，但这些共产党人通常被称为巴特寮（老挝的土地）。

[8] Colby, 1978, p. 192.

[9] Id., ibid., pp. 197-199.

[10] Schlesinger Jr., 1965, pp. 536-537.

[11] Schulzinger, 1994, pp. 238-239.

[12] Id., ibid., p. 239.

[13] 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革命党（共产党）为两个不同的组织。人民革命党在北越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表面上演变为另一个党，加入了民族解放阵线。自1956年起，南越媒体开始把共产党人称为"越共"，既指个体，也指民族解放阵线。南越所有共产党人都是"越共"，但并不是所有"越共"都是共产党人。

[14] McNamara, 1996, p. 31.

[15] Schlesinger Jr., 1965, pp. 538-539.

[16] Haig, 1992, p. 130.

[17] Kissinger, 1954, p. 653. 据沃尔顿称，肯尼迪上任时，只有600名美国军事人员作为顾问在越南活动。肯尼迪遭暗杀时，共有25 000名美国军人在那里。Walton, 1972, p. 201.

[18] Id., ibid., p. 653.

[19] Powers, 1979, pp. 207-208.

[20] Colby, 1978, p. 216.

[21] Karnow, 1997, pp. 293-294.

[22] 成立国际控制委员会是为了监督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的履行。

[23] Maneli, Mieczyslaw. "Vietnam, '63 and now". *The New York Times*, 27/1/1975, apud Hersh, 1997, pp. 420-422.

[24] Maneli, 1971, pp. 128-130.

[25] Id., ibid., p. 121.

[26] Id., ibid., pp. 118-121.

[27] Corson, 1968, p. 48.

[28] Hersh, 1997, pp. 422-423.

[29] "*Kennedy's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November* 2, 1963, *overthrow and murder of Ngo Dihn Diem* (...) *has been obscured by the lies of the men who worked for him and the lies of his ever-loyal brother Bobby*". Id., ibid., p. 412.

[30]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William P. Bundy-Bill Moyers,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Diem Regime in August - October 1963*" —Memorandum for Mr. Moeyer—Eyes only. Subject: Discussion Concerning the Diem Regime in August-October 1963.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Lyndon B. Johnson Papers, National Security File, Country File Vietnam, box 263, folder: Hilsman, Roger (Diem 1963)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Anderson, 1979, pp. 207-208. 在一个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洛奇求助于"巧妙否认"："*The overthrow* (...) *of the Diem regime was purely a Vietnamese affair. We never participated in the planning. We never gave advice. We had nothing whatever to do with it.*" 但是，1963年11月6日，在吴庭艳被处决4天后，他专门给国务院发了一封电报："*It is equally certain that the ground in which the coup seed grew into a robust plant was prepared by us and that the coup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as*) *it did without our preparation.*" Apud Karnow, 1997, p. 311. 关于推翻吴庭艳的政变，另参阅 Beschloss, 1991, pp. 650-657。

[31] U. S. Senate—*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 pp. 5, 49-64, 217-223 e 261-262. Powers, 1979, pp. 184-185, 324-326. Karnow, 1997, pp. 314-327. Frey, 2004, pp. 160-161. Russo, 1998, p. 49. Schulsinger, 1994, pp. 270-271. Hersh, 1997, p. 412.

[32] Id., ibid., p. 412.

[33] Schlesinger Jr., 1965, p. 997.

[34] Hersh, 1997, p. 430.

[35] Id., ibid., 1997, pp. 429-431.

[36] Id., ibid., p. 30.

[37] Schlesinger Jr., 1965, p. 997.

[38] Bamford, 2002, p. 291.

[39] Karnow, 1997, p. 270.

[40] "升级"一词被五角大楼行动研究办公室的学术战略家们用来指力量的逐步增加"将超过敌人的痛苦界限"。

[41] Goulden, 1969, pp. 84-85.

[42] McNamara, 1996, p. 129. 入侵北越行动在1961年开始时由中央情报局协调。1964年1月，这项任务被交给国防部，由一个名为"研究和观察团"的秘密组织负责。

为了进行海上“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悄悄从挪威购入了 PTF Nasty Class 船只，以便制造美国没有卷入的假象。

[43] *Pentagon Papers*, 1971, p. 238.

[44] Apud Goulden, 1969, p. 92.

[45] Id., ibid., p. 92.

[46] 电子间谍活动名义上由海军负责，但真正负责协调的是美国国家安全署。该机构于 1952 年 11 月 4 日通过杜鲁门的一个行政令设立，在美国情报机构中规模最大且资金最充裕，但最不为人所知。该行政令从来没有被公布。在 5 年时间内，美国政府没有公开承认国家安全署的存在。

[47] *Pentagon Papers*, 1971, p. 259.

[48] 东京湾位于北越东岸和海南岛西岸之间。

[49] 河内政府认为，7 月 30 日夜间，美国和南越舰只进入了北越水域，并轰炸了那儿的两个岛屿。Vide também Goulden, 1969, pp. 127-128.

[50] Id., ibid., pp. 25-26.

[51] Bamford, 2002, pp. 294-295.

[52] 河内向国际控制委员会进行了控诉，但美国否认卷入。作为回应，北越加强了那两个岛屿沿岸的军控力度。

[53] Beschloss (ed.), 1997, p. 493.

[54] Johnson, 1971, pp. 112-115.

[55] *Pentagon Papers*, 1971, p. 249.

[56] Ibid., p. 257.

[57] 该舰以特纳·乔伊（Charles Turner Joy）海军上将名字命名。1951—1952 年间，他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朝鲜停火谈判。

[58] 美国后来表示不知道河内设立了 12 海里领海界限。

[59] Summary Notes of the 538th Meeting of the NSC, 4 August 1964, 6:15-6:40 p. m., FRUS 1964-1968, vol. 1, Vietnam 1964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 611.

[60] Karnow, 1997, pp. 381-387.

[61] “麦克纳马拉：总统先生，事情已被美联社和合众社公布。约翰逊：我知道。麦克纳马拉：……事件已被公布。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同意发一个声明，声明可以由某一个部起草，我认为可以是五角大楼……我们要发布的声明……我们就简单地说，夜间……两艘驱逐舰遭到巡逻艇攻击，进攻被击退，驱逐舰没有伤亡和损坏。我们相信有数艘巡逻艇被击沉。等天亮才能提供细节”。Transcrição da conversa telefônica in Beschloss (ed.), 1997, p. 500.

[62] McNamara, 1996, p. 133.

[63]Apud Goulden, 1969, p. 160.

[64] “后来进行的官方和非官方调查几乎有十足的把握证明，共产党人的第二次袭击从来不曾发生。该事件并非蓄意伪造，但正绝望地寻找借口以便更多参与行动的

约翰逊及其班子利用了一个模糊不清的情况来实现一个特别行动。" Karnow, 1997, p. 389.

[65] Goulden, 1969, p. 80.

[66] Karnow, 1997, p. 386.

[67] 俄勒冈州参议员莫尔斯和阿拉斯加州参议员格里宁是仅有的投反对票的议员。

[68] Joint Resolution of Congress (H. J. RES 1145 August 7, 1964). 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在其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做出决议，国会批准并支持作为美军总司令的总统做出的关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反击针对美军的任何攻击和采取攻击预防措施的决定。

第二款：美国认为维护在东南亚的国防和平和安全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至关重要。遵循美国宪法和《联合国宪章》以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国将根据总统的决定，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各种必要步骤，支持《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任何成员国或协议国捍卫其自由的要求。

第三款：当总统做出决定，认为联合国的行动所创造的条件已使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得到合理保证时，此决议失效。除非国会通过不需要总统签署的共同决议案使其提前失效。

[69] Kissinger, 1994, pp. 658-659.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已从国会获得了两张空白支票：一张是 1954 年给予总统广泛权力，以便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另一张是 1958 年有关中东问题。

[70] Id., ibid., p. 659.

[71] Apud Corson, 1968, p. 63.

[72] Cohen & Tucker, 1994, p. 34.

[73] 1964 年 9 月 25 日在选举运动中的演讲。Apud Goulden, 1969, p. 164. Haig, 1992, p. 147.

[74] Cohen & Tucker, 1994, p. 34.

[75] Karnow, 1997, pp. 357-358.

[76] Apud LaFeber, Walter. "Johnson, Vietnam and Tocqueville", in Cohen & Tucker, 1994, p. 35.

[77] Schulzinger, 1994, p. 281.

[78] McNamara, 1995, p. 291.

[79] Schulzinger, 1994, p. 276.

[80] Historical Tables,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1999, pp. 42-49.

第十五章

巴西军事政变和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　美国的反越战示威　法国和英国的反对　越南大屠杀　北朝鲜事件　美国经济危机　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遭暗杀　美国的骚乱　胡志明

越南战争升级并未妨碍美国重新在属于其势力范围的拉美确立主导地位。约翰逊在就任总统四个月后为对巴西进行军事干预（“萨姆兄弟行动”）开了绿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政变推翻了若昂·古拉特的劳工党政府。[1]美国驻巴西大使林肯·戈登（Lincoln Gordon）除了建议“秘密运送武器”用于特遣部队[2]，实施“隐蔽行动”，并提供天然气和石油（“萨姆兄弟行动”）外，还请求约翰逊政府迅速筹组一支用于“第二阶段公开干预”的部队。[3]约翰逊在与副国务卿乔治·波尔（George Ball）和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会晤中，命令“采取我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措施，准备做我们该做的任何事情”[4]。但古拉特已被压力击垮。戈登后来表示，他对巴西米纳斯州暴动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它避免了一件非常不愉快事情的发生，否则就需要美国对巴西进行军事干预”[5]。

第二年，约翰逊违反《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15条和第17条[6]，单方面决定派遣海军陆战队士兵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此前，在该国发生了一场由弗朗西斯科·德诺（Fancisco Caamaño Deñó）领导的军事政变，他试将政权交还前总统胡安·博施（Juan Bosch）。博施为左派知识分子，1963年当选总统，6个月后被军事政变推翻。他被指称亲卡斯特罗并有共产主义思想。入侵行动发生于1965年4月28日。[7]在造成既成事实后，美国召集了第十次美洲国家组织外长磋商会议。会上，美国代表团团长埃尔斯沃斯·邦克（Ellsworth Bunker）大使辩称，没有及时进行磋商是因为入侵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和其他国家公民的生命。[8]这便是美国的借

口。[9]然而，约翰逊次日声称，他下令海军陆战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登陆是因为，美洲国家“不能、不应该也不允许在西半球建立另一个共产党政权”[10]。当时在中央情报局任职的菲力普·阿吉（Philip Agee）在其日记中评论说，“没有人会相信约翰逊所说的正在形成另一个古巴式革命的说法”[11]。他在几天后又表示，“采取行动并不因为是共产主义，而是民族主义”[12]。约翰逊在其回忆录中辩称，存在共产党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执政的可能性。因为，在4 000～5 000 名暴乱分子中，有约 1 500 名共产党人或亲共产党者，这对和平以及西半球和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13]但美国政治学家布雷迪·泰森（Brady Tyson）认为，面对那一年议会选举的前景，约翰逊采取的行动并不是基于各种危险和（或）对国家安全和美洲体系可能构成的威胁，而是因为担心“不稳定和不成熟”，即“歇斯底里潜能”，受“五角大楼妄想狂”和“卡斯特罗情结”影响的美国公众舆论做出负面反应。[14]美洲国家组织外长磋商会议仅仅是为了以多边化名义使一个单边行动变得合法、合理，以便使美国得以维护其形象，回击对其毫无理由入侵一个小国并再次将西半球置于联合国管辖之外的指责。[15]约翰逊政府承诺，如果其他国家分摊责任，参与集体安全任务，那么这将是美国最后一次采取单独干涉行动。美国再次要求建立一个美洲国家组织军事机构，即所谓的“美洲和平部队”，以便把地区警察权力也就是“大棒”交给该组织来打击革命，免除自己单边实施“门罗主义”的义务。这样，巴西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了一支由 1 100 名士兵组成的部队，参与由巴西人乌戈·阿尔文（Hugo Penasco Alvim）担任司令的“美洲和平部队”。除美国和巴西外，该部队还包括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军人。

巴西 1964 年军事政变后上台的布朗科（Humberto Castelo Branco）政府成为五角大楼战略方针在拉美的宣传工具[16]，它还支持对主权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主权界定不再基于国家的地理疆界，而是政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这将使美国得以通过集体形式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干涉，只要被视为民主政体的某一个国家受到所谓的共产主义或类似运动的威胁。根据这一思想，就有必要建立一支随时待命的部队，即“美洲和平部队”。它由西半球各国部队组成，接受美洲国家组织领导，时刻准备捍卫意识形态的疆界，不管颠覆威胁来自何方。布朗科认为，维护独立（相对于共产主义）就要求以“接受某种程度的相互依存”为前提。核武器的发展及其摧毁力不仅使常规战争成为过去，也使美苏之间的军事冲突几乎不再可能，因而两极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转向每个国家内部，

并呈现颠覆和革命斗争的形式。在这一背景下的相互依存，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也包括军事领域。[17]派遣部队协助美国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使布朗科政府的威望大大削弱，就连与军人保持密切关系的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议会主席弗朗西斯科·平托（Francisco H. Bilac Pinto）也在一份措辞激烈的声明中对这一行动予以谴责。他指责政府正准备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越南参战。巴西军方反对建立一支听命于美洲国家组织的待命部队来进行集体防御，他们难以接受把主权交给一个超国家机构，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将使自己维护国内秩序的功能和作战能力受到限制。

意识形态疆界思想表达了由美国主导经营的超帝国主义利益，并要使这一利益合理化，这反映了政治国际化的趋势。美国资本已超越民族国家的狭窄界限而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约翰逊在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在国外的义务作为政府民主体系的产物，已使国内和国际责任界限不复存在。他说："曾被我们称为'外来的'严重危险和麻烦，现已持续发生在我们中间。"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国人必须在我们知之甚少的国度付出生命和金钱，那就是我们保持信心和持久承诺的代价。"[18]

这样，美国就明显地把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权力据为己有，颠覆的幽灵已成为新的威胁。华盛顿试图以此保持它主宰下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凝聚力并助长军国主义，满足美国军事工业的要求，支持那些维护美国公司利益的右翼独裁政府。

然而，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未消除作为组织的最高层次和统领各自社会的各民族国家利益与作为卡特尔之首的美国利益之间的矛盾。作为集团最重要的伙伴，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拒绝派遣军队，这使约翰逊大为恼火。但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非常之深，容不得西欧政府首脑们在全欧民众极为反感的越战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约翰逊希望联邦德国派遣 2 000 名士兵。而联邦德国政府领导人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难以接受这一要求，因为 1948 年生效的《基本法》不允许他向国外派遣军队。但他承诺将向南越政府提供资金支持。[19]法国总统戴高乐则明确反对战争。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也持相同立场，他表示愿意充当调停者。美国的资金支持加速了艾哈德政府的垮台和社民党领导人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联邦德国的掌权。约翰逊甚至未能说服巴西的布朗科军事独裁政府向越南派遣部队。迫于军队内部民族主义势力的压力，布朗科先是未予回应[20]，后来，他干脆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他认为，越南战争不影响巴西本国的利益，而只是与世界强国

美国有关。他曾表示，不应事先就附和任何强国的态度，“哪怕是西方世界的保护国”，因为有必要把保护西方体系的基本利益和一个强国的利益加以区分。[21]巴西只派遣了一架装载药品的飞机，因为，正如当时的巴西外长茹拉西·马加良斯（Juracy Magalhães）所言，“巴西国内不存在能表明我们军队有必要参与在如此遥远的行动舞台所进行战争的气氛”[22]。

越南战争在各国产生了对美国的不信任和敌对情绪。1967 年，在美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反对约翰逊政策的示威。与此同时，在内华克和底特律发生了血腥的种族骚乱，造成 43 人死亡、2 000 人受伤和 5 000 万美元的财物损失。国会也出现了反叛行动，尤其是 1967 年年底当东京湾的“马多克斯号”第二次袭击并没有像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所宣称的那样发生这一事实变得明显之时。[23]1968 年 1 月 31 日，在泰特节（越南农历新年）第一天，越共和北越军人发动强大攻势，占领了南越包括西贡在内的约 23 个城市，并在西贡包围了美国大使馆。这一行动出乎中央情报局的意料，它一直认为西贡是越共唯一不可能攻击的城市。尽管越共损失约 1 万人的兵力并在随后被迫撤退，但越南新年攻势让美国公众明白，美国不仅与胜利相距甚远，而且正在输掉这场战争。约一个半月后的 3 月 16 日，第 11 旅的查理连在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中尉和戴维·米切尔（David Mitchell）的指挥下，进入了南部的美莱村，执行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下达的“搜索和毁灭”使命，杀害了 300 名手无寸铁的农民，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和老人。很多人被刺刀捅死，另一些人颈项中弹，年轻女子遭强奸。[24]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承认，1968—1971 年间，美国和南越政府杀害了大约 20 587 名被怀疑与越共合作的平民。[25]南越政府把 40 994 名可疑分子之死归于中央情报局制定的“凤凰计划”。根据美国官方报告，“情报部门、军队和警察”共破坏了约84 000 个“越共基础设施”，杀死 21 000 人。[26]南越地方官员除掉了 80%的可疑人员，但美国顾问说服他们只公开承认杀了其中的 50%。美国一名情报顾问称，他到达湄公河三角洲时，收到了一份包括 200 名要被处决人员的名单。6 个月后，当他离开那里时，共有 260 人被杀，但没有一人包含在那份名单内。这些处决行动进一步消除了农民大众支持阮文绍政府的任何可能。“凤凰计划”作为一个镇压越共系统的组成部分，为西贡政权树了更多敌人，其人数多于被清除掉的敌人。

美国国内政治形势也日趋恶化，并出现了强烈的内部动荡。自 1964 年起日趋严重的反种族歧视暴力冲突在洛杉矶（1965 年）和芝加哥（1966 年）等城市发动，并于 1967 年的头 9 个月达到顶峰。128 个美国城市发生

了160起暴动事件，多数为警察野蛮对待黑人所引发。1967年夏天，发生在内华克和底特律的暴动尤为严重，共有43人死亡、2 000人受伤。暴动引发的火灾使5 000人流离失所，物质损失达5 000万美元。这些事件促使约翰逊于1967年7月29日发布第11365号行政令，设立国家内乱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时任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Otto Kerner）担任主席。委员会的目的是调查国内动乱的原因及可能存在的煽动或支持暴力的组织或个人。以“克纳委员会”闻名的国家内乱咨询委员会于1968年3月1日递交了首份报告。报告的结论是，美国“正成为被割裂且不平等的黑白两个社会”。它的其中一条建议是，军事情报机构应该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各州、郡的警察共同承担国内情报的搜集任务。佐治亚州的军事警察学院开设了内乱控制专业。陆军和地区警察安全部队则接受实施处置突发事件计划的训练，这些计划涉及全国所有存在学生暴动潜在可能的城市。但示威活动依然未能平息，1967年10月，成千上万名反战运动人士集聚华盛顿。这在美国尚属首次，来自全国各州的大批示威者在华盛顿五角大楼前游行，抗议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内部出现社会分裂而外部陷入印度支那泥潭的美国此时又碰到了一个国际难题。1968年1月23日，朝鲜四艘鱼雷艇、一艘猎潜艇和数架米格战机攻击了在其沿海从事电子侦察活动“叩头虫行动”的美国“普韦布罗号”舰。舰上的美军船员被俘，舰只被作为战利品带往和成港。美国政府立即将这一事件解读为平壤（在北京授意下）有意帮助河内，分散美国在越南的注意力，阻止汉城政府卷入越南战争。[27]约翰逊考虑派遣12架F-105战机或3艘驱逐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去解救船只和被俘人员。韩国政府要求美国采取强硬姿态。金日成领导的平壤政府做出回应称，他们将对美国的任何报复行动采取反报复，以一场全面战争来回击一场全面战争。事态变得极为紧张。但美国并无内外政治条件去卷入另一场后果难以设想的军事冲突。约翰逊认为，“普韦布罗号”舰被劫是有预谋的，并非一起孤立事件。朝鲜意在把美国军队从南越吸引过来，并指望韩国派往那里的两个师返回本国。[28]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选择了外交手段。他认为，任何军事行动都难以把船员活着营救出来。他们当中一个名为杜安·霍奇（Duane Hodges）的船员已死亡，另有几人受伤。种种迹象表明，舰长劳埃德·布切（Lloyd M. Bucher）和其他由海员及情报人员组成的船员遭到了殴打和酷刑。但事实是，他们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公开承认，“普韦布罗号”舰当时处于朝鲜12海里水域内。[29]他们还签署了声明。平壤政府于3月4日将该声明送交停战委员会。美国在莫须有的“马多克斯号”事件和对“普韦布罗号”舰真实攻击中的不同

反应清楚地表明，约翰逊政府在东京湾事件中确实炮制了一个“可用作宣传的理由”，以便向河内发起进攻，为扩大对北越的战争找到借口。[30]

美国经济危机的不断加重使约翰逊的地位岌岌可危。3月前两周出现了黄金抢购浪潮，危及美元稳定，并动摇了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基础。[31]约翰逊清楚，如果不采取措施，调整税收并降低通胀，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将会持续走低，有可能重演1931年的货币危机。但他未能让国会改变对提高税收的反对立场，国会只在3月14日批准了政府的一项紧急措施，即拨出104亿美元的黄金冲抵美联储的钞票，以满足需求。[32]3月16日，美国与控制“黄金互助基金”的西欧7国（联邦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英国和瑞士）达成一项协议，这些国家同意向黄金市场供应15亿美元，以便使“黄金热”降温。但这一行动未能恢复美元的稳定。

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同样日趋复杂。约翰逊意识到，他难以遏制内部越来越强大的反对势力，无法在与国会的对抗中占据上风，也不可能赢得印度支那战争的胜利。于是，他在1968年3月31日宣布部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行动，以便推进和谈。同时，他撤销了自己竞选连任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资格。对所谓的东京湾“马多克斯号”事件重新展开调查，对于他采取这些行动和选择外交途径与朝鲜解决围绕“普韦布罗号”舰遭袭并被扣压所产生的危机产生了极大影响。[33]约翰逊认为，这一事件成为危机、灾难和失望等一系列事件的第一个环节。它使约翰逊度过了比其他任何总统在白宫所经历的“更为难熬岁月”中的一年。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34]此时，他已声名狼藉，同时也觉得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自入主白宫以来，他已两度住院并接受手术。他忧心忡忡，隐隐感到1955年那次心梗对身体所造成的影响。其妻子“伯德夫人”（Lady Bird）不希望他谋求第二个任期。除个人问题外，约翰逊不仅明白越南问题已在美国人民中造成分裂和仇视，而且预料到，1968年夏天将发生新的动荡。这些原因使他放弃了1968年的总统竞选。[35]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治愈一些伤口并恢复国家的团结。”[36]

4月4日，在约翰逊中止对北越的轰炸并放弃竞选连任几天后，民权和争取种族平等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遭暗杀。这一事件在美国19个城市的黑人居住区引发骚乱，造成约50人死亡。[37]一个伴随着抢劫和暴力的反种族隔离示威浪潮使美国领导阶层感到恐慌。当时有7个旅共计21 000名士兵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干预。一个先进的信息化中心被用于向陆军特别工作组提供情报。该工作组曾为“克纳委员会”服务，后成为内乱规划和行动指挥部，或称军事支持指挥部，设在

五角大楼地下室。这一花费270万美元设立的“国家内部战争作战室”，拥有150名工作人员，他们日夜监视所有大城市的民众骚乱。如有必要，可向任何州调遣军队。而当五角大楼极力监控民众骚乱之时，个体恐怖主义并未在美国消失。

1968年6月5日，在马丁·路德·金辞世两个月之际，1963年遭枪杀的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成为另一起恐怖事件的受害者。袭击发生在洛杉矶的大使酒店。他刚在加利福尼亚州赢得1968年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的胜利，在接受新闻界采访后准备离开时遭到枪击。尽管凶手巴勒斯坦人西尔汉·西尔汉（Sirhan Sirhan）被当场抓住，但其供词及尸检显示，凶手并未发射3颗子弹，这使人们更加怀疑这一始终没有得到应有澄清的犯罪行动也是一场阴谋。而且，在调查中存在掩盖行为。事件发生前，罗伯特·肯尼迪在保险经纪人唐纳德·雷诺兹（Donald Reynolds）和参议院程序暨行政委员会成员巴克·范·科克（Burkett von Kirk）的协助下，正在秘密搜集约翰逊[38]及其前顾问罗伯特·贝克（Robert Baker）肆无忌惮地收取贿赂的证据。[39]此前，贝克的朋友唐·雷诺兹（Don. B. Reynolds）已向参议院程序委员会主席本杰明·乔丹（Benjamin Everett Jordan）参议员通报，约翰逊曾要求从企业获得非法佣金，作为对其在生意中提供帮助的回报，包括一个价值585美元的立体声米罗华音响和因为把位于马里兰的该公司宣传节目在1 500英里之外的奥斯汀KTBC电视频道插播而得到的1 200美元。他还声称，在贝克的公文包中看到过10万美元，该款项用来向约翰逊支付佣金，答谢他在该公司与沃尔斯堡TFX公司签署合作合同中所起的作用。

贝克与黑帮人员埃德·莱文森（Ed Levinson）也有牵连。此人的哥哥也是黑帮头目，名为路易斯·莱文森（Louis Levenson），曾是哈瓦那里维埃拉酒店迈耶·兰斯基赌场的经理，当时已转而经营拉斯维加斯的弗锐曼赌场。该赌场私下为托尼·阿卡杜（Tony Accardo）、萨姆·吉安卡纳和保罗·里卡（Paul Ricca）所有。贝克卷入了持有泛美航空公司产权的洲际酒店集团的一桩丑闻。该集团当时正考虑在加勒比扩充赌场（已拥有23家），尤其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贝克和约翰逊一起在国会山和白宫活动，以便放松管理规章。约翰·肯尼迪遇刺后，唐·雷诺兹的作证被中止。然而，几十年来，华盛顿的人们一直怀疑，约翰逊作为一个公务员，何以在其一生中积累如此丰厚的财产。其财产包括电台、电视台、在得克萨斯州一个414英亩的庄园、大量土地、两架飞机和总额1 500万美元的银行存款。表面上看，他的生意与得克萨斯民主党最重要捐款人比利·埃斯蒂斯（Billie Sol Estes）有关。此人于1962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抓捕，罪名是参

与了一个包括棉花的虚假遴选和分发在内的巨额舞弊行为，这一事件可能致使农业部数位官员辞职。公众得到的信息是，埃斯蒂斯和约翰逊为合伙人，后者通过向埃德加·胡佛施加影响，试图阻止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罗伯特·肯尼迪遭暗杀后，该案卷被毁掉。查克·吉安卡纳把策划谋杀案归咎于他那位担任黑手党头目的哥哥萨姆·吉安卡纳。

> 他不知道凶手是否为同一人，中央情报局是否卷入。可以肯定的是，未对鲍勃[①]谋杀案进行真正调查让人怀疑与杰克（约翰·肯尼迪）遇刺案情况相似。[40]

很多人抱怨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案没有得到应有调查。种种迹象表明，这又是一次“掩盖”行动。因为，揭开阴谋线索不利于占据美国领导地位的精英们，会使各个机构和美国整体形象受损。不管罗伯特·肯尼迪之死是否是犯罪阴谋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反对他竞选美国总统。当时他正参加初选，胜利似乎已难以避免。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约翰逊憎恨他是客观事实，自约翰·肯尼迪担任总统时期起，罗伯特·肯尼迪就成了约翰逊的死敌。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确实存在罗伯特通过深入调查揭开约翰逊参与舞弊交易的风险。这是一场家族之间的战争。

当时国防部用来应对城市骚乱的资金已超过司法部。司法部大多数官员都清楚，如有必要，大批军人就会参与镇压或控制可能发生的反叛和骚乱。美国保守的精英集团害怕发生暴动。和平和民权运动领导者被视为受境外人员操纵的阴谋分子。陆军情报组组长助理威廉·亚伯拉罕（William P. Yarborough）将军在1967年10月20日发给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歇尔·卡特（Marshall Carter）将军的电报中，要求提供能证明外来行动控制国内反越战等示威的信息，或者是否“有外国政府或个人和组织，作为外国政府的代理人，正在控制或企图控制或影响我们的‘和平’团体和‘黑色权力’组织”。[41]

在反战和争取民权运动中寻找外来影响已到了着魔的地步。中央情报局掌握着一份“监视名单”，其中包括约30名美国公民和700个外国个人和团体。监视的目的是要弄清他们是否受到外来影响和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支持。国防情报局同样拥有一份参与反越战示威者的“监视名单”，名单中的人员也被怀疑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和操纵。

---

① 即罗伯特·肯尼迪。——译者注

美国总统选举在城市暴动、种族冲突和大批反战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的背景下进行。在约翰逊放弃谋求连任后，受到越战削弱的民主党推出了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作为总统候选人。然而，10年前作为副总统在拉美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唾弃的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赢得了胜利。他承诺将迅速结束战争。他的“光荣和平”纲领的内容是，美军从印度支那撤出，使战争越南化，也就是把战争交给南越士兵。但尼克松并未履行承诺。1969年年初，在印度支那的美国士兵人数达到了543 000人的顶点。[42]此时，美军士气已趋于崩溃状态，约1/3的士兵依赖药物，还有一些人抗拒上级命令，甚至使用炸弹将他们杀死，这一做法被称为“Fragging”。[43]1966—1970年，约有1 403名美国人脱离军队，逃到国外。中央情报局为了获得情报，与反对北越和巴特寮的老挝海洛因、鸦片毒贩沆瀣一气，其成员已走向堕落。[44]

美国主要城市的抗议示威没有停息。1969年11月，著名记者赫什对美莱村大屠杀的揭露，更激起了人们对这场毫无意义却败坏美国国际形象的战争的愤恨。但尼克松认为，如果美国撤军，把南越交给越共，那将是国家的耻辱。他向1967年开始在南越执政的阮文绍将军提供了约20亿美元的军用物资，试图让其拥有世界第四强大的空军。这些产品来自中国台湾、韩国和菲律宾。作为交换，它们获得了更现代化的装备。1971年5月重新开始的主要围绕北越释放战俘[45]和西贡地位问题的谈判未能打破僵局。这样，在美国士兵继续为捍卫一个假想国家和一个难以维持的局面付出生命代价的同时，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与北越当局进行谈判，寻求把美国从战争泥潭中拯救出来。战争已波及整个半岛——南越、北越、老挝、柬埔寨和作为行动基地的泰国。美国不仅难以赢得战争的胜利，每天却还要支出6 000万美元（一年的开支约为500亿美元）[46]，向北越、越共、巴特寮（老挝）和红色高棉（柬埔寨）投掷400吨炸弹和其他弹药。

在消耗美国经济剩余、清空兵工厂以便接受军火新订单的同时，约翰逊、麦克纳马拉及其团伙试图毁灭北越经济，并让胡志明屈服。但北越极为贫穷，1965—1968年间在那里被击落的700架美军飞机约合9亿美元的总价，远远高于轰炸所造成的北越约3亿美元的损失。[47]基辛格证实，旨在破坏北越经济的空中行动无果而终，因为那里的交通体系十分简陋，难以成为轰炸的目标。[48]向“胡志明小道”发射的导弹，仅仅摧毁了15%的目标，F-15战斗机很难发现一辆卡车。[49]越共和北越士兵虽然无法拥有美军那样先进的装备，但却采取各种战术。他们用伏击和设陷阱来对付美

军，用手榴弹袭击西贡政府官员，这令由导弹和飞机构成的美国战争机器难以应对。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1966 年，美国共耗资约 20 亿美元，但全年仅杀死 100 多名越共成员。27 000 吨因失灵而未被引爆的炸弹和其他弹药被越共改装成了地雷和陷阱。同期，越共杀死了 1 000 名美国人。[50]五角大楼提供的另一份资料表明，1969 年，美国每月消耗 128 000 吨弹药（其中 75 600 吨为炸弹，其余为地面战争所使用的弹药），而越共和北越至 1972 年共使用 1 000 吨炸药，也就是说，不足美国所使用弹药的 1%。[51]

美军的战略目的是毁灭和杀死越共和北越士兵，指望 B-52 和全副武装的直升机摧毁他们继续战斗的意志。尽管拥有空前强大的常规军事实力和源源不断的武器、弹药和石油供应，但美国输掉这场战争已成定局。因为，比起美国人，有更多的越南人做好了献身的准备，为了把美国人逐出越南，他们战斗不息，1966 年，北越总理范文同对《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说了上述这番话。[52]基辛格承认，越南人经历了他国几个世纪的统治，但却没有失去自己的特性。民族主义已成为对付入侵者和邻居的鞭子，因为，比起外国人，他们总是更不畏惧死亡。[53]负责中央情报局在印度支那行动的科尔比称，尽管苏联从来没有说过，但它对北越的影响很小。北越政府始终坚持自己的决定[54]，以便加强对老挝的控制，包括靠近河内的红河三角洲地区和穿越老挝、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他们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向南越运送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以及成千上万的士兵。[55]事实上，苏联并未掌控越南的各种事件。[56]

不管是北越还是越共，除明显的特性和独立性外，他们不仅拥有才智和勇气，而且能够利用大自然所赋予的资源在丛林中生存。他们懂得为何而战，为何去死。美国人则不然。南越人民没有把美国人当作合作者和救世主，而是将其视为帝国主义。事实上，美国把这个国家当作自己的殖民地。[57]另外，美国进行的系统轰炸并没有打垮北越的士气和勇气，就如同二战中没能使德国人屈服一样。与另一位同属民主党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一起成为反战者的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认为，越南灾难的核心是，该国最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越共不是约翰逊和他的盟友所理解的中国在东南亚推行扩张主义的工具。[58]胡志明也非美国所想象的只是中国的代理人，[59]而是一个曾经领导反法殖民主义起义的“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他也是共产主义者的事实，成为美国将其视为敌人的主要原因。[60]富布赖特认为，寻求

越南战争的解决方案，应该从民族主义是世界上存在的最强大力量这一事实以及越南最有效的民族主义运动被共产党所控制这一具体事实出发。[61]

【注解】

[1] 美国参与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的细节，可参阅 Moniz Bandeira，2001，pp. 127-184。

[2] 关于“绿色贝雷帽”在巴西的渗透，可参阅 Moniz Bandeira，2001，pp. 134-138。

[3] State Department，Top Secret Cable from Rio de Janeiro，March 27，1964；State Department，Top Secret Cable from Amb. Lincoln Gordon，March 29，1964.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4] White House Conference Call White House Audio Tape，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discussing the impending coup in Brazil with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George Ball，March 31，1964. Windows Media Audio—High bandwidth (7.11 MB).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Files.

[5] “As confissões de Lacerda”. *Jornal da Tarde*，*São Paulo*，6/6/1977，p. 20. *Friday*，*April* 3，1964-12:06 p. m.

“Thomas Mann：*I hope you're as happy about Brazil as I am.*

Lyndon B. Johnson：*I am.*

Thomas Mann：*I thin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s happened in the hemisphere in three years.*

Lyndon B. Johnson：*I hope they give us some credit，instead of hell.*”

对话从 Michael Beschloss 公布的录音中摘录。*Taking Charge：the Johnson White House Tapes，1963-1964*. Nova York，Simon & Schuster，1997，p. 306.

[6]《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15条规定：“无论任何原因，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权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部和外部事务。这一原则不仅排除武力，也排除任何其他形式的干涉或对国家特性以及组成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元素的侵犯性倾向。”第17条强调：“一个国家的领土不容侵犯。无论任何原因，都不能成为其他国家直接或间接实施的即使是临时的军事占领和其他强力措施的目标。通过武力或其他任何强制方式获得的土地或特别好处将不被承认。”

[7] 1927年以来在拉美国家进行的首次军事干涉。

[8] Connell-Smith，1966，p. 336.

[9] Johnson，1971，pp. 195-197.

[10] Connell-Smith，1966，pp. 337-338.

[11] Agee，1975，p. 419.

[12] Id.，ibid.，p. 421.

[13] Johnson, 1971, pp. 200-201.

[14] Tyson, Brady. "O sistema Interamericano depois de São Domingos", *Política Externa Independente*,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ano I, nº 3, janeiro 1966, pp. 83-108.

[15] Connell-Smith, 1966, p. 341.

[16] 关于布朗科元帅政府，可参阅 Moniz Bandeira, 1999, vol. II, pp. 87-109. Cervo & Bueno, 2002, pp. 267-280。

[17] 布朗科在伊塔马拉蒂宫向被新录用的外交官颁发证书时的讲话。em 31/7/1964.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A Política Exterior da Revolução Brasileira (Discursos), Seção de Pubicações, 1968, pp. 12-13.

[18] Inaugural Adress, January 20, 1965,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e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Johnson*, 1965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 p. 72, apud Kissinger, 1994.

[19] Letter From the German Charge d'Affaires (Lilienfeld) to President Johnson. Washington, February 25, 1966. Johnson Library, Bator Papers, Non-Proliferation, August 3, 1965-July 29, 1966, Box 30. Secret, in FRUS, 1964-1968, vol. XI.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Department of State, pp. 347-349.

[20]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Johnson. Washington, January 3, 1966, 11: 45 a. m. Source: Johnson Library, National Security File, Memos to the President—McGeorge Bundy, vol. 18. Secret. *The source text is marked with an indication that the President saw the memorandum*. FRUS—1964 - 1968. Vol. IV. Vietnam, 1966. Department of State. 1998, pp. 753-755.

[21] 布朗科在伊塔马拉蒂宫向被新录用的外交官颁发证书时的讲话。em 31/7/1964, in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A Política Exterior da Revolução Brasileira (Discursos). Seção de Publicações, 1968, pp. 12-13.

[22] Magalhães, 1982, p. 183.

[23] Apud LaFeber, Walter. "Johnson, Vietnam and Tocqueville", in Cohen & Tucker, 1994, p. 49.

[24] Frey, 2004, p. 166. Karnow, 1997, pp. 31, 543 e 615. 卡利中尉被判处无期徒刑，但 1974 年被释放。

[25] Powers, 1979, pp. 230-232.

[26] Vide também Isaacs, 1984, pp. 108-109.

[27] Cohen & Tucker, 1994, p. 101.

[28] Johnson, 1971, pp. 532-537.

[29] 美国坚持不承认朝鲜和北越确立的 12 海里领海权。

[30] 美国政府进行了道歉，但 1968 年 12 月被扣押人员获释后又收回了道歉内容。

[31] Id., ibid., p. 537.

[32] Id., ibid., p 537.

[33] Goulden, 1969, p. 242.

[34] Johnson, 1971, p. 520.

[35] Id., ibid., pp. 425-427.

[36] Id., ibid., p. 427.

[37] 由于其在民众中的号召力，马丁·路德·金被视为对美国利益“确立”的威胁。杀害他的嫌疑人厄尔·雷（Earl Ray）六个月后被抓获。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仅仅是一场阴谋中的工具。

[38] Johnson, 2002, p. 736.

[39] Seymour, 1997, p. 446.

[40] Giancana & Giancana, 1992, pp. 345-347.

[41]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Senate Resolution 21 Hearings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Ninety-Four Congress—First Session—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nd Fourth Amendment Rights, October 29 and November 6, 1975, vol. 5,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145-149.

[42] Kissinger, 1994, p. 658.

[43] Karnow, 1997, p. 31.

[44] Trento, 2001, p. 345.

[45] POW: Prisoner of War.

[46] Schulzinger, 1994, pp. 281-283.

[47] Id., ibid., p. 65.

[48] Kissinger, 1994, p. 661.

[49] 基辛格1976年对阿根廷外长古塞蒂所说的话。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antiago do Chile, June 6, 1976. Secretary's Suite. 8:10 a. m. -9:15 a. m. Participants: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cretary, the Under Secretay Roger et al. Argentina: Foreign Minister Guzzeti, Ambassador Carasales, Ambassador Pereyra et al. Distribution: ARA S/P. State Department Opens Files on Argentina's Dirty Wa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50] Isaacs, 1984, p. 126.

[51] Id., ibid., p. 126.

[52] Kissinger, 1982, p. 660.

[53] Id., ibid., p. 12.

[54] Colby, 1978, p. 194.

[55] 这一穿越老挝南部和柬埔寨东北部直至南越山脉的小道不仅仅是一条道，而是丛林中一连串复杂的小道。美国的飞机和直升机即使低空飞行，也难以看清任何东西。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土著部落以猎杀老虎、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为生。在其迁徙过程中，已开辟了各种小道。在几个世纪里，它们被商人和苦力队伍用来从中国往东南亚运送黄金和鸦片。Karnow, 1984, pp. 346-348.

[56] Isaacs, 1984, p. 29.
[57] Trento, 2001, p. 339.
[58] Clinton, 2004, p. 100.
[59] Fulbright, 1982, p. 145.
[60] Id., ibid., p. 145.
[61] Id., ibid., p. 145.

第十六章

军事力量的局限性　惨遭破坏的柬埔寨　美国实施化学和细菌战　“农业贸易”和大公司　借越战牟利　对自由和人权的侵犯　“五角大楼文件”的披露　经济危机　抢购黄金和《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破裂

越战毋庸置疑和触目惊心地证明，不管美国的军事实力有多么强大，也难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拥有最现代化技术、电子武器和其他精良、神秘的军事装备固然重要，能使其具备无限的摧毁力，但不足以战胜与自然完美共生、能在最原始条件下生存、英勇善战并得到南越各地民众最广泛支持的军队。美国确实能依靠空中力量和核武器等摧毁这个国家，但约翰逊最后只能像一位医生那样说：“手术成功了，但病人却死了。”而这里的病人并不仅仅是越南，也包括美国，科尔森上校这样说。[1]他进一步指出：

> 越来越大的“胜利”不仅会加速南越社会的彻底毁灭，而且在可预见的某个时候，追逐胜利将造成美军严重的军事失败。[2]

胜利反而会是一种失败，但军工集团的生意就是战争，它促使武器得到消耗，库存得到更新，使资本实现再生产。在约翰逊执政的四年中，美国在印度支那投下的炸弹，比二战期间在日本和德国投下的还要多。在尼克松执政的三年中，所投炸弹数量超过了约翰逊执政的四年。[3]空中恐怖主义行动极为残酷。1965—1973 年，美国 B-52 轰炸机投下了 800 万吨炸弹，是二战期间所投炸弹的三倍，相当于向每个越南人投掷了 300 公斤炸弹[4]，造成约 1 000 万人流离失所。在老挝这个面积相当于英国，但仅拥有 300 万人口的国家，至 1969 年，美军在一个被委婉地称为“武装侦察”的行动中，投下了 454 998 吨炸弹。尼克松执政后，每年所投炸弹数量更

大。至1973年，在其四年任期中，共投下2 092 900吨炸弹，是前一个四年的五倍。[5]柬埔寨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巴黎协议签署后的11天内，它遭受了美军战机的攻击。从2月9日起的6个月时间中，轰炸行动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程度持续不断。在1973年的军事行动中，美军共使用了250 000吨炸弹，在半年内所用炸弹比二战期间打击日本的数量还多。[6]20世纪60年代柬埔寨稻米收成为每年300万吨左右，1969年曾达380万吨。由于轰炸，1972—1973年产量仅为953 000吨，1974年更减至493 000吨。[7]柬埔寨农民的一半牲畜包括耕畜死于轰炸，就连民众用来补充蛋白质的鱼类也未能幸免，因为一半以上的河流和干净水源位于共产党控制区内。[8]按富布赖特参议员的说法，美国的口号是“争强！争取更多资金生产炸弹！争取更多权力！我们定要成为第一”。[9]

美国还以1961年的“牧场行动计划”为开端实施并扩大了化学和细菌战。该计划后改称“研究和发展计划”。在实施“牧场行动计划”中，两架C-123战机进行了6架次飞行，共在南越喷洒了5万加仑除草剂和化学落叶剂。[10]这些用以落叶的化学物质不仅摧毁了树木和植物叶子，破坏了土壤和环境，还造成南越民众中毒。[11]中毒人数众多，许多儿童失明，还有许多牛和猪被毒死。[12]曾在越南服役的科尔森勇敢地揭露，为了“大生意”的利益，美军在1967年年底就发动了化学战。那一年，执行“牧场行动计划”的飞机在南越洒下了400万加仑除草剂和化学落叶剂，这一数量为“所有美国公司”年产量的四倍。[13]道氏化学是国防部在越南使用的化学除草剂的最大供应商之一，秘密存放的其他部分则来自国际卡特尔。科尔森上校揭露，化学战行动发展到了“惊人地步，而且还在不顾后果地继续”。事实上，美国空军在越南投下了40万吨凝固汽油，毁坏了40%的庄稼和果园，并喷洒了1 200万～1 500万加仑“橙剂”，其目的是清除丛林，降低遭伏击的危险，并减少越共控制区的食物供应。[14]这些对老人、孩子和孕妇造成尤为严重危害的化学战行动，给美国的“农业贸易”带来了巨大利润，南越过去有能力生产大量稻米养活其国民并可用以出口（1963年出口约30万吨）。但随着化学战的加强，1967年，却反而从美国进口170万吨稻米。[15]难民营里挤满了营养不良的人们。

战争还给美国的大公司带来了其他利润丰厚的生意。盛行的系统性腐败是这些生意的润滑剂。科尔森上校指出，“虽然，对外政策并非由那些工业集团负责制定，但它们却把越南当作一个好东西加以利用”。[16]他举例说，国防供应局为购买20万个带刺铁丝线圈，把一个190万美元的合同给了共和钢铁公司，这相当于5万英里长的带刺铁丝，足以把北越和南越

之间长 43 英里的边界缠上 1 000 多道。[17]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而为此埋单的却是孩子在替战争卖命的美国纳税人。在政府需要用新订单弥补损失的物资时，还是由他们来支付新合同的开销，如 1967 年 7 月 15 日晚，岘港遭到越共袭击，价值 7 500 万美元的飞机、弹药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18]

美国在打击北越的空战中投入 60 亿～80 亿美元，但收效甚微，也就是说，未能阻止或减少越共的供应和共产党军队向南越的运动。[19]科尔森上校认为，事实上，对北越的轰炸使美军遭受的打击更大。科尔森称，“对北越的空战是一个昂贵的腐败行为”[20]。为数不多的空军和海军将军们所希望的是，在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支持下，获得更多飞机、更多飞行员和更多款项，由美国人民承担增加的军费。当艾森豪威尔警告军工集团对美国构成威胁时，他难以预料越南战争所形成的合谋体系会达到如此广泛的地步，高级军官能如此容易地进入民用工业。无数人从现役转入道格拉斯、立顿、通用电器等众多公司[21]，理由是，“对通用电器有益的东西就一定有益于美国”[22]。不管是低级还是高级军官，即使是从事行政服务的军人，都能以跟踪战争进程为名，通过从五角大楼或夏威夷出发前往越南的旅行捞到好处。根据规定，如果他们在越南住上五天，就可以免交 500 美元的所得税，并以津贴名义获得 65 美元“作战费”。这类旅行他们每个月进行两次或更多。这样，除了 130 美元的“作战费”，还能免去至少 1 000 美元的税款。文职人员也能获得 500 美元的免税，但不享受津贴。[23]

尽管美国四任总统均承诺扶持西贡政府，但印度支那并非美国践行允诺的最佳场所。弗农·沃特（Vernon A. Walters）将军也承认这一点。[24]他们扶持西贡政府徒劳无益。仅仅在 1972—1973 年间，美军便投下了 4 000 枚精确制导炸弹，并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常规武器，但美国巨大的空中优势未能保证其取得胜利。在北越、柬埔寨和老挝所投下的这些炸弹，反而从经济、道德和政治上撼动了美国社会本身，美国固有的民族共识破裂。1968 年总统选举期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得到了 31 770 237 张选票，以不到 1%的民众选票微弱优势战胜了民权捍卫者、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后者共获得 31 270 533 张选票。但那并非一场干净的胜利。1968 年 4 月，五角大楼宣布“越南化”意图。10 月 4 日，约翰逊下令中止对越南的轰炸，他声称是为了使巴黎和谈有成果。尼克松竞选运动协调员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通过为美国和东亚国家非官方接触牵线的陈香梅（Anna Chennault）[25]，说服阮文绍不参加会议。后者答应了美国的要求。11 月 2 日，在美国选举前几天，阮文绍宣布将不去巴黎，理由是“全国解放阵线”（越共）被会议接纳，

而美国想强迫他与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26]尼克松的追随者于是乘机向约翰逊发难，指责他在没有对所有外交活动进行分析的情况下就采取和平行动，是为了帮助民主党候选人汉弗莱。[27]约翰逊得知了这一意在破坏巴黎谈判的行动，因为司法部对陈香梅和南越大使的电话进行了监控。约翰逊对汉弗莱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利用尼克松卷入一场背叛行动的情报。[28]汉弗莱输掉了选举，“保守民粹主义”作为美国主导政治力量取代了“进步民粹主义”。[29]但民众的抗议以及总统选举期间的反越战示威并没有停息。1969 年 3—4 月，尼克松上台后不久，在旧金山、剑桥和伊萨卡等地发生了学生暴动。在芝加哥犹太人居住区，黑人与警察爆发了冲突。愈演愈烈的动乱引起了白宫的极大关注。和约翰逊一样，尼克松也认为有外国势力在支持示威活动。[30]面对这类事件，尼克松于 1969 年 4 月指示其顾问约翰·亚列舒曼（John Ehrlichman），让情报机构起草一份关于“外国势力支持”发生在大学校区动乱的报告。但外国支持的证据并不存在。他对收到的信息并不满意，认为不够全面。其助理汤姆·休斯顿（Tom Charles Huston）等人认为，更好地收集示威者计划的情报，有助于对存在暴力倾向的反对者采取决定性措施。他们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于 1960 年年中做出的减少某些侦探技术（尤其是歪曲事实的侦察和渗透）的决定，致使在获取情报方面存在严重缺陷。

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国内情报的副局长苏利文支持休斯顿关于取消胡佛所规定限制的提议。尼克松同意对美国国内情报搜集手段进行修改，因为，美国入侵柬埔寨再度引发的大规模学生示威令他感到担忧，尤其是 1970 年 5 月 4 日和 14—15 日发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校园内和杰克逊市（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州立学院内的严重骚乱。在肯特州立大学，四名学生被国民警卫队打死。6 月 5 日，他召集情报部门负责人联邦调查局埃德加·胡佛、国防情报局唐纳德·贝内特（Donald V. Bennet）和国家安全局诺埃尔·盖勒（Noel Gayler）上将开会，目的是建立一个能够协调各种情报活动的机构，以便为他提供既包括阿尔-法塔赫这类外国团体和组织，也包括美国国内社会主义工人党、新左派、黑豹党和民权团体、学生团体等持不同政见组织的各类情报。[31]他决定组建一个常设跨部门委员会，即一个由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和军事反情报部门组成的特别小组。其任务是对情报搜集和调查方法进行审视。白宫在该特别委员会中的代表汤姆·休斯顿为总统助理哈德曼（H. R. Haldeman）准备了一份名为《现行情报搜集限制》的备忘录。他在该备忘录中建议放松对情报搜集的限制，其建议包括：（1）对美国公民的

国际通信进行监视；（2）加强对美国持不同政见者和特定机构的电子监视；（3）审查美国国民的国际信件；（4）有权搜查特定机构和美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住宅；（5）加强对学院和大学的电子监视。[32]

休斯顿认为，为了打击那些显然会威胁社会的力量，就应该置法律于不顾。尼克松批准了他的建议。1970 年 7 月 14 日，哈德曼告诉休斯顿，他已批准取消法律限制的方案。这样，宪法所赋予的一切保障几乎被全部取消，于是，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开始监听不同情报部门所提供的“监视名单”中所列美国公民的谈话，中央情报局继续从事其非法拆信计划，联邦调查局降低了学院和大学校园中情报员的年龄，加紧了对学生的监视。1970 年 12 月，应白宫要求，情报部门建立了一个跨部门常设委员会——情报评估委员会，负责评估搜集到的情报。但“休斯顿方案”中的许多建议依然未能实施。1971 年 3 月 22 日，诺埃尔·盖勒和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要求总检察长米歇尔放松对一些重要情报搜集行动的限制。尼克松在得知这些措施的非法性后将其否决。对“休斯顿方案”的反对主要来自胡佛局长，他的担忧是，万一内容泄露出去，就会遭到新闻界的抨击。尼克松对胡佛的反对感到意外。[33]国家安全局继续有意识地监视美国公民的国际通信。实际上，它在“休斯顿方案”制定前就已采取此做法。各个情报部门新提供的名字使“监视名单”不断扩大。正如艾森豪威尔在其告别演说中所预言，军事和工业集团的利益结合，“使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处于危险之中”。对战争的需求使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试图向拉美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镇压体系国内化，其目的是保证并扩大美国大公司的投资。对不同思想的宽容正在消失，美国越来越像一个专制国家，越来越与苏联相似。

这些违反美国宪法和法律、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措施，未能阻止示威活动在此后几年中继续增多。1971 年 6 月 13 日，《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一些被确定为秘密等级的文件摘要。这些文件包含在《美国越南政策决策程序史》文集中，以“五角大楼文件”著称。[34]几天后，《华盛顿邮报》也紧随其后，刊登了文件内容。这些文件显示，胡志明曾数次写信给杜鲁门请求帮助，但杜鲁门却置之不理。与此同时，他在国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法国提供武器支持。艾森豪威尔同意将越南分割并扶持一个腐败政府，还支持吴庭艳推迟选举并发动政变。约翰逊则炮制了莫须有的东京湾袭击事件，以便在没有正式宣战情况下向北越发起进攻。

美国历任总统为了得到公众对不希望发生的战争的支持而欺骗国会和舆论的行径被揭露后，舆论一片哗然，尼克松感到非常恐慌。因为，即使

是约翰逊执政时期政府的内部争斗及其两面性，都会打击人们对其领导地位的信心和信任。他深感沮丧，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他猜想苏联大使馆事先得到了文件的复印件。[35]于是，他下令在白宫专门设立一个秘密机构，“以避免安全漏洞，并调查其他敏感安全事项”[36]。华盛顿政府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阻止文件的刊登，但在最高法院以三票对六票落败。给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看病的神经科医生路易斯·菲尔丁（Lewis Fielding）的诊所被尼克松的情报人员捣毁，情报部门的目的是搜集有关他所持态度的原因和动机的信息资料及可能的同谋者名字。[37]由总检察长米歇尔担纲的司法部对埃尔斯伯格提出起诉，并以背叛罪、盗窃罪、间谍罪和谋反罪将其逮捕。然而，在1973年水门丑闻后，政府渎职的事实昭然若揭。因而，法院做出了政府起诉目的属迫害的裁决。[38]

尽管1964年的军火订单和减税政策曾刺激经济自1965年年底起快速增长，但越南战争已开始影响美国经济。约翰逊意识到美国的武器库存量高于需求，曾承诺削减国防预算[39]，但他未能如愿。国防预算占联邦预算的比例从1964年的41.8%上升到1968年的43.3%。相对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也从1964年的8.3%提高到9.9%。[40]1966年的国防支出增加130亿美元，增幅为25%，1967年再增90亿美元。在国外的军费开支1966年增加8亿美元，1967年又增6亿美元。这对美国的国际收支产生了强烈冲击。1970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达98亿美元。[41]在约翰逊执政期间，用于教育的支出从230万美元增至1 008万美元，卫生支出则从410万美元增至2 460万美元。[42]由于1968年起出口的下降，1970—1971年间，贸易顺差不复存在。此外，减税以及1964年约翰逊宣布的“对贫困的无条件战争”[43]使得财政赤字状况更加恶化，从1966年的37亿美元增至1967年的88亿美元，1968年更上升为250亿美元。[44]通胀则从1961年的1.5%左右升至1968—1969年间的4.7%。[45]美国的国民总产值在二战期间翻了一番。1970年前，它相当于世界总产值的34%，到1971年已降至不到30%，美元地位也因此受到削弱。

美国经济恶化导致《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此前，这一体系的运转还算顺利。20世纪60年代，美国采取了旨在把战争成本转嫁到西欧特别是联邦德国的单边货币政策和遏制苏联的政策，货币体系的稳定开始依赖于美国对货币政策的驾驭，这意味着对其整个经济的驾驭。约翰逊和尼克松在印制美元上拥有绝对自由，以便能支付美国的进口以及冷战和越战的费用，而其他国家则不得不出口越来越多的商品来支

付外债，并增加国际储备以支撑本国货币的币值。美元的国际需求使得美国得以通过自《布雷顿森林协定》以来其他国家所依赖的这一资助机制，转嫁其经济的结构性困难，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变成了世界货币资本流动性增加的主要来源。按戴高乐将军的说法，美国可以继续通过印制美元投放市场来弥补其赤字，这样做似乎使美国处于“一种过分有利的地位”[46]。但美国顽固地拒绝必要的调整，这表明它已不再像1945年以来所做的那样，能够继续驾驭国际金融体系。约翰逊在军备、冷战和越战中的开支使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不断减弱。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用黄金取代它所拥有的美元储备。1966年，法国购入6亿美元的黄金。[47]但很多欧洲银行特别是德国银行仍继续在一段时间中持有美元。

1970年，俄亥俄州企业家爱德华·达雷尔（Edward Durrell）揭露，存放在诺克斯堡的美国黄金总储备量已明显减少，据说高达8 500吨的黄金仅剩1 000吨。约翰逊已在1967年和1968年年初将其中大部分运往伦敦出售，以维持35美元/1盎司的黄金价格。[48]事实上，美国发行和花费的美元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它投入流通的美元已难以与诺克斯堡所存放的黄金储备维持平衡。1971年，以35美元/1盎司的官方价格计算，所储存黄金只相当于120亿美元。而外国银行所拥有的美元储备已从238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7月的360亿美元，到8月，更增至400亿美元，比美国需要用来履行布雷顿森林会议所承诺责任的价值高出三倍。[49]恐慌情绪蔓延到整个市场。外汇储备增长的德国于1971年允许马克浮动。荷兰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也采取了同样做法。美国财政部遭受了大出血[50]，可被用来衡量某种货币健康程度的国际收支赤字已变得很大，而且还在继续上升。收支赤字、美元贬值、通胀、经济萧条、贸易顺差萎缩，以及尤其是来自日本的国际竞争，促使尼克松将进口税调高10%，并于1971年8月15日中止了《布雷顿森林协定》所确立的美元和黄金的兑换比例。当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来到财政部，要求把30亿美元兑换成黄金时，尼克松做出了“关闭窗户”的决定。[51]诺克斯堡的储备正是通过这一“窗户”蒸发。尼克松担心其他国家仿效这一做法，从而引发危及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严重危机。因为美国不拥有足够储备来满足各国对黄金的抢购，这样就会导致美国破产。因此，尼克松只能让美元与黄金脱钩。1971年12月，以美国为首的十国集团[52]签署了类似《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史密斯协定》。[53]该协定允许各国货币有更大浮动（±2.25%），并把黄金价格提高到每盎司38美元，美元贬值8%。1972年，欧洲共同体试图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建立了共同浮动体系。“欧洲联合浮动”由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

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创立。但美国经济问题仍不断加剧，尼克松被迫让美元再贬值10%，导致《史密斯协定》和“欧洲联合浮动”均于1973年崩溃。这为各国货币自由兑换铺平了道路，由美国独家印制的美元成为了国际信托货币。

根据1971年在德黑兰和的黎波里达成的协议，美元贬值意味着石油价格将立即提高5%，而且还将进行新的调整，以弥补美元的再度贬值，因为石油价格以及支付给生产者的费用都按美元计算。1972年年底，石油输出国组织被允许对石油价格进行大幅度调整，以补偿美元的贬值。1973年2—3月，美元相对马克贬值约40%。[54]能源成本变得惊人之高，使得中东成为新兴跨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供应西方国家的石油中，有约60%来自中东油田。石油、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利益更加交织在一起。对美国利益来说，中东变得和远东甚至西欧一样或更为重要。于是，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集团。[55]石油输出国组织出口石油收入的大部分被以美元形式存入西欧银行。这一做法使美元保持坚挺，并使20世纪70年代跨国金融体系取得巨大发展。但黄金标准与美元可兑换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破裂，以及石油在“赎罪日战争”期间的涨价，造成石油美元充斥世界市场，出现流动性过度，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增加，连波兰和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未能幸免。

发展中国家负债是那些使石油美元再循环的国际性银行造成的。它们在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国家怂恿下并在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肯后，以低利率轻易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信贷。这样，富国，也就是美国等工业国家，作为石油消费者，开始通过石油美元的再循环，向穷国转嫁其赤字，避免了与石油生产和出口国的冲突。[56]这场由跨国银行和企业推动的资本运动，扭曲了货币标准、储蓄规则、公共投资和各国的银行组织。[57]金融资本进入了另一个扩张周期，它依托于一个新自由主义性质的经济策略。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开放和稳定计划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军政府国家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施。乌拉圭经济学家萨姆埃尔·利支敦士顿（Samuel Lichtensztein）认为，“尽管是相对的，但事实上，跨国现实使政治选择，包括民主计划的自身发展变得狭窄，尤其在不发达国家”。他进一步指出，这样做要揭示的是，渴望并推动资本和收入更大集中的跨国扩张行为正在与国家专制意识的形态和做法趋同并更加相容这一现实，而并非使那些损害跨国公司利益的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权变得不稳所发挥的作用。[58]

随着世界市场石油美元的泛滥，二战后出现的工业生产国际化更加深入。1950 年，美国企业在国外的直接投资为 80 亿美元。到 1971 年，仅在欧洲的直接投资就超过 600 亿美元，大部分投资集中在工业领域，如电脑、电子设备、汽车、化工、医药和电信等。美国企业在欧洲大量投资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它们在那里看到了孕育着巨大商机的丰富市场，尤其是在经济恢复领域。此外，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然后把产品销往美国。然而，随着社会福利国家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确立，资本开始向亚洲和拉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转移。

大公司为了弥补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的建立了社会福利国家的西欧和美国由于高薪而导致的利润下降，加强了对拥有丰富劳动力和原材料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出口。工厂，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工厂分散和转移到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恢复平均利润率。国际资本的这一运动推动了“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新兴工业国家”的产生是劳动国际重新分工的结果。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此极力保持技术垄断、资本产品生产和金融中枢地位，并把部分消费品生产转移至第三世界的国家。尽管落后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能以某种形式从资本主义的这一扩张中受益，但其经济极易受跨国企业商业活动的危害。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30%左右）[59]转而通过公司内部，即在跨国企业总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或者同一家公司的各部门之间，通过提供贷款、技术和服务等交易来实现。这种内部交易能够对转让价格进行调节，其结果将损害公司所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这样，跨国公司不仅通过价格的人为转移获得了操纵金融流通的巨大能力，而且能够通过企业内部贸易的限制性行为强加交易，限制子公司的出口自由，在各国之间划分市场，并限制它所拥有的技术或由子公司研发技术的使用。这一资本跨国化以大企业扩张为特点，约 200 家大企业的总部设在美国。它们参与并集中控制世界市场的生产和消费结构的战略核心，制约了民族国家特别是南半球第三世界国家的决定和操控能力。

北半球国家，尤其是美国，集中了全世界 90%以上的制造业。其跨国公司不仅垄断了大部分专利权和新技术，而且控制了国际经济体系及其规章、金融、货币和国际贸易机构。与以往一样，彻底的经济自由和自由竞争将会造成各国间越来越大的不平等。据国际劳工局估计，20 世纪 70 年代初，第三世界约有 7 亿人生活在赤贫状态。而按世界银行的估计，这一数字将增至 8 亿[60]，仅拉美就达 1 亿人。在拉美 23 个国家中的 12 个，只有一半多一点的人口拥有购买维持家庭所需物品和服务的能力。在整个南

半球，约40%的人口备受贫困煎熬，其收入难以满足生活的最基本需要。[61]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人口增长超过食品生产，这使得农村生存条件日益恶化。[62]这样，负债愈来愈多的南半球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为首的北半球工业国家卡特尔之间的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变得十分尖锐。

20世纪下半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所预见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前景已不复存在，战争已转移到资本主义边缘的第三世界国家。法国与德国，或者德国与英国，甚或它们中的某一国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已难以想象。考茨基关于金融资本联合起来剥削世界的预言却得到了应验[63]，尽管这一联合并未消除工业国之间在金融市场的商业竞争和矛盾。1975—1976年间，全球体系管理权实际上已从联合国安理会交到由美、日、德、英、法、意、加政府首脑组成的七国集团手中。[64]该集团的初衷是协调国际金融政策，后又扩展至安全、经济和政治稳定等其他方面，考茨基预言的工业强国卡特尔得到了巩固。

【注解】

[1] Corson，1968，p. 264.

[2] Id.，ibid.，p. 286.

[3] Ellsberg，1972，p. 38.

[4] Frey，2004，p. 165. 仅在1965—1968年间，美军战机就在北越投下了300万吨炸弹，超过二战期间在欧洲和日本所投炸弹的总数。Schulzinger，1994，p. 276.

[5] Isaacs，1984，p. 161.

[6] Id.，ibid.，p. 217.

[7] Id.，ibid.，p. 224.

[8] Id.，ibid.，p. 224.

[9] Fulbright，1989，p. 133.

[10] Corson，1968，p. 76.

[11] Maneli，1971，pp. 85-86.

[12] Id.，ibid.，pp. 85-88.

[13] Corson，1968，p. 76.

[14] Id.，ibid.，p. 76.

[15] Id.，ibid.，p. 77.

[16] Id.，ibid.，pp. 81-82.

[17] Id.，ibid.，pp. 81-82.

[18] Id.，ibid.，p. 84.

[19] Id.，ibid.，p. 265.

[20] Id.，ibid.，p. 265.

[21] Id.，ibid.，pp. 251-252.

[22] Id.，ibid.，p. 251.

[23] Id.，ibid.，p. 259.

[24] Walters，1978，p. 478.

[25] 陈香梅出生于中国，是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将军的遗孀。在美国参与二战前，陈纳德是“飞虎队”统帅，后成为盟军空军远东司令。1967 年，陈香梅被邀请参与尼克松的竞选运动。她接受邀请是因为尼克松承诺要结束越战。但他没有履行诺言，战争没有结束。陈香梅发出了失望的感慨：“政客从来都不诚实。”

[26] Clinton，2004，p. 140. Wise，1976，pp. 294-295.

[27] Clinton，2004，p. 140.

[28] Id.，ibid.，pp. 140-141，145.

[29] Id.，ibid.，p. 144.

[30] 约翰逊就反战运动是否与外国势力有联系也多次询问情报机构。Supplementary Detailed Staff Report o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nd the Rights of Americans. Final Report，Book III，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U. S. Senate，2nd Session，April 23（under authority of the order of April 14），1976.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p. 928-929.

[31] Supplementary Detailed Staff Report o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nd the Rights of Americans. Final Report，Book III，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U. S. Senate，2nd Session，April 23（under authority of the order of April 14），1976.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p. 950-974.

[32] Supplementary Detailed Staff Report o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nd the Rights of Americans. Final Report，Book III，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U. S. Senate，2nd Session，April 23（under authority of the order of April 14），1976.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p. 952-960.

[33] Ibid.，pp. 957-958.

[34] 麦克纳马拉请莱斯利（Leslie H. Gelb）进行的名为“五角大楼文件”的研究于 1967 年年中完成，它被确定为“最高机密”，共 47 卷，7 000 页，包括近 3 000 页历史叙述和 4 000 页附件。仅做了 15 个副本，其中 2 个交给了替五角大楼效力的兰德公司。期间，作为国防部官员于 1965—1967 年间在越南工作并曾与莱斯利共事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看到了在兰德公司的一个副本。他深信政府没有说明真相而是在欺骗民众，于是就将文件透露给了《纽约时报》记者尼尔·希恩（Neil Sheehan），后者开始将其发表。Vide McNamara，1995，pp. 280-283.

[35] Nixon，1978，p. 513.

[36] Kutler (ed.)，1997，pp. 7-20.

[37] Nixon，1978，p. 514.

[38] 对埃尔斯伯格的指控于 1973 年 5 月 11 日被撤销，总检察长约翰·米切尔被指控犯有阴谋、发假誓和妨碍司法罪。

[39] Johnson，1964，pp. 175-176.

[40] Fiscal Years 1964 to 1979. Department of Defense，press release，23 January 1978.

[41] Solomon，1977，pp. 102-103.

[42] Johnson，2002，p. 739.

[43] Johnson，1964，p. 168.

[44] Johnson，2002，p. 739.

[45] Nixon，1978，p. 516.

[46] *Norte-Sur*. 一个生存计划。威廉·勃兰特（Willy Brandt）担任主席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c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Bogotá：Editorial Pluma，1980，p. 305.

[47] Solomon，1977，p. 102.

[48] 詹姆斯·塔克（James Turk）在 1999 年 12 月 13 日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有权利知道”的文章（http://www. fgmr. com/right2know. htm）中重提了企业家爱德华·杜勒尔（Edward Durrel）所作的揭露。塔克为前银行家，曾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工作，是 *Freemarket Gold & Money Report* 杂志的编辑。美国财政部在 2001 年 12 月 30 日的一个声明中表示，当时的黄金储备总额为 2.615 亿盎司（8 134 吨），其中 1.473 亿盎司（4 583 吨）“深藏”在诺克斯堡。(http://www. fms. treas. gov/gold/01-12. html)(http://www. fgmr. com/response. htm)

[49] Bundy，1998，p. 361.

[50] Salomon，1977，pp. 108-109.

[51] Bundy，1998，p. 263. Nixon，1978，p. 518.

[52] 十国集团为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非国际货币基金成员的瑞士也派出了代表。

[53] 以此命名是因为十国会议是在由史密斯创建的华盛顿美国国际博物馆举行。Vide Solomon，1977，pp. 216-219.

[54] Johnson，2002，p. 763.

[55] Gerson & Birchard (eds.)，1991，p. 282.

[56] 审核巴西外债问题并评估政府不再支付外债产生的国内外金融负担理由的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报告——1988 年 3 月。报告人：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参议员。Requerimento nº 17，de 1987.

[57] Lichtensztein，1985，p. 8.

[58] Lichtensztein，1985，pp. 62-63.

[59] *Norte-Sur*. 一个生存计划。威廉·勃兰特担任主席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c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Bogotá：

Editorial Pluma，1980，p. 283.

[60] Ibid.，p. 78.

[61] Ibid.，pp. 78－79.

[62] Ibid.，p. 80.

[63] Die Neue Zeit，30/4/1915.

[64] 加拿大于 1976 年加入。

第十七章

约旦的巴勒斯坦人起义　尼克松、基辛格及其“现实政治”　美国对中国的承认　与苏联达成谅解　美军撤离越南和《巴黎协议》　占领河内的“体面间隙”　美国与智利军事政变　“赎罪日”战争　石油危机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重大政治事件也开始改变国际政治格局。在中东，约旦的侯赛因·塔拉勒（Hussein Bin Talal）国王与那里的巴勒斯坦难民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以色列军队1967年入侵西岸后，巴勒斯坦人已占约旦人口的多数。1970年9月1日，因不满侯赛因国王奉行的亲西方和支持以色列政策，巴解组织激进派别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一名成员对其实施了暗杀行动，但未能得手。9月7—9日，该组织多名成员劫持了瑞士航空公司、环球航空公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和不列颠航空公司的客机。飞机被分别劫持到约旦的道森机场、安曼和开罗。劫机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并“因为美国人长期支持以色列，因而就得给他们一个教训”。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成员在侯赛因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后同意让乘客离开飞机。但他们当着电视镜头将飞机炸毁，并宣布约旦第二大城市伊尔比德为“解放区”。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企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支持下夺取政权。按照亚历山大·黑格的说法，没有人相信巴勒斯坦人会接受没有经过斗争的政府重组。[1]基辛格认为，保住曾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侯赛因国王是中东和平的关键，他的下台可能会导致一场世界战争。基辛格甚至考虑让被视为美国在该地区政治资本的以色列进入约旦，去营救侯赛因国王。但尼克松认为，这一方案虽能避免侯赛因倒台，但会削弱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地位。美国的目的是挽救约旦政府，并使其在渡过危机后变得更加强大。

9月16日，在美国和以色列支持下，侯赛因国王宣布戒严令，并动用

60 个装甲旅进攻巴勒斯坦人在安曼的据点以及在伊尔比德、萨尔特、斯威莱赫和扎尔卡的营地。负责培训约旦军队的巴基斯坦人齐亚·哈克（Muhammad Zia-ul-Haq）将军担任第二师指挥官。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遭到杀戮。18 日，叙利亚的苏制坦克在由从难民营招募的巴勒斯坦人组成的巴勒斯坦解放军支持下进入约旦。以色列空军在约旦北部袭击了叙利亚的坦克纵队，摧毁了大量坦克。与此同时，尼克松命令“萨拉托加号”、“独立号”和“肯尼迪号”航空母舰以及其他配备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部队开赴该地区。美国还试图与苏联达成谅解。苏联当时正寻求摆脱西方包围，以便确立一个不卷入冲突的生存状态。黑格将军认为，以色列的空中打击，加上美国建立在陆海空压倒性优势基础上的强大外交攻势，保住了侯赛因国王政权。[2]遭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找到了避难所。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制造杀害以色列运动员惨案的“黑色九月”组织、真主党和伊斯兰抵抗运动等准军事组织，纷纷在其营地诞生。自那时起，以哈马斯闻名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敢死队”[3]对以色列发起了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它不时采用导弹和人肉炸弹等恐怖手段对其进行攻击。

当时，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加与经济的持续衰落形成反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严重摩擦促使其寻求与西方改善关系。由阿布拉西莫夫大使（Pyotr Abrassimov）策划的更换民主德国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行动（1971 年 5 月 3 日）使苏联与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谈判得以打破僵局。1971 年 9 月 3 日，由四个占领国签署的《西柏林条约》解决了柏林问题，其补充协议和 1972 年 12 月签署的《基础条约》促使两个德国建立了关系。但这一关系并非外交关系，而是按照双方不是两个外来国家而同属一个民族的两个国家这一模式互派简单代表处。根据这一谅解，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该会议于 1975 年 8 月 1 日在赫尔辛基召开。

基辛格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认知意识到，寻求绝对安全是一种空想，因为那会使其他所有国家感到不安全。只有认识到世界局势永远不可能彻底和谐，才能实现一种相对安全。[4]他认识到了美国实力的局限性。尼克松尽管与基辛格关系紧张，但却没有摒弃他的“现实政治”。同时，他在智利和柬埔寨等国继续发动秘密战争[5]，并尽量与苏联相安无事。1972 年美苏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使冷战降温。为避免苏联在西恩富戈斯湾的阿尔卡特拉斯岛建立潜艇基地，尼克松再次承诺，美国不会侵犯古巴。记者赫什将这一事件称为一场“虚假的危机”，其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尼克松在 1972 年总统选举中获得连任。他同

样相信，肯尼迪为了在1962年11月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得到犹豫未定者的选票，操纵了当年那场导弹危机。[6]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指责政府为了让国会慷慨地向五角大楼批准资金，捏造了西恩富戈斯潜艇基地问题，目的是欺骗舆论。[7]富布赖特承认，尽管国会大部分议员无意削减国防项目预算，三叉戟核潜艇和B-1轰炸机等多个军备项目被保留下来，但不管怎么说，尼克松为与苏联建立“缓和”所作的努力非常重要。[8]

与此同时，美国打破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僵局。自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美国一直拒绝对其予以承认。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来到北京。这一标志着美国回到“现实政治”世界的行动，并非一个突然的政治行动，1969年就已开始趋于成熟。当时，苏联为了让中国接受按照勃列日涅夫主义制定的莫斯科方针，似乎有可能像它在前一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那样入侵中华人民共和国。尼克松向莫斯科表示，“对这一争端深感忧虑”。这在外交语言上意味着，美国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支持中国。中美双方的接触在第三国展开，先是在波兰。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赛尔（Walter Stoessel）和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Walters）将军试图打开沟通渠道[9]，他们试着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Kahy Khan）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与中国进行沟通。[10]1971年，基辛格秘密与周恩来总理会面，并与其交谈了约17个小时。[11]他认为，周恩来是他认识的人中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两三位人物之一。[12]科尔森上校则认为，周恩来是20世纪涌现的最精明谈判者之一。[13]

摆脱所面临危机和开辟市场的需要，以及利用1969年加剧的中苏分歧的意图，是导致美国承认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它一直拒绝的毛泽东政府的主要因素。尼克松清楚，访问的成功取决于他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接受“一中一台”方案。[14]尽管他起初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做出了多项承诺，其中包括不支持被中国视为属自己一个省的台湾的“独立”；越战结束后撤走部署在那里的军队。[15]只有这样才能使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基辛格承认，两国接近并不是因为抽象的良好愿望，而是利益的交汇[16]，其中包括美国认为苏联和印度联合可能主导亚丁湾至马六甲海峡的广大地区这一因素。正因为如此，美国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达成和解。[17]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说明，美国自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对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是失败的。

尼克松北京之行还清楚地表明，美国在越南的承诺正在终结。在出发

去北京前不久，他下令从南越再撤出 70 000 名士兵，把驻扎在那里的军队总人数从 536 000 降至 69 000。[18]美国已难以维持这些军人，也因为自尼克松 1971 年 7 月 15 日宣布其访华意图后，这一战争在全球政治中已变得不合时宜。[19]此外，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加剧，示威游行在美国 1970 年和 1972 年接连入侵老挝和柬埔寨后再度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试图将战争“越南化”，单方面、无条件从越南撤出仍在那里的地面部队。他意识到不可能取得胜利，甚至想取得体面的结果也成问题。[20]但他又加紧了对北越的轰炸。1972 年平安夜，北越首都河内遭到猛烈空袭。在 11 天时间中，美军共投下约 20 000 吨炸弹，其中 15 000 吨为 B-52 轰炸机所投。[21]尽管未能通过平安夜轰炸从河内政府那里得到大的让步，但尼克松却于 1973 年 1 月 15 日宣布结束空袭，理由是，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有望结束。[22]北越仅仅接受了“交换条件”，即释放美军战俘，以换取美军在 60 日内从南越撤离。[23]1973 年 1 月 2 日，众议院以 154 票对 74 票，通过裁掉用于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所有资金的决议。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随之向参议院民主党党团会议提交了类似决议，决议以 36 票对 12 票获得通过。[24]

印度支那战争已使美国不堪重负。至 1970 年，美国已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投入约 1 200 亿美元（且仍在增加）。此前美国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仅投入 1.5 亿美元，朝鲜战争也仅耗资 180 亿美元。[25]美元贬值不久，尼克松于 1 月 15 日下令，停止对北越的一切轰炸行动。1973 年 1 月 27 日，约翰逊去世的第二天，美国、北越、南越和越共最终在巴黎签署了《停战和恢复和平协议》。华盛顿与河内、越共就这一协议进行了直接谈判。这样做只是为了让美军摆脱战争，并让对方遣返战俘，以掩盖其所遭受的失败耻辱。因此，停火意味着美国隐蔽的投降，它要让西贡自生自灭。它表面上向北越和越共提出只能在一段时间后才能占领西贡的条件。“体面承诺”在巴黎签署的协议第一条第一款中得到了明确体现。该条规定，“美国和其他国家按 1954 年《日内瓦条约》之规定，尊重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26]。这一内容隐约表明，华盛顿正在抛弃南越。此前，美国一直试图使其成为一个与北越分离的国家。这一“国家重建”的努力始于 1955 年吴庭艳发动的政变。另外，河内和越共并没有做出太多让步，它们只同意阮文绍在一段时间内仍执掌南越政府。种种迹象表明，这样做是为了给予美国一个两年的“体面间隙”，此后才攻占西贡。[27]北越部队没有从南越撤离，游击战也并未停息。尼克松所寻求的是挽回面子，找到一个“体面方案”来掩盖美国的失败。战争仍在持续，越南和柬埔寨的战

争一刻也没有停顿。[28]一位美国军官在林同省向上司汇报说，“停火似乎推动了一场新的战争，它比此前的战争更加猛烈、更加残酷”[29]。4—8月期间，美国加强了对柬埔寨的轰炸，它不断消耗库存军火，但却未能阻止“红色高棉”的前进。[30]到年底，其战线已推进至仅距金边10英里处，金边成为唯一处于朗诺集团统治的城市。美国空军的轰炸，在这一拥有不到300万人口但难民人数超过200万的国家，引发了疯狂的暴力浪潮。美国记者阿诺德·伊萨克斯（Arnold R. Isaacs）称，“在美国人行动和‘红色高棉’野蛮行径之间可以说有某种关联”[31]，轰炸激发了愤怒和暴力。相比被“红色高棉”杀害的成千上万柬埔寨人，更多人死于美国的轰炸以及由此引发的疾病和饥饿。

在对拉美政策问题上，尼克松遵循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相同的模式，只要不是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威胁美国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拉美国家就有选择自己政府的自由。苏美政策之间存在的相似，比美国人愿意承认的更多。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言之有理。如果说，在冷战期间，苏联对民主德国（1953年）、匈牙利（1957年）和捷克（1968年）进行了军事干涉，美国则策划了伊朗政变（1953年），入侵了危地马拉（1954年）和古巴（1961年），武装侵占了多米尼加共和国（1965年），并干涉了朝鲜（1950年）和越南（在那里扶持独裁政权，所杀害人数多于苏联成功干涉中的死亡人数）。[32]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尊重被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视为美洲民主精髓的“人民主权定理”[33]，既没有在中东，也没有在拉美这样做。1970年，“人民团结联盟”（社会主义党、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派别）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赢得智利总统选举，准备尝试社会主义议会民主道路。但尼克松做出了“美国难以接受智利阿连德政权”的声明。[34]基辛格在备忘录中认为，这一事件“对我们来说，是在本半球所遇到的最严重挑战之一”。他断言，阿连德将会在智利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排斥美国影响，并与苏联、古巴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紧密关系。他强调说：

> 阿连德在智利巩固权力将是对我们在本半球利益和地位的一种严重威胁，将影响我们与他们之间在世界任何地区的关系。[35]

根据基辛格的假设，美国有可能失去在智利的总额约为10亿美元的投资，智利有可能宣布不履行其对美国政府和私人银行约15亿美元的外债。但基辛格承认，阿连德是通过自由选举合法选出的首位马克思主义领导

人。他指出，阿连德得到“智利人和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认可。我们难以否定他的合法性或者声称它不存在”。尽管言行不一，但他认为，美国一直对自决和对自由选举的尊重表达出“强烈”支持。尼克松本人对干涉本半球其他国家内部事务也曾表达强烈反对，他支持接受各国“现状”。但基辛格辩称，如果美国不做出反应，那么其态度有可能被拉美和欧洲理解为，“面对在长期被认为是我们势力范围地区出现的明显倒退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36]。他预料阿连德政府可能会尽量装作“独立”，而并非苏联的一个卫星国或一个共产党政府。但对美国来说，拉美出现一个铁托式政府[37]，比在欧洲更加危险，恰恰是因为，它能够以更容易和模糊的方式损害美国利益，这一模式的效应会更具危害性。鉴于这些原因，基辛格建议美国竭其所能，阻止阿连德巩固其政权。[38]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试图为其所采取的态度开脱，他声称，1970 年美国得到了有人正从古巴和其他共产党国家为阿连德筹集大量资金（尼克松认为来自古巴的资金为 35 万美元[39]）的情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支持那些试图抗衡激进统治集团的内部政治势力，既非不道德，也非政治上的不公正。[40]他称，鉴于这些考虑，前几届政府向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提供了 300 多万美元。[41]事实上，肯尼迪早已得出结论，智利的民族党等寡头势力政党不仅未能削弱左翼，反而使其加强。他试图扶持改良主义政党，使其成为“可行方案”，以避免拉美出现另一个卡斯特罗。

智利已成为“争取进步联盟”的演示案例，肯尼迪试图通过这一计划，加强诸如基督教民主党这类属于中产阶级的中间派政党的实力，以排斥革命运动。1961 年 3 月 10 日，其助理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写给他的信中称，“如果拉美富裕阶层让中产阶级革命成为不可能，他们将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工业和农民’革命”[42]。肯尼迪政府首先启动了阻止由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组成的“人民行动阵线”候选人阿连德上台的“隐蔽行动”，行动始于 1964 年。[43]那一年，中央情报局为了让爱德华多·弗雷当选，投入了 260 万美元，占其选举开支的一半以上。资金通过中间人提供。[44]约翰逊沿袭了肯尼迪的政策，为了操控智利选举运动，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由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中央情报局西半球处处长代斯蒙·费兹杰罗及白宫的拉夫·邓根（Ralph Dungan）和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组成的委员会。中央情报局通过报纸、电台节目和海报等，发动了迅猛而广泛的宣传运动，使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弗雷在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1962—1970 年，仅拥有

1 100 万人口的智利，获得了 12 亿美元的资助和贷款，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然而，1970 年 3 月 25 日，由基辛格领导的负责审批中央情报局行动的“40 委员会”，决定不再支持智利任何一位候选人，既不支持民族党（保守党）的阿雷桑德里（Jorge Alessandri），也不支持左翼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托米奇（Rodomiro Tomic），而是向支持阿连德竞选的“人民团结联盟”发起“干扰行动”。该委员会批准了 80 万～100 万美元资金，用于进行“干扰行动”、“隐蔽行动”和“黑色宣传”，以便影响选举结果。此举还得到了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资金支持。该公司国际关系部主任杰克·尼尔（Jack D. Neal）告诉基辛格的拉美问题助理瓦伊伦·瓦基（Viron P. Vaky），公司总裁哈罗德·吉宁（Harold S. Geneen）希望去华盛顿商谈智利局势，并有意提供一笔七位数的资金，以阻止阿连德上台。[45]但“隐蔽行动”未获成功。[46]1970 年 9 月 4 日，阿连德赢得大选。尼克松向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表示，准备批准 1 000 万美元，资助一个代号为“富贝尔特”（FUBELT）[47]的计划，以阻止阿连德上台。[48]中央情报局发动的“干扰行动”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效应。以使民众和企业界感到恐慌为目的的“恐吓行动”，对造成智利金融恐慌和政治不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样就能迫使军人甚至在阿连德政府建立前就采取行动。阿连德被认为是对美国在西半球利益的严重威胁[49]，之所以构成威胁，是因为他是经由民主选举上台的。于是，美国就着手做政变准备。美国驻圣地亚哥大使馆武官保罗·怀默特（Paul M. Wimert）上校与罗伯托·维奥克斯（Roberto Viaux）和卡米罗·巴伦苏埃拉（Camilo Valenzuela）策划了 1970 年 10 月 22 日的政变。政变未遂，但政变者使用中央情报局提供、通过外交邮袋运到圣地亚哥并进行“消毒”的机枪[50]，杀害了捍卫宪法的陆军司令雷纳·施奈德（René Schneider）。[51]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取而代之。国会于 10 月 24 日表决通过了批准阿连德为智利总统的决议，意在阻止智利国会做出这一决定的“富贝尔特”计划“第一步”落空。1970 年 11 月 4 日，阿连德就任总统。但似乎包括对其实施暗杀的“第二步”立即启动[52]，再度发动军事政变的准备随之开始，中央情报局通过在智利制造混乱为政变创造条件。

尽管基辛格承认，美国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阻止阿连德出任智利总统并巩固权力，但他却恬不知耻地否认参与了 1973 年 9 月 11 日皮诺切特将军所发动的血腥政变。他写道：“我们政府与推翻他（阿连德）的计划毫不相干，与政变策划者毫无关系。”[53]他坚持说，“美国没有卷入后

来的政变”[54]。他的解释与客观事实和他亲口承认的内容全然不一致，完全经不起推敲。他承认，尼克松及其主要助手都认为，阿连德是对美国和西半球稳定的一个挑战。[55]如果说，美国竭力阻止阿连德当选以及智利国会对他的确认，它为何不采取行动阻止其政权的巩固？事实上，基辛格承认，尼克松和阿连德双方都“肯定不会安于现状”[56]。他在承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是为了避免阿连德巩固政权的同时证实，“40委员会”（由他领导，但他并不承认）同意提供100万美元，支持被视为民主的政党，即基督教民主党和民族党等反对党。[57]基辛格指责阿连德无意在行动上哪怕是象征性地尊重民主进程，或与美国相安无事。他认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保护人权无法相容。[58]他承认，阿连德垮台确实使美国松了口气。因为，智利新政府不会像前政府那样，在所有国际论坛上都攻击美国的利益。[59]

但并不只是智利让美国感到不安，趋于左倾的玻利维亚和乌拉圭也令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担忧。[60]胡安·托雷斯（Juan José Torres）将军执政（1970年）后，开始在玻利维亚建立一个类似胡安·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1968年政变后在秘鲁建立的社会化革命民族主义政权。美国随即做出反应。1971年8月21日，托雷斯政府被乌戈·班塞尔（Hugo Banzer）将军发动的政变所推翻，政变得到巴西军政府的直接支持。并未遮蔽国家标识的巴西军用飞机在圣克鲁斯卸下了步枪、机枪和弹药。与此同时，由享伯特·梅洛（Humberto Melo）将军统率的第二军被部署在马托格罗索州，必要时将侵入玻利维亚。数月后，乌拉圭也同样处于巴西军事干涉威胁之下。尼克松政府担心智利发生的阿连德赢得选举胜利的类似情形在乌拉圭重演，于是就极力阻止“广泛阵线”候选人利韦尔·塞雷尼（Líber Seregni）在1971年的乌拉圭总统选举中获胜。[61]这一做法得到奥米利奥·梅迪西（Emílio Garrastazu Médici）（1969—1974年）将军为首的巴西军政府的支持。尼克松本人在与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交谈中透露，巴西帮助操纵了乌拉圭选举。[62]假如“广泛阵线”候选人塞雷尼获胜，驻扎在南里约格朗德州的第三军将入侵乌拉圭，执行“三十小时行动”（占领乌拉圭全国所需时间）。[63]尼克松曾不无道理地指出，“我们知道，只要巴西做了，拉美大陆其他国家就会效仿”[64]。

巴西在南美其他国家政变中提供的帮助，是梅迪西政府对内残酷镇压任何胆敢挑战其专制政权行动的反映。当乌拉圭军人于1973年通过军事政变建立独裁政权后，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一结果的巴西，向其提供了总额达815 000美元的数百辆汽车，其中包括卡车和大众轿车。而阿根廷除提供石

油矿藏管理局[①]的汽油和煤油外，还向乌拉圭警察提供了汽车。[65]美国政府在拉美支持的恐怖主义行动，以智利立宪总统阿连德于1973年9月11日下台和死亡达到顶峰。皮诺切特将军在中央情报局协助下，发动了血腥军事政变。中央情报局为颠覆阿连德政府花费了大量美元。按美国驻圣地亚哥大使爱德华·科里（Edward Korry）的说法，政变还得到巴西军政府"实实在在的技术和心理支持"[66]。政变发生几天后，基辛格就为皮诺切特领导的屠杀行动开脱，在得知《纽约周刊》报道圣地亚哥停尸房堆放着约2 700具政治人士的尸体，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杰克·库比斯（Jack Kubisch）就智利事件接受参议院质询后，基辛格回答说：

> 我同意，我们不应该推翻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事情，也不应该持维护他们正在圣迭戈所采取行动的立场。但我认为，必须明白我们的政策。尽管他们的行动令人不快，但对我们来说，这一政府总好于阿连德政府。[67]

皮诺切特将军建立的军事独裁政府实行"战时戒严"，取消政党，镇压工会并消灭政治异己。根据美国驻圣地亚哥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1973年9月11日至11月15日，约13 500人遭拘留，320人被处决，另有40人在试图逃跑时被杀，2 000人遭流放。"大赦国际"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估计，至1973年年底，约有25万人因政治原因被关押。自1973年9月11日起，社会和政治冲突充斥智利社会。皮诺切特的统治基于国家安全和"内部敌人"理念。"内部敌人"包括被认为是颠覆分子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或任何其他不同政见者。在此后几年中，皮诺切特的镇压机器至少处决了1 500人，放逐了15 000人。根据智利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接受酷刑、遭暗杀和失踪人数达数千人。[68]尽管尼克松表示不希望看到独裁，但他称，"我们必须承认共产党独裁和非共产党独裁之间的不同"[69]。在为美国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服务和不为其服务的人们之间，确实存在差别。

智利政变后不到一个月，1973年10月6日，正当犹太人庆祝其最重要的宗教节日"赎罪日"之际，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对以色列发动了以收复1967年战争失地为目的的战争。这一事件取代了记者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揭露美国支持智利政变而充斥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据安德森

① 即阿根廷国有石油公司。——译者注

称，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华盛顿负责人威廉·麦林（William R. Merriam）曾于1970年向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提供了100万美元资金，用以阻止阿连德上台。[70]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几天，基辛格曾与以色列、埃及和苏联政府接触，试图避免这场战争。[71]中央情报局不仅没有预见到这场战争，而且还向尼克松报告说，战争不太可能发生，它对埃及进行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和部队调动未予重视。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表示：“我对我们情报部门的疏忽感到失望，更对以色列情报的失误感到震惊。”[72]

以色列当时已拥有重水技术的热核能力[73]，它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政府均不知情的情况下，依靠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帮助，在耶路撒冷南面内格夫沙漠中的迪摩纳核工厂秘密研制原子弹。[74]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卡尔·杜克特（Carl Ducketts）估计，以色列在1968年就已拥有3颗原子弹，它们是用美籍犹太人扎尔曼·夏皮罗（Zalman Shapiro）从美国偷运来的200磅浓缩铀制造而成。[75]以色列情报机构成员阿里·本-麦纳斯切（Ari Ben-Menache）在回忆录中透露，1968—1973年间，以色列制造了13颗原子弹，每一颗的杀伤力都相当于在广岛和长崎所投原子弹的三倍。[76]但因担心遭美国和世界各地犹太人反对并减少对以色列的资金支持，他不愿意透露以色列正在获得核能力的信息。但当阿拉伯军队继续推进时，国防部长莫夏·达扬（Moshe Dayan）将军发出了核警告，并命令携带所拥有的13颗原子弹的B-52轰炸机处于待命状态。[77]他这样做并非真的要使用原子弹，而是想让美国在迫使苏联制止叙利亚和埃及的行动中采取更坚定的态度。[78]以色列以制造“世界末日”相威胁。

与极力主张核不扩散的肯尼迪和约翰逊不同，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以色列的野心理由充分，可以理解。[79]白宫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或拥有至少可用作制造核武器部件的放任态度，影响了华盛顿整个官僚机构，包括负责监视敏感物资输出的官员。自1948年起，历任美国总统都遇到巴勒斯坦分裂所引发的问题。一方面，他们理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难民的诉求，并试图在中东建立持久和平，因为他们也需要与出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以色列是反对共产主义和作为阿拉伯国家实质上同盟的苏联的一个堡垒，任何针对其核野心的强硬立场都可能导致犹太侨民做出反应。由于所拥有的巨大经济、金融和政治影响，犹太侨民是美国重要的选举因素。

尼克松清楚，叙利亚和埃及在进攻以色列前，通知了苏联或者甚至还得到它的怂恿。美国决定支持以色列，一条用于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和弹药的空中走廊被建立起来。但美国与其西欧盟友之间产生了分歧，这些国家

不同意美国飞机飞越其领空。[80]尽管遭受突袭，但以色列很快稳住了阵脚并开始反击，对大马士革进行了猛烈轰炸，占领了戈兰高地，并包围了西奈的埃及军队。在“赎罪日”战争期间，以色列曾两度威胁使用核武器，但它最终遏制了对方的进攻，并击败叙利亚和埃及军队。从表面上看，两国军队并非有意越过1967年前的边界。

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81]成员的阿拉伯国家，借“赎罪日”战争来弥补美元贬值的损失，它们首次把石油用作武器和施压工具，中止向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供应石油。石油每桶价格从9月的2.9美元上升至12月的11.65美元。这一事件打击了世界经济，影响到西欧、日本，尤其是美国。美国石油日消耗量已从1970年的320万桶增加到1973年的620万桶，这使得沙特石油出口从1970年占世界总出口量的13%上升到1972年的21%。[82]尼克松听从了基辛格的建议，动用了外交手段，以避免与埃及关系出现不可修复的破裂以及与苏联的冲突。美苏在联合国共同推动，通过了一项停火决议，但希望把战争继续下去的以色列极右翼做出了反应。国防部长达扬将军在以色列议会警告说：“先生们，我要告诉你们，正被我们的军队用来在埃及开火的坦克和弹药三周前还在美国。”[83]这场冲突结束后，以色列并没有归还1967年占领的土地。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战争中遭受了沉重和屈辱的失败，约旦丢失了西岸和耶路撒冷，叙利亚和埃及分别失去了戈兰高地和西奈沙漠。而埃及之所以没有在“赎罪日”战争中遭受更惨重失败，是由于美国所施加的压力，而并非苏联向其提供的武器。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石油出口的限制，使油价上涨四倍，股市受到重挫，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通胀指数上升。1974年，工业国赤字达110亿美元，而欠发达国家赤字高达近400亿美元，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所遭受的最严重冲击。

基辛格加强了拉拢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努力。萨达特因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感到失望，于“赎罪日”战争前一年辞退了苏联顾问，并立即转而与尼克松维持良好关系。[84]1973年12月中旬，在日内瓦召开了和平大会，美国和苏联为大会共同主席国。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历史中，双方首次坐到了谈判桌前。与此同时，作为回报，唯一没有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的穆斯林国家伊朗开始接受越来越多的武器，总额高达210亿美元。而1950—1971年间，伊朗总共才得到价值12亿美元的武器。[85]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政府把国家25%的预算用于军费开支，购买了最先进的战机——225架F-4、41架F-5、80架F-14、160架F-16和900架直升机。美国向伊朗派遣了5 000名军事顾问和4

万多名非军事人员到油田和炼油厂作业，并进行电话系统和现代化港口、机场的建设。他们居住在美国定居点田园风格的房子中，购买进口食品和生活用品，但却不愿讲伊朗语言波斯语。伊朗已成为美国在中东用来遏制苏联扩张的“中枢国家”。美国意在把一个暴力和专制政权改造为一个西化国家。由于拥有大量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在苏联、波斯湾港口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之间，因此，它对西方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然而，尽管伊朗是世界上三大主要产油国之一，但其大部分民众生活极度贫困。伊朗民众大多信奉伊斯兰教，这一宗教与巴列维国王坚持引入的西方资本主义习俗格格不入。

【注解】

[1] Haig，1992，pp. 242-247.

[2] Id.，ibid.，p. 251.

[3] 为一项事业献身者。

[4] Hersh，1983，pp. 465-408.

[5] Id.，ibid.，1983，pp. 465-480.

[6] Id.，ibid.，pp. 250-257.

[7] Nixon，1978，p. 488.

[8] Fulbright，1989，p. 30.

[9]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White House. Information. Top Secret/Sensitive. Exclusively eyes only. From Henry Kissinger. Subject：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9/12/7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Files. Nixon，1978，p. 554.

[10] Id.，ibid.，p. 554.

[11] Kissinger，1979，pp. 741-755.

[12] Id.，ibid.，p. 745.

[13] Corson，1968，p. 30. 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的谈判中，美国国务卿曾拒绝与他握手。美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4] Memorandum for：The President Files. Subject：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Dr. Kissinger and general Haig，Thursday，July 1，Oval Office. Top Secret/Sensitive/Exclusively Eyes Onl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Files. Kissinger，1979，pp. 684-718.

[1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ensitive/Exclusively eyes only. Tuesday，February 22，1972—2：10 p. m.-6：00 p. m；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Wednesday，February 23，1972—2：00 p. m.-6：00 p. m；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Thursday，February 24，1972—5：15 p. m.-8：05 p. m.；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riday，February 25，1972—5：45 p. m.-6：45 p. m.；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aturday，February 26，1972—9：20 p. m.-10：05 p. m.；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Monday，February 28，1972—8：30 a. m.-9：30 a. m.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Files. Vide também Nixon, 1978, pp. 559; Kissinger, 1979, pp. 1049-1096.

[16] Id., ibid., p. 746.

[17] Bundy, 1998, pp. 289-290.

[18] Haig, 1992, p. 278.

[19] Isaacs, 1984, p. 27.

[20] Kissinger, 1979, pp. 271-272, 297-298.

[21] Bundy, 1998, p. 361. 1947—1948年，作为穆斯林国家的巴基斯坦与印度因克什米尔控制权而发生了冲突。巴基斯坦是从印度分裂出来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经联合国调停才得以停息。联合国承诺将在克什米尔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其归属。第二场战争发生于1965年。在联合国呼吁下，双方才结束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各损失3 000名和3 800名士兵。克什米尔冲突持续不断。1971年，两国间爆发了另一场战争，起因是1970年12月进行的选举导致东巴基斯坦与西巴基斯坦的分裂。穆吉布·拉赫曼（Mujiber Rehman）领导的人民联盟在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与此同时，人民党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o）在西巴基斯坦胜出。东巴基斯坦有意脱离西巴基斯坦，并得到印度的支持。1972年，孟加拉国宣布独立。中国支持西巴基斯坦。基辛格将西巴基斯坦视为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一个战略同盟。基辛格十分重视那些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

[22] Kissinger, 1979, p. 363.

[23] Nixon, 1978, p. 729

[24] Id., ibid., pp. 742-743.

[25] Lens, 2003, pp. 419-420.

[26] Extratos do acordo de Paris in Isaacs, 1984, pp. 65-68.

[27] Id., ibid., pp. 69, 333.

[28] Id., ibid., pp. 12-15.

[29] Id., ibid., p. 11.

[30] Bundy, 1998, p. 490.

[31] Isaacs, 1984, p. 232.

[32] Johnson, 2001, p. 21.

[33] Tocqueville, 1968, pp. 52-56.

[34]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ubject: Gênesis of Prokect FUBELT. 16 September 1970. William V. Broe, Chief—Western Hemisphere Division, in Kornbluh (ed.), 2003, Doc. 2. CIA Memorandum, "Genesis of Project FUBELT, Sep. 16", p. 37. Vide também Dinges, 2004, pp. 19-20.

[35]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Henry Kissinger. Subject NSC Meeting, November 6—Chile. White House, November 5, 1970. Pinochet Fil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36] Ibid.

[37] 基辛格指的是南斯拉夫的铁托。他虽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却与苏联分道

扬镳。

[38]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Henry Kissinger. Subject NSC Meeting, November 6—Chile. White House, November 5, 1970. Pinochet Fil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39] Nixon, 1978, pp. 489-490.

[40] Kissinger, 1979, p. 659.

[41] Id., ibid., pp. 659-661.

[42] Apud Kornbluh (ed.), 2004, p. 3.

[43] Id., ibid., p. 3.

[44] Covert Action. Hearings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Ninety-Fourth Congress, First Sectional, vol 7, December 4 and 5, 1975,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 156.

[45] 1972 年 3 月 22 日，美国记者杰克·安德森将揭露的这一情况公之于众。Vide Anderson, 1974, pp. 53-57, 150-151. Kissinger, 1982, pp. 389-391. Fac-simile do documento in *Documentos Secretos de la ITT*. Fotocopia de los originales en inglés y traducción en castellano. Santiago: Secretaría General del Gobierno —Empresa Editora Nacional Quimantu, 1972.

[46] 1963—1970 年间，中央情报局在智利投入了约 13.4 亿美元。Covert Action. Hearings befor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Ninety-Four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al, vol 7, December 4 and 5, 1975,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 95. Covert Action in Chile 1963—1973. 94th Congress 1st Session Committee Print—Staff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United States Senate. December 18, 1975. Printed for the use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63-372. Kissinger, 1979, pp. 665-669.

[47] FU 是中央情报局对智利的代称；BELT 似乎认定该行动将从经济和政治上扼杀智利，这样阿连德就难以当上总统。1975 年，当这些文件被提交“邱池委员会”时，代号的意思依然是一个秘密。Kornbluh, 2003, n°2, p. 513.

[48] Id., ibid., pp. 673-674.

[49] Kissinger, 1979, pp. 667-670.

[50] “消毒”是为了消除痕迹，以便掩盖来源。

[51] “*According to declassified documents, the CIA provided three submachine guns to one group of plotters at 2 a. m. on the day of the kidnapping.*” Dinges, 2004, p. 20. Davis, 1985, pp. 8-10. Kornbluh, 2003, pp. 22-28. Trento, 2001, pp. 378-384. Powers, 1979, pp. 298-304. 中央情报局否认它为暗杀行动提供了冲锋枪。

[52] Davis，1985，p. 10.

[53] Kissinger，1982，p. 374.

[54] Id.，ibid.，p. 377.

[55] Id.，ibid.，p. 376.

[56] Id.，ibid.，pp. 378-379.

[57] Id.，ibid.，p. 403.

[58] Id.，ibid.，p. 410.

[59] Id.，ibid.，pp. 410-411.

[60] Memorandum.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s/NODIS. Informatiom. Ma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From Arnold Nachmanoff. Subject：Memcon of your Meeting with President Medici of Brazil—December 8，1971. Ibid.

[61] 1971年12月7—9日，巴西总统梅迪西访问华盛顿。此时，11月8日举行的乌拉圭选举结果尚未确定。在多个关于尼克松和梅迪西谈话的备忘录中，尼克松都提到希望巴西配合，以便影响乌拉圭的选举。基辛格再次要求梅迪西支持尼克松主义。根据这一主张，巴西应发挥次大陆地区大国的作用，以维护美国利益。“广泛阵线”领导人对美国和巴西恐吓其候选人的行为进行了揭露。选举结果被推迟两个多月才公布，这引发了很大争议。1972年2月15日，选举法院宣布红党的胡安·博尔达贝里（Juan Maria Bordaberry）以41%的支持率获胜。

[62] “*Brazilian helped rig the Uruguayan elections*”，disse Nixon a Heath. Memorandum. Top Secret/Sensitive/Exclusively eyes only. White House—December 20，1971. Memorandum. Top Memorandum the President's File. From：Henry A. Kissinger. Subject：The President's Private Meeting with British Prime Minister Edward Heath on Monday，December 20，1971，1：30-5：00 p. m.，in Sitting Room of Government House，Bermuda. Participants：The President，Prime Minister Heath，Henry A. Kissinger，Sir Burke Trend，Secretary of the Cabinet.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Files.

[63] Para detalhes，Vide Moniz Bandeira，2003，pp. 385 - 403. Roper，Christopher，“Estados Unidos y América—Latina—La Política del presidente Nixon” *Estrategia*，março/abril 1972，nº 15，pp. 33-42.

[64] Black，1977，p. 55.

[65] J. M. Sanguinetti，“Anatomia da crise—Bem Nacional o Golpe Uruguaio”. *O Estado de S. Paulo*，*São Paulo*，13/6/1974，p. 24. *La Opinión*，*Buenos Aires*，13/7/1973. *OGlobo*，Rio de Janeiro，25/5/1974.

[66] Korry，Edward M. “Confronting our Past in Chile”. *Los Angeles Times*，8/3/1981，sec. 6，p. 5，apud Davis，1985，pp. 331-332.

[67] Department of State，Secret/NODIS，Secretary's Staff Meeting，October 1，1973. National Security File.

[68] 据捍卫人权全国委员会的估计，皮诺切特独裁政权仅在1984—1988年的四年

时间中就犯下了 11 536 起违反人权罪行。

[69] Apud Schoultz，1987，p. 116.

[70] 美国政府与大公司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智利发生军事政变之时，曾在肯尼迪政府中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约翰·麦克恩就是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Anderson，1974，pp. 152-153.

[71] Nixon，1978，p. 921.

[72] Id.，ibid.，pp. 920-921. Kissinger，1994，p. 739. Vide também Powers，1979，pp. 457-458.

[73] 以色列原子弹之父是科学家恩斯特·伯格曼（Ernst David Berman），他是在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总理支持下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一个犹太教士之子。这一核计划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得到时任国防部局长的西蒙·佩雷斯的推动。以色列的第一个核反应堆建在地中海附近的 Nahal Sorek。当时正在阿尔及利亚与阿拉伯人交战的法国除提供原子材料外，还派科学家协助以色列人。Hersh，1991，pp. 19-46. Ben-Menache，1992，pp. 199-211.

[74] Hersh，1991，pp. 11，20-25，60-61，68-70.

[75] Id.，ibid.，pp. 241-242.

[76] Ben-Menasche，1992，p. 208.

[77] Id.，ibid.，p. 208.

[78] Hersh，1991，pp. 223-231.

[79] Id.，ibid.，pp. 209-215.

[80] Kissinger，1994，p. 537.

[81]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 1960 年，作为协调其成员国石油生产政策的卡特尔，其多数成员来自中东，如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和委内瑞拉等国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

[82] Unger，2004，p. 36.

[83] Apud Schulzinger，1990，p. 306.

[84] Haig，1952，p. 459.

[85] Schulzinger，1990，p. 309.

第十八章

“管子工”小组　潜入水门大厦　案犯与中央情报局和白宫的关系　《华盛顿邮报》的揭露　丑闻　阻止调查的企图　尼克松及其助手罪行的败露　弹劾程序　辞职　福特总统的赦免令

尽管美军已全部撤离越南（柬埔寨仍处于猛烈轰炸之下），但自1972年尼克松连任起，美国的政治和道德危机伴随着经济和金融危机变得日益严重。1973年9月4日，在阿连德政权被推翻前9天，尼克松的主要助理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和白宫特别助理乔治·利迪（George Gordon Liddy）因为与那起擅自搜查给埃尔斯伯格看病的神经科医生菲尔丁的诊所案件有牵连而遭起诉。埃尔斯伯格曾于1971年透露了五角大楼有关越战的秘密文件。然而，丑闻远不止菲尔丁诊所遭搜查的行动。

此前，尼克松的助理们已在白宫建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俗称“管子工”小组，其表面目的是调查和阻止埃尔斯伯格透露五角大楼文件这类敏感信息泄露事件的发生。这样，美国任何政党从来不曾拥有的雄心勃勃的窃听政治机器被建立起来。“管子工”小组行动十分广泛，其成员无所不为，包括侵犯私人档案，窃听记者电话，支持对反战示威者发动袭击，安插“煽动者”，诱使激进者采取非法行动，模拟用于攻击对手的证据，通过国家税务局给政界人物制造麻烦，从事广泛的政治窃听活动，等等。[1]1972年6月17日凌晨2点30分，水门大厦保安弗兰克·威利斯（Frank Wills）在看见5个人闯入设在那里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后报警。被当场抓获的全部5名不速之客[2]中，4名是流亡的古巴人，他们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并参与1961年猪湾入侵行动。[3]这些人身上装有一张由霍华德·亨特（Eeward Howard Hunt）签发的690美元支票。亨特是中央情

报局人员，“管子工”小组负责人之一。[4]被抓的另一人是美国人詹姆斯·麦科德（James McCord），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他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安全头目。这些人都是白宫特别调查小组即“管子工”小组成员。后来的调查发现，在阵亡将士纪念日[5]后不久，他们就已非法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装置、电子录音器和文件拍摄设备。他们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弄清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竞选运动的捐款人和他的竞选计划。行动由约翰·米切尔（John N. Mitchell）、戈登·利迪和霍华德·亨特策划。米切尔是前总检察长，他控制着共和党用来资助庞大情报网的秘密资金。白宫官员利迪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他和亨特均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领导人。行动得到尼克松的主要助理埃利希曼和鲍勃·霍尔德曼（Bob Haldeman）的批准。[6]他们此前批准过多起更险恶的行动，包括“沙坑杆行动”、“钻石行动”、“红宝石行动”、“水晶行动”和“蓝宝石行动”等。行动目标多种多样，如搜集情报；通过电子手段监听参议员埃德蒙德·马斯基（Edmund Muskie）、爱德华·肯尼迪和其他民主党领导人的电话和谈话；在反印度支那战争示威者中渗透“煽动者”[7]；绑架被假定为可能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发动示威的领导者，并将他们遣送到中美洲和墨西哥；通过损坏空调和照明系统，破坏民主党在迈阿密海滩会议中心举行的会议；利用“高档应召女郎”让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卷入丑闻，进而对其进行敲诈[8]；伪造信件、调查个人隐私和各种其他非法活动[9]。据尼克松顾问莱昂纳德·加门特（Leonard Garment）称，尼克松特别顾问查尔斯·寇尔森（Charles W. Colson）是“邪恶天才”。尼克松主要助手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对此均知情。基辛格曾说过：“（……）假如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卷入了这项行动，那么总统对此完全不知情几乎难以想象。”[10]

尼克松应该了解这些计划，当得知“管子工”在水门被抓时，他的反应是务实的。据他本人定义，“也是厚颜无耻的”。他解释说，“厚颜无耻”来自经验，因为他从政已有相当长时间，“从肮脏诡计到选票舞弊”，什么事情都见过。[11]他为自己辩解说，“我不能把道德败坏行为混同于政治窃听”。他称，窃听活动自发明电话起就存在。他还说，两度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12]班子中的一位成员曾公开表示，1960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监听了肯尼迪的电话。[13]约翰逊也曾对他说，知道肯尼迪派人监听自己的电话。巴里·高德沃特（Barry Goldwater）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 1964 年总统选举期间，也意识

到电话被人窃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亲口对尼克松说，1968 年大选期间，约翰逊曾下令监听他的电话。[14]监听并不只限于选举竞争中候选人的谈话和电话，而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肯尼迪曾下令监听马丁·路德·金和糖业院外活动人士下榻的酒店。其弟弟罗伯特总检察长曾下令调查 17 个右翼组织在国家税务局的税收舞弊。[15]他还下令监听影视喜剧演员鲁旺（Dan Rowan），原因是怀疑他与自己的情人菲利斯·麦吉尔（Phyllis McGuire）有暧昧关系。[16]1961—1962 年，经罗伯特·肯尼迪同意，在调查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所做的糖业院外活动期间，民主党议员、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哈罗德·库利（Harold D. Cooley）的电话被窃听。[17]此外，为查清一份机密文件的泄露，《纽约周刊》驻五角大楼记者劳埃德·诺曼（Lloyd Norman）的电话也遭窃听。[18]

美国总统在国内所从事的非法犯罪活动或专横行径远非这些窃听活动。在美国内战（1860—1864 年）期间，亚伯拉罕·林肯以保证内部安定和拯救国家为借口，违反宪法第六修正案，中止了“人身保护权”。[19]他曾声称，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采取的不符合宪法行动如果是为了保护宪法和国家，就有可能变得合法。接替他的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因被指责违反《任职法》[20]而遭受弹劾，在参议院仅以一票优势免遭弹劾。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以安全名义下令在集中营抓捕美籍日本人，同样违反宪法第一和第四修正案。[21]这些理由被用来开脱和掩盖对《权利法案》所规定的民权的侵犯。因此，“管子工”潜入水门大厦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并非晴空霹雳，美国社会存在进行任何类型非法活动和舞弊的气氛，甚至包括税收舞弊。约翰逊任总统期间，以捐赠名义扣除了数百万美元应缴税款。他对尼克松说，不效仿他的做法将是愚蠢的。[22]

由弗兰克·斯特吉斯（Frank Fiorini Sturgis）统领的“管子工”在案发数周前曾闯入智利驻华盛顿使馆。[23]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生的事件过去数日后，记者鲍勃·伍德沃特（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中称，被抓 5 人中 1 人为尼克松“争取连任委员会”成员。这一报道掀起了轩然大波。[24]这两位记者后来又撰文称，闯入民主党总部 5 人中的 1 人在迈阿密一家银行存入了一张 25 000 美元的支票，支票来自尼克松竞选运动基金。这位古巴人名为伯纳德·巴克（Bernard L. Barker），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并参与猪湾入侵行动。[25]此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隶属于国会的审计总署着手调查此案。[26]对尼克松竞选资金的审计显示，负责筹集资金的前商务部部长莫里斯·斯坦斯（Maurice H. Stans）非法在其办公室保险柜中存放着 35 万美

元。[27]《华盛顿邮报》紧接着揭露，这笔35万美元的资金部分用于获取情报。

指控接连不断。伯恩斯坦和伍德沃特越来越对调查感到不信任，于是决定自行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28]伍德沃特在政府中有一个内线，可得到来自白宫、司法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情报。为掩人耳目，他改用广为人知的色情电影名“深喉”来称呼对方。通过这一内线，他开始接收到各种与“水门事件”有关的信息和踪迹。[29]《华盛顿邮报》揭露说，前总检察长米切尔控制着间谍资金，也就是用于收集有关民主党情报的所谓“秘密基金”。[30]1972年10月10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透露，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员已确认，因5名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和监控装置人员而被抓引发的水门大厦事件，源于一场为使尼克松获得连任的严重间谍和破坏活动，由白宫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官员领导。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资料，至少有50名尼克松竞选班子的秘密人员在全国各地从事破坏和侦探民主党竞选活动的行动。[31]尼克松竞选运动捐款中的数十万美元被用于资助意在败坏民主党候选人名声并干扰其竞选活动的秘密破坏和间谍活动。[32]

尽管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伍德沃特和伯恩斯坦已找到指向白宫地下室阴谋的线索，但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太大反应。[33]尼克松的竞选口号是“选举二战老兵理查德·尼克松”。他采取共和党人自内战（1860—1864年）以来始终奉行的做法，打着沙文爱国主义旗帜。1972年11月7日，他凭借60.7%的得票率，击败民主党候选人麦戈文参议员连任总统。这是美国政治历史上最悬殊的总统选举结果之一。[34]于是，尼克松认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这一极度乐观情绪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73年1月30日，在尼克松开始第二任期10天后，华盛顿地区法官约翰·西里卡（John J. Sirica）以从事阴谋、非法闯入、非法监听谈话和电话罪名，判定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前成员利迪和麦科德有罪。[35]2月7日，参议院成立以调查“水门事件”为目的的总统竞选活动特别委员会，由民主党参议员萨姆·艾尔文（Sam Eevin）担任主席。听证工作于2月17日启动。对自己近乎无限的权力充满信心的尼克松傲慢地面对水门丑闻，此前他已试图在联邦大陪审团中掩盖案情。他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一起极力阻碍参议院委员会和司法机关进行的调查，以便使其助手免受惩罚。但他未能如愿，供词和新证据的不断出现，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越来越不利。总检察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Richard G. Kleindienst）别无选择，被迫承认自己的责任，并辞去在政府中的职务。[36]霍尔德曼是美国总统的

最主要代理人，经常以总统名义行事。鉴于他和尼克松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得到尼克松明确或不明确的认可，他卷入这些活动的策划并资助秘密行动似乎不太可能，尤其是这些秘密行动体现了竞选连任的基本策略。[37]

随着霍尔德曼的名字被揭出，尼克松失去了最后一道抵抗防线，其罪责暴露无遗。他的顾问约翰·迪安（John W. Dean III）曾向一位参议员承认，他与尼克松就掩盖丑闻的必要性交谈过至少35次。有一次，尼克松对他说，白宫有一颗正在长大的毒瘤，如果不加以剔除，将会置总统于死地。[38]在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作证时，他证实尼克松事先了解为换得“水门事件”策划者保持沉默而支付的所有款项，并做出过承诺：如果他们承担所有责任，将会获得政府的宽恕。与此同时，司法检察官们找到了白宫官员戴维·杨（David Young）和埃吉尔·克罗格（Egil Krogh）1971年9月3日寄给埃利希曼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描写了搜查给埃尔斯伯格看病的神经科医生诊所计划的细节。[39]总统助理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Alexander Butterfield）告诉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白宫所有关于“水门事件”的谈话均录了音。尼克松为之震惊，他从未料到这一录音系统会被揭露出来。[40]他意识到，随着这些磁带被揭露，加上他做出的不将其销毁的决定，政府支撑到任期结束的可能性已不大。[41]于是，他决定直面这场最严重的宪政冲突，这使得危机进一步加深。

由参议员萨姆·艾尔文任主席的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发出传票，勒令尼克松交出谈话和电话录音磁带。但他凭借“总统特权”[42]予以拒绝。[43]被任命负责“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传唤了总统顾问弗雷德·布兹哈特（Fred Buzhart），令其就录音问题接受联邦法院审问。参议院也采取了同样做法，传讯了白宫律师莱昂纳德·加门特。尼克松做出反应，将考克斯解职并取消了特别检察官这一职位。他还接受了总检察长埃利奥特·理查森（Elliot L. Richardson）及其副手威廉·卢克豪斯（William D. Ruckelshaus）将军的辞职要求。[44]紧接着，根据白宫命令，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查封了理查森、卢克豪斯在司法部的办公室和考克斯在K Street NW.的办公室。这一措施更加深了人们对尼克松的确有意掩盖某些东西的看法，甚至包括共和党人在内。

与此同时，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因被指控在执掌巴尔的摩郡政府和担任马里兰州州长期间犯有勒索、阴谋、贿赂和税收舞弊罪，被迫于10月10日辞职。他发表了“无罪申诉”，即不回应对其提出的未向国家税务局申报1967年收受的29 500美元的指控。尼克松可谓分秒必争，他知道自己在国会的力量正在消失。依据美国宪法第二十五修正

案第二款[45]，他于 10 月 12 日任命共和党众议院领袖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为副总统[46]，取代阿格纽，他意识到政府垮台已在所难免。

10 月 23 日，八个要求弹劾总统的决议被递交众议院。尼克松试图摆脱困境，他提供了录音磁带，但其中 18 分 30 秒的录音已被消磁。[47]尼克松办公室主任黑格无法向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做出解释，只将其归咎于“某种邪恶力量”。[48]1974 年 3 月，尼克松的助手米切尔、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科森、戈登·斯特拉坎（Gordon Strachan）、罗伯特·马迪安（Robert Mardian）和肯尼斯·帕金森（Kenneth Parkinson）以及其他 33 名政府官员，被指控犯有企图阻止对擅闯水门大厦事件调查的罪名。尼克松仍试图自救，他向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送交了 1972 年 9 月至 1973 年 4 月期间 1 254 页谈话录音的记录。但参议院仍不满意。最高法院也不承认“总统特权”可作为拒绝依据，要求他提供 24 盘原带和其他文件。[49]7 月 27 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 27 票（民主党 21 票，共和党 6 票）对 11 票，通过了一项决议的第一条，建议弹劾尼克松，罢免其美国总统职位，理由是他企图阻碍“水门事件”调查，并掩盖其他非法活动。[50]29 日，该决议另一条指控其滥用权力的内容获得通过。30 日，又通过了指控其拒绝向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提供录音的条文，并以此作为弹劾依据。[51]之后，这些条款将被提交定于 8 月 19 日召开的参议院全会表决。

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Edward W. Brooke III）首先通过电视要求尼克松辞职。同属共和党的俄勒冈参议员罗伯特·帕克伍德（Robert W. Packwood）公开向尼克松表示，“‘水门事件’已摧毁了你启迪和领导国家的能力”[52]。黑格将军劝他在向参议院交出录音之前辞职。[53]他的观点是，录音毁了尼克松，辞职尚能保全他的身体、“部分名声”以及在同僚中恢复名誉的可能。[54]然而，尽管承认辞职已在所难免[55]，尼克松仍希望出现奇迹，或者说录音谈话所产生的反响不至于过分负面，使他能与国会达成某种妥协。8 月 5 日，他交出了 1972 年 6 月 23 日即闯入水门大厦 6 天后与霍尔德曼谈话的录音。他在谈话中命令美国联邦调查局放弃调查，并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及其副手沃尔特斯将军竭力促使调查流产。[56]他接着又交出了其他录音。这些录音证实他试图掩盖非法闯入民主党总部的真相，以及他对白宫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官员卷入事件的知情。[57]人们对录音内容的反应极为负面。8 月 7 日，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对他说，避免弹劾前景黯淡，除了辞职别无选择。9 日，他辞去美国总统职务，福特继任并宣称：“我们漫长的民族梦魇结束了。”他进一步阐述：

我们的宪法是有效的。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是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在这里，人民当家作主。但世上有一个更高的权力。我们以任何名义捍卫圣主，他不仅赐予我们正直，还有爱；不仅赐予我们公正，还有怜悯。

怜悯很快就得到体现。一个月后，他赦免了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犯下的种种罪行和其他不当行为。

【注解】

[1] Nevins & Commager，1986，pp. 636-637.

[2] Bernard Barker，Frank Fiorini Sturgis（被指控为杀害肯尼迪的凶手），Virgilio Gonzalez，Eugenio Martinez，James W. McCord。其中两人为美国人名字：Bernard Barker 和 Frank Fiorini Sturgis。关于事件的第一个消息这样写道："五人于昨日凌晨两点半被抓，其中一人供认曾在中央情报局供职。当局认为，这是一起窃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蓄意阴谋。其中三人出生于古巴，另一人据说在 1961 年猪湾入侵行动后参加了对流亡古巴人的游击训练。" E. Lewis，Alfred，"5 Held in Plot to Bug Democrats' Office Here". The Washington Post，18/6/1972，p. A01.

[3] Kutler (ed.)，1997.

[4] Id.，ibid.，pp. 49-53.

[5] 定在 5 月最后一个周一的公共假日，用以纪念战争中的死难者。1971 年前为 5 月 30 日。

[6] Kutler (ed.)，1997，pp. 43-45.

[7] Bernstein & Woodward，1974，p. 20.

[8] Dean Ⅲ，1976，pp. 73-88. White，1975，p. 157. Kissinger，1982，p. 75.

[9] Bernstein & Woodward，1974，p. 135.

[10] Kissinger，1982，p. 75.

[11] Nixon，1978，p. 628.

[12] 史蒂文森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在 1952 年和 1956 年总统选举中败给了艾森豪威尔。

[13] Nixon，1978，pp. 628-629.

[14] Id.，ibid.，pp. 628-629.

[15] Rangell，1980，p. 274.

[16] Giancana & Giancana，1992.

[17] 农业委员会掌控着从其他国家进口糖的配额。Wise，1976，pp. 296-297.

[18] Id.，ibid.，p. 297.

[19] White，1975，pp. 136-137.

[20] 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在林肯遭暗杀后出任美国总统。1867 年

通过的《任职法》取消了总统解雇由参议院任命的官员的职权，他们的撤换需得到参议院批准。参议院休会期间，总统可根据《任职法》批准某些官员的停职。但如参议院对此持异议，他们就能复职。1867年年中参议院休会期间，约翰逊先是要求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辞职，后强行令其停职。斯坦顿由林肯任命，他与约翰逊和政府其他人员有摩擦，并与那些企图破坏南方重建政策的激进共和党人串通。接替他的是乌里西斯·格兰特（Ullysses S. Grant）将军。1968年1月3日，新的国会举行会议，以35票对16票否决了对斯坦顿的免职决定。但约翰逊拒绝了参议院的决定，认为自己曾投票反对的《任职法》违反行政权，因而是违宪的。他的这一做法导致了参议院对总统启动了弹劾程序。在参议院投票中，他仅以一票优势免遭弹劾。

[21] White，1975，pp. 137-138.

[22] Rangell，1980，p. 274.

[23] Weiner，Tim. "In Tapes，Nixon Talks of Plans for Foreign Embassy Break-Ins，" *The New York Times*，26/2/1999. Late Edition—Final，Section A，Page 13，Column 1. Lardner，George，Jr. & Pincus Walter. "Watergate Burglars Broke Into Chilean Embassy as Covert，Tapes Show". *Washington Post*；26/2/1999；p. A09. Vide também Wise，1996，pp. 178-179.

[24] Woodward，Bob & Bernstein，Carl . "GOP Security Aide Among Five Arrested in Bugging Affair". *The Washington Post*，19/6/1972，p. A01. GOP意为"老大党"，人们通常这样称呼共和党。

[25] Bernstein，Carl & Woodward，Bob. "Bug Suspect Got Campaign Funds". *The Washington Post*. 1/8/1972，p. A01.

[26] "Watergate. Chronology of a Crisis". Washington，*Congressional Quartely Inc.*，1973，pp. 3-5.

[27] Meyer，Lawrence. "Last Two Guilty in Watergate Plot"，*The Washington Post*，31/1/1973，p. A01.

[28] Bernstein & Woodward，1974，p. 69.

[29] Id.，ibid，P·71.

[30] Bernstein，Carl & Woodward，Bob. "Mitchell Controlled Secret GOP Fund". *The Washington Post*，29/9/1972，p. A01.

[31] Bernstein，Carl & Woodward，Bob. "FBI Finds Nixon Aides Sabotaged Democrats". *The Washington Post*，10/10/1972，p. A01. Bernstein & Woodward，1974，pp. 135-136.

[32] 记者伍德沃特和伯恩斯坦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把联邦调查局作为消息来源，表面上是为了转移社会对那个在白宫内部真正提供消息者的注意力。在1974年出版的《总统身边的所有人》一书中，他们将此人称为"深喉"（Bernstein & Woodward，1974，p. 150）。这两位记者有意不暴露他的身份。只有四个人知道他的身份，他们是伍德沃特、伯恩斯坦、《华盛顿邮报》前编辑本杰明·布雷德利（Benjamin C. Bradlee）和该报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这四个人从来没有透

露过“深喉”的身份。嫌疑者包括基辛格、黑格将军、中央情报局官员柯德·梅耶（Cord Meyee）和威廉·科尔比以及联邦调查局的帕特里克·格雷（Patrick Gray）、马克·费尔特（Mark W. Felt）、查尔斯·贝茨（Charles W. Bates）和罗孔伯特·孔克尔（Robert Kunkel）。孔克尔当时是联邦调查局低层官员，但其家人在他已过世后的2005年向《名利场》杂志透露说，他就是那位被称为“深喉”的情报员。伍德沃特、伯恩斯坦、布雷德利和戴维·德雷赫（David Drehele）证实了这一说法。“FBI's nº 2 Was 'Deep Throat' —Mark Felt Ends 30-Year mistery of The Post's Watergate Source". *Washington Post*, 1/6/2005 P·A01.

[33] Rangell, 1980, p. 30.

[34] 尼克松获得了508张选举团票和3 355万张选民票。麦戈文获得了17张选举团票和2 150万张选民票。Broder, David S. “Nixon Wins Landslide Victory; Democrats Hold Senate, House". *The Washington Post*, 8/11/1972, p. A01. 1934年，罗斯福以60.8%的选票胜出。1964年，约翰逊获得了61%的选票。White, 1975, p. 169.

[35] Meyer, Lawrence. “Last Two Guilty in Watergate Plot". *The Washington Post*, 31/1/1973, p. A01.

[36] Stern, Laurence, & Johnson, Haynes. “3 Top Nixon Aides, Kleindienst Out; President Accepts Full Responsibility; Richardson Will Conduct New Probe". *The Washington Post*, 1/5/1973, p. A01.

[37] Berntstein & Woodward, 1974, p. 178.

[38] Bernstein, Carl & Woodward, Bob. “Dean Alleges Nixon Knew of Cover-up Plan". *The Washington Post*, 3/6/1973; p. A01. 这一“总统身边的毒瘤”警告是1973年3月21日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交谈中做出的。Está transcrita em Kutler (ed), 1997, pp. 247-257. Vide também Rangell, 1980, p. 34.

[39] Woodward, Bob & Bernstein, Carl. “Break-In Memo Sent to Ehrlichman". *The Washington Post*, 13/6/1973, p. A01.

[40] Nixon, 1978, pp. 899-900.

[41] Id., ibid., p. 904.

[42] Kilpatrick, Carroll. “President Refuses to Turn Over Tapes; Ervin Committee, Cox Issue Subpoenas". *The Washington Post*, 24/7/1973; p. A01.

[43] Nixon, 1978, pp. 902-904.

[44] Kilpatrick, Carroll. “Nixon Forces Firing of Cox; Richardson, Ruckelshaus Quit." *The Washington Post*, 21/10/1973, p. A01.

[45] 1965年7月6日提交议会并于1967年2月10日通过的第二十五修正案准许美国总统在副总统职位空缺情况下有权任命副总统。

[46] 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于1973年11月27日和12月6日确认了这一任命。

[47] 根据霍尔德曼的日记，此段指的是1972年6月23日尼克松与霍尔德曼的谈话。在谈话中，尼克松说必须阻止联邦调查局走到“他们能够找出证据，使我们无法掩盖真相的地步。” *Kutler (ed.)*, 1997, *p.* 47. 1972年6月23日谈话录音所保

留的部分。他在谈到中央情报局掌控的用来进行“隐蔽行动”的款项时称：“……我们清楚，中央情报局在敛财。我的意思是，他们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运作资金。”尼克松还补充说：“能够想象肯尼迪会用大量钱财来做什么吗?” Kutler (ed)，1997，p. 70. 录音就此中断。尼克松的私人女秘书玛丽·伍兹（Rose Mary Woods）向参议院确认，磁带最后五分钟被抹掉了，但她声称是无意为之。

[48]Lardner Jr.，George. “Haig Tells of Theories on Erasure”. *The Washington Post*，7/12/1973，p. A01.

[49] MacKenzie，John P. “Court Orders Nixon to Yield Tapes；President Promises to Comply Fully；Justices Reject Privilege Claim in 8-to-0 Ruling”. *The Washington Post*，25/7/1974.

[50] Lyons，Richard & Chapman，William. “Judiciary Committee Approves Article to Impeach President Nixon，27 to 11—6 Republicans Join Democrats to Pass Obstruction Charge”. *The Washington Post*，28/7/1974，p. A01.

[51] 弹劾决议第一条得出的结论是：“查德·尼克松的行为违背了他作为总统的正直并破坏了宪政，极大地损害了法律和正义，而且明显伤害了美国人民。”第二条指控他亲自从国家税务局获得“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所包含的机密信息以达到法律所不允许的目的”，并操纵“联邦调查局、秘密情报局和其他行政人员、领导或批准这些机构或人员进行或继续从事与国家安全目的及其办公室的合法执法或经济职能无关的电子监视或其他调查，侵犯或蔑视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此条以 28 票对 10 票获通过。第三条将他违背誓言和宪法义务的事实作为弹劾的基础。“在没有合法理由和借口的情况下，他未按照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于 1974 年 4 月 11 日、1974 年 5 月 15 日、1974 年 5 月 30 日和 1974 年 6 月 24 日发生的正式授权传票的要求提供文件和其他东西，蓄意违抗传票。”此条以 21 票对 17 票获得通过。

[52] Haig，1992，p. 441.

[53] Nixon，1978，p. 1057.

[54] Haig，1992，pp. 447 e 478.

[55] Nixon，1978，p. 1064.

[56] Powers，1979，pp. 331-337.

[57] 这些磁带被认为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确凿证据，因为它们证明尼克松参与了“水门事件”。全部内容抄件收录于 Kutler (ed)，1978，pp. 67-69。关于这一事件见 Powers，1979，pp. 333-334。

第十九章

“水门事件”背后的政治斗争　“新保守主义”遭打击　美国在越南的失败　“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胜利　西贡失守　“邱池委员会”和对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调查　中央情报局参与杀害吴庭艳、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和卢蒙巴被披露　肯尼迪与黑手党

黑格将军将“水门事件”理解为“左翼与右翼”、国会与政府、情报部门与普通民众为控制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心灵与思想所进行的长期斗争的终结。事实上，更应该说是一场“进步民粹主义”与“保守民粹主义”为主导美国而进行的一场争斗。但正像当时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律师比尔·克林顿所称，“新保守主义”受到“水门事件”打击，但并没有被摧毁。[1]美国的噩梦没有随着尼克松的辞职而终结。尽管此前尼克松已与北越商定停火，并自1973年年初起从越南撤出美国军队，但战争并未结束。1973年11月7日，国会推翻了尼克松对《战争权力法》的否决[2]，该法案意在限制总统在未征得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将军队置于国外出现的敌对或迫在眉睫敌对状态的权力。尼克松在辞职前批准的最后一个法案中规定的向越南提供军援的最高限额，也从10亿美元减为7亿。南越[3]的战斗仍在持续，仍驻扎在那里的美军部队已无法直接参与。1975年年初，福特总统请求国会追加10亿美元，用以援助南越、老挝和柬埔寨[4]，但他未能如愿。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北越人正公然违反巴黎协议之际，国会先后拒绝赋予我和福特总统履行该协议的手段”[5]。美国驻汉城大使格雷厄姆·马丁（Graham Martin）指出，美国削减援助使阮文绍政府难以有效阻止共产党人的前进。即使获得批准的资金，也只有2/5真正用于越南，其余被用于购买装备。这些装备或等待发运，或根本就不被

发运。[6]

问题既不是资金，也不是武器的数量。美国士兵正因为拥有尖端技术和舒适的后勤供应，才无法适应越南沼泽和丛林最原始的条件。越共和北越士兵不仅与民众打成一片，而且完全适应这种生存条件，他们用大米和植物根茎充饥。为了抵御空袭，他们把补给物资深藏于在大山中挖掘的巨大仓库内。北越外交官黎德寿[7]（Le Duc Tho）将军1970年与基辛格就停火问题进行谈判期间曾表示，不能指望士气低落且待遇低下的南越部队战胜越共，即使在55万美军士兵支持下，他们也未曾做到。[8]美国提供的资金能够延长战争，但却难以帮助它赢得战争胜利，指望南越获胜很不现实。

美国战机的轰炸收效甚微，难以摧毁北越储存的武器和石油。越共和北越部队的工兵营从位于湄公河中部三角洲的广智省一直到西贡附近，建造了一条用于运送坦克和装甲车的公路和一条输油管道。[9]福特在致国会的一份函中称，河内除向南部派遣289 000名士兵外，还向那里运送了数百辆坦克和重炮、高射炮等。他在那份函中请求追加3亿美元资金，用于向阮文绍政府提供军事援助。[10]1975年3月，北越军队发起总攻，占领了古都顺化、岘港、朱莱和广义等城市。此时，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入了“红色高棉”手中。1970年在美国支持下推翻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亲王中立政府的朗诺（Lon Nol）将军被迫逃亡夏威夷。同时，北越军队和越共夺取了春禄，并向西贡挺进。西贡陷入一片恐慌和混乱，城内充斥着200万名难民。美国飞机和直升机匆忙营救绝望地聚集在美国大使馆的阮文绍政府的士兵和官员。4月21日，阮文绍辞职并逃亡中国台湾。30日，在包括美国大使格雷厄姆·马丁在内的最后50名美国人撤离后，北越军队和越共占领了西贡并将其改名为胡志明市。“体面间隙”的两年时间已经过去，战争宣告结束。5月7日，福特宣称，“美国已不再处于战争之中”[11]。“越战时代”以美国的失败告终。其间，约200万美国人参与了在印度支那的战斗和（或）行动[12]，结局极为悲惨，南越和北越分别有约300 000名和65 000名平民丧生。美国死亡人数为47 244人，153 329人住院，150 375人负“轻伤”，2 483人失踪。南越军队223 000名士兵死亡，570 600人受伤。北越军队有660 000人阵亡，伤员人数不详。[13]目睹西贡陷落的美国记者阿诺德·伊萨克斯评论说，并不需要敬仰共产主义制度就能承认，越共和北越人书写了历史上一个最卓越的“英勇、坚定和巧妙地抵抗优势兵力的壮举”[14]。

在“水门事件”和由此导致的尼克松辞职之后，美国在越南彻底失败

的同时，由参议员弗兰克·邱池（Frank Church）领导的参议院调查美国情报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行动委员会[15]揭露，中央情报局不仅参与了推翻阿连德政府的政变，而且卷入了暗杀智利陆军司令施奈德、卢蒙巴（刚果）、吴庭艳（南越）、特鲁希略（多米尼加共和国）事件和杀害卡斯特罗的企图，以及对古巴进行的恐怖行动。[16]“邱池委员会”查明，中央情报局在20多年时间中，非法从事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在反战组织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组织中安插人员，分别进行了32次电话窃听和电子通信截取行动，实施了12次非法搜查，拆封并检查了2 800万件信函，拍摄了279万件来自国外的信函，拆封了其中的215 820件。[17]国家安全局通过“幸运草行动”，截获了数百万份美国收发的电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则进行了“反情报计划”，即破坏行动，对马丁·路德·金和其他捍卫民权人士进行电子监视。监视对象还包括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仇视白人团”、“争取民主社会学生团”和“黑豹”等2 300个被定性为“旧左翼”、“新左翼”和“右翼”的组织。[18]1968年实施并在1969年扩展的“*CHAOS*行动”中，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对30万名学生和其他美国国民进行了监视，截取公民信件，对美国国内的大学和数百个组织实施调查，并向其中渗透人员。[19]1976年前后，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组织花费超过12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各种调查。一些是官方性质的调查，但往往也有政府难以控制的非法调查。中央情报局疯狂卷入国内政治，到了国会根本难以想象的地步。同时，该机构还以记者身份为掩护或使用其他伪装，向国外派遣人员。

“邱池委员会”也对情报机构参与肯尼迪谋杀展开了调查，但被传唤的黑帮人员却神秘地遭到暗杀。1975年6月19日，与肯尼迪有联系并协助中央情报局参与暗杀卡斯特罗未遂行动的黑帮头目萨姆·吉安卡纳[20]在接到传票后被杀。[21]其律师弗兰克·拉加诺在回忆录中称，“毫无疑问，吉安卡纳被杀是为了不让他说出中央情报局针对卡斯特罗的阴谋或其他任何黑帮式秘密”[22]。1975年7月30日，曾为尼克松竞选捐款的卡车司机工会副主席吉米·霍法（Jimmy R. Hoffa）在前往底特律会晤黑帮头目安东尼·贾卡洛内（Anthony Giacalone）途中神秘失踪。[23]他也被要求去“邱池委员会”作证，因为在肯尼迪遇刺案中，他与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前在古巴建立了庞大赌博网络的黑帮头目特拉菲坎特（Santo Trafficante）和卡洛斯·马尔塞洛（Carlos Marcello）有关系。查克·吉安卡纳（Chuck Giancana）认为，其兄弟萨姆·吉安卡纳遭暗杀前，曾根据中央情报局要求，策划了处决霍法的行动。共有5人参与了这一行动，其中芝加哥2人，

波士顿、底特律和辛辛那提各1人。[24]

1992年1月14日出版的《纽约邮报》报道称，霍法、特拉菲坎特和马尔塞洛参与了杀害肯尼迪的阴谋。“黑帮律师”拉加诺也被提及。他在1963年年初曾说过，霍法曾让他向特拉菲坎特和马尔塞洛转达有关暗杀肯尼迪的口信。拉加诺在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事实。霍法对他说：“你的朋友和卡洛斯除掉他的时机到了，杀了约翰·肯尼迪这个婊子养的!”[25]在皇家奥尔良酒店见面时，拉加诺说：“你不会相信霍法想让我转告你的话，吉米（霍法）要你去杀害总统。”特拉菲坎特和马尔塞洛这两人给他的印象是，他们真有执行这一命令的意图。拉加诺还在1994年出版的自传中透露，1963年7月，霍法让他再度去新奥尔良，又带去一个暗杀肯尼迪的口信。此后，马尔塞洛对他说：“见到吉米（霍法），你就告诉他，他对我有恩，恩重如山。”拉加诺认为，马尔塞洛、特拉菲坎特和霍法确实在暗杀肯尼迪事件中发挥了作用。[26]马尔塞洛此前已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流放到中美洲。特拉菲坎特不喜欢肯尼迪，他曾表示，在1961年入侵猪湾期间，肯尼迪背叛了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没有向他们提供空中支援。[27]霍法因种种原因而鄙视肯尼迪兄弟。[28]所有人都指望约翰逊在就任总统后免去罗伯特·肯尼迪总检察长职务[29]，以便中止他所进行的针对有组织犯罪的调查。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和黑帮头目们认为他们遭背叛了。[30]肯尼迪兄弟违背了其父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1960年在寻求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支持其儿子竞选时所作的承诺。[31]毫无疑问，正如新奥尔良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员1960年3月所证实的那样，黑手党一些成员和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在资金上支持肯尼迪竞选。[32]萨姆·吉安卡纳和东北部尤其是芝加哥的黑帮头目认为，是他们使肯尼迪得以入主白宫，因而他们有权得到回报。[33]

中央情报局招募去毒杀卡斯特罗的玛丽塔·洛伦茨曾与卡斯特罗有过一段恋情。她向1976年9月通过众议院第1540号决议成立的由路易斯·斯托克斯（Louis Stokes）担任主席的遇刺案特别委员会表示，“水门事件”中被抓的弗兰克·斯特吉斯是1963年11月22日向肯尼迪开枪者之一。她说，暗杀事件发生一个月前，他参加了奥尔兰多·博施（Orlando Bosch）在迈阿密家中的一次会晤。她在回忆录中重申了这一点。佩德罗·兰斯[34]（Pedro Luís Díaz Lanz）和李·奥斯瓦尔德（Lee Oswald）也在场，他们在会上确定了去达拉斯的计划。11月15日，他们驱车前往，同行者还包括博施、斯特吉斯、兰斯、奥斯瓦尔德、吉瑞·赫明（Gerry Hemming）和诺沃·山波尔（Novo Sampoll）兄弟。在他们下榻的酒店中

有数支步枪。他们在那里接待了杰克·鲁比（Jack Ruby）的造访。[35] 1977年11月3日的《纽约每日新闻》刊登了对她的采访。她称，奥斯瓦尔德参与了执行暗杀行动的秘密游击小组“40行动”，该组织是中央情报局于1960年准备入侵猪湾时成立的。其他成员为奥斯瓦尔德、斯特吉斯、博施、兰斯和一对姓名不详的古巴兄弟。特别委员会未接受她的证词，认为没有明显证据支持指控。但种种迹象似乎能够证明洛伦茨的指控是可信的。她在《亲爱的卡斯特罗》一书中揭露，奥斯瓦尔德“显然是美国秘密情报组织成员”，1959年，他曾以此身份被派往苏联。[36]

1976年7月，与肯尼迪有私交并参与谋害卡斯特罗阴谋[37]的约翰尼·罗塞里（Johnny Roselli）在向“邱池委员会”作证前失踪，其尸体在顿芳德林湾（迈阿密）的一个储油罐中被发现。几天前（7月6日），他向《华盛顿邮报》记者杰克·安德森透露，地下世界的阴谋策划者担心奥斯瓦尔德被抓后会将他们供出。卡洛斯·甘比诺（Carlos Gambino）1976年10月死于心脏病。1977年，卡洛斯·尼科莱蒂（Carlos Nicoletti）也是在刚被要求到众议院遇刺案特别委员会作证后被暗杀。同年，乔治·莫切齐尔德（George De Morchenchild）也在本该前往特别委员会就肯尼迪遇刺案作证的当天被杀。[38]特拉菲坎特是为数不多活下来的几个人之一。他在佛罗里达统领最大的毒品输入和分送中心[39]，被怀疑策划了针对萨姆·吉安卡纳的谋杀。[40]另一个活下来的黑帮头目是马尔塞洛，他很可能是肯尼迪遇刺案的组织者。他于1981年被判刑，作为特别犯人被关押在得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交界处的德克萨卡纳监狱，直到1993年3月3日去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备受老年痴呆症折磨。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中，他将一笔50万美元（现金）的款项交给霍法，以便转至尼克松竞选基金。[41]尼克松选举中的竞争对手是他们两人均憎恨的肯尼迪。水门丑闻爆发后，前总检察长米切尔的妻子玛塔·米切尔（Martha Mitchell）向合众社揭露，“尼克松与黑手党有牵连”。约翰·米切尔负责管理尼克松竞选资金，当时，他们夫妻关系已失和。米切尔对她的指控所作的回应是她精神失常。[42]但是，玛塔·米切尔的指责并非缺乏根据。萨姆·吉安卡纳曾对其弟弟查克说过，他和马尔塞洛为尼克松1960年总统选举初选提供了200万美元。他声称：“尼克松并不像杰克（肯尼迪）那样是我的囊中之物。很多老板拥有尼克松的一部分……我们分享影响力。”后来，他进一步指出：

> ……尼克松给了我一些好处，这很好。他使我们得到了一些高速公路合同，我们可以参与联邦和海外项目。我们也帮了他和他的中央

情报局朋友……他还甚至帮了我在得克萨斯的哥儿们（杰克）鲁比[43]，使他们避免去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作证。[44]

根据一些报告可以推断，在新泽西工会领袖安东尼·普罗文扎诺（Anthony Provenzano）和热那亚黑手党“我们的事业”分支机构“麦克莱伦委员会”张罗下，黑手党成员为尼克松竞选连任提供了50万美元，作为他于1971年12月23日宽恕霍法的回报。[45]不管是尼克松还是肯尼迪，以及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美国历任总统[46]，他们都与黑手党有一定牵连。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贝斯洛斯指出，美国联邦调查局保存的肯尼迪档案中，有他在1960年竞选运动中与黑社会成员保持联系的“相当多证据”。[47]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表明，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在太浩湖的卡尔-内华旅馆停留期间，多个对赌博和赌场感兴趣的黑帮头目拜访了他。[48]在谋杀卡斯特罗的阴谋中，黑帮头目萨姆·吉安卡纳、约翰尼·罗塞里、马尔塞洛、甘比诺、特拉菲坎特和梅耶·兰斯基（Meyer Lansky）都无偿与中央情报局进行了合作。因为，他们既希望重开在古巴的赌场，也希望美国政府能容忍和宽恕其非法活动。[49]弗兰克·拉加诺称：“中央情报局招募黑手党去谋杀卡斯特罗证明，它欣赏黑帮实施暗杀的能力。”[50]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肯尼迪在1960年与吉安卡纳和其他犯罪组织头目结成了某种“秘密邪恶联盟”。尽管黑手党在谋杀卡斯特罗计划中配合了中央情报局，但肯尼迪在当选后，不得不在对黑手党所作承诺和其弟弟罗伯特坚持追查黑帮头目之间摇摆。

除掉吉安卡纳和其他黑手党家族头目作为一种“掩盖”行为，避免了“邱池委员会”更深入地调查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行动。种种证据表明，两个情报机构出于不同目的，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中存在渎职或避免履行某些责任。[51]“邱池委员会”最终报告指出，“……很难找到任何情报机构行动的细节，因为它们在设计时就刻意防止被发现”[52]。但被揭露出来的内容足以让刚刚遭受越战和水门丑闻打击的大部分美国人感到震惊，它们清楚地表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国内对民权的侵犯，揭示出各个情报部门，尤其是中央情报局与犯罪团伙的勾结和同流合污，以及它们在亚非拉和中东所从事的暗杀、破坏和其他恐怖活动。而这些活动均得到美国领导人的批准。这些揭露连同水门丑闻和在越南的失败表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遭受了打击，民众对它的支持也不断降低，但它并未被毁灭。克林顿在回忆录中也持同样观点。[53]

当新保守主义者意识到美国在道义和军事上均容易受到伤害后，他们

重新结集，试图加强军事实力，使美国社会军事化，以便恢复其信誉，并捍卫智利和阿根廷等国军政府很好体现的“自由世界”利益。福特政府一方面宣扬财政紧缩，另一方面则继续增加军费开支。财政紧缩的目的是遏制已高达7%的年通胀率。虽然这一通胀率相对来说并不算高，但已足以遏制投资，使资本无法转化为美国政府的利润。1974年，福特通过电视节目呼吁美国人民“立即打击通胀”，要求人们勒紧裤带。1975年1月15日，他在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时宣布，将削减160亿美元税收，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他承认，“单凭军事力量并不够”，有效的外交活动对避免冲突并建立世界和平至关重要。[54]但第二年他又表达了在向议会提交的1977年度预算中把国防预算显著提高的意图[55]，国防预算增至1 050亿美元[56]，这意味着比前几年增加15%，五角大楼的购买力将得到实质性提高。美国经济对军工集团的依赖性更强。1976年总统选举期间，福特在回击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卡特（James Earl Carter）的批评时透露，他本来考虑把1975年的军事预算削减30亿～50亿美元，但国防部长施勒辛格回应说，这一措施将迫使美国裁减25万名军人、10万名文职人员和10万个工作岗位。这样，就只能推迟飞机的采购，对海军建设计划和陆、海、空军研究进行紧缩，并立即关闭20个军事基地。

接替施勒辛格出任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 Rumsfeld）（1975年11月20日—1977年1月20日）也试图扭转国防预算下降的趋势，以便使“美国战略力量能从本质上保持拥有制止一场全面核攻击的可信赖能力”。1976年3月，福特提出“国家历史上最高国防预算”，将债务权限提高到“1 127亿美元，并将开支权限确定为1 010亿美元”[57]。1976年，他在否决1976年《教育拨款法案》后，又为军事开支争取到1 100万美元。美国历史学家阿伦·内文斯和亨利·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认为，尼克松和福特把军工集团扩充为军事、金融、工业和学术为一体的集团，而曾经意味着社会保障的国家安全，从1974年起则意味着军事安全。[58]1976年年底，800万或更多失业者中的一半没有领到失业保险，老年人和那些拥有固定收入者，在与通胀搏斗中败下阵来。纽约、克里夫兰、底特律等大城市没有获得联邦资金。黑人青年中的失业率高达40%。[59]内文斯和康马杰认为，“在福特财政保守主义为数不多的受益者中，除了军人，就是工业大财团”[60]。

【注解】

[1] Clinton, 2004, p. 144.

[2] War Powers Resolution. Public Law 93－148. 93rd Congress, H. J. Res. 542.

November 7, 1973. Joint Resolution. Concerning the War Powers of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3] Karnow, 1997, pp. 675-676.

[4] 1972 年，国会批准向越南提供 20 亿美元的援助。1973 年，这一数额被削减至 14 亿。1974 年减为一半，1975 年更降至 6 亿美元。Nixon, 1978, p. 697.

[5] Id., ibid., p. 889.

[6] Karnow, 1997, p. 676.

[7] 黎德寿在河内政府中位居第五。

[8] Kissinger, 1994, p. 684.

[9] Id., ibid., p. 674.

[10]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Requesting Supplemental Assistance for the Republic of Vietnam and Camboja. January 28, 1975. 他要求对南越追加的 3 亿美元军援是此前批准的 10 亿美元和已在 1975 财政年度提供的 7 亿美元之间的差额;

[11] President Ford—Statement on Terminating the Eligibility Period for Vietnam Era. Veterans Benefits. May 7, 1975.

[12] Johnson, 2002, p. 740.

[13] Id., ibid., p. 740.

[14] Isaacs, 1984, p. 13.

[15] 被称为“邱池委员会”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对美国情报机构所从事的活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该委员会听取了数百人的证词，收集了来自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财政部税捐稽征署和其他联邦情报机构的大量文件。它在 1975—1976 年间拟订了 14 份报告。1975 年 2 月 19 日，参议院也投票批准建立众议院情报小组委员会，即内兹委员会。5 个月后，该委员会被奥蒂斯·派克（Otis Pipe）担任主席的派克委员会所取代。

[16] 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 An Interim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U. S. Senate, together with Additional, Supplemental, and Separate Views, November 20 (legislative day, November 18) 1975,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240-279.

[17] 关于这一主题，参阅 Wise, 1976, pp. 75, 399-400。

[18]Mais datalhes vide Supplementary Detailed Staff Report o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nd the Rights of Americans. Final Report, Book III, 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U. S. Senate, 2nd Session, April 23 (under authority of the order of April 14), 1976. U. S. Government Printig Office, pp. 787 - 886. Vide também Wise, 1976, pp. 148, 279 - 281, 311-314.

[19] 数百个接受调查并有调查人员打入其内部的机构包括：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 Young Communist Workers Liberation League (YCWLL); Na-

tional Mobilization Committee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 Women's Strike for Peace; Freedomways Magazine and Freedomways Associated, Inc.;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AIM);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 Draft Resistance Groups (US); Cross World Books and Periodicals, Inc.; U. S. Committee to Aid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 Grove Press, Inc.; Nation of Islam; 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 (YIP);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Black Panther Party (BPP); Venceremos Brigade; Clergy and Laymen Concerned About Vietnam。

[20] 肯尼迪可能自1960年起就知道中央情报局在和黑手党共同策划谋害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阴谋，因为就在那个时候，萨姆·吉安卡纳的情人朱迪思·埃克斯纳（Judith Campbell Exner，两人的共同情人）就将他介绍给肯尼迪。应弗兰克·辛纳屈的请求，萨姆·吉安卡纳与约瑟夫·菲斯凯蒂和迈耶·兰斯基等黑手党首领在西弗吉尼亚和芝加哥的总统初选中向肯尼迪提供了帮助。与黑手党的密切合作是通过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实现的。肯尼迪1960年2月通过辛纳屈在比弗利山庄认识了埃克斯纳。Beschloss, 1991, pp. 140 - 142. Hinckle & Turner, 1992, pp. 136 - 139. Hersh, 1997, pp. 300-312.

[21] Giancana & Giancana, 1992, pp. 353-354.

[22] Ragano & Raab, 1994, p. 325.

[23] 1983年，霍法被宣称遭到合法处决。

[24] Giancana & Giancana, 1992, p. 354.

[25] Ragano & Raab, 1994, pp. 144-145.

[26] Id., ibid., pp. 348-349.

[27] Id., ibid., p. 154.

[28] Dallek, 2003, p. 299.

[29] Ragano & Raab, 1994, p. 359.

[30] Id., ibid., p. 357.

[31] Id., ibid., p. 358.

[32] Dallek, 2003, p. 298.

[33] Ragano & Raab, 1994, pp. 357-359.

[34] 在与巴蒂斯塔斗争中帮助起义军并在革命胜利后出任古巴空军司令的飞行员少校佩德罗·兰斯是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公开表示不满的第一人。他逃往美国并于7月14日向参议院国际安全小组委员会表示共产党正在接管古巴政权。当时该委员会主席为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

[35] Lorenz & Schwarz, 1994, pp. 164-179. Vide Geyer, 1993, pp. 223-226.

[36] *"Lee Harvey Oswald war of fensichtlich Agent des amerikanischen Geheimdienste. Er ist 1959 schon in dieser Funktion in die Sowjetunion eingereist"*. Lorenz, 2001, p. 210.

[37] Vide 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 An Interim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U. S. Senate, together with Additional, Supplemental, and Separate Views, November 20 (legislative day, November 18) 1975,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72 - 73, 125 - 129. Hersh, 1997, pp. 303 - 312. Hinckle & Turner, 1992, pp. 136-139. Moniz Bandeira, 1998, pp. 400-409.

[38] Giancana & Giancana, 1992, pp. 353-357.

[39] Id., ibid., pp. 353-355.

[40] Id., ibid., p. 355.

[41] Beschloss, 1991, p. 140.

[42] 尼克松的助手们试图隐藏合众社记者海伦·托马斯（Helen Thomas）写的报道。该谈话参阅 Kutler (ed.), 1997, p. 614。

[43] 奥斯瓦尔德被谋杀与萨姆·吉安卡纳有关。

[44] Giancana & Giancana, 1992, pp. 285-288.

[45] Bakley & Billings, 1981.

[46] Beschloss, 1991, p. 140.

[47] Id., ibid., pp. 140-141.

[48] Id., ibid., p. 141. 关于约瑟夫·肯尼迪参与组织犯罪的谣传自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流传。靠白酒生意发财的他与黑手党一位首领的遗孀有染。

[49] "……某些地下势力反对卡斯特罗。在他当政前，古巴对他们的利益来说非常重要。但卡斯特罗强迫地下势力退出。推翻卡斯特罗意味着这些势力能够重返古巴。"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Kennedy, 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U. S. Senate. April 23 (under authority of the order of April 14), 1976. Book V.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 10. "From 1960 until 1962 the CIA met regularly with underworld figures plotting the assassination of Fidel Castro". Ibid., p. 11.

[50] Ragano & Raab, 1994, p. 457.

[51] 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 An Interim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U. S. Senate, together with Additional, Supplemental, and Separate Views, November 20 (legislative day, November 18) 1975,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72-73 e 125-129.

[52] Ibid., p. 10.

[53] Clinton, 2004, p. 144.

[54] Gerald Ford—1s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January 15, 1975—Washington, DC—The American Presidency—Speech Archive.

[55] Gerald Ford—2nd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January 19, 1976—Washington, DC—The American Presidency—Speech Archive.

[56] Blechman, Barry M. & Fried, Edward R. "Controlling the Defense Budge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76. 1975 年 11 月，国会将金额缩减至 75 亿美元左右。

[57] Remarks at a Meeting with the Chairmen and Ranking Republican Members of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and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s on the Fiscal Year 1977 Defense Budget—March 2, 1976.

[58] Nevis & Commager, 1986, p. 643.

[59] Id., ibid., pp. 643-644.

[60] Id., ibid., p. 644.

第二十章

中央情报局对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的干涉 “康乃馨革命”和葡萄牙独裁垮台 美国和对东帝汶的入侵 中央情报局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中央情报局支持“秃鹫行动”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治谋杀 阿根廷镇压活动和基辛格的告诫

基辛格入主国务院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仍维持之前所奉行的原则。尽管第11905号“行政命令”把情报部门的职能限制在美国宪法范围内，并禁止政治谋杀，但中央情报局继续干预各国内部事务。它对澳大利亚实施干涉，试图推翻工党总理爱德华·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领导的政府。福特总统批准向意大利提供资金，以便对可能取得选举胜利的共产党采取行动。在葡萄牙发生“康乃馨革命”（1974年4月25日）[1]后，他以阻止共产党上台为由，向葡萄牙提供了资金支持。“康乃馨革命”推翻了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的继任者马尔塞洛·卡埃塔诺（Marcelo Caetano），安东尼奥·斯皮诺拉（Antônio De Spínola）出任“救国联合委员会”主席。1974年9月，右翼势力采取了破坏“四二五”革命成果的行动，斯皮诺拉迫于左翼压力辞职，这令美国政府感到恐慌。1975年2月17日的《纽约时报》社论写道，革命暴动造成动荡的葡萄牙出现的“权力接管”，会助长意大利和法国的类似趋势，使希腊和土耳其出现问题，并将终结与苏联保持的“缓和”。中央情报局前成员艾吉称，中央情报局及其合作者在弗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大使和赫伯特·奥肯[2]（Herbert Okum）的策动下，极力在葡萄牙制造混乱，以便找到借口，让那些被视为温和派的军人采取行动，推翻革命政府。[3]3月11日，效忠斯皮诺拉将军的一批较为保守的军官试图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得到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势力支持的“救国联合委员会”原主席弗朗西

斯科·戈麦斯（Francisco Da Costa Gomes）将军。

尽管行动未能取得成功，但右翼和极右势力通过拉马略·埃亚内斯（Antônio Dos Santos Ramalho Eanes）中校率温和派军人于1975年11月25日发动的军事政变，重新获得了权力。政变是在革命委员会（1975年3月在“救国联合委员会”解散后成立）试图撤换一批军官并撤销唐科斯空军基地时发生的。社会党领导人马里奥·苏亚雷斯（Mário Soares）认为，11月25日发生的是一场反政变，由“九人小组”共同预谋并实施，特别是里斯本军区司令瓦斯科·劳伦索（Vasco Lourenço）等军官扮演了决定性角色。苏亚雷斯揭露，“不少人已预谋数月之久，他们毫不隐讳用武力夺权的意图”。他指出，左派不断进行挑衅，发表煽动性演讲，而“共产党则一直耿耿于怀，等待第一个时机夺回失去的地盘”[4]。他补充说，“政治和军事上均不存在任何诡计，一些人起而夺取政权。尽管他们拥有相当多的手段，但却成为失败者”[5]。从表面来看，11月21日被“革命委员会”去职的左翼军方领导人、大陆作战指挥部司令奥特罗·卡尔瓦略（Otelo Saraiva de Carvalho）将军试图在共产党总书记阿尔瓦罗·库尼亚（Álvaro Cunhal）支持下夺取政权。他在军人和海员走上里斯本街头示威和劳动者包围议会（1975年11月12日和13日）后采取了行动。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科斯塔·戈麦斯（Costa Gomes）总统后来宣称，在对过去的一些行动进行分析，尤其是为应对政变而举行的会议之后，他认为11月25日的事件至少得到一些团体的强烈推动。这些团体确实希望使形势变得明朗，并撤换了一些当时占据某种主导地位的军事和政治人物。[6]1976年7月23日，戈麦斯卸任总统，埃亚内斯继任。后被社会党领导人苏亚雷斯取代的若泽·阿泽维多（José Pinheiro Azevedo）海军上将成为6月27日选举的获胜者。美国驻里斯本大使、中央情报局前成员弗兰克·卡卢奇更愿意支持这一同时得到德国和法国支持的选择，以遏制共产党，避免出现或许北约要被迫出面干预的局面。莱斯利·盖尔布1975年9月25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称，到那个时候为止，中央情报局已向葡萄牙社会党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由于被认为是一支温和而多元的力量，它也得到联邦德国社民党的资金支持。[7]

福特和基辛格甚至考虑过把葡萄牙驱逐出北约并支持美国拥有重要军事设施的亚速尔群岛独立运动的可能性。[8]基辛格为因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取得胜利[9]而失去理智的印尼独裁者穆罕默德·苏哈托（Muhammad Suharto）入侵东帝汶开了绿灯。东帝汶曾是葡萄牙殖民地。11月27日，即印尼入侵前一周，由沙纳纳·古斯芒（Xanana Gusmão）领导的左翼东帝

汶全国解放阵线宣布国家独立。自1974年年底起，由国家情报协调委员会主任苏卡玛（Yoga Sugama）将军等组成的印尼军事小组进行了一项名为“科摩多行动”的“隐蔽行动”，目的是占领东帝汶。[10]令基辛格感到担忧的是，印尼在入侵行动中使用的是美国提供的武器。按照美国国会规定，它们只能用于防御目的。因此，他告诫苏哈托，“不管你做什么，都应行动迅速，这很重要”[11]。得到美国完全首肯的入侵行动于1975年12月7日在阿里·穆多波（Ali Murtopo）将军指挥下进行，印尼军队使用的是美国提供的武器。拥有70万人口的东帝汶可能有10万人丧生，约20万幸存者被关入令人不寒而栗的集中营。[12]7天后，印尼正式兼并东帝汶。联合国安理会于12月22日通过第384号决议，谴责印尼的入侵行动，要求其撤军。1976年4月22日，又通过第389号决议，承认东帝汶的自决权，要求印尼撤出军队。但美国并未为保障决议的履行采取任何行动。1976年，福特对雅加达进行了正式访问，他声称，将保持对印尼的经济援助，而对印尼在东帝汶进行的种族大屠杀却只字未提。美国不断向印尼提供攻击直升机和其他用来毁灭村庄和庄稼的各种武器。[13]对华盛顿来说，重要的是印尼位于航海生命线附近的战略位置和作为五角大楼军援接收者以及面向美国的石油等重要原料出口国的事实。帝汶海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苏哈托后来把开采权给予了澳大利亚[14]，以换取对兼并东帝汶的认可[15]。然而，古斯芒组织东帝汶全国解放武装力量（FALINTIL）开展了抵抗运动，他们在战略要地依靠民众支持，用游击战打击印尼军队。

“康乃馨革命”后，和莫桑比克、佛得角、几内亚比绍等葡萄牙殖民地一起获得独立的安哥拉，状况也十分艰难。自1963—1964年起，中央情报局与中国一起，在军事物资和资金上支持由霍尔顿·罗伯托（Holden Roberto）领导的安哥拉全国解放阵线（FNLA）。但此时它转而支持由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领导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MITA），并挑起内战。美国这样做是为了阻止由阿戈什蒂纽·内图（Antônio Agostinho Neto）领导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MPLA）巩固权力。“他们在挑起战争。”当时的巴西总统（1974—1979年）埃尔内斯托·盖泽尔（Ernesto Geisel）将军指的就是美国。他还表示：“他们大谈和平，却挑起战争。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是什么？是安哥拉一个得到美国支持的反政府部落，美国人向他们提供武器、金钱和技术等一切所需。”[16]

盖泽尔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还表示，当巴西承认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时，就有人对他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国家，美国正在资助反对安哥拉政

府的革命，而我们是支持美国的。”他立即予以反驳：“不！我不支持这一点。我认为美国无权推动他国革命。”他还称，如果阿戈斯蒂尼奥政府是共产党，那么，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则在“武器、弹药、金钱等很多方面得到美国支持”[17]。他质问：

> 美国为何要干预那个国家（安哥拉）并挑起一场革命？我们与此毫不相干，我们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毫不相干。过去我们一直与安哥拉有贸易来往，现在，我们有兴趣从那里获得石油。[18]

美国养虎为患。1964 年美国怂恿、支持的巴西专制政权，自 1967—1968 年起，不再听命于它。面对民族主义右翼军人等群体的不满，为了保全政权并使自己合法化，它转而更多地考虑民族发展的利益。然而，苏联并不信任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它对巴西承认阿戈什蒂纽·内图政府心存疑虑。苏联的一位情报人员称，古巴在非洲的最高民事官员阿尔基梅德斯·科隆比埃（Arquimedes Columbié）在安哥拉战争期间曾表示，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在背后指挥巴西的可能性。他们清楚，让巴西人去做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领导人的工作会相对容易”，“有必要密切关注巴西人在罗安达所做的事情”[19]。另外，在安哥拉独立前夕撤走了领事的美国，对巴西承认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感到震惊，基辛格十分恼怒。[20]尽管古巴在未通知莫斯科的情况下，于 1975 年 11 月 4 日出兵支持阿戈什蒂纽·内图政府抵御南非军队，但基辛格和福特总统持相同观点，都认为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是苏联地缘政治的扩张工具。对于南非入侵安哥拉，美国不只是知情，而且还给予了支持。[21]基辛格对“侵略性专制主义和其他政府”加以区别对待。那些政府“尽管有其不完美之处，但均极力抵制外来压力和颠覆，这样就能使所有自由人民保持权力平衡”[22]。这里“有其不完美之处”的政府，指的是军事独裁政府。美国支持它们的建立，目的是要保证“所有自由人民”的权力平衡，尽管这些国家的人民并不自由，智利便是其中一例。美国的真正目的是维护美国商业集团及其各国伙伴的利益。

这一理由使得基辛格不仅容忍，而且怂恿在阿根廷的血腥镇压。因在智利的所作所为而受“邱池委员会”调查的中央情报局，尽管表面上与 1976 年 3 月 24 日发生的推翻贝隆夫人的政变保持一定距离[23]，但国务院对这一阴谋了如指掌，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加以制止。它知道阿根廷议会会被关闭，而“军政府将是一个保守政府，其最迫切目标是粉碎恐怖主义，消除政府腐败和工潮”[24]。

基辛格指望阿根廷军政府“能对美国友好”。他预计，随着打击游击队战斗的加强，“它几乎肯定会侵犯人权”，招致“国际批评”，并在美国舆论中形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将使我们和阿根廷新政府的关系变得复杂”[25]。但美洲事务局的报告认为，承认阿根廷新政府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问题。在接到阿根廷军政府照会后，美国可以按其规章行事，“最好在几个拉美国家承认阿根廷新政府后再那样做”[26]。

不出美洲事务局所料，贝隆政府倒台后，阿根廷军政府实施了大量处决，不只是针对阿根廷人，还包括流亡在阿根廷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来自智利、乌拉圭、玻利维亚、巴西和巴拉圭。甚至格温达·洛佩斯（Gwenda Loken Lopez）和梅尔塞德斯·班德（Mercedes Naveiro Bender）这两位旅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国公民也遭关押，并被施以野蛮酷刑。5月19—20日，两名乌拉圭议员遭暗杀，一位是泽尔马尔·米切利尼（Zelmar Michelini）参议员，另一位是古铁雷斯·鲁伊斯（Héctor Gutiérrez Ruiz）众议员。这些事实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邱池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在智利政变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暗杀政治领导人的揭露，强烈冲击了大部分民众的民主意识。于是，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罗伯特·希尔（Robert Hill）向阿根廷总统府副秘书长里卡多·尤弗雷（Ricardo Yofre）转达了美国对那里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担忧。尤弗雷声称，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德拉（Jorge Rafael Videla）将军也对绑架和暗杀感到震惊。但他解释说，阿根廷正进行“一场反颠覆的全面战争”，在激烈战斗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侵犯人权的情况”。他还说，政府计划“立即大大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27]。他认为，问题十分复杂，因为有大量不处于他们控制下的团体，很可能是这些团体绑架和杀害了米切利尼参议员和鲁伊斯众议员。[28]根据维德拉将军的定义，“不应仅仅将那些使用武器或安放炸弹者认定为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也包括那些从事与我们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违背的行动的人”[29]。

希尔大使与阿根廷总统府副秘书长会晤后的几天，局势更趋恶化，另一名美国公民被阿根廷安全部队绑架，并被施以酷刑，此人名为埃利达·梅西纳（Elida Beatriz Messina），是富布赖特委员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协调员。[30]希尔大使不得不向阿根廷外长塞萨尔·古塞蒂（César Augusto Guzzetti）表达美国的担忧。然而，暴力愈演愈烈。6月3日，被推翻的玻利维亚总统胡安·托雷斯[31]的尸体被发现。希尔大使向国务院报告说，有“相当多间接证据”证明，阿根廷安全部门处决了乌拉圭议员米切利尼、鲁伊斯和玻利维亚的托雷斯将军。他在另一份电报中指出：“(1) 所

有这些国家的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在某种程度上都进行合作。（2）所有这些政府都有权进行隐蔽处决。”[32]

同一时期，在美国知情的情况下，智利、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情报机构负责人在智利圣地亚哥会晤。他们建立了一个代号为“秃鹫行动”的电脑信息系统，并商定建立一个扩展到欧洲的国际通信网络。他们还决定分阶段实施一系列共同行动，以便于协调镇压活动，铲除南锥体国家专制政体的敌人。据美军国防情报局解密文件显示，“秃鹫行动”第三阶段，即最秘密阶段的目的是，由成员国组成专门小组，并将其派往世界各地执行惩罚行动。这些行动包括暗杀所谓的恐怖分子或支持他们的组织者，也就是打击南锥体军政府的政治对手。这些对手并不仅仅指那些诉诸武装手段而被不加区分地指控为“恐怖分子”的人们，也包括那些在政治上反对独裁的人们。假如一名政治对手或一名支持敌对分子的组织者在欧洲，那么，“秃鹫行动”的一个专门小组就会被派往那里，对其定位并实施监视。定位和监视完成后，“秃鹫行动”第二个小组会被派往那里，采取针对他的实质性惩罚。一个国家向由另一国家人员组成的谋杀小组提供假证件。因反对皮诺切特发动的政变而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智利将军卡洛斯·普拉茨（Carlos Prats）是最早受害者之一。1974 年 9 月 7 日凌晨，当他和妻子下车时，一枚炸弹爆炸，两人均被炸死。

美国解密的文件表明，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组织鼓励并支持了智利、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安全部队的联合。华盛顿对此感到欢欣鼓舞，认为为了应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一做法是必要的。“国际恐怖主义”的代表是左翼政治组织，它们诉诸武装行动与军政府抗争，并于 1974 年组成了“革命协调委员会”。[33]美国记者约翰·丁基斯（John Dinges）写道：“这一历史中的政治悲剧在于，实施暗杀和群体屠杀者指望美国提供技术支持和战略指导。”[34]美国外交官、情报和军事人员与镇压机构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美国情报机构对“秃鹫行动”成员进行培训并提供物资、情报和通信系统的支持，还对他们就实施绑架和刑讯逼供进行指导。[35]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掌握大量系统侵犯人权的信息，但都未加以劝阻和制止，也未使“秃鹫行动”计划流产。[36]阿根廷外长古塞蒂上将[37]曾在智利圣地亚哥谈及协调各国安全机构行动的必要性。1976 年 6 月 10 日，他亲口对基辛格说，“阿根廷的主要问题是恐怖主义”，消灭它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他还强调，恐怖主义是整个南锥体的普遍问题，阿根廷政府支持使邻国联合起来的共同行动。[38]基辛格告诉他，美国政治形势已变得“疯狂”，詹姆斯·卡特（James Earl Carter）显然将成为继任福特

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国内有强烈压力要求在人权上有所作为。基辛格指出，“这是一个政治活动、犯罪活动和恐怖活动趋于融合而失去明显界限的令人好奇的时刻”[39]。他告诉对方，“如果需要做一些事，那你就应该行动，并应该行动迅速”，以便立即回到“常规步骤”。基辛格一边表示美国在人权方面存在压力，一边又激励古塞蒂：“我们希望你取得成功，我们并不想折磨①你，我会尽力而为。”[40]

鉴于阿根廷不断侵犯人权，包括有三名美国公民被抓，并被施以酷刑，美国公众舆论反响强烈。1976 年 9 月 17 日，希尔大使再次就人权问题向古塞蒂上将提出交涉。但古塞蒂反驳说，基辛格希望阿根廷政府“尽可能快地”解决恐怖分子问题。所有抵制和反抗军政府者均被冠以这一称谓。[41]阿根廷军政府明白，基辛格全力支持他们。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希尔大使与古塞蒂交谈以及智利驻美国前大使（阿连德政府）奥兰多·勒特利埃尔（Orlando Letelier）及其秘书罗尼·莫菲特（Ronni Moffitt）在“秃鹫行动”第三阶段[42]遭暗杀几周后，副国务卿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W. Robinson）在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施劳德曼（Harry Shlaudeman）陪同下，在华盛顿接待了古塞蒂将军并向他表示，阿根廷政府一开始采取强硬做法可以理解，但随后有必要采取一个温和姿态。他表示，美国是“一个理想主义和道义国家”，其国民很难理解阿根廷所面临的那种问题。他还说，趋势应是采取“我们的道德标准”，阿根廷应该理解美国国会对贷款和军援的反应。罗宾逊认为，不管美国人民“正确或错误”，阿根廷在他们看来是“粗暴干涉人权的一个典型”。在现行法律下，政府可能无法在美洲发展银行向阿根廷提供资金问题上投赞成票。他称，“政府处境困难”。他还提到了其他原因，包括“美国许多有良知者虽可能有点天真，但均不分青红皂白地与阿根廷囚犯站在一起”这一事实。当阿根廷政府拒绝让美国核查其被关押国民时，持这一观点者更加占据上风。[43]

基辛格向美国驻外使馆发出的信号是，捍卫人权并非优先，而是要服从美国的战略目标。他不支持搜集南美各国军政府所从事的暴行和滥用权力的情报。他希望华盛顿不再出现抗议活动。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一个套间内会见古塞蒂（10 月 7 日）时，基辛格劝告阿根廷政府加快行动，以便在美国国会开会讨论削减对阿根廷的军援前，结束这场“肮脏战争”。根据在国家安全档案局要求下解密的谈话备忘录，基辛格对他说：

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希望你们取得成功。我的一贯观念是朋友应该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 得到支持。美国人不明白的是，你们正在进行一场内战。我们在了解人权问题时并不了解其背景。你越早取得成功就越好……人权问题正在上升，你们的大使会告诉你。我们希望一个稳定的局势，并无意给你们造成不必要的困难，你们最好赶在国会复会前解决问题。不管你恢复何种自由，都会有用。[44]

古塞蒂将军告诉基辛格，“恐怖组织”将被铲除，如果继续采取行动，有望在年底前后控制危险，尽管还可能发生孤立的恐怖行动。基辛格追问：“它们何时能被消除？明年春天？”古塞蒂回答说，将会在年内，即1976年年底前后。基辛格再度对阿根廷的事态表示理解和支持。1976—1983年间，基辛格和福特政府其他官员所默许的这场针对“颠覆”和“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导致至少8 960名阿根廷人“失踪”，其中多数为劳动者（30.2%）和学生（21%）。[45]他们被绑架、虐待和秘密处决，很多人被活活扔进拉普拉塔河。约有8 625人在军政府期间被关押多年。[46]根据一些估计，加上在阿根廷内地被杀害的人民革命军（托洛茨基派）和贝隆青年特别组织（蒙特内罗斯）的游击队员，死亡总数接近3万。

【注解】

[1] 之所以被称为“康乃馨革命”，是因为人们上街与推翻政府的武装力量共同欢庆，并在他们所持的步枪枪口上插上康乃馨（葡萄牙国花）。

[2] 奥肯曾任美国驻米纳斯州总领事。他参与了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的策划。

[3] Agee & Wolf (eds.), 1978, pp. 65-68.

[4] Soares, 1984, pp. 200-201.

[5] Id., ibid., p. 202.

[6] Costa Gomes, Francisco da. Experiência na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http://www.presidenciarepublica.pt/pt/palacio/presidentes/costa_gomes_exp.html.

[7] Agee and Wolf (eds.). 1978, pp. 74-75.

[8] Andersen, Benedict R. “East Timor and Indonesia: Some Implications,” in Peter Carey and G. Carter Bentley (eds.). *East Timor at the Crossroads: The Forging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pp. 138-39, apud *East Timor Revisited Ford, Kissinger and the Indonesian Invasion*, 1975-1976. Ford and Kissinger Gave Green Light to Indonesia's Invasion of East Timor, 1975: New Documents Detail Conversations with Suharto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º 62. Edited by William Burr and Michael L. Evans December 6, 2001.

[9] Carey & Bentley, 1995, p. 62.

[10] Id., ibid., p. 62.

[11] Embassy Jakarta Telegram 1579 to Secretary State, 6 December 1975 [Text of Ford-Kissinger-Suharto Discussion], Secret/Nodis. Source: Gerald R. Ford Library, Kissinger-Scowcroft Temporary Parallel File, Box A3, Country File, Far East-Indonesia, State Department Telegrams 4/1/75-9/22/76.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2] Carey & Bentley, 1995, p. 63. Hertsgaard, Mark. "The secret life of Henry Kissinger; minutes of a 1975 meeting with Lawrence Eagleburger". *The Nation*, 29/10/1990.

[13] Ibid.

[14] 1989 年签署的《帝汶海峡条约》将印尼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域划分为 3 个区域：一个为两国共同所有，一个属于印尼，另一个归属澳大利亚。开发的是属于两国共同拥有的区域，石油储量估计达 9 亿桶。这一条约在国际上一直未被认可。

[15] Embassy Jakarta Telegram 1579 to Secretary State, 6 December 1975 [Text of Ford-Kissinger-Suharto Discussion], Secret/Nodis. Source: Gerald R. Ford Library, Kissinger-Scowcroft Temporary Parallel File, Box A3, Country File, Far East-Indonesia, State Department Telegrams 4/1/75 - 9/22/76.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Vide também Wood, 2003, pp. 130-131.

[16] D'Araujo & Castro (orgs.), 1998, pp. 344-454.

[17] Id., ibid., pp. 364-365.

[18] Id., ibid., pp. 364-365.

[19] Telegrama de Arquimides Columbié [Situación Política Angola]. Procedente do Congo. Documento del Centro de Informacion de Defensa de las 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CIDFAR. 18/12/1975, Nacional Security Archive.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历史学家、国家安全档案局局长葛雷杰西从古巴档案中找到了这些文件。它们被汇集到他撰写的《互有冲突的使命：哈瓦那、华盛顿与非洲 1959—1976》一书中，(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20] *Relatório Reservado* 484, ano IX, Rio de Janeiro, 6-12/1/1976.

[21]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Secret/Sensitive—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 Participants: Teng Hsiao-p'ing, Vice Premi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ao Kuan-hua, PRC Foreign Minister et al., Gerald R. For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enry A. Kissinger, Secretary of State, Brent Scowcroft,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George Bush, Chief of the United States Liaison Office in Peking et al. Wednesday, December 3, 1975, 9: 25 a. m-11: 55 a. m.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2] *The Washington Post*, 25/9/1977. Apud Schoultz, 1987, p. 116. Dinges, 2004, p. 158.

[23] Sáenz Quesada, 2003, p. 424.

[24] Report. Secret. 13 February 1976. From: Bureau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William Rogers. To: Secretary of State—Henry Kissinger. Subject/Title: Possible Coup in Ar-

gentina. Agency: Department of State. Source: U. S. Government Chile De-Classification Project.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5] Ibid.

[26] Ibid.

[27] Secret—EXDIS. Document Number 1976—Buenos03460. Info—OCT-01—ISO-000SS-00—065165—P 251156z May 76—From Amembassy Buenos Aires to Sec State WashDC—Piority 5774—Secret—Section 1 of Buenos Aires 346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8] Ibid.

[29]Apud Sáenz Quesada, 2004, p. 659.

[30] Stateman, May 27, 1976. Elida Beatriz Messina to George S. Beckett, Security Officer of the U. S. Departament of State. Witnessess: Charles R. Meyer, Cultural Affairs Officer—USIS—28/5/1976. State Department Opens Files on Argentina's Dirty Wa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国家安全档案局南锥体文献项目部主任、历史学家卡洛斯·奥索里奥（Carlos Osório）编辑了名为《阿根廷的肮脏战争》的文件。

[31] 1971年8月，带有军事和民族主义性质的托雷斯政府被乌戈·班塞尔将军推翻。巴西政府怂恿了这一军事政变。

[32] Departament of State Telegram. 7 June 1976. From Amembassy Buenos Aires Aires. Object: Possible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of Violent Deaths of Political Figures Abroad. Action: Secstate, WashDC, IMMEDIATE, Buenos Aires 3741. Ref State 127156. State Department Opens Files on Argentina's Dirty Wa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33] 这些组织为革命左翼运动（智利）、人民革命军（阿根廷）、民族解放阵线——杜帕马洛斯（乌拉圭）和玻利维亚民族解放阵线等。

[34] Dinges, 2004, p. 2.

[35] Id., ibid., p. 250.

[36] Id., ibid., p. 2.

[37] 古塞蒂上将后遭炸弹袭击致残。

[3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antiago Chile, June 6, 1976. Secretary's Suite. 8：10 a. m. -9：15 a. m.

Participants: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cretary, the Under Secretary Roger et al. Argentina: Foreign Minister Guzzetti, Ambassador Carasales, Ambassador Pereyra et al. Distribution: ARA, S/p. State Department Opens Files on Argentina's Dirty Wa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3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antiago Chile, June 6, 1976. Secretary's Suite. 8：10 a. m. -9：15 a. m.

Participants: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cretary, the Under Secretary Roger et al. Argentina: Foreign Minister Guzzetti, Ambassador Carasales, Ambassador Pereyra

et al. Distribution: ARA, S/p. Ibid. 基辛格与古塞蒂的会晤是在 6 月 10 日圣地亚哥一次会议期间进行的。但谈话备忘录日期被误写为 6 月6 日。

[40] Ibid.

[41] Document Number: 1976Buenos06130. Case Number: 200000044—Buenos Aires 06130 202213Z Action SS-25 P 202115Z—From: Amembassy Buenos Aires. To: SecState WashDC Priority—7180. Subject: Other aspects of September 17 conversations with Foreign Minister Ref: Buenos Aires 6100.

[42] 巴拉圭武装部队参谋长阿雷亨德罗·达瓦罗斯（Alejandro Fretes Davalos）将军告知美国大使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参与“秃鹫行动”的南美各国情报机构负责人通过美国设在巴拿马运河区的通信设施保持相互联系。这些覆盖整个拉美的设施被用于协调南锥体国家的情报信息。State Department Cable, U. S. Ambassador Robert White (Paraguay) to Secretaryof State Cyrus Vance, Subject: Second Meeting with Chief of Staff. Letelier Case, October 20, 1978, Confidential. 这一电报被长岛大学的帕特里希·麦雪（Patrice McSherry）教授发现，并被发表在 2001 年 3 月 6 日的《纽约时报》上。http://www. gwu. edu/-nsarchiv/mews/20010306/.

[43] Ibid.

[44] Department of State—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 Date: Oct. 7, 1976. Secret—NODIS. Subject: Secretary's Meeting with Argentine Foreign Minister Guzzetti. Date, Time and Place: October 7, 1976 5:15 P. M., Secretary's Suite, Waldorf Astoria Hotel, New York. Participants: Argentina—Foreign Minister Cesar Augusto Guzzetti,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rnaldo T. Musich,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Carlos Ortiz: U. S. — The Secretary, Under Secretary Philip Babib et al., Sourc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reques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released November 2003.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该备忘录并未包括在美国国务院阿根廷解密项目 2002 年 8 月解密的 4 700 份文件中。

[45] *Informe de la Comisión Nacional sobre la Desaparición de Personas: Nunca Más*, pp. 479-481. Vide também Boccia Paz et al., 2002, p. 188. Verbitsky, 2003.

[46]Informe de la Comisión Nacional sobre Desaparición de Personas: Nunca Más, pp. 408-409.

第二十一章

卡特对人权的承诺　与巴拿马谈判和与古巴接触　桑地诺阵线在尼加拉瓜的胜利　伊朗伊斯兰革命　美国使馆人员沦为人质　入侵阿富汗　招募“圣战者”　布热津斯基和支持分裂苏联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美国从来没有认真地把人权问题当作其对外政策的要素，捍卫自由在冷战期间只停留在口头上。尼克松对共产党独裁政府和非共产党独裁政府区别对待，基辛格则意识到“侵略性专制主义”与“其他政府”之间的“道德差异”。后者“尽管有其种种不完善，但它试图抵制外来压迫或颠覆”，有助于使“自由世界”保持权力平衡。两者的区别并非基辛格所说的“道义上”的，主要是经济上的。尽管有其种种“不完善”的“其他国家”是最糟糕的极右军事独裁政府，但它们能够保证美国大公司的投资和贸易。“自由世界”就是商业世界，包括趋于瓦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以及依靠中央情报局支持在伊朗、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建立的独裁政府。在越南的失败、导致尼克松辞职的“水门事件”、中央情报局支持智利建立血腥独裁政府和参与暗杀外国政治领导人的行动，以及对拉美国家宪法赋予的人权的粗暴侵犯充分说明，美国所采取的态度毫无道义可言。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美国对外政策日趋低劣，在国内和国际均丧失了人们对它的尊重。[1]由于美国以捍卫民主和“自由世界”为由推动各种政变，并支持残忍的右翼独裁政权，它正在输掉与苏联进行的心理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智利事件感到震惊的美国国会于1974年通过一项法律，把尊重人权确定为向外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重要条件，要求国务院提交年度《人权报告》，并建立一个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处。

越战失败所带来的国际性后果可能并没有令绝大部分美国民众感到耻辱，但他们却失去了自信和自尊，因为他们知道，本国领导人在一场毫无益处和毫无必要的战争中牺牲了5万名年轻人，违反了美国自恃拥有的民主等价值和德行，正如水门丑闻以及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部门被揭露出来的犯罪和滥用权力行为所揭示的那样。作为接替福特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试图恢复美国人民的自尊和被视为美国形象基石的价值和德行信念。他被推选为总统候选人时声称，美国“不应用吹嘘和好战而应以平静的力量”说话，在国际问题上“不仅需要依靠军火库的大小，还应依靠思想的高尚”。他之后还表示：

> 和平不只是意味着放弃战争，还意味着粉碎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和平是保护人权的不懈努力，是力量和友善的双重体现。我们祈盼和平，我们将为和平而工作，直至永久消除对所有国家的核威胁。[2]

在民权运动、普通劳工、黑人以及南部几乎所有州（除明尼苏达州和得克萨斯州外）的支持下，他赢得了1976年的总统选举。他执政伊始就强调：“我们对人权的承诺必须是绝对的，要使我们的法律保持公正，使我们的自然美得到保存。强者不应该欺负弱者，人的尊严应该得到重视。”[3]

卡特确实把人权问题当作其对外政策的核心。他有意表明，美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基于军事实力，同样也体现在道德力量之中，以此否定苏联专制政权的合法性。1977年3月17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他将致力于维护和平，减少军备竞赛，建立一个合作更密切的国际经济体系。为此，他将“和潜在的对手以及我们亲密的朋友一起努力，以推进人权事业”。他后来还表示，所有《联合国宪章》签字国都负有履行对人权基本尊重的义务。因此，任何人不能宣称虐待本国公民“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当酷刑和非法囚禁在世界某一个地方发生时，美国不能回避令其改正的责任。他宣布，美国愿支持哥斯达黎加政府12年前提出的在联合国建立一个人权高级专员署的提议。他指出：

> 强大的国际机器将帮助我们缩小在保护人权方面有关承诺与行动之间的差距。当与国际承诺相违背的粗暴或大规模侵犯发生之时，我们大家都应感到担忧。对《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赫尔辛基协定》和其他许多国际协议的庄严承诺，应该与商业和安

全协议一样予以严肃对待。

卡特关于美国将倡导和保护人权的言论，既针对“潜在的对手”，即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面向“亲密的朋友”，即拉美和亚洲国家。然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简·布莱克（Jan K. Black）所作的评价，人权政策的实施，自卡特执政之初就显得谨小慎微。[4]事实上，由于不尊重人权而中止军援的情况十分有限，只影响了智利、埃塞俄比亚、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而韩国和菲律宾则以国家安全为由，被免于制裁。[5]1977 年，美国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团副团长安德鲁·杨（Andrew Yong）大使[6]的助手、政治学家布雷迪·泰森（Brady Tyson）为美国在推翻阿连德军事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致歉，他在演讲中表示：

> “如果我们不为一些政府官员、机构和私人金融集团在 1973 年 9 月 11 日发动的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的军事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深深歉意，那么就不能说我们是真诚的。”[7]

尽管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一直反对向智利提供新贷款，但这一正义人士富有勇气的讲话未产生多少效果，反而使他丢了公职。向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提供的援助虽然数量不多，却一直未曾中断。美国军事小组继续留在那里，它们以专业性关系为理由，目的是要避开国会的监视。在中非的扎伊尔（前比利时治下的刚果）统治的约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utu）长期侵犯人权，但仍得到华盛顿的帮助。卡特寻求改善美国在拉美的形象，于是就与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的军政府产生了摩擦。1977 年，他与奥马尔·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总统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承诺将在 2000 年把巴拿马运河主权移交给巴拿马政府。[8]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消除两国关系的症结，因为巴拿马人经常因运河问题进行示威并与美军发生冲突。[9]卡特还通过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代表处，以期与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但这一进程未能推进到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地步，因为，卡斯特罗拒绝承诺放弃干涉索马里或不支持任何民族解放运动。[10]1979 年，卡特完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两国互派大使，这意味着与其台湾“外交关系”的终结，尽管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保留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利。1980 年，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总额达 10 亿美元。[11]同年，美国和苏联就《美苏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开始谈判。这一新协议把导弹（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基弹道导弹

等）数量限制在 2 250 枚以内。6 月 15—18 日，美苏在维也纳举行首脑会议。卡特在会上对勃列日涅夫宣称，将不会批准任何针对伊朗和阿富汗的军事干预。1979 年 2 月，阿富汗发生了美国大使阿道夫·杜布斯（Adolph Dubs）遭绑架并遇害事件。卡特希望勃列日涅夫也能采取同样做法。但卡特无法驾驭行政机器，其实施人权政策的努力遭到了很大阻挠和限制。尽管美国中止向严重侵犯人权的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提供武器，但伊朗、菲律宾、韩国和扎伊尔这些存在各种权力滥用和恶行的独裁政权，由于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继续从它那里获得大量武器。[12]美国国务院遭到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抵制，它们不允许政府查看档案，而仅提供量身订制的报告，以便掩盖国家恐怖主义和反暴动行动未能得到真正控制的事实。国务院本身对处理尼加拉瓜事件的方式也感到不决并争论不休。1979 年 7 月 19 日，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13]战胜国民卫队，推翻了此前一直得到美国支持的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并夺取政权。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尼加拉瓜的胜利令美国感到恐惧。美国担心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最终会在萨尔瓦多夺权。于是，卡特政府于 1979 年 10 月 15 日支持了旨在推翻萨尔瓦多卡洛斯·罗梅罗（Carlos Romero）总统的政变。该国的内战更趋激烈，由右翼组成的“死亡队”杀害了成千上万平民。

那一年发生的其他一些国际事件，导致了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的恶化。伊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日趋严重。长期以来，伊朗人民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十分反感，1953 年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导致巴列维重新掌权的政变等，促使这一反感情绪加重。1964 年，反对伊朗西化的什叶派精神领袖[14]鲁霍拉·霍梅尼[15]（Ruhollah Khomeini）宣称，美国把伊朗人民矮化到连一条美国狗都不如的地步。[16]他将美国总统斥为“人类最令人厌恶的成员”，因为他把不公正强加给穆斯林民族。霍梅尼揭露说，所有在伊朗工作的美国人，不管什么身份，从事何种工作，不管是厨师还是机械师、技术员，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即使犯法也不能被起诉。但许多“乌拉玛”（《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的解释者）却遭关押和惩罚[17]，他本人也未能幸免。1964 年 11 月 4 日，也就是发表上述讲话几天后，巴列维政府强迫他流亡国外。

1970 年，流亡中的霍梅尼揭露了美国摆布巴列维政府的行为。他指出，“外国法律强加给”伊斯兰社会是问题和困难的根源，不幸的伊朗人民在贫穷和饥饿中苟且偷生。[18]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回忆录中承认，一个十分传统的社会的快

速现代化，会带来不稳定和革命的动力。这就要求政府扩大政治参与，并为社会不满提供安全阀门。因此，在现代价值尚未逐步被人们接受的情况下，古老的宗教信仰不应被彻底铲除。[19]1961 年访问伊朗的黑格将军在回忆录中指出，当巴列维国王过着奢华生活的时候，除少数人外，几乎所有伊朗人都过着中世纪式的悲惨和无知生活。布热津斯基认为，巴列维是一个“西方式新贵”，他过着奢侈的西方式生活，尽管表面上希望成为一个“习惯于臣民俯首帖耳的传统专制者”[20]。他内心犹豫，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摆。肯尼迪认为他聪明透顶，但思想坚定。他担心巴列维倾向中立或伊朗出现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首脑会议（1961 年 6 月）上预言的崩溃。[21]国务院建议继续采取支持巴列维政权的政策，认为它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并加快向其提供 2 0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22]

以色列军事情报人员阿里·本-梅纳什（Ari Ben-Menashe）认为，巴列维对粮食生产没有兴趣，只关心军火的购买。[23]摩萨德[24]官员、以色列外交部司长戴维·金奇（David Kimche）也持相同观点。他在《最后的抉择》一书中写道，巴列维国王“对尖端武器贪得无厌”，胃口极大。1972 年，尼克松在与巴列维会面后，指示国防部提供巴列维所希望得到的任何武器（除核武器外）。[25]尼克松对巴列维能承担波斯湾安全责任感到非常高兴。在随后的五年中，伊朗向美国订购了价值 120 亿美元的最先进武器，而且仍不满足。[26]其国防开支与国内总产值的比例高于除以色列外的任何国家。1975 年前后，伊朗拥有一支包括 25 万名现役军人和 50 万名后备役人员的军队，是美国在北约以外最强大和最值得信赖的盟友。[27]霍梅尼继续揭露在伊朗尤为明显的“帝国主义邪恶影响”。他称，巴列维政府在推行被称为“白色革命”的一系列“羞耻和血腥”变革期间，一天内就用坦克和大炮杀害 15 000 人，使受奴役的农民阶级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28]他认为，“左翼和右翼帝国主义联手镇压穆斯林国家和人民”，对其进行奴役，并大肆掠夺其资金和自然资源。[29]

尽管人们对美国支持巴列维专制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上升，但由于伊朗所处的战略中心地位，卡特政府继承了尼克松的政策，不断批准向伊朗提供为其定制的武器。[30]霍梅尼称，凭借美国人支持和“所拥有的骇人武器装备”，巴列维国王把伊朗变成了一座“巨大坟墓”。工潮开始席卷全国，巴列维威胁将实行戒严并建立一个军政府。与此同时，他的“雇佣兵及其指挥官们”正在杀戮男女老少。[31]巴列维试图通过分配土地打破封建体制的“白色革命”，破坏了乡村经济赖以运转的基础设施。因为，此前大庄园主向农民提供种子、生产运输、市场和水利等，但他们在失去土地

以后就难以再这样做。结果是，1978 年的大部分粮食供应只能依靠进口，富人才能承受高昂的食品价格，中产阶级陷入了窘境。[32]

在这种情况下，自 1977 年起，已成为强大政治因素的广大群众接二连三地发起暴动。巴列维政权虽不断强化镇压手段，但由于腐败透顶，已摇摇欲坠。暴动由中产阶级发起，但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很快充当了先锋。引领占人口 90%的什叶派信徒的毛拉和阿亚图拉对有悖于穆斯林传统的西方习俗和商品（时尚、饮料、化妆品等）的不断输入感到愤懑，于是就加入到学生、商人和对现状不满的中产阶级行列中，致使德黑兰街头局势持续动荡。秘密警察“萨瓦克”（伊朗安全情报署）加紧了镇压。但抓捕行动未能遏制人们对一个腐败透顶和压迫成性的政权的普遍不满。包括顾问、专家、技术员和教员在内的 24 000 名美国人[33]在伊朗训练军人和建设工业设施，并经营着每年能带来约 200 亿美元收入的油田。

仍流亡在外的霍梅尼对已签署了《人权宪章》但罪恶累累的美国进行了揭露。他指出，在卡特看来，“巴列维的所有罪行、野蛮行径和镇压行为，是致力于确立民主、为社会问题寻求进步解决方法的努力”[34]。1978 年 12 月，中央情报局要求以色列情报机构和“萨瓦克”支持一个暗杀霍梅尼的计划，对此卡特肯定知情。这项行动拟由以色列反恐部队首领阿萨夫·海菲兹（Assaf Heftez）上校领衔的一个小组负责执行。与此同时，将军们将在伊朗实施戒严令。[35]以色列驻德黑兰大使尤里·鲁布拉尼（Urilubrani）向巴列维介绍了此计划，但他没有接受。巴列维表示，不会再批准对伊朗人的屠杀行动，因为戒严令意味着血洗德黑兰大街。[36]

1978 年 12 月 26 日，巴列维在接见苏利文大使时询问对方，美国希望他如何行事，是否让他采取铁腕手段，尽管这样做不可能恢复法律和秩序，而只会造成大规模流血。苏利文大使回答说，他是想让美国政府为他的行动承担责任。[37]此时的巴列维已筋疲力尽、情绪低落，他在与助手开会时还掉了泪。[38]以色列大使鲁布拉尼向特拉维夫报告说，巴列维已坚持不了几年。但美国大使馆却向国务院报告说，政府牢牢控制着局势。[39]苏利文大使坚持认为，“我们注定要与国王共事”。布热津斯基后来承认美国（广义）政治情报的失误。他们不知道国王已病入膏肓，对权力的渴望已不复存在，其高度个人化政治体系难以造就真正继任者。[40]

卡特之前一直保持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1977 年 12 月 31 日，他邀请巴列维共进晚餐。他在祝酒词中表示，多亏了巴列维国王，伊朗才成为“世界最麻烦地区中的一个稳定岛屿”。他还说，两国政府均认同人权事业。事实上，卡特政府内部存在尖锐分歧，政府处境艰难。一方面是他在

政府纲领中强调捍卫人权和发展民主，另一方面是伊朗专制政权不断实施的粗暴违法行为。但伊朗是美国的重要军事同盟，是西南亚和中东安全战略的“中枢国家”。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共和党人，希望保留巴列维，因为他是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和原教旨主义的屏障。尽管驻德黑兰大使苏利文反对与霍梅尼达成任何协议，并坚持认为巴列维国王是既能遏制军人，又可掌控向民主政权过渡进程的“唯一人物”，但由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掌管的国务院却采取了缓和立场。[41]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更多考虑地缘政治的影响，鉴于波斯湾石油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他主张全力支持伊朗政府，甚至包括支持军人的镇压行动。[42]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feller）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一个明确立场。[43]他的这一观点得到卡特首肯。卡特与巴列维通了电话，口头上向他表达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几天后，应卡特的要求，布热津斯基又重申了这一立场。美国希望伊朗政府变得自由，但首先必须恢复秩序，它不在乎伊朗以何种途径实现这一目的，不管是通过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还是借助军事镇压。

尽管美国正在直接卷入伊朗问题以避免政府倒台，但巴列维对卡特的真实意图持怀疑态度。他已感到身心疲惫，内心彷徨不安。当意识到自己已无力控制危机之时，他甚至考虑退位。民族阵线领导人肖布尔·巴赫蒂尔（Shahpur Bakhtiar）被邀请组建新政府。他提出的条件是，巴列维必须离开伊朗。他向美国承诺，君主制将很快被共和国所取代。[44]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于是制定了一个保卫油田的应急预案。卡特派遣罗伯特·哈伊泽（Robert Huyser）将军前往德黑兰帮助伊朗军人，以便在巴列维离开伊朗后保持军队的团结，并在出现“摊牌”[45]，即与人民发生冲突时，保证美国对他们的支持。如果巴赫蒂尔政府难以平息危机，就发动军事政变，实施“C方案”，以达到镇压暴动和恢复秩序的目的。[46]

1979年1月中旬，尚在法国的霍梅尼开始筹划建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和新秩序的模式。他宣称当时的议会为非法，并指出伊朗发生军事政变进而导致流血的可能性。[47]伊朗国内罢工浪潮不断，暴力冲突日增。由于领导广大群众的工人、中产阶级、学生和属原教旨主义的阿亚图拉们不接受这一政权，巴列维国王、巴赫蒂尔首相和武装部队即使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也难以继续维持其统治。部分军人加入了暴动者行列，另一些则按兵不动。美国并没有下令发动军事政变。尽管布热津斯基主张使用武力捍卫建立在人权和民主之上的美国利益，但卡特担心这引发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流血行动。伊朗内战会让苏联从中渔利。[48]巴列维国王身体虚弱，疾病缠身，无力制止民众暴动，被迫于1979年1月16日离开伊朗。阿亚图拉

霍梅尼从流亡地法国返回，被他视为非法的巴赫蒂尔政府无力抵抗。2月2日，在以胜利者姿态进入德黑兰之前，霍梅尼抨击了巴列维国王在乡村实行的改革。他认为，以让农民成为农业独立经营者为借口的改革，彻底破坏了所有耕作方式，摧毁了农业经济，迫使国家只能依赖于从美国和以色列进口的小麦、大米和鸡肉。他宣称：

> 我们的石油被交给美国等国。美国确实为所得石油付了钱，但是，这些钱被用来购买武器和为美国建立军事基地。换句话说，我们先把石油给它，并为它建立军事基地（……）。它则向伊朗出口我们军队没有能力使用的武器，这样，美国的军事顾问就得来伊朗使用它们。（……）人民拥有自己的军队是为了独立，而不是让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顾问来发号施令。[49]

霍梅尼在巴赫蒂尔辞职后接管了德黑兰政府。1979年4月10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作为一个中东国家，其领土位于苏联以南，嵌在波斯湾和里海之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霍梅尼将美国视为“大撒旦”。

在当时东西方对峙背景下，什叶派革命尽管未受到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影响，却具有明显的反美民族主义特征，表现出一种对美国的反感，这一反感情绪由来已久，其根源可追溯到1953年英国情报组织MI-6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针对摩萨台政府的“阿贾克斯行动”。这样，伊朗革命成为伊斯兰人民反对美国影响不断上升的第一场大运动。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破坏了伊斯兰文化、习俗和伊斯兰人民的诉求。伊朗革命启发了整个中东地区原教旨主义运动，对与西方利益紧密相连的邻国君主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当卡特批准巴列维国王到美国就医后，美国与伊朗的对抗变得更加尖锐。霍梅尼要求将巴列维引渡回国。1979年11月4日，500名愤怒的什叶派学生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使馆，要求美国交出巴列维，并归还据说被巴列维转往国外的数百亿美元财产。卡特则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并冻结伊朗在美国银行的金融资产。1979年11月11日，他在实施对伊朗石油出口禁运时宣称，“我们不能允许使用恐怖主义和绑架、扣押人质来强加政治要求”。12月27日，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莫斯科领导人采取这一行动，不仅仅出于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影响，还因为他们感觉到，世界冲突的焦点将转向中东和中亚，即伊朗和阿富汗。[50]他们担心该地区的不稳定，尤其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不稳定会影响苏联的穆斯林民众。但苏联的行

动使华盛顿倍感恐慌，美国政府担心苏联企图推进到中东产油区，而这一地区对美国和西欧的安全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冷战背景下。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提醒卡特，苏联如果占领阿富汗，就将获得肢解巴基斯坦的条件，把领土不足35万平方公里但却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巴鲁吉斯坦从其领土中分割出去。这样它就能获得通往印度洋的出口。[51]

中央情报局希望在阿富汗建立电子信号收集设施，以弥补在伊朗的损失。[52]自1978年4月17日政变后[53]，共产党就一直在该国掌权。在那次政变中，1973年上台的总理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med Daoud）被推翻并遭杀害。[54]来自普什图族的穆罕默德·塔拉基（Noor Mohammad Taraki）出任总统，人民党（激进派）的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ah Amin）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分别被任命为总理和副总理。苏联根据1978年12月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第四条对阿富汗进行干涉，其借口是人民民主党（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争斗。当时的背景是，农民和穆斯林民众不满共产党政府强行采取的激进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改变土地所有权；取消雇工以及在乡村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嫁妆；让男女共同接受教育，享受同等权利。[55]自1978年最后几个月起，阿富汗发生了多起武装暴动。1979年3月，赫拉特市发生暴动，阿富汗军队第17步兵师中的大部分官兵起义，加入了暴动行列，忠于塔拉基的部队占领城市并动用空军进行轰炸。包括苏联公民在内的5 000多人丧生。塔拉基请求苏联出兵支持喀布尔政府。勃列日涅夫虽然对阿富汗局势感到担忧，但他没有接受塔拉基的请求。阿富汗军队逃兵不断增加，甚至出现整个旅倒向叛军的情形。1979年一年中，阿富汗正规军人数从9万降至4万，有一半军官被清洗、处决或脱逃。

1979年7月3日，卡特接受布热津斯基的建议，签署了一份决定，批准中央情报局通过宣传和心理战等手段，暗中帮助阿富汗“圣战者”，让民众能收听到设立在他国的电台广播，并向反喀布尔政府行动提供支持。[56]与此同时，人民民主党和阿富汗政府内部斗争激化。1979年9月14日，阿明在逃脱一次伏击后控制了局势，加害他的塔拉基被抓，几天后被吊死在地牢，阿明执掌政权。但越来越多地卷入派别纷争的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KGB）[57]并不信任他[58]，认为他替中央情报局效命并依附于美国[59]。1979年12月27日，身着阿富汗军服的克格勃和苏联特种部队在格里高利·波雅里诺夫（Grigoriy Boyarinov）上校的指挥下，袭击了政府大楼，双方发生交火，包括格里高利在内的数十人丧生，阿明及其家人均遭杀害[60]，曾为克格勃服务的前共产党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台执

政。他指责阿明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并宣布，对他的“处决”是革命法庭的命令。同时，他要求苏联向其提供支持。于是，苏联军队越过边境进入阿富汗。[61]但他们数月后就不得不面对得到美国、巴基斯坦、沙特、伊朗和中国支持的“圣战者”。

事实上，一些苏联部队已先期空运至喀布尔。多种因素促使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其中包括赋予苏联干涉那些政权受到威胁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权利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戈尔巴乔夫认为，入侵阿富汗使得国际关系长期向好的可能不复存在，因为它导致了“新的、更加危险的冷战时期”[62]。前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布雷宁（Anatoly Dobrynin）在回忆录中表示，莫斯科并不想继续推进至中东产油区，并以此取得相对于美国的全球优势[63]，莫斯科档案中也未能找到任何能证明这一理论的可信证据[64]。令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最担忧的是，由于阿明政府的无能和伊朗发生的事件，阿富汗的不稳定可能越过边界，使苏联位于东方的各共和国受到影响。[65]苏联国防部长迪米特里·乌斯蒂诺夫（Dimitri Ustinov）认为，如果苏联不采取措施，美国未来会在它的腹部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基地，这将危及那些中亚共和国。[66]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阿明是中央情报局成员，但乌斯蒂诺夫的担忧有一定根据。和乌斯蒂诺夫怀疑美国意图并认为阿明是中央情报局成员一样，苏联入侵阿富汗也让卡特政府感到恐慌，并加重了对苏联寻求控制波斯湾和中东油区的疑虑。

伊朗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并扣押官员，再加上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使到那时为止被卡特政府以人权为由抑制的冷战重新抬头，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地位得到加强。这位政治学家已在此前组建了“三方委员会”。[67]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应该在作为苏联的组成部分、人口达 5 500 万的中亚伊斯兰共和国中鼓励“一个更加不同的政治意识”作为遏制因素，阻止共产主义对伊斯兰人民的同化。[68]他认为，阻挡苏联扩张的“最强大屏障”是这些国家不愿被北方强大邻居统治的政治和宗教愿望。“美国所采取的任何政策都难以取代这一愿望。”[69]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立即对其采取了各种经济制裁。他在 1980 年 1 月 21 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受苏联军队威胁的地区具有“很大的战略重要性”，因为它拥有超过世界可出口石油的 2/3，而苏联控制阿富汗将使其军队进入到离印度洋 300 英里的范围内，并接近世界大部分油轮必经的霍尔木兹海峡。卡特宣称，“苏联正企图巩固其战略地位，因而对中东石油的自由运输构成严重威胁”。他还表示：

> 一个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会被认为是对美国核心利益的攻击，这一攻击将会受到美国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的反击。[70]

随着西方工业国家开始进口越来越多的能源，中东对它们来说变得至关重要。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亚洲南沿（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个对美国人来说显得遥远和陌生的地方，却是“世界安全的中枢”[71]。而在中东和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和石油问题交织在一起。卡特试图让所有国家明白，美国将自己在波斯湾的利益视为至高无上，如有必要，会不惜动用武力予以捍卫。按照这一方针，国防部竭力与肯尼亚、索马里、阿曼、埃及和巴基斯坦订立新的军事协议。同时，它加强了位于印度洋英属岛屿迪戈加西亚的海军基地。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在佛罗里达州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建立了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便于向美国没有常驻军队的西南亚和中东地区派兵。1979 年，卡特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针，目的是在紧急调动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时，能够使用索马里、阿曼和肯尼亚的空军和海军设施。美国在中东其他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不多，主要是因为阿拉伯半岛国家不希望与华盛顿进行公开和直接的联系。[72]卡特政府所宣布的方针意在遏制苏联日益增长的影响，恢复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自柏林问题协议（1973 年）和越战失败以来，美国在这一已成为冷战主要舞台地区的地位每况愈下。自 1974 年起，左翼组织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埃塞俄比亚、南也门、南越、老挝、柬埔寨、罗得西亚、阿富汗和尼加拉瓜取得了政权。古巴正向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等陷入内战的非洲国家派遣部队。[73]苏丹、索马里和埃及等国发生了未遂政变；利比亚与苏联接近；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卡特仍以模棱两可方式支持的巴列维国王政权；格瓦拉 60 年代领导过游击战的扎伊尔[74]出现了分裂企图；黎巴嫩自 1975 年各宗教派别爆发战争以来一直战火纷飞，战斗是在基督教徒制造的致使数十名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穆斯林丧生的谋杀行动后爆发的，叙利亚和以色列卷入了这一行动。这些事件促使主张把政治军事化并希望推动军备竞赛的超保守主义和沙文主义趋势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经济则面临严重困难，通胀率接近 20%，失业伴随着经济衰退不断增加，美国国际威望下降。对于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激进的阶层即新保守主义者来说，“缓和”一词意味着接受共产党人占领世界大片地区。这些比国际主义者更加好战的人们反对美国的多边政策，主张中止向联合国支付会费。他们开始在共和党中占据主导，并散布卡特不愿抵制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

苏联所发动的针对美国利益的“大胆袭击”的传言。[75]

毫无疑问，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以及卡特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于1980年1月4日采取的制裁，使东西方关系更趋紧张。在美国政府内部，布热津斯基建立了地缘战略体系和概念，其中包括苏联威胁美国利益“核心圈”的理论。这一“核心圈”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东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起，包括伊朗和中东其他国家，一直延伸到博斯普鲁斯海峡。[76]他认为，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势力日益上升造成的现实，需要美国对防御战略进行定义。[77]从巴基斯坦到埃塞俄比亚的“危机弧形带”环绕蕴藏石油的中东各国，这里是美国国际政策、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需求和大财团利益交汇的地区。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有必要勾勒出“一个地区安全构架”，在阿曼、索马里和肯尼亚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将其势力实实在在注入这一已成为“危机弧形带”的地区。[78]这样，他几乎总是与国务院意见相左，使卡特的对外政策变得强硬，并加紧实施“隐蔽行动”计划，以全然不同于以往历任政府的强度和决心，通过向苏联境内偷运宣传材料，开展意识形态的战争。[79]

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M. Gates）在回忆录中称，卡特通过人权政策成为第一位在苏联人民注视下公开、坚定挑战该国政府合法性的美国总统。[80]尼克松执政期间曾在白宫效力并与共和党有联系的黑格将军承认，卡特毫无疑问是“自威尔逊以来美国所见过的道德上最坚定的总统”，他的理想使他面临政治困难。[81]然而，卡特依然批准了尽管不属致命性质的“隐蔽行动”，以便遏制苏联和（或）古巴在格林纳达、牙买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也门和阿富汗的影响。[82]在这一背景下，布热津斯基有意通过鼓动苏联东南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开辟冷战的第三条战线，以便形成一个“绿色地带”[83]，即建立一系列伊斯兰政府，以遏制“邪恶红魔”，即没有宗教信仰的共产党人的推进，阻断他们前往波斯湾水域和中东油田的道路。很可能正因为如此，卡特决定容忍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霍梅尼政权，尽管它公然反对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

布热津斯基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仅是阻止共产主义影响扩张到波斯湾、非洲和印度洋地区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而且还能在苏联中亚共和国挑起对莫斯科政府的不满。他在《竞赛方案》一书中指出，劝说苏联不朝南方前进的最好方法存在于其本国境内，那里有5 500万穆斯林，他们仅仅是表面上被征服或者说“被苏维埃化”[84]。布热津斯基认为，他们在十多年中始终抵抗莫斯科的统治，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而且，有相当多证据表明，人们的不满依然存在。[85]他表示，“莫斯科控制苏联在中

亚地区面临的严峻宗教和种族挑战的潜在动力就在于此”。他强调，这一事实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尚未利用的机会。[86]鉴于这一结论，中央情报局大力向苏联渗透有关伊斯兰历史和文化的文学著作，以便使少数民族遗产得以保存。[87]斯大林建立的政权不仅实行暴政，而且还采取让“大俄罗斯”主宰其他民族的做法。

布热津斯基设计这一战略的灵感来自《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其作者法国政治学家埃莱娜·唐科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在书中预见了苏联的解体，导火索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车臣等亚洲共和国的伊斯兰民众发生暴动。她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苏联内部依然存在的宗教意识是一个社会文化现实，尤其在其“边缘的穆斯林地区”[88]，那里有五千多万人信奉伊斯兰教，并保持着自己的特性。他们紧紧抓住自己的信仰和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对莫斯科的权力和统治采取抵制态度。[89]唐科斯认为，苏联领导人也意识到了伊斯兰教及其领袖的力量，知道他们能够利用历史传统和民族感情。[90]她称，“（……）穆斯林社会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群体，不同于苏联的其余部分”。她解释说，尽管苏联在各个层次进行教化，极力确立苏联社会的共同特征，而不是内部存在的差异，但穆斯林自身的社会文化同质性仍得以保持。[91]“伊斯兰同质性”它不仅在塔吉克斯坦确立，在乌兹别克斯坦也不例外。它不仅表现在城市，也同样存在于农村。这给莫斯科造成了困难，尽管它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试图建立“苏维埃同质性”[92]。苏联的脆弱就在于此，最糟糕的是，苏联与伊斯兰世界有2 500公里的共同边界，而伊斯兰国家自1977年以来情况不断恶化。[93]因此，在伊朗出现的伊斯兰共和国只能让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感到不安。随着巴列维国王政权的垮台，美国失去了一个盟友，但这一战略削弱得到的补偿是，莫斯科也将面临付出更高代价的风险：苏联本国境内的穆斯林民族主义情绪受到鼓舞，以及在该地区一个团结的伊斯兰群体的形成。中国能够对这些群体施加影响。[94]

这一结论促使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卡特主义。根据卡特主义，美国应该：（1）在要害国家，尤其是巴基斯坦和伊朗支持反苏行动，并与中国合作，改善巴基斯坦的安全；（2）提高美国随时反击任何来自苏联攻击的能力；（3）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向“圣战者”提供资金和包括防空导弹在内的现代化武器和弹药，并向苏联表明恢复阿富汗真正中立和自决的愿望；（4）鼓励印度为解决阿富汗问题进行外交努力，并促使其缓和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5）鼓励苏联的穆斯林拥有不同政治意识，以便让苏联放弃同化伊斯兰人民的任何企图。[95]布热津斯基清楚，在阿富汗发动的针

对苏联军队的“圣战”、伊朗的原教旨主义革命、对阿富汗“圣战者”强有力的支持，以及齐亚·哈克将军[96]在巴基斯坦推行的伊斯兰法，反映了一个独特现象，那就是广泛唤起一个基于种族和宗教信仰的更多自我认同倾向。他认为，莫斯科领导人可能有向该地区推进的意图，只有在确信波斯湾的动荡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苏联本国后，它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97]

布热津斯基认为，尽管霍梅尼政府对美国持公然敌视态度，但美国应该与其重新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避免莫斯科从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中渔利，并乘机进入中东，从侧面包抄波斯湾。[98]1978 年 9 月 5—17 日，为推动该地区的和平进程，卡特与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99]（Anwar Sadat）、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在戴维营（马里兰州）进行会晤。经过 13 天的紧张谈判，他取得了巨大成功，促使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双方的主要分歧得到解决。1979 年 3 月 26 日，两国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以色列向埃及归还 1967 年占领的西奈半岛，拆除在那里建立的以色列定居点，埃及则正式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双方谈判也包括就定居在西岸（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众的自治问题。卡特要求贝京不允许在那些地区建立更多犹太定居点。他采取了与基辛格 1974 年相同的做法，即让以色列让步，同时又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包括资金和技术转让。作为回报，埃及成为首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100]，它还驱逐了苏联顾问，并开始每年从美国获得 22 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色列从美国获得 30 亿美元，用以建设一个新机场，以取代位于西奈的机场。1980 财政年度中，以色列还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从此，美国把自 1949 年以来一直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额提高了四倍。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是促使它采取这一做法的最主要原因。

同时，按照布热津斯基的方针，中央情报局还动员 10 万名来自非洲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圣战者”和其他人员前往阿富汗。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推翻喀布尔的共产党政府，而且还着眼于借助由穆斯林人口组成的苏联东方共和国，造成其中亚地区的不稳定。[101]曾在白宫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透露，“六个月前开始的‘隐蔽行动’的资金为 500 多万美元，不到一年，就突破 1 000 万美元，而且肯定还包括提供武器”[102]。执行这一行动得到巴基斯坦和沙特情报机构的协助，一些资金甚至来自毒品交易。该行动负责人在伊斯兰国家纠集了成千上万游手好闲之徒，他们在中央情报局设于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省的特别营地接受训练，沙特和波斯湾其他富国与美国一起，共同慷慨地为阿富汗“圣战”[103]提供资金

支持。[104]

由齐亚·哈克将军统治的巴基斯坦有效控制着由“圣战者”艾哈迈德·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和古勒卜丁·希克马蒂尔（Gulbuddin Hekmatyar）统领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他已能组织这些人前往参与“圣战”。[105]沙特富翁奥萨玛·本·拉登（Usamah Bin-Ladin）是招募的组织者之一，他被批准召集10 000名穆斯林去抗击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队。结合种族、宗教和政治层面，这些人中包括反西方和反美人士，以及游击战、破坏和“隐蔽行动”方面的专家。本·拉登是沙特建筑业大亨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拉登（Muhammad Bin-'Awad Bin-Ladin）[106]所生的54个孩子之一。他是“瓦哈比”穆斯林，认为所有在伊斯兰历3世纪，即公元4世纪后对伊斯兰教义所作的改变或附加均不合法。[107]1979年12月，他的导师费萨尔·萨乌德（Turki ibn Faisal as-Sa'ud）（1977年至2001年8月任沙特情报局长）让他负责中央情报局“隐蔽行动”的资金运作。当时，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的投入为300万美元。本·拉登就这样投入到抵抗苏联军队的运动中。他认为支持伊斯兰世界是他应尽的义务。1984—1985年间，他与巴勒斯坦人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建立了“圣战服务中心”，来自也门、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埃及和苏丹等多个国家的穆斯林参与其中。由来自北非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游手好闲之徒组成的约10万名“自由战士”被组织起来接受训练，以便去抗击没有宗教信仰的苏联人。这些行动计划由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沙特的情报机构共同制定，资金来自在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称为“金新月”的山区的鸦片交易。每个家庭或村落中，只要有一个不务正业者，他就会成为兴都库什山脉的“圣战者”。他们在抗击苏联军队的战斗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然后从石油和毒品资金中得到回报。[108]据估计，“圣战者”得到来自美国、沙特和其他伊斯兰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的约100亿美元的资金。[109]

来自占阿富汗人口多数的普什图族[110]（占总人口的40%）的塔利班成员[111]被引诱到一个巴基斯坦“麦德莱赛”（伊斯兰神学院）网络中，这些神学院是由伊斯兰极端主义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建立的。该党的宗旨是，在阿富汗建立一个以更激进和更极端的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政权，根据基于对该教德奥班德学派思想的理解，除伊斯兰教外，他们不认同任何其他东西。德奥班德学派属哈纳斐教派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其思想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纳诺塔维（Muhammad Qasim Nanautawi，1833—1877）和拉希德·纳诺塔维（Rashid Nanautawi），他们创立了穆斯林这一

派别的首个“麦德莱赛”，它位于新德里附近的德奥班德。[112]他们的弟子把德奥班德“麦德莱赛”推广到了整个印度和阿富汗。1967 年，在整个南亚共有约 9 000 所这类“麦德莱赛”。[113]1990 年年初，仅在巴基斯坦就有 4 000 所，尤其是在与阿富汗交界地区。那里的难民营中生活着 200 多万难民，难民的孩子和巴基斯坦富裕家庭的孩子一起在“麦德莱赛”就学。[114]

与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头目哈米德·古尔（Hamid Gul）和沙特情报机构负责人图尔基·费萨尔（Turki al-Feisal）亲王有联系的本·拉登是为这些“麦德莱赛”招募极端分子的组织者之一。哈卡尼是其中最大一所“麦德莱赛”，在那里只教授《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按杰弗里·戈德博格（Jeffery Goldberg）的说法，它是一个“圣战者工厂”。[115]在中央情报局特别营地进行训练的这些人，与其说属于宗教团体，还不如说是土匪团伙成员。中央情报局在沙特协助下，每年投入约 5 亿美元，用于训练和武装这些贫穷的“圣战”游击战士，使其成为“自由战士”。中央情报局还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高技术武器，包括“毒刺”防空导弹，以及用来建立训练营、军火库和基地所需的各种物资。[116]此外，还向那里派遣了美国军事专家和游击战顾问。

美国急于控制能源和起始于里海湾的输油管走廊。正是由于美国的地缘战略目的，中央情报局才鼓动“圣战”，并操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了瓦解苏联，中央情报局加强了在中亚和高加索共和国以及巴尔干地区的行动。19 世纪发生的列强争夺中亚控制权的“大游戏”重新上演，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执政期间得到延续。在 1985 年一年中，中央情报局向阿富汗提供了大量重型机枪、SA-7 和“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及厄利空高射炮，这些武器致使越来越多的苏联人丧生。1982—1992 年间，来自中东、东非、北非、中亚和远东 43 个伊斯兰国家的约 35 000 名激进分子加入了阿富汗“圣战者”行列。曾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罗伯特·盖茨证实，“他们来自叙利亚、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大多数人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圣战’组织一起战斗，尤其是由阿卜杜尔·萨亚夫（Abdul Rasul Sayaf）领导的组织”。他表示，中央情报局曾试图建立一个“国际旅”。[117]成千上万来自外国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在齐亚·哈克军政府设立的数百所“麦德莱赛”学习，它们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超过 10 万名激进穆斯林接受了“圣战”影响。[118]布热津斯基后来承认，这一行动是一个“好主意”。[119]他证实，苏联军队 1979 年 12 月越过边界前，中央情报局就已进入阿富汗，动员和武装了“圣战者”。他回忆说，这一事实发生之时，他曾给卡特写信称：“我们现在有机会让苏

联陷入它的‘越战’。”[120]但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亚问题专家塞利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曾警告说，美国在豢养“一个恶魔”。一名美国官员反驳说：“如果说这些人狂热，那么，他们就会更疯狂地去与苏联人战斗。”[121]哈里森所言得到了应验，恶魔已被养大。数年后，由“圣战者”训练的原教旨主义者出现在中东和纽约等世界其他地区。罗伯特·盖茨承认，他们“仍在进行‘圣战’”[122]。

【注解】

[1] Nevins & Commager，1986，p. 657.

[2] Our Nation's Past and Future. Jimmy Carter's speech in accepting the Democratic Party's nomination—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meeting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in New York City on July 15，1976.

[3] Inaugural Address of President Jimmy Carter. January 20，1977.

[4] Black，1986，p. 135.

[5] 1977年，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年度《人权报告》提到，尽管巴西盖泽尔政府逐步地改善专制统治并重新确立民主，但违反人权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巴西因此废止了与美国的军事协议，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6] 安德鲁·杨曾任马丁·路德·金的助手。他被卡特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7] Apud Drago，1993. p. 35.

[8] 美国与巴拿马还签署了一个条约，通过该条约巴拿马批准美国在2000年后负责对运河的防务。许多美国人强烈反对这两个条约，他们认为运河应归美国所有。但参议院批准了该条约。

[9] 1903年，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开支持下，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不久，就与美国签署了一个条约，该条约给予美国建造、运营和防卫巴拿马运河的“永久”权利。同时，还将一块被称为“运河区”的巴拿马领土转让给美国。1964年，当地居民与美国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约翰逊决定重新谈判原条约内容。但不管是他还是尼克松和福特都没有推进谈判。转让“运河区”控制权的想法伤害了美国人的自尊，他们认为巴拿马运河属美国财产，是美国领土的组成部分。

[10] Dobrynin，1995，p. 412.

[11] Haig，1984，p. 197.

[12] Higgs (ed.)，1990，p. 149.

[13] 该组织起名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是为了纪念1927—1932年抵抗美国占领运动领导人奥古斯托·桑地诺（Augusto César Sandino）。

[14] 什叶派代表人物除先知外就是他的女婿阿里。法蒂玛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独生女。被穆罕默德指定为继承人的阿里是第四任哈里发，是最初皈依伊斯兰教的信徒中最后一位被推举为哈里发者。他被迫为那些自认为属于自己的权利而战斗并最终被杀害。其头颅可能保存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喀拉拉。什叶派尽管只占穆斯林人口的

25%～30%，但在伊拉克和伊朗属多数派。而约占穆斯林人口 70%的逊尼派不相信先知指定了一位继承人，他们把头几位哈里发的当选视为一个纯粹的推选程序。虽然伊斯兰教各种派别规定的义务和圣地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实质上没有根本区别，都遵照《古兰经》教义。

[15] Os xiitas têm como referência histórica maior, após o profeta, o imã Ali ibn Abi Talib, genro do porfeta, marido de Fátima, sua filha única. Segundo eles, foi Alique Muhammad indicou como herdeiro. Ele foi o quarto califa e o último eleito dentre os primeiros convertidos ao Islã. Mas teve de lutar pelo que considerava seus diretitos e acabou assassinado. Sua cabeça estaria preservada em Kerala, cidade santa dos xiitas, situa da no Iraque. Os xiitas são maioria no Iraque e no Irã, embora representem apenas 25%—30% dos muçulmanos. Os sunitas, que constituem cerca de 70%dos muçulmanos, não creem que o profeta tivesse designado herdeiro, etrataram a escolha dos primeiros califas como um processo puramente eletivo. Mas, na essência, não existem diferençac fundamentais entre as duas correntes do islamismo, que obedecem aos ensinamentos do Qu'ran, porém possuem obrigações, assim como locais de peregrinações , parcialmente diferentes.

[16] 1964 年 10 月 27 日在库姆的寓所前发表的讲话。Khomeini, 1981, pp. 181-188.

[17] Id., ibid., pp. 181-188.

[18] *Ayatollah Khomeini, lectures delivered to students of religion in Najaf, Iraq, January-February, advoc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Islamic political principles in Iran*, in Hunt, 1996, pp. 394-395.

[19] Brzezinski, 1983, p. 397.

[20] Id., ibid., pp. 360-361.

[21] Haig, 1992, p. 85.

[22] Id., ibid., p. 86.

[23] Bem-Manashe, 1992, p. 30.

[24] 情报和特殊使命局。

[25] Kimche, 1991, p. 192.

[26] Id., ibid., p. 192.

[27] Id., ibid., p. 192.

[28] "Message to the Pilgrims", in Khomeini, 1981, pp. 195-199.

[29] "Message to the Muslim Students in North America", id., ibid., pp. 209-211.

[30] Brzezinski, 1983, p. 357.

[31] "Message to the Pilgrims", 27/09/1978;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Martyrs of Theran", 11/10/1978, in Khomeini, 1981, pp. 237-238, 239-241.

[32] Ben-Menasche, 1992, p. 30.

[33] Kimche，1991，p. 192.

[34] *Ayatollah Khomeini，statement delivered from exile in Najaf，Iraq，19 February 1978，supporting anti-shah demonstrations and attacking American policy；Ayatollah Khomeini，declaration issued from exile in Paris，11 October 1978，praising the waves of anti-shah demonstrations in Iran.* Khomeini，1981，pp. 212－213，239－241.

[35] Ben-Menasche，1992，pp. 40－41.

[36] Id.，ibid.，pp. 40－41.

[37] Brzezinski，1983，p. 375.

[38] Sick，1991，p. 63.

[39] Id.，ibid.，p. 63.

[40] Brzezinski，1983，p. 397.

[41] Id.，ibid.，p. 359.

[42] Id.，ibid.，pp. 354－355.

[43] Id.，ibid.，p. 363.

[44] Haig，1992，p. 537.

[45] Brzezinski，1983，pp. 377－378.

[46] Id.，ibid.，pp. 382－388.

[47] "Format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12/1/1979；"The Fortieth Day after 'Ashura'"，15/1/1979，in Khomeini，1981，pp. 247－251.

[48] Brzezinski，1983 pp. 396－397.

[49] "Adress at Bihisht-I Zahra"，*Ayatollah Khomeini，speech delivered at the cemetery outside Tehran，2 February 1979，indicating the shah's legacy and calling for overthrow of Bahktiar government.* Khomeini，1981，pp. 254－260.

[50] Carrère D'Encausse，1978，p. 344.

[51] Brzezinski，1983，p. 427.

[52] Gates，1997，p. 132.

[53] 任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长达24年的多布雷宁认为，即使有克格勃参与，这一事件也并不明显。Dobrynin，1995，p. 440.

[54] 1973年，穆罕默德·达乌德推翻了查希尔·沙阿国王的统治，成立了阿富汗共和国。他可能得到克格勃的支持。1978年达乌德下台后，共产党人将国名改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55] 1980年左右，学生中的一半是女性。妇女占医生总数的40%、教师的70%和文职官员的30%。

[56] Gates，1997，p. 146.

[57] KGB为Komitet Gosudarstvennoy Bezopasnosti的缩写，意为国家安全委员会。

[58] Dobrynin，1995，p. 441.

[59] 阿明曾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60] Andrew & Gordievsky，1990，pp. 575－576.

[61] 关于依据莫斯科的文献对喀布尔所发生事件的描述，参阅 Volkogonov，1999，pp. 193－1202。Dobrynin，1995，pp. 440－442. Andrew & Gordievsky，1990，pp. 465，573－577. Sudoplatov & Sudoplatov，1995，p. 415.

[62] Gorbachev，2000，p. 177.

[63] Dobrynin，1995，pp. 446－447.

[64] Id.，ibid.，p. 446.

[65] Id.，ibid.，p. 446.

[66] Id.，ibid.，p. 446.

[67] 布热津斯基生于波兰。1970 年，他应戴维·洛克菲勒的请求开始组织“三方委员会”。该组织包括西欧、日本和美国的代表。他认为基辛格所理解的权力平衡概念已经过时，应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从经济上把日本、西欧和美国这三个应当承担国际体系责任的工业化民主国家联系在一起。布热津斯基是“三方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卡特也是该委员会成员。Robertson，1991，p. 102.

[68] Brzezinski，1986，p. 222.

[69] Id.，ibid.，p. 222.

[70] Jimmy Carter—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1980. January 21，1980.

[71] Kissinger，1982，p. 677.

[72] Brzezinski，1986，p. 174.

[73] 1974 年，马里亚姆·黑尔·门格斯图（Mengistu Haile Mariam）上校推翻了黑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的统治，面对厄立特里亚的分裂，他向苏联求助。古巴派遣了部队。

[74] 扎伊尔后更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75] Haig，1984，pp. 26－27.

[76] Brzezinski，1983，pp. 443－446. Dobrynin，1995，pp. 420－422.

[77] Id.，ibid.，pp. 454－455.

[78] Id.，ibid.，pp. 446－447.

[79] Gates，1997，pp. 94－95.

[80] Id.，ibid.，p. 95.

[81] Haig，1992，p. 532.

[82] Gates，1997，p. 178.

[83] 绿色是伊斯兰旗帜的象征色。

[84] Brzezinski，1986，p. 226.

[85] Id.，ibid.，p. 226.

[86] Id.，ibid.，p. 226.

[87] Gates，1997，p. 177.

[88] Carrère D'Encausse，1978，p. 282.

[89] Id.，ibid.，pp. 283-289.

[90] Id.，ibid.，p. 304.

[91] Id.，ibid.，pp. 327-328.

[92] Id.，ibid.，p. 329.

[93] Id.，ibid.，p. 343.

[94] Id.，ibid.，p. 349.

[95] Id.，ibid.，pp. 222-224.

[96] 为了维持巴基斯坦独立后出现的三个军事独裁政府中最长的一个政权，齐亚·哈克将军将伊斯兰教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并决定根据伊斯兰教法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关于这一主题，参阅 Kepel，2000，pp. 94-100。

[97] Carrère D'Encausse，1978，pp. 226-227.

[98] Id.，ibid.，pp. 223-226.

[99] 萨达特采取了重启和平进程行动。1977 年 11 月，他成为首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政府首脑，此举默认了以色列存在的权利。

[100] 根据 1994 年和平协议，约旦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第二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国家。

[101] Leberty，Stephan & Thomma，Norbert. "Da sind Spuren wie von einer trampelnden Elefantenherde Der erste Verdacht kam ihm，da saß er im Bundestag. Geheimdienste wurden sein Thema. Andreas von Bülow traut ihnen Schlimmstes zu：eine Verwicklung in die New Yorker Anschläge". Der Tagesspiegel—Sonntag，Berlim，13/1/2002，Seit S1.

[102] Gates，1997，pp. 146-147. Johnson，2001，p. xv.

[103] *Jihad* —词来自阿拉伯语词根 *Jahada*，意为"战斗"、"努力"。实质上它的意思是穆斯林为了完善自我并帮助教派而进行的一场内部斗争，但在某种情况下也允许对不公正政府发动战争和暴动，不管是否为穆斯林政府。

[104] Kepel，2000，pp. 136-138.

[105] Rashid，2001，p. 85.

[106] 他于 1931 年成立了沙特本·拉登集团（SBG）。他还组建了一家瑞士投资公司（Saudi Investment Company），该公司设立了沙特国家商业银行的分行。SBG 在 General Electric、Nortel Networks 和 Cadbury Schweppes 等公司中拥有相当股份。SBG 在美国的代表为阿德南·哈肖吉，其金融活动由凯雷集团经营。前总统老布什曾在凯雷集团任职。Meyssan，2002，p. 110.

[107] 阿卜杜尔·瓦哈比（Abdul Wahab，1703—1792）发动了"清除"贝督因人从事伊斯兰教活动的运动。这样，痛斥奢侈和炫耀的"瓦哈比"教义在沙漠里的阿拉伯人中发展起来，并成为沙特的官方宗教，尽管激进的穆斯林指责沙特王室违背其教义。

[108] Rashid，2001，pp. 18-19.

[109] Id.，ibid.，p. 18.

[110] 塔利班中为寻求毛拉所传授知识的伊斯兰学生。

[111] Rashid，2001，pp. 1-2.

[112] “麦德莱赛”（Madrasah）最初由萨拉丁·阿尤布（Salah al-Din el-Ayyoubi，1138—1193）苏丹引入埃及，用来消灭非正统伊斯兰教派。1171 年，萨拉丁在法蒂玛（Fatimid）哈里发死后控制了埃及。十字军进攻埃及时，放火焚烧了开罗城。萨拉丁在城内修筑工事进行抵抗。他凭借自己的谦卑、勇敢以及管理和军事才能，战胜了基督教军队，进而成为伊斯兰的大英雄。萨拉丁王朝持续 24 年，他在开罗度过了大部分时间。除了修建医院和基础设施，他还建立了“麦德莱赛”——土耳其塞尔柱人建立的一种机构。他增加了马穆鲁克（阿拉伯语意为“有钱人”）的人数，还将男孩都降为奴隶，让他们接受军事和伊斯兰教育，以便日后从事军队和管理方面的工作。马穆鲁克是年轻的土耳其或库尔德奴隶，由各自的所有者在棚子里对其进行培养，接受严格的宗教和军事教育。他们成年后就被释放，每人会得到一匹马和一种武器。他们会终生效忠于原先的主人埃米尔（首领）。阿尤布王朝招募的马穆鲁克篡夺了权力，并将权力保持 300 年之久，直到 1517 年奥斯曼人攻占埃及。这一苏丹国由沙拉特·杜尔（Shajrat al-Durr）（珍珠树）创立。她是阿尤布苏丹之妻，死于癌症和肺结核。其子杜兰·沙赫（Turan Shah）被一群忠于拜伯尔斯（Baybar）的马穆鲁克杀害。她于 1249—1250 年统治埃及，是整个伊斯兰历史上唯一拥有苏丹王位的女性，也是自克娄巴特拉女王以后埃及唯一的一位苏丹女王。

[113] Rashid，2001，pp. 87-91.

[114] 2001 年前后，所有麦德莱赛共拥有约 100 万名学生。

[115] Goldberg，Jeffrey. “Inside jihad university—The Education of a Holy Warrior”，http://www.jammu-kashmir-facts.com/inside_jihad_university1.htm.

[116] McFarlane，1994，p. 69. 1983—1997 年，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训练了约 83 000 名“圣战者”。

[117] Gates，1997，p. 349.

[118] Rashid，2001，p. 130.

[119] “Les Révelations d'un Ancien Conseiller de Carter：‘Oui，la CIA est Entrée en Afghanistan avant les Russes...’”，*Le Nouvele Observateur*，Paris，15-21/1/1998. Apud，Johnson，2000，p. XV.

[120] Ibid.，p. XV.

[121] Ahmed，2002，p. 34.

[122] Gates，1997，p. 349.

第二十二章

美国人质危机持续　灾难性“鹰爪行动”　与伊朗秘密谈判　美国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　里根和老布什搭档及其对卡特营救人质谈判的破坏　《十月惊奇》——卡特的失败　里根与黎巴嫩危机　通过以色列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

与伊朗的僵局依然持续，为使遭伊朗民兵扣压的52名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官员（其中很多是中央情报局成员）获释而展开的外交努力未能奏效。1980年，卡特批准中央情报局推进以营救人质为目的的“鹰爪行动”。该行动起初定名为“饭碗行动”或“沙漠风暴”。共有8架USMC RH-53直升机、12架运输机参与这一行动。许多部队被从巴基斯坦湾运往德黑兰附近的某一地点，并在那里过夜，以便翌日清晨执行营救行动。这一行动要求直升机在塔巴斯附近的伊朗沙漠（一号沙漠）加油。但有几架直升机出现了机械故障，其中一架在加油时与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相撞爆炸，5名空军官兵和3名海军陆战队员丧生，多人受伤。“鹰爪行动”失败被视为一场巨大灾难。对卡特政策不满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以及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约翰·辛格劳伯（John Singlaub）将军和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上校等人可能参与了破坏。因为，卡特试图阻止中央情报局人员从事暗杀和其他犯罪阴谋[1]，辛格劳伯将军则因反对减少在韩国的驻军而愤然退役[2]。

卡特在没有排除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可能的同时，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寻求与伊朗政府就释放人质达成协议，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巴列维政府在美国银行120亿美元存款的冻结。在伊朗人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后，美国做出了冻结这些存款的决定。谈判由助理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夫（Warren Christopher）通过德国中间人进行[3]，中间人包括德国外长迪特

里希·根舍[4]（Hans-Dietrich Gensher）、赛勒斯（Cyrus）、詹姆希德（Jamshid）和哈什米（Hashemi）兄弟[5]。据说哈什米兄弟是伊斯兰要人哈什米·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的表兄弟，与伊朗高层有联系。但霍梅尼政府除要求解除对存款的冻结外，还提出必须解除对伊斯兰革命前伊朗订购且已付款的武器的禁运。它急需这些军火去对付伊拉克的入侵。伊拉克六个师于1980年9月22日对伊朗发动进攻，其米格-23和米格-21战机在同一时间攻击了伊朗位于梅赫拉巴德和多申—塔篷（两地均位于德黑兰附近）的空军基地和大不里士、巴赫塔兰、阿赫瓦兹、迪兹富勒、乌尔米亚、哈马丹、萨纳达基和阿巴丹等城市。来自什叶派[6]对立面逊尼派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挑起了这一冲突，其理由是伊朗在阿拉伯河的非法存在。所谓阿拉伯河是一个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汇合而成的河槽。萨达姆的目的是占据位于波斯湾上方伊朗东南部拥有丰富石油储量的胡齐斯坦。[7]

众所周知，萨达姆于1979年与美方人员在安曼（约旦）进行了秘密会晤后，才采取了入侵伊朗的行动。他请求美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并向美方承诺三周内攻入德黑兰。他指望挑起当地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而导致霍梅尼政府倒台。布热津斯基怂恿了萨达姆的侵略行动，因为，美国不希望伊朗在巴列维垮台后继续控制拥有丰富石油储量的阿拉伯河。[8]这场战争的起因不仅仅是边界纠纷，还是意识形态和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9]，也就是萨达姆的逊尼派政府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朗革命所代表的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对立。自伊斯梅尔（Ismail，1502—1524）国王16世纪建立萨非王朝起，什叶派教义就成为伊朗的官方宗教。[10]

伊朗对波斯湾伊拉克油船实施的袭击使科威特感到恐慌，于是它就请求英国保护。由于英国没有答应，它转而求助苏联。苏联接受了请求。但美国警告苏联不要涉足波斯湾，并宣布科威特油轮可悬挂美国国旗，美国将为其提供海上保护。华盛顿采取的立场实际上意味着它不再奉行中立政策，转而支持伊拉克。美国向伊拉克提供的由中央情报局借助卫星获得的关于伊朗部队集结的情报，使伊拉克免遭伊朗对其薄弱点的攻击。这一攻击如成为事实，伊朗部队就能突破伊拉克的防线。面对这一灾难性前景，中央情报局委婉地将这一信息告知了萨达姆，使其及时调集部队而躲过一劫。以色列外交部司长、摩萨德成员戴维·金奇透露说，“这一并非唯一的行动，充分显示得到国务院强有力支持的五角大楼在两伊战争进程中的倾向性”。他进一步指出：

> 这一偏袒态度自战争之初就显而易见。尽管伊拉克的行为明显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但美国并未对其予以谴责。对以色列小规模侵犯边界行为总是立即予以谴责的联合国安理会也未做出反应。[11]

美国向海湾派遣军舰保护科威特和其他国家船只的决定表明其中立的结束。它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对该地区石油的需要，也因为五角大楼有意偏袒伊拉克，它是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性地区[12]中唯一能与伊朗抗衡的中等规模军事强国。但卡特准备解除对伊朗的武器冻结，包括伊朗订购且已付款的七个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13]他还将解除对伊朗在美国银行存款的冻结。[14]此举是为了满足霍梅尼政府的要求，作为释放人质的交换条件。但他没有表示会批准通过以色列向伊朗出售更多武器的意愿。1980 年 4 月，以色列总理贝京曾向他作此提议。[15]由于萨达姆极力希望掌握核技术，以色列因而把伊拉克视为对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它谨慎地通过军界恢复了与伊朗的接触。1980 年 4 月，以色列为伊朗的 F-4 战机提供了轮胎。[16]

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依靠迈尔斯·柯普兰（Miles Copeland）等对卡特政策不满官员的配合，在政府机构，特别是在中央情报局内建立了庞大而先进的情报搜集网络。1977 年，卡特把从事包括操纵各种选举在内的“隐蔽行动”人员从1 200人减至 400 人。[17]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George Bush）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而里根竞选班子负责人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18]为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是一名间谍大师。二战期间，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他在德国防线后方领导秘密行动。两人均在中央情报局拥有巨大影响力。中央情报局大部分人都极力希望共和党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19]在里根和布什竞选班子工作的约 120 名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助理拥有在五角大楼和情报部门工作的背景。[20]在通过内部情报得知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夫与霍梅尼代表萨德赫·塔巴塔贝（Sadegh Tabatabai）就释放人质问题在波恩秘密会晤后，里根竞选班子战略家理查德·沃斯林（Richard B. Wirthlin）及其助手理查德·比尔（Richard Beal）通过“政治情报系统”这一高级电脑程序，进行了民意调查和测验，结果显示，假如人质在 11 月 4 日大选前获释，卡特将稳操胜券。

里根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老布什所指的“惊奇十月”即将来临。里根对外政策顾问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称，与伊朗一名使者达成协议促使克利斯托夫秘密谈判流产的主意，出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

翰·托尔（John Tower）参议员（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的助手、海军陆战队军官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会晤安排在华盛顿朗方广场酒店。麦克法兰在回忆录中未提及“惊奇十月”问题。但事实是，1980年3月，凯西在马德里利兹酒店与伊斯兰元老卡塞姆·卡桑尼（Abol Qassem Kashani）之子赛义德·卡沙尼（Sayeed Mehdi Kashani）和伊朗国防部长的助手艾哈迈德·奥姆谢（Ahmed Omshei）进行了会晤，麦克法兰和唐纳德·格雷格（Donald Gregg）陪同。后者是中央情报局官员、中东问题专家，也是卡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助理，他同时又听命于老布什。他在白宫的同事对此并不知情。[21]5月，凯西再次在利兹酒店会晤了与霍梅尼关系密切的伊朗最高委员会成员、对外关系负责人迈赫迪·卡鲁比（Hojjat Mehdi Karrubi）[22]，陪同他的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名官员、作为老布什代表的盖茨。

从中撮合的伊朗犹太人、以色列国防军情报机构[23]成员梅纳什评论说，“叛逆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和共和党人与伊朗人的秘密会面继续进行，而“美国总统，当然是美国人民的总统，却被蒙在鼓里”[24]。1980年9月进行的其中一次会晤被安排在阿姆斯特丹的万豪酒店进行，以色列方面派出了外交部司长金奇、尤里·西姆哈尼（Uri Simchoni）等国防军成员、沙巴克（以色列情报局）成员塞缪尔·莫里亚（Shmuel Moriah）和摩萨德成员梅纳什。伊朗方面与会者包括赛义德·卡萨尼阿亚图拉霍梅尼之子艾哈迈德·霍梅尼（Ahmed Khomeini）、伊朗最高委员会成员阿亚图拉阿里·哈什米（Ali Reza Hashemi）的助手克霍斯罗·法克利埃赫（Kohosro Fakhrieh）和国防部长助理艾哈迈德·奥姆谢。美方代表为长期潜伏的摩萨德间谍罗伯特·麦克法兰[25]、在白宫供职但已与里根谈妥留任的理查德·艾伦[26]、布什竞选班子负责人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 III）和副总统候选人的密友劳伦斯·希尔伯曼（Lawrence Silberman）。

以色列总理贝京预先批准了调停行动，他愿意帮助霍梅尼政府，目的是让伊朗士兵替以色列士兵去送命，同时消耗伊拉克。这样做不仅能够转移人们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还能从阿拉伯国家获得资金。从贝京的利库德集团角度看，以色列已在中东失掉了作为美国战略资产的优势地位。自《戴维营协议》签订后，美国开始与埃及、沙特和约旦等阿拉伯“温和”国家取得谅解。[27]以色列日益感到孤立，担心美国为遏制伊朗所代表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而最终公开支持伊拉克。贝京更愿意共和党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正因为如此，在没有征得卡特同意的情况下，一架装载武器的飞机抵达德黑兰。他还希望通过出售武器，使生活在伊朗的5万名犹

太人能获准离开那里。这些犹太人后来移居到以色列。[28]

当时，美国扣压着伊朗巴列维时期订购的价值2.4亿美元的军事物资。卡特通过伊朗情报部负责人侯赛因·法杜斯特（Hosain Fardust），向霍梅尼政府发了正式信函，信函落款时间为10月11日。他在函中承诺，立即解除对价值1.5亿美元武器的扣压，这比此前商定的少1 000万美元。[29]与此同时，凯西以里根和老布什的名义，向穆罕默德·贝赫什提（Muhammad Beheshti）和拉夫桑贾尼这两位阿亚图拉做出了条件更优厚的承诺。[30]伊朗于是中止了与卡特政府的商谈，因为它觉得如果选择与里根班子谈判，其利益能得到更大满足。里根班子承诺，如果伊朗能把释放人质的时间拖延到美国大选后，它将通过以色列提供更多武器。伊朗与卡特政府的谈判破裂发生在10月18—20日期间，当时，正在联合国访问的伊朗总理阿里·拉贾伊（Mohammad Ali Rajai）拒绝了与美国国务卿埃德蒙德·马斯基的会晤。[31]贝京未经卡特同意就向德黑兰运送武器的事实，促使伊朗做出这一决定。但伊朗希望未来的共和党政府高层直接作出保证。为此，阿伯尔哈桑·巴尼萨德尔（Abolhassan Bani-Sadr）总统和伊斯兰元老卡鲁比前往巴黎进行最终商谈。他们明确表示，任何与以色列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伊朗伊斯兰政府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32]

隶属于总理府的法国情报机构外国情报与反谍报署跟踪了整个过程。各种信息来源表明，前往巴黎的不只是凯西、盖茨、艾伦和格雷格，副总统候选人老布什也亲自前往，他于10月19日（周日）在那里与阿亚图拉贝赫什提的代表卡鲁比进行了秘密会晤，以便确定协议内容。[33]后来流亡巴黎的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证实了那次会晤。[34]海军情报署飞行员冈瑟·拉斯贝克（Gunther Karl Russbacher）上尉[35]称，他驾驶沙特阿拉伯王室的一架飞机（BAC-111）载着老布什，从安德鲁空军基地起飞，途中在纽芬兰加油，并在短短几小时后，用一架被称作“黑鸟”的SR-71间谍飞机将其送回美国。该飞机能以高于3.2马赫的速度和85 000英尺的高度飞行。为了避免让媒体认出，老布什在奥利机场空军基地下了飞机。据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美籍瑞士飞行员海因里希·鲁普（Heinrich Rupp）称，老布什等人乘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格鲁曼·格夫斯姆Ⅱ飞机前往巴黎，飞机在布尔热机场加油，用阿德南·哈肖吉（Adnan Khashoggi）的信用卡付了款。[36]与老布什关系密切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菲利克斯·罗德里格斯（Felix Rodríguez）的亲信杰克·托利弗（Jack Tolliver）可能作为副驾驶也去了巴黎。[37]

不管老布什是否参与，巴黎达成的“交换”成为向伊朗提供多于先前

订购且已付款武器（卡特未同意这样做）和解除对伊朗在美国银行的资金冻结并交付 5 200 万美元的保证。作为交换，阿亚图拉霍梅尼政府将把人质的释放拖延至美国大选后。布热津斯基已意识到，尽管伊朗与克里斯托夫和中间人达成了协议，但只要卡特仍是美国总统，人质就不可能被释放。[38]事实上，1981 年 1 月 20 日 12 时 30 分，即里根就任总统半小时后[39]，两架飞机从德黑兰梅斯拉巴德机场起飞，把人质送回美国，人质危机共持续 444 天。[40]几天后，按照右翼利库德集团总理贝京的命令，来自美国的武器经以色列被运往伊朗。瑞典军火商斯文·克朗（Sven Klang）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记者皮埃尔·塞林格（Pierre Salinger），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在 1981 年执政之初，就秘密从位于比利时的北约机库向伊朗发运了 F-4 歼击机。

1981 年 3 月 30 日，也就是里根政府执政两个多月后，当里根总统走出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时，遭到枪击[41]，开枪者名为约翰·欣克利（John W. Hinckley Jr.），是范德比特石油公司副董事长斯科特·欣克利（Scott Hinckley）的弟弟。该公司为布什竞选提供了大量资金。[42]黑格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忙赶往白宫，他并不清楚“总统遇刺是个人行为，还是阴谋的一部分”[43]。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完成全部调查之前，政府内的一些人就匆忙排除了阴谋的可能性，但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立即启动了最高军事戒备状态。国务卿对此感到诧异，于是就询问温伯格：“如果说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为何我们要让军队进入戒备状态?”[44]布什家族一位成员被怀疑卷入此事件。也许各种相似纯属巧合，但事实是，老布什的小儿子、供职于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尼尔·布什（Neil Bush）与约翰·欣克利的兄长斯科特·欣克利有交往。据《休斯敦邮报》透露[45]，他本来要在枪击案的第二天与约翰·欣克利共进晚餐，可能是为了就欣克利家族企业范德比特石油公司由于在汽油价格上的不规范做法将被能源部处以罚款事宜进行商量。尽管有相反证据，但白宫的官方说法是“不存在阴谋”。1982 年，接受审讯的约翰·欣克利被以患有精神不正常为由释放。在美国，这一理由被应用于不到 2%的案件中，其中近 80%遭驳回。他有可能精神失常，痴迷于由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和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主演的影片《出租车司机》，但可能有更深层次原因（或受挑唆）促使他试图谋害里根。“罪魁祸首欲从中牟利。”[46]

只有老布什可能从这一犯罪活动中渔利，里根一死，他就能成为总统。1980 年年初，他与里根为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进行了激烈竞

争，他退出竞争后，同意成为里根的副总统候选人。他建立了甚至能涉足卡特办公室的情报网，并得到曾参与和伊朗谈判的格雷格的支持。根据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问题助理加里·斯克（Gary Sick）的说法，在白宫内部，没有人知道他和老布什的关系。[47]斯克写道："里根竞选班子组建了一个有组织的专业情报体系，以颠覆美国的民主进程。"[48]建立这一体系的主要负责人是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6—1977 年）的老布什。曾在人质危机中担任布热津斯基主要助手，并被他认为是"严谨而有思想的分析家"的斯克[49]，当年就怀疑存在一个意在阻止卡特连任的阴谋，他还接到伊朗正从以色列获得武器的情报。1982 年 10 月，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莫夏·阿伦斯（Moshe Arens）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他解释说，武器发运"与几乎是美国政府的最高层"进行协调，目的是寻求与温和、务实的伊朗军人接触的领域，探索推翻霍梅尼政权的可能性。[50]自 1981 年起，美国向伊朗运送的武器价值不是数百万美元，而是数十亿。[51]

这一丑闻直到 1986 年 11 月 3 日才爆发。当日，贝鲁特《帆船》周刊透露，白宫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1983—1985 年）曾作为里根总统特使秘密访问德黑兰，其使命是通过以色列向伊朗提供武器，让霍梅尼政府通过自身影响，使七名在黎巴嫩俗称"阿马尔"（黎巴嫩抵抗部队）的什叶派民兵扣留的人质获释，人质中包括中央情报局黎巴嫩站站长威廉·巴克利[52]（William Buckley）。向新闻界走漏消息者可能是以色列情报官员梅纳什，也许是因为他知道里根政府也在帮助伊拉克。伊拉克被以色列视为头号威胁，因此，1981 年 6 月 7 日两伊战争爆发后，以色列美制战机根据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卫星照片，轰炸了位于距巴格达约 14 公里的塔姆斯 1 号 70 兆瓦核反应堆。[53]

美国的两面性和虚伪在这一事件中暴露无遗。以色列违背了承诺，它利用 KH-11 卫星照片，在没有预先通知美国的情况下，出动 F-16 战机，对伊拉克进行了空袭。美国向其提供这一战机的条件是，只能用于防御目的。副总统老布什及其办公室主任贝克主张对以色列实施制裁，里根则犹豫不决。他对以色列颇有好感。以色列所采取的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行动，令他感到"欣喜若狂、非常满意"[54]。他说："这表明以色列有勇气和战略意识，能够在他们研制核弹之前解决问题。"[55]但不管如何，美国不得不公开谴责以色列的空袭行为，这样做主要源于在阿拉伯国家中所产生的反响。美国宣布中止向以色列交付另外四架 F-16 战机，这批战机是 1975 年美国向以色列出售战机的延续。里根在自传中承认，尽管美国不得

不公开批评以色列违背承诺，但他对贝京总理的动机表示同情，因为他对伊拉克正在研制核武器深信不疑。[56]两个月后，禁售决定悄然解除，战机被交付给以色列。[57]

1984 年发生的美国公民接二连三在黎巴嫩被劫持的事件，反映出中东对美国敌视情绪的上升，原因是它对中东的干涉政策和对以色列无限的支持。1982 年，里根政府心照不宣地为以色列再次入侵黎巴嫩开了绿灯。以色列国防军七个师 78 000 名士兵和 1 200 辆坦克参与了入侵行动，他们攻击了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营地。里根还批准向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领导的黎巴嫩长枪党提供 1 000 万美元资金。巴希尔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后当选黎巴嫩总统，他于 1982 年 9 月 14 日遭暗杀。事件发生两天后，以色列军队在阿里埃勒·沙龙[58]（Ariel Sharon）将军统率下，包围了萨布拉和夏提拉营地。他们在夜间发射照明弹，并允许基督教民兵组织长枪党（皮埃尔·杰马耶勒于 1936 年创建）进入两个营地。长枪党杀害了 2 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59]裹着尿布的婴儿和老人的尸体成堆摆放，就连动物也未能幸免。[60]美国对屠杀进行了谴责，但没有坚持让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紧接着，里根以维和的名义向黎巴嫩派遣了海军陆战队第 32 分队的 800 名官兵，目的是支持以色列军队，并监督巴解组织部队的撤离。这样，美国开始干涉黎巴嫩内战，它不仅训练和武装取代被暗杀的巴希尔的弟弟阿明·杰马耶勒（Amin Gemayel）的部队，也从军事上支持基督教长枪党民兵与穆斯林进行的战斗。

黎巴嫩内战导致 3 万人丧生，贝鲁特遭到严重破坏，50 万人流离失所。虽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军，但它依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美国卷入黎巴嫩内战使得它在中东仅剩的一点信誉也不复存在。[61]随着针对被视为腐败的本国政府和“异教徒”即那些占领穆斯林土地的外国人（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和在阿富汗的苏联人）的“圣战”加剧，针对美国人的恐怖活动频频发生。1983 年 4 月 18 日，一位自杀式“圣战者”驾驶一辆装满炸弹的汽车冲入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爆炸造成 63 人死亡，包括中央情报局中东负责人。10 月 23 日，真主党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24 分队军营引爆了一辆装载炸弹的卡车，致使 241 名美国人丧生。与此同时，另一枚炸弹在法国军事基地爆炸，炸死 58 名士兵。作为报复，停泊在黎巴嫩沿岸的美军军舰“新泽西号”向贝鲁特周边山上的德鲁兹和什叶派穆斯林居住区发射了数十枚 40 毫米炮弹，不少村镇被摧毁。然而，黎巴嫩的安全形势日益恶化，除了把美国军队撤到军舰上，里根别无选择。

种种迹象表明，通过以色列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在黎巴嫩被什叶派民兵劫持的美国公民的主意，出自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1980 年，也是他与霍梅尼政府进行了成功谈判，将被扣留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人质释放拖延至美国大选后。麦克法兰称，1985 年 7 月 3 日，时任以色列外交部司长的摩萨德成员金奇来到白宫，向他提议了这桩交易。金奇对在阿富汗的 10 万名苏联士兵可能向伊朗推进直抵波斯湾感到担忧，因为这是“世界的一条生命线”，是向西方运送石油的必经通道。根据他的说法，尽管凯西拒绝了金奇提出的“加速”霍梅尼死亡，即暗杀他的想法，但他答应，将会把利用武器交易博得什叶派政府温和派好感的建议提交里根。建议得到了里根的认可，他确实对扶持一个能改变伊朗政策乃至其政府的反对派感兴趣。[62]此外，麦克法兰认为，里根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对人质的处境十分担忧。而且，在击败卡特的总统竞选中，他曾指责对手在与劫持美国大使馆人员的学生谈判表现无能。[63]

这样，经里根批准，并得到老布什支持[64]，麦克法兰重新建立了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三角关系，以色列外交部司长金奇充当中间人。后来，以色列工党总理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反恐助手阿米拉姆·尼尔（Amiram Nir）也通过与伊朗政府关系密切的沙特军火商阿德南·哈肖吉[65]（Adnan Khashoggi），充当了这一关系的调停人。[66]1986 年 7 月 29 日，尼尔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会晤了美国副总统老布什，向他通报了通过以色列向伊朗出售武器事宜。据说，尼尔对整个谈话进行了录音。[67]这一交易的“理论基础”是，在与伊拉克战争中需获得支持的伊朗，有可能依附于苏联，这将成为第三世界的一场灾难，并构成对美国的最大挑战。[68]在《最后一个选择》一书中，金奇为自己参与这一交易开脱。他称，麦克法兰向他保证，与他所谈内容完全得到里根总统的批准。[69]后来，他们之间又进行了多次会晤，与本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伊朗军火商马努切·戈伯法尼（Manucher Ghorbanifar）和作为麦克法兰代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迈克尔·莱丁（Michael Ledeen）参与了会晤。

毫无疑问，协议内容确实得到了里根的批准。尽管伊朗被列为“恐怖主义国家”，但他依然于 1985 年 7 月中旬签署了总统令[70]，“原则上”批准向伊朗出售陶式反坦克导弹[71]。这一决定既违反《武器出口控制法》，也不符合与交易中间人以色列签署的协议。[72]1985 年 9—11 月，美国通过戈伯法尼向伊朗运送了更多陶式和霍克导弹。据说戈伯法尼为萨瓦克（巴列维时期的秘密警察，后被萨瓦马所取代）提供情报并与摩萨德有联系。1986 年年初，经里根批准，美国又向伊朗出售了一批导弹。里根于 1 月 17

日又签署了一项总统令[73]，尽管国防部长温伯格、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P. Shultz）和总检察长埃德文·米斯（Edwin Meese III）警告，这一行动违反《武器出口控制法》和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74]。商定的条件是，2月10日，以色列把资金存入瑞士信贷银行，次日，中央情报局把购买3 508枚陶式导弹的2 100万美元转至国防部账户。[75]

中央情报局从国防部获得再转给以色列代理人[76]的武器售价非常高。因此，当伊朗意识到报价过高后，放弃了购买计划。[77]由于国会对负责在中美洲国家从事秘密战争的中央情报局预算设限，不允许它提供以推翻桑地诺政府为目的的援助，于是，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额外利润被用于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奥利弗·诺斯（Oliver L. North）中校指望这些交易能带来1 200万美元的收入，因而就把武器价格提高200%。[78]这种做法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和政策。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美国对伊朗实行武器禁运，禁止任何形式的用赎金交换俘虏行为，也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的资助高于国会根据爱德华·博兰（Edward Boland）（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议员）1982年提出的修正案所确定的限额。

向伊朗出售武器和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转移资金通过美国企业研究所进行，该机构也被称为“黄色水果行动”或“民主项目”。它是一个私人组织，实际上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密之手。[79]它拥有自己的飞机、飞行员、飞机起降跑道、船只、通信设备以及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其负责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诺斯中校。他得到凯西的全力支持。尽管凯西藐视国会，认为在事关保障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央情报局可凌驾于法律之上，但面对国会的约束[80]，为了使中央情报局逃脱责任，他提出了“一个超越法律的隐蔽组织”[81]概念。推翻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除了从与伊朗的武器交易中获得资金，诺斯所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自1984年年中起就设法让沙特每月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100万美元。1985年，在里根与法赫德·阿齐兹（Fahd Bin Abdul Aziz）国王会晤后，这一数额翻了一番。温伯格的密友沙特驻美大使班德尔·阿齐兹（Bandar Bin Sultan Bin Adbul Aziz）亲王，通过诺斯和麦克法兰等人建立的网络，共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了2 500万美元。[82]《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兼作家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per）证实，各国提供的资金总额达3 400万美元。[83]

美国国会未察觉的这一行动体系，在用那些资金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

装购买的武器空运至该国后才暴露。在尼加拉瓜的联系人为中央情报局成员菲利克斯·罗德里格斯，代号为马克斯·戈麦斯（Max Gomez），此人是老布什和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格雷格的亲信。[84]作为对他在前总统卡特办公室进行的渗透行动的补偿，他获得了这一职位。丑闻爆发后，诺斯中校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另外一些成员开始销毁可能对自己不利的文件，包括其他违法行为。

毫无疑问，里根了解所有非法交易，并给予了支持。他认为，总统作为政府首脑，应该比国会有更大的权力，因为他的主要责任是保证人民和国家的安全。但他觉得一系列法律规定妨碍了他在贸易、人权、武器销售、援外、情报行动和向国外派遣军队等问题上施展其权威。[85]1986 年 11 月 19 日，他在接受新闻界采访时谎称，美国仅向伊朗运送了数量不多的防御性武器，用一架小型货机就装下了。里根还编造了另一个谎言，他坚持说，没有其他国家参与这一行动，尽管事实上武器交易通过以色列进行。他后来试图更正说，美国只向伊朗运送了 1 000 枚陶式导弹，而实际销售数量是 2 004 枚，用一架小型飞机根本不可能装下。他承认，曾试图对伊朗采取一项外交行动。麦克法兰评论说："这说明，显然已入主白宫的自以为是的心态没有发生真正变化，这恰恰就是公开撒谎的一面。"麦克法兰认为，里根的言论令人失望，他本可以用美国的战略利益需要作为理由，对其所采取的行动承担责任。[86]里根承认，"多位高级官员"反对向伊朗出售武器，用武器交换人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但他做出了摒弃这一观念的决定，下令"不再向伊朗出售任何类型的武器"[87]。他否认 1 月 17 日发布总统令之前向伊朗运送的另外几批武器与美国有关，同时又自相矛盾地表示："我别无所指，指的是我们出售的导弹。"[88]德雷珀认为，这是里根在担任总统期间所接受的"最灾难性采访"[89]。曾参与里根竞选运动并作为政治调查和分析员在白宫任职的芭芭拉·霍尼格（Barbara Honegger）在其《十月惊奇》一书中指出，里根本人编造并美化了"事实"，并且至少三次改变说法，他完全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中"[90]。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6—1977 年）的老布什清楚，"中央情报局一个最基本的职能是撒谎、哄骗，并小心翼翼地扩展已建立起来的'巧言否认'网络"[91]。

1986 年 11 月 25 日，也就是里根接受采访几天后，美国总检察长米斯被迫承认，里根知道 1985 年 11 月向伊朗运送武器，以及出售武器所获利润被非法用于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进行以推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为目的游击战这一情况。第二天，里根在表示没有人告知他

这一交易的同时，不得不宣布由参议员约翰·托尔、前国务卿埃德蒙德·马斯基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澄清这一问题。1980 年，以武器换人质的最初谈判进行之时，托尔参议员是麦克法兰的上司。而他要负责调查的正是他在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案中的同谋。里根在自传中为自己开脱，理由是，他认为反政府武装作为尼加拉瓜“民主抵抗力量”是必要的。他承认，自己“坚定地”站在以色列行动的后面，因为，他的目的是解放人质，并开启与伊朗未来领导人的对话。但他表示，在诺斯的备忘录被公开之前，他未听说过任何关于向伊朗出售武器的资金盈余被用于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传言。即使有人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也不会同意。[92]里根感叹道：“我平生第一次得不到人们的信赖。我以实相告，但他们依然不相信我。”[93]

12 月 19 日，哥伦比亚区上诉法庭特别处指派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Lawrence E. Walsh）组建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调查 1984 年或自 1984 年前后起至那时为止美国向伊朗政府、组织、机构或个人直接或间接出售武器，发运或转运军事物资、武器或资金以及它们被挪用到尼加拉瓜等国的有关情况。此外，1987 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设立了一个由李·汉密尔顿（Lee H. Hamilton）（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人）和丹尼尔·井上（Daniel K. Inouye）（夏威夷州民主党人）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这一丑闻。毒品、恐怖主义和国际问题对外关系小组委员会主席约翰·克利（John Kerry）参议员则努力调查中央情报局在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过程中与贩毒集团的联系。他在美国公共电视公司的《前线》栏目中表示：

> 我们最近几个月所感知的是，我们发表的关于打击毒品战争宣言的结果是一场口水战而不是实际行动……我们的边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毒品泛滥。这表明，遏制毒品交易仿佛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次要目的，它经常被其他政治和机构目标所牺牲，这些目标包括颠覆尼加拉瓜政权、支持巴拿马政府、把贩毒集团当作情报资本以及通过卷入贩毒案件来保护军事和情报来源，避免其可能的妥协。[94]

根据《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国会调查委员会报告》，1985 年年中，经里根总统批准，美国开始向伊朗出售武器。该报告显示，在伊朗军火商戈伯法尼的怂恿下，以色列卷入了这一交易。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同意向伊朗出售炮弹和其他武器，“但在得到美国批准，即里根的批准后

才会这样做”[95]。里根批准了向伊朗出售武器。首批交易达成于1985年年中。同年11月，他批准了另一批武器的出售。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要求得到了满足。1986年1月6日，里根不顾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国务卿舒尔茨的反对，签署总统令，批准出售更多武器，以换取人质。温伯格和舒尔茨认为，这一行动是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96]根据“托尔委员会”得出的结论，里根根本不是一名远处的观望者或不经意的监督者，他自向伊朗出售武器以获取用于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资金的行动之初，就扮演了十分积极的角色。1985年年底和1986年年初，他不顾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反对，坚持要求将这一行动继续下去。[97]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卷入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丑闻的莱丁在回忆录中证实，基本政策就是总统“强烈希望的”那些，并且是在得到他正式批准后才付诸实施的。[98]

国会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尽管以色列确实出售了武器，包括霍克导弹，但这是在总统及其高级顾问知情并批准的情况下执行的。”此外，尽管里根否认其非法性，但其属下却“极力掩盖”[99]。国会中几个委员会的评估认为，“对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所采取政策的共同特征是隐秘、欺骗和蔑视法律”。这说明美国采取的是相互矛盾的两种政策：一种公开，另一种秘密。[100]在里根政府公开声称将在“形式和实质上”遵守《博兰修正案》确定的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规定的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承担了领导该组织并向其提供资金支持的职责。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在尼加拉瓜参与行动，并利用不负责任的个人，怂恿他们执行“隐蔽行动”。[101]公开的对外政策还包括：不为人质的释放作任何让步，以免助长绑架行动；禁止向伊朗出售武器；改善与伊拉克的关系。事实上，美国一边支持伊拉克，一边秘密向伊朗出售尖端导弹，并与其分享军事情报，尽管什叶派原教旨主义及其对恐怖主义行动的支持被认为是对美国在中东利益的主要威胁。

【注解】

[1] Id.，ibid.，p. 137.

[2] Ben-Menasche，1992，p. 59.

[3] Brzezinski，1983，p. 504.

[4] Honegger，1989，p. 13.

[5] 已加入美国国籍。

[6] 先知穆罕默德在死前指定其堂弟和女婿阿里（与其女儿法蒂玛成婚）为其继承人。支持阿里担任哈里发的穆斯林被称为阿里党人，反对阿里担任哈里发并主张为

奥斯曼报仇的穆斯林被称为奥斯曼党人。两派之间的战争是伊斯兰的第一次内战，从656年一直持续到661年。661年阿里被政敌刺死。认为只有穆罕默德的家属后代阿里、哈桑、侯赛因等人才有权任哈里发的信众被称为“阿里什叶”（“什叶”在阿拉伯语中是“追随”、“党派”的意思），即后来的什叶派。他们认为其他的哈里发都是篡权者。由于什叶派在人数上占少数，阿里、侯赛因皆遇害而亡，而且在历史上什叶派长期受到迫害，所以什叶派有强烈的受难心理和凝聚力。

[7] 1980年9月17日，萨达姆·侯赛因对《阿尔及尔协议》进行了谴责。该协议确定了石油通道阿拉伯河水域的分割。9月2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伊朗。围绕阿拉伯河的争端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其他因素，如库尔德分裂主义、萨达姆对伊拉克什叶派暴动的担忧以及夺回1975年被伊朗侵占领土的企图。

[8] Ritter & Pitt，2002，p. 14. 1973年，巴西石油公司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三角洲发现了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马吉努油田，其石油储量估计为100亿桶。由于两伊战争，该公司被迫放弃该油田。1979年，巴西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告知，伊朗不承认该地区归属伊拉克。巴西石油公司不愿在这一即将成为战场的地点投资25亿美元。伊拉克因此向巴西支付了3亿美元，作为对地质勘探投入的补偿。此外，它还给予巴西一份极为优厚的合同，根据该合同，伊拉克每天向巴西供应15万桶石油，为期15年。

[9] 伊拉克声称，1980年4月，伊朗支持了“伊斯兰号召党”（什叶派）实施的谋杀伊拉克外长阿齐兹的未遂阴谋。该组织还被指控从事了暗杀伊拉克文化和新闻部长拉菲夫·亚辛（Lafif Nayyif Jasim）的行动。作为报复，萨达姆下令逮捕了所有“伊斯兰号召党”成员及其支持者，并将来自伊朗的逊尼派军人流放到伊朗。1980年年中，他下令处决了“伊斯兰号召党”领导人穆罕默德·巴克尔（Muhammad Baqr）及其妹妹萨德尔（Sadr）。

[10] 当时，伊朗政府在伊拉克南部支持被萨达姆取缔的“伊斯兰号召党”。萨达姆则支持伊朗胡齐斯坦省的阿拉伯解放阵线。

[11] Kimche，1991，p. 206.

[12] Von Bülow，2002，pp. 97-98.

[13] Higgs (ed.)，1990，p. 149.

[14] Sick，1991，pp. 189-191.

[15] Id.，ibid.，pp. 12-13，70-73.

[16] Id.，ibid.，pp. 70-73.

[17] 这一数百人遭免职的裁员行动在中央情报局内部被称为“万圣节前夕大屠杀”。Sick，1991，p. 23.

[18] 凯西后来在里根政府中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19] Honegger，1989，pp. 10-11.

[20] Id.，ibid.，p. 11.

[21] Sick，1991，pp. 34-35.

[22] 赛勒斯、詹姆希德和哈什米兄弟是伊朗情报组织成员，与武器贩卖有牵连。

[23] Sick，1991，pp. 66-69.

[24] Ben-Menasche，1992，p. 60.

[25] Id.，ibid.，p. 176.

[26] Id.，ibid.，p. 71.

[27] Id.，ibid.，p. 78.

[28] Haig，1992，pp. 551-552. Honegger，1989，p. 56.

[29] Id.，ibid.，p. 55.

[30] Id.，ibid.，pp. 56-59

[31] Id.，ibid.，p. 55.

[32] Ben-Menasche，1992，p. 74.

[33] Sick，1991，p. 225. Ben-Menasche，1992，pp. 74-76.

[34] Honegger，1989，pp. 59-61.

[35] 出生证上的名字是冯·拉斯贝克（von Russbach）男爵、范·埃斯特哈齐（von Esterhazy）伯爵冈瑟·卡尔（Gunther Karl），1942 年 7 月 1 日出生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拉斯贝克后因不当使用和侵占政府财产、不当使用飞机和不当使用政府命令购买汽油而被判刑并遭关押。作为海军情报局成员，他配合中央情报局工作，曾化名罗伯特·沃克（Robert A. Walker）。在罗马，他为打入“红色旅”进行了工作。他是老布什 1980 年 10 月 19 日前往巴黎作证的第二位机组成员。

[36] Honegger，1989，pp. 63-65.

[37] Drapper，1991，p. 575.

[38] Brzezinski，1983，pp. 507-509.

[39] Woodward，1987，p. 102. Ben-Menasche，1992，p. 75.

[40] “沃伦·克里斯托弗此前已就我们在伊朗的人质释放问题进行了谈判，但人质一直到里根总统上任之日才得以释放。这说明所有领导人都玩弄政治，即使在神权国家也不例外。” Clinton，2004，p. 410.

[41] 受伤者还包括新闻局长詹姆斯·布雷迪（James Brady）、警员托马斯·德拉汉蒂（Thomas Delahanty）和情报人员蒂莫西·麦卡锡（Timothy J. McCarthy.）。

[42] Tarpley & Chaitkin，1992，pp. 370-374.

[43] Haig，1984，p. 151.

[44] Id.，ibid.，p. 156.

[45] 3 月 31 日（周三）《休士敦邮报》报道了晚餐安排及被取消的事实。标题为“老布什之子曾约定与疑犯兄弟共进晚餐”。作者为阿瑟·维斯（Arthur Wiese）和玛格丽特·唐宁（Margarte Downing）。

[46] O autor do delito é quem dele tira proveito.

[47] Ben-Menasche，1992，pp. 59，74-75. Sick，1991，34-35，83，149，210-212. 217.

[48] Id.，ibid.，p. 226.

[49] “他（加里·斯克）证明自己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正如我在 1981 年他获得

'国防资深奖章'时所说的：'美国的人质以及他们的家人可能都意识不到，为了人质可能的释放，他们欠加里·斯克的是一笔多么巨大的债！'" Brzezinski，1983，p. 359.

[50] *Boston Globe*，21/10/1982，p. 1. Apud Mitchell & Schoeffel，2002，p. 9. 51. Honegger，1989，p. 170.

[51] Honegger，1989，p. 170.

[52] 除了后被暗杀的中央情报局站长巴克利，1974 年，美联社著名记者本杰明·威尔（Benjamin Weir）、劳伦斯·詹科（Lawrence M. Jenco）、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以及贝鲁特美洲大学的皮特·基尔伯恩（Peter Kilburn）、大卫·雅各布森（David P. Jacobsen）和托马斯·萨瑟兰（Thomas M. Sutherland）均遭暗杀。

[53] 袭击持续了 80 秒钟，共投下 13 枚炸弹。低于 600 瓦的塔姆斯 2 号反应堆没有受到破坏。

[54] Woodward，1987，p. 189.

[55] Hersh，1991，pp. 8-13. "*Israel has never had a greater friend in the White House than Ronald Reagan*". Haig，1984，pp. 167，183-184.

[56] Hersh，1991，p. 9.

[57] Apud Hersh，1991，p. 9.

[58] Id.，ibid.，p. 9.

[59] 沙龙出生在德国，该地区二战后被划归波兰。他原名为 Ariel Scheinermann。

[60] 以色列情报机构估计有 700～800 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61] Woodward，1987，p. 258.

[62] 1958 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一支海军陆战队前往支持卡米尔·夏蒙（Camille Shamun）（1952—1958 年）总统领导的政府，以打击穆斯林。艾森豪威尔的借口是穆斯林得到叙利亚的支持，正从苏联获得武器。这一干预致使穆斯林仇视美国。

[63] McFarlane，1994，pp. 17-21.

[64] Id.，ibid.，pp. 22-24.

[65] 哈肖吉是 1997 年与英国王妃黛安娜一同在巴黎死于车祸的多迪·法耶德（Dodi al-Fayed）的叔叔。

[66] Id.，ibid.，pp. 33-35.

[67] Kimche，1991，pp. 214-220.

[68] Document 67：Craig Fuller Memorandum，"The Vice-President's meeting with Mr. Nir"，July 29，1986. *The Iran-Contra Scandal*：*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Edited by Peter Kornbluh and Malcolm Byrne.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s Reader. Nova York：New York Press，1993. Walsh，1997，pp. 111，155，456. Drapper，1991，p. 389.

[69] Kimche，1991，pp. 208-209.

[70] Kimche，1991，p. 212.

[71] 美国总统的批准书，几乎总是以书面形式做出。他在其中指出，采取一个"隐蔽行动"对国家安全十分重要。"总统令"是美国政府中最秘密的文件。

[72] 关于这些交易的细节，可参阅 Von Bülow，2002，pp. 113-114。

[73]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with Minority Views，p. 358.

[74] Document 64：John Poindexter，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Covert Action Finding Regarding Iran"，with Signed Findin Attached，January，17，1986，in *The Iran-Contra Scandal：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Edited by Peter Kornbluh and Malcolm Byrne.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s Reader. Nova York：New York Press，1993，pp. 232-235. Walsh，1997，p. 44.

[75]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with Minority Views，p. 239.

[76] Document 79：Oliver North，Action Memorandum for John Poindexter，"Operation Recovery"，(National timeline for major events in Operation Recovery)，January 24，1986，in *The Iran-Contra Scandal：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Edited by Peter Kornbluh and Malcolm Byrne.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s Reader. Nova York：New York Press，1993，pp. 286-291.

[77] Document 64：John Poindexter，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Covert Action Finding Regarding Iran"，with Signed Finding Attached，January，17，1986，pp. 232-235. Ibid.

[78] Walsh，1997，p. 155.

[79]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with Minority Views，p. 246.

[80] Ibid.，pp. 13，62-68.

[81] Ibid.，p. 33.

[82] Mahle，2004，pp. 18-19.

[83] Walsh，1997，pp. 19，80，391-392.

[84] Drapper，1991，p. 91.

[85] Reagan，1990，pp. 483-484.

[86] Walsh，1997，pp. 21-22，105-106.

[87] McFarlane，1994，pp. 94-95.

[88] Apud Drapper，1991，p. 482.

[89]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with Minority Views，pp. 19-20.

[90] Drapper，1991，p. 482.

[91] Honegger，1989，p. 3.

[92] Reagan，1990，p. 542.

[93] Id.，ibid.，p. 3.

[94] Frontline：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IA and its role in international drug dealing. Guns，Drugs，and the CIA ＃613 Original Air Date：May 17，1988. Produced

and Written by Andrew and Leslie Cockburn. Directed by Leslie Cockburn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drugs/archive/gunsdrugscia.html. Vide também Bainerman, 1994, pp. 184–185, 203.

[95]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with Minority Views, p. 20.

[96] Ledeen, 1988, pp. 277–278.

[97] Id., ibid., p. 278.

[98] Ibid., p. 15.

[99] Ibid., p. 20.

[100] Ibid., p. 21.

[101] Ibid., pp. 22–25.

第二十三章

里根对萨达姆的期望　两伊战争中对伊拉克的支持　拉姆斯菲尔德与萨达姆　美国对外政策的双重性　“伊朗门”丑闻　里根的责任和掩盖行动　中央情报局与贩毒　美国和马尔维纳斯战争　对格林纳达的干涉

里根政府自1981年起就意识到，萨达姆虽与苏联有往来，但作为一名强有力的领导人，却能填补巴列维垮台所留下的真空，并被用来捍卫美国在中东的利益。[1]他曾与中央情报局有过合作，被指使去谋杀伊拉克总统阿卜杜拉·卡西姆（Abdul Karim Qassim）。1958年，卡西姆在伊拉克发动推翻王室的军事政变，费萨尔二世（Faisal II）国王和阿卜杜拉·伊拉（Abd al-Illah）王储遭杀害。[2]1959年10月，萨达姆谋杀未遂，被迫和其他反对卡西姆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成员一起逃离伊拉克。中央情报局继续支持伊拉克政府的反对派，原因是卡西姆此前把伊拉克石油公司收归了国有。该财团由企业家克洛斯特·古本江（Calouste Gulbenkian）于1920年创立，其股东包括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索科尼真空油公司。[3]1963年，中央情报局以卡西姆政府受共产党影响为借口，两度策划谋杀行动，卡西姆最终下台，并于1963年2月9日被处死。[4]阿拉伯社会复兴党败给了一个由阿卜杜拉·萨拉姆（Abd al-Salam‘Arif）领导的亲纳赛尔派别。结束流亡返回伊拉克的萨达姆开始组建杰“哈兹·可汗”，即广为人知的情报组织“艾杰哈兹·亚哈斯”，该组织根据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名单，抓捕和处决了大批共产党人。[5]1968年，艾哈迈德·贝克尔（Ahmad Hassan al-Bakr）发动政变时，对共产党人也采取了相同行动，政变使阿拉伯社会复兴党重掌政权。该党是一个非宗教性质的民族主义政党，作为一个泛阿拉伯政党，其意识形态类似于法西斯主义。

1979年的伊朗革命改变了中东政治和战略格局，是美国自越战失败以

来遭受的最大挫折。华盛顿于是把目光转向那一年成为伊拉克总统的萨达姆。尽管他被认为是一名激进分子，但美国仍希望由他去填补巴列维垮台所留下的领导真空。[6]阻止原教旨主义扩张，遏制伊朗的影响，避免其延伸到其他波斯湾产油国，是美国的主要政治目的。美国担心什叶派（占伊拉克人口的60%）可能推翻由逊尼派的萨达姆执掌的非政教合一政府，并倒向德黑兰的毛阿们。[7]因此，对华盛顿决策者来说，萨达姆只算是一个“小恶”。沙特也将伊拉克视为阻止什叶派原教旨主义扩张的一个堡垒。于是，它和科威特一起向萨达姆提供资金，并安排了一条运送武器的通道。

1982年，美国国务院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与伊拉克达成协议。1983年，在萨达姆把巴解组织异己分子阿布·尼达尔（Abu Nidal，巴勒斯坦人沙布里·阿尔巴那的代号）从伊拉克驱逐出去后，美国将伊拉克从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删除。美国接着向伊拉克出售了600架休斯300C和500D直升机，它们后来被用于向平民喷洒化学物质。1983年7月，伊拉克国有杀虫剂生产公司从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子公司KBS Holland BV获得了5吨用作芥子气成分的硫二甘醇。1983年年底，该公司又从KBS买入500吨硫二甘醇和200吨氯化钾。当时，伊拉克已在与伊朗战争中使用芥子气。[8]1983年12月，以建立“里根总统特使与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之间的直接接触”为主要使命，瑟尔公司（G. D. Searle & Co.，阿斯巴甜等化学产品生产商）执行理事、曾在福特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飞往中东。[9]12月20日，他与萨达姆进行了90分钟会晤，双方谈话涉及黎巴嫩内战、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及对海湾战争升级并可能导致石油出口中断的担忧等内容。拉姆斯菲尔德告诉萨达姆，美国正在“劝说别国不向伊朗出售武器，并将继续那样做”[10]。他说，相信华盛顿已成功阻止其他国家向伊朗出口由美国控制的装备。萨达姆在会晤中表示，利比亚和叙利亚是伊朗军火交易的中间方。拉姆斯菲尔德称，出口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国家将得到确定。他还表示，“人们应该知道，恐怖主义有藏身之处——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苏联一直都在向它提供支持。[11]拉姆斯菲尔德在与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的长谈中，涉及了“很多共同兴趣”，譬如遏制伊朗和叙利亚在波斯湾的影响等。他称，里根政府“愿意为伊拉克做更多事情”，但“我们提供帮助的努力受到某些事情的阻碍，这使我们感到为难，譬如化学武器的使用、战争在波斯湾的可能升级和中东的人权状况等”[12]。1984年11月26日，在里根批准向伊朗出售武器八个月前，美国恢复了与伊拉克的外交关系，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访问华盛顿。他在与国务卿舒尔茨的交谈中表示，伊拉克对

华盛顿就海湾战争威胁地区稳定所作的分析感到满意，他同时感谢美国为阻止其他国家向伊朗出售武器而进行的努力。[13]

华盛顿政府充分了解伊拉克在其国内所施行的酷刑、集体处决和屠杀反叛的库尔德人。[14]自20世纪70年代起，库尔德分裂主义一直得到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的支持。[15]虽然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谴责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他也知道伊拉克军队每天都使用从美国公司购买的化学品打击伊朗和库尔德反叛者[16]，但与萨达姆达成的协议能让他有利可图。白宫和国务院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施压，让它为伊拉克提供信贷。1984年，里根要求该银行向伊拉克提供4.85亿美元贷款，用于建造一条从伊拉克至约旦亚喀巴[17]的输油管道，该项目由贝克特尔公司的子公司沙特贝克特尔承建。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曾担任贝克特尔公司的高级主管，布什家族中普利史考特·布什[18]（Prescott Bush Jr.）等也与该公司有利益关系。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阿齐兹亲王和司法部长米斯也参与了这桩生意，后者通过朋友布鲁斯·拉帕波特（Bruce Rappaport）为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从以色列总理佩雷斯那里取得了一份“保证书”，该“保证书”承诺以色列不对那条油管进行轰炸。[19]同时，米斯将军、班达尔亲王和诺斯上校一起参与了通过以色列向伊朗出售武器的交易。1985年，里根政府批准向伊朗出售26架麦道公司生产的MD-530MF直升机，总价2 740万美元。1986年，又批准出售17架贝尔214ST直升机，这是总数为45架订单的一部分。[20]这些武器交易均由黎巴嫩商人萨尔其斯·索格哈纳里安（Sarkis Soghanalian）一手张罗，他得到环球研究国际公司的协助，该公司总部设在华盛顿，由曾任尼克松军事顾问的约翰·布伦南（John V. Brennan）经营，公司的另一股东是曾任尼克松政府总检察长的米切尔。[21]

萨达姆还从美国获得每年2亿美元的信贷，以便通过商品信贷公司（CCC）购买农业产品（大米、小麦和其他谷物）。这一额度在后来几年中被提高到5亿美元。[22]美国所产大米的约23%被运往伊拉克。此外，美国每年还向伊拉克出口100万吨小麦。工业和农贸企业的院外活动使国会难以通过制裁措施。此外，虽然美国宣布在两伊战争中保持中立，但它却向萨达姆提供情报和军事支持。这样做符合里根的战略方针，他最关心的是保护波斯湾的石油设施，避免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以免对国际经济体系造成真正的冲击。[23]

伊拉克得到的不仅仅是经济支持和军事情报方面的帮助。1985—1990年间，美国政府通过埃及向伊拉克提供了约15亿美元的武器和弹药，甚至包括主战坦克等。[24]中央情报局向伊拉克提供了各种情报，包括伊朗部队

集结的卫星照片。萨达姆还得到了2 000～4 000 吨致命化学毒剂，它们被用于与伊朗的战争。1985—1989 年，美国商务部批准向伊拉克出口 70 批生物制品，包括炭疽、芥子气和肉毒杆菌。从拉姆斯菲尔德造访巴格达的 1983 年到 1987 年，萨达姆使用化学武器 195 次，杀害 5 万人，其中包括大量平民。[25]自那时起，美国政府共向伊拉克提供了 50 亿美元贷款，使萨达姆得以更新军队的武器装备，包括化学武器库存。尽管知道芥子气和神经性毒气正被用于打击伊朗军队和库尔德反叛者，但美国并未停止出售。在美国向萨达姆提供支持的同时，里根及其助手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长卡鲁奇和时任国家安全助理科林·鲍威尔（Colin L. Powell）将军又在公开场合谴责伊拉克于 1988 年 3 月在哈拉布亚镇打击库尔德人时使用毒气。[26]

谴责不过是做表面文章而已。从 1985 年到 1989 年 11 月，获得商务部许可的美国公司向伊拉克出口了细菌和炭疽等各种生物制品。[27]尽管知道它们被用于打击库尔德人和伊朗军队，但美国的官方政策却继续亲近和支持萨达姆，将他视为地区稳定的支柱。[28]这样做的理论基础就如同加强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一样，是为了保护石油，遏制伊朗所代表的伊斯兰好战分子。[29]

1989 年，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在巴格达美国展馆落成仪式上称，美国大使馆“高度重视发展两国的贸易和友好关系”[30]。AT & R International、通用电器、施乐、西屋和 Wabg Laboratories 等美国大公司参与了该项活动。另一些公司参与了伊拉克商务论坛的设立，它们希望华盛顿加强与伊拉克的商业往来。1989 年 10 月 2 日，在 6 万名库尔德人为躲避毒气袭击逃亡土耳其一年后，老布什总统签署第 26 号国家安全总统指令。该指令强调“获得波斯湾石油和保证该地区主要友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指出，“美国和伊拉克的正常关系将有利于我们的长远利益以及海湾和中东的稳定”。因此，政府“应尽力为美国公司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寻求机会”[31]。1990 年 1 月，老布什不顾国会反对，签署一项总统指令，批准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伊拉克提供一笔 2 亿美元贷款。假如没有 1989 年 8 月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丑闻[32]和萨达姆对以色列进行的威胁[33]，这些措施将为巨大的资金流和军事援助打开大门，并将为有意积极参与被伊朗轰炸所摧毁的伊拉克城市重建工作的美国大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在此前十年中，尽管华盛顿对萨达姆所施行的暴政了如指掌，但伊拉克却取代了伊朗，成为美国在波斯湾的两个战略支柱之一。以色列自 1980 年以来一直将伊拉克视为死敌，它不仅轰炸了奥西拉克核反应堆，还在 1988 年结束的两伊战争中肆无忌惮地支持伊朗。1989 年，负

责中东以及包括埃及、肯尼亚和巴基斯坦在内地区军事活动的美国中央指挥部预测，在结束与伊朗战争以及苏联衰落后，伊拉克将成为美国在中东利益的主要威胁，尤其是因为其军事实力的增强。

美国对外政策的双重性远不止众议院委员会所举出的各种例子。该委员会指出，“‘伊朗门’事件体现了普遍不诚实和非同寻常保密的特点”。非法向伊朗出售武器的相当一部分利润进入了项目执行者的个人账户。[34]尽管有诸多不利于里根的证据，但即便是由民主党成员担任主席的国会两党委员会，依然做出了不再进行深入调查的决定。否则，处于第二任期中期的他，遭弹劾会在所难免。掩盖真相既是为了维护“政府尊严”和美国形象，也是屈从于来自各方的压力，包括来自以色列方面，如美国和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院外活动。该机构从摩萨德储备基金中为政治人物提取资金，这些政治人物包括两党委员会成员中的民主党人。[35]共和党在众议院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特别调查委员会代表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的帮助下，走漏了调查结果。不只是里根，就连布什也被彻底免责。80年代末，在美国公共电视公司《前线》节目中，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主席汉密尔顿称，他认为再启动一次弹劾程序“对国家不利”，与其把会带来诸多麻烦的类似“水门事件”的案子公之于众，还不如让公众蒙在鼓里。但由参议员约翰·克利（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担任主席的毒品、恐怖主义和国际行动特别委员会则极力要求深入调查毒品交易和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支持。1988年，他得出结论称，包括中央情报局成员在内的许多人卷入了这一行动，他们通过商业信贷国际银行参与了毒品交易，该银行被毒贩和军火商用来洗钱。[36]克利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国务院为了支持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等国的反政府武装活动，把国会批准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基金交给了贩毒分子。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资深的政策制定者也摆脱不了贩毒资金是解决反政府武装‘资金问题’最佳方案的想法”。1981年11月，在国会批准出售空中预警和控制系统后，后来成为沙特国王的法赫德亲王对与商业信贷国际银行关系密切的银行家塞缪尔·巴米额（Samuel Bamieh）表示：“我们会帮助你们的人去打击共产主义运动。”事实上，两年后，沙特当局在得到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的首肯后，请巴米额筹集资金，用以支持正在与安哥拉政府作战的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游击队员的训练。[37]

由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Lawrence E. Walsh）领导的“独立委员会”则继续自己的调查。该委员会认为，里根政府的所作所为违反《武器出口控制法》和禁止向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的《博兰修正案》。

虽然里根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们声称不了解事件，但这从任何意义上都难以“洗脱他们暗中支持向伊朗出售武器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行动中的责任”。他证实，通过以色列与伊朗进行交易，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行动，是在总统里根、副总统布什、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长温伯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麦克法兰和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M. Poindexter）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所有人中，只有温伯格和舒尔茨对这一决定持有异议。检察官沃尔什的结论是：“里根总统的行为近乎犯罪，可以被成功起诉。”他强调，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及其下属制定了一个策略，使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斯成为替罪羊，以便保全里根余下两年的任期。他揭露说：

>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诺斯等人，在绝对秘密状态下工作，运作中不设账户。他们参与了明显的犯罪行动，包括从向伊朗出售武器中获利，把其中一些资金转移，用于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他们销毁文件并向国会撒谎，以掩盖其犯罪行动。[38]

1986年12月，检察官沃尔什对14人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11人接受审判，其中2人通过上诉得以幸免，2人在审判前就被赦免。另一桩起诉因1989年接替里根的老布什政府拒绝解密审判所必需信息而被中止。诺斯于1988年3月16日被判犯有16项罪行。

1989年，曾作为里根政治助理在白宫工作2年的芭芭拉·霍尼格发表了《十月惊奇》一书。她在书中揭露了1980年选举活动中所有的背叛、讹诈和破坏活动，包括为了把伊朗学生扣押的美国大使馆人质释放时间推延至选举后，老布什亲自参与和伊朗谈判的过程。1991年，加里·斯克就同一内容出版了一本同名书，他在书中描述了谈判过程。尽管他认为老布什作为里根班子副总统候选人，没有太多理由在选举关键时期冒“这一极端风险”[39]，但事实是，老布什未能在司法程序中证明揭露此事的中央情报局成员理查德·布兰尼克（Richard Brenneke）是在撒谎[40]，因诽谤罪而遭起诉的布兰尼克被判无罪。飞行员冈瑟·鲁斯巴切（Gunther Karl Russbacher）上尉证实了老布什的巴黎之行。老布什很可能到过巴黎，因为，伊朗领导人要求未来美国政府最高层中的某人做出承诺。1991年，众议院和参议院均开始调查“十月惊奇”案件。由托尔参议员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10月18—22日期间，老布什先生在美国。因

此，他未曾赴法国巴黎参加所谓的会晤。”但梅纳什在回忆录中证实，10月19日老布什参加了巴黎的会晤。1992年6月1日，他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起誓作证时重申了这一点。[41]

尽管有确凿证据，但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各种罪行和非法行为都被掩盖起来。作为“十月惊奇”案件和“伊朗门”事件的中心人物，中央情报局一位最权重的局长凯西，在将要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的当天上午，死于脑溢血。阿米拉姆·尼尔（Amiram Nir）在1988年11月30日发生在墨西哥的一起神秘空难中丧生。当时，他乘坐的是一架赛斯纳T210飞机。据梅纳什称，摩萨德一直认为，他是在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项行动中被处决的，为的是不让他在诺斯案件中作为证人揭露佩雷斯与里根、老布什之间达成的协议。[42]诺斯担当了“超级明星和替罪羊”的角色[43]，在经历了12个月的审讯后，他于1989年5月4日被判刑。被指控犯有7项罪名的波因德克斯特，于1990年4月7日被判刑，其罪名为妨碍调查、作假证、毁灭罪证。但他们中没有任何人服刑，所有人都通过上诉免予刑事处罚。曾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并在该机构内部深受拥戴的老布什此时已成为美国总统（1989—1993年）。老布什在接替里根出任总统后不久，就任命托尔担任国防部长，作为对其替自己摆脱前往巴黎与伊朗人进行过谈判指控的回报。但国会没有批准这项任命，原因是托尔与许多承包商和供货企业有利益关系。1992年12月24日，离卸任不足一个月，老布什赦免了里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前国务卿埃里奥特·阿伯拉姆斯（Elliott Abrams）、中央情报局成员艾伦·菲尔斯（Alan D. Fiers）、克莱尔·乔治（Clair E. George）、杜安·克拉里奇（Duane R. Claridge）以及因在国会撒谎而即将受审的前国防部长温伯格。[44]这又是一次掩盖行动，它由白宫的两任政府策划，其目的是掩盖总统和副总统的违法行为，保存“政府尊严”和美国形象，使违宪者逃脱法律制裁。

“伊朗门”丑闻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试图推翻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丑恶行径。自1914年8月巴拿马运河开通后，尼加拉瓜就被视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在该国推翻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莫查（Anastácio Somoza）的革命取得胜利六个月后，美国就开始了这一努力。在对外政策上摇摆不定的卡特，在其任内签署了一份绝密总统指令，批准中央情报局向桑地诺的反对派提供政治支持，并提供资金，用以维持《新闻报》的发行。此后，美国又向尼加拉瓜提供了3 90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以购买食品。但中央情报局发现，桑地诺政府仍在支持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1977年卡洛斯·罗梅罗当选萨尔瓦多总统后，该国暴力冲

突持续上升。1979 年，罗梅罗被一个军人集团罢免。于是，卡特不再向尼加拉瓜提供帮助。里根不仅维持了该做法，把任何援助与恢复民主挂钩[45]，而且还在阿根廷军政府的协助下，扩大了对中美洲的干涉。里根尚未上台时，阿根廷“肮脏战争”专家就与反对桑地诺的抵抗组织联手，在洪都拉斯北部和尼加拉瓜交界处训练了 1 000 名反政府武装分子。1978—1980 年间，被视为稳定国家的洪都拉斯，从美国得到了 1.279 亿美元的援助，这一数额高于任何其他中美洲国家从美国得到的支持。在之后数年中，它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最主要军事训练场所及反对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革命的战略基地。[46]这些行动与美国自越战结束以来所采取的战略相吻合，其核心是“低强度冲突”，包括反暴乱、支持暴乱、反恐怖袭击、缉毒和营救人质等低于常规战争水平的行动。新的军事方针要求美国能够快速调遣军队，并通过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应对世界任何地区出现的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所推行的“肮脏战争”中，阿根廷和美国的合作在国际上造成了极为强烈的影响。阿根廷在训练反桑地诺游击队中所提供的合作，一直持续到 1982 年马尔维纳斯战争结束，那场战争以阿根廷的失败而告终。鉴于巴西心照不宣地协同苏联和古巴支持西非左翼政府，特别是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等国政府，它在当地的影响力不断上升。里根政府于是就竭力阻止巴西扩大和增强其在南大西洋的战略地位，并采取行动破坏 1979 年巴西与阿根廷达成的协议。出任国务卿短短数月，黑格将军就中止了卡特以违反人权为由对阿根廷采取的包括武器禁运在内的制裁，并邀请它参与西奈和平部队。黑格在担任国务卿之前，是军工企业联合技术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981 年至 1982 年年初，美国加强了拉拢阿根廷军人的工作。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Walters）作为里根总统特使，数次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得到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大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罗杰·方丹（Roger Fontaine）的支持。[47]沃尔特斯的使命是向阿根廷军政府施加影响，促使其改变对外政策方针，同时向其推销武器。1978—1982 年间，阿根廷约斥资 167 亿美元用于购买军火，包括从英国购买武器装备[48]，这一金额几乎为阿根廷外债的一半。沃尔特斯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另一目的是，为美国军工集团联合技术公司招揽生意。黑格当时依然与该公司有利益关系。[49]

美国的行动收到了效果。1981 年年底，军政府因未能迫使罗伯特·维奥拉（Roberto Viola）将军辞去总统职务而将其推翻，由莱奥波尔多·加

尔铁里（Leopoldo F. Galtieri）将军取而代之。沃尔特斯将军发挥了关键作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理查德·桑顿（Richard C. Thornton）指出，他“自始至终在后台扮演着重要角色”[50]。维奥拉开启的有限政治开放告终，加尔铁里将军重新确立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方针。同时，他使阿根廷无条件与美国保持一致。从那时起，武器采购迅速集中于联合技术公司的沃尔特斯和黑格将军所代表的美国供应商。[51]军政府认为，阿根廷可以利用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成为美国战略方针的中介。正因为如此，它启动了美国国务院曾提议的建立包括南非在内的南大西洋政治军事同盟的方案，密切配合里根政府的中美洲政策，派遣反暴动顾问和情报人员前往训练萨尔瓦多军队，打击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并参与反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的秘密行动。[52]阿根廷军政府从这一亲密关系中隐约感觉到，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争端中，美国所希望的是一个对阿根廷有利的解决方案。因为在维持现状情况下，英国不可能同意美国在该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53]美国自二战以来就有意在那里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在麦哲伦海峡边缘的帕塔戈尼亚建立另一个基地，使两个基地遥相呼应，以加强南大西洋的防御体系，促进美洲大陆安全一体化，这样就能应对和遏制苏联的扩张。[54]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可作为控制合恩角周围地区的一个前哨，在那里设立的美军基地将成为南大西洋的一个要塞。这样，美国就能稽查来自东方的石油运输船，并打消巴西对南极的任何企图。[55]地质勘探还显示，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附近海底拥有一个很大的油层。里根的一些助理提议双方就开采权进行谈判，以解决争端。[56]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美国对该群岛同样感兴趣。里根政府或多或少让加尔铁里将军为首的军政府相信，一旦阿根廷入侵马尔维纳斯（福克兰），华盛顿将会向它提供帮助或至少保持中立。[57]加尔铁里将军认为，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和作为对阿根廷在中美洲提供帮助的回报，将会阻止英国的武力反击使英国仅限于口头抗议。里根总统在回忆录中证实了加尔铁里的以下想象：

> 我们会站在阿根廷一边，因为我们是美洲的邻居，而且我们还要求军政府支持我们在西半球打击共产主义。我确实把发展与拉美邻居的关系放在优先位置，而阿根廷是我们极力想要推进民主改革的国家之一。[58]

国务卿黑格也认为，不存在任何误解或误判的基础。“种种迹象表明，

阿根廷人相信美国将容忍他们的侵略行为。”[59]但他指出，事实上，加尔铁里将军曾向哈里·施劳德曼（Harry W. Schlaudeman）大使提出，作为阿根廷在南半球支持美国的一个交换条件，华盛顿应同意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的入侵。[60]据了解，沃尔特斯将军、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柯克帕特里克大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方丹都就这一可能作了暗示。他们均为里根的亲信。于是，加尔铁里认为他得到了入侵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的授权。1982 年 4 月 2 日，阿根廷军队在那里登陆，并于次日攻占南乔治岛。但与军政府的判断相反，英国立即做出反应，一支舰队被派往南大西洋。

阿根廷入侵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的冒险行动得到华盛顿的某种支持，这一点从来没有疑问，至少得到里根政府某些部门的支持。里根本人在回忆录中提及了柯克帕特里克对他支持英国决定的“某种抗拒”。[61]根据黑格的叙述，柯克帕特里克大使对美国以国际法为依据谴责阿根廷并支持英国立场表示“强烈”反对[62]，他向里根表示，这一立场会让美国付出“在拉美受到一百年敌视”[63]的代价。黑格认为，中央情报局和阿根廷人在为中美洲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方面的秘密协作是一个难题，他担心布宜诺斯艾利斯军政府实施报复，中止与美国在打击桑地诺政权中的合作。尽管如此，里根和凯西依然选择了支持英国首相马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h Tatcher）。[64]在和平解决争端的调停行动失败后，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公开支持英国，向其提供为收复马尔维纳斯（福克兰）军事行动所需的各种后勤支持。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比起以《里约热内卢条约》著称的《美洲互助条约》更为强烈和重要。然而，即使在里根确定政策后，柯克帕特里克依然对阿根廷驻联合国大使表示，如果他的国家继续支持美国在尼加拉瓜的行动，“美国就不会在联合国谴责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的登陆行动”[65]。不管如何，阿根廷输掉了战争。6 月 14 日，也就是在入侵行动的两个半月后，阿军缴械投降。难以掩饰仇恨的阿根廷军人所能做的只有咬牙切齿。加尔铁里这位被黑格形容为“一个穿着灰色制服的滑稽独裁者”[66]则公开宣称，对“华盛顿的背叛”感到“意外”。[67]

不久，南美洲发生了另一场严重危机，里根企图干涉位于巴西北面的苏里南。他签署了一项总统指令，并为向帕拉马利博派遣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小组筹集了大笔资金，该小组的任务是为发动以推翻德西·鲍特瑟（Desi Bouterse）总统为目的的政变搜集情报，因为鲍特瑟正在把这一仅有 35 万人口的国家推向古巴轨道。[68]1982 年 12 月，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将这一行动计划告知了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但在国会遇到了巨大阻力，

甚至连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也愤怒地宣称："这是我一生中听说过的最愚蠢的主意。"[69]对苏里南的入侵时间定于1983年7月1日，由来自美国等国的雇佣兵负责实施。但参议员们拒绝支持这一计划。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不仅拒绝提供一个伞兵旅配合美军士兵占领帕拉马利博机场，还明确表示反对干涉苏里南。虽然他不希望边境上存在一个左翼政权，但他更不愿意看到美国在南美洲展开军事行动，并涉足亚马逊地区。[70]于是，他承担了和平解决问题的责任。1983年10月，在得到古巴援助并被视为共产党政权的格林纳达，总理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遇害，一个由伯纳德·科尔德（Bernard Coard）领导的更激进派别"新宝石运动"接管了政权。里根于是决定入侵格林纳达。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炫耀武力，以克服所谓的"后越南症"，也就是国会大部分议员因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而拒绝支持对任何国家实施军事干涉。他命令正在驶往黎巴嫩的"独立号"航空母舰返回加勒比。10月25日的最初几个小时中，由"关岛号"搭载的以"愤怒的公牛"著称的海洋中型直升机中队（HMM-261）和第22海上两栖作战部队空中作战支队联合实施了"紧急狂暴行动"，也就是入侵那个仅有120平方英里领土和11万人口的加勒比小岛。这一荒唐的战争是里根发动的一次单边行动，它使18名美国人、110名格林纳达人和80名古巴人丧生[71]，其主要目的是炫耀武力，抹去越战失败的记忆，同时向世人表明，在美国后院，任何左翼政府都不会被容忍。里根认为，如果在萨尔瓦多发生卡特执政时期的尼加拉瓜革命这样的事件，让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上台，那将是一件不可宽恕的事情。

【注解】

[1] Ben-Menasche，1992，pp. 170-171.

[2] Unger，2004，pp. 79-80 Darwish & Alexander，1991，pp. 20-25.

[3] Yergin，1993，pp. 420-423，554，608 e 677.

[4] Darwish & Alexander，1991，pp. 20-25.

[5] Id.，ibid.，pp. 25-26，203.

[6] Kissinger，1982，pp. 669 e 674.

[7] 1980年，伊拉克什叶派在伊朗革命影响下试图暗杀政府官员。萨达姆做出回击，他下令将什叶派军人流放到伊朗，并处决了反对派领导人。

[8] Darwish & Alexander，1991，p. 105.

[9] Department of State. AM：0830735-0522. Page 01—Baghdad 03079 1010582. Info Oct-00 A05-00 550-00（AS-01 CIAE-00 NSCE-00）/025w. Confidential. Baghdad

3079. EXDIS. For Amb Rumsfeld from Eagleton. Ed 12356 DECL. OADR. Tags: OVIP (Rumsfeld, Don) Prel. Subj: Rumsfeld Visit do Iraq. Ref Baghdad 3074 (No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0] Departament of State. Telegram. Secret AN: 0830753-0374. Department Pass s/SN—Tom Miller E. -0. 12356: Decl: 12/21/13 Tags: Prel, IQ, US, XF. Subject Rumsfeld Mission: December 20 Meeting with Iraqi. Saddam Hussein. Ibid.

[11] Ibid.

[12]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Cable from Charles H. Price II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umsfeld One-on-One Meeting with Iraqi Deputy Prime Minister," December 21, 1983. Ibid.

[13] Department of State. Telegram. AN: 0840762-0936. State 352124. Origin SS-25—Info Oct-00 Copy-01 ADS-00 550-00 /026 R. From SecState WashDC—To AMEMBASSY Baghdad Immediate—Info Gulf War Collective Immediate. E. O. 12356: Decl: OADR-TAGS: Prel. U. S., 12. Subject: Memcon: Secretary's Meeting with Iraqi Deprimmin Tariq Aziz, November 16, 1984, 10:00 a. m. Ibid.

[14] 国务院内部备忘录只是这样评论："抛开人权和化学武器使用，在很多方面，我们与伊拉克有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Overview of U. S. -Iraq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ressure Points", p. 1, apud Power, 2002, p. 221.

[15] Kimche, 1991, p. 194.

[16] U. S. Departa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 C. 20520—1983, Nov—1 P5 : 23. Information Memorandu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PM—Jonathan T. Howe. Subject: Iraq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Department of State. 8335709. Nov—21—1983 . Action Memorandum. To Lawrence S. Ragleburger; From: PM—Jonathan T. Howe; NEA—Richard W. Murphy. Subject: Iraqi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Issue for decision: Whether to instruct USINT Baghdad to raise issue of Iraqui CW use and urge cessation.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ttp://www2. gwu. edu/~nsarchiv/.

[17] 亚喀巴是约旦通向红海的唯一港口。它继续被当作伊拉克物资的储存库。这一港口至少自公元前1000年就存在，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之间的一个贸易点，后来落入罗马人手中。罗马人在图拉真（Trajano）皇帝时期建立了一条连接大马士革和埃及的公路。1115年，十字军占领亚喀巴并在那里修筑了工事。1187年，萨拉丁·阿尤比（1138—1193）苏丹收复了亚喀巴。19世纪，该城市成为通往圣地麦加的一个重要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的劳伦斯"替同盟国占领了亚喀巴，后成为汉志省的一部分。1924年被转让给外约旦。

[18] 副总统乔治·布什的小弟。

[19] Ben-Menasche, 1992, pp. 172-173. UNger, 2004, pp. 76-78.

[20] Darwish & Alexander, 1991, p. 153.

[21] Id., ibid., p. 153.

[22] Power, 2002, pp. 176-177.

[23]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Nov. 26, 1983.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114. U. S. Policy Toward Iran-Iraq War. Ibid.

[24] Dickey, Christopher & Thomas, Evan. "How Saddam Happened". *Newsweek*, September 17, 2002.

[25] Power, 2002, p. 178.

[26] Tyler, Patrick E. "Officers Say U. S. Aided Iraq in War Despite Use of Gas". *The New York Times*, 18/8/2002.

[27] Blum, 2001, pp. 112-123.

[28] Tirman, 1997, p. 111.

[29] Id., ibid., p. 168.

[30] Apud Power, 2002, p. 234.

[31] Id., ibid., p. 234. Tirman, 1997, p. 171.

[32] 1988—1989 年，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不久，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通过设在亚特兰大的分行向伊拉克汇递了 21.6 亿美元。1989 年 11 月，根据美国农业部信贷和商品公司的计划，白宫官员为用于向美国购买粮食而向伊拉克提供的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假如伊拉克难以偿还获得的贷款，美国纳税人将向银行赔偿提供给伊拉克的款项。这些贷款为伊拉克提供了入侵科威特的经济保障，部分款项被用于购买袭击库尔德城市的毒气。该交易是通过卡当工业有限公司（Cardoen Industries）进行的。这家中央情报局在智利设立的门面公司向萨达姆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国民劳动银行也向伊拉克发出了约2 500个信用证，总金额约为 8 亿美元。由于伊拉克有 8.5 亿美元未支付，国民劳动银行向美国联邦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向其支付超过 4.5 亿美元的费用。但直到 1995 年，美国政府才同意支付 4 亿美元以了结此事。

[33] Id., ibid., p. 171.

[34]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with Minority Views*, p. 23.

[35] Ben-Menasche, 1992, pp. 118-119.

[36] 巴林首相哈利法·阿勒哈利法（Khalifah Bin-Sulman al-Khalifah）是商业信贷国际银行的最大投资者。该银行用来自中东石油生意的美元作为获得影响力的手段。它被贩毒分子和军火商用来洗钱。该银行通过卡马尔·阿德罕姆（Kamal Adham）购入了第一美国银行。在克里委员会关于商业信贷国际银行的报告中，卡马尔·阿德罕姆被指为"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1979 年期间中央情报局在整个中东的主要联络人"。在乔治·布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他在沙特负责情报工作。沙特的阿卜杜勒·巴赫什也是商业信贷国际银行的投资人。他还拥有哈肯能源公司 16%的股份。生于芝加哥的巴勒斯坦人塔拉特·奥斯曼（Talat Othman）是他在该公司的代表。此人曾与乔治·沃克·布什一起担任公司领导。奥斯曼曾至少三次造访白宫与乔治·布什讨论中东问题。

[37] *The BCCI Affair. A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by Senator John Kerry and Senator Hank Brown. December 1992 102nd

Congress 2nd Session Senate Print, pp. 102-140.

[38]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with Minority Views*, p. 23.

[39] Sick, 1991, p. 223.

[40] Id., ibid., p. 224.

[41] Ben-Menashe, 1992, pp. 68-74, 343-345.

[42] Ben-Menashe, 1992, pp. 288-291. Thomas, 1999, pp. 329-335.

[43] Walsh, 1997, p. 23.

[44]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拥有赦免的绝对权力，其决定不能被更改。共和国初期，为了让某人在案件审理中作证，有过一些审判前对其做出赦免决定的情况。但从来没有为了阻止尴尬之事在审理中被公之于众而给予赦免的情况，而只会在被告接受审判后才将其赦免。从来没有像前国防部长温伯格这样在审判前就被赦免的先例。Walsh, 1997, pp. 507-531.

[45] Woodward, 1987, p. 131.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with Minority Views*, pp. 37-38.

[46] Gerson & Birchard (eds.), 1991, pp. 311-318.

[47] Roett, Riordan & Wiegand, Gunnar. "The Role of Argentina and Brazil—A View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AIS, Center of Brazilian Studies,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pp. 2 - 3. Cardoso, R. Kirschbaum, & Van Der Kooy, 1983, pp. 22-27.

[48] Thornton, 1998, p. xv. "随着阿根廷与智利冲突的升温，武器销售商与阿根廷做成了大笔生意，并在此后几年中一直不断。但战争并没有爆发。" Garcia Lupo, 1983, p. 124.

[49] Id., ibid., pp. 113-124.

[50] Thornton, 1998, p. 62. 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助理的沃尔特斯将军在担任美国驻巴西武官期间曾协调 1964 年推翻古拉特总统的军事政变。

[51] Garcia Lupo, 1983, p. 124.

[52] Id., ibid., pp. 180-183.

[53] Id., ibid., pp. 10, 43, 51 e 53.

[54] Carlos, Newton. "Definindo o Papel dos Estados Unidos na crise", in *Folha de S. Paulo*, São Paulo, 7/5/1982, p. 8. 关于美国二战后一直想在巴塔哥尼亚建立基地的企图，参阅 Scenna, 1970, p. 231. Peterson, 1970, p. 562。

[55] 巴西外交部前外交政策司长阿尔瓦罗·苏亚雷斯（Álvaro Teixeira Soares）大使的观点。*OGlobo*, 14/5/1982. 有关马尔维纳斯战争的更多细节，可参阅 Moniz Bandeira, 2003, p. 30。

[56] Haig, 1984, p. 268.

[57] Thornton, 1998, p. xx.

[58] Reagan, 1990, p. 358.

[59] Haig，1984，p. 296.

[60] Id.，ibid.，p. 275.

[61] Reagan，1990，p. 358.

[62] Haig，1984，p. 275.

[63] Id.，ibid.，pp. 268-269.

[64] Ledeen，1988，pp. 28-29.

[65] Haig，1984，p. 269.

[66] Id.，ibid.，p. 266.

[67] Garcia Lupo，1983，p. 71.

[68] Woodward，1987，p. 283.

[69] Id.，ibid.，pp. 283-284.

[70] SNI前局长（1979—1985年）奥克塔维奥·梅代罗斯（Octavio Aguiar de Medeiros）的证词（in *Veja*，São Paulo）。更多细节，可参阅Moniz Bandeira，2003，pp. 458-459。美国作家威廉·布卢姆（William Blum）称，由于准备工作被荷兰情报部门发现，致使行动被取消。苏里南原为荷兰殖民地。Blum，2001，p. 152.

[71] Musicant，1990，p. 389.

第二十四章

里根“邪恶帝国” 对军国主义的支持 伊朗的威胁和对萨达姆的支持 美国犹太族群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 中东反美情绪 利比亚问题 支持恐怖主义的美国 苏联的解体 中国的经济改革

除了极力推翻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阻止游击队在萨尔瓦多扩张，里根还竭力加剧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将其称为“邪恶帝国”[1]、“现代世界的恶鸟”，并以发动核战争相威胁。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 年）使世界局势变得十分严峻，石油价格从 1974 年的每桶 9.8 美元升至 1979 年的 17.3 美元，1982 年更攀升至 33.6 美元。1980—1982 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年平均通胀率已高达 10.5%，但经济增长率却从 1979 年的 3.3% 降至 1980—1981 年的 1.2%。在美国出现明显衰退的 1982 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0.5%。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一样，里根也将自己视为右翼激进分子。为了把资金吸引到美国，作为保守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里根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他决定大幅提高利率。这一政策使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国家，尤其是债台高筑的拉美国家受到损害。1982 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外债危机使所有发展中国家均受影响，甚至殃及波兰和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与此同时，里根却在询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挥官们，美国需要哪些新式武器才能保持对敌人的军事优势？他表示，假如需要在国家安全风险和预算赤字两者间做出选择，他宁愿选择预算赤字。[2]

在这样一个试图重启冷战的背景下，里根政府（里根本人既不熟悉国际问题，也不重视对外政策细节）[3]重新把目光转向中东和中亚。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就在那里进行军事准备，以便行使霸权，并构建一个能应对广泛威胁的战略。华盛顿最关心的是保卫石油产区，使其免遭伊斯兰

原教旨民族主义扩张的威胁。伊朗出现的原教旨主义使美国在该地区失去了一个战略支柱（另一个是以色列），并使利比亚的孤立状态几乎不复存在。伊朗已成为美国中东利益的主要威胁。正因为如此，尽管萨达姆被视为激进分子[4]，里根政府起初仍向其提供支持。美国把萨达姆视为激进分子的理由是，在艾哈迈德·巴克尔将军发动革命，使阿拉伯社会复兴党走上执政舞台约 4 年后，萨达姆把伊拉克石油收归了国有（1972 年）。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投入约 10 亿美元，用于实施一个计划，以便美军能使用遍布北非、中东和东南亚 12 个国家的军事设施和波斯湾附近的 7 个机场。这样，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南 1 900 英里印度洋中的迭戈加西亚岛上的海军基地就能发挥支持作用。这一军事准备于 1986 年完成，一个空军和海军基地网络被建立起来，增强了美国在中东的干预能力。[5]但此时其战略出发点已发生改变，不再是应对苏联可能发动的针对伊朗和波斯湾其他国家的侵略，保卫这些国家的油田，而是抵御民族主义的伊斯兰伊朗对美国的阿拉伯盟国如沙特、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卡特尔和巴林的威胁。国务院、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和华盛顿其他机构所宣扬的“国际恐怖主义”理论已把重点转向利比亚、叙利亚、南也门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6]

美国为了应对中东的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威胁，制定了一个基于“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战略，并于 1981 年组建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其成员国为美国在波斯湾的盟友。组建海湾合作委员会是为了建立一个广阔的一体化空中防御体系。1983 年，以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和阿曼部队为基础，组建了海湾快速反应部队。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获得了位于波斯湾附近、阿曼东岸的玛斯拉岛的使用权，这一基地得到其他设在伯贝拉、蒙巴萨和埃及东南部的巴纳斯基地的支持。美国的军费开支从 1980 年的 1 439 亿美元增加到 1985 年的 2 582 亿美元。在里根政府军备达到巅峰的 1986 年，军费高达 2 730 亿美元，按定值美元计算，比 1980 年增加 48%。[7]

同时，里根继续奉行卡特政府时期布热津斯基制定的以建立一个“绿色地带”为目的的政策，也就是一个始于阿富汗的伊斯兰地带，以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在巴基斯坦和沙特协助下，继续发动中东各地的原教旨主义派别前往阿富汗抗击“没有宗教信仰的共产党人”，并通过煽动穆斯林占主导的中亚共和国的暴动，在苏联国内制造不稳定。然而，由于宗教原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资本主义文明相抵触，穆斯林始终把资本主义的习俗和产品看作与《古兰经》道德准则相违背的罪孽，这是他们不满并抗拒美国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美国是以色列在中东的最主要支持者。

自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并引发能源危机后，美国意识到必须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便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包括保护石油资源和阻止苏联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但在穆斯林看来，最大威胁并非苏联，而是以色列。美国始终希望以色列在军事上保持对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优势。种种迹象表明，华盛顿意识到，与以色列保持密切关系影响它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一定程度战略协作的努力，即便是沙特这样的温和国家。但美国无法割断或损害这一关系，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份军事资产，也是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的犹太族群除了是强大的选举力量，还控制着相当一部分经济、金融，乃至行政体系。20世纪70年代，尽管600万犹太人只占美国人口的3%，但其质的影响相当大。美国外交官戴维·内斯（David Nes）认为，爱德华·肯尼迪可能是一个例外，但民主党任何其他政治人物都接受犹太族群的竞选资金，而且其捐赠均超过总资金的50%。[8]在1970年选举中，犹太人向民主党捐了6 400万美元。[9]但后来他们意识到，共和党能更好地服务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总之，美国和以色列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埃及总统萨达特曾表示，“美国政客竞相取悦以色列的方式显得十分滑稽，或许是灾难性的”[10]。

反美情绪成为中东的决定性政治因素，甚至连埃及、沙特和阿曼这样的国家也担心，公开与美国建立更密切关系会激怒穆斯林民众。与发生什叶派革命的伊朗一样，反美情绪同样也在利比亚表现出来。1969年9月1日，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Qathafi）上校推翻了穆罕默德·赛努西（Muhammad al-Saousi）国王，试图建立所谓的“群众国家”，即一种基于人民权力的“既无替代，也无代表机构”的直接民主。[11]他认为，政党是“当代独裁的统治工具”[12]。卡扎菲在《绿皮书》中声称，“由一党统治的社会，从任何意义上看，都和由一个部落或教派支配的社会相似，因为党仅仅是社会某一个群体的观念、利益、意识形态和根源的表现”[13]。以迦玛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1918—1970）为榜样的卡扎菲，既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14]。他将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相融合，提出了所谓的“世界第三理论”。他自1970年起推行石油公司和银行国有化，并为世界各地的反叛运动和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这使得利比亚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对立，利比亚于是就成了美国仇视的目标。

1981年5月6日，执掌美国政府才几个月的里根，根据情报机构报告，关闭了利比亚驻华盛顿大使馆，将其外交官驱逐出境。根据所获情

报，卡扎菲有暗杀美国驻罗马和巴黎外交官的计划。国务卿黑格将军认为，卡扎菲正在用苏联提供的武器和炸药武装一个“左翼杀手国际阴谋”，并借助其军事实力威胁乍得和苏丹。[15]此后不久，里根下令美国海军战机挑衅性地飞越“死亡线”（卡扎菲把利比亚领海延伸到100海里外）[16]，利比亚空军两架苏-22飞机在离海岸60海里的苏尔特湾被击落。几乎在同一时期，利比亚发生了第三次推翻卡扎菲的行动，这一很可能得到中央情报局和法国情报机构支持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同年10月6日，在一次阅兵中，一名“贾马特圣战组织”[17]的埃及原教旨主义军人杀害了萨达特。[18]作为首位与以色列和谈的阿拉伯领导人，萨达特于1978年在戴维营与以色列签署协议，他还允许美国自由使用在巴纳斯、基纳和西开罗的军事基地。[19]比起共产主义，萨达特更害怕原教旨主义。

到那时为止，恐怖主义呈现为一个由每个国家内在条件所引发的国内现象。1969年，美国“大学生民主会”的一个持不同政见派别组建了“地下气象员”组织，其成员均是对国会山、五角大楼、警察大楼和监狱等目标实施过袭击行动的左翼激进分子。1974—1977年，波多黎各发生的49起炸弹爆炸案被归咎于民族解放军（FALN）。那里还活跃着博里库阿人民军，它在本岛和美国大陆发动了多起恐怖袭击。针对美国人最严重的恐怖行动发生在美国本土。1975年12月，一颗炸弹在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爆炸，炸死11人，另有58人受伤。1981年5月16日，一颗炸弹在肯尼迪机场泛美航空公司航站楼爆炸。这一恐怖活动被归咎于波多黎各民族解放军。

除劫持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人员（1979年）和同年发生的劫持朝拜麦加大清真寺信徒事件（法国和沙特部队的营救行动导致250人死亡、600人受伤）外，在德国也发生了两起恐怖事件。当地恐怖组织“赤军旅”在拉姆斯泰因美国空军基地停车场引爆了一枚炸弹，致使20人受伤。恐怖分子还向美军驻德国司令弗雷德·克罗森（Fred Kroesen）将军乘坐的汽车发射了一枚火箭弹，但暗杀未能得逞。不久，黑格将军指责苏联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并宣称，在美国议程中，打击这种活动将取代对人权的促进和捍卫（在卡特时期，保护人权被置于优先位置）。1982年4月10日，里根签署国家安全决策第30号指令，建立了协调和监督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工作组。[20]

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清晰地表明，黑格夸大了苏联的作用。事实上，苏联并没有鼓励恐怖主义，它反对自己训练的组织杀害无辜，也不支持和帮助个体恐怖主义者。[21]报告指出，苏联对那些为民族自由而战的组

织与“阿布·尼达尔”、“红色旅”和“赤军旅”这类从事纯粹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加以区分。但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对报告内容感到不满意。国防情报局于是向他提交了另一份评估报告，并在此基础上拟订了两个机构均能接受的妥协性报告《苏联在革命暴力中的作用》。该文件认为，苏联在世界各地极力支持“革命暴力”，其目的是削弱“友好社会，动摇敌对政权，促进苏维埃利益”，它对所使用策略是否属恐怖主义毫无顾忌。[22]

然而，打击恐怖主义并不仅仅与美国在欧洲的公民和军事设施可能遭受的袭击有关，美国最担忧的是对中东石油产地的威胁。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指责该地区一些国家支持恐怖主义，而将恐怖主义组织放到次要位置。1984 年 4 月 3 日，里根签署国家安全决策第 138 号指令——《对可疑恐怖分子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根据该指令，美国将对那些可能支持或出口恐怖主义的国家实施包括军事在内的制裁。一份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文件摘要显示了该指令的一些要点：“那些实施恐怖主义和积极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将自食其果。”这一密令（从未被完全解密）是在中央情报局贝鲁特站站长威廉·巴克雷（William Buckley）被劫持（1984 年 3 月 16 日）后签署的。里根在该指令中指出，“美国将动用一切可利用的合法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行为”，而“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行动，或者这种行动的直接威胁，将被视为敌对行为”[23]。种种迹象表明，他批准了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预防性或报复性“隐蔽行动”和其他游击战类型的特殊军事行动，以打击“敌对”游击队，并对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采取破坏和空中打击行动，这些国家包括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古巴、朝鲜、尼加拉瓜和苏联。换句话说，里根批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自“邱池委员会”1975—1976 年间对中央情报局进行揭露后，这些行动已不再被允许。根据“邱池委员会”的报告，中央情报局不仅自 1970 年起在智利策划推翻阿连德总统的政变，暗杀捍卫宪法的陆军司令施奈德将军[24]，还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参与杀害特鲁希略（多米尼共和国）、卢蒙巴（刚果）、吴庭艳将军兄弟（南越），并在 1960—1965 年间对卡斯特罗实施了八次未遂谋杀行动。[25]

中央情报局在恐怖主义方面确实拥有相当多的实践经验。联邦调查局将恐怖主义定义为：

> 一种与外来力量有某种关联或其行动超出国家边界的群体或个人，为推动其政治和社会目的，针对人或财物实施的以恫吓或胁迫一个政府、民众或其局部为目的的非法武力或暴力行为。

尽管这一定义试图描述的仅仅是针对美国的恐怖行为，但它恰恰揭示了中央情报局所从事的恐怖行动的特点。作为美国的一个国家机构，它在“法外处决”和“定点清除”行动，即暗杀、爆炸、破坏、化学和生物战以及实施酷刑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其实施范围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间针对古巴的行动。普利斯顿大学名誉教授阿尔诺·迈耶（Arno Mayer）指出，自1947年起，美国就成为“实施先发制人国家恐怖活动的魁首和先驱”，其行动专门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它以隐蔽方式颠覆他国政府，暗杀政治人士，支持被很不妥当地称为“自由战士”的敢死队和恐怖分子所进行的“恶棍行动”。它永远以民主、自由和公正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对他国采取封锁、禁运、军事干涉、惩罚性空中（导弹）打击和绑架行动，加剧了各国经济和政治的紧张局势。[26]

然而，对于里根来说，仅仅批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重启“法外处决”和“定点清除”[27]这类恐怖行动来支持美国对外政策，并（或）达到镇压第三世界各国起义的目的还不够。除了重启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他还扩大了恐怖威胁的范畴，将其与贩毒、游击队和左翼政府，尤其是古巴和尼加拉瓜政府联系起来。这一结合使美国国家安全机器（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毒品管制局[28]、军事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得以把冷战重点转向打击贩毒和反恐战争，进而为维持庞大军费开支找到理由，这使得里根政府在冷战接近尾声的20世纪80年代，仍能把军费提高到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的军费和国际项目开支从1980年的1 467亿美元，提高到1987年的2 936亿美元（定值美元）。这意味着1987年里根政府的军事预算实际值高于美国任何年份的开支，包括越战最激烈时期。[29]1989财政年度，美国军费增至3 760亿美元，比冷战时期和平年份的平均值2 750亿美元高出25%。[30]里根执政期间，美国国债增加了三倍，达到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社会阶层分化加剧。[31]

为了证明有必要花费数十亿美元生产核武器、“民兵”导弹及F-16、F-111、A-10、U-2战机（间谍飞机）等武器，里根政府把目标从被视为恐怖活动直接凶手的各种组织，转向可能支持或没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1984年，国务卿舒尔茨宣称，那些支持或赞助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出于其本身的战略目的，利用和操纵这一现象，用以“动摇西方的自信，削弱其打击侵略和恫吓的决心”。这样就出现了利比亚和伊朗这类被称为“不负责任国家”的新敌人。

一些恐怖活动是由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等情报机构煽动的，这些行动具有包括宣传在内的不同政治目的。在情报部门、恐怖分子、毒贩和武器

贩子之间，始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总部设在伦敦的战略情报服务公司经理安东尼·皮尔逊（Anthony Pearson）一直通过约旦上校穆罕默德·阿卜杜勒（Muhammad Radi Abdullah），为摩萨德提供有关巴勒斯坦组织的情报。阿卜杜勒通过戴纳维斯特公司和在英国的其他毒贩，从南斯拉夫获得武器，并将其出售给“阿布·尼达尔”和其他恐怖组织。这样，他就能获得有关武器去向的情报。这些情报被交给摩萨德。摩萨德成员梅纳什在回忆录中透露，载有400名游客的“阿齐罗·劳罗号”游轮1985年10月7日被穆罕默德·阿巴斯[32]（Muhammad Abbas）和巴解组织的一个派别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成员劫持。实际上，这是以色列的一个“黑色行动”，其目的是使那些呼吁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50名巴勒斯坦人以换取人质的人难有作为。这一行动以69岁的美籍犹太人莱昂·克林霍夫（Leon Klinghoffer）遇害告终。梅纳什称：

> （……）来路不正的资金资助了情报部门在全球的“黑色行动”，这些行动包括资助以色列所掌控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他们以巴勒斯坦革命名义犯罪，而实际上他们往往不知不觉地作为以色列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实施行动。[33]

在“阿齐罗·劳罗号”被劫持后不久，发生了对以色列航空公司驻罗马和维也纳办事处的恐怖袭击（1985年12月）。另外，西柏林的拉贝尔迪斯科厅发生爆炸，有3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美国士兵，另有200余人受伤。这些暗杀行动成为美国把责任归咎于利比亚并对其实施报复的借口。美国对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轰炸（1986年4月14日）造成15人死亡，其中包括卡扎菲的小女儿。不管利比亚是否应对恐怖事件负责，但美国在此前就已准备对其发动袭击。第六舰队特遣部队的3艘航空母舰、约100架F-111战机和导弹已被部署在锡德拉湾，以执行“黄金峡谷任务”。[34]虽然里根通过袭击利比亚进行了反击，但恐怖活动仍有增无减。1985—1988年为恐怖活动的高峰期，全球平均每年发生的恐怖事件高达630起，攻击目标多为在海外的美国人。[35]仅1987年，就发生了665起。[36]就在那一年，美国的盟国伊拉克意外发射（据推测）的两枚“飞鱼”导弹击中了美国“斯塔克号”护卫舰，导致37人丧生。这让华盛顿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它不仅要防止敌人袭击其利益目标，还得警惕所谓的盟友。恐怖事件并不仅限于中东国家。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客机从伦敦飞往纽约途中，在苏格兰的洛克比上空爆炸，造成259名乘客和11名地面人员

丧生。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被归咎于利比亚情报人员巴塞特·麦格拉希（Abdul Basset al-Megrahi）的爆炸案，是对美军轰炸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报复。1989年又发生了另一起恐怖事件，法国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的一架飞机在尼日利亚上空爆炸，导致171人丧生，其中包括6名美国人。[37] 1986—1987年数量达到巅峰的恐怖事件，在里根卸任后显著降温。

以东西方对抗为特征的国际形势，正在经历自二战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共产党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执政半个多世纪后，在1989年的短短几个月内纷纷崩溃。曾是苏联组成部分的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宣布独立。同年，柏林墙被推倒，德国于1990年实现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与此同时，随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少数民族引发分裂战争，南斯拉夫发生分裂。[38]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成为独立国家，并随即得到德国政府的承认。1992年，波黑（48%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35%为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17%为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也宣布独立，但塞尔维亚和黑山通过全民投票选择了维持联邦体制。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党（前共产主义联盟）主席斯洛博丹·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成为新建立的小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塞尔维亚人加紧了巴尔干的战争行动。[39]马其顿从南斯拉夫和平分离，成为一个新的共和国。然而，老布什和国务卿贝克更关注原属苏联地区的分裂威胁。[40]

苏联的解体并非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的“历史的终结”，而是这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年）时代的终结。人们不应对苏联的解体感到吃惊。作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苏联解体从某种程度上在预料之中。托洛茨基在1935年前后就指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并不可行。他认为，苏联的经济薄弱点除过去遗留的落后，主要在于它的孤立。因为，它既无法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也不能按资本主义原则，以正常国际信贷形式，利用世界经济资源。而后者对落后国家更具决定性意义。[41]苏联经济的尖锐危机提醒人们，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无法与国家模式相适应，而只能在一种国际环境下，以社会主义形式进行协调，并达到和谐。他认为，这一危机比“儿童烦恼，或者说成长烦恼要严重得多”，它是苏联所依附的并与之密不可分的国际市场的“严重警告”。[42]按照托洛茨基的预计，如果不发生一场政治革命，在苏联建立充分自由的工会和政党的民主，那么，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将不可避免。富裕阶层产生的条件已经建立，官僚、技术人员和共产党领导人

将为他们提供服务。[43]

尽管二战对苏联造成了极大破坏，但从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它的困难，使它得以把东欧国家纳入其经济体系，并作为政治和军事强国，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进而开始建设消费型社会。[44]斯大林的目的并非推广社会主义，而是要让苏联控制波兰和巴尔干国家，以便通过1939年与希特勒达成的协议，重新确立其边界和战略地位，建立一个防御和安全体系。其指导方针并非任何革命和国际主义的考虑，而是苏联所代表的大俄罗斯民族利益。苏联并没有考虑德国无产阶级同样遭受了战争的可怕影响，而只表现出极大的民族自私，其贪婪程度超过了美国和英国。率先进入柏林的苏联红军，迅速对德国工厂进行掠夺。1945年7月12日，当美军和英军抵达柏林时，红军已把柏林工厂中至少50%的重型设备搬走。[45]拥有8 500名工人的德国电气公司和亨尼希多夫公司98%的生产设备被苏联拆走。苏联不仅洗劫了生产雷达等设备的莱茵金属-波斯格工厂，还从飞机发动机生产公司戴姆斯勒-奔驰搬走了400台机器以及打字机和电话机等设备。[46]仅在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中，即1945年5—6月，柏林约460家企业的设备被拆卸并转移到苏联。[47]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在与丘吉尔和杜鲁门谈判时，大部分时间被用于向包括英美占领区在内的德国提出赔偿要求。

1949年，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一起，创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民主德国于1950年成为其成员。蒙古、越南和古巴后来也加入了该组织。[48]这些国家建立了一个内部货币体系，各国间根据五年计划，通过长期协议开展贸易。由于其内外矛盾，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化并对工业落后或没有财富可用来分配的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注定不会成功。生产官僚体系和社会平均主义阻碍了发展经济所需资本的积累。尽管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但这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从来没有脱离按照资本主义法则运作的世界市场。与东欧国家经济的结合，使苏联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但由于介入世界市场，70年代前期，以石油为主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对西方经济造成的打击，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由于苏联以越来越高的成本从西方进口产品，它已难以维持对经济互助委员会其他成员国出口产品的补贴，自1974年起，它对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做出了一些调整。[49]

当时苏联的国防开支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16%。[50]由于阿富汗战争的开销，苏联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日益严重，其所拥有的资金已不允

许它维持与美国的军备竞赛，特别是里根宣布将建立以“星球大战”闻名的战略防御计划后更是如此。美国实施这一计划也并非易事，它将使美国经济负担变得更加沉重。1985—1986 财政年度，美国的预算赤字为 2 200 亿美元，贸易逆差 1 700 亿美元，外债高达 2 630 亿美元。但与苏联不同，美国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而且也更富有生机，它还可以从世界资本市场寻求支持。也正因为如此，美联储从 1979 年起大幅调高利率，1981 年后更为明显，这使美国能够吸引各种资本。这样做虽然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偿还变得更加艰难，但却能为武器生产项目获得资金，又不至引发大的通胀压力，也不会危及产品和服务的内部消费。苏联因为不拥有同样优势，所以处境要艰难得多。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数据，但种种迹象表明，其预算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7.2%（也有来自苏联的资料显示该比例为 20%），而美国的这一指数还不到 3%。[51] 贸易逆差使苏联的外债高达 400 亿美元[52]，尽管低于美国，但却对苏联构成了沉重负担。因为，不管是卢布，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货币，都不能在世界资本市场自由兑换，技术落后（除军事领域外）和由此造成的竞争力不足，限制了苏联向西方出口产品的能力。除此以外，它不拥有获得外汇的其他途径。这些因素是导致苏联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因素。1961—1965 年间，它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5%，而 1976—1985 年间仅为 2%。[53]

1985 年执掌苏联政权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着手进行了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便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避免国家解体。为此，他引入了一定程度的民主。他意识到，部分引入市场经济将有利于苏联的工业化。于是，他将列宁在 1922 年内战后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作为改革模式。列宁“新经济政策”终结了自 1917 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戈尔巴乔夫通过政权的政治自由来推动“开放”和“改革”。改革包括：实行货币改革，使卢布成为可兑换货币，以便振兴市场；承认多种形式的所有制作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基础。[54] 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之一瓦连京·法林（Valentin Falin）认为，“只要存在国家垄断，人民就不会有责任性”。除了改革，别无选择。[55] 然而，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这就需要与美国达成一致。1987 年，戈尔巴乔夫试图与美国就裁军和军备控制达成协议，以便减少苏联的军费开支。当时苏联的这一开支估计达 700 亿卢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5%。[56] 在这一背景下，华约组织 1987 年在重新审视其军事方针时，把“进攻性防御”战略修改为“防守性防御”。[57] 戈尔巴乔夫废除了勃列日涅夫主义，放弃对那些有可能抛弃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阵营国

家进行干预。这样，不仅使这些国家获得了自由，而且还引导它们实行开放，并调整经济和政治结构。他还考虑取消向各国提供的所有补贴。1980—1988 年，苏联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的补贴总额高达 370 亿卢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58]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领导人就意识到，不能照搬斯大林自 1927 年终结“新经济政策”后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去世（1976 年）两年后，邓小平[59]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允许中国人从事私人商业活动，并批准外资的进入，国家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唯一所有者。邓小平有意从搞活农村经济入手，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发展乡村企业。在城镇地区，他同样给予国营企业自主经营权。他还推动向地方下放权力、促进投资并放开价格。邓小平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受到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启发。列宁没有把它当作一时的应急之策，而是作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战略加以实施，也就是发展国家控制下的私人资本主义，而非斯大林后来所采取的企业国有化策略。斯大林试图以此在处于世界市场经济之外孤立且落后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和李鹏作为邓小平的继承者，继续推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机构重组，对金融体系和税收实行改革，并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体系。这些改革促使中国经济得到巨大发展。1960—1970 年，中国的年增长率为 4.5%，1970—1980 年增至 5.8%，1980—1990 年则高达 8.5%。而美国的增长率则从 1960—1970 年的 3.8%降至 1970—1980 年的 2.7%，1980—1990 年为 2.8%。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和苏联解体的 1991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仅为 0.7%。从战略角度看，对美国来说，20 世纪末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它开始接待大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投资者的到来。

【注解】

[1] “America's Spiritual Reawakening”, Remarks to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Orlando (Florida), 8 March, 1983, in Reagan, 1988, pp. 49-57. 1982 年 6 月 8 日，里根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时首次使用“邪恶帝国”的表述。

[2] Johnson, 2002, p. 771.

[3] Ledeen, 1988, p. 6.

[4] Kissinger, 1982, pp. 669 e 674.

[5] Gerson & Birchard (eds.), 1991, pp. 275-277.

[6] Id., ibid., p. 295.

[7] Trubowitz, 1998, p. 225.

[8] Arakie，1973，pp. 166-167.

[9] Id.，ibid.，p. 167.

[10] Id.，ibid.，p. 166.

[11] Al-Qathafi，s. d.，p. 24.

[12] Id.，ibid.，p. 12.

[13] Id.，ibid.，p. 16.

[14]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 Commentary on the Green Book. Tripoli：World Center for Researches and Studies of the Green Book，vol. 1，p. 15.

[15] Haig，1984，p. 31.

[16] 1970—1971 年，巴西将领海权延伸为 200 海里。美国和其他国家只承认 12 海里。

[17] 这一组织 1978 年成立于埃及，由萨利姆·法拉吉（Abdal al'Salem Faraj）担任首领。其追随者认为，烈士的鲜血和牺牲能铲除腐败者，并恢复信仰的纯洁，不管这些腐败者是穆斯林还是异教徒。Wheatcroft，2003，pp. 319-321.

[18] 在埃及继承纳赛尔政府的萨达特于 1977 年带着和平方案来到耶路撒冷。卡特总统为达成戴维营协议从中斡旋。萨达特的这一行动导致一些不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断绝了与埃及的外交关系。针对萨达特的袭击还导致他的 7 名随从死亡和 28 人受伤。

[19] 据说，美国在埃及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在那里部署了空军和大量物资，这些物资可供空中预警和控制机以及歼击机队在执行任务时使用。

[20]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Directive Number 30—Managing Terrorist Incidents，Ronald Reagan—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Intelligence Resource Program—http://www. fas. org/irp/threat/terror. htm.

[21] Gates，1997，p. 204.

[22] Id.，ibid.，p. 205.

[23] Extract of NSDD 138，April 1984.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4] U. S. Senate—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pp. 225-254.

[25] 1975 年，卡斯特罗把一份列有 24 次企图杀害他的行动统计表交给乔治·麦戈文参议员。中央情报局卷入了这些行动。中央情报局否认与其中的 15 起行动有关。Ibid.，p. 71n.

[26] Mayer，Arno. "Untimely Reflections"，in *Theory & Event*，*vol. 5*，n° 4，2002.

[27] "定点清除"是一种国际性做法，它以在战时打击并杀死敌方指挥链中的某一成员为目的。

[28]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29] Gerlach，Jeffrey R. "Pentagon Myths And Global Realities：*The 1993 Military Budget*" —Policy Analysis N° 171—May 24，1992—Cato Institute.

[30] Military Spending Working Group—Military Spending Situation Assessment http://www.fas.org/pub/gen/mswg/situatn.htm.

[31] Ben-Menashe，1992，pp. 120-121.

[32] 阿巴斯于2003年4月1日在伊拉克被美军抓获，并于2004年3月9日死亡，死因不详。人们怀疑他死于虐待或在牢中被人杀害。

[33] Id.，ibid.，p. 120.

[34] 1986年3月，载有225架战机的第六舰队特遣部队的3艘航空母舰已部署在利比亚沿海，并与利比亚军舰发生冲突。3月26日，美军向利比亚军舰发动了5起袭击。

[35] Center for Data Analysis—The Heritage Foundation—http://www.heritage.org.

[36] 1996 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Report—Archive Site for State Department—information prior to January 20，2001. http://www.state.gov/www/global/terrorism/1996Report/1996index.html. 据《纽约时报》报道，1986年发生了774起恐怖事件，1987年上升至832起，增幅为6%，主要原因是巴基斯坦的炸弹爆炸事件增加。阿富汗秘密警察被认为是爆炸事件的元凶。Johnson，Julie. “Abduction Renews Hostage Policy Debate in U. S.”. *The New York Times*，28/2/1989.

[37] 1999年3月，法国司法法院对包括卡扎菲连襟在内的利比亚政府人员进行了审判，他们被指控策划了法国联合航空运输公司飞机在尼日利亚上空的爆炸案。四个月后，利比亚承认了对该起恐怖袭击负有责任，并向法国死者家属支付了2.11亿法郎（约合3 300万美元）的赔偿。

[38] 1991年以前，南斯拉夫由6个共和国组成。

[39] 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所谓的“大塞尔维亚”，它由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的一部分和几乎整个波斯尼亚组成。当1992年波黑宣布独立时，塞尔维亚人不能接受，种族间的内战因而爆发。

[40] Halberstam，2001，p. 139.

[41] Trotsky，1936，p. 11.

[42] Id.，ibid.，p. 12.

[43] Id.，ibid.，pp. 285，286，306，324 e 325.

[44] Kagarlitsky，1993，p. 36.

[45] *Jornal do Commercio*，Rio de Janeiro，16-17/7/1945，p. 1.

[46] Id.，p. 1.

[47] Dennis，1988，p. 128.

[48] 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阿尔巴尼亚后来因与苏联的分歧而退出。

[49] McCauley，1979，p，185. Dennis. 1988，pp. 131-138.

[50] Gates，1997，pp. 318-319.

[51] White et al.，1990. p，163.

[52] Id.，ibid.，p. 181.

[53] Id.，ibid.，p. 161.

[54] Falin，1999，p. 43.

[55] Id.，ibid.，pp. 60 e 84.

[56] White et al.，1990. p. 181.

[57] Falin，1999，pp. 146-155.

[58] Id.，ibid.，p. 163. 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1991 年 1 月 25 日在柏林接受作者的采访。

[59] 邓小平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试图实行经济改革，但毛泽东认为他要复辟资本主义。此后邓小平被淹没在红卫兵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1975 年才被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职务，却又在 1976 年周恩来去世后再次下台。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复出并巩固了权力。

第二十五章

被视为“新威胁”的恐怖主义和贩毒　维持和增加国防预算的“理由”　美国的军国主义　美国所谓的“国际恐怖主义”　取代“红色威胁”的“绿色威胁”　历史上作为反抗手段的恐怖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恐怖主义的谴责

苏联并不是在冷战中落败，而是发生了内爆，即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崩溃。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该体系难以维持在预料之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社会主义构想为一种发展道路或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而是将其视为财富的分配过程，而这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1]俄国未达到这一水平。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兼掌管情报部门和秘密警察的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Lavrenti P. Beria）对苏联所面临的困难了如指掌。作为斯大林的亲信，他提议重视消费，并接受关于在农业方面进行某些改革的提议。因为，从前线返回的士兵在将自己的生活与在西欧所看到的水平比较后，产生了不满情绪。[2]中央情报局 60 年代末就了解到，苏联面临着长期经济困难。到了 70 年代，这一困难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民众不满、意志堕落、物质匮乏和民族动荡。[3]1979 年 8 月，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是：“苏联消费者的不满正在上升，将给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权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4]美国专家估计，假如苏联军费继续增长，将几乎消耗掉全部的国内生产总值。[5]即使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也滋生了不满情绪，他们抱怨腐败、暴力犯罪、经济困难和社会纪律的缺失。在对苏联机构和现行政权日益增加的批评声中，小规模罢工开始出现，在克格勃内部也产生了希望有某种改变的强烈情绪。中央情报局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并预计：“在任何情况下着手改革都将会招致灾难。”[6]事实上，苏联危机尽管因时势而加剧，但它是系统性的，并且可能已病入膏肓。这样，被埃里希·昂纳克

（Erich Honecker）称为“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出现了解体。按卡斯特罗的说法，出现了一次“剧变”。

俄罗斯成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并几乎保留了它的全部军力。但从社会主义废墟中站起来的俄罗斯，尚未从一场深刻危机的打击中恢复元气，它没有思想上的动力，经济和政治受到削弱，无法跟上技术的发展。它不仅难以支配东欧国家，而且对原苏联波罗的海和中亚共和国也失去了控制。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理由”来维持和扩张其庞大的军事体系，这一体系自1947年起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同盟而建立，其借口是遏制通常被称为“国际共产主义”的苏联。庞大的军事体系为巨额国防开支找到了理由，五角大楼的年度预算约占美国总预算的23%。在柏林墙被推倒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1989年，美国的军费开支高达3 000亿美元。1947—1989年间，国会批准了11.5万亿美元来维持美国的战争机器。另有数十亿美元被用于核武器生产、对外军援、情报搜集、民防和军事研究。

从纯经济角度看，军国主义是实现财富增值的一种特殊方式。罗莎·卢森堡指出，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扩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它能够通过殖民主义和世界性政策吸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7]与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一样，美国把军国主义视为国家维持私人企业繁荣和减少失业人口的一种手段，私人企业从国家手中得到武器订单和其他大的军事项目，尤其是在二战期间。80年代，里根加快了“军事建设”，创造了成千上万新的就业机会。80年代中期，约有700万名美国劳动者直接或间接就业于国防工业，致力于制造导弹、战机等武器装备。与苏联的对抗被用作美国中东政策的背景和出口大量武器的理由。[8]美国的借口是维持世界“民主安全”，但实质上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内部经济体系，避免民众对美国大公司利益进行任何抵制。

1989年，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担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声称，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预算可在五年中自动削减一半。然而，为了不失去巨额资金，主导军工集团的五角大楼试图找到新的威胁和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因为，有能力挑战美国并威胁其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已不复存在。[9]戈尔（Al Gore）参议员（田纳西州民主党人）提出了全球环境问题，将其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他提议把环境问题提高到“战略防御计划”一样的高度，制定“战略环境计划”。1989年，戈尔在国家科学院的讲话中称：“我们必须清楚，就像世界可能经历以核战争为形式的人为战争一样，它现在正面临以日益增

多的灾难性环境破坏为形式的人为灾难。”[10]

“国际贩毒”被美国视为新的威胁，它被用作1989年12月20日老布什总统下令实施的“蓝勺行动”（后被国防部长切尼定名为“正义事业行动”）的借口。干涉巴拿马是越战后美军在海外采取的最大军事行动（调动约25 000名士兵）。尽管官方说法是为了抓捕被指控贩毒的巴拿马政府首脑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Antônio Noriega）将军（他也由中央情报局一手培养，并曾为其效力），以便让他到美国迈阿密法庭接受审讯。但这一军事行动的真实目的是，在一个现代环境下试验美军对不发达国家突发事件采取行动的规划和联合执行能力。有意思的是，对诺列加的指控除一项外，其他各项均与他1984年以前所从事的活动有关。当时，他正替中央情报局效命，从事推翻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工作。在美国指使下，他对尼加拉瓜选举进行操纵，很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美国对巴拿马“全面入侵”的代价是，23名美国军人丧生（323人受伤）。巴拿马有297名士兵死亡，123人受伤，另有300名平民被炸死。[11]战争结束后，老布什宣布向巴拿马提供10亿美元，其中4亿用于进口美国产品，1.5亿用于清偿银行债务，6 500万用于向私人部门提供贷款或用于向美国投资者提供保证。其中约一半资金是从美国纳税人那里被转到美国商人手中。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作为新敌人和又一新威胁出现在美国官员讲话中的“国际恐怖主义”，取代了“国际共产主义”。为了证明高额国防开支的必要性，并使其得以继续增加，美国安全机器极力强调这一“新威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代表的“绿色危险”，取代了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所构成的“红色危险”，即国际共产主义。五角大楼的官僚、中央情报局和其他安全机构的新保守派创立了一个新魔鬼学。“不负责任国家”，即新邪恶轴心概念，丰富了这一新学说，他们炮制了大量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文章。

按照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的广义概念[12]，历史上，自国家形成，即权力对人们行使支配作用以来，恐怖主义就一直不断，不管国家形式是共和国还是公国（君主制）。[13]从总体上看，它是工具主义性质的一种战争方法和（或）政治犯罪。[14]不仅被革命或反革命组织、左翼或右翼激进分子或者宗教极端分子和不同种族所采用，几乎所有国家的情报机构也同样使用。采取恐怖主义并不总是在战争时期出于军事目的，所有那些手持武器反抗暴政或外国占领的人，都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者这一广义而未被真正重新定义的概念。但恐怖主义者作为政治罪行的执行者，无一例外都是失败者。当他取得胜利时，就成了英雄和统治者，就像贝京

和其他犹太领导人一样，他们在巴勒斯坦与英国占领军的斗争中采取了恐怖行动，直至1947年以色列国建立。葡萄牙政治学家安东尼奥·拉腊（Antônio de Sousa Lara）指出，恐怖主义永远是“那些没有合法颠覆性手段者的一个武器，它被用来迅速强加自己的愿望”[15]。历史上，恐怖主义确实被作为弱者的武器，以达到打破国家暴力垄断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以游击战形式的暴动呈现。恐怖主义使用的工具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进步，古代和中世纪使用刀、箭和火。火药发明后，变成了火枪。19世纪，随着炸药的发明，又变成了炸弹和炸药包。

在犹太地，罗马的残酷统治令人民无法承受。公元前48年，犹太组织奋锐党徒实施了一项意在激起暴动的恐怖行动，混入城市的匕首党“斯卡里”用被称为“式加”的短刀，谋杀古罗马军团士兵及其犹太帮凶[16]，他们或绑架神庙卫士以索取赎金，或大规模使用毒药。[17]基督耶稣可能就是一名奋锐党徒，理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罗马人处决叛逆者的做法，而且I. N. R. I.[18]这一符号表明，他被判处了叛国重罪。他宣称自己是弥赛亚，即犹太人的国王，其行为被视为反抗罗马的统治，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20世纪，在非洲和亚洲国家出现的解放运动以及拉美的反独裁运动，很多情况下都使用了恐怖主义。他们所反对并试图推翻的政府同样也使用了恐怖手段。抵抗德国占领军的法国和意大利人也被希特勒政府视为恐怖分子。[19]在拉美，美国扶植的军政府同样把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借助武力手段与压迫者作斗争的人们称为恐怖分子。

恐怖作为表现形式，一直泛指把暴力用作政治武器的行为，不管是以革命，还是以镇压为目的，为的是制造恐慌情绪和震慑对手。这一表述在法国革命后才得以传播。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Maximilian Robespierre，1758—1794）控制下的“恐怖政权”的“革命法庭”，从1793年4月17日设立之日至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的15个月时间内，下令处决了约3 964人。[20]政治家兼政论家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2）使这一表述在英国广为传播。他对法国革命进行了抨击。在写给厄尔·费兹威廉（Earl William Fitzwilliam）的信中，他把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领导人描述为“拿人民撒气的名为恐怖主义的地狱猎犬”[21]。但恐怖主义并未销声匿迹。1793年7月13日，在“恐怖政权”执政期间，年轻贵族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de Corday，1768—1793）刺杀了革命领导人之一、《人民之友报》编辑简·马拉（Jean Paul Marat，1743—1793）。虽然此前她已加入共和党，但她对吉伦特派成员遭排挤感到震惊，认为每天都要求把更多人送上断头台的马拉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人民遭受苦难的罪魁

祸首，于是她决定将其除掉。[22]四天后（7 月 17 日）被送上断头台的她，被视为法国人民的女英雄。但镇压不断升级，以至于共和国受到人们仇视，“恐怖”不再使人感到恐怖[23]，这导致了推翻罗伯斯庇尔独裁的“热月政变”（1794 年 7 月 26 日）。罗伯斯庇尔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在科黛被杀约一年后的热月 10 日（1794 年 7 月 28 日），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袭击权贵和资本家以及破坏和捣毁工厂等各种政治暴力活动贯穿了整个 19 世纪，恐怖主义在欧洲已初步形成理论，成为民族主义和共和运动的反叛策略，如意大利的“烧炭党”[24]、爱尔兰的“新芬运动”[25]等，也包括英国和法国新兴工人阶级的某些群体。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生活条件令他们感到绝望。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为统一而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卡洛·皮萨卡内[26]（Carlo Pisacane，1818—1857）主张用暴力作为带有启发目的的政治行动手段。但马克思恩格斯则反对任何可能引发恐怖主义的行动。1867 年 9 月 18 日，一些“新芬运动”成员在曼彻斯特袭击了一辆警车，在枪杀押解警察后，解救了被关押的同伙。马克思对此予以抨击。直接参与者未被查获，但政府抓捕了大批“新芬运动”成员，指控他们参与该犯罪行动，政府虽无法出具犯罪的确凿证据，但仍处死了其中的三人。

作为报复并为在整个英格兰制造恐慌，“新芬运动”成员在伦敦穷人和无产阶级居住的克拉肯韦尔区监狱的围墙前投掷了一枚炸弹，导致数人死亡，上百人受伤。[27]马克思尽管同情爱尔兰解放运动，但他对这一袭击予以谴责。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说，“‘新芬运动’在克拉肯韦尔制造的爆炸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动”。[28]他认为，这一袭击对“新芬运动”本身的危害尤为严重，它将使英国工人对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同情冷却，甚至彻底消亡。几天后，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写道，“克拉肯韦尔的愚蠢行动”是“极端狂热分子”所为。他说，所有蓄谋行动中，最糟糕的是导致这一愚蠢行为的发生。[29]恩格斯认为，围绕爆炸和纵火这类行动，在美洲已制造了不少事端[30]，于是就来了“一些蠢驴干了这一蠢事”。“在多数情况下，这些野蛮分子是最胆小之徒”。他在得知因袭击警车而被处决的威廉·艾伦（William Phillip Allen）似乎已招供后挖苦说，他们的想法是，为解放爱尔兰而去焚毁一个裁缝店。[31]

马克思恩格斯同样谴责了钣金工海因里希·霍德尔（Emil Heinrich Max Hödel）和知识分子卡尔·诺比林格（Karl Edward Nobiling）谋害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的未遂行动。这一行动使得帝国政府首脑俾斯麦得以镇压工人运动，国会则通过一项法律，取缔了 1869 年成立的社会民主

党。[32]恩格斯将霍德尔和诺比林格的愚蠢行为与“新芬运动”在爱尔兰凤凰公园发动的袭击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是“真正的愚蠢”，而且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夸夸其谈和毫无用处的“为事实进行的宣传”[33]。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内部，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迈克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1814—1874）和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uei Guennádievich Netchayev，1847—1888）[34]的言行，怀疑涅恰耶夫[35]是一个“俄国煽动分子”[36]。1872 年，他们在名为“社会民主主义与国际工人协会的联盟”[37]的小册子中，尖锐地抨击了被认为是涅恰耶夫所著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一书[38]，指出，“一个革命者（……）只懂得一门科学，那就是毁灭”，“对他来说，有利于革命胜利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和罪恶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Fiodor Dostoiévski，1821—1881）受涅恰耶夫启发，撰写了《罪与罚》一书，其目的是通过小说形式揭示这一问题，并对问题做出清晰回答：在经历过渡时期的俄国，怎样才能使更多的涅恰耶夫出现？这些涅恰耶夫如何才能招揽追随者？事实上，涅恰耶夫和巴枯宁创建了自己的学说。他们认为，革命者不应该教育人民，而应该发动他们。他们认为俄国的小偷是“真正的和唯一的革命者”，是没有言语和没有从书中提取辞藻的革命者。法国医生保罗·布劳斯（Paul Brousse，1844—1912）深受其影响，19 世纪 70 年代初，他成为无政府主义流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宣扬“用事实来宣传”[39]，也就是通过行动和暴力行为造成事实，把暗杀作为主要手段。他们在法国发起了恐怖行动，最初的目的是替在“巴黎公社”野蛮镇压行动中丧生的包括数百名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 20 000 人报仇，后来则变为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让他们明白当权者和资产阶级有可能被摧毁。1879 年在拉桑迪坊（瑞士）举行的无政府主义大会最终通过了这一战略。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 1868 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发明炸药并将其应用到工业领域，个人恐怖主义的破坏力增强。被称为“炸药之声”的弗朗索瓦·拉瓦肖尔（François Claudius Kcenigstein）在法国成为涅恰耶夫理想中的革命者，他把道德作为资产阶级的偏见加以拒绝，不允许为革命行动设置任何限制。

尽管并非所有无政府主义流派都宣扬用事实进行宣传并（或）从事恐怖主义活动[40]，但直接行动通常是其主要斗争方式，目的是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这些行动包括群众示威、罢工、抵制、破坏，甚至包括暗杀和炸弹袭击。它们被当作教育劳动者在争取更好劳动条件的斗争中团结起来的方法，让他们通过亲身经历去认识革命的必要性。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工会领

导人（从事工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捣毁机器、焚烧工厂或者杀害其所有者乃至袭击统治者，通常都可接受，很少人会认为这些行为属于恐怖主义。[41]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以发动社会革命毁灭国家为目的的孤立行动，不仅在法国得到发展，还扩展到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和俄国。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头十年中，各国发生了暗杀王室成员、政府官员和炸弹爆炸等一系列袭击事件，当然，并非所有行动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为。

在俄国，对政治犯的惩罚促使维拉·查苏里奇（Vera Ivanovna Zasulich，1848—1919）于1878年发动了对圣彼得堡军队和警察首领西奥多·特列波夫（Theodore Trepov）的袭击，表达了人们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的普遍愤恨情绪。他的做法启发了并没有得到民众支持的革命“知识”阶层。作为单纯复仇行为出现的个人恐怖主义变成了政治斗争手段，并形成了一个体系。与西欧国家和美国发生的情况不同[42]，1879—1881年，随着认为俄国无须经历苦难的资本主义而能直接从封建主义跨越到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分裂，恐怖主义在俄国呈现出有组织的形式[43]，它的其中一个流派创立了“人民的意愿”组织。该组织声称，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44]是其明确目标，并将通过不懈努力实施这一决定。其策略是，针对独裁政权代理人发动各种袭击，以唤醒广大民众的革命意识，或者至少能激励自由主义者反抗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斗争。它的全部力量凝聚在一个由28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中。至1881年，该组织成员不超过37人，所有成员均处在地下状态，没有任何社会和家庭关系。他们遵照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的教导，全身心致力于革命事业，愿意为革命献身。他们没有“个人事务或利益，没有感情、没有财产，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革命这一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和唯一的激情所迷恋”，显示了极大的组织才能。但孤立状态为警察的镇压行动提供了便利。1878年8月至1879年12月，为杀死2名政府官员，17名革命者被送上绞首架。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终于在炸弹爆炸声中倒下。[45]同年，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也在美国遇害。亚历山大二世之子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不仅没有做出妥协，反而变本加厉，他废除了父亲实行的多项改革[46]，并加紧了镇压。任何没有真正得到民众支持的组织，都难以在地下状态生存下去。1885年，“人民的意愿”已几乎被彻底消灭。

托洛茨基在1911年指出，社会民主国际始终“毫不妥协地”反对这种个人恐怖主义。认为它“难以接受”，恰恰是因为它贬低了群众的作用，

诱使他们接受自身的无能，并将目光转向“能替他们完成使命的伟大复仇者和解放者”身上。[47]托洛茨基认为，个人恐怖主义作为政治革命的手段，是“俄国民族的”产物。因为，尽管专制者的刺客与专制机构一样古老，但承担除掉一个接一个独裁者、一个接一个大臣、一个接一个君王（一个接一个“沙世卡”[48]）任务的系统恐怖活动，与专制主义的官僚等级相适应，并建立起其自身的革命官僚体系，是“俄国知识阶层独特创造力的结果”[49]。然而，并不仅是政治革命手段的个人恐怖主义，是“俄国知识阶层独特创造力”的结果。

尽管列宁与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xandre Ulianov）相反，选择了社会民主主义，并谴责个人恐怖主义，认为它无益和不当[50]，但他欣赏“人民的意愿”的战斗性和组织能力，并十分敬重那些使用恐怖手段并在与独裁斗争中倒下的革命者。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就是其中之一。在提到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作为工人运动领导者开始有“人民主义者”的革命想法时，其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他写道，几乎所有人年轻时都崇拜恐怖英雄，很难抵御这一英勇传统的诱惑[51]。纳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da Krupskaia）在回忆录中，把这一段落看作是列宁生平的一部分。列宁确实把个人愿望提升到革命因素的高度。他认为，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假如没有一个拥有全身心投入革命行动的稳定地下领导组织，使警察的镇压变得困难，就不可能有稳固的革命运动。[52]他以“人民的意愿”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政党——作为社会民主工人党分支的布尔什维克党，它由一个地下执行委员会领导。列宁认为，该委员会的错误在于，没有把它的活动与人民的运动、阶级斗争、罢工和街头斗争联系起来。

列宁所构建的这一组织模式是为了准备、确定和实现全体人民的起义[53]，它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皮奥特尔·特卡茨仇（Piotr Nikititsch Tkatschow，1844—1885）1875 年在日内瓦发表的一份名为“纳巴特”（警示运动）的小册子所宣扬的内容相同。特卡茨仇在该册子中指出，俄国革命只能由一小群有纪律并接受一个中央领导机构领导的人们来发动，他们将通过密谋方式夺取政权。这与法国革命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54]（Louis-Auguste Blanqui，1805—1881）的观点相似。布朗基认为，组织纪律严明的少数人在特定时刻能够帮助革命，并带领群众取得革命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严厉批评。恩格斯在回应特卡茨仇的观点时称，俄国革命者除了单纯的密谋而没有其他手段的断言是一派胡言。[55]尽管托洛茨基回击了考茨基的抨击，支持苏维埃政权对其敌人所采

取的恐怖行动[56]，但从“社会民主国际”即“第二国际”分离出来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继续谴责个人恐怖主义。在卢贝案中，为把国会纵火案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纳粹分子企图把“共产国际”的一位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ff）牵连进去。他在法庭上断然指出：“作为共产党员，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成员，我对个人恐怖主义深恶痛绝。”[57]

他在案件审讯过程中多次重申这一点，谴责国会纵火事件，并否认卢贝是共产党员或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位已被共产党除名者。[58]斯大林则在20世纪30年代把恐怖活动当作国家政策加以广泛使用，将那些反对其专制统治或仅仅对其提出批评者指控为“恐怖主义者”，并将其判处死刑，这导致了数百万苏联人的丧生。国家安全机构[59]（OGPU）则在各国推行恐怖主义行动，如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暗杀托洛茨基。作为冷战的组成部分，恐怖主义行动在二战后并没有消亡，它们出自各种反叛运动或反革命组织之手。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在拉美，一些恐怖活动得到克格勃、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和其他情报组织的支持。在拉美地区，国家恐怖造成了恐怖状态和残酷镇压，城市和乡村游击战再度抬头。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为阿尔及利亚解放而战的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多起恐怖行动。在法国国内，萨兰（Raoul Salan）将军和其他反对戴高乐政策的右翼军人建立的“秘密武装组织”也采取了同样做法，他们在巴黎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和其他犯罪活动。卫斯廉大学教授玛莎·克伦肖（Martha Crenshaw）认为，民族解放阵线所从事的恐怖主义，初期是把民族主义斗争列入国内和国际议程的一种手段，将其当作猛烈抵抗的标志、战争的策略和漫长起义的组成部分。[60]1963年，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结束后，随着法国的撤离，又掀起了反对英国占领阿拉伯半岛的运动。1963年12月10日，一颗炸弹在亚丁机场爆炸，英国驻南阿拉伯联盟高级专员肯尼迪·特尔瓦斯基斯（Kennedy Trevaskis）爵士等数人被炸身亡，这是南也门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阵线在埃及支持下发动的一系列针对军人和平民恐怖袭击的开始。袭击活动的暴力程度不断升级，直至1967年英国彻底撤出。

爱尔兰的情况基本上是，天主教徒指望借助恐怖主义改变与新教徒和英国的政治关系。自1969年起，作为新芬党武装力量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发起的针对英国统治的恐怖袭击不断增加，震撼北爱尔兰并数次袭击伦敦和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行动最终导致内战的发生，其起因是争取捍卫

民族特性的少数派天主教徒与把持着权力且与英国结盟的多数派新教徒之间的一场政治冲突。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得到少数派天主教徒支持的爱尔兰共和军，未能凭借武力改变现状。英国也未能遏制恐怖袭击，或借助警察和军事手段将其消灭。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先前的执政者不可能像美英在阿富汗那样，下令轰炸阿尔斯特，打击当地民众。要解决这一冲突只能通过艰苦的政治谈判。这样，为了打破僵局和保证和平进程的顺利推进，爱尔兰共和军在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出售了大量武器后，做出了销毁其秘密军火库的决定。作为对爱尔兰共和军姿态的回应，英国开始拆除它在阿尔斯特的军事设施。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力量新芬党也同意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争夺权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恐怖行动同样在西班牙呈上升趋势，其罪魁祸首是巴斯克分裂组织“埃塔”。[61]接替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939—1975）元帅的候选人路易斯·布兰科（Luís Carrero Blanco）海军上将就死于“埃塔”发动的恐怖袭击。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暴力活动都有其历史根源，种族和（或）宗教特性与政治目的交织在一起。在其他一些国家，恐怖主义组织是在1968年标志性的学生反叛运动失败后诞生的。1968年，在安德列亚斯·巴德尔（Andreas Baader）和古德伦·恩斯林（Gudrun Ensslin）的领导下，“赤军旅”（RAF）在联邦德国开始了恐怖活动，在法兰克福的施奈德商场引爆了炸弹。乌利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后来与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组成了以“巴德尔-迈因霍夫”[62]闻名的组织。在整个70年代，该组织实施了各种恐怖行动，包括抢劫银行和暗杀。[63]在意大利出现的“红色旅”（Brigate Rosse）则开展了武装宣传行动和城市游击战。1978年，他们杀害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总理。1981年，又绑架了美军詹姆斯·多齐尔（James Dozier）将军。他们还声称对1984年西奈多国部队和军事观察团司令、美国外交官利蒙·亨特（Leamon Hunt）遭暗杀事件负责。此外，1971年，日本出现了一个名为“赤军”的组织，其领导人为重信房子（Fusako Shigenobu）。该组织将日航一架飞机劫持到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并迫使东京政府为人质获释支付了600万美元。“赤军旅”、“红色旅”和日本“赤军”等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学生。昂纳克称他们为“迷失的理想主义者”、“资产阶级的子女”。他们对德国的社会关系感到失望[64]，其中多数是中产阶级中思想激进的年轻人。他们对苏联和各国共产党选择的和平道路感到失望，要求恢复马列主义。实际上，他们从来就没有读过马克思或者哪怕是列宁的著作。

在跨国金融资本快速扩张的同时，拉美出现的军事独裁和城乡游击战、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玻利维亚的牺牲、古巴竖立的榜样、越南战争、中东石油危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事件，启发并广泛地推动了反美情绪。那些没有深深扎根于欧洲或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组织，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表达了同情和认同，它们仇视国际现状，于是就采用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谴责的行动。列宁和托洛茨基也同样对这类行动持反对立场。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和认同在联邦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1972 年，“赤军旅”成员为“黑色九月”组织提供了后勤支持。作为巴解组织主要派别法塔赫的分支，该组织是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杀害 11 名以色列运动员的罪魁祸首。[65]1975 年，“赤军旅”和巴勒斯坦人联合行动，扣押了在维也纳开会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部长们。1976 年，他们把法航一架飞机劫持到恩德培（乌干达）。1977 年，又把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劫持到索马里。“赤军旅”还与法国的“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比利时的“共产主义战斗细胞”（CCC）和意大利的“红色旅”等极端组织联合，采取无政府主义策略，试图建立一个抵抗帝国主义，即抵抗美国的国际网络。为此，它们甚至与库尔德工人党（PKK）、爱尔兰共和军和“埃塔”合作，或许它们还得到利比亚的支持。[66]日本“赤军”则与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FPLP）保持密切关系。[67]20 世纪 80 年代，崇尚恐怖主义的极左浪潮在欧洲几乎销声匿迹后，伊斯兰反叛组织纷纷出现。得到伊朗支持、以黎巴嫩南部为基地的真主党和在与以色列的不对称战争中采用自杀式人肉炸弹的哈马斯便是其中的两个组织。

【注解】

[1] *Engels, F. "Soziales aus Russland"* in Marx & Engels, vol. 18, 1976, pp. 556-559.

[2] 关于这一内容，可参阅 Moniz Bandeira, 2001, 2ª ed., pp. 97-99. Knight, 1997, pp. 234-246。

[3] Gates, 1997, p. 173.

[4] Id., ibid., p. 173.

[5] Haig, 1984.

[6] Gates, 1997. p. 188.

[7] Luxemburg, Band 5 (*Ökonomische Schriften*), 1990, pp. 398-411.

[8] Tirman, 1997, p. 6.

[9] Guimarães, Samuel Pinheiro "Esperanças e ameaças: notas preliminares", 23/10/1995. Original. Rio de Janeiro.

[10] U. S. Senator Al Gore, remarks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

ences，May 1，1989.

[11] Musicant，1990，417. Chomsky，2003，p. 156.

[12]“所有政体，所有统治体，只要拥有对人的支配权力，就是共和国或公国”。Machiavelli，1986，p. 9.

[13] Sousa Lara，1987，p. 271. Sousa Lara，2002，pp. 48 e 132.

[14] 根据不同目的，有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如宗教和种族恐怖主义等。

[15] Sousa Lara，2002，p. 49.

[16] Kautsky，1922 pp. 316-322.

[17] 奋锐党徒声称，暗杀其他犹太人是为了让人们明白与入侵者不道德合作的后果，即使罗马人也无法保护他们。然而，正如考茨基所指出的，使用恐怖手段仅仅是延长了战争，加剧了人们的痛苦，增加了最终胜利者的愤怒，促使其使用最残暴的手段。Id.，ibid.，pp. 316-322.

[18] 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国王。

[19] Hoffman，1998，pp. 31-32，

[20] Kropotkin，，1955，vol. Ⅱ，p. 287.

[21] 埃德蒙德·伯克著有多部作品，其中一部为著名的《关于法国革命和伦敦与此事件有关团体举动的感想》(1790 年 11 月)。该作品流传至整个欧洲，使各国政府都仇视法国革命。

[22] 7 月 13 日，她买了一把切肉刀前往马拉住处，她假装雅各宾派支持者，要向马拉告发吉伦特派的某些人。当她进门时，看见马拉正泡在浴缸里。他因为一种皮肤病，经常要在浴缸里泡很长时间。科黛说出了吉伦特派的几个人名，马拉做了记录。然后，她就将马拉刺杀。她随即被抓获，并接受“革命法庭”的审判，1793 年 7 月 17 日，被送上断头台。科黛是法国喜剧家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的后代。

[23] 由于富人逃亡英国或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穷人被送上断头台。路易·布朗基（Louis Blanqui）在花名册上找到的 2 750 名被砍头者中，只有 650 名属于富人阶层。*A Grande Revolução*（*1789—1793*），Salvador，Livraria Progresso Editora，1955，vol. II，pp. 287-288.

[24] 1807—1816 年间意大利南部出现的黑社会可能是从共济会分裂出来的，后延伸到西班牙和法国。它在很大程度上是 1820 年（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和 1821 年（皮埃蒙特）所发生暴动的罪魁祸首。1830 年后，意大利“烧炭党”逐渐被复兴运动所吸收。

[25] 19 世纪 60 年代末，要求将爱尔兰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再次兴起，并分裂为两个流派，一个主张宣传、示威和做国会工作；另一个则从 1863 年起选择了“新芬运动”创始者詹姆斯·斯蒂芬斯（James Stephans）和约翰·奥马霍尼（John O'Mahony）所主张的武装斗争。1858 年，两人在都柏林和纽约创建了这一秘密组织，它也被称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他们借助了美国的内战气氛。1866 年，他们以打击英国为目的侵入加拿大。“新芬”（*Fenian*）之名来自盖尔语 *Fianna*，是芬恩·麦科尔（Finn MacCool）所领导的一群斗士。麦科尔和古奇连（Cuchulainn）是爱尔兰

神话中的英雄人物。麦科尔的儿子是奥义欣（Oisin）。他是少数几个应邀参观青春之岛（Tir Nan Og）这一神话之地的人。他们在那里寻欢作乐。爱尔兰土地神在其土地被爱尔兰人占据后从该地区逃离。

[26] 皮萨卡内是一位意大利革命者和爱国者。他于1847年从那不勒斯逃亡后先后在马赛、伦敦、巴黎和阿尔及利亚居住。他在阿尔及利亚加入了外国军团。当米兰发生起义后，他返回意大利。1849年，他参加了战争委员会，并担任捍卫罗马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参谋长。1851年，他出版《1848—1849年意大利发生的战争》一书。他的政治立场有时十分激进，并带有社会主义倾向。1855年前后，他与青年意大利党（Giovine Italia）创始人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走到了一起。青年意大利党是一个领导革命、共和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政党，为意大利的重新统一而斗争。皮萨卡内计划在半岛南部开展武装斗争，但却难以如愿。1857年6月25日，他进行了新的尝试。他和24名同伴一起在蓬扎岛登陆，释放了所有犯人。其中数百人跟随他到萨普里发动起义。起义遭受了失败，负伤后比沙卡尼选择了自杀。

[27] Mehring，1985，pp. 393-394.

[28] “Essa explosão feniana em Clerkenwell é uma grande estupidez.” Marx & Engels，em Manchester，Londres，14/12/1867，in Marx & Engels，1974，Band 31，p. 409.

[29] Engels & Marx，em Londres，Manchester，19. 12. 1867，id.，ibid.，p. 413.

[30] 恩格斯提到美洲是因为发起“新芬运动”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是由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创立的，其目的是入侵加拿大以打击英国。

[31] “而这些吃人恶魔似的人又大都是些最小的胆小鬼，像以前提过的阿林，似乎已经成了告发同党的证人。此外，用放火焚烧伦敦一个裁缝铺的办法来解放爱尔兰，这算什么主张！” Engels & Marx，in Londres，Manchester，19/12/1867，id.，ibid.，p. 414.

[32] Marx，Karl. “Konspekt der Reichstasdebatte”，Geschrieben Ende September 1878，in Marx & Engels，1976，Band 34，pp. 491-500.

[33] 原文为：“(…) pura bakuninista，fanfarronesca，inútil ‘propaganda pelo fato’”.

[34] 涅恰耶夫是俄罗斯奴仆之子。其主人允许他上神学院，以便把他培养成为一名教师。1869年，他以圣彼得堡一个所谓的学生委员会成员和一名逃犯的身份来到日内瓦。Mehring，Karl. *Karl Marx：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Berlim：Dietz Verlag，1985，p. 466. Wheen，Francis. Karl Marx. Londres：Fourth Estate，1999，pp. 345-346. Marx，Karl & Engels，Friedrich. *Ein Komplot gegen d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Im Auftrage des Haager Congresses verfaßter Bericht über das Treiben Bakunin's und der Alianz der socialistischen Democratie*，in Marx & Engels，Band 18，1976，p. 398.

[35] 涅恰耶夫返回莫斯科后依靠农学院学生建立了“人民的复仇”组织。但一位名为伊万·伊万诺维奇（Ivan Ivanovitch）的成员在意识到上当后决定脱离该组织。涅

恰耶夫将其视为间谍，并将其暗杀。死者尸体被发现后，“人民的复仇”成员遭到审讯，并被判处强迫劳动和流放。涅恰耶夫得以逃脱，但在瑞士被抓获并引渡回国。1882年，他死于圣彼得与圣保罗城堡中，时年35岁。

[36] 恩格斯致在米兰的西奥多·库诺（Theodor Cuno）的函，Londres，24/1/1972，in Marx & Engels，1976，Band 33，p. 393.

[37] 这一小册子用法语写成，并被翻译成德语，1874年以《针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为书名在德国出版。Id.，ibid.，pp. 327-469.

[38]《革命者教义入门》分为4章26节。一些人误认为其作者是巴枯宁。无论如何，即使不是他写的，但他阅读并批准了此书的出版。Cole，1958，vol. Ⅱ，p. 187.

[39] 1875年，布劳斯发表文章对选举进行抨击，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后来他对无政府主义和恐怖策略的幻想破灭，于是创立了法国社会党可能派。

[40] 无政府主义分为多个流派并采用不同的斗争方式。一些人主张通过和平手段改变社会，采取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和公民不服从运动，如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王子。他提议不纳税、抵制兵役和拒绝承认法院判决。另一些人宣扬暴力和个人恐怖主义。但所有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主张权力分散、联邦制、自治和自由、平等、共识，反对等级、命令和权威。他们还认为改变应该先发生在个体意识中，之后才出现在社会中。

[41]“捍卫个人暴力（一些情况下的集体暴力）”往往是他们（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调。Carone，Edgard. *Socialismo e anarquismo no início do século*. Petrópolis：Vozes，1996，p. 145.

[42] 个人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心理源泉几乎总是复仇心理，即对压迫的回击。西欧和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行动往往是在政府对罢工的劳动者采取某种暴力行动或处决政治犯之后发生。

[43] 民粹主义者对工业资本主义表达了深刻的仇恨。工业资本主义的工厂和煤矿在西方造成了无产阶级极为悲惨的处境。民粹主义者主张实行一种乡村社会主义，希望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组织社会，小型工业则围绕农村公社而运作。他们希望用一个联盟来取代国家。民粹主义在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作品的影响下自1860年起日渐活跃。1876年，他们竭力在农民中宣传自己的主张。1876年，他们建立了“土地和自由”组织，其目的是推动起义。在受到警察镇压后，其中一个流派建立了“人民的意愿”组织并实施恐怖主义。暗杀亚历山大二世后，由于遭到镇压，该组织的活动日益涣散。1901年，“人民的意愿”组织残余分子成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党。俄国社会民主党源自“土地和自由”的另一流派，其名称为“黑分配”（*Tcherny Perediel*），它试图保持乡村革命的人民社会主义的纯洁，其领导人起初支持农村公社，反对工业化。但他们后来却转而支持工业化而牺牲农村公社。“黑分配”领导人乔治·普列汉诺夫（George Vlantinovitch Plekhanov）于1883年成立了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团体“劳动解放团”。

[44] 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是尼古拉一世之子和继承人，他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期间继位。

[45] 在1881年3月1日被暗杀前，亚历山大二世已躲过了多次袭击。第一次是1879年11月19日在莫斯科附近，一枚炸弹被投向沙皇专列，但亚历山大二世乘坐了另一列火车。另一起袭击案发生于1880年2月5日，一枚炸弹被投向冬宫，造成11人丧生，50多人受伤，其中大多为士兵。亚历山大二世却毫发无损，因为他还没有来到爆炸发生的餐厅。16名男女被认为是那些恐怖袭击的罪魁祸首，他们接受了圣彼得堡军事法庭的审判（1880年11月6日），其中两人被判处死刑，在圣彼得与圣保罗城堡被绞死。第三次袭击终于成功。1881年3月1日，当亚历山大二世返回冬宫时，炸弹被投向他乘坐的马车，第一枚炸弹没有击中目标，但第二枚炸弹致使亚历山大二世丧生。

[46] 最重要的改革是农奴的解放（1861年）。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能实现农业改革而将土地分给从农奴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新农民，这就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1864年，他引入了一个有限自治体系，部分西化了司法体系。

[47] Trotsky, L. "La posición marxista acerca del terrorismo individual", in Trotsky, 1978, pp. 16-18.

[48]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的昵称。

[49] Trotsky, Leon. "La bancarrota delterrorismo", in Trotsky, 1978, p. 24.

[50] *Lenin-¿Qué hacer?* in Lenin, tomo I, 1948, pp. 250-253 e 294-295.

[51] Id., ibid., pp. 349-350.

[52] Id., ibid., p. 297.

[53] *Lenin-¿Qué hacer?*, in Lenin, tomo I, 1948, p. 348.

[54] 布朗基追随了弗朗索瓦·巴贝夫（François Noël Babeuf, 1760—1797）的步伐。1796年，巴贝夫为了捍卫"平等和民主的宗教"，在法国领导了"平等者叛乱"。1797年5月25日，他在巴黎被送上断头台。1839年，布朗基在法国领导了一场政变。他是巴黎公社（1871年）领导人之一。他一生在监狱中度过了36年。

[55] "*Ist es falsch, daß den russischen Revolutionären keinanderes Mittel bleibt als die reine Verschwörung*". *Engels, Friedrich. "Flüchtlingsliteratur—Programm der blanquistischen Kommune flüchtlinge"*, IV, in Marx & Engels, 1976, Band 18, pp. 548-554.

[56] "和革命一样，战争基于恫吓。一场胜利的战争通常只是消灭失败一方很少一部分军队，但却使其余部分士气低落，斗志丧失。革命也以相同的方式实施：杀害一些人，使军人感到畏惧。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恐怖在武装起义的原则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只是武装起义的继续。" Trotsky, 1969, p. 60.

[57] "Como comunista, como membro do Partido Comunista da Bulgária e da Internacional Comunista, sou principalmente contra o terror individual." Dimitroff, 1946, pp. 4-5.

[58] Id., ibid., pp. 36, 57, 138-19, 150.

[59] 被称为"契卡"（Cheka）的打击反革命和破坏的泛俄特别委员会成立于1917年。当时，反革命分子开始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恐怖行动。1922年，该机构成为国家政

策局（GPU），为内政委员会（NKVD）的一个部门，后来更名为国家安全机构（OGPU）。1934 年，又更名为国际安全总局（GUGB）。国家安全委员会（NKGB）承担了秘密警察的职能。1946 年，内政委员会改称内政部。1954 年，在贝利亚遭清洗后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KGB）。

[60] Apud Kupchan，2002，p. 227.

[61]“巴斯克祖国和自由”。

[62] 与人们想象的相反，主要的领导人并非乌利克·迈因霍夫，而是古德伦·恩斯林。表面上，迈因霍夫 1976 年在狱中自杀，但人们相信这是一起国家犯罪。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和恩斯林的情况一样。根据官方说法，他们是自杀身亡，但人们认为他们是被谋杀。

[63] 德国富有的企业家汉斯·施莱尔（Hans Martin Schleyer）被“赤军旅”绑架后于 1977 年遭杀害。

[64] 在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失去权力后，该组织一些成员在他们居住的民主德国被抓。这些抓捕行动得到了秘密警察的支持。昂纳克否认了解内情。他称，米尔克（Mielke）并没有向他提供任何信息。但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的一位领导人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称，昂纳克认为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是“迷失的理想主义者”、“对爱尔兰共和军社会关系不满的资产阶级子女”，他的内心深处也许赞赏年轻人愿意生活在非法状态下并愿为一项事业而献身。鉴于这一原因，他甚至有可能会批准米尔克为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提供庇护。但即使他知情，他可能也不会允许他们把前民主德国领土用作恐怖行动的基地，因为他希望与联邦德国保持友好关系。Vide Moniz Bandeira，2ª ed.，2001，pp. 189-191.

[65] Aust，1998，pp. 272-274.

[66] 博丹斯基（Bodansky）认为，利比亚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支持者。Bodansky，1993，pp. 265-268.

[67] 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是在 1967 年阿以战争后建立的。

第二十六章

国际恐怖主义问题　油价和入侵科威特　沙特与美国“沙漠风暴”行动　伊拉克军队遭驱逐　五角大楼“鹰派”和《防务计划指南》　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　第三世界外债重新谈判和“华盛顿共识”

纽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教授约纳赫·亚历山大（Yonah Alexander）认为，现代恐怖主义者不同于从前，他们在实施恐怖活动中引入了新武器，拥有了新技术手段。过去只用匕首、手枪或手榴弹，对袭击目标只能造成有限伤害。现代恐怖主义拥有先进技术手段，未来甚至可能使用核武器和生物武器，这将对文明本身构成严重威胁。[1]但亚历山大颠倒了其中的关系。恐怖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始终是战争的策略和（或）抗争的表现形式，它所使用的手段在历史进程中随着军事技术的提高而得到改进。并非恐怖主义者发明了核武器和生物武器，而是工业强国的科学家，尤其是美国科学家。美国是首个也是唯一把核武器作为恐怖工具使用的国家。1945年，它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难以想象“埃塔”或爱尔兰共和军会使用核武器打击西班牙或英国政府，因为这一手段超出了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即巴斯克和北爱尔兰的独立。但假如穆斯林能得到核武器或生物武器，这些武器则完全有可能被用来攻击美国城市。因为，伊斯兰恐怖主义作为国际现象的出现和加剧，是“大撒旦”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造成的。美国作为世界帝国，奴役其他地区，特别是天然气和石油产地，中东就是一个具体例子。

兰德公司经理、曾任苏格兰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主任的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写道，现代“国际恐怖主义”诞生于1968年7月22日。当时，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成员把一架从罗马飞往特拉维夫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劫持到阿尔及尔，21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

被扣留长达 39 天之久，直到 8 月 31 日才获释。[2]他还称，1979 年穆斯林学生侵占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扣留所有工作人员，标志着“国家恐怖主义”的出现。[3]他忽视了一个事实，中央情报局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最大支持者。美国通过招募、资助、训练和武装恐怖分子，直接支持恐怖主义，这些恐怖分子活跃在危地马拉、古巴、尼加拉瓜、巴西、智利、阿富汗、刚果以及其他亚非拉国家，从事颠覆、爆炸、破坏和暗杀活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提出的作为新威胁的“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表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掩盖中东的石油问题和美国与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深刻矛盾。在那些国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结合在一起，作为对美国霸权地位以及它常常毫无保留地支持以色列的反抗。共产主义对抗民主的东西方冲突已被“文明冲突”理论所取代，即基督教与被含糊地称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或）“国家恐怖主义”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之间的对抗，这一冲突在中东日益加剧。美国为了促进其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与该地区最不得人心和最反民主的政权建立了密切关系。华盛顿尽管对萨达姆并不十分信任，但仍对其政权予以首肯。萨达姆指责占世界石油产量 10%的科威特增加产油额度，使石油产量过剩，进而导致油价降至每桶 18 美元，而伊拉克的额度仍被限制在每天 264 万桶。可能是因为科威特了解到伊拉克经济的脆弱性，尤其是与伊朗战争结束后裁军 20 万，使其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它才选择以石油作为武器，迫使萨达姆在边界问题上让步。它要求伊拉克偿还两伊战争期间欠下的 120 亿～140 亿美元贷款。[4]

从表面上看，这些行动是在得到美国首肯后采取的。在交给科威特内政部长萨阿德·萨利姆·萨巴赫（Saad al-Salim al-Sabah）的备忘录中，科威特国家安全局局长萨阿德·法赫德·萨巴赫（Saad al-Fahd al-Sabah）少将向他通报了在兰利（弗吉尼亚）与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所达成的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将就伊拉克的武器装备情况和政治结构交换信息；有必要利用伊拉克经济形势恶化这一有利条件，向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勘定两国边界。[5]该文件在伊拉克攻入科威特时被发现，但中央情报局予以否认。不管如何，美国的行动十分活跃。1990 年 7 月 25 日，也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8 天前，美国驻巴格达大使格拉斯皮与萨达姆和总理阿齐兹进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萨达姆就提醒她说，伊拉克保护了美国的利益，阻止了伊朗军队向海湾的推进，而这是美军难以做到的。他说：“你们的社会无法接受在一场战争中损失一万人。”[6]他表示急需资金，因为，扣除欠沙特和科威特的 350 亿美元以及欠埃及的 30 亿美

元，扣除阿拉伯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刚刚走出战争的伊拉克还有400亿美元的欠债。他称，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石油政策是一种经济侵略。针对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他评论说：

> 那些过着奢侈生活并有经济保障的国家，能够与美国就正当的共同利益达成协议。但是，忍饥挨饿、经济上一无所有者则难以达成同样的协议。[7]

萨达姆告诉格拉斯皮大使，他知道美国在背后操纵，国务院在怂恿科威特和阿联酋漠视伊拉克的权利。他说，他不是请求美国来替他解决问题，但希望美国不要让任何人采取与其身份不相称的举动。格拉斯皮大使回答说，“我们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发表意见”，这也是国务院一直给她的指令。格拉斯皮大使希望在阿拉伯联盟秘书长沙德利·克利比（Chadli Klibi）或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调停下，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8]

种种迹象表明，萨达姆把格拉斯皮大使的话理解为，在与伊朗战争中支持过他的美国，不会干预伊科冲突，并会接受他对阿拉伯世界的统治。[9]他想做的第一步是兼并科威特。因为，尽管1961年科威特的独立得到了承认，但在1918年以前，它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归属巴士拉省，后来成了伊拉克的一部分。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波斯湾战争指导》报告（1992年），1990年，伊拉克拥有一个弹道导弹军火库（在与伊朗战争中发射了350枚各型导弹，尤其是“飞毛腿”导弹）和一支能够深入敌国领土的空军。它在西部拥有约28个固定导弹发射架，这对以色列构成了威胁。

据1990年10月20日的《华盛顿邮报》透露，老布什总统曾于7月28日致函萨达姆表示，美国对其在该地区的盟友承担义务，对科威特动武是难以想象的。[10]美国担心失控的萨达姆会继续推进并进攻沙特，进而控制中东石油价格。该地区三国（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的石油储量占全世界储量的60%。此外，在美国战略中，沙特发挥着中心作用。自1938年起，美国一直与沙特王室保持密切关系。[11]那一年，在宰赫兰附近发现了大规模石油储量。二战期间，美国在利雅德设立了军事团。美国利用英国的衰落与它在该地区讨价还价，美国得到了沙特，波斯被让与英国，伊拉克和科威特则由两国分享。[12]美国和沙特的关系一直处于美国向沙特王室提供金钱和武器，换取石油开采权，并让沙特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模

式。由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组成的合资公司——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成为王室收入的来源。

二战期间，罗斯福迫于石油公司的压力宣布，保卫沙特对保卫美国至关重要。1953 年，国务卿约翰·福斯特访问沙特，对该国丰富的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印象深刻，他宣称，那个国家“对我们的繁荣至关重要”[13]。事实上，自 1948 年起，美国进口的原油和其他产品超过了它的出口，它越来越依赖中东。美国在沙特的宰赫兰建立了一个空军基地。王室的对立面，即沙特民族主义集团对此表示不满。该基地对美国来说极为重要，以至于 1961 年塔拉勒·阿卜杜勒亲王因提议将其关闭并废止允许其建设的协议而被免去财政部长职务。之后，其护照被扣留，财产被没收，一些追随者遭关押。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美国通过“武器换石油”机制与沙特建立了先前与伊朗保持的相同关系模式。自那时起，它共向沙特提供了超过 1 000 亿美元的军工产品、配件和技术支持，包括空中预警和控制系统、艾布兰 M-1 主战坦克和军舰等武器装备。这样，购买石油所支付的资金又返回美国。在伊朗什叶派革命后，沙特成为美国武器和包括电子侦察设备在内的先进作战系统的最大消费者。与此同时，萨乌德家族变得越来越富裕。前中央情报局成员罗伯特·贝尔（Robert Baer）在《与魔鬼同眠》[14]一书中写道，购买每一笔武器都会有佣金，萨乌德家族的一位成员会在帘子后等待每一笔佣金。1983 年出任沙特驻美大使的班达尔·阿齐兹向美国公共电视公司《前线》栏目记者洛厄尔·伯格曼（Lowell Bergman）透露，在过去 30 年中，他的国家实施了一个总额约为 4 000 亿美元的发展项目。从这些资金中，“我们滥用或贪污了 500 亿美元”[15]。他解释说：“不是我们发明了贪污，它自亚当和夏娃年代起就一直存在。我的意思是，这是人类的天性。”[16]确实不是沙特或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发明了贪污，美国有一个为出售武器而腐蚀对方的集团，华盛顿也有人因充当中间人或为交易提供便利而获取佣金。1893 年，政论家爱德华多·普拉多（Eduardo Prado）说过，“政治和行政腐败是美国政府运作的本质”。他言之有理。[17]

在经历 1/4 个世纪后，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石油产品不再过剩，转而成为石油纯进口国，石油进口从 1970 年的每天 320 万桶，增加到 1973 年的 620 万桶。[18]沙特成为其经济的命脉（石油和武器），其战略和地缘政治意义与重要的经济地位交织在一起。1981 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保罗·凯利（Paul X. Kelley）声称，“就对自由世界美好未来的重要性

而言，它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国家”[19]。毫无疑问，沙特已成为美国在中东实现军事意图的决定性支撑点，这并非只是因为其石油储量和战略位置，还因为美国在陆军工程师兵团监督下在那里建立的巨大军事基地网络，包括沿边界建立的哈萨、卡西姆、卡里德国王、哈密斯·穆沙依特、塔布克和沙鲁拉等军事基地，在波斯湾的朱拜勒、达曼及在红海的吉达海军基地。[20]

尽管沙特是中东最专制和腐败的政权，但它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美国的利益极为广泛和深入，以至于任何对沙特的威胁都将成为美国宣战的理由。在沙特，妇女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它是执行斩首最多的国家。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混为一体。统治国家的萨乌德家族是石油企业的拥有者。在“瓦哈比”原教旨主义引导下，它把萨达姆视为企图毁灭伊斯兰的非宗教统治者。老布什总统与这一家族和自 1752 年起统治科威特的萨巴赫家族的贾比尔·艾哈迈德（Jaber al-Ahmad）埃米尔保持着密切关系。他动用 10 万士兵把伊拉克军队驱逐出科威特。但凡有必要，他还会保卫沙特的君主政权。美国首先发动了“沙漠盾牌”行动。在联合国要求萨达姆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通牒到期后，1991 年 1 月 15 日，又发动了“沙漠风暴”行动。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参与了行动。这一行动得到了苏联和阿拉伯联盟的首肯。[21]这是美国首次没有以捍卫民主为借口发动的一场战争，事实上它也难以那样做。因为，1918—1928 年间，消灭多个敌对部落的萨乌德家族在赢得对沙特的统治权后，公开处死了 45 000 人。在这个拥有 400 万人口的国度中，有 35 万人因被指控犯有偷盗罪而遭断手。[22]与沙特一样，科威特也并非民主的楷模，该国约 200 万人口中，只有 6.5 万人享有投票权。妇女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权力掌握在执政的萨巴赫家族从其成员中选出的埃米尔手中。尽管美国舆论对这场战争的必要性莫衷一是，批准开战的决议仅以 5 票多数在国会获得通过，但战争清楚地表明，石油政策和国际安全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决定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美国在海外的军事活动不只是地缘战略的要求，更是经济发展的绝对需要。

持续六周左右的战争的确完全为了捍卫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目的。美国乘机在沙特建立了基地，并在此后数年中推销了数十亿美元武器。[23]当美军从沙特和科威特撤离之时，已确定了价值 100 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失败后的萨达姆不得不放弃科威特，但他依然活着，并继续在伊拉克掌权。老布什总统不想僭越联合国赋予美国的权力。他清楚，假如越权入侵巴格达，他将难以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它们支持“沙漠风暴”行动，但不愿攻击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继续战争会加剧地

区问题，老布什于是就采取了温和行动。在战争期间，他派遣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前往特拉维夫，劝说以色列不要因为伊拉克向其发射导弹而采取报复行动。战争结束后，老布什指示中央情报局通过“隐蔽行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约有 2 000 多万美元被用于反萨达姆的宣传，至少有 1 100 万美元被交给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在伦敦领导的伊拉克国民大会。该组织内活跃着多个伊拉克反对派和库尔德组织。[24]

五角大楼“鹰派”对老布什做出的不向伊拉克推进以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决定并不甘心。最好战和最凶残的“鹰派”人物并非军人，而是在五角大楼工作的文职人员，即激进的极右“新保守派”（Neocons）[25]，他们代表借助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武器的专业公司的利益，这些企业位于“阳光带”（得克萨斯、密苏里、佛罗里达、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州）。这一地区在冷战中受益最大，美国人口和经济重心已向该地区转移。[26]这些人包括当时的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D. Wolfowitz）、刘易斯·利比（I. Lewis Lybby）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等保守理论家。他们主张基于对敌人攻击的预判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并向政府施压，要求其扩展核武器的功能，以便保证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在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他们认为，美国应利用自身军事实力，借助武力向所有国家，尤其是伊斯兰世界从经济和政治上推行其“生活方式”。因为，能与其抗衡的苏联已不复存在。

1992 年，切尼发布了《防务计划指南》。该文件的大部分内容由副国务卿沃尔福威茨拟订。它宣称，冷战之后，美国的主要政治和军事目标是“预防新对手的出现”和阻止“任何敌对势力主导这样的地区：一旦该地区资源被他人牢固地控制，将足以产生全球性权力”。这些地区包括西欧、东亚、前苏联和西南亚。美国还应保持必要的领导地位，以确立和保护新秩序，应对那些试图发挥更大作用或在美国利益面前保持侵略性姿态的可能竞争者的挑战。《防务计划指南》主张，美国应劝阻其他工业国家挑战其领导地位或试图颠覆现存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它认为美国“必须保持阻止潜在竞争者可能寻求更大地区或全球作用的机制”，还应干预地区冲突或不稳定之源，推动对国际法的遵守，减少国际暴力，推广民主政体和开放的经济体系，以便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恐怖主义在地区或局部冲突中对美国公民的威胁以及贩毒对美国社会的威胁，保护原料产地通道，尤其是波斯湾地区。[27]美国每年从国防预算中支出 500 亿美元用于保护波斯湾的安全，这一金额是美国从该地区进口石油成本的 5 倍。《防务计

划指南》预见到了一些冲突局面，尤其是与伊拉克和朝鲜的冲突。[28]

沃尔福威茨认为，基于“威慑和遏制”原则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作为冷战的产物已过时，美国应公开宣扬其霸权，作为世界警察挥舞“大棒”，并利用其军事实力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专家们对冷战后美国应发挥的作用意见不一。军人们也显得谨小慎微。因为，尽管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试用了尖端武器，提高了军队士气，但越战的失败依然让他们记忆犹新。[29]五角大楼的“新保守派”们则感到鼓舞，他们希望美国对南斯拉夫也实施干预，在塞尔维亚动用其空中打击能力。他们开始控制共和党。该党的地理基地已从北部移到南部，尤其是位于“阳光带”的几个州，很多极端保守的南方浸信会教徒开始在那里建立选民区，把圣公会、卫理公会和长老会教徒排挤出去。

老布什认为，美国在科威特打败萨达姆军队已恢复了声誉。[30]他声称，“我们的确彻底消除了‘越战综合征’”。他没有接受“新保守派”宣扬的正式确立《防务计划指南》的主张。他们希望美国在“麻烦时期”成为“世界警察”，并通过武力，甚至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和平”。老布什属老式保守派，在共和党内倾向中间，更接近“三边主义者”和传统保守派。传统保守派支持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这类地区性经济集团和“世界新秩序”。他们认为，美国应利用和掌控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领导富国俱乐部，即工业国家卡特尔，真正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也就是使用武力维持中美洲、加勒比和中东的现状。

1992 年，美军参谋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将军在制定美国军事战略方针时，主张美国使用武力，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组成联合部队。他承认，“我们还必须根据自身利益要求，保留独立行动能力”[31]，在必要情况下，使用决定性力量消灭对手，“以最小生命代价”，快速结束冲突。[32]然而，鲍威尔对要求美国干预巴尔干分裂战争的呼吁置之不理。波黑的塞族人通过驱逐非塞族人和抓捕、杀害平民，进行所谓的种族清洗。鲍威尔认为，华盛顿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一行动将付出的代价，那些干涉主义者（沃尔福威茨及“新保守派”）的说法是基于期望而不是现实。他们希望通过使用空中力量把战争对美国的影响降至最低，避免美军人员伤亡。[33]切尼与鲍威尔意见一致，认为不应该让地面部队卷入巴尔干。但沃尔福威茨认为，光对武器实施禁运没有效果，巴尔干会变得更加脆弱。他认为美国不应回避，而应干预冲突。[34]利益由“鹰派”所捍卫的军工企业需要更多的武器订单。老布什持模糊立场，他宣布美国的军事结构应维持

不变。1993财政年度，他本想拨给五角大楼2 810亿美元，但被国会削减为2 750亿。不过，这也仅仅是回到了冷战时期正常水平的军费开支，尽管40年中一直作为美国主要对手的苏联集团已不复存在。加图研究所国际政治分析家杰弗里·格拉克（Jeffrey R. Gerlach）指出，“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在防务上依然花费比其七国集团盟友加起来还多出很多的资金十分荒唐”[35]。老布什总统所提出的保持美国霸权战略需要约2 900亿～3 000亿美元的资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5%）[36]和160万现役军人。1993年，美国仅在北约就投入了900亿～1 000亿美元，理由是履行保护欧洲的义务。但如果说共产主义已经消亡，俄罗斯连发动一场哪怕是常规战争以恢复对原苏联共和国统治的条件也没有，那么对欧洲的威胁从何而来？

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俄罗斯已不再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恰恰相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加上中国的开放，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其征服了大片非资本主义市场，这一市场可被美国和西欧大公司用来投放其经济剩余。另外，这些大公司还能为它们的雇佣体系获得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生产元素。东欧非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积累。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言，把不复存在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国营企业占为己有的新资本家们从共产党队伍中产生了。已经得到加强的经济国际化进程随着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发展而进一步提速，呈现了真正的全球化格局。在这一全球化背景中，各国政府更加丧失了按照凯恩斯主义驾驭本国经济的能力，金融资本极力破坏福利国家的基础，推进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因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已经消失。

由1982年墨西哥拖欠债务引发的拉美危机造成外国和本国资本大量外逃，使该地区进口和外债偿还能力受到限制，进而引发通胀失控和经济萧条。这一状况开始严重危及美国利益，使其出口受到影响。1989年3月，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37]（Nicholas Brady）提出一项计划[38]，其目的是通过减少本金或利率，延长偿还期限，并用固定利率债券代替浮动利率债券以减少外债金额。但只有那些接受预设条件，即实行“新自由主义”性质“机构改革”的国家，才有可能减债。[39]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适应外国债权人的“债务战略”，而这一战略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债务重新谈判条件确定的。

定居华盛顿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当时向国际经济研究所[40]组织的会议提交了一份文件。该文件包含经济改革的10条建议，在华盛顿形成广泛共识。这些建议不仅在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

中形成共识，在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政府经济部门、美联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智库”的专家治国论者中间也不例外。[41]这些意在稳定货币和彻底恢复市场定律的建议包括：（1）财政纪律；（2）改变公共开支重点；（3）税收改革；（4）正利率；（5）根据市场规律制定汇率；（6）开放贸易；（7）取消对外资的限制；（8）对公共企业实行私有化；（9）取消对经济活动（特别是劳动市场的经济活动）的管制；（10）保护产权。[42]南半球和东欧国家均被迫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长期结构调整，而工业国家则可自愿为之。这是“里根经济模式”，即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于20世纪80年代所实施的政策，它采取经济自由化，取消对经济活动（电话、航空公司等）的管制。同时极力摧毁工会力量，瓦解以英国为首的福利国家。

财政纪律作为一种用来控制几乎失控的通胀的紧缩政策，实际上是拉美国家重新恢复可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的一种需要。“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各项措施使自由主义（开放主义）原则重新焕发活力，备受鼓舞，特别是对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取消经济管制以及外贸的单边开放。这些措施与60年代美国支持的各国军政府试图在拉美实行或未成功实行的政策类似，只是在付出巨大社会代价和对人权彻底漠视的智利取得了相对成功，它们是在“芝加哥弟子”[43]指导下实行的。但它们却成为南半球国家（亚非拉）和东欧国家重新谈判外债和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得到任何帮助或资金的根本条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这两个机构中，美国自其创立起就是唯一真正拥有否决权的国家。[44]美国是包括日、德、法、英等国在内的工业国卡特尔的首领。[45]这两个由美国控制的孪生金融机构开始构筑世界经济新秩序，要求债务国采取“华盛顿共识”所确定的措施。它们通过条件限制，严重地损害了拉美和其他地区国家的民族主权。世界银行前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0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承认这一点。[46]这些国家有可能失去掌控自己经济、决定自己未来和根据自身社会现实制定政策的能力。

这场20世纪80年代波及亚非拉的经济危机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变成了两个庞然大物，它们能蛮横地向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债务国推行其“处方”。[47]这些国家不得不采纳其建议，以便获得贷款和资金援助，用以建设公共项目，同时还必须将各自的经济政策和投资决策置于国际监管之下。堪萨斯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赫德逊（Michael Hudson）认为，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资金需要，强迫它们实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改革。[48]他预计，“华盛顿共识”的趋势是

“使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负有对美国的债务，这将使世界的发展进程延缓，并要求美国用本身的美元债务为手段，去解决每一个地区的支付不平衡”[49]。这一条件限制[50]甚至影响各国的防务政策，因为军费开支被规定了限额。拉美国家不得不单方面开放其外贸等政策，降低关税壁垒，使美国得以在外债问题上无须优先考虑银行部门利益的情况下按照美国出口商的压力行事，把美国与该地区的贸易逆差变为顺差。

美国在多边领域的战略是把外债重新谈判与采取“结构性调整”项目联系起来，也就是以接受结构性调整为条件。这意味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监督下，向产品、服务和资本开放市场，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并放开对经济的管制。[51]这一揽子改革实际上是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存在的共识，概括起来就是，国家不管是作为国内和国际交易的经营者还是监管者，都应退出经济领域。这样，整个拉美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就都仅受市场力量的支配，也就是受以美国公司占主导的51家大公司的支配，这些公司俨然成为一个超国家实体。降低国家的作用，即“最小国家”，意味着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把所有经济权力转让给多数属于美国的跨国大公司，它们占有了以私有化名义被政府抛售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实际上是民族企业外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它们在总部设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的侵袭中变得十分脆弱。[52]这样做为的是建立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使其成为一个自由区，让竞争存在于整个世界市场，为跨国公司、投资者和银行家提供转移资金、产品、工厂、利润和技术的自由，而民族国家政府难以对其造成任何阻碍。这就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所构想的国际关系模式。在他看来，民族国家政府“自动爱国”，而没有国家权力影响的私营跨国公司“通常无爱国心”，这就使得利润率成为国际冲突中避免浪费和破坏的最好保证。[53]然而，一个“经济上没有国家存在的世界”难以保证全球化金融资本的风险和复杂性所要求的秩序和稳定，而秩序和稳定对跨国投资者来说必不可少。[54]

1990年6月27日，老布什总统所宣布的“开创美洲事业倡议”是美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模式的一部分，尽管美国国内的一些阶层包括工会在内反对全球化。在难以减少贸易不平衡的背景下，建立一个从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到火地岛的自由贸易区，能够进一步提高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商品出口，避免与各国政府谈判并做出其他让步，也能排除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基于这一目的，老布什着手商谈一系列贸易协定。首先是与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执政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建立《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他试图设立一个 15 亿美元基金，用以支持投资项目的实施。在本半球拥有这一自由贸易区后，跨国公司就能够在转移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除劳动力外）方面获得最大自由。与此同时，美国却根据自己的需要，以不正当竞争、卫生风险和国家安全等各种借口，限制别国产品进入其市场。[55]然而，由跨国公司提出并得到其支持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和加拿大遇到了强烈反对，特别是来自劳动者工会的抵触。因为，就业机会有可能被出口到工资更低的墨西哥。

美国在通过“肯尼迪回合”谈判（1962—1967 年）确定降低税率和国际贸易自由化后，凭借其实力推进了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类贸易协议，并推动“乌拉圭回合”（1987—1994 年）取得成功。“乌拉圭回合”以达成多个协议并把关贸总协定变为世界贸易组织而告终。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占主导的是工业国家的利益，它们之间组成了更大市场，相互变得更加密不可分，尽管 1991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批准后，工业国家间的矛盾加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欧盟和统一货币[56]，朝建立一个欧洲统一国家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关贸总协定签署国被迫下调关税近 40%，减少在纺织和农业领域的保护主义措施，取消或降低补贴，并应用涉及服务、投资、配额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新规则和规章。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在《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57]一书中承认，“在‘肯尼迪回合’取得的减税和由此引发的多个谈判‘回合’中，更多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譬如从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贷款所附加的条件”。“乌拉圭回合”的目的是消除产品、资本和利润自由流通的壁垒，阻止协议签署国根据自身需要采取不同的经济、社会政策和规章，推动金融投资者和主宰世界市场的大公司利益，使它们能够把商业利润转移到美国。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又一支柱，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起，成为监督和推行超帝国主义政府体系规章的三巨头。它基本上由 60 家大公司总部所在的工业国卡特尔所支配，以全球化为手段，扼杀和破坏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58]美国在幕后制定规则，进而操纵世界贸易组织，这和它在七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北约、美洲国家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其他各种组织和机构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59]

【注解】

[1] Alexander (ed.), 1976, pp. vi e xv.

[2] Hoffman, 1998, p. 67.

[3] Id., ibid., p. 186.

[4] Kimche，1996，pp. 332－334.

[5] Hiro，2003，pp. 224－225.

[6] Darwish & Alexander，1991，p. 230.

[7] Id.，ibid.，pp. 267－268.

[8] Hiro，2003，p. 34. Tirman，1997，p. 171. Camacho，2004，pp. 25－27. Darwish & Alexander，1991，pp. 267－270. April Glaspie Transcript—http://www.whatreallyhappened.com/ARTICLE5/april.html.

[9] 1991年4月，格拉斯皮大使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声称，她反复警告萨达姆，让他不要使用武力解决与科威特的冲突。她对自己的话被萨达姆理解为美国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计划的默许感到意外。“*We foolishly did not realize he* [*Saddam*] *was stupid.*”

[10] Apud Darwish & Alexander，1991，p. 270.

[11] 萨乌德王朝的历史要追溯到1744年。当时，穆罕默德·瓦哈卜（Muhammad Ibn Wahhab）酋长在迪里耶安顿，穆罕默德·萨乌德（Muhammad Ibn Sa'ud）亲王同意帮助他，并在他所进行的肃清伊斯兰信仰扭曲事业中提供支持。1824年，图尔基·阿卜杜拉（Turki Ibn Abdullah）攻占利雅德，将纳季德从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的军队中解放出来。1902年，阿卜杜勒·萨乌德（Abdul Aziz Sa'ud）国王攻占利雅德并建立了未来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雏形。

[12] Ferguson，2004，p. 109.

[13] Id.，ibid.，p. 109.

[14] Baer，2003，pp. 152－153.

[15]《前线》栏目采访了驻华盛顿的使团长班达尔亲王。他声称，尽管美国的中东政策存在缺陷，但“9·11”袭击不应归咎于美国。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terrorism/interviews/bandar.html. Vide também Baer，2003，p. 154.

[16]《前线》栏目采访了驻华盛顿的使团长班达尔亲王。他声称，尽管美国的中东政策存在缺陷，但“9·11”袭击不应归咎于美国。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terrorism/interviews/bandar.html.

[17] Prado，2001，p. 163.

[18] Unger，2004，p. 36.

[19] Gerson & Birchard，1991，p. 291.

[20] 在沙特拥有的基地使美国得以在1979年快速向北也门即亲西方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提供武器。当时，它正与社会党领导人阿卜杜勒·伊斯玛仪（Abd al-Fatth Isma'il）执政的也门民主共和国即南也门交战。南也门得到苏联的支持。

[21] Shellum，Brian. “A Chronology of Defense Intelligence in the Gulf War：a Research Aid for Analysts”. July 1977.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History Office—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2] Unger，2004，pp. 103－104.

[23] Tirman，1997，p. 178，

[24] Mahle，2004，p. 215.

[25] neoconservatives 的缩写。

[26] Trubowitz，1998，pp. 226-227. Johnson，2002，p. 765.

[27] "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 "U. S. Strategy Plan Calls for Insuring No Rivals Develop" 的摘要，1992 年 3 月 8 日发表于《纽约时报》。Vide também Tyler，Patrick E. "Lone Superpower Plan：Ammunition for Cr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10/3/1992. Gellman，Barton "Keeping the U. S. First：Pentagon Would Preclude a Rival Superpower". *The Washington Post*，11/3/1992.

[28] Johnson，2001，p. 87.

[29] Halberstam，2003，pp. 59-60，146-147.

[30] Power，2002，p. 161.

[31] Powell，Collin L. *The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2.

[32] Id.，ibid.

[33] Halberstam，2001，p. 141.

[34] Id.，ibid.，pp. 141-142.

[35] Gerlach，Jeffrey R. *Pentagon Myths And Global Realities*：*The 1993 Military Budget*. Policy Analysis No. 171—May 24，1992. Cato Institute. http://www. cato. org/pubs/pas/pa-171. html.

[36] 军费相对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下降反映了美国经济自 1960 年之后的极大增长。美国 196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16 553 亿美元（定值美元），1989 年增至 41 177 亿。鉴于这一增长，军费比例自然下降。

[37] 在卡塔赫纳举行的打击毒品会议（1990 年 2 月 15 日）后，老布什总统要求助理们和财政部长布雷迪修正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政策，因而就有了对该地区各国外债进行重新谈判的计划。他将这一政策体现在 1990 年 6 月 27 日制定的《美洲倡议》中。此后，在波斯湾冲突正趋激烈之际，他访问了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委内瑞拉。

[38] 布雷迪计划的灵感来自 1987 年 4 月出任（巴西）财长的路易斯·佩雷拉教授（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向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提的一个想法。他希望为巴西争取"减债"，也就是债务的证券化。贝克没有接受他的提议，不同意把自愿减少私人债务方案与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协议脱钩。

[39] Bresser-Pereira，Luiz Carlos. "O Plano Brady"，in *IstoÉ-Senhor*，22/3/1989.

[40] 国际经济研究所于 1981 年依靠德国马歇尔基金创立。靠福特基金会、威廉和弗洛拉基金会以及斯隆基金会的捐款维持。

[41] 关于这一内容，可参阅 Williamson，l990，pp. 9 e 10。

[42] Id.，ibid.，pp. 10 a 33.

[43] "芝加哥弟子" 属于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82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主张作为曼彻斯特学派的现代版，是最极端的自由主义，它要求对企业和政府服务实行私有化，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放开对融资的限制，取消对经济活动的监管以及对进出口、价格和工资的控制，将所有权力交给市场。1970 年，智利 20%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由于采取这一政策，1990 年皮诺切特交出政权时，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到了 40%。

[44] Stiglitz，2003，p. 167. 1990 年，仅 7 个国家就控制着世界银行 45%的投票权。美国一国就拥有 17%的投票权。Id.，ibid.，p. 166.

[45] Hanahoe，2003，pp. 166-167.

[46] Stiglitz，2003，p. 9.

[47] Hanahoe，2003，p. 181.

[48] Hudson，2003，p. x.

[49] Id.，ibid.，p. 32.

[50] "'有条件'指的是更苛刻的条件，它们往往将贷款用作政治工具。比如说，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一个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它就会分期支付贷款，并将随后的分期贷款与能够核实的金融市场开放步骤捆绑在一起。" Stiglitz，2002，p. 44.

[51] Pinheiro Guimarães，1999，p. 90.

[52] Wood，2003，pp. 133-134.

[53] Viner，Jacob.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State-Controlled National Economies",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4 (Suppl. March 1944) p. 315，apud Hudson，2003，p. 8.

[54] Panitch & Leys (eds.)，1999，pp. 3-14.

[55] Pinheiro Guimarães，Samuel. "Market Access in a ALCA". 向美洲发展银行及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ECLAC）1992 年 9 月 28—29 日进行的 IDB/ECLAC 研讨会"支持本半球贸易开放进程"圆桌会议提交的文件原件。

[56]《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 年生效。统一货币即欧元自 2002 年启用。

[57] Ferguson，2004，p. 9.

[58] Hananoe，2003，p. 25.

[59]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于 1989 年，由以下国家和地区组成：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美国、越南。

第二十七章

美国经济危机　克林顿当选总统　国防开支和军工企业的利益　人道主义干预和帝国主义目的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　干涉索马里遇挫　发生在美国的“圣战”　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　伊拉克问题和暗杀萨达姆阴谋

成功地把萨达姆军队驱逐出科威特未能使老布什在1992年获得连任。美国仍未能摆脱经济危机，虽然其严重程度比不上原苏联所经历的危机，但其在选票中的分量超过伊拉克战争。作为老布什的继任者，民主党总统威廉·克林顿（William J. Clinton）（1993—2000年）接手的是高达2 9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1992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00年左右将增至4 550亿美元。大部分赤字来自国防开支，它是冷战期间所建立的军事体系的需要。1989年，曾在肯尼迪政府（1961—1963年）和约翰逊政府（1963—1969年）中担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一数目可在五年内逐渐减至一半。

尽管国防预算在克林顿当选前出现了轻微下降，而军工企业的院外活动组织声称，快速“非军事化”将导致人口的大量迁移，并给一些人群带来经济问题，但克林顿意识到，冷战确定的军费开支使政府缺乏用于国内项目的资金，导致经济扭曲，非生产性项目占据主导。他试图通过实施新政予以缩减。根据1993年9月发布的《通盘检讨报告》，美国计划削减武装力量规模以降低开支。而“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美国在和平时代的强大存在”，使美国有能力执行有限的军事行动，包括“维持和平”，且能同时参与并打赢两场“大的地区性突发战争”。克林顿政府还计划把部分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生产。为此，将在五年中投入200亿美元，其中100亿用于政府对技术的投资，40亿用于失业劳动者项目，10亿用于帮助受裁员影响的群体，50亿用于发展军民两用技术。

克林顿承认，由于苏联的解体，到1997年，美国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可减少1/3的军事开支。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Les Aspin）认为，部分因过度国防开支造成的“不良经济表现”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内在威胁。他称，“危险在于，没有以一种同时保证我们经济成功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经济的良好表现对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阿斯平建议关闭31个大型军事设施，减少或加强另外131个，这样就能从2000年起节约30亿美元。至于里根主张的“战略防御计划”，他认为“星球大战时代的末期”已经到来。他称，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计划已失去意义。于是，他把该计划更名为“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实际上，里根建设“战略防御计划”的想法被束之高阁。但要真正把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又不至于引发深刻政治问题并非易事。因为，失业人数将增加，多个地区，尤其是“阳光地带”的经济活动将受到打击。

但克林顿政府认为，国家安全将会“日益依赖”于国际结构。因此，他继续以“经济和安全利益越来越难以分隔”和“假如不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我们就无法在推进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方面取得成功”为由继续调整美国的战略。[1]在减少美国海外军事存在方面，他没有作太多努力，而是继续在世界各地维持一个庞大的基地网络，这些基地大多建于二战时期。当时，美国取代英国建立了霸主地位，德国或其他任何工业国家也不再拥有与其抗衡的能力。杜鲁门总统在波茨坦会议期间（1945年7—8月）宣称，美国将会在许多国家建立“充分保护我们利益和世界和平所需要”的军事基地。[2]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其本土和关岛、夏威夷或圣迭戈等属地共拥有6 000个军事基地。1988年前后，美国在国外拥有794个基地（见下表）。90年代，它仍在约130个国家维持702个基地，共驻扎大约253 288名军人。这一数目还不包括家属、文职官员和44 446名当地雇员。这些基地拥有44 870个军营、机库、医院和其他建筑，另有4 844座租用建筑。此外，还有用以安置负责电子窃听的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的秘密设施。国家侦察局是美国情报部门14个机构中的其中一个，1960年创建，设于国防部内，其任务是通过侦察卫星对各国领空进行警戒和控制，以便保持美国的优势。

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1947—1988年）

	1947年	1949年	1953年	1957年	1967年	1975年	1988年
欧洲、加拿大和北大西洋	506	258	446	566	673	633	627
太平洋和东南亚	343	235	291	256	271	183	121
拉美和加勒比	113	59	61	46	55	40	39

续前表

	1947 年	1949 年	1953 年	1957 年	1967 年	1975 年	1988 年
南亚	103	2	0	0	0	0	0
总数①	1 139	582	815	883	1 014	865	794

资料来源：James R. Blaker，*United States Overseas Basing*，Table 1. 2。[3]

曾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高级顾问的詹姆斯·布莱克（James Blaker）骄傲地宣称，“除美国核垄断地位外，没有比海外军事基地体系更得到广泛认可的能体现超级大国地位的标志”。事实上，美国的帝国战争机器从韩国、日本、泰国、澳大利亚、沙特和土耳其，一直延伸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英国和冰岛等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美国的附庸国。90 年代期间，除里根 1983 年建立的中东地区中央司令部外，克林顿通过在拉美（南方司令部）、太平洋（太平洋司令部）和欧洲（欧洲司令部）建立其他地区性司令部，极力扩大其全球军事独裁的基础。拥有相对自主权的总司令和将军所拥有的影响力超过了大使。他们还拥有推动军事外交的使命，即与所在地区的各国军队建立密切关系[4]，实际上充当了殖民地总督的角色。90 年代后期，至少有 7 000 名特种部队士兵分布在 150 个国家，其任务是训练当地士兵，执行所谓的“协防”任务。在很多情况下，它纯属恐怖主义的委婉表述。[5]

为了节约资金，五角大楼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部署军事基地方面采取一项新策略：备好飞机跑道、军营、汽油储备和设备，但特种部队并不长期安扎在那些基地，只是让它们保持完好，有必要进行军事干预时，可立即投入使用。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经济成本和军事人员。另外，这些基地也可定期被用作美军反恐训练、教学的支持点。同时，这些基地也是熟悉美国军事设备的场所，可以为未来用于武装当地军队的武器销售创造条件。美国着手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等南美国家以及毛里塔尼亚和马里等非洲国家建立这种间歇性基地。

训练外国军队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通过国务院和国防安全合作局的“国际军事训练项目”得以实施。除被用于搜集情报，还可成为推销武器和弹药等军事设备的一个途径。尽管各公司在得到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办公室许可后可直接买卖武器，但这一交易由五角大楼统领。在各国向第三世界出口的武器总额中，美国占 70%。1997—2000 年，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的武器出口总额达 315 亿美元[6]（占全世界总量的

① 表中各列数据之和与总数不一致，原文如此。——译者注

37.2%）。发展中国家仍是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最大销售市场。1993—2000年，向这些国家销售军工产品的合同金额占所有合同总额的67%。2000年，美国仍保持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武器供应商的地位。发展中国家是它的主要市场，与它们签订的合同金额达120亿美元，相当于总额的49.7%。俄罗斯以74亿美元位居第二，占总合同金额的29.1%。[7]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在欧洲的基地共驻扎着11万余名士兵[8]，其中73 600名在德国。那里还生活着95 000名美国军人家属。这些基地大部分分布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巴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尽管冷战已结束，苏联军队也已撤出德国。美国在德国的95个军事设施包括步兵基地、机场、医院、行政中心和广阔的军事训练区域。美国人享受各种特权，包括无须在德国登记车牌和购物免税的特权。在日本，美国拥有39个军事基地，驻扎着约48 000名士兵，其中26 000人为在普天间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那里还有嘉手纳空军基地和楚边通信设施。虽然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已于1952年正式结束，但东京仍负担驻日美军的一半费用，每年约为80亿美元。[9]

1995年，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Joseph Nye）公布了以“奈计划”著称的“东亚战略计划”[10]，以保证美国不会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撤走10余万士兵。这一消息使日本民众感到震惊，他们对制造各种事端甚至犯罪的美军士兵极为不满。[11]在韩国的情况也并无两样。自1953年停战协议签署后，美国在韩国设立了96个军事基地，共驻扎着37 000～38 000名士兵。1997年，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宣布，即使韩国和朝鲜实现统一，美国也无意从那里撤出军队。[12]美国基地遍布南美洲、中美洲、加勒比、非洲和中东国家。在打击伊拉克战争结束后，35 000名美国士兵留在了中东，这使穆斯林深感不满，占领沙特圣地的美国人被视为“异教徒”。虽然沙特王室支持并资助了“沙漠风暴”行动，但自己的国家受奴役状况以及成千上万非穆斯林美国人的出现，让多数民众感到痛心。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与“瓦哈比”严厉教规截然对立。[13]

无论是出于地缘战略考虑，还是经贸利益，尤其是军工集团的利益，美国继续卷入国际秩序被打破以及世界权力的一极崩塌后爆发的各种地区冲突。“人道主义干预”标签遮掩了帝国主义目的，它经常被用作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这些行动违反了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它们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往往多于内部冲突或内战本身。美国进行这类干预的借口永远是保护其公民或其他国家的公民。但事实上，这些行动从来不

是出于真正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由其他原因所决定，就像1939年德国占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一样。希特勒称，该行动是为保护德国少数民族而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纳粹镇压了各种抵抗行动，包括1942年彻底摧毁利迪策村。“实现和平”也成为军事干预的代名词，干预的目的并非为了制止两国间冲突，而是干涉派别、种族或军阀之间的内战。军事干预毫无例外地成为一种战争行动。在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中，使用武力的目的始终是一国主宰另一国或一国在一场内部冲突中主宰部分民众。

1991年，索马里在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支持的阿里·穆罕默德（Ali Mahdi Muhammad）总统和忠于穆罕默德·艾迪德（Mohamed Farah Aidid）将军的军阀之间爆发了内战。美国自1992年起卷入其中，它以人道主义援助名义，在好几个月时间内一直向那里空投食品。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经贸利益冲突。作为总部设在美国的多勒鲜果公司（Dole Fresh Fruit）供应商的索马里香蕉公司与由意大利资本（DE Nadai集团）、索马里政府和当地种植者[14]共同组成的合资公司争夺每月面向欧洲的20万箱香蕉生产和出口的控制权。12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94号决议，批准美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尽快建立在索马里开展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安全环境”。老布什在得到即将继任的克林顿[15]认可后，发动了“恢复希望”行动，向该国派遣25 000名士兵。联合国也派遣了2万名维和士兵。

“恢复希望”行动作为美国的“肯定性多边主义”行动，被视为美国领导下的多国军事干预。但它服从于与人道援助关系不大或毫不相干的其他目的。除了借此说服国会不削减五角大楼预算外，其另外一个目的是要结束索马里的无政府状态，恢复其安全。因为研究表明，索马里拥有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量，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其领土的2/3（1 490万英亩）已在1991年1月穆罕默德·巴雷（Muhammad Siad Barre）总统被推翻前的80年代末划拨给康诺克、阿莫科、雪佛龙和菲利普斯石油这四大美国公司，由它们负责开采。[16]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必须控制通往红海的亚丁湾入口和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这是一条战略性航线，是供应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油轮的必经通道，属美国中央司令部辖区。美国军队为了“国家重建”，即恢复索马里国家组织体系，并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政府，站到了艾迪德将军派系的对立面。

联合国部队（联合国索马里行动Ⅱ部队）卷入一场内战使其遭到大部分索马里民众（不仅仅是艾迪德派系）的敌视，并遭受了严重的人员损失。在把24名巴基斯坦维和人员之死归咎于艾迪德将军后，联合特别行动

特遣队游骑兵在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将军统率下，试图在摩加迪沙将其抓获，然后交给联合国索马里行动Ⅱ部队并对其进行审判。尽管动用 AC-130 战机进行空袭，并发动了地面打击，但游骑兵特遣队于 1993 年 10 月 3 日发动的攻击以失败告终，两架运送游骑兵的 MH-60“黑鹰”直升机被击落。于是，由托马斯·蒙哥马利（Thomas Montgomery）将军统率的快速部署部队参与行动，战斗一直持续到 4 日，500 多名索马里人丧生，1 000 多人受伤。美军 18 人被打死，83 人受伤，美军士兵的尸体在摩加迪沙被游街。美军士兵的伤亡和令人恐惧的游街场景震惊了华盛顿。这是美国自越战以来遭受的最大失败。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C. Byrd）劝告克林顿终结那些“警匪行动”。曾在越南战争中被俘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卡恩（John McCain）宣称：“克林顿应该让他们回家。”[17]克林顿别无选择，只能结束这场失败的“人道主义干预”，并于 1994 年 3 月 31 日下令美国军队全部从索马里撤出。但克林顿试图将这一完全由美国造成的灾难归咎于联合国，他指责联合国赋予美国军队“警察职能”。[18]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宣称，“多边主义已在摩加迪沙的街巷中遭扼杀”。1993 年 10 月 18 日的《纽约时报》标题为：“在支持对艾迪德的追击后，美国现在将战斗中的伤亡归咎联合国”[19]。

华盛顿认为，本·拉登训练并资助了抵制联合国部队和袭击美国特种部队（游骑兵特遣队）的部落。[20]1994 年，沙特政府剥夺了本·拉登的沙特国籍，之后，又将返回沙特继续从事针对“不忠诚的”王室“圣战”的他驱逐出境，本·拉登于是就到了苏丹。[21]尽管他在那里投资兴建工程，但由于来自埃及的压力，1996 年，苏丹政府以他策划针对穆巴拉克的阴谋和沙特胡拜尔军事基地爆炸案为由将其驱逐。沙特政府尽管在宣扬伊斯兰教“瓦哈比”教义时仍继续暗中使用石油美元，但没有同意让本·拉登回来。他们担心，由于本·拉登在民众中所享有的威望，扣押他将会使所有反对王室者团结起来，进而激起民众暴动。[22]这样，本·拉登就返回到仍在运作的阿富汗“圣战者”训练营中。许多曾参与抵抗苏联战斗的老资格雇佣兵都是从那里前往索马里、波斯尼亚、科索沃和车臣参与暴动。美国国会恐怖主义和非常规战争工作组组长约瑟夫·波丹斯基（Yossef Bodansky）认为，这些地区的暴动是“真主党”在摩加迪沙举行（1996 年）的一次会议中做出的规划，本·拉登以及伊朗和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巴基斯坦情报部门不仅向伊斯兰分裂主义分子提供武器，还为他们制定战略方针。[23]

从1987年到1998年，基地组织成员的培训工作在埃及军官阿里·穆罕默德的督导下进行。此人同时还在肯尼迪特种战争中心任教，训练美国的地下网络成员和特种部队军官。1998年年初他被抓后，本·拉登建立了“世界伊斯兰阵线”，该组织成员包括埃及“伊斯兰组织”、阿伊曼·扎瓦西里（Ayman al-Zawahiri）领导的“埃及圣战组织”和艾哈迈德·塔赫（Rifa'i Ahmad Taha）为首的“伊斯兰集团”，它以打击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为目标。2月，他发表的一个“教法见解”[24]宣称：“在7年多时间中，美国占据着阿拉伯半岛整个伊斯兰地区，他们掠夺财富、订立规章、侮辱人民、恐吓邻居，并将其基地作为打击周围穆斯林邻居的矛头。”

本·拉登在这份文件中还指出，能证明他所说的最好证据就是美国仍在利用设在阿拉伯半岛的军事基地侵略伊拉克的事实。虽然，美国的侵略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巨大苦难并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超过100万人），但它依然没有停止屠杀，而且似乎并不满足于海湾战争后对伊拉克实行的封锁。[25]他称：“他们想毁灭该国人民尚存的一切，并羞辱其他穆斯林邻居。”

克林顿并没有改变美国中东政策的总体方针，两党就此已达成共识。海湾战争后针对伊拉克实施的禁运贯穿了整个90年代，造成约50万伊拉克平民死于营养不良、疾病和药品短缺，但却未能迫使萨达姆下台。[26]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Samuel R. Berger）骄傲地宣称，这一封锁“是史无前例的严厉”[27]。但是，针对其他国家采取制裁政策、军事干涉和（或）“隐蔽行动”，迟早会自食其果。五角大楼199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致使其极易招致攻击。历史资料揭示了美国卷入国际问题和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数量上升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民族国家无力公开对抗美国的军事不对称，导致跨国行动者的出现”[28]。加利福尼亚大学名誉教授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认为，针对无辜且手无寸铁美国人的恐怖袭击属于报复。他的这一理解完全有道理，因为，美国士兵和海员通过军舰或B-52轰炸机从遥不可及的地方或高度发射导弹，并在中东支持着残暴政权。[29]

华盛顿通过中央情报局和军队在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发动的军事政变和外部战争中所实施的对外政策的后果，开始在美国国内得到强烈反应。[30]1993年1月25日，克林顿执政后第五天，曾在阿富汗抗击苏联的前“圣战者”巴基斯坦人米尔·坎西（Mir Aimal Kasi）把一辆汽车停放在兰利中央情报局总部门前，他用AK-47冲锋枪打死了该机构官员弗兰克·达林（Frank Darling）和兰辛·班尼特（Lansing Bennett），另有多人受伤。[31]凶手后在巴基斯坦被抓获（1997年）并遣送到美国。他向美国

联邦调查局供认，因为美国轰炸伊拉克、杀害巴基斯坦人以及中央情报局深深卷入伊斯兰国家内部事务，所以，他想惩罚美国政府。

2月26日，也就是中央情报局两名官员被杀一个月后，一枚炸弹在世界贸易中心地下车库爆炸，炸毁了塔楼结构，造成六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这一事件发生四天后，《纽约时报》接到一封信，一个自称“解放军”的组织在信中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并警告说：

> 必须用类似方式回应以色列所从事的（得到美国支持的）恐怖主义。一些国家针对本国人民的独裁和恐怖主义（也得到美国支持）同样必须用恐怖主义来回击。[32]

世界贸易中心车库炸弹是由多个国家的穆斯林“圣战者”安放的，其中主要是埃及人。为抗击苏联军队，他们在阿富汗营地接受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的训练，这些营地是在中央情报局资助下建立的。[33]三个月后，作案的恐怖分子被抓获时[34]，当局发现，他们的头目拉姆齐·尤塞夫（Ramzi Yousef）持一本伊拉克假护照，他以阿卜杜勒·卡里姆（Abdul Basit Mahmud Abdul Karim）的身份进入美国。引爆炸弹的伊密·沙林（Emad Salem）是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效力的情报员，与埃及情报机构有关系。包括出租车司机、爆炸案组织者马哈茂德·阿布哈里马（Mahmud Abouhalima）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曾作为“圣战者”在阿富汗抗击苏联军队。他们曾接受中央情报局的培训，并从该机构获得武器。他们认为，冷战已成为历史，但“圣战”尚未结束。[35]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策划者之一的埃及人赛义德·诺塞尔[36]（El Sayyid Nosair）来到美国后，于1990年11月5日杀害了犹太教教士梅厄·卡亨（Meir David Kahane）。卡亨作为一名正统犹太人，是原教旨主义者、“捍卫犹太人联盟”的创始人。这一种族主义组织主张把所有阿拉伯人逐出以色列，包括加沙地带和西岸的阿拉伯居民。“圣战”已进入新阶段，其精神领袖是双目失明的伊斯兰教教士奥马尔·拉赫曼（Omar Abdel-Rahman）。此人是原教旨主义运动“伊斯兰组织”领导人，曾试图推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他将穆巴拉克称为“西方驯顺的犬”。作为一名优秀的宣传员，他曾是中央情报局“很有价值的资产”。他从两万名“圣战者”中招募了包括阿布哈里马在内的许多人，让他们前往阿富汗抗击苏联军队。[37]但他憎恶西方文化的物质主义。他用中央情报局批准的签证来到美国后[38]，极力鼓动他的追随者摧毁“资本主义的高楼大厦”[39]。

1994年10月7日，彼得·多伊奇（Peter Deutsch）众议员（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在众议院称："我惊愕地注意到，一些与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有密切联系的阿富汗组织被认为卷入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40]他感到诧异是有道理的，因为巴基斯坦情报组织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资助。穆罕默德·阿布哈里马、赛义德·诺塞尔、易卜拉欣·加布罗尼（Ibrahim El-Gabrowny）和阿卜杜勒·亚辛[41]（Abdul Rahman Yasin，美国人）等人的计划是，以纽约为起点在美国发动血腥恐怖袭击，摧毁桥梁、隧道和联合国大楼这类象征性建筑。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的沙林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于1992年2月6日把这起阴谋告知了联邦调查局。[42]虽然联邦调查局对这些穆斯林实施了监视，但却在阻止爆炸案中毫无作为。伊拉克被怀疑与恐怖主义者合作，以报复它所遭受的严厉封锁。尤塞夫持一本没有签证的伊拉克护照，于1992年9月1日进入美国，并在获得庇护后住到一个名为穆萨巴·亚辛（Musab Yasin）的伊拉克人家中的事实，本可成为美国按共和党"新保守派"主张对萨达姆政权采取军事干预的借口。但一切都未能得到证实，就连联邦调查局为何没有阻止袭击发生的原因也未弄清。整个过程中唯一清楚的是，恐怖主义者是曾作为"自由战士"在阿富汗营地接受训练的"圣战者"，他们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伙伴巴基斯坦情报组织和海洛因毒贩有牵连。美国正在吞食自己种下的苦果。[43]

在总统竞选期间，克林顿曾指责老布什"没有吸取姑息萨达姆的教训"，而让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继续受压迫。[44]他表示，萨达姆并没有让他感到"烦恼"。1993年1月13日，他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承认，可以想象与萨达姆保持一种正常关系。克林顿称："他应该做的一切就是改变自己的行为。"[45]种种迹象表明，科威特政府担心克林顿会将其抛弃，并与萨达姆改善关系。4月13日，科威特在沙漠中抓获了12名伊拉克人，并指责他们阴谋杀害正在科威特访问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老布什是作为谢赫·萨巴赫（Sheikh Jaber Ⅲ al Sabah）的埃米尔客人，前往参加驱逐萨达姆军队两周年纪念活动。四天后，其中一名俘虏瓦利·加扎利（Wali al-Ghazali）在严刑逼供下承认，他们受伊拉克情报部门指使。另一名俘虏拉阿德·阿萨迪（Ra'ad al-Assadi）表示，认识那辆装载炸弹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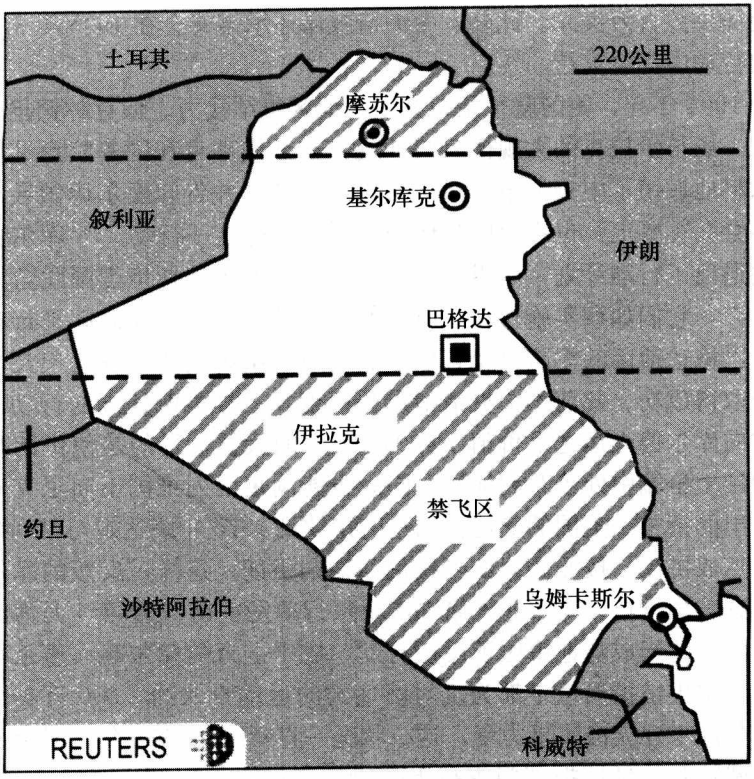
美国政府承认，在抓获伊拉克人和发现所谓的汽车炸弹之间间隔这么长的时间（四天），使这一事件系科威特有意编造的可能性增加。此前，这类事件曾发生过多次。但克林顿仍以巴格达煽动暗杀老布什阴谋为由，

命令五角大楼采取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提议对伊拉克情报机构总部发动袭击，作为适度反击，以劝阻萨达姆政府停止支持恐怖主义，而不是向萨达姆的各个宫殿投掷炸弹。因为，那样做可能无法炸死萨达姆，但会造成无辜平民的伤亡。[46]6 月 26 日，23 枚战斧巡航导弹从停泊在波斯湾和红海的美军战舰上发射，目标为伊拉克情报总局大楼。但其中四枚（或更多）导弹偏离预定目标，摧毁了附近的几处住宅，8 名无辜平民被炸死，包括当时正在睡觉的著名画家莱拉·阿塔尔（Layla al-Attar）及其丈夫和子女。[47]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声称，轰炸巴格达行动可能会拯救中东及其他地区许多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性命。塞缪尔·赫什认为，此话令人想起越战时期的种种说法。莱克恬不知耻地声称，“报复”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五十一条。该条款赋予成员国出于自我防卫反击别国武装攻击的权利。但该条款并不适用此种情况[48]，因为没有发生来自伊拉克的任何武装攻击，而只是一个针对美国前总统的阴谋假设，因而，难以证明这属于个人或集体自我防卫的行动。“肯定性多边主义”不过是一个修辞。从表面上看，该阴谋是一个挑衅行为。赫什在《纽约人》杂志发表的文章戳穿了科威特的谎言。他指出，根本就不存在能把科威特法庭展示的所谓丰田陆地巡洋舰汽车炸弹与伊拉克联系起来的明显证据。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aleine Albright）大使在安理会展示的照片让人们看到的是“大量通常被用于步话机和飞机模型的产品，其产地很可能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其中一地”[49]。他认为，所谓针对礼节性访问科威特的老布什的阴谋有点“雅培和科斯特洛的味道”[50]。他指的是一对 20 世纪 30 年代起专门出演滑稽戏的喜剧演员。

不管使用何种借口，事实上，在华盛顿核心圈中确有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意图。海湾战争（1991 年）后，联合国安理会作为美国的假面具，把伊拉克变成了实质上的保护国。其各种机构开始在那里开展工作，如联合国伊拉克人道援助协调办公室、巴格达监测和核查中心以及联合国伊科观察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 687 号决议（1991 年）第三款规定，伊拉克必须无条件接受在国际监督下销毁、消除或解除所有射程超过 150 公里的弹道导弹和相关主要部件以及与其生产有关的设施和设备。安理会还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范围内确定了更加严厉和广泛的制裁。而 1980 年伊拉克入侵伊朗时，美国并没有采取同样做法，原因是它希望消灭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伊斯兰政权，另外还由于当时的伊拉克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伊拉克的石油出口通过“石油换食品”项目而受到限制。采取这一做法是为

了避免萨达姆政府从中受益。美、英、法以保护北部的库尔德人和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为借口在伊拉克划定了“禁飞区”。根据“谴责伊拉克在多处镇压平民”的安理会第688号决议，美英战机对“禁飞区”实施了空中巡逻，伊拉克主权由此遭剥夺。当萨达姆开始限制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所采取的一些带有挑衅目的的突击核查时，冲突随即爆发。这两个机构中的大量美国籍核查人员实际上从事着间谍工作。



划定“禁飞区”的伊拉克地图[51]

联合国所建立的核查体系利用情报人员、电子通信和后勤组织技术人员作为间谍和颠覆工具，中央情报局则竭力鼓动遭萨达姆政府压迫的库尔德人和什叶派反对派发动政变和暴动。1993年8月，副总统戈尔重申美国对伊拉克国民大会“坚定的承诺”。该组织是中央情报局建立的一个假面具，它包括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伊拉克民族协约等反对萨达姆政权的组织。伊拉克民族协约领导人为伊亚德·阿拉维[52]（Iyad Allawi）、塔森·姆阿拉（Tahseen Mualla）和萨拉赫·谢赫里（Sallah al-Sheikhly），他们曾是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积极分子和伊拉克情

报局的合作者。该组织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十六处及沙特和约旦情报部门资助下，于1992年在巴格达发动了一起炸弹袭击事件。当伊拉克军事情报部门头目瓦费格·萨马赖（Wafiq Jassim al-Samarrai）站到萨达姆对立面并与旅居伦敦的什叶派商人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结盟后，由中央情报局协调的推翻萨达姆政府的军事政变计划得到大大推进。副总统戈尔、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夫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均承诺向他提供数百万美元。此外，中央情报局还承诺将会在1995年3月4日发起的行动中提供支持。[53]

自1994年起，美国就开始在波斯湾地区集结兵力。但克林顿担心美国会卷入一场与伊拉克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在征询莱克和国务院意见后，他出人意料地撤销了中央情报局对该行动的支持，并告知库尔德领导人，美国既不会在军事上，也不会以其他任何形式支持这一行动。[54]库尔德斯坦民主党退出了行动计划，而伊拉克国民大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并没有因此放弃，它们如期实施行动，但摩苏尔和基尔库克民众的起义行动没有爆发，巴格达地区的军队以及其他不满政府的组织也均未发动起义，反叛行动未取得成功。此前，中央情报局曾两度发动推翻萨达姆的行动。1972年，它向库尔德人运送了价值1 600万美元的武器，目的是使伊朗在与伊拉克的领土争端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也能满足巴列维国王向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出的请求。美国的支持行动一直持续到1975年萨达姆与巴列维就阿拉伯河达成协议。按照协议，阿拉伯河划归伊朗。这样，反叛的库尔德人不再得到美国支持。库尔德人第二次反叛行动发生在1991年1月海湾战争期间，但萨达姆成功地镇压了反叛行动，成千上万的库尔德人遭杀戮。自那时起，中央情报局每年都为反对萨达姆的运动投入约2 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用来建立准军事力量，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1996年。时年，在沙特、科威特和约旦情报部门支持下，伊拉克反对派再次发动政变。此前，萨达姆的女婿侯赛因·卡麦尔（Hussein Kamel）和萨达姆·卡麦尔（Saddam Kamel）于1995年8月逃亡约旦寻求避难，并开始与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主任罗尔夫·埃克乌斯（Rolf Ekeus）、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合作。[55]政变行动时间定于6月26日。中央情报局成员在巴格达监测和核查中心及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掩护下，负责与共和国卫队及共和国特别卫队中的谋反者联络。

沙拉比领导的伊拉克国民大会和阿拉维领导的伊拉克民族协约是行动的执行者。阿拉维分别于1995年和1996年从中央情报局得到500万和600万美元，这使他甚至能够在华盛顿从事广泛的院外活动。但萨达姆情

报人员打入了这两个组织的内部。萨达姆在了解阴谋计划后，拒绝巴格达监测和核查中心负责人美国人戈仑·沃伦（Goran Wallen）和安插有9名中央情报局成员的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美国海军陆战队前情报官员斯科特·里特[56]（William Scott Ritter）提出进入一些军营的要求。后来据里特本人透露，他和一位化名莫·多希斯（Moe Dobbs）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策划了联合国所承担的其中一项最广泛和复杂的行动。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中存在“中央情报局准军事隐蔽人员”。他还证实，1996年6月发动的针对萨达姆的政变被安排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核查人员到来之时。由于萨达姆限制核查，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共和国卫队和共和国特别卫队军营，于是就产生摩擦。紧接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0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合作，允许核查人员无限制、无条件地进入所有设施，包括伊拉克情报总局，并被允许询问所有官员，但萨达姆没有让步。核查人员被迫撤出后，中央情报局以“DBACHILLES”为代号的政变宣告流产。[57]萨达姆下令逮捕了120名政变策划者，其中很多人被处决。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另一起库尔德人的反叛行动也遭到镇压。中央情报局在五年中共投入1亿美元，这是它所策划和协调的第三次流产政变。9月3—4日，美国在英国支持下，向伊拉克的防御设施投下了44枚导弹，总费用超过4 400万美元。

但克林顿在伊拉克问题上十分谨慎，并没有选择入侵。劳伦斯·卡普兰（Lawrence F. Kapl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这两位“新保守派”成员对他的决定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美国政策的问题是“在把武力当作政策工具方面的纯粹矛盾心理”[58]。克林顿认为，袭击伊拉克情报总局和1986年轰炸利比亚一样，显示“美国实力”能够震慑那些直接卷入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的国家。[59]克林顿承认，恐怖不仅仅是一个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形式，因为恐怖组织往往得到国家和民众的支持。[60]与美国其他领导人一样，他也认为中东的恐怖主义需得到某个国家的支持，如同中央情报局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拉美国家，尤其是古巴实行的恐怖主义。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伊拉克阻止进攻或进行报复的镇压手段上，却没有意识到，恐怖主义行动产生的原因与美国卷入国际危机[61]以及它在世界各个地区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烈介入有极大关系。

在巴勒斯坦人发动的一波自杀性爆炸浪潮造成数十名以色列人丧生后，克林顿于1996年3月13日召集27国领导人在埃及举行了“反恐”会议。他在会上宣称，必须让人们十分清楚，美国谴责一切恐怖手段，在中东没有暴力存在的空间。1996年4月4日，他签署了《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死刑

法》。[62]假如没有蒂莫西·麦克维[63]（Timothy McVeigh）这位因在打击伊拉克（1990—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表现杰出”而受人尊敬并被授勋的美军士官在俄克拉何马州对联邦大楼实施爆炸，国会中的民权捍卫者肯定会反对该法案。这一野蛮事件被许多美国人比作使希特勒获得无限权力的德国国会纵火案（1933年2月27日）。因为有迹象表明，联邦政府预先知道即将发生的袭击事件。[64]尽管克林顿采取了打击恐怖主义战略[65]，中央情报局此时却在伊拉克民族协约组织身上投入大量美元。该组织使用汽车炸弹在巴格达和其他城市实施爆炸，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66]，其目的是动摇萨达姆政府的统治基础[67]。克林顿没有接受119个不结盟运动国家提出的举行一次打击恐怖主义国际会议的提议，因为他不希望讨论两个问题：国家恐怖主义（伤及平民的轰炸）以及恐怖主义分子与“自由战士”之间的区别。“真主党”和哈马斯属于后者范畴，他们为反抗以色列的统治而战。[68]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进行的直接和（或）间接干涉所造成的创伤一直没有愈合，而且在继续淌血。因为华盛顿一直依仗武力扶持沙特、科威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专制、腐败和不为民众所接受的政府，毫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民族感情，甚至伤害穆斯林的宗教感情。沙特大部分民众从来不接受“异教徒”和美国部队在麦加、麦地那等伊斯兰教圣地附近的存在。麦加是阿拉的住处和法蒂玛（穆罕默德之女）丈夫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Ali Ibn Abi Taalib）的诞生地。海湾战争后，法赫德国王于1991年同意美军在那些地区部署军队。结果是，1996年6月25日，沙特反对派用一辆满载炸弹的卡车在宰赫兰市附近炸毁了一幢名为霍巴大厦的住宅楼，炸死19名美国空军士兵和近300名其他人员。[69]这一袭击事件后，《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预言，假如美国和沙特不改变其奉行的政策，沙特君主政府将在15年内被推翻，一个激进的反美政府将会在利雅德掌权。[70]

【注解】

[1] Report of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Information Warfare-Defense (IW-D)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 & Technology. Washington, D. C. 20301-3140.

[2] 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基地体系包括分布在100个国家2 000个地点的30 000个设施，从北极一直延伸到南极。这些基地分布在各个大陆和岛屿上。美国在巴西曾建立了多个基地。但二战后，巴西政府不允许美国将它们保留下来。

[3] 詹姆斯·贝克的研究得到了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支持。他将军事基地定义为武装部队“日常使用”的地点。在25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设施均被划定为一个与附近的镇

或城市相连的军事基地的组成部分。25英里之外的设施被视为另一基地。

[4] Johnson，2004，pp. 124-125.

[5] Id.，ibid.，124.

[6] 按2000年定值美元计算。1997—2000年间，阿联酋与美国签署了价值140亿美元的订购协议。印度和埃及分别购买了76亿和69亿美元的武器。

[7] CRR Report of the Congress.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Developing Nations—1993-2000. August 16 2001. By Richard F. Grimmet，specialist in National Defense，Foreign Affairs，Defense，and Trade Divis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8] 冷战结束时，美国在欧洲拥有30多万名军人、5 000辆坦克、700架飞机、6 000辆军车和2 500门大炮。其中大部分部署在德国。此外，还部署了数千件战术核武器和一支强大的海军。国防部约一半的预算用于西欧的防御。美国在那里的军人和非军人总数超过100万。Sweedler，Alan. U. 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 Cold-War Era. Paper prepared for seminar sponsored by the NEST，Niterói，May 14-15，1992. 艾伦·斯威德勒（Alan Sweedler）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圣戈哥州立大学国际安全和解决冲突研究所主任之一。

[9] 对冲绳的占领于1972年正式结束。

[10]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East Asia Strategy Report. New Releases. Reference Number：No. 092-95. http://www. defenselink. mil/releases/1995/b022795_bt092－95. html.

[11] 1995年9月，美国海军士兵在冲绳劫持和强奸一名12岁女孩给美日关系造成了严重麻烦，85 000人上街游行要求撤走美军基地。

[12] Johnson，2001，pp. 103 e 128.

[13] Brisard & Dasquié，2001，pp. 102-103.

[14] 1984—1990年间，索马里的香蕉种植得到极大发展，年产量达9万～10万吨。其中一部分（1988年、1989年和1990年分别为51 921吨、59 388吨和57 785吨）通过意大利的那代集团（De Nadai）于1983年创建的卡玛尔公司（Camar）出口到欧洲，特别是意大利（1990年为45 130吨）。

[15] Clinton，2004，p. 550.

[16] Blum，2001，p. 158.

[17] Id.，ibid.，p. 551.

[18] Boutros-Ghali，1999，pp. 104-105.

[19] Id.，ibid.，p. 107.

[20] 199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根据联合国（联合国索马里行动II）授权，下令执行“恢复希望”行动，派遣了一支由2 000名海军士兵组成的“维和”部队，其使命是监督向民众发放食品，恢复秩序，建立一个政治和解环境。

[21] 本·拉登在苏丹建立了工厂、庄园和阿富汗老兵训练营地，并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他与伊斯兰民主阵线和苏丹军队合作建立了阿尔-希加拉赫建筑公司（Al-Hijrah for

Constrution and Development Ltd.）。该公司在苏丹港建造了一个新机场，并建造了一条连接苏丹港和喀土穆的高速公路，该公路长达1 200 公里。本·拉登的另一公司瓦迪·阿尔-阿基亚公司（Wadi al-Aqia Company）经营出口业务。他也是塔巴投资公司（Taba Investment Company Ltd.）和喀土穆阿尔-沙玛尔伊斯兰银行（Al-Shamal Islamic Bank）的股东之一。该银行的另一股东也是伊斯兰民族阵线。本·拉登在其中投入 5 000 万美元。

[22] Baer，2003，p. 20.

[23] Bodansky，Yossef. "Some Call It Peace—Waiting For War In the Balkans"，http://members. tripod. com/Balkania/resources/geostrategy/bodansky_peace/bp_part3. html.

[24] Text of Fatwah Urging Jihad against Americans published in Al-Quds al-'Arabi on Febuary 23，1998. Statement signed by Sheikh Usamah Bin-Muhammad Bin-Ladin；Ayman al-Zawahiri，leader of the Jihad Group in Egypt；Abu-Yasir Rifa'i Ahmad Taha，a leader of the Islamic Group；Sheikh Mir Hamzah，secretary of the Jamiat-ul-Ulema-e-Pakistan；and Fazlul Rahman，leader of the Jihad Movement in Bangladesh.

[25] Transcript of Usamah bin-Ladin，the Destruction of the Base—Interview with Usamah bin-Ladin presented by Salah Najm. Conducted by Jamal Isma'il in an unspecified location in Afghanistan. Aired 10 June 1999—The Terrorism Reseach Center.

[26] Tirman，1997，p. 220. Johnson，2000，p. 8.

[27] Johnson，2001，p. 9.

[28] Defense Science Board，*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1997 *Summer Study Task Force on DoD Responses to Transnational Threats*（Washington：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October 1997），vol. 1，Final Report，p. 15. Apud Eland，Ivan. *Protecting the Homeland*：The Best Defense is to give no Offense. Cato Policy Analysis No. 306. May 5，1998. http://www. cato. org/pubs/pas/pa-306. html. Defense Science Board，*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1997 *Summer Study Task Force on DoD Responses to Transnational Threats*（Washington：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October 1997），vol. 1，Final Report，p. 15.

[29] Johnson，2001，p. 9.

[30] Clinton，2004，p. 497.

[31] Mahle，2004，pp. 101-102. 米尔·坎西后来在巴基斯坦被抓获，并在美国被判处死刑。在被用毒气刑处死时，他高呼："没有上帝，只有真主。"

[32] Apud Dwyer et al.，pp. 243-244.

[33] Von Bulow，2003，pp. 23-24. Johnson，2001，pp. 9，13.

[34] 被抓获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是拉姆齐·尤塞夫（还使用过阿卜杜勒·卡里姆之名，他被怀疑是伊拉克的情报人员，是一位关键人物）、赛义德·诺塞尔（埃及人）、伊密·沙林（联邦调查局情报员、埃及军官，并与埃及情报部门有联系）、穆罕默德·萨拉姆（Muhammad Salameh）（巴勒斯坦极端分子）、诺塞尔（种种迹象表明，作为同谋的他与伊拉克有联系）、穆萨巴·亚辛（伊拉克人，在新泽西州拥有住房）、阿卜杜

勒·亚辛（穆萨巴的兄弟，生于印第安纳州。他在接受审讯后被联邦调查局释放，回到巴格达后被捕）、尼达尔·阿亚德（Nidal Ayyad）（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穆罕默德·哈里姆（Muhmud Abu Halim）（埃及极端分子）和伊亚德·伊斯梅尔（Eyyad Ismail）（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炸弹汽车驾驶员）。

[35] Dwyer et al.，1994，pp. 2–6.

[36] 诺塞尔被拘留。在他的住处找到了数十份制造炸弹的说明书和与恐怖阴谋有关的资料。这些文件使用的是阿拉伯语，没有被译成英语。他在犹太教士梅尔·卡赫纳（Meir Kahane）谋杀案审理中被释放。他还因抢劫和携带枪支被判刑。他在狱中与其他人一起策划了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

[37] Dwyer et al.，pp. 180–181.

[38] Id.，ibid.，p. 258.

[39] Id.，ibid.，p. 170.

[40] "Pakistan's Links With Fundamentalism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Hon, Peter Deutsch (Florida).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riday, October 7, 1994. http://www.fas.org/irp/congress/1994_cr/pd_cong_speech.html.

[41] 阿卜杜勒·亚辛曾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但在接受审讯后被释放，逃到伊拉克后被逮捕。

[42] Blumenthal, Ralph. "Tapes Depict Proposal to Thwart Bomb Used in Trade Center Blast". *The New York Times*, 28/10/1993, p. A1.

[43] 奥马尔·拉赫曼（Omar Abdel-Rahman）和其他 9 名人员被判刑，罪名是阴谋破坏纽约的重要建筑，如联合国总部和联邦调查局大楼。

[44] Kaplan & Kristol, 2003, pp. 50–51.

[45] Apud Hersh, Seymour M. "A Case Not Closed". *The New Yorker*, 1/11/1993. Hiro, 2002, p. 63.

[46] Clinton, 2004, pp. 525–526.

[47] 克林顿在其回忆录中证实了无辜贫民的死亡人数。他表示："这次事件无情地提醒我们，不管计划得多么周详，武器有多么精确，一旦使用这一类武器，通常都会出现非意愿的后果。" Id.，ibid.，p. 526. Hersh, Seymour M. "A Case Not Closed". *The New Yorker*, 1/11/1993. Hiro, 2002, p. 63.

[48]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五十一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其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天然权利"。

[49] Hersh, Seymour M. "A Case Not Closed". *The New Yorker*, 1/11/1993. Hiro, 2002, p. 63.

[50] 雅培（Bud Abbott）和科斯特洛（Lou Costello）是一对传奇的喜剧演员。

[51] 美国和英国空军所划定的界线。

[52] 他曾担任欧洲伊朗学生同盟会主席，并为萨达姆情报部门效力。1975 年脱离后同盟会转而为英国情报机构服务。1978 年在伦敦郊区遇袭受伤。

[53] Kaplan & Kristol，2003，p. 50.

[54] Id.，ibid.，p. 50. Hiro，2003，p. 81.

[55] 1996 年 2 月，萨达姆的两位女婿侯赛因·卡麦尔和萨达姆·卡麦尔及他们的妻子在得到将受赦免的承诺后返回巴格达，却被指控为犯叛国罪而遭处决，其家人也未能幸免。这一事实被伊拉克媒体认为是部落司法。

[56] 斯科特·里特也被认为是以色列间谍。

[57] Ignatius，David . "The CIA and the Coup That Wasn't". *The Washington Post*，16/5/2003，p. A29.

[58] Kaplan & Kristol，2003，pp. 50-51.

[59] Clinton，2004，p. 717.

[60] Id.，ibid.，p. 718.

[61] Defense Science Board.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1997 Summer Study Task Force on DoD Responses to Transnational Threats*（Washington：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October 1997），vol. 1，Final Report，p. 15. Apud Ivan Eland. "Does U. S. Intervention Overseas Breed Terrorism：The Historical Record：The Historical Record"，Foreign Policy Briefing，Cato Institute，December 17，1998. Cato Foreign Policy Briefing nº 50.

[62] 克林顿提出的法律议案违反美国宪法，它赋予美国总统最广泛的权力，包括：在没有司法令的情况下查看个人银行账户信息的权力；将某些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并审查其金融资产的权力；在没有司法程序情况下逮捕美国公民和驱逐外国人的权力。它还授予政府使用那些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允许外国人及其律师查看的"秘密证据"等各种权力，这违背了《第六修正案》保证被告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享有辩护权的规定。

[63] 麦克维获得了青铜星章和步兵作战奖章。他被判处死刑并于 2001 年 6 月 11 日在印第安纳州的一所监狱中通过毒气刑被处死。其同谋特里·尼科尔斯（Terry Nichols）被判处终身监禁。

[64] Final Report Reviews and Details—Current Review—World Net Daily Article—Final Report on the Bombing of the Alfred P. Murrah Building April 19，1995.

[65] Clinton，2004，pp. 771-718.

[66] 据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些炸弹仅在巴格达就夺去了 100 多名贫民的生命。

[67] Blum，2001，pp. 31-32.

[68] Id.，ibid.，p. 32.

[69] Clinton，2004，pp. 716-717.

[70] Johnson，2001，pp. xvii e 92-93.

第二十八章

轰炸南斯拉夫和入侵海地　克林顿的对外政策　美国与联合国　克林顿政府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冲突　美国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国家”　经济全球化　美国工业间谍活动和贸易推广　克林顿与国际金融危机

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促进民主和多边主义。相反，政治学家福山等美国金融、政治和军事精英们认为，历史已经走到尽头，他们试图建立一个不容争辩的单边统治体系，凌驾于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共同组成的经济和政治卡特尔之上。极右翼认为，此前一直被用来消除美苏矛盾的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已毫无用处。共和党议员称，在联合国内部有一个企图掌控美国主权的全球性阴谋。[1]

尽管这一因素制约克林顿的行动，但他并未实质性地改变老布什所推行的国际政策。他选择了“肯定性多边主义”，即假如高压外交不能取得结果，美国就诉诸武力，但会在联合国范围内与其他国家进行协调。“新保守派”认为联合国是一个简单的“主权国家联盟”，在其内部，专制政权和民主政体没有区别。[2]按照这一方针，1994—1995 年，美国统领北约其他成员国轰炸了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军队。1994 年 9 月，在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后（1994 年 7 月 31 日），克林顿以恢复海地民主秩序为借口，下令实施入侵该国的“维护民主”行动。这一对美国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的干涉基于名为“参与和扩展”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3]他从来没有排除在美国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采取单边干涉的可能。克林顿在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之时宣称：“美国是世界唯一不可或缺的国家。”[4]他在数日后的《国情咨文》中重申：“现在就让我们去做同样的事情，去做保持不可或缺的国家地位该做的事，使美国在未来 50 年中

继续保持强大、安全和富裕。”[5]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重复了他的话：“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根据这一理解，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竭力瓦解联合国，他们反对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埃及外交官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Ghali）的做法，并于1997年否决了他的连任。加利一直试图让这一国际组织拥有更多自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寻求连任被否决的情况此前从未有过。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称，加利越来越多地批评美国。[6]加利意识到：

> 美国认为，外交没有太大用处，实力就足够了，只有弱者才依赖外交。正因为如此，弱国才这样关心国家主权平等的民主原则，以便被用来作为在那些事实上不平等的事情中给予它们一点小小平等的手段。

加利评论说，罗马帝国不曾需要外交，美国也不需要。他称，“外交被帝国主义强国视为浪费时间和权威，是虚弱的信号”[7]。作为“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不喜欢多边主义思想。这样，它与联合国的紧张关系和分歧就出现了。苏联的解体以及共产主义作为真正威胁不复存在使美国的傲慢心理复苏，于是，它就可以脱掉一直作为其对外政策伪装的民主和道德外衣，尽管这在其表述中依然存在。不管是何种理论——“不可或缺的国家”、“唯一的超级强国”或“软实力”，克林顿的目的是想让美国的超级帝国地位合理化，并通过在“人道主义”标签下进行的军事干预，推进其政治和地缘政治利益。这种军事干预将改变国家主权的概念，使其变得并非绝对，并与民族国家分离。这样，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意识形态疆界”理论在另一外衣掩盖下，在不同环境中得以复苏。然而，干涉主义实质上属单边性质，因为只有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即超帝国主义卡特尔，才拥有以人道主义援助为借口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手段和资金。

在联合国掩护下公开加大美国干涉主义力度的同时，克林顿还积极推动与各国签订经贸协议，以便实现贸易收支顺差，弥补与欧洲、中国和日本贸易中的巨额逆差。基于这一考虑，尽管克林顿对恐怖主义以及非洲和巴尔干地区的冲突感到担忧，但他把全球化进程看得高于一切。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世界经济美国化的一种努力。尽管在民主党内有不同声音，但他依然批准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8]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国会以两党议员的压倒性多数于1994年12月通过《关贸总协定》协议时，美国政治

又恢复了一点“健康”。《关贸总协定》框架内签署的协议使全世界关税总额下降约 7 400 亿美元，“促使原先关闭的市场向美国产品和服务开放”[9]。对债权银行委员会和“巴黎俱乐部”的承诺，以及 1994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完成后在《关贸总协定》框架内所达成的大量协议，导致贸易开放，放开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取消或放松了国有垄断。完成《关贸总协定》谈判的结果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1994 年 12 月 9—11 日，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迈阿密召开，克林顿召集了本大陆所有国家的首脑。为了保证美国获得巨大贸易顺差，以弥补与其他地区的逆差并支付外债，克林顿重新采纳了老布什 1989 年推出的“美洲事业创议”思想。他说服本大陆各国元首，让他们做出了在 2000 年前使本国加入“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承诺。但 10 天后，墨西哥货币比索崩溃。至 1995 年 3 月，其汇率已贬值 90%。克林顿总统被迫向墨西哥提供 500 亿美元的援助，以帮助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的伙伴摆脱困境。

在努力通过各种协定扩大美国对外贸易的同时，克林顿还广泛借助情报部门促进美国公司的利益。1993 年 9 月，他让中央情报局窃取正在设计生产零排放汽车的日本公司的机密，并把获得的情报交给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等汽车公司。同年，他还指示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对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采取间谍行动，举行会议的酒店的所有房间都被安装了窃听设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与越南一项工程有关的情报。当时，越南正准备在嘉莱省建造雅里电站，其设计装机量为 720MW，可为供应该国中部和山区的电网提供 36.8 亿千瓦时的电力，电站建成后将成为越南第二大水电站（最大的是位于黑河的和平电站）。获得的情报被交给向民主党捐款最多的那家公司。工业间谍不仅损害外国公司，美国企业也同样受到损害。当时，越南有意从一个美国商人手中购买两架波音 737 货机。商务部长罗纳德·布朗（Ronald Brown）在接到情报部门报告后，对这一交易实施了干扰，他极力为越南从波音公司购买两架新飞机争取优惠贷款。

这样，情报部门就更积极致力于克林顿竭力推动的贸易推广活动，其目的是扩大美国出口。洛克西德（Lockheed）、波音、洛雷尔（Loral）、天合（TRW）和雷神（Raytheon）等从事技术研发的工业企业都得到了重要商业情报。情报部门通过“通信情报”（COMINT）的高信息化处理系统——“梯阵系统”（ECHELON）获得这些情报。[10]这一系统的初衷是截获外国政府与其驻外使馆之间的通信。随着技术的发展，其使用范围逐步扩大，它被用于截获通过卫星传输的国际通信，如电话、传真和

互联网信息。这些活动通过安装在阿拉斯加州埃尔门多夫、华盛顿州的雅基马、伊利诺伊州的糖林、波多黎各地区和太平洋的关岛以及美国驻外大使馆和空军基地的设备得以实施。自60年代起，搜集经济情报和有关科技发展的信息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国家通信总局开展的“通信侦察”行动的最重要目的之一。1948年，英国与美国签署了《英美条约》[11]，组成了一个截获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信的联合体，它是和平时期首个大规模情报部门联盟。[12]后来，其他国家情报机构也陆续加入，包括加拿大通信安全局、澳大利亚国防信息局和新西兰政府电讯安全局。

美国情报部门多次试图否认协助工业企业并通过外国合作伙伴或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这类机构为它们获取情报。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是根据《出口促进法案》于1992年建立的跨政府部门机构，由商务部领导，其目的是统一和协调美国政府的出口活动和融资，并实施一个广泛战略以推进这些计划。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内部的“倡导中心”是克林顿政府制定的“国家出口战略”[13]的核心部门。为了美国企业利益，它不惜收买各国政府或对其进行院外活动。它与行政支持办公室（原情报联络办公室）联合行动，后者是商务部内部的一个绝密机构，由中央情报局成员组成，可动用情报部门的机密和设备，其目的是满足美国工业企业对经济类情报的需求。克林顿上任后不久就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目的是用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支持美国公司。

1994年，华盛顿政府极力维护1 970多桩出口交易，总金额达200多亿美元，它们将为美国提供30多万个就业机会。根据记者邓肯·坎贝尔（Duncan Campbell）和保罗·拉什马（Paul Lashmar）的说法，1994年，国家安全局截获了欧洲空客集团与沙特政府间的传真和通话，使美国政府得以进行有利于波音公司的干预。此外，在巴西部署“亚马逊警戒系统”的竞争中，“美国情报机构扮演了决定性角色”，保证了雷神公司的胜出。该公司负责对设在糖林的“梯队系统”卫星接收站的维护和工程服务。[14]1995年1月6日，罗纳德·布朗在众议院科学委员会宣称，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这一跨政府部门机构于1993年制定了国家出口战略，其目的显而易见，是“帮助美国大中小企业充分施展出口能力”[15]。他表示，“我们的支持，或者说克林顿总统对美国企业在参与竞争外国政府订单中的支持，已开始见效”。同年，《纽约时报》报道说，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东京站负责向美国贸易代表米奇·坎特（Mickey Kantor）的小组提供详细情报，以便在日内瓦进行的一宗汽车商业纠纷中对付日本谈判代表。日本

《每日新闻》指责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梯队系统”监视日本企业，以便使美国企业处于有利位置。

克林顿1997年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继续奉行扩大贸易的政策，坚持要求各国向美国产品和服务开放更大的市场。他不仅努力推动计划于2005年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也竭力推进预计2020年实现贸易自由的亚太经合组织，目的是实现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所说的使美国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最富活力中心的目标。奥尔布赖特宣称，“我们必须继续打造一个为美国服务的全球经济体系”[16]。她还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服务本国公民，而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或消防部门”[17]。她在参议院声称，“我们将坚定地维护我们自身的根本利益”。她还引用了克林顿的一句话：“美国不能也不应该试图去解决每一个问题，但在我们的利益十分明显以及我们的价值面临威胁的地方，以及我们能改变局面的地方，我们必须行动，我们必须担当起领导者角色。”[18]

奥尔布赖特声称，克林顿政策的目的是“塑造全球经济体系”，以便为美国服务，而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服务本国公民。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将通过美洲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包括在“乌拉圭回合”框架内签署的协议在内的200多项贸易协议所实施的帝国主义计划。“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使美国出口增加了34%，自1993年起新增160万个就业机会。[19]对外贸易为美国创造了1 100多万个就业机会，总额约2.3万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相比197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增加了一倍多。在之前四年中，经济增长的1/4来自出口。经济的继续增长依赖于新市场的征服。[20]这样，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就显得十分关键，因为，拉美的经济增速位居世界第二。据当时估计，到2010年左右，拉美吸收美国的出口将超过欧洲和日本之和。[21]

被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的查林·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大使也劝说众议院小组委员会通过“快轨程序”。这将使克林顿能够与他国谈判其他贸易协定，而国会不能对其进行修改，只能批准或否决。她声称，随着亚洲和拉美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政府正抢在美国之前，在美国周围达成协议，并正在建立新的排他性商业同盟，这将“损害美国的富裕和领导地位”[22]。巴尔舍夫斯基所言和奥尔布赖特如出一辙，透出“肯定性民族主义”的气味。她认为，和20世纪军事同盟塑造了全球关系主体一样，商业同盟将在21世纪各国关系的确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3]尽管巴尔舍夫斯基所希望的贸易政策的潜在原则显而易见，按她自己的话说，是“支持美国的富裕、美国的就业和美国企业的健康”[24]，但她未能

说服美国国会批准“快轨程序”。因为，除了民主党一部分人和工会的反对，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与其他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一样，始终对拉美国家抱有负面和一成不变的印象，在他们眼中，拉美国家是依赖、虚弱、低下、无能、低效和腐败的代名词。[25]震撼墨西哥的严重金融危机使这一感觉再生。迈阿密首脑会议结束不久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给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伙伴美国带来了严重麻烦，这使得反对重新给予克林顿与拉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协议谈判的权力而国会却不能修改的呼声上升。

1994—1995 年发生的墨西哥比索崩溃是一场严重危机的戏剧性前兆。1997 年，这场危机在泰国爆发并波及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导致各国股市崩盘，并对世界金融市场构成严重威胁。危机并非仅限于东南亚。1998 年年中，俄罗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纽约股市暴跌（8 月 31 日），道琼斯指数下挫 554 点，为纽约股票交易市场历史上的第二大跌幅。1999 年 1 月 6—14 日，一场投机行动使巴西将 68 亿美元拱手送给了投机者。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总统被迫放开汇率，让美元根据市场自由浮动。克林顿意识到危机将影响美国经济，于是就说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同僚一起探讨建立一个避免全球金融危机继续殃及其他国家的机制和应急计划。[26]10 月 6 日，他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的年会上发出警告：“全球经济绝不能再经受过去几年所发生的那种广泛和系统的瓦解。”[27]

克林顿对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指出，每个国家的成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成功。他警告：“这场危机不是对某个国家的挑战，而是对每个国家的挑战。假如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当中无人能幸免。”[28]基于这一理解，他提议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机构——一个能给全球性市场提供支持和资本全球性流动的开放、稳定和富裕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台了一个新型贷款方案，即一个“应急信贷线”，用来预防金融危机的蔓延，而不是在投机行为盛行之时坐视危机殃及其他国家。克林顿亲自出面干预，以避免这一爆发于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在横扫俄罗斯后殃及巴西。巴西当时的预算赤字达 60 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8%。与此同时，巴西的外汇储备在 1998 年的 8—9 月间从 750 亿美元降至 450 亿美元。[29]

【注解】

[1] Boutros-Ghali，1999，p. 4.

[2] Kaplan & Kristol，2003，pp. 52-59e90-91.

[3] 自19世纪初起，海地由于在加勒比所处的地理位置，对美国一直具有战略重要性。20世纪初，海地开始接受美国投资。1915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了保护美国投资，编造了德国试图在那里建造一个潜艇基地和法国有可能进行干预（这些威胁从来就不存在）的理由，并下令入侵该岛。美国对海地的占领一直持续到1934年。

[4] The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of President William J. Clinton.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Law Center.

[5] The 1997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of President William J. Clinton, February 4, 1997. Ibid.

[6] Albright, 2003, p. 207.

[7] Boutros-Ghali, 1999, p. 195.

[8] Clinton, 2004, p. 432.

[9] Id., ibid., p. 636.

[10] 国家安全局通过“通信情报”（COMINT）搜集外国人的通信信息。它是“信号情报”（SIGINT）的主要内容。SIGINT能够截获“非通信信号”，如雷达发射信号。COMINT伴随民用通信系统的快速发展，并依靠优秀技术人员和高度自动化，实施了大规模工业间谍活动。

[11] Bamford, 2002, pp. 397-398.《英美条约》（UKUSA）直到1999年3月才被公之于众。当时，澳大利亚政府确认国防通信处（Defence Signals Directorate, DSD）应该“在《英美条约》框架下，与国外相应情报组织合作”。1996 Intelligence Online report on UKUSA cooperation: http://www.blythe.org/Intelligence/readme/brits-usa.int45; 1997 Daily Telegraph report “Spies Like US” on Mentwith Hill (with aerial photo) and other commentary: http://www.accessone.com/%7Erivero/POLITICS/ECHELON/echelon.html; 1998 Nicky Hager, Covert Action Quarterly article on ECHELON: http://jya.com/echelon.htm; 1998 European Parliament, STOA report, Assessment of the Technologies of Political Control: http://jya.com/stoa-atpc.htm.

[12] Johnson, 1996, pp. 122-144.

[13] Levelling the playing field around the world—Trade Promot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27/5/2001. Annexe 2-1: Function Statement of U.S. government Advocacy Center—http://www.heise.de/tp/deutsch/special/ech/7743/1.html.

[14] Campbell, Duncan & Lashmar, Pau. “USA: Spying for Free Trade”, Londres, *The Independent*, 2/7/2000.

[15] Prepared Testimony of Secretary Ron Brow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Preparing For Changes in the Year 2015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anuary 6, 1995. http://clinton3.nara.gov/WE/EOP/OSTP/other/tsdoc1.html.

[16] Secretary of State-Designate Madeleine K. Albright. Prepared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as released by the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January 8, 1997. http://www.secretary.

state. gov/statements/970108a. html.

[17] Secretary of State-Designate Madeleine K. Albright prepared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 C., January 8, 1997. As released by the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usinfo. org/USIA/usinfo. state. gov/regional/ea/easec/albrt108. htm.

[18] Secretary of State-Designated Madeleine K. Albright, prepared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January 8, 1997. http://www. secretary. state. gov/statements/970108a. html.

[19] Id., ibid.

[20] U. S. T. R. Charlene Barshefsky Testimony to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U. S. Information and Texts* n° 005—Z12481 B,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February 5, 1997, pp. 5-10.

[21] Id., ibid., Charlene Barshefsky statement before House Trade Panel. *U. S. Information and Texts* n° 011—Z12481 B,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March 20, 1997, pp. 38-45.

[22] Barshefsky statement before House Trade Panel 3/18. U. S. Information and Texts n° 011, USIS, March 20, 1997, p. 38.

[23] Barshefsky testimony to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U. S. Information and Texts*, n° 5, February 5, 1997, p. 8.

[24] Barshefsky statement before House Trade Panel 3/18, *U. S. Information and Texts*, n° 011, March 20, 1997, p. 42.

[25] Cottam, M. L. Ob. cit., pp. 21, 23 e 31.

[26] The White House at Work—Friday, October 2, 1998—President Clinton: Leadership in the global economy—http://clinton3. nara. gov/WH/Work/100298. html.

[27] 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October 6, 1998—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Bill Clinton to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99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Bank Annual Meeting—Marriott Wardman Park Hotel, Washington, D. C.

[28] Blustein, 2002, pp. 326-327.

[29] Id., ibid., p. 332.

第二十九章

北约东扩　国际军火贸易　军工企业对克林顿政策的不满　右翼和“新美国世纪计划”“邦达右翼阴谋”　摩萨德与莱温斯基　弹劾克林顿的失败　干预科索沃与“东西走廊”

克林顿在推动贸易协定的同时，努力拓展美国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利益，极力避免大西洋联盟因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而丧失凝聚力进而让欧洲建立自身的防御体系。他所推动的北约东扩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并保持美国在欧洲的存在。1994 年，曾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和欧亚大陆主任的兰德公司副总裁戴维·贡帕特（David Gompert）指出，“我们不能回避一个重要事实：美国在冷战后承诺留在欧洲，是为了帮助维持和平和支持民主革命”[1]。克林顿在 1997 年 1 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称：“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为首次建设一个没有分裂的民主欧洲提供帮助。”他积极推动北约向前华沙集团成员国扩展。美国希望保持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为此就有必要赋予北约新的含义并加以扩充，以证明它对保障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性。作为第一阶段，波兰、捷克和匈牙利被邀请加入北约。1997 年 6 月，在马德里首脑会议期间，它们与 16 个成员国签署协议。1999 年 3 月 12 日，三国正式加入北约。克林顿的计划是，通过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在内的中、东欧所有国家的加入，把北约延伸到波罗的海和黑海。

北约的扩大自然意味着美国每年要增加 21 亿～27 亿美元的额外开支，这使得美国在北约的总支出达到 270 亿～350 亿美元。[2]美国的目的不只是保障自己在欧洲的投资安全，同时还得为美国军工企业带来巨大生意。1995 年，美国出口的新武器总额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总额多出 160 亿美元。以人道主义目的为借口发动的战争不单单是美国军工企业的大买卖，国防部也收益颇丰。1990 年前半年，国防部出口武器约 530 亿美元，多于军工企业直接向其他国家出口武器的总额。1996 财政年度，国防部通过国防安全合作局管理的“过剩国防物品处理计划”出口 5.36 亿美元的武器，

并通过向20个国家的军队租赁军事设备获得6.95亿美元。此外，还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建立了“国防出口贷款担保项目”，批准向私人部门提供不超过15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向特定外国销售或租赁（通过商业渠道或政府谈判）美国军事物资或相关服务。

1991—1995年武器出口额（百万美元）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共计
美国（政府出口）	9 360	10 713	10 685	9 842	12 549	53 149
美国（企业出口）	5 166	2 667	3 808	2 099	3 620	17 360
俄罗斯	6 200	2 500	3 100	1 500	3 100	16 400
法国	2 200	1 800	1 100	1 400	2 200	8 700
英国	4 700	4 700	4 600	5 200	4 900	24 100
中国	1 400	1 000	1 200	700	600	4 900
德国	2 400	1 100	1 700	1 400	1 200	7 800
意大利	300	400	400	100	0	1 200
欧洲其他国家	1 800	3 000	1 500	1 300	1 000	8 600
其他各国	1 900	1 700	2 000	2 400	2 700	10 700
共计	34 426①	29 580	30 093	25 941	31 869	152 909

注：采用等值美元。除美国以财政年度计算外，其他各国出口额均基于自然年度。

资料来源：*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1988–1995*; *Defense Security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 (*DSAA*), 1995。

凭借海湾战争后信誉的提高和华盛顿的支持，美国军工企业加强了在世界市场的主导地位。1992年9月，老布什政府和国会批准向沙特出口48架麦道F-15E鹰式战机。这是一种多功能、全天候轰炸机，海湾战争中被美国空军用于攻击“飞毛腿”导弹发射架。这是此类最先进战机首度被出口到他国。为保证以色列在武器质量上相对沙特的优势，一年半后，克林顿和国会批准向以色列出售21架这一型号的战机。美国也极力希望向阿联酋出售20～80架F-15E鹰式远程轰炸机，阿联酋要求为这些战机配备最先进的空对空远程导弹。

通过这些销售，美国大大提高了中东盟国战机和武器的标准，但这一地区的军事化并非仅仅出于遏制伊朗和伊拉克的地缘政治目的，也是为了照顾军工企业的利益。这些企业向美国政治领导人施压、游说并进行贿赂，促使他们支持武器贸易。[3]出口尖端技术武器的官方理由是保持企业的就业岗位，尽管真正目的是为了保证美国在武器市场的主导地位。苏联解体后，这一市场的竞争变得极为激烈。中央情报局1995年撰写的一份报告称，军工企业

① 此列各数字之和应为35 426，疑原文有误。——译者注

所施加的压力增加了，它们要求扩大高科技常规武器的出口，以便保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防务和情报机构以第三世界国家要求购买这类武器为由，证明研制和生产新型武器的必要性。洛克西德·马丁公司请求国会批准用于生产 F-22“猛禽”歼击机的资金，理由是俄罗斯生产的米格- 29 和美国生产的 F-15、F-16 等战机已广泛扩散。

克林顿执政期间的国防开支保持了高水平。如果说 1986 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比当时对其构成潜在威胁的所有国家，即华沙集团、中国、古巴、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叙利亚和越南高出 2/3，1995 年则高出大约 76%。[4]克林顿还向国会提议在 1999 财政年度再增加 120 亿美元，并在之后六年内，即到 2005 年，共增加 1 100 亿美元。这一金额超过俄罗斯和中国军事预算之和，这两个国家各自的军事预算预计为 500 亿美元。这样，美国军费增至 2 906 亿美元，为 1984 年里根“军事振兴”巅峰时期以来的最大增幅，超过北约其他成员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军事预算的总和。

但军工集团仍不满足。院外活动团体（军需品工业基地特遣部队和传统基金会等）和代表军工利益的五角大楼“鹰派”指责克林顿系统地肢解了里根于 20 世纪 80 年代重建的国防，并批评他提出的以小规模军事力量捍卫美国利益的观点。1997 年 6 月 3 日，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小布什的弟弟）、切尼、福山（提出历史终结理论）、利比、沃尔福威茨、拉姆斯菲尔德以及与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哈德森研究所等“智库”有关系的其他“新保守派”人士，共同提出了“新美国世纪计划”。这一工程的实质是：增加国防开支，增强民主纽带，挑战那些“敌视美国利益和价值的政权”，在全世界推广“政治自由”，由美国扮演“维护和扩展一个对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富裕和我们的原则友善的国际秩序”这一独一无二的角色。[5]这些思想清楚地表明了军工集团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在葆拉·琼斯（Paula Jones）控告克林顿性骚扰案被搁置的同时，又爆发了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之间的性丑闻。在五角大楼工作的琳达·特里普（Linda Tripp）对莱温斯基在电话中向她透露的其与克林顿发生性关系的隐私内容进行了录音。这一丑闻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当时，独立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Kenneth Starr）曾负责调查阿肯色州白水公司失败的土地分割行动中可能存在的不合法行为。克林顿及其妻子希拉里 70 年代末曾是该公司股东。为了将克林顿赶下总统位置，他扩大了攻势。除了作为四大烟草公司的律师就针对青少年的烟草广告与政府打官司外，斯塔尔还与国会的共和党右翼关系密切[6]，他已不能自拔。克林顿在回忆录中写道：“真正打动斯塔尔的是他

从共和党右翼以及三四个记者那里获得的全部热量，那些记者被彻底收买来调查我们的过错或至少让风暴持续。”

1998年1月27日，希拉里·克林顿在电视栏目《今日秀》中揭露，自从她丈夫宣布竞选总统之日起，就存在一个针对他的“庞大右翼阴谋”。[7]民主党圈内和其他一些人认为，为右翼“智库”和共和党大量出资的超保守派亿万富翁理查德·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为这一阴谋提供了最大的资金支持。他曾向发动针对克林顿弹劾运动的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加图研究所、公民健全经济、自由国会基金会等“智库”、右翼组织以及《美国观察者》杂志等新闻机构捐助了数百万美元。[8]希拉里揭露说，共和党所发动的意在推翻克林顿的“庞大右翼阴谋”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也可能卷入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之间的性丑闻，因为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inyamin Netanyahu）所属的利库德集团极端分子反对和平谈判的深入，尤其是当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向巴勒斯坦最高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9]（Yasser Arafat）承诺以色列军队将从西岸城市希伯伦撤出后更是如此。克林顿在回忆录中谈了内塔尼亚胡的处境。一方面是克林顿要求他向巴勒斯坦人做出比让出希伯伦更多妥协的压力，即开放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通道、机场、港口并释放囚犯等；另一方面是来自国内保守派联盟和扩张主义“强硬路线”的立场。苏联解体后，约100万俄罗斯犹太人的迁入使这一立场变得更加强硬，而保守派联盟是政府在以色列议会中的主体。[10]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性丑闻出现之时，围绕巴勒斯坦和平进程的《奥斯陆协议》正在谈判中。担任以色列移民党领导人和以色列工商部长的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11]、俄罗斯犹太人纳坦·夏兰斯基[12]（Natan Sharansky）等极右分子对该协议持反对立场。

英国作家戈登·托马斯（Gordon Thomas）揭露，被内塔尼亚胡任命为摩萨德局长的强硬派人士丹尼·雅顿（Danny Yaton）通过一名下属了解到克林顿的绯闻，他于是向华盛顿派遣了一个电话监听专家小组，前往水门大厦窃听莱温斯基的电话。他们获得了她与克林顿在性方面的30个小时的谈话录音。摩萨德可能得到五角大楼工作人员特里普的配合，莱温斯基向她透露了自己与克林顿保持性关系的隐私。3月27日，克林顿请莱温斯基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并告诉她，她的电话正在被监听。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从此结束。在1998年7月30日所作证词中，莱温斯基对克林顿向她提供的这一信息略有涉及。斯塔尔检察官在其报告中做了如下记录：

> 莱温斯基小姐称，那天，她和总统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她，他怀疑一个外国大使馆（他没有指明是哪国大使馆）正在窃听她的电话。他让她不要说出真相，如果被问及，就说他们之间仅仅是朋友关系。假如有人问及他们在电话中谈的性问题，她就说，他们知道电话一直在被监听，在电话中谈论性是一个有意安排的把戏。[13]

他所提及的外国大使馆只能是以色列使馆，它是唯一有兴趣也有能力在美国采取这一行动的使馆。自1993年克林顿就任总统第一天起，特拉维夫政府就一直与其对抗，要求美国否决因以色列未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第799号决议而可能通过的对它的制裁。该决议谴责以色列违反《日内瓦公约》，要求它允许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14]尽管克林顿处处让步，但特拉维夫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气氛并未消失。摩萨德的目的可能是敲诈，以迫使克林顿阻止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查一位长期在白宫卧底的间谍。此人只以梅加（Mega）为代号，他向特拉维夫提供了极为敏感的情报。[15]卧底间谍或许是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此人时任白宫高级助理。在特里普把录音交给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后，这一意在搞垮克林顿政府的丑闻已越闹越大。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彻底弄清“庞大右翼阴谋”的线索以及利库德集团和共和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为这类行动很少会留下可供解密的文件。但人们怀疑莱温斯基受到了摩萨德的指使。[16]正因为这一原因，不管是否得到特里普提示，她保存了一件残留精斑的内裤，以便作为证据向国会出示。此外，她还记下了1996—1997年间与克林顿见面或电话交谈的日期。[17]这种假设不能排除，假如没有任何不良企图，谁也不会通过电话向一位同事透露自己与总统保持暧昧关系的隐私，也不可能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保存一件带有精斑的内裤。莱温斯基的父亲伯纳德·莱温斯基（Bernard Lewinsky），一位富有的肿瘤学专家，终于打破了沉默，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采访时，指责斯塔尔检察官正在进行一项“麦卡锡”式的调查。事实上，卷入更为严重丑闻的里根和老布什却没有受到更多纠缠。

克林顿在回忆录中写道：“与新右翼共和党人的斗争是围绕着权力开始的。”[18]他分析说，自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开始捍卫民权以来，南部保守主义者开始倾向共和党。1970年年初，共和党与新兴极右宗教运动结成联盟。1995年，当新右翼共和党人控制国会时，克林顿封杀了他们的最极端计划。之后，他在改善经济、社会和环境公正等方面取得了成效。他希望国家的利益和责任由民众分享，人们平等参与民主社会。而新右翼共和党人则希

望看到一个“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正当’人手中”的国家。他们通过妖魔化那些要求社会平等而威胁他们权力的少数人来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19]，但罢免克林顿的企图未能成功。尽管众议院于1998年12月19日以发假誓和阻挠司法罪名通过了对他的弹劾，但参议院于1999年2月12日进行审议时却将他赦免，使其得以继续总统任期。[20]

次日，克林顿召集国会领袖，讨论在法国朗姆依埃进行的谈判失败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科索沃采取军事干预的可能。在谈判中，“联络小组”（美、俄、法、意、德、英）以轰炸塞尔维亚和黑山军事目标相威胁，要求米洛舍维奇接受一项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分裂主义组织科索沃解放军（ELK）的和平协议。代表西方工业国利益的联合国和北约希望科索沃获得它在1974—1989年间根据《南斯拉夫宪法》所享有的政治自治。但以空中打击相威胁强加一项完全由他国外交部拟定的协议，只会加剧危机。

塞尔维亚人仍坚决拒绝3万名北约维和人员的进入，并排除了就科索沃地位进行全民公决的可能。这一试图从南斯拉夫分裂出去的省拥有200万居民，其中90%为阿尔巴尼亚人和穆斯林，一旦进行公决，支持独立派必胜无疑。由统一民主运动（LBD）和科索沃解放军（ELK）等组成的科索沃政党联盟此前曾反对协议，因为它们要求的不是自治，而是彻底独立。但它们最终接受了协议，以便让北约对塞尔维亚实施打击。美国空军已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欧洲其他基地完成部署，随时准备对米洛舍维奇政府发动打击。3月24日，参与“联军行动”的112架美军战机和102架北约盟国（19国）战机开始从毫无风险的高空轰炸南斯拉夫，即对其实施空中恐怖主义。他们摧毁基础设施，炸毁民房、学校和医院，造成500名平民丧生。此外，还有许多人被炸伤，大量民众流离失所，贫铀弹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复活节当天，在罗马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举行的传统弥撒开始时，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质问：“当战争的爆炸声响彻天空，大火肆虐南斯拉夫民居之时，怎么可能在复活节谈论和平?”他对美国轰炸南斯拉夫予以谴责。3月29日，他在欧洲议会全会上指出：“以更大暴力回击暴力永远不会是解决危机的手段。”罗马教皇认为，“北约在科索沃发动的流血战争”毫无用处，即使有再多的人道主义理由，北约也无权袭击南斯拉夫这一主权国家，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能批准轰炸，但美国就连征询该机构的意见也不曾做到。因为美国清楚，俄罗斯和中国都不会同意采取这一行动。战争爆发七天后就出现了125 000名难民，他们不是为了躲避种族或宗教迫害，

而是为了躲避空袭。克林顿在回忆录中天真地为空袭行动辩称，除其他原因外，出动地面部队可能会造成一场灾难，导致比“误炸”造成的更多的平民死亡。[21]

军事干涉的强度十分猛烈。6 月，米洛舍维奇放弃抵抗，但这一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加剧。为增强爆炸威力，北约军队在南斯拉夫共投下了约 25 000 枚贫铀弹，使民众受到放射性、有毒和致癌元素的污染。英国生物学家罗杰·科格希尔（Roger Coghill）预计，美国空军使用贫铀弹对塞尔维亚的空袭可能致使巴尔干地区大批人患上癌症，最终造成 10 150 人死亡。受害者不只限于直接遭轰炸地区，还包括其周边地区。他估计，A-10 战机投下了 50 多万枚炸弹，其中一半发生了爆炸。在塞尔维亚地区，检测到的放射性指数比正常水平高出 30 倍，即使在距冲突区域 100 多公里的希腊北部地区，放射性元素含量也比正常指数高出 25%。[22]轰炸并非仅针对军事目标，还包括桥梁、炼油厂、电厂和通信设施等。

阻止种族清洗不过是北约卷入一场由来已久的冲突的一个借口，这一冲突的历史根源是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帝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以及塞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之间的政治矛盾。当然，对于军工集团来说，有必要试验比海湾战争中使用的精确度更高的导弹[23]和贫铀弹，清空军火库中存放的武器，以便接受新订单。美国的策略是从高空进行打击，不动用地面部队，这样，他们的男孩就不会死亡，就不会像越战那样造成大量伤亡而引发国内抗议。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和政治因素促使美国以北约名义打击塞尔维亚。巴尔干地区对保护西方利益始终具有经济和战略意义，因为它是通往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里海和外高加索地区的走廊，那里有美国公司希望开采的大量石油。正因为这一原因，美国对北约发挥更大作用、拓宽其行动范围，以及结束波黑和科索沃冲突并对巴尔干地区加以控制特别感兴趣。美国希望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由维和部队的军事存在为依托的政权，以保障石油开采和运输，这已成为建立保护国和行使宗主权的新方法。北约干涉南斯拉夫的目的并非只是科索沃，与其接壤的马其顿[24]处于传统的南北和东西通道上，对石油走廊十分重要。科索沃北约部队司令英国将军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爵士声称：“我们肯定会在这里长期停留，以便保证跨越马其顿的能源走廊的安全。”干涉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

杰克逊将军所指的能源走廊实际上已在规划之中。1996 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批准了一笔 20 万美元的资金，美国柏克德国际公司也投资了 10 多万美元，用于开展对建立一个“东西走廊”建设项目的研究。克林顿

于1995年公布的这一项目，将通过完善“南巴尔干发展计划”[25]所包含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基础设施和交通衔接来实现，总投资3 000万美元。“东西走廊”的主要内容包括：完成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阿尔巴尼亚都拉斯港与黑海沿岸保加利亚的布尔加斯和瓦尔纳之间的铁路；建造一条并行高速公路；实现都拉斯、法罗拉、布尔加斯和瓦尔纳港的现代化；建造多式联运设施。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还同意出资45万美元，对为萨拉热窝-普罗切走廊建立一个多式联运设施进行可行性研究。该地区已被接替联合国警察特遣部队的联合国波黑特别团和北约多国执行部队所控制，并由其维持治安。1998年，当科索沃危机加剧，联合国对塞尔维亚实行武器禁运时，柏克德国际公司已完成了对建设“东西走廊”的研究。这一工程包括由总部设在纽约英镑岭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公司（AMBO）建设一条输油管。德士古、雪佛罗、埃克森、美孚、阿莫可、英国石油、阿吉普（意大利埃尼集团的子公司）和道达尔（法国）等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大型石油公司试图利用这一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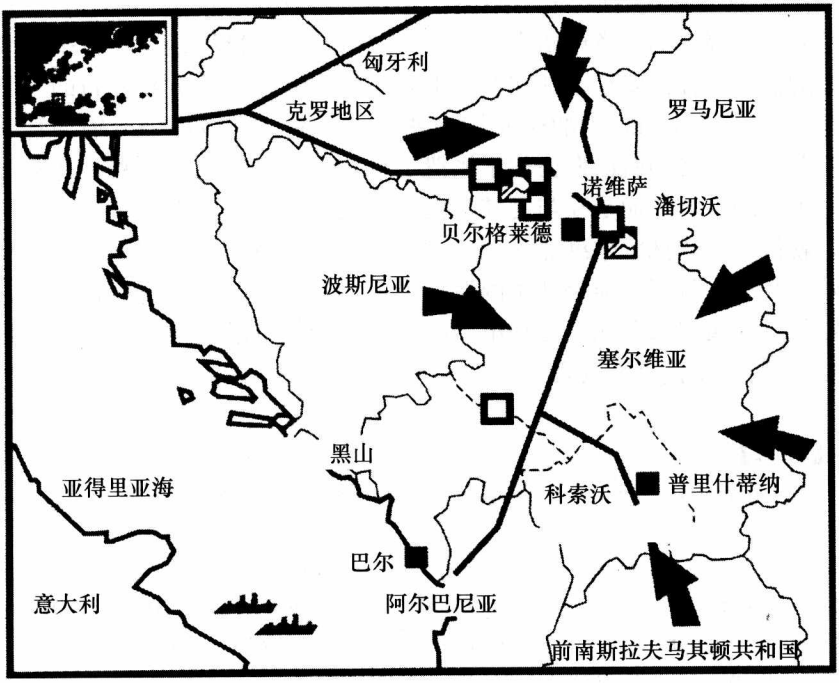
AMBO总裁爱德华·弗格森（Edward L. Ferguson）是老布什政府国防部下属的哈里伯顿公司的子公司布朗和鲁特公司（Brown & Root）的总经理。[26]就是这家公司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支持下，完成了第8通道中的跨巴尔干输油管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其基础设施包括建设高速公路、铁路、输气管道和光纤通信电缆。这一输油管道有可能带来“可观的新收益”，给各国政府带来在其经济中直接投资的机会。

> 通过支持负责维护输油管道的新企业和下游炼油企业，为其提供作业机会，必将增强美国政府在该地区推行私有化的愿望。[27]

1995年4月，欧盟各国交通部长批准了这一项目。美国政府通过“南巴尔干发展计划”对项目提供了十分积极的支持。欧盟通过1989年为援助东欧国家建立的“中东欧国家经济援助项目”，与英、法、德一起为项目提供了额外支持。“东西走廊”的起点为黑海沿岸的瓦尔纳港和布尔加斯港，经保加利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终点为都拉斯港和法罗拉港。这样，在里海地区作业的石油公司就有可能以更低成本，通过直径36英寸、长890公里的输油管，每天把75万桶从中亚开采的原油源源不断地输往停泊在法罗拉港深水区的油船上，这将给欧洲国家和美国的炼油厂提供一个可靠的替代来源。除了能使里海地区各国政府为开发新油田的经济潜力进行长期规划外，“它将使美国企业在建设至关重要的‘东西走廊’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

仅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就达 200 亿万桶左右，略大于北海的储量，比美国的石油储量稍低，但其实际储量可能大大高于已探明储量。[28]该地区 80 万桶的日出口量可增加到 180 万桶。美国试图依靠其私营公司开发出可行的运输通道，譬如长达 1 091 英里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和里海管道财团（BTC）。克林顿政府还积极支持另一条输油管的建设。该管道的起点为巴库，穿越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终点为黑海的巴统港和地中海沿岸处于土耳其境内的杰伊汉港。为此，美国政府派军队前往中亚训练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军队，以便他们有能力保护该地区的输油管。



南斯拉夫遭轰炸时的输油管地区

- 北约行动针对的炼油厂、输油管、多瑙河上的桥梁和通往黑山的主要道路
- 可能的走私通道
- 炼油厂
- 受北约制裁监视的船只供应
- 输油管

资料来源：BBC。[29]

1999 年 6 月，对南斯拉夫的空袭一结束，在准备启动输油管工程和其

他“东西走廊”辅助工程的同时，哈里伯顿-布朗·鲁特公司接受了一个在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波黑建设军事设施以及邦德斯蒂尔基地的五年合同。邦德斯蒂尔基地位于科索沃，在乌罗舍瓦茨市附近，离普里什蒂纳33公里，占地36万平方米。美国利用北约部队开始在外高加索输油管防御区周边的黑海地区进行军事演练，维和部队的作用恰恰是保护AMBO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建造通往亚得里亚海的跨巴尔干输油管全线中的投资。著有多部作品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反战人士贾斯汀·雷蒙（Justin Raimondo）怀疑，中央情报局可能已放出它的“阿尔巴尼亚疯狗”，以便持续创造不稳定条件，为美国与联合国、北约一起进行干涉找到理由。其怀疑并非毫无根据。

2001年2月15日，记者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在发表于伦敦《卫报》的文章中指出，巴尔干战争的目的恰恰是为建造横穿南斯拉夫的输油管提供安全。他在文章中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的凯斯·费舍尔（Keith Fisher）的研究报告进行了评论。[30]1993年，输油管项目尚未获批时，美国就已向巴尔干派遣了维和部队，他们没有驻扎在关押和杀害平民的区域，而是在与马其顿接壤的北部。为了获得阿尔巴尼亚的许可，就得让北约把塞尔维亚人赶出科索沃，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和平。没有巴尔干和平，就不可能保证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世界银行、花旗银行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建造输油管道所提供的约12亿美元的资金。

【注解】

[1] Gompert, David. “How to Defeat Serbia”,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4.

[2]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the Enlargement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ationale, Benefits, Costs and Implications. Released by the Bureau of European and Canadian Affair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4, 1997.

[3] Tirman, 1997, p. 282.

[4] Conetta, Carl & Knight, Charles. “Inventing Threats”, in *The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March/April 1998 vol. 54, nº 2.

[5] 推出“新美国世纪计划”时的讲话确定了以下原则：“(1) 如果我们要履行我们今天的责任并面向未来实现我们军队的现代化，我们就需要大幅度增加国际开支。(2) 我们需要加强我们与民主的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向那些仇视我们利益和价值的政权发起挑战。(3) 我们需要在海外宣传政治和经济自由事业。(4) 我们需要承担责任，在维护和扩展一个对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富裕和我们的原则友善的国际秩序中，发挥美国独特的作用。”

[6] Clinton，2004，pp. 708-710.

[7] Id.，ibid.，p. 776.

[8]“阿肯色项目”由超级保守派亿万富翁理查德·斯凯夫在匹兹堡建立。他也为《美国观察者》杂志提供了资金，以搜集希拉里和我的负面故事。Id.，ibid.，p. 711.

[9] 阿拉法特的全名是 Muhammad ‘Abd-al-Rauf Arafat al-Quduwa。他生于 1929 年，在埃及长大，并在那里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

[10] Id.，ibid.，pp. 747-748，752-753，775-776，815-816，817-820.

[11] 他的俄国名字是安纳托里·夏兰斯基（Anatoly Shcharansky）。1978 年，他因被指控为美国间谍而被抓，并被判处 13 年徒刑，其中 9 年在西伯利亚的古拉格度过。1986 年，他与一名苏联间谍作交换后移民以色列。他在以色列采用了“纳坦”这一名字。

[12] Sharansky，2004，pp. 148-161.

[13] Referral to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ursuant to Title 28，United States Code，§ 595 (c). Submitted by the 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 September 9，1998. Lewinsky，7/30/98 Int. at 16.

[14] Boutros-Ghali，1999，pp. 193-197.

[15] Thomas，1999，pp. 105-112.

[16] Id.，ibid.，pp. 108-109.

[17] 克林顿起誓与莫尼卡·莱温斯基不存在性关系。但莱温斯基否认了克林顿的说法，并出示了一件带有精斑的蓝色内裤。这迫使总统因为说谎而向美国人民道歉。

[18] Clinton，2004，p. 862.

[19] Id.，ibid.，p. 863.

[20] 1999 年 1 月 7 日，参议院开始审议，以 55 票对 54 票撤销了对他违誓的指控。对他妨碍司法的指控表决为 50 票对 50 票。但弹劾总统需要 67 票。

[21] Clinton，2004，pp. 851 e 859.

[22] BBC Online Network Friday，July 30，1999. Published at 18:50 GMT 19：50 UK. http://news. bbc. co. uk/1/hi/sci/tech/408122. stm.

[23] Clinton，2004，p. 859.

[24] 马其顿联邦共和国1991 年从南斯拉夫分离出来后，西方各国立即对其予以承认。

[25] USTDA Library. SBDI South Balkan East-West Corridor. nº 199672A—1998-04-01. Bechtel International，Inc. Europe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http://search. yahoo. com/search?p=Burgas&sm=Yahoo%21+Search&fr=FP-tab-web-t&toggle=1&ei=UTF-8.

[26] 1992 年，切尼作为国防部长给予了哈里伯顿公司一个向全球美军行动提供支持的合同。1995 年，他成为该公司总裁。也是在 1992 年，哈里伯顿公司的子公司布朗和鲁特公司承接了一个 6 200 万美元的合同，负责维持在索马里的军事基地。1994 年，该公司负责在海地建造基地并向 18 000 名士兵提供支持。

[27] U. S. Trade and Development Agency. Executive Summary—Albanian-Macedo-

nian-Bulgarian Oil Pipeline Corporation (Trans-Balkan Pipeline Project). May 1, 2002. U. S. Firm: AMBO LLC. Project Sponsor: Bulgarian Prime Minis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Works. TDA Active Number: 99 - 70008A. NTIS Number: PB2000106974. Sector: Mining & Natural Resources. Region: Europe. Country: Europe Regional.

[28] White House. Reliable, Affordable, and Environmentally Sound Energy for America's Future. Chapter Eight. Strengthening Global Alliances. Enhancing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Report of the National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Group, 2001.

[29] "World: Europe Analysis: Turning off Serbia's oil supply". BBC Online Network, Thursday, April 29, 1999 . Published at 13:48 GMT 14:48 UK. Thursday, April 29, 1999 . Published at 13:48 GMT 14:48 UK.

[30] Monbiot, George. "A discreet deal in the pipeline. Nato mocked those who claimed there was a plan for Caspian oil". Londres, *The Guardian*, 15/2/2001.

第三十章

美国在中亚和里海的地缘战略利益　巴基斯坦、沙特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资本主义　针对美国大使馆的恐怖袭击　联合国在伊拉克的核查人员和中央情报局间谍　右翼向克林顿施压　准备在哥伦比亚发动的战争

巴尔干地区通过武力实现的和平不足以使美国和与其共同组成工业国卡特尔的欧洲伙伴在该地区实施能源项目，它们还必须控制中亚地区。该地区的问题显得尤为复杂，因为即使苏联军队撤出后，阿富汗战争依然没有停息。沙特和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出于经济和宗教原因，在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继续怂恿“圣战”。中央情报局则出于美国的地缘战略考虑，操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使其行动延伸到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以及高加索共和国和巴尔干地区，目的是控制能源和起点为里海湾的输油管走廊。据来自俄罗斯的资料，1993 年，约有 4 000～5 000 名塔吉克斯坦“圣战者”跨越阿富汗东北部边界来到原苏联各中亚共和国，去与非宗教政府抗争。[1]里海沿岸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2]是原苏联最贫穷的共和国，美国早就图谋让它们摆脱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进而控制它们所拥有的大量石油。这些国家的石油储量可与沙特等量齐观。此外，它们还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天然气，探明储量达 236 万亿立方米。1998 年 2 月 12 日，优尼科公司主管国际关系的副总裁约翰·马雷斯卡（John J. Maresca）在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和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称，整个地区的石油储量可能超过 600 亿桶，甚至达 2 000 亿桶。他还说，西方国家公司有条件把产量提高 500％以上，从 1995 年的 87 万桶，增加到 2010 年的 450 万桶，这相当于世界石油总产量的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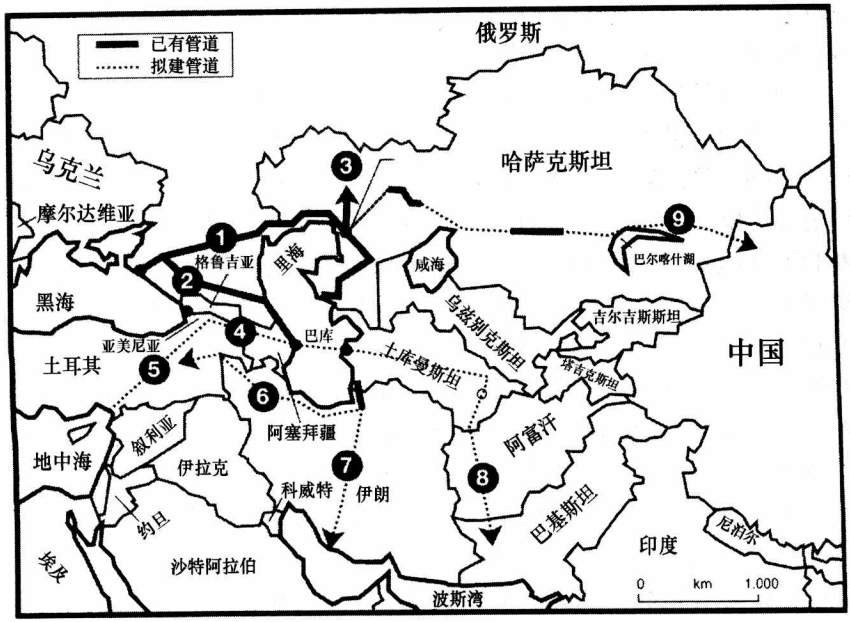
然而，美国担心原教旨主义者会推翻巴基斯坦军政府。这样，不仅一个拥有核武器生产能力的国家会落入原教育主义者手中，而且，一旦沙特君主制政府倒台，他们还将占据丰富的石油资源（世界已探明石油的2/3）。为了遏制伊朗对该地区的影响，美国认为，帮助被什叶派视为非伊斯兰的塔利班组织夺取阿富汗政权更为有利。因此，阿富汗内战未能停息，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和沙特支持下，于1996年占领喀布尔。沙特三角洲石油公司和宁加霍（Ningarcho）石油公司参与了起始于土库曼斯坦并跨阿富汗的输油管道和输气管道工程。塔利班的胜利有利于美国孤立伊朗的政策。这样，美国就能在阿富汗边境建立一条牢固的逊尼派隔离带，使其成为贸易通道和输油管的安全屏障。[4]

石油已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圣战者”在巴尔干的活动是美国所希望的，因为他们的行动有可能使南斯拉夫发生更严重的分裂，这将为北约干涉创造条件。即使是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的稳定也有利于石油公司项目的实施。当时，沙特持有股份的两个大财团竞相博取塔利班的好感，目的是想得到项目合同。一个是阿根廷企业家卡洛斯·巴尔格罗尼（Carlos Bulgheroni）拥有的布里达斯公司和沙特宁加霍公司共同组成的财团，后者与费萨尔亲王有关系；另一个是美国的优尼科公司，该公司计划建造一条始于乌兹别克斯坦并跨阿富汗、巴基斯坦通往印度洋的输气管道和一条始于土库曼斯坦的查尔朱、跨越土耳其、全长1 050英里的中亚输油管道，这样就能使阿塞拜疆尚未开采的巨量石油无须经过俄罗斯即可运抵海外。

1997年10月27日，以优尼科为首的包括沙特三角洲石油公司在内的六家公司在阿什哈巴德签署协议，建立了中亚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5]，准备建设一条全长1 272公里、耗资20亿美元的管道。该管道设计日输气量为5 400万立方米（年200亿立方米），起点是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多勒塔巴德，跨越赫拉德和坎大哈，直通巴基斯坦的木尔坦，在那里与另一条通往新德里的管道衔接。当时，塔利班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阿什哈巴德，同意与巴基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组成一个三方委员会来监督项目实施。1998年1月，塔利班与优尼科签署协议，批准建造这一输气管道。

多家石油公司在研究建设从中亚跨越阿富汗的赫拉德和坎大哈以及巴基斯坦的奎达和卡拉奇的输油管道，总投资将达19亿美元。通过这一管道把石油输往印度市场的距离相对较短（第8通道）。但由于阿富汗内战尚未平息，包括最感兴趣的优尼科在内的所有公司都放弃了原先的想法。太平洋沿岸和中国也是里海和中亚石油潜在的广阔市场。一些公司考虑建设一条从哈萨克斯坦通往中国的输油管道，用于供应中国、日本和韩国市场

(第 9 通道)。参与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油气工程的 40 多个项目的公司中有 11 家来自美国，24 家为西方其他国家公司，2 家为俄罗斯公司。这些项目的总金额超过 1 000 亿美元。埃克森、阿莫科、美孚和雪佛龙等公司与该地区的相关国家签署了地区性合同。然而，这一地区的政治动荡和美国对阿塞拜疆所采取的政策使很多项目进度缓慢或处于瘫痪。1998 年为工程项目的巅峰时期。[6]



中亚和里海地区已建成的输油管道和规划管道图

资料来源：*Military Review*。

与“基地”组织成员联合的塔利班，其激进和极端程度丝毫不亚于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在阿富汗掌权后就立即强行实施沙特所推行的伊斯兰教最保守的“瓦哈比”派教义。本·拉登为其最激进代表。这一 19 世纪中叶出现的教义排斥西方文明，将其视为颓废、贪婪并具极端的压迫性。作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精髓，它试图在已经堕落的穆斯林政权中推行纯洁的伊斯兰教。亨廷顿将其与 16 世纪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改革相提并论。他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和新教改革一样，是对各种机构中存在的毫无生气和贪污现象的一种反应，试图通过说教、秩序和纪律恢复宗教最纯洁和最严格的形态。

与其相比，塔利班更为极端，它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拉什顿哈里发式政权，恢复七世纪阿拉伯人所处的状况。拉什顿是先知穆罕默德（570—

632）的四个继承者[7]，被视为有怜悯心之人。[8]这一做法意味着一系列限制，尤其是针对妇女的措施。她们被禁止就学和工作，甚至不能迈出家门，除非在特定和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她们也不被允许听音乐或从事艺术活动。由于宗教原因，不管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原教旨主义都反对资本主义文明，反对引入西方习惯和被视为亵渎神明的音像、时尚、饮料和金融服务。[9]资本主义的发展瓦解了之前存在的自然经济或简单市场经济，它不仅没有为第三世界国家广大民众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反而使其边缘化，人们的贫困和绝望使原教旨主义倾向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上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民族主义为主要特征，它与泛伊斯兰主义交织在一起，并作为以推翻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和突尼斯等国的专制、腐败政权为目的的政治运动而得到加强。因此，取得政权比伊斯兰信仰的确立显得更为重要。[10]由于未能推翻在沙特、埃及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腐败、专断和不受民众支持的政权，深感绝望的原教旨主义者就开始直接攻击被他们视为“大撒旦”的敌人美国。先前支持他们的美国所行使的世界霸权程度超过了1870—1914年间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它是巴勒斯坦问题的罪魁祸首。1998年8月7日，一枚炸弹在美国驻内罗毕（肯尼亚）大使馆爆炸，炸死12名美国人和32名当地雇员，约247人受伤。几乎同时，另一枚炸弹在美国驻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大使馆被引爆，10人丧生，70多人受伤。作为对炸毁美国在东非的两个大使馆行动的报复，克林顿于8月19日下令美国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的军舰和潜艇对阿富汗和苏丹实施轰炸，以便清除本·拉登。约80枚战斧巡航导弹在卫星导航下轰炸了这两个位于不同大陆、相距约4 000公里的国家，炸毁了阿富汗东部霍斯特和贾拉拉巴德内可能是本·拉登设立的游击队和恐怖分子训练营，并将喀土穆（苏丹）郊区的希法制药厂作为化学武器工厂予以摧毁，但本·拉登却毫发未损。在这一行动中，美国投入的“价值7 500万美元的导弹被发射到阿富汗和苏丹这两个世界上最穷的伊斯兰国家”，20世纪80年代曾任中央情报局喀土穆站站长的米尔顿·比尔登（Milton Bearden）这样评论。[11]本·拉登通过一个地下电台声称：“感谢真主，我还活着！”

第二天，克林顿发布第13099号行政令[12]，“禁止与威胁破坏中东和平进程的恐怖分子尤其是本·拉登进行交易”，并冻结了他和埃及恐怖分子阿布·马斯里（Abu hafs al-Masri）、里费·穆萨（Rifa'i Ahmad Taha Musa）的财产和银行账户。他还签署多个备忘录，批准中央情报局对本·拉登进行“杀伤性打击”[13]。自那时起，美国放弃了对塔利班的支持。尽管费萨尔亲王从中调停，希望获得卷入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使馆

袭击案的凶手名单，但塔利班拒绝交出本·拉登。美国长期扶植恶魔，它曾利用塔利班抵抗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队，并试图孤立伊朗什叶派政权，而此时则试图除掉他。1987—1989 年间曾任巴基斯坦情报局局长并协调“圣战者”抵抗苏联军队的哈米德·古尔（Hamid Gul）将军认为，伊斯兰教不允许把一个人交给那些要将其置于死地的人们，而且，审判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央情报局未能抓获本·拉登。他可能藏身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处的洞穴中。两国边境的居民属同情塔利班的普什图族。

塔利班自 1995 年在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建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后，就与得到王室支持的沙特“瓦哈比”派和伊斯兰神学者协会成员结成同盟。准备前往巴尔干（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和车臣以及俄罗斯联邦主要输油管道经过的塔吉克斯坦进行战斗的游击队员和恐怖分子聚集到本·拉登的训练营地。种种迹象表明，本·拉登没有为了得到物质、资金和后勤保障而与自己所憎恨的美国签署任何协议。80 年代他就在汉志省和内志省宣扬抵制美国商品和打击美国经济的必要性。2001 年 9 月 26 日，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他否认美国曾与自己及阿富汗的“圣战者”合作，并以挑衅的口吻要求美国出示证据。他称，“不存在任何协议”。他还表示，“圣战者”是在履行支持穆斯林的义务，“尽管这一义务与并未得到我们认可的美国利益发生交汇”。本·拉登把为抗击罗马人而与波斯人站在同一条战线的穆斯林当作例子。他指出，他们的利益相吻合，但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认为，在穆厄泰战役中与罗马人作战的穆斯林是波斯人的党羽，双方共同战斗仅仅是利益交织而已。[14]他认为，穆斯林把抗击罗马人当作其义务的一部分，尽管这样做让波斯人感到高兴。但与罗马人的战争一结束，穆斯林又转而对付波斯人。本·拉登称，“没有任何协议的利益交汇并不意味着联合或卑躬屈膝”[15]。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即使在 1998 年后，中央情报局仍求助于本·拉登，以便吸引外来者和伊斯兰教“瓦哈比”成员与车臣反叛者一起共同抗击俄罗斯的统治。[16]本·拉登从未接受与沙特王室结盟，在他眼中，沙特王室是一群维持腐败政权的异教徒，尤其是美国军队在圣地（麦加和麦地那）[17]的存在亵渎和冒犯了真主。他在 1998 年 2 月 23 日下达的教令中称，杀死“美国人及其同盟者，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是“所有穆斯林的一种个人义务”，这一义务可以在任何国家实现。他的目的是解放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把美国军队从伊斯兰圣地驱逐出去。[18]也许本·拉登要求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从伊斯兰国家驱逐出去的目的是想把塔利班政权当作矛头，

去破坏巴基斯坦的稳定，从而主宰这一拥有核能力并能使伊斯兰实力得到加强的国家，并推翻沙特政权，进而控制世界石油生产。他与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和军队结盟，以显示穆斯林有条件控制沙特石油和守护麦加等圣地。满脑子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本·拉登于是成为穆斯林世界地下反对势力的代表，其活动范围遍及整个中东，乃至乌兹别克斯坦。曾任中央情报局苏丹站站长的比尔顿认为，如果把近十年发生的恐怖袭击全部归咎于本·拉登，除了“其危害性和过于简单化”外，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是一种侮辱。[19]

优尼科公司因支持塔利班政权而在美国受到强烈指责，尤其是来自女权主义者团体的批评。塔利班政权压迫妇女，剥夺她们的一切社会生活权利，残酷镇压阿富汗少数民族。1998 年 8 月，由于克林顿在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使馆遭袭后下令轰炸“基地”组织营地，优尼科公司以石油价格走低和阿富汗的动荡局势让投资者感到恐慌致使管道项目利润率降低并具高风险为由，中止了中亚天然气管道公司在承建该项目财团中的参与。该公司 8 月 21 日宣布，“只有当阿富汗实现从国际信贷机构获得此项目投资所需的和平和稳定，并建立一个得到联合国和美国承认的政府后，优尼科才会参与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20]

中东危机也进一步加剧。1995 年，极端正统派原教旨主义者伊加尔·阿米尔（Yigal Amir）暗杀了以色列工党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此前在 1994 年 5 月，拉宾与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签署了以《奥斯陆协议》著称的“原则声明”。根据这一协议，以色列同意归还其所占土地并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最高权力机构则承诺打击恐怖主义，并在《巴勒斯坦民族宪章》中删除宣扬消灭以色列的条款。通过这一意在使巴勒斯坦局势变得正常的交换条件，克林顿试图与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重启和平进程，尽管后者在工党赢得 1996 年大选后废除了禁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张的法令，并关闭了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的办事处。克林顿认为，利库德主导的右翼联盟“是一群更难说服的人”[21]，他们顽固拒绝和《奥斯陆协议》建立的巴勒斯坦最高权力机构达成协议。1997 年，各方达成了一项以色列军队从希伯伦犹太定居点以外地区撤军的协议，但利库德集团不同意按《奥斯陆协议》把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部分控制权交给巴勒斯坦最高权力机构。

在因与莱温斯基不正当关系引发的针对克林顿的弹劾程序进行之时，美国右翼势力要求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压力不断上升。1998 年 1 月 26 日，由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约翰·波尔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弗朗西斯·福

山、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威廉·贝内特（William J. Bennett）、杰弗里·伯格纳（Jeffrey Bergner）、葆拉·多布里扬斯基（Paula Dobriansky）和扎尔梅·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等“新美国世纪计划”团伙致函克林顿，要求他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他们表示：

> 唯一可以接受的战略是，消除伊拉克使用或威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从短期看，意味着在外交行动明显失败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从长期看，意味着推翻萨达姆及其政权。这需要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22]

克林顿不情愿地签署了批准五角大楼向伊拉克国民大会提供总金额为9 700万美元的物资和服务的法案。伊拉克反对派实际只收到20 000美元，作为3名伊拉克人两周的培训费。另有64 000美元作为直接经济帮助，用于该组织在伦敦办事处的房租和薪水。克林顿排除了提供武器支持的可能性。[23]自1997年起，由裁军专家澳大利亚人理查德·巴特勒（Richard Butler）领导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继续通过“特殊情报搜集小组”等机构在伊拉克开展工作。这些小组的要求带有挑衅性，其真正目的是寻求摩擦，为美英发动新的袭击寻找借口。[24]它们与摩萨德分享其所获得的情报，后者向其提供了高频扫描仪和数字录音设备，以便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总局、安全特别局、军事情报局和军事安全局等伊拉克敏感军事和安全机构的加密通话进行录音。

1998年8月26日，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负责人斯科特·里特（William Scott Ritter）少校提出辞职，理由是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安理会没有给予其应有的支持。“我很失望地离开我的岗位，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和作为其最重要支持者的美国没有实施要求伊拉克削减武器的后海湾战争决议。”1998年9月3日，他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了上述表示。他声称：

> 核查伊拉克总统府自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实际上是特别委员会的一个退步，这是与伊拉克之间不断冲突的一部分。包括美国和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社会向伊拉克作了让步。

里特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并无意核查“总统府邸”这种“敏感地

点”，但当伊拉克政府拒绝美国和联合国人员进入时，这就变成了一个问题，结果是双方发生冲突。伊拉克政府的理由是美英控制了核查进程，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试图核查涉及伊拉克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地点，包括“总统官邸”。萨达姆不想让 40 名中央情报局人员在那些地方进进出出。[25]由于萨达姆态度强硬，美国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但是，1998 年 2 月 23 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与萨达姆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避免了军事行动。[26]里特称，“现在的伊拉克并没有被解除武装，依然对邻国和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他指责克林顿政府干涉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削弱其解除伊拉克武装的能力。他称，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目的是“使我们和中东地区的伊拉克邻国不受萨达姆的核武器、化学或生物武器或能够携带这些武器的远程弹道导弹所威胁”[27]。他进一步指出：“伊拉克没有被解除武装。”[28]

里特少校明白，美国在波斯湾的首要政治目的是通过制裁来遏制伊拉克，而并不一定非要让它解除武装。他指责法国、俄罗斯和中国保护伊拉克以及克林顿政府 1996 年 11 月至 1998 年 8 月间因萨达姆阻止突击核查而进行的至少 6 次直接干预。他认为，美国致力于用经济制裁和在波斯湾的广泛军事存在遏制伊拉克的政策（尽管未公开宣布），尽量避免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与萨达姆政府之间代价高昂的冲突。克林顿国家安全班子清楚，让伊拉克无法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捷径是，让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核查最神圣的萨达姆官邸，即那些会进一步冒犯伊拉克主权和尊严的“敏感地点”。他们对事实依据视而不见。由于克林顿担心伊拉克的反击，更因为不清楚伊拉克所隐藏的武器，他选择了一个通过无限期制裁的“非残局遏制战略”。美国自 1991 年起采取的制裁造成了 100 多万平民死亡，尤其是儿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1997 年约有 50 万名伊拉克儿童死亡）[29]，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因为伊拉克消费的约 70%食品依靠进口。[30]

事实上，克林顿在力主打击伊拉克的共和党人压力（包括约翰·克里在内的一些民主党成员）和反对使用武力回应任何对抗之间陷于两难，因而，他认为最好使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核查拖延下去。但到了 10 月，形势恶化，阿齐兹总理向安理会宣称，巴格达政府不再接受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中的美国人，理由是他们为美国而不是为联合国工作。鉴于伊拉克已经履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议，因而阿齐兹要求中止 U-2 侦察机的监督飞行。此外，他还要求由新执行局领导的、其主席采取轮值做法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必须由与联合国安理会相同的成员比例组成，其总部应从纽约

迁至日内瓦或维也纳。1998 年，美国国会批准政府把向伊拉克反对派武装提供的军事援助额增至 9 700 万美元，以便“推翻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政府”，并“推动一个民主政府的出现”[31]。1998 年 10 月 21 日，克林顿签署了《1999 年统一紧急追加拨款综合法案》，落实了用于支持“伊拉克民主反对派”的 800 万美元。10 月 31 日，他签署第 4655 号《伊拉克解放法案》，明确将在伊拉克实施“改变政权”政策，宣布美国国会将支持和保护“非常有别于巴格达现政权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这一残酷现实”的所有反对派人士。[32]

在符合自身经济、政治和战略目的的情况下，美国从来不尊重自 17 世纪以来基于国际法的两项基本原则：民族主权和国家的法律平等。克林顿签署的《伊拉克解放法案》使单边主义正式成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它毫无掩饰地对抗在三个世纪中作为脆弱的法律和国际协定结构支柱的民族主权、自决和不干涉原则。克林顿清楚地表明，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与“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新保守派”如出一辙，即向中东出口民主，尽管是通过“隐蔽行动”和（或）在得到别国支持情况下采取多边武装干涉。也许这就是他与主张不惜代价进行单边干涉的“新保守派”策略的不同之处。

入侵伊拉克并不是因为那里还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为了推翻萨达姆政府，由一个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政府取而代之。这一点在《伊拉克解放法案》中显而易见。12 月，伊拉克政府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发生冲突。当时，一个带有明显挑衅意图的核查小组试图搜查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总部。按照 1991—1997 年领导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核查项目的瑞典外交官罗尔夫·艾克尤斯（Rolf Ekeus）与伊拉克政府签署的《敏感地点核查模式》协议，只能允许 6 名核查人员进入其中。但核查小组组长违反协议，要求所有核查人员进入大楼。由于伊方没有同意，双方商谈陷入僵局。接替艾克尤斯的澳大利亚外交官巴特勒在与克林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Samuel Berger）会晤后，向安理会通报说，萨达姆政府未遵守安理会决议。美国正需要一个轰炸伊拉克的理由。12 月 15 日，在安理会未被告知的情况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彼得·布尔里（Peter Burleigh）通知巴特勒立即从巴格达撤出核查人员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辅助人员。

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中，俄罗斯、法国和中国不同意对萨达姆动武。在未征询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克林顿在众议院审议针对自己的弹劾前夕，下令发动了“沙漠之狐”行动。他这样做或许是为了阻止弹劾议案获得通过。1998 年 12 月 16—18 日，美国巡洋舰和 B-52 轰炸机以及英国的“旋风”轰炸机对伊拉克实施了 650 次轰炸，并向巴格达的军事和安全目标

发射了400枚“战斧”远程导弹。轰炸波及住宅区（包括萨达姆女儿家）、医院和巴格达大学多个实验室，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伤。这一行动从政治和外交角度看，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正如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在8年时间中一无所获一样，克林顿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清楚有多少禁用材料已被销毁，但伊拉克生产和转让“危险武器”的能力已被摧毁。

实施“沙漠之狐”行动后，克林顿借助核查行动将“遏制”政策发展为“遏制＋”政策，这实际上意味着“改变政权”政策，即推翻萨达姆。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主席巴特勒在回忆录中写道，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表示，即使伊拉克解除武装，在其政权更迭前，美国也不会同意取消制裁。[33]她的说法给了萨达姆进行反美宣传的口实。安南私下批评这一说法，因为，把萨达姆赶下台并非联合国的目的。[34]“沙漠之狐”行动炸毁了很多建筑物，但没有迹象表明建筑物内真正藏有大规模杀伤性物质和武器。俄罗斯对美英实施的轰炸提出了抗议，并撤回驻华盛顿大使。法国和中国也与俄罗斯一道抗议美英行动，要求取消对伊拉克长达8年的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同盟因此瓦解，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核查不再继续。“沙漠之狐”行动结束两天后，里特少校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直到今天，伊拉克也没有被完全解除武装。”他相信美国致力于一个“无限期遏制”政策。几个月后，他出版了《残局》一书。他在书中揭露说，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巢穴。他指责美国政府蓄意设立新的削减标准以维持联合国制裁，并使持续的轰炸变得合理。里特称，中央情报局成员以核查人员身份为掩护，在核查过程中滥用职权，借工作之便搜集与联合国安理会所确定的解除伊拉克武装毫不相干的情报。里特写道，1996—1998年实施的核查计划“纯粹是为了监视萨达姆”。他曾多次抱怨，自己并不相信所谓的核查，这也是他辞职的一个主要原因。[35]

中央情报局日益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各小组中发挥主导作用，仅1992年就在其中安插了9名成员，这样就与里特产生了摩擦。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摩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里特所采取的行动，他试图与以色列合作。为了摆脱中央情报局的控制和对它的依赖，里特从摩萨德那里获得了无线电扫描仪等核查设备。自1996年起，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因怀疑他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服务而对其实施监视。里特曾参与海湾战争（1991年），是“持有正式成员证的共和党人”，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向小布什投了支持票。他在参议院多个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听证会中表示，“武力威胁十分重要，必须保持”，“使用武力必须是一个确实可行的选择”[36]。应众议院国家

安全委员会要求前往参加伊拉克问题会议的沃尔福威茨教授赞誉他是“一个非常正直并具有特殊道德勇气的公职人员和一个不怕说真话的人”[37]。作为“新保守派”成员，沃尔福威茨是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是“新美国世纪计划”的策划者之一。

里特作为美国情报官员，对美国政府包括中央情报局的颠覆角色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核查项目间谍性质的揭露，毋庸置疑拥有权威和可信度。中央情报局策划了 1996 年的伊拉克军事政变。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在 1996—1998 年核查期间的间谍行动尤为明显，当时，伊拉克虽并未彻底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所规定的义务，但已毁掉 90%～95%的军事设施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项目。里特称，“我们必须清楚，余下的 5%～10%并不一定会构成威胁”。他强调说，“它甚至难以构成武器项目”[38]。1998 年，随着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撤离，核查行动宣告结束，里特离开了伊拉克。他当时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所禁武器的生产设施几乎 100%遭拆除。按照艾克尤斯的说法，事实上，自 1996 年年中至 1997 年年中，伊拉克 95%的项目被毁灭，这意味着很高程度的武器裁减。所有工厂都被核查组识别，其中的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设备被毁。接替艾克尤斯出任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巴特勒清楚，1991 年年初，伊拉克“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销毁了相当数量的违禁武器”[39]。伊拉克副总统阿齐兹私下向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核查人员证实了这一点。他说，销毁武器是一个单边决定，目的是不暴露裁减武器项目的规模。[40]1994—1998 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核查人员不厌其烦地对伊拉克研究机构和工业设施进行了不间断的监视，以对伊拉克当时和未来的工业基础设施做出完整评价。

尽管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与萨达姆之间摩擦频频，但克林顿并没有屈从共和党“新保守派”的压力而单方面入侵伊拉克。他下令对“禁飞区”分界线一带的伊拉克军事设施进行间歇性轰炸。由于担心美国会变得更加孤立以及美军卷入地面战斗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他希望组成一个广泛同盟来实施多边干涉。1999 年 1 月，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了多个阿拉伯国家，以寻求对美国极力推行的在伊拉克实现“改变政权”政策的支持，但她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效。在埃及，奥尔布赖特没有从穆巴拉克总统那里获得任何支持。穆巴拉克在《伊拉克解放法案》公布后评论说：“这种计划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所有了解伊拉克的人都知道，任何行动如果不是来自其内部，由本国人民所发动，都不可能取得成功。”[41]

在利雅德，1995 年年底法赫德国王患病后实际主政的阿卜杜勒·萨乌德亲王对奥尔布赖特说，他不会允许美国使用海湾战争后在其境内依然保

留的军事设施去进攻伊拉克，并质问她为何要对伊拉克动武。与此同时，以色列不仅肆无忌惮地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还拒绝履行协议中向巴勒斯坦人做出的承诺。阿联酋总统扎耶德·阿勒纳哈扬（Zaid ibn Sultan al Nahyan）也表明了反对打击伊拉克的态度。奥尔布赖特在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也都没有获得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反对军事干涉伊拉克。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没有达成共识，而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也不予支持，这使克林顿感到十分犹豫，他意识到对萨达姆发动战争的政治条件并不存在。沙特不支持美国行动主要是王室担心国内会发生民众起义。

在奥尔布赖特访问中东国家以寻求对伊拉克开战支持的同时，美国政府一些部门在考虑以打击毒品走私为由对哥伦比亚实施军事干预。毒品走私已成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发动游击战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央情报局代号为“FIX 先生”[42]的秘鲁国家情报局局长瓦尔多米洛·蒙特西诺斯[43]（Valdomiro Montesinos）向环球电视网老板吉纳罗·帕克（Genaro Delgado Parker）透露，美国策划了干涉行动。阿尔贝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1999 年 2 月 4 日在美洲国防学院所进行的演说是由美国人安排的，其目的是告诉世人，这场冲突的起因是拉美地区正面临的危险。秘鲁将军们也被告知，入侵哥伦比亚的准备正在进行之中，战争会在 40～60 天内打响，将动用两个空运师、两支陆军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三个师及 200 架 C-5 和 C-141 战机，约 12 万士兵将参与战斗。这一军事行动将由南美其他国家部队负责执行（显然是为了避免美军减员），或由一支美洲联合部队承担。这一建议于 1999 年在巴拿马召开的西半球各国军事首脑会议中提出，起初并不涉及美国的直接参与。美国将提供 15 亿美元资金，同时负责训练联合部队，并提供武器和后勤支持。

1999 年 6 月，当时的南方指挥部司令查尔斯·威廉（Charles E. Wilhelm）将军向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证实了蒙特西诺斯提供的信息。他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一个在必要情况下干涉巴拿马的特别行动计划，并将入侵哥伦比亚。如果哥伦比亚游击队到达巴拿马运河，“或者与巴拿马人合作，或者根据客观条件要求采取单边行动”。美国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主任巴里·麦卡弗雷[44]（Barry McCaffrey）将军 1999 年 8 月 6 日向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及刑事司法、药物政策和人力资源小组委员会通报说，巴拿马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当作庇护所，其成员还经常越过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秘鲁边界。因此，哥伦比亚反叛组织正从毒品交易中获得资金，并对地区安全造成影响。[45]几周后，他访问了南美的巴西、

玻利维亚、秘鲁和阿根廷。他极为夸张地介绍了哥伦比亚的形势，强烈要求四国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采取一项多国干预行动。麦卡弗雷认为，美国对哥伦比亚进行军事干预将会是“一个疯狂行动”，因此有必要寻求该地区的支持来解决问题。

麦卡弗雷将军提议的计划是，先由美国特种部队训练并装备的五个哥伦比亚旅发动攻势，假如难以打垮游击队，就进行多国武装干预。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谈判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为2000年1月，假如未能在该期限内达成和平协议，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Andrés Pastrana）总统将宣布哥伦比亚进入内战状态，同时要求秘鲁、厄瓜多尔和巴西等南美国家提供帮助，让这些国家的军队与美国顾问训练的五个旅联合起来。与此同时，部署在哥伦比亚沿岸的美国军舰将通过导弹和空中打击支持军事干预。为了保证在哥伦比亚的石油开采和保护已建成的输油管道，美国有必要控制该地区。当时，有多家外国公司在哥伦比亚进行石油开采，包括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输油管道则把石油产品从古比阿瓜、古希阿纳、瓜杜阿斯、奥利托油田和厄瓜多尔的油田输往位于太平洋的科维尼亚斯和杜马科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断袭击这两个港口。哥伦比亚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且未被开采，它已成为美国的第六大石油供应国，哥伦比亚加上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向美国出口的石油已超过波斯湾对美国的石油出口量。

美国政策研发小组2001年提交的《国家能源报告》指出，“哥伦比亚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石油供应国”[46]。美国驻波哥大大使安妮·帕特森（Anne Patterson）声称，哥伦比亚的石油安全已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美国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卡尼奥至科维尼亚斯的输油管，还有300个关键点。正如国际政策中心分析家亚当·艾萨克森（Adam Isacson）所言，石油已成为在哥伦比亚的“一个不断上升的重点”[47]。保守智库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了哥伦比亚的战略重要性，其理由是，它是本地区四个大国之一，人口数量位居第二。它濒临太平洋和大西洋，紧邻委内瑞拉、加勒比湾、巴拿马运河和中美洲，再加上它所拥有的油田更凸显其价值。该研究报告还指出，“哥伦比亚还拥有西半球最大的未开采石油层”[48]。

打击贩毒实际上只是次要目的。计划于2000年对哥伦比亚进行的武装干预还能使美国证明它协调位于厄瓜多尔、阿鲁巴-库拉索和萨尔瓦多的三个新基地即“前沿行动地带”[49]的能力，并借机试验新武器、发展新战略。在哥伦比亚进行的多国干预和对伊拉克的干预是一体之两面，目的是维护石油公司和军工企业的利益。然而，巴西和委内瑞拉就连让美国战机

和部队驻扎在其境内用以打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要求也未答应。克林顿对伊拉克和哥伦比亚的干预没有得到各国的支持。2000 年 8 月 31 日，克林顿在卡塔赫纳宣布推出“哥伦比亚计划”。[50]美国以打击贩毒、支持该国经济发展和资助古柯替代作物种植为借口，计划在五年内投资 75 亿美元。[51]这一计划作为一个新战略，意在重新绘制南美地图。巴西参议员若泽·萨尔内（José Sarney）和一些军人认为，“哥伦比亚计划”意在使美国军人在亚马逊流域的存在合法化，是推动该地区国际化的开始。

【注解】

[1] Blum，2001，p. 36.

[2]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位于南高加索地区，是原苏联的组成部分，与土耳其和伊朗接壤，从黑海和里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的高加索山脉。历史上，位于南高加索地区的国家被视为欧洲、中东和亚洲之间的连接通道。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在一段时间中曾获得自治。但阿塞拜疆到 20 世纪才获得独立。这些国家在 1917 年革命后立即宣布独立，但苏联红军于 1921 年将其重新占领。它们在苏联解体后重获独立。这些国家由于拥有石油和天然气而引起外国兴趣。

[3] Apud Ahmed，2002，pp. 305-307.

[4] Rashid，2001，pp. 166-167.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一直支持塔利班势力的扩张，一方面它鼓励本国的石油公司参与那里的项目，另一方面默许自己在该地区的两个主要盟友——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在资金和军事上支持塔利班。信奉原始的伊斯兰逊尼派教义的塔利班由于极端仇视邻国伊朗（也包括阿富汗）的什叶派穆斯林，因此对美国来说具有额外的好处。建造天然气管道的一个最根本条件是阿富汗的政治稳定。在一段时间中，美国相信塔利班恰恰能保证这一点。如果不是塔利班表面上对曾得到美国支持的本·拉登的包容以及它在妇女和其他社会问题上所持的十分明显的极端压迫态度，美国可能更愿意继续支持塔利班，那么，管道建设也就能在 90 年代后期上马。Tanter，Richard. “Pipeline Politics：Oil，gas and the US interest in Afghanistan”. http://www.zmag.org/tanteroil.htm.

[5] 优尼科拥有 46.5%的股份，沙特三角洲石油公司（Delta Oil）占 15%，土库曼斯坦国家天然气公司占 7%，日本伊藤忠石油勘探公司（Itochu Oil）和日本国际石油开发株式会社（Inpex）分别占 6.5%，韩国现代工程公司占 5.5%，巴基斯坦新月集团占 3.5%。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公司（RAO Gazprom）有意在未来持有 10%的股份。

[6]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Office. Hydrocarbons and a New Strategic Region：The Caspian Sea and Central Asia”，by Mr. Lester W. Grau，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Office，Fort Leavenworth，KS.，*Military Review*. May-June 2001.

[7] Common Era.

[8] 632 年穆罕默德去世后，穆斯林群体的领导权落到四大哈里发手中。他们在麦加执掌权力。

[9] Guimarães, Samuel Pinheiro. "Esperanças e ameaças: notas preliminares", 23 de outubro de, 1995. Original.

[10] Touraine, Alain. "La hegemonía de EEUU y la guerra islamista", Madri, *El País*, 13/7/2001.

[11] "Hunting bin Laden", *Frontline*—PBS, 2001.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binladen/interviews/bearden.html.

[12] Clinton, 2004, p. 804.

[13] Id., ibid., p. 804.

[14] Al-Jazirah TV Broadcasts Usama Bin Ladin's 1998. Interview by Daniel Pinéu—26 September 200, 13: 29 UTC.

[15] Ibid.

[16] Wines, Michael. "War on Terror Casts Chechen Conflict in a New Light", *The New York Times*, 9/12/2001, Late Edition—Final, Section 1A, p. 6, Column 3.

[17] 对穆斯林来说，最神圣的地方是麦加圣寺，其次是麦地那圣寺。著名的耶路撒冷阿萨克清真寺被视为伊斯兰第三圣地。

[18] Text of Fatwah Urging Jihad Against Americans published in *Al-Quds al-'Arabi* on Febuary 23, 1998. Statement signed by Sheikh Usamah bin-Muhammad bin-Ladin; Ayman al-Zawahiri, leader of the Jihad Group in Egypt; Abu-Yasir Rifa'i Ahmad Taha, a leader of the Islamic Group; Sheikh Mir Hamzah, secretary of the Jamiat-ul-Ulemae-Pakistan; and Fazlul Rahman, leader of the Jihad Movement in Bangladesh.

[19] "Hunting bin Ladin", *Frontline*—PBS, 2001.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binladen/interviews/bearden.html.

[20] 优尼科发布的声明如下：中止被提议的跨阿富汗的天然气管道的相关活动。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塞贡多，1998 年 8 月 21 日。由于该地区的政治条件急剧恶化，负责中亚天然气管道集团业务发展的优尼科公司已中止了与被提议的在阿富汗建设管道项目有关的所有活动。我们正在与集团的其他成员商讨此次中止事宜。这一中止活动的决定符合优尼科参与该项目的一贯立场。在过去的数个月中，优尼科一直在与中亚天然气管道集团的其他成员检讨这一项目。我们始终让其他参与者清楚，除非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得到联合国和美国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府，而且必须在这一政府建立后，优尼科才会在这一项目中投资。与一些报道恰恰相反，优尼科没有也不会参与任何与阿富汗某一个派别的商业协议。在 1995 年提议开发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和 1997 年 10 月建立由七个成员组成的中亚天然气集团过程中，优尼科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集团的建立是为了评估并在合适情况下参与未来天然气管道的建设，该管道的起点为土库曼斯坦，经阿富汗到达巴基斯坦天然气市场，并有延伸至印度的潜在可能。只有当阿富汗实现从国际信贷机构获得此项目投资所需的和平和稳定，并建立一个得到联合国和美国承认的政府后，优尼科才会参与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建设。鉴于此理由，我们强烈支持联合国在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解决冲突的方案。

我们相信，中亚天然气管道通过提供至关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就业和培训，并

为多个相关国家带来硬通货收入，将使整个地区受益。被提议的管道建设是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样板，在拥有适当的条件后，将帮助阿富汗从目前的战乱状态中走出来，实现经济重建。自从管道项目首次被提出以来，优尼科已认真地应对了大量复杂的事务。优尼科认识到，在对待阿富汗妇女问题上的合理关切与我们的核心价值和商业原则相一致。优尼科正通过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和奥马哈的内布拉斯加大学为阿富汗人提供人道主义支持和技能培训。两者的目的均不是为提供管道建设技能训练所设计，这些项目符合乃至超出了联合国关于在阿富汗从事实地工作的指导方针。它们包括对男性和女性的基本劳动技能的培训和教育，并为男孩和女孩提供初级教育。优尼科还通过红十字会和联合国向最近发生的地震受害者提供了救灾援助。

[21] Clinton, 2004, p. 832.

[22] The Honorable William J. Clinto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January 26, 1998. Project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iraqclintonletter.htm.

[23] Kaplan & Kristol, 2003, p. 50. Lancaster, John. "In Saddam's Future, a Harder U. S. Line". *The Washington Post*, 3/6/2000.

[24] Hiro, 2003.

[25] Ritter & Pitt, 2002.

[26] Scott Ritter. "Saddam's Trap". *The New Republic*, 21/12/1998.

[27] 1998 Congressional Hearings Special Weapons Nuclear,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Missile. Statement of Scott Ritter, September 3, 1998 at United States Senate Joint Legislative Hearing of the Committees on Armed Services and Foreign Affairs—216 Hart Office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8] Ibid.

[29] Hiro, 2003, p. 143. 伊拉克卫生部认为死亡人数要多得多。

[30] Ritter & Pitt, 2002, pp. 17-19.

[31] Woodward, 2004, p. 10.

[32] Butler, 2001, p. 49.

[33] Id., ibid., p. 41.

[34] The Iraq Liberation Act. October 31, 1998.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For Immediate Release. October 31, 1998.

[35] Ritter & Pitt, 2002, p. 51.

[36] 1998 Congressional Hearings Special Weapons Nuclear,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Missile. Statement of Scott Ritter, September 3, 1998 at United States Senate Joint Legislative Hearing of the Committees on Armed Services and Foreign Affairs—216 Hart Office Building, Washington DC.

[37] Statement of Paul Wolfowitz, Dean of The 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for th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Hearings on Iraq. September 16, 1998.

[38] Butler, 2001, pp. 51-52.

[39] Id., ibid., pp. 51-52.

[40] Ritter & Pitt, 2002, p. 24.

[41] *The Washington Post*, 23/11/1998.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0/11/1998, apud Hiro, 2003, p. 145.

[42] Páez, Angel. "Montesinos era conocido por la CIA como 'Mr. Fix'", *La República*, Lima, 22/1/2004.

[43] 1999 年，蒙特西诺斯派人通过萨基斯·科佩连（Sarkis Soghanalian Kopelian）前往约旦购买武器。科佩连来自亚美尼亚一个贩毒家庭，他曾为中央情报局效力，被称为"死亡商人"。购买武器是为了供应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目的在于挑衅，也就是为美国对哥伦比亚进行军事干预找到理由。这一事实揭露所引发的丑闻加剧了 2000 年年中秘鲁国内发生的政治危机，导致藤森总统下台。

[44] 普利策奖获得者、《纽约客》杂志资深记者塞缪尔·赫什揭露说，曾参与越战的麦卡弗雷将军在海湾战争结束前几天指挥杀害了数百名伊拉克士兵。

[45] Statement by General Barry R. McCaffrey, Director,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Reform, Subcommittee on Criminal Justice, Drug Policy, and Human Resources—The Evolving Drug Threat in Colombia and other South American Source Zone Nations, August 6, 1999.

[46] White House. National Energy Report. Chapeter Eight. Strengthening Global Alliances. Enhancing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8 - 10. National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Group. May 2001.

[47] Van Dongen, Rachel. "US focus in Colombia expands from drugs to oil. American troops arrived recently to train local soldiers in how to guard pipeline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5/2/2003.

[48] RAND. "The Colombian Labyrinth: The Synergy of Drugs and Insurgen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tability." Ángel Rabasa and Peter Chalk. 2001.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339/.

[49] "前沿行动地带"使美国侦察机和预警机得以使用战略性机场和基地。这些机场和军事设施的所有权属于所在国，由它们负责运营。美国在那里部署一小批军人以及缉毒局（DEA）、海岸警卫队和海关人员，以便为美国战机提供支持，并协调通信和情报收集工作。

[50] 1998 年 8 月 3 日，帕斯特拉纳在就任总统前 3 天到访华盛顿。他向克林顿总统提议，美国政府和银行应该在哥伦比亚资助一项类似"马歇尔计划"的项目，以便使古柯种植区得以重生，让当地人民能进行赢利的替代性生产。这就是"哥伦比亚计划"的由来。1999 年成型的这一计划符合帕斯特拉纳"发展计划"思路，其中包括美国的多项政治、经济和军事要求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内容。

[51] "哥伦比亚计划"预计总投资 75 亿美元，其中美国提供 13 亿美元（包括援助厄瓜多尔的4 700 万美元），40 亿由哥伦比亚政府自筹，19 亿由欧洲和一些机构提供。

第三十一章

哥伦比亚内战和拉美形势　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　巴勒斯坦问题的艰难谈判　“基地”组织暴动　克林顿在动武问题上的矛盾心态　政治体系的衰败　凯雷集团　经济实力、司法阴谋和小布什的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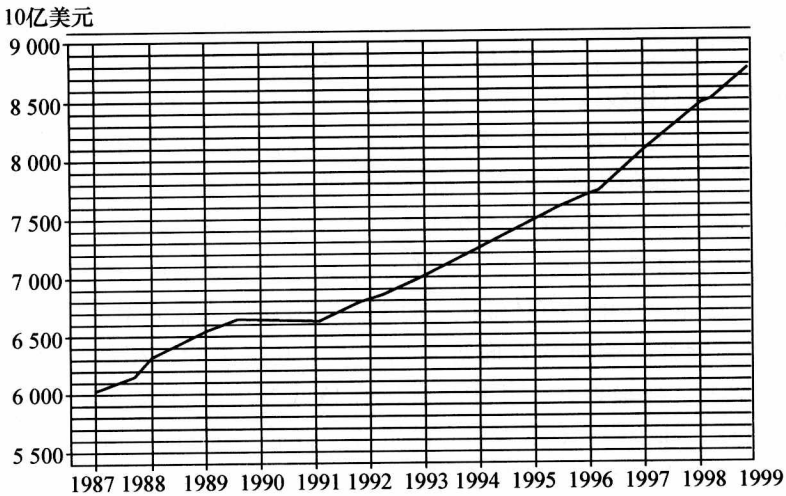
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中，哥伦比亚一直是无休止血腥内战的舞台。自1997年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人民军至少控制了1 071个市中的622个，接近国土的一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民族解放军、准军事部队与得到美国特种部队支持的政府安全部队之间冲突升级[1]，在近几年中造成70多万人逃离家园，难民总数达150万，远多于从科索沃逃离的阿尔巴尼亚族难民，是仅次于苏丹和安哥拉的第三大难民潮。来自农村的大批贫民在波哥大和其他大城市周围形成了贫困带，其中包括近100万名妇女和儿童。与此同时，哥伦比亚正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从1998年的约980亿美元降至1999年的942亿美元。1990年，该国外债为178亿美元，此后十年翻了一番多，几乎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哥伦比亚尽管受到内战的严重影响，但它仅是20世纪90年代末南美各国所经历的不同程度危机的缩影，这一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自由经济政策造成的。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查尔斯·威廉将军在参议院国际毒品控制核心小组会议中承认，在厄瓜多尔（新自由主义政策实验室）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南美其他国家，“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未给人民带来可感知的结果”。正如他所言，很多国家的经济状况比建立民主前更糟糕。他质问：“不拥有能为大多数公民带来适当生活资料和服务的经济体系的民主能存在下去吗?”[2]

这场危机肯定不是始于《华盛顿共识》的自由经济政策之实施，而是由来已久。60年代和70年代引发反叛运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在民

选政府执行自由经济政策十年后更趋恶化，外债继续成为整个拉美的问题。根据拉美经济体系常设秘书处的报告《拉美和加勒比：2001 年的经济结果将会如何?》，2000 年，拉美外债达到 7 540 亿美元的惊人数字，而且仍呈上升势头，预计 2001 年将达 8 000 亿美元。[3]另一方面，主要由于放开对经济的管制并单方面开放市场，整个 90 年代，几乎所有南美国家（阿根廷自 1992 年起，巴西自 1994 年起）的贸易出现逆差。[4]《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协议使单方面开放市场的程度加大，而这些国家未能像美国及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那样通过建立关税壁垒（配额、技术和卫生等）来限制进口。这样，南美各国越来越难以履行外债义务。此前，这些国家靠外贸顺差来支付部分外债。它们也难以满足利润、特许权使用费汇出以及资金的跨国转移。这类资金转移由于公司非国有化尤其是国营公司转而由外国资本控制而出现增长。

与拉美各国相反，走出衰退的美国经济在克林顿的八年任期中持续增长，电子产业作为主要动力使经济增长 50%。电子产业成为“新市场”经济的基础。在新信息技术中的投资保证了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并促进了与商品和服务市场毫无关系的金融市场的繁荣。这一市场拥有比国际商品贸易所需多出 20～50 倍的货币。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因此跃升至约 10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产值的 1/4。这一增长创造了 2 000 多万个就业机会[5]，失业率降至 4%（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最低），罢工次数减少，利率下调，股票市场增长了三倍多（道琼斯指数接近 12 000 点，纳斯达克指数冲



1987—1999 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资料来源：Departamento de Comércio americano。

破5 000点），中产阶级股票持有者中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仅在位于旧金山黄金地段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每天就产生64位新的百万富翁。1985—2000年间，美国出现的大富豪超过历史任何时期，仅189名富翁（比1982年高出12倍以上）就拥有约3万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6]

但财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2000年，在所有工业国家中，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率最高，公司破产数量比1995年增加70%。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7]，仅1%的人口控制着国家40%的资产。与此同时，约3 200万人，相当于全国总人口12%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88—1998年间，最贫困的20%人口，其家庭工资仅增加1%，而最富裕的20%人口，其家庭工资则增加了15%。1992年，美国大公司高级主管的工资是普通劳动者的100倍，而2000年则变成了475倍。[8]相当数量的美国人遭受贫穷和饥饿之苦，约4 600万人不享受社会保险，而八年前，这一数目为3 0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12.3%，上升至1999/2000年的15.8%，也就是说，每6个美国人中有1个人不享受医疗保险。美国农业部2000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9.7%的美国家庭没有足够的食物。在18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至少有10%的家庭经常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之苦。[9]1998年，每5名美国儿童中的1人，也就是共有1 450万名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1 130万名儿童不享受医疗保险，美国每天降生的婴儿中有1 827人不在医疗保险范围之列。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按照相对参数所确定的标准（低于全国平均收入50%的家庭被视为贫穷家庭），北欧国家中只有不足5%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而美国约有1/5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丹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比例为20%，瑞士为7.5%，德国为10%，英国为15%，葡萄牙和爱尔兰分别为16%，意大利为17%，而美国则为22%，略低于墨西哥的28%。[10]

克林顿在其八年任期中，通过紧缩开支政策，使美国2 99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1994年）变为1 240亿美元的盈余（1999年），通胀率从4.6%降至2.5%。但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在核武器体系、核武器控制协议、弹道导弹防御研究方面每年仍花费350亿美元，相当于每天支出9 600万美元。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在核武器中的投入超过了在教育、培训、就业、社会服务、农业、自然资源、普通科学和空间研究、社区和地区发展、法律实施和能源生产等各个领域开支的总和。约8%的资金被用于武器进攻和防御的转移以及7万枚核弹头指挥中心基础设施的建造和维护。克林顿更加屈从于军工集团的压力，他把五角大楼2000年的预算提

高到 2 760 亿美元，超过北约其他各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军费之和，而且，到 2005 年左右增至 2 960 亿美元，为 1986 年以来的最大增幅。[11]

克林顿政府与各国签署了 300 个贸易协定，为美国产品打开了市场。1992—2000 年，为本国创造 140 多万个新就业机会的美国产品和服务出口增长约 74%，增额近5 000 亿美元。1992 年年中，老布什批准向沙特提供 72 架 F-15 战机，总价为 90 亿美元。1995 年，沙特购买了 23 架波音 777-200 飞机、5 架波音 747-400 飞机和 4 架麦道 11F 货机。此外，它还购买了通用电气和国际飞机发动机公司的产品，总额达 70 亿美元。这些交易为美国创造了 40 万个就业机会。[12]和以往一样，佣金、犒赏、贿赂、中饱私囊、间谍活动和腐败充斥其中，并为军工集团创造了巨额利润。

克林顿也诱使巴西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总统（1995—2003 年）与雷神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 14 亿美元的合同，由这家军工企业为巴西部署“亚马逊警戒系统”，共安装 13 个雷达站、6 个移动雷达、8 个航空传感器及 800 个遥控天线和手提电脑。尽管此项目被指控存在许多不规范做法，但克林顿未能说服国会批准“快轨”，以开展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也未能如愿使亚太经合组织各国消除所有贸易壁垒，把太平洋地区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尽管美国签署了各种协议，但 2000 年其贸易逆差仍高达 3 697 亿美元，相比 1999 年的 2 650 亿美元增加了 39.5%，仅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达 838 亿美元，且仍呈扩大之势。[13]美国贸易赤字主要靠外国在美国市场的投资来弥补，这些投资受美元升值的推动，美元升值还使低通胀成为可能。这样，美国经济就变得更加脆弱。美国政府已失去支付国际债务的条件，它所作的是难以履行的远期承诺。在外国银行手中和（或）在世界市场流通的美元多达 44.2 万亿美元[14]，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 倍多，高于 39 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总额[15]，货币与财富的差额巨大。假如所有这些金额都回到美国，将导致巨大通胀，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美国不仅依赖石油进口，也需要外来投资以及它遍布世界的公司所转回的利润、利息、专利税和红利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并维持美元的价值。

在政治方面，克林顿竭力推动巴勒斯坦和平进程，巩固和扩大《奥斯陆协议》所取得的成果。包括实际主政的沙特王储阿卜杜勒·萨乌德亲王在内的许多阿拉伯人都认为《奥斯陆协议》是一纸空文，因为以色列并没有拆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任何定居点，那里共有25 万～30 万犹太人。居住在约旦河谷的 5 000 名犹太人的用水量占当地总用水量的 75%，而留给那里的 200 万巴勒斯坦人的是余下 25%的水量。[16]根据 1998 年签

署的《怀伊协议》，以色列同意再让出约旦河西岸13%的土地并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巴勒斯坦最高权力机构则承诺删除《巴勒斯坦民族宪章》中宣扬毁灭以色列的内容并打击恐怖主义。但内塔尼亚胡于12月中止了撤离时间表，原因是政府中的极端保守派不同意归还领土。以色列议会选举因此提前到1999年5月。工党领袖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以56%的选票击败利库德集团。他承诺将履行《怀伊种植园协议》，结束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但大部分以色列人反对他的这一做法。

克林顿邀请接替内塔尼亚胡的巴拉克作为以色列总理与阿拉法特一起于2000年7月11日举行了一次首脑会议，以继续推进和平协议，并就耶路撒冷地位、安全、边界和巴勒斯坦难民返回等棘手问题进行谈判。[17]巴拉克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如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别撤出95%和100%的以色列军队；拆除以色列定居点并将土地归还巴勒斯坦人；把耶路撒冷控制权交给巴勒斯坦最高权力机构；建立巴勒斯坦国；把以色列国防军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圣殿山和“哭墙”的宗教主权交还巴勒斯坦人。经克林顿斡旋，以色列还同意归还西岸91%的土地，巴勒斯坦用加沙和西岸附近的一块土地作象征性交换；巴勒斯坦国首都将设在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将获得对老城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街区以及东耶路撒冷附近地区的主权；巴勒斯坦人将行使对圣殿山的管理权而非主权。作为交换，阿拉法特将宣布中止冲突，结束暴力活动并承诺今后不再提出新要求。[18]阿拉法特愿意将谈判继续下去，但希望得到圣殿山的主权，并坚持要求巴勒斯坦难民返回，这让巴拉克感到为难。虽然，按照克林顿的说法，巴拉克显示了“非凡的勇气、目光和对这一时刻历史重要性的理解”[19]，但他甚至未能说服利库德集团把西岸和加沙的一部分归还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冲突极为复杂，因为除了领土还涉及宗教问题，宗教问题主要围绕一些被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视为圣地的地点。领土问题则包括经济和政治因素，如归还以色列所占定居点，以便让100万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克林顿甚至提议让阿拉伯人获得圣殿山的主权，以色列则享有西墙（“哭墙”）的主权，让难民返回即将成立的不拥有军队的巴勒斯坦国。阿拉法特从来没有说过不接受这些条件[20]，但他犹豫不决的行事方式类似中东的集市风格，他指望对方做出更大让步。克林顿未能做到的是让他把“同意”一词说出来。巴拉克愿意做出的妥协使他在与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的政治较量中处于下风。沙龙是1982年屠杀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2 000名巴勒斯坦人的罪魁祸首。巴拉克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失败已成定局。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约100万名犹太人从苏联迁入，

以色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移民们需要就业、土地和住房。这一形势对利库德集团有利，[21]他们反对归还戈兰高地。而拉宾已就此做出承诺，并由佩雷斯再度确认。利库德集团不认为叙利亚会构成威胁，相信以色列能轻易将其击败。其代表人物之一是俄罗斯犹太人夏兰斯基，他反对与阿拉法特达成任何协议[22]，认为在西岸和加沙定居的18万犹太殖民者是以色列一支十分可观的力量。

因为阿拉法特在戴维营谈判中对是否接受巴拉克的提议犹豫不决，反对《奥斯陆协议》的利库德集团候选人沙龙决定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挑衅。其行动可能得到巴拉克认可，或许克林顿也点了头。戴维营会晤刚以失败告终，克林顿就公开赞扬沙龙，并暗示阿拉法特应对谈判失败负责。2000年10月2日，为了激怒巴勒斯坦人，沙龙视察了耶路撒冷中心区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圣殿山，巴勒斯坦人对这一伊斯兰教第三圣地有主权要求。[23]约1 000名以色列警察和防暴部队将那里隔离。愤怒的巴勒斯坦人做出回应，他们投掷石块、玻璃瓶、椅子和其他物体。巴勒斯坦人再次起义[24]成为以色列军事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借口，《奥斯陆协议》被撕毁，暴力气氛使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重新活跃，人肉炸弹袭击行动增多。

在美国，包括在五角大楼担任文职并与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关系密切的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等犹太原教旨主义者在内的共和党“新保守派”，自1996年起就认为《奥斯陆协议》已过时。他们指责萨达姆资助人肉炸弹家庭，认为中东问题的永久解决方案是消灭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政权，用一个亲西方的议会民主政府取而代之，这是打破阿拉伯人敌视以色列的唯一途径。[25]移居以色列的原苏联异己分子夏兰斯基也支持这一观点，他反对把戈兰高地和通过1967年战争占领的其他土地归还给阿拉伯人。根据克林顿后来透露的情况，可能是考虑到在最近50年中，即20世纪下半叶，美国参与的战争均在短期、中期和长期以失败告终[26]，他不想让美国卷入一场与伊拉克的战争。因未得到巴西和委内瑞拉的支持，加上秘鲁发生的危机使该国政府摇摇欲坠，他也未对哥伦比亚实施军事干预。由于受情报局局长蒙特西诺斯丑闻[27]牵连，藤森总统在通过舞弊手段获得第三任期（2000年5月22日）五个月后，于2000年11月被议会以“道德腐败”罪名罢免。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独立研究所和平与自由中心主任伊万·伊兰（Ivan Eland）认为，克林顿政府是近年来对外干涉倾向最强烈的政府，在其执政期间，北约从一个以防御为目的、被用来与苏联抗衡的联盟变成了

进攻性联盟，开始干预其势力范围外的冲突，如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冲突。[28]然而，克林顿更热衷于以人道主义为借口采取多边性质的军事干预。其谨慎态度令权势阶层感到不快，他们与军工集团特别是“阳光地带”（得克萨斯州、密苏里州、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工业企业的利益休戚相关，这些企业专业生产技术密集型武器，并有意在实战中试验这些武器。同时，五角大楼需要清空武器库，以便承接能给他们带来酬金和红利的新订单。院外活动团体（军需工业基地工作小组和传统基金会等机构）指责克林顿继续系统破坏里根总统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的国家防务体系，认为他所设想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捍卫美国利益。推动“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新保守派”进而批评他在把武力用作对外政策工具时的矛盾心理，他们认为有必要进攻伊拉克并控制中东。

这一不满情绪很快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反映出来。竞争在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前总统老布什之子、得克萨斯州长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民主党候选人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 Jr.）之间展开。《金融时报》2000年10月25日的一篇文章称，美国政治体系已堕落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以至于美国选民能“嗅到铜臭”。该文章还指出，“选举清楚地表明，美国民主可被出售给出价最高者”[29]。事实上，候选人的才能、思想和背景已变得无足轻重，选民在推选候选人的初次选举中投出最初几张选票前，美国的金融精英已就提名人选进行了一次私下投票。美国公共廉政中心的查尔斯·刘易斯（Charles Lewis）认为：

> 美国总统政治的肮脏秘密是，国家最富裕的利益集团能在选举前一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将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自1976年以来的每次选举都毫无例外，在选举前一年年底募集到资金最多并有资格获得联邦配套资金的候选人将被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30]

2000年，曾指控尼克松的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lbald Cox）指出，当今选举运动中滥用资金的情况比水门时代要“严重得多”[31]，这是因为利益团体有了更多的钱，接受资金者满足捐助者意愿的压力变得更大。尽管政治人物与赞助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但它不断强化，并达到了空前程度。当一位新总统入主白宫后，权势显赫的前任政府政治人物就会变成商人或恢复商人身份，担任公司、压力集团或律师事务所的高管，他们能在那里拿到约50万美元的年薪。另一批商人则开始在新政府各层次中担任各种职务。美国已不存在传

统的公共人物，只有把政府当成大买卖的自私者。华盛顿变成了一个前往那里或在那里的人们从政府业务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场所，金钱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东西。阿历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于1840年发表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描述了这一趋势。他在书中写道，在贵族政权中，当权者极少会有腐败行为，追求金钱的欲望不大。而在民主国家则截然相反，譬如在美国，领导人并不富裕，因而他们就想敛财。[32]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治人物得到的金钱越多，希望增加自己财富的愿望就越强烈，腐败近乎制度化。《纽约客》记者伊丽莎白·德鲁（Elizabeth Drew）写道：

> 寻求和获得金钱已成为最主要的活动，其后果是有害的。金钱文化在华盛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盛行。现在，金钱作为主导目标已可与权力媲美，甚至超过权力。这会影响所涉及的问题及其结果，它已改变了华盛顿的工作模式。它改变了政治，颠覆了价值。（……）私人利益通过长期使用金钱去努力影响立法和行政结果。[33]

1999年，德鲁写道，在过去的25年中，华盛顿政治人物的品行呈下降趋势，而且正在加速下降。[34]与此同时，作为中右保守组织、势力集中在美国东部的共和党已变成了一个极右组织，它更深地扎根于南边和西部各州。这一趋势始于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议员发动的运动，并随着1971年里根的崛起而变得明显。无明确政治立场和未来视野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小布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作为前总统乔治·布什的儿子——小布什的唯一资本，他居住在奥斯丁，缺乏联邦政府工作经历。1999年12月，他为了获得提名，史无前例地花费了6 700万美元，远远多于竞争对手。[35]在2000年的4个月中，他获得的资金是共和党所有竞争对手募集到资金的十倍，超过克林顿或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共和党候选人）在1995—1996年整个选举过程中为各自竞选运动所筹集的资金。[36]克林顿在1995—1996年的七个月中仅筹到2 600万美元，而小布什在2000年的竞选运动中每天就能获得惊人的310 748美元，相当于每小时12 947美元。[37]他获得提名是基于强大的捐款人网络及其家族的名声。[38]根据相关政治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在2000年选举中，凯雷集团向参选者提供的约42.7万美元中，80%给了共和党。在五角大楼承包商和供货商提供的19万美元资金中，小布什获得的金额超过12.9万美元，比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所得高出四倍。[39]

除了拥有大量资金，小布什在2000年11月7日总统选举中获胜还借助了一起由凯雷集团高级顾问、老布什政府国务卿贝克所策划的司法阴谋。尽管最高法院对小布什胜出的合法性存有疑问，并存在他在与戈尔竞争中有舞弊行为的指控，但仍以5票对4票判定他获胜。大法官约翰·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在解释这一剥夺美国人民参与总统选举的宪法权利[40]行为时称，一般来说，对宪法原则的理解“不能过于咬文嚼字”，因为“假如不允许在整体中玩一个小游戏”，那么政府机器就将无法运作。他明确承认：

> 尽管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凿地知道今年总统选举获胜者的身份，但失败者的身份完全清楚，那就是全国人民对法官作为法律准则公正守护者的信赖。[41]

《财富》杂志记者丹·布赖奥迪（Dan Briody）认为，凯雷集团对小布什获胜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最高法院占据压倒性多数的共和党人按自己的意识形态思维把小布什确定为胜利者。[42]这样，被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称为“连环杀手”的小布什就接受了实施“新美国世纪计划”的使命。[43]2001年1月20日，他凭借比对手多不到1%的选票出任美国总统。他得到的民众选票比对手戈尔少50万张。[44]作为少数派总统，相当一部分民众不承认其合法性。

布什家族在军工集团的阴暗过道建立了一个与冷战期间壮大的情报和国家安全机构相结合的权力基础。家族关系和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所称的“裙带资本主义”成为其经济支柱。“裙带资本主义”强调对金融界的补偿和生意圈本能的政治忠诚，在很多情况下，其代表是中央情报局所资助的公司。[45]老布什从美国总统职位卸任后，成为强大的凯雷集团的顾问。该集团总部设在华盛顿，不只是前国务卿贝克、前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卡路西[46]及前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理查德·达曼（Richard G. Darman）（1989—1993年）参与其中，沙特王室多位成员也与该集团有关，包括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富裕的本·拉登家族和沙特本·拉登集团。它获得了在沙特建设美军基地和海湾战争后重建科威特的合同。

1987年由曾任卡特总统内政顾问的戴维·鲁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发起成立的凯雷集团汇集了同一批人——老布什、贝克、卡路西和达曼。他们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中为沙特与柏克德公司签订“空中预警和

控制系统”侦察机购买合同发挥了作用，并促使沙特承诺通过实施美国国会所不允许的“隐蔽行动”资助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的反共游击队。此外，凯雷集团还罗致各国政府前首脑，如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菲律宾前总统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泰国前总理阿南·班雅拉春（Anand Panyarachun）、韩国前总理朴泰俊（Park Tae Joon）以及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鲍威尔、德意志银行前总裁卡尔·波尔（Karl Otto Pöhl）和艾丽斯·奥尔布赖特（Alice Albright），后者是美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并在克林顿第二任期担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大使的女儿。该集团还启用了一批驻外大使以及联邦通信委员会、证券市场委员会等政府监管机构的主席和证券交易所等机构的经理。1991 年，它为沙特亲王阿尔瓦利德·塔拉尔（Al-Waalid bin Talal）购进花旗集团约 6 亿美元股票铺平了道路，这一交易使阿尔瓦利德亲王成为该集团最大的个人股东，并成为 2001 年世界最富有的 6 个人之一。据《财富》杂志公布的信息，其资产总值达 200 亿美元。[47]凯雷集团在以鼓励到沙特投资为目的的“经济补偿计划”中向萨乌德国王家族提供了帮助。

凯雷集团的政治关系非常重要，具有很高价值，它能使经营提前产生结果，让公司获得五角大楼的合同，并能使其涉足政府和白宫的关键部门，因而是一笔十分可观的经济资本。

凯雷集团作为一家投资公司，专门从事低价买进股票业务，当这些公司因从政府手中得到新业务导致股价上升时再将其卖出。它已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资产收购和房地产领域建立高风险和高盈利基金，并控制了约 165 家企业，其总资产达 180 亿美元。它在 14 个国家拥有 300 个投资经纪人，7 万名雇员。它们当中有为美国军队生产装备、机车和武器的公司，如生产导弹的联合防务公司，也有能源、通信、媒体和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凯雷集团聘用名人具有促进投资和为其所控制的防务公司争取合同铺平道路的双重意图。

1990 年，凯雷公司收购了 BDM 国际公司，国防部所聘用的维纳尔公司（Vinnell）为其子公司。维纳尔公司每年从国防部获得 5 000 万美元，其任务是训练沙特国民卫队的 75 000 名士兵。1992 年，凯雷公司购入生产 B-2 轰炸机和运输机元件的沃特飞机工业公司（Vought Aircraft）、通用动力公司的电子部和菲利普斯公司的军事电子部。这些公司从 1975 年起招募外国雇佣兵，用于训练沙特士兵，教他们使用从美国购买的武器装备去保卫油田。这样，五角大楼就避开了国会在越战失败后通过的对美国军队干

预别国的限制。维纳尔公司招募的外国雇佣兵卷入了推翻格林纳达总理毕晓普的未遂政变。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央情报局从事情报活动的一个掩护。90年代期间，除了在沙特的5 000名军事人员，它连同布拉多克（Braddock）、邓恩（Dunn）和麦克唐纳（McDonald）公司在该国还拥有约2 000名雇员。[48]

除维纳尔等公司外，凯雷集团于1997年控制了生产战车的大企业联合防务公司（United Defense），并于2000年接手了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Northrop Grumman）的航空元件部。[49]老布什卸去总统职务后，曾来到沙特私下与阿卜杜勒·萨乌德亲王和本·拉登集团董事会晤，其中包括在凯雷合伙人基金中投资200万美元的本·拉登的哥哥巴克尔·本·拉登（Bakr bin-Ladin）。该基金包括联合防务公司及其他一些防务和航空航天领域的公司。老布什在替凯雷公司招徕投资者而作的每一场演讲中收取8万～10万美元的酬金，其儿子小布什1990年被任命为凯雷公司子公司凯特航空餐饮公司（Caterair）理事会成员，他在1992年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后辞去该职。小布什当选州长不久就提名数人担任州教师养老金基金（得克萨斯教师退休体系）董事，该基金决定把1亿美元的公共款项投资于凯雷集团。[50]

小布什和其家族其他成员一样，与得克萨斯石油大亨们关系密切。他从经营矿产开发权起家，后经营矿产及矿区土地使用权，并在勘探设备中投资。1978年前后，他用17 000美元的教育基金成立了自己的天然气和石油企业——布什能源公司。该企业分为两家公司（布什79有限公司和布什80有限公司），其中一个股东是詹姆斯·巴思（James Bath）。这位得克萨斯企业家是本·拉登之父萨里姆·本·拉登的利益代表，与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70年代，他以8万美元入股。[51]公司在油价下跌时一度处境艰难。小布什试图恢复自己公司的活力，他先将公司改名，将其一分为二，然后着手与其他公司融资。1983年，小布什成为7色石油公司总经理。这家由威廉·德威特（William DeWitt）和默瑟·雷诺兹（Mercer Reynolds）经营的小公司为避免布什公司破产而将其收购。1986年，哈肯能源公司（Harken Energy Corporation）收购了亏损40万美元的7色石油公司。在这笔交易中，小布什及其合伙人得到了价值200多万美元的股票，他成为哈肯公司的顾问，为此，公司又给了他60万美元的股票，并向他支付42 000～120 000美元不等的年薪。

1987年，哈肯公司出现资金困难。小布什与其同事促使小石城的一家投资银行老板、斯蒂芬斯公司董事杰克逊·斯蒂芬斯（Jackson Stephens）

让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向哈肯公司提供 2 000 万美元的资金，以换取该公司的股份。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沙特大亨阿卜杜勒·巴赫什（Abdullah Bakhsh）成了最大投资者和哈肯公司董事会成员，他代表沙特银行家哈立德·马赫福兹（Khaled bin-Mahfouz）的利益。此人被怀疑曾向与本·拉登有关系的协会捐款。他拥有国际信贷商业银行 20%的股份，并与斯蒂芬斯一起卷入该银行的丑闻。[52]与布什家族关系密切的马赫福兹家族是阿塞拜疆油田的最大投资者之一，而哈肯公司则得到了在巴林开采石油的许可。1988 年买下橄榄球队得克萨斯游骑队的小布什却于 1990 年 6 月 22 日以 848 560 美元的价格将其在哈肯公司所拥有股份的 2/3 卖出，所获净利润为 200%。一周后，该公司宣布亏损2 320万美元，其股价在此后六个月中下跌 60%。1990 年 8 月 2 日，萨达姆军队入侵科威特。

小布什与安然等多家能源和军火企业有瓜葛。副总统切尼也不例外，他在卸去老布什政府国防部长一职后，成为哈里伯顿公司（石油、国防和建筑）总裁，并一直任职直至总统选举。其妻子琳恩·切尼（Lynn Cheney）为洛克西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副总裁兼董事，该公司与哈利伯顿公司一样，也受益于五角大楼的巨额合同。除了这一搭档（小布什和切尼），进入政府的还有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佐利克、艾布拉姆·舒尔基（Abram Shulsky）、珀尔、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以及作家卡根和克里斯托尔等“新美国世纪计划”团伙所有成员、五角大楼的文职人员、犹太教和基督教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此外还有与石油工业企业有瓜葛[53]而政治上与极右的共和党立场一致，且与以色列利库德集团有关系的权势交易者。[54]新任国务卿鲍威尔曾在凯雷集团供职，他还是通用动力公司的股东；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是吉利德科学公司（生物技术）董事；国防部长助理沃尔福威茨此前是休斯（Hughes）电子集团纳恩-沃尔福威茨公司（Nunn-Wolfowitz）“特别行动”双总裁之一；国防部副部长达夫·扎赫姆（Dov Zakheim）则是系统规划公司（防务领域的咨询公司）副总裁；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是安然公司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上任前是雪佛龙集团理事会成员。

在组建这一由共和党极右派和商界精英集结的政府班子后，小布什确定了政府使命：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新美国世纪计划”智库创始人切尼（副总统）、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助理国防部长）、博尔顿（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署副署长）、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和刘易斯·利比（切尼办公室主任）已在选举前（2000 年 9 月）拟订

了一份78页的秘密文件，文件标题为“重建美国防务：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文件指出，“美国的对手将继续反对‘美式和平’的建立”。在“禁飞区行动”实施八年后，“只要萨达姆仍掌权”，就没有理由大幅度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空中存在。“从长远看，伊朗将和伊拉克一样，对美国在海湾的利益构成巨大威胁”。注明信息来源为中央情报局的这份文件还指出，“朝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等深深仇视美国的国家‘已经或正在研制弹道导弹’，它们将威胁美国在海外的军队和美国的盟国”[55]。

组成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派”的明确意图是实施一项“改变政权”政策，该政策把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和大幅增加美国在波斯湾的兵力以巩固对该地区的军事控制作为起点。2000年5月19日，在一个由近东政策研究所组织的论坛中，曾作为小布什选举运动协调人的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把美国“可能”动摇萨达姆在其本国地位的意图向前推进了一步——“慢慢地蚕食其领土”。他指出：

> 我们已经开始在（伊拉克）北部这样做，相信我们能在南部采取同样做法。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将动用（美国的）空中力量，它必须更多地参与其中。[56]

巩固美国对波斯湾和里海石油产地及其领空的控制对实施《重建美国防务：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显得十分必要，这样就能阻止其他敌对势力的出现，“以与美国原则和利益一致”的形式构筑国际秩序和安全。这一研究强调，“在新世纪的挑战将是维护和增强这一‘美式和平’”。它建议国防部：

> 采取更具进攻性的行动去试验新技术和作战方针，将新兴革命服务于军事。信息技术在现代军事体系中越来越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57]

在《重建美国防务：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这份带有强烈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征的文件中，“新保守派”勾勒出小布什将实施的国际政策思路，它当然包括终结“与伊拉克尚未解决的冲突”，进一步增强美国军事实力，以便在“多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58]“新保守派”不管以“民主帝国主义者”还是以“肯定性民族主义

者”面目出现，其目标是一致的：建立全球性独裁，为多数属于美国的跨国公司服务并使其获利。

这一意图很快就表露出来。2001 年 1 月，当选副总统的切尼向曾在克林顿政府中任国防部长的共和党人威廉·科恩索要了一份关于伊拉克和（美国应对萨达姆的）各种选择方案的完整信息。[59]小布什政府的财长保罗·奥尼尔（Paul H. O' Neill）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 分钟》节目中向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透露，2001 年 1 月 30 日，也就是新政府执政 10 天后，“中东政策要点”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60]国家安全助理赖斯声称，伊拉克正在使该地区变得不稳定，中央情报局所掌握照片显示的或许是一个生产用来制造武器的化学或生物材料的工厂。推翻萨达姆政权是中东发生变革的关键。[61]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推测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称已获得能证明萨达姆资助在西岸和加沙的人肉炸弹家庭的情报。在两天后进行的第二次会议中，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主张推翻萨达姆政权。他声称，这一行动能够表明，美国为改变中东将不惜一切代价。他认为，推翻萨达姆政权作为“美国新的、单边决定的演示模式”将会是有用的，能“说服”其他国家不要试图成为美国的“不对称挑战者”。[62]他还表示，“制裁很好，但我们真正要思考的是萨达姆之后的事情”。对油田和伊拉克经济重建项目的憧憬令他兴奋不已。他指出：

> 你们可以想象没有了萨达姆而出现一个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政权后，那里会是什么样子。它将会使该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任何事情发生变化，将会体现美国政策的本质。[63]

石油工业领域顾问法拉赫·阿尔吉布里（Falah Aljibury）向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透露，小布什上台不久，就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和中东与“大石油企业董事长们”及五角大楼的“务实派”开会，讨论伊拉克石油私有化计划。[64]事实上，在莱斯大学詹姆斯·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支持下，爱德华·莫尔斯（Edward L. Morse）和埃米·贾菲（Amy Meyers Jaffe）于 2001 年拟订了题为《战略能源政策：21 世纪的挑战》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伊拉克对中东石油运输至关重要，因为它所处位置蕴藏的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二，美国需要这些石油来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它不能允许萨达姆因为军事安全对其进行开采。出于能源安全考虑，美国需要变更伊拉克政权。[65]该研究报告称，“伊拉克已成为一个

关键的‘无拘束’产油国，这使美国政府处境艰难”[66]。报告认为，萨达姆政府对美国、本地区和全世界以及中东的石油运输来说是一个“制造不稳定的势力”。萨达姆可能会以石油为武器威胁和操纵国际市场。假如他采取这一做法，将会增加其个人权力，他作为“泛阿拉伯领袖”的形象将得到加强。该报告呼吁，“美国应该调整对伊拉克政策，包括军事、能源、经济和政治（外交）评估”，因为，“假如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限制、武器管制和反对他的同盟的支援不够有力，萨达姆可能在该地区对美国盟友构成巨大威胁”[67]。

【注解】

[1] Human Rights Watch. Colombia—The Ties that Bind: Colombia and Military-Paramilitary Links. February 2000. Vol. 12, nº 1 (B).

[2] Statement of General Charles E. Wilhelm, commander-in-chief, U. S. Southern Command, Before the Senate Caucus on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March 23, 2000.

[3] Secrtaría Permannente del SELA (Sistema Ecomnómico Latinoamericano). “Informe de Conyuntu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ómo Cierra la Economía en 2001”.

[4] 1995—2001 年的 6 年中，仅美国一国对几乎所有南美国家的贸易顺差总额就达 550 亿美元。

[5] Clinton, 2004, pp. 880 e 911.

[6] Lewis &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2000, p. 10.

[7] U. S. Census Bureau. http://www. census. gov/prod/2003pubs/p60-222. pdf.

[8] US Human Rights Record in 2000 Released by the February 27, 2001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http://www3. itu. int/MISSIONS/China/humanrights/usrec2000e. htm.

[9] Ibid.

[10] *The Economist*, 5/3/2005, p. 104.

[11] 1980—1985 年间，美国的军费开支从 1 439 亿美元增加到 2 947 亿美元。里根政府军备达到最高点的 1986 年，军费开支为 2 730 亿美元，以定值美元计算，比 1980 年增长 48%。Trubowitz, 1998, p. 225.

[12] Baer, 2003, p. 155.

[13] Fonte: U. 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 Data Dissemination Branch, Washington D. C., 20233.

[14] 45 万亿美元是财政部预算分析师估计的结果。该项研究是财部部长保罗·奥尼尔 2002 年要求进行的。研究小组负责人为当时的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助理、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盖蒂希·戈卡莱（Jagadeesh Gokhale）和时任财政部经济政策局局长助理的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2003 年，奥尼尔被小布什免职后，研究项目受到审查。但经济学家戈卡莱和斯迈特斯公布了调查报告。白宫和财政部则声称从来没有听说

过该项研究。Vide Gokhale, Jagadeesh & Smetters, 2003, p. 2.

[15] Littlefield, Nathan. "State of the Union: The US $45 Trillion Problem". *The Atlantic Monthly*, January/February 2004. http://www. theatlantic. com/doc/prem/200401/littlefield.

[16] Baer, 2003, p. 185.

[17] Clinton, 2004, pp. 911-916.

[18] Id., ibid., p. 915.

[19] Id., ibid., pp. 815-816.

[20] Id., ibid., p. 944.

[21] Id., ibid., p. 883.

[22] Sharansky, 2004, pp. 146-161.

[23] 亚伯拉罕将自己的长子埋葬于圆顶下祭祀真主，以表明自己的信仰。穆斯林认为亚伯拉罕的长子伊斯迈尔，是萨拉的奴仆阿加尔之子，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无法生子。因此，阿拉伯都是伊斯迈尔的后裔。而犹太人则认为，根据《旧约》的记载，那位长子是伊萨克。圆顶所在的位置有可能显现了天使让亚伯拉罕用来祭祀的羔羊。犹太教经学和《旧约》中记载的同一个亚伯拉罕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的宗祖。阿萨克清真寺大约在 690—691 年哈里发阿卜杜勒·马里克（Abd al-Malik，646—705）时代建造。

[24] 以"阿萨克起义"闻名。第一次起义即"石头起义"发生于 1987 年 12 月。

[25] Kepel, 2004, p. 27.

[26] Ekaizer, Ernesto (Enviado Especial—Davos). "Clinton asegura que el presidente Bush no sabe lo que quiere. El ex-mandatario de Estados Unidos considera a su sucesor una figura errática"（克林顿保证，布什总统不知道想要什么。美国前总统认为其继任者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in *El País Internacional*, 28/1/2003.

[27] 藤森总统被指控侵犯人权、贪污和迫害新闻记者。蒙特西诺斯的父亲是一位共产党人，他给儿子起名瓦尔多米洛·伊利奇（Vladimiro Illich）是为了纪念列宁。蒙特西诺斯在胡安·阿尔瓦拉多将军（Juan Velasco Alvarado）（1968—1974 年）执政期间曾因向中央情报局出售军事机密而遭关押，并作为叛徒被驱逐出军队。他曾卷入贩毒和走私。1996 年，被称为"梵蒂冈"的毒品贩子德梅特里奥·查维斯（Demetrio *Chávez*）向法官声称，他每月向蒙特西诺斯交纳 5 万美元贿赂金，以便能在丛林中从事交易活动。据在利马披露的信息，蒙特西诺斯的秘密账户中月收入可达 25 万美元。

[28] Eland, 2004, p. 18.

[29] Apud Government Document—US Human Rights Record in 2000. Released by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February 27, 2001. http://www3. itu. int/MISSIONS/ China/humanrights/usrec2000e. htm.

[30] Lewis &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2000, p. 3.

[31] Id., ibid., p. 5.

[32] Tocqueville, 1968, pp. 119-130.

[33] Drew，2000，p. 61.

[34] Id.，ibid.，p. 19.

[35] Id.，ibid.，pp. 275-276.

[36] Lewis &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2000，p. 8.

[37] Id.，ibid.，p. 8.

[38] Phillips，2004，p. 16.

[39] Briody，2003，pp. 91-92.

[40] Philips，2004，p. 97. 美国总统选举为间接选举。选民投票给一个选举人团。该选举人团由538位代表组成，由他们选出共和国总统。2000年11月7日，1亿多选民前往选举点给代表们投票。随后，电视网公布了相互矛盾的消息。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都宣称自己获胜，但直到11月12日，美国民众还不清楚谁是未来的美国总统。在共和党候选人的弟弟杰布·布什担任州长的佛罗里达州被怀疑有舞弊行为。该州法律规定，当候选人票数相差低于0.5%时需重新计票。这样，民主党于11月13日根据该法律要求在佛罗里达州包括棕榈滩郡在内的5个郡重新人工计票。棕榈滩郡选举委员会宣布将对462 657张选票进行重新统计。这一决定是在对1%的选票进行重新统计后做出的。1%选票重新统计结果使戈尔增加了33张选票，乔治·W·布什多获了14张选票。如果这一比例扩大到该郡的全部选票，民主党候选人将获胜。地方当局得出的结论是，这可能改变选举结果。共和党请求联邦司法法院中止重新计票。这样，小布什就当上了美国总统。

[41] “Stevens Dissents from Majority Decision，Says Confidence in Judges Will Be Undermined”. December 12，2000，australianpolitics. com—http://www. americanpolitics. info/news/2000/00-12-12. shtml.

[42] Daalder & Lindsay，2003，p. 50.

[43] 2003年，在阿斯图里亚王子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苏姗·桑塔格就这样称呼小布什：“我讽刺性地称他为‘连环杀手’并非因为入侵伊拉克，我指的是他在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的所作所为。在得州被处决的人列各州之首，小布什任期内有300多人被处死。执行死刑列第二位的是他的弟弟杰布·布什执政的佛罗里达州。”*O Globo*，Rio de Janeiro，1/6/2003.

[44] Woodward，2004，p. 28.

[45] Phillips，2004，pp. 9-10，49，123e 129.

[46] 卡路西曾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里根政府的最后一位国防部长。

[47] Baer，2003，p. 48.

[48] Briody，2003，pp. 62-67.

[49] Unger，2004，p. 187.

[50] Baer，2003，p. 51.

[51] Brisard & Dasquié，2001，p. 298.

[52] Id.，ibid.，pp. 182e 217.

[53] Vide Phillips，2004，pp. 150-165.

[54] Todd, 2002, p. 136.

[55] "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A Report of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September 2000.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RebuildingAmericasDefenses.pdf.

[56] Lancaster, John. "In Saddam's Future, a Harder U.S. Line". *The Washington Post*, 3/6/2000.

[57] "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A Report of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September 2000.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RebuildingAmericasDefenses.pdf.

[58] Ibid.

[59] Woodward, 2002, p. 9.

[60] Allen, Mike. "O'Neill: Plan to Hit Iraq Began Pre-9/11", *Washington Post*, 11/1/2004, p. A13. Stevenson, Richard W. "Bush Sought to Oust Hussein From Start, Ex-Official Says", *The New York Time*, 12/1/2004.

[61] Suskind, 2004, pp. 72-74.

[62] Id., ibid., pp. 86-96.

[63] Id., ibid., pp. 72-75, 82-87, 96, 129.

[64] Palast, Greg. "Secret US plans for Iraq's oil", BBC News—World Edition—Last Updated: Thursday, 17 March, 2005, 15:41 GMT. http://news.bbc.co.uk/2/hi/programmes/newsnight/4354269.stm.

[65] Strategic Energy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Sponsored by the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and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dward L. Morse, Chair Amy Myers Jaffe, Project Director. http://www.informationclearinghouse.info/article3535.htm.

[66] Suskind, 2004, p. 13.

[67] Ibid., p. 46.

第三十二章

“9·11”恐怖袭击　反恐战争“可用作宣传的理由”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基地”组织与本·拉登　“波金卡计划”和“9·11”恐怖袭击　伊拉克成为“新保守派”议事日程　入侵阿富汗　《爱国法案》　小布什预知本·拉登对美国的袭击　“9·11”恐怖袭击的可预见性

1999年，作为美国21世纪安全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民主党）和沃伦·拉德曼（Warren Rudman）（共和党）表示，美国应该在至少未来25年中继续成为世界最主要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并保持在全球的军事主导地位。他们认为，尽管美国拥有军事优势，但以美国及其盟国利益为目标的不对称战略将给美国带来真正的麻烦。一些能给多数人带来好处的技术具有消除差别的作用，这将使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一些敌对小组织和狂热分子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造成巨大危害。该委员会的报告预计，随着政治、军事和文化优势得以继续保持并不断扩展，美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在被接受的同时受到憎恨。报告认为，“一些国家、个体恐怖主义者和其他敌对组织将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破坏性武器，一些人会使用这些武器，美国人或许会死在自己土地上，也许会出现大量死亡”[1]。

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预言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验证。2001年9月11日，小布什上台9个月后，不拥有其他武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从美国不同机场起飞的客机，并将它们作为导弹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楼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当时正在给埃玛·布克小学的学生们讲课的小布什总统听到这一消息时无动于衷，好像一点都不感到吃惊，他做出的第一反应是：“事件应该是飞行员失误造成的。”[2]这一导致近3 000人死亡的残酷事件改变了国际形势，使其变得阴云密布。小布什离开学校后登上了“空军一

号”，但却不知道该飞往何处。紧接着，他宣布美国遭到了攻击。他在宣战之时并不清楚要打击的目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场“没有战场或滩头堡”的善与恶之间的战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始终以“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为标题报道这一事件。

尽管在国际战争规范中并不存在，但针对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多重袭击，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战争行为。但它不同于罗斯福利用日本从“后门”把美国带入欧洲战争的“珍珠港事件”，这一袭击行动不是来自一个民族国家，而是由沙特和其他国家的阿拉伯人所实施的。他们属于一个广泛的跨国网络，活动范围极大，该网络把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多个伊斯兰激进组织联系在一起，因此是一个分散的敌人。他们利用恐怖主义手段，不惜采取自杀式手法，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没有可用来袭击美国的导弹或其他武器。美国政府似乎预计到并期待这一事件的发生，于是很快就查明了19名劫机者的身份，其中15名为沙特人。美国指责“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是行动主谋。美国作家埃利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认为，小布什政府把“一个很小的犯罪集团变成了一个大规模敌人”，其目的是为军事干预找到理由。

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针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事实上并不是一起偶然事件，也并非意想不到，而是一个合宜的事件。与希特勒一样，小布什需要“可用作宣传的理由”使自己的政权变得合理，他需要发动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新美国世纪计划”：

> 以便大幅提高防务预算；（……）挑战敌视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的政权；（……）在海外推进政治和经济自由；（……）在维护和扩展一个对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富裕和我们的原则的友善国际秩序中，接受美国发挥独特作用的责任。[3]

小布什在11日晚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发生了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4]他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这是他实施“重建美国防务：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计划所需的借口。正因为如此，他极力把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所遭受的多重袭击说成“善与恶之间的重大战斗中的一个战争行动”[5]。

小布什并非由于“9·11”袭击才向恐怖主义宣战，他是该恐怖事件的唯一受益者，因为，在备受质疑的选举后，这一事件使他的总统地位变得合法，并使他获得了更大权力。相反，对恐怖主义发动战争以建立金融

资本的“全方位主导”，即超帝国主义独裁的意图，促使美国政府创造条件引发了“9·11”恐怖袭击。必须创造一个全球性战争状态，一场针对一个抽象敌人的无休止和不确定战争。紧随袭击世贸中心双子塔和五角大楼恐怖事件，发生了通过信件和其他途径把炭疽作为细菌武器散发的事件，其来源一直没有查清。根据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观点[6]，美国需要制造更多恐慌，让全世界舆论感到震惊，使自己成为阿拉伯人的对立面，以便把伊斯兰教树为新的敌人。亨廷顿在谈到穆斯林的好战和暴力倾向时指出，他们总是在世界各地与其他文明的民族保持对立。[7]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东正教与西方宗教之间往往是一种暴力关系。与其相比，自由民主与马列主义之间的冲突只能被视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表面的历史现象。[8]他认为，为了保存西方文明，就必须采取“抑制伊斯兰和邪恶国家发展常规及非常规军事力量”等手段。[9]

小布什向恐怖主义宣战，事实上被用作打击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理由。打击这些国家的目的是保证对所有石油产地的控制，封锁各国特别是中国获得那里的石油。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防务计划指南”理论家和作为“新美国世纪计划”创始人之一的沃尔福威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意图。他的主张是，仅仅抓获和关押塔利班成员并不够，必须清除敌人的支持系统，“消灭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他把伊拉克设定为首要目标，理由是，对它采取行动要比对阿富汗更容易。[10]打击恐怖主义战争的地图是与天然气和石油地图一样的中东和中亚地图，这不是纯粹的巧合。然而，根据保守的传统基金会智库的资料，1995—2000年，发生恐怖袭击数量最多的地区并非中东，而是拉美地区。其间，拉美发生了729起恐怖事件（平均每年122起），欧洲608起，美国仅为15起。2000年，针对美国的恐怖行动为创纪录的193起（1999年为121起），其中86%发生在拉美，4.5%在亚洲，3.5%在非洲，中东地区仅占1%。拉美的恐怖事件只局限于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美国石油公司和它的军队几乎彻底占领了这两个国家。[11]各地发生的大部分袭击为炸弹爆炸(90%)，企业成为主要目标，占87%，只有3%的行动针对军事机构和设施。[12]

小布什对恐怖主义宣战实际上是向那些不接受其霸权的中东国家宣战。这确实意味着“文明的冲突”，因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排斥资本主义文明。本·拉登在“9·11”恐怖袭击后通过半岛电视台[13]发表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指出，美国领导整个西方世界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是对伊斯兰世界进行的“一场彻头彻尾的侮辱性十字军东征”[14]。他否认

“圣战者”参与针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因为，想象那些“为了让真主满意，让真主宗教的捍卫者满意”而于20年前放弃工作、大学、家庭、亲戚并离开自己国家的人们去杀害无辜者，是“非理性的”[15]。但他为19名学生的恐怖行动而欢呼，这一行动使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受到重创，打击了美国经济，使纽约和其他资本市场损失了10 000亿美元。他表示，这说明美国依仗军事实力向弱国推行“不忠和侮辱”过程中所使用的“这一令人憎恶的高利贷国际经济”会轻易崩溃。[16]

在反对美国利益过程中，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与冷战时期共产主义一样甚至更大的威胁。“新保守派”极力将其塑造成最后一个敌人——“邪恶帝国”，即苏联的形象，于是就把“基地”组织设计成一个由本·拉登在阿富汗山洞中领导的邪恶恐怖链。英国广播公司电视二台播出的《梦魇般的权力：恐惧政策的上升》节目表明，公众了解到的大部分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危险不过是“新保守派”夸大和扭曲的幻想，它通过全世界各国政府、安全机构和新闻媒体得到自由传播：

> 政治家们获得的想象使他们在一个幻想破灭的年代重新获得了权力和权威。那些患有黑夜恐惧症者变成了最有权势者。恐惧政策上升始于1949年，来自两个人，他们的激进思想启发了“9·11”袭击，并影响了控制华盛顿的“新保守派”运动。这两个人都认为，当代宽容的自由将打破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的束缚。他们所启发的两个运动，以不同方式为出发点，去拯救各自社会，使其免于腐朽。但是，在一个对政治家们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年代，“新保守派”又求助于恐惧是为了推行其理念，建立一个由苏联运作的隐蔽邪恶网络，只有他们自己才看得见这一网络。穆斯林所面临的现实是，广大民众不愿追随他们的梦想。于是，他们只能求助于恐怖，迫使人们“看到真相”。[17]

“9·11”恐怖袭击使“新保守派”得以把小布什当作一个提线木偶加以操纵，并重启冷战时期所采用的策略。当时，苏联被视为有意破坏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社会和民主并奴役其人民的“邪恶帝国”。似乎“基地”组织和本·拉登是仅有的两个伊斯兰恐怖主义之源，是新的威胁，即恐怖主义，它被用来营造恐怖气氛，激发民族主义。随着炭疽信件在参议院等多个地方神秘出现，恐惧气氛进一步扩大和加重。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为了给镇压和发动战争寻找理由，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伊拉克。这样，小布什政府就能大幅度提高军费；违反国际法准则，尤其是国家主权概念，打击

所谓敌视美国利益和价值的政权；在别国推行它所理解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使美国在扩展和保持一个“对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富裕和我们的原则”友善的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18]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助理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有意利用“9·11”悲剧来推进自小布什执政之初就试图实施的入侵伊拉克计划。[19]小布什亲自出面，让美国政府安全、基础设施保护和反恐协调员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A. Clarke）从某种程度上把伊拉克与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事件联系起来。[20]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K. Clark）将军透露，9月11日，他接到“白宫内部人员”电话，让他把该恐怖袭击与萨达姆联系在一起，以便为打击伊拉克找到借口。克拉克将军所透露的情况证实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戴维·马丁（David Martin）2002年9月4日在该电视台《晚间新闻》中所报道的内容。他说，2001年9月11日，美国航空公司飞机撞上五角大楼5小时后，拉姆斯菲尔德就让他的助手们考虑如何让这些恐怖袭击与萨达姆联系起来，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五角大楼官员所做的笔记记录了拉姆斯菲尔德的话。他要求“尽快获得最佳信息”，以便“判定是否可以同时打击萨达姆和本·拉登”。拉姆斯菲尔德还表示，“应大规模出击（……），将其彻底扫清，不管是否有关联”[21]。

在“9·11”恐怖袭击后召开的会议中，多年来一直批评老布什未能在1991年推翻萨达姆政权[22]的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不局限于打击‘基地’组织，而将矛头指向伊拉克?”他表示，可以利用恐怖袭击提供的机会“去立即追杀萨达姆”[23]。2001年11月，他命令中央司令部的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将军制定和推进“1003行动计划”，设计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方案。[24]他认为，那里存在阿富汗所不拥有的“合乎情理的目标”，可作为轰炸对象。[25]

沃尔福威茨也企图让伊拉克成为反恐战争第一轮的主要目标，他的想法反映了以色列的关切和利益。[26]其理由是，打击伊拉克要比打击阿富汗容易。[27]副总统切尼提议美国应该宽泛地确定自己的目的，并随即打击那些支持、培养和出口恐怖主义的国家（“国家恐怖主义”）。他认为，比起那些“朦胧的恐怖主义者”，它们是更容易的目标。[28]小布什要求安全、基础设施保护和反恐协调员理查德·克拉克寻找任何能把“9·11”恐怖袭击与伊拉克联系起来的证据。[29]强硬派人物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开始策划战争，并构想后萨达姆时代的国家模式。与他们相比，较为温和的鲍威尔则显得更为谨慎[30]，他对抛开巴勒斯坦问题而把伊拉克作

为主要关注点感到吃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休·谢尔顿（Hugh Shelton）将军反对在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伊拉克与“9·11”袭击有牵连的情况下，将其确定为军事行动第一阶段目标。[31]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小布什似乎相信萨达姆卷入了“9·11”袭击，但他决定先不对他采取打击。9月17日，也就是“9·11”事件六天后，他签署了一份两页半长的文件。这一被定为“最高机密”的文件，不仅阐述了打击塔利班的行动，而且要求五角大楼启动军事入侵伊拉克的计划。紧接着，他从国会获得了打击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主义的授权。于是，他向塔利班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其投降。塔利班没有被吓倒，即便本·拉登确实在那里，他们也不可能将其交出，因为这样做违背他们的道德准则。10月6日，小布什宣布启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行动：“这场反恐战争将持续相当长时间。”他宣称，美国给所有国家提供了一个明确选择：“要么与文明国家同在，要么与恐怖主义者为伍。”他威胁说，不作选择的国家（被视为与恐怖主义为伍）将会付出“沉重代价”[32]。次日，美国和英国一起开始从高空轰炸曾得到中央情报局、沙特和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共同资助的阿富汗“基地”组织训练营和设施。[33]空袭使这一在过去20年中饱受战争重创的国家雪上加霜，共造成约5 00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几乎为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恐怖袭击受害者的一倍，遭袭目标主要为非军事设施。[34]

小布什认为，那是“一场针对恐怖主义和恶魔的战争，并非针对伊斯兰世界”[35]。因此，他将其命名为“永久自由行动”或“无限正义行动”。然而，对阿富汗实施空袭一个多月后，五角大楼顾问委员会成员、“新美国世纪计划”参与者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埃里奥特·科恩（Eliot Cohe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中称，“这场战争中的敌人并非‘恐怖主义’（……），而是好战的伊斯兰教”[36]。科恩承认，对于小布什政府来说，这么说在政治上不适宜，也会“非常不舒服”，因为谁也不愿想象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有一个“强烈的好战和危险”癖好。他还表示，“但敢于说出不舒服和令人不快的事实是领袖的一个特点”[37]。英国首相布莱尔则在工党会议中指出，在阿富汗采取的行动是一个“恢复我们世界秩序”庞大工程的一部分。[38]

与1933年使希特勒获得授权并开始合法建立专制政权的国会纵火案一样，“9·11”袭击给了小布什在美国打击民权的机会。恐怖袭击发生后不到一周，《爱国法案》（正式名称为《美国爱国法案》）[39]首个版本成型。[40]这样，在轰炸阿富汗的同时，由“新保守派”、民主帝国主义者和

“肯定性”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团伙极力建立一个专制政府，打击美国和其他国家公民的自由，尤其是通信和行动隐私权。“9·11”事件七周后，美国国会基本未作修改就通过了《美国爱国法案》。[41]它不仅扩大了对公民实施电子监视方面的联邦权力，而且确定了“国内恐怖主义”这一新罪行。它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适用于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任何政治倾向。丹尼斯·库西尼奇（Dennis Kucinich）议员（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认为，这是对美国宪法的直接违背。伊利诺伊大学国际法教授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A. Boyle）指出，“9·11”事件以来，美国人所看到的是政府对宪法接二连三的打击。[42]这样，在美国建立一个类似纳粹德国的警察国家的条件开始逐步形成，这些特征包括对民权和个人保障的限制，对公共自由的约束，还包括美国是优等人种、其武器无人能敌的信念以及作为强国的狂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拥有摩尼教世界观的小布什（他在向恐怖主义发起打击阿富汗的“讨伐”行动时表示，“任何人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敌人”）真正开始在本国建立一个专制警察政权，即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独裁。2002 年 6 月 1 日，他在向西点军校学生发表讲话时彻底暴露了这一专制观念。他说：“我们处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美国将点出恶魔的名字。”在《美国爱国法案》框架内，美国国内的人权遭到践踏，人们往往未被指控和审判就遭关押。1 200 名外国人通过秘密程序被羁押并驱逐出境，官方甚至连其姓名都没有透露。美国国内个人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居住在美国的各国移民，即使已成为常驻居民，即拥有“绿卡”，也会在未被正式指控的情况下依照司法部最高法院决定遭羁押。被判有罪者，即使刑满，仍可能被移民归化局继续关押，直至做出是否应将其遣返的决定。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还做出了无限期关押非法入境外国人的决定，并不考虑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对伊战争开始后，这一做法令美国政府负担加重。当时，政府决定无限期关押所有来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伊斯兰国家公民。2003 年 5—10 月，约 13 万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和短期来访者为了能够留在美国，被迫接受拍照和留指纹。在这一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行动中，2 300 名非法移民被拘留，另有 800 人涉嫌犯罪被抓，美国还宣布抓获了 11 名恐怖活动嫌疑分子。2003 年 10 月开始的登记工作，起初只针对来自叙利亚、苏丹、利比亚、伊朗和伊拉克的公民，后来被扩大至 25 个国家，其中大部分为伊斯兰国家。[43]

记者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责小布什“追求专制权力”，以便抓捕和处决外国人，“用非正规军事法

庭取代美国法规”，蔑视一直支撑美国司法体系的法律准则和证据规则。[44]与小布什政府唱反调的安全、基础设施保护和反恐协调员理查德·克拉克指责总检察长阿什克罗夫特，认为他试图让大部分民众接受《美国爱国法案》改革措施意在利用“反恐战争”打击而非保护民众自由，“实质上是法西斯的开始”。他并没有夸大其词，[45]对美国民主的破坏正以1933年类似德国的方式进行着。当时，希特勒在没有废除《魏玛宪法》的情况下破坏了民主。把小布什推上美国总统位置而政府转而为其服务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即军工大企业，与推动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执掌德国政府的力量极为相似。

“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并非美国安全和情报机构的失误，而是有必要形成一个对推出《重建美国防务：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和《美国爱国法案》有利的气氛，以巩固“新保守派”、民主帝国主义者或“肯定性”民族主义者即共和党极右翼的权力。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安全机构也需要理由，以免支付“和平红利”，即裁减雇员人数、缩减经费。海湾战争（1991年）为以色列和美国的阿拉伯盟国清除了主要威胁。1994年，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纽约州民主党人）公开要求解散中央情报局。该机构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期间扩大了35%，被很多人视为“凶猛的离群象”、恐龙和冷战的遗存。[46]1995年，国会曾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中央情报局在后冷战时期的作用和任务，还对中央情报局是否应继续保留进行了评估。自1997年起，国会试图削减其预算。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乌尔西（James R. Woolsey）是投资于专门生产反恐产品的企业帕拉丁私募基金公司（Paladin Capital）的股东[47]，他与国会达成了将中央情报局预算削减约22%的协议，这意味着要裁减700名负责“隐蔽行动”的行动处人员、1 000名分析员和1 700名辅助人员以及科技处26%的人员。[48]在中央情报局不得不关闭许多站点的同时，联邦调查局开始扩张，它以打击贩毒和有组织犯罪为由，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设点。因此，需要为中央情报局找到新的使命和新的任务。它转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为美国的双边和多边谈判搜集情报。[49]但任何活动也比不上反恐战争，这是一场时间和空间都不确定的战争，永远不会让美国军队在纽约大街上进行凯旋时的阅兵游行。

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才导致“9·11”恐怖袭击的发生。不管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航空管理局都掌握了与本·拉登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可能挟持飞机进行自杀性袭击的详细情报。2001年10月3日的

《纽约时报》披露，1994年，有两架飞机遭劫持，其中一名劫机者为伊斯兰组织成员，他企图让飞机撞向大楼，但机组人员制服了劫机者。[50]自1995年起，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就对“波金卡计划”知情。[51]该计划由曾参与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的拉姆齐·尤塞夫（Ramzi Yousef）、卡里德·穆罕默德（Khalid Shaikh Muhammad）和其他“基地”组织成员在菲律宾马尼拉制定，其目的是发动多起恐怖行动，包括：在克林顿访问菲律宾期间向他乘坐的汽车发射火箭弹；谋害教皇保罗二世；劫持并使用飞机进行自杀式袭击，目标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兰利的总部和华盛顿、纽约等地的政府大楼，如世贸中心和希尔斯大厦等。这一项目未能实施，因为阴谋策划者之一阿卜杜勒·穆拉德（Abdul Hakim Ali Hashim Murad）在其寓所调配制造炸弹的化学物质时引发了火灾，前来调查的警察在那里除找到各种化学物质和硝化甘油外，还发现了一台属于拉姆齐·尤塞夫的手提电脑和几个磁盘。磁盘中存有多个行动计划，包括航班飞行计划和爆炸时间的计算等。作为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合作者，菲律宾麦格电脑集团（Mega Group of Computer Companies）总裁拉菲尔·加西亚（Rafael M. Garcia）解密了拉姆齐·尤塞夫电脑中的资料。[52]

在电脑中发现的一个方案是，恐怖分子计划在48小时内从太平洋上空劫持美联航、西北航空公司和三角洲航空公司的11架飞机，让它们分别撞向兰利中央情报局总部、纽约世贸中心、芝加哥希尔斯大厦、旧金山泛美大厦、华盛顿白宫等建筑。[53]恐怖分子还企图破坏美国的核设施。他们声称，所有支持美国对外政策和以色列的人都将成为袭击目标。曾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飞行训练的巴基斯坦人穆拉德被立即逮捕。菲律宾警察在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人员协助下对其进行了刑讯逼供。他供认其任务是劫持一架小飞机，最好是一架塞斯纳，让它撞向中央情报局大楼。拉姆齐·尤塞夫后被抓获并在美国受审。1996年9月5日，他和穆拉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梅利莎·马勒（Melissa Boyle Mahle）指出，假如1996年就将卡里德·穆罕默德抓获，他就不可能指挥“9·11”恐怖袭击。[54]直到2003年，他才在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情报局的一次联合行动中被抓获。

“波金卡计划”是后来发生的“9·11”事件的前奏。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美国联合反恐小组获得的情报均表明，该计划的资金来自本·拉登、外号为哈姆巴里（Hambali）的菲律宾恐怖分子瑞杜·伊萨穆丁（Riduan Isamuddin）、本·拉登的妹夫沙特人穆罕默德·哈里发（Muhammad Jamal Khalifa）所统领的一些组织和曾抗击苏联军队的阿富汗“圣战者”瓦里·夏（Wali Khan Amin Shah）。他们还得知“基地”组织在美国

和世界其他地区训练飞行员。[55]1999 年 3 月，德国联邦情报局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后来在“9·11”事件中控制美联航 175 航班撞向世贸中心大楼的恐怖分子马尔万·谢西（Marwan al-Shehhi）的名字和电话。这些信息是通过监听居住在汉堡的伊斯兰组织成员穆罕默德·扎马（Muhammad Heidar Zammar）的电话获得的，此人与策划“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成员关系密切。[56]扎卡里亚斯·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艾哈迈德·莱萨姆（Ahmed Ressam）、哈利德·米达尔（Khalid al-Mihdhar）、纳瓦夫·哈兹米（Nawaf al-Hazmi）和萨里姆·哈兹米（Salim al-Hazmi）等恐怖分子曾遭美国移民归化局拘留或处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下。[57]穆萨维在诺曼市（俄克拉何马州）“空中飞人”飞行学校和泛美航空公司波音 747 飞机上接受过培训，此事对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58]一位与明尼阿波利斯联合反恐小组代表共同负责穆萨维案情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很快就发现穆萨维有“圣战者信仰”，并怀疑他有劫机图谋，认为他是在为发动袭击而接受培训。[59]2001 年 5—6 月，穆罕默德·阿塔（Muhammad Atta）在德国法兰克福与美因茨接受飞行训练时，也处于中央情报局的监视下。但奇怪的是，没有人向美国移民归化局报告任何信息，他们被允许进入美国，并在亚拉巴马州的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接受飞行训练。[60]穆罕默德·阿塔尽管在此前的一次德国之行中违反签证规定，但他仍被允许进入美国。[61]

从 2001 年上半年起到年中，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了恐怖袭击迫在眉睫的迹象，尽管并不知道它们将在何地、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它们还获得了国际恐怖主义正在认真考虑在行动中将飞机用作武器的情报。[62]国家安全局所操控的“梯队系统”也在监视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通信联系。[63]“9·11”袭击发生五个月前，美国政府就把中东恐怖分子可能试图劫持美国飞机的信息通知了各航空公司。[64]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特承认，“系统已经亮起红灯”[65]。红灯确实已经亮起，国家安全局截获了大约 34 条本·拉登与其同伙之间的专门通信，包括“零点是明天”或“精彩之极的事情即将到来”之类的话。[66]2001 年 8 月头几天，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向小布什总统报告了恐怖分子可能劫持飞机的情报。[67]2001 年 8 月 6 日，小布什收到了一份标题为“本·拉登决心在美国发动袭击”的“总统每日绝密简令备忘”，其内容为情报人员“凤凰”（克纳斯·威廉姆斯，Kenneth Williams）提供的情报[68]：

我们无法确证一些更为敏感的威胁报告，譬如来自……（此部分

被编辑过）……情报机构的信息称，本·拉登企图劫持一架美国飞机以便迫使美国释放“盲人谢克”奥马尔·拉赫曼和美国关押的其他极端分子。

尽管如此，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那时起获得的情报表明，在我们国家进行着一些与劫机或其他袭击准备相符的可疑行动，包括最近对纽约联邦大楼的监视。[69]

8月15日，明尼阿波利斯联邦调查局地方办事处开始围绕法籍摩洛哥人穆萨维进行调查，并与该机构驻巴黎的专员进行了联系，得到的情报证实，穆萨维与车臣叛军首领伊本·哈塔布（Ibn al-Khattab）有关联。8月23日，特纳特收到一份名为“伊斯兰极端分子学习飞行”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称，穆萨维有意学习驾驶波音747飞机的技术，并已为培训支付现金，他对进行一次从伦敦至纽约的模拟飞行感兴趣，想弄清楚如何在飞行过程中使机舱门无法开启。[70]8月24日，中央情报局就“围绕可疑的747航班问题”给伦敦和巴黎发了电报，把穆萨维描述为一名“自杀性劫机者”[71]。“9·11”恐怖袭击发生的12天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通过黎巴嫩《使节报》声称“即将发生一些事情”，而且他已告知美国人。[72]生活在伦敦的伊朗作家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向《时代》周刊表示，他相信美国知道迫在眉睫的恐怖袭击，因为，9月3日，联邦航空局让他不要旅行，除非航空公司履行所有安全措施。[73]由于受到来自德黑兰的死亡威胁，他不得不接受伦敦警察的保护，其旅行计划必须得到英国军情五处和六处的批准。记者埃文·托马斯（Evan Thomas）和马克·霍森鲍尔（Mark Hosenball）在《新闻周刊》杂志中透露，恐怖袭击前一天，也就是9月10日，五角大楼高层官员突然取消了第二天的出行计划，从表面上看是出于安全考虑[74]，但戒备状态两周前就已宣布。9月10日晚上，五角大楼接到一个紧急通告，“五角大楼一批最高级官员”因此中止了出行计划。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不仅知道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且还了解其时间表，他们试图保护自己。《新闻周刊》认为，美国军事情报部门高层得到了一些风声，并给予了高度重视。[75]

各种情报如同积木一般堆放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五角大楼和小布什总统的办公桌上。但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辩称，谁也没有想到“飞机会被当作导弹使用”[76]。白宫另一些官员表示，因为缺乏最新情报，小布什对通告并不十分重视。国家安全局局长空军中将迈克尔·海登（Michael V. Hayden）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基地”组织把纽约和华盛顿作为目标或正计划在美国本土发动袭击。[77]但国防部前监察长、调查导致“9·11”恐怖袭击过失的国会委员会负责人埃利诺·希尔（Eleanor Hill）透露，从1998年起一直到2001年8月，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构不断接到“基地”组织企图使用飞机或其他手段袭击华盛顿和纽约的情报。[78]

1999年，众议院特别小组组长约瑟夫·波丹斯基在《瞄准美国和西方》一书中写道，作为“圣战”的一部分，自1980年年初起，恐怖分子就开始进行劫持和驾驶运输机的训练，最初训练基地建在德黑兰东边以殉难地闻名的马什哈德附近的瓦基拉巴德。他们“从愿意驾驶客机撞向设定目标的恐怖分子中挑选人员，让他们接受飞行训练”[79]。1980年年中，在德黑兰附近的道尚·塔佩空军基地，一些PC-7飞机就曾做好了去执行以一些波斯湾国家元首宫殿为目标的自杀性行动。[80]同年，特别行动和低密度冲突办公室的道格·梅纳切克（Doug Menarchik）上校在兰利空军基地组织了一次会议，多名参会者讨论了“商业飞机被蓄意撞向国家首都某座公共建筑的可能性”[81]。1994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播放了一个专题片，记者史蒂文·爱默森（Steven Emerson）作为制片人在片中介绍了在参与1993年世贸中心车库爆炸案的一个恐怖分子身上找到的一份文件，该文件包含袭击飞机的详细说明，并号召穆斯林以各种方式打击真主之敌的士气，“破坏和炸毁其文明的支柱，如他们引以为傲的旅游景点和高楼大厦”[82]。

自1994年起，美国就预见到伊斯兰激进分子采取自杀性行动劫持商业飞机撞向高楼大厦的可能性。但令人奇怪的是，八年后，华盛顿没有人想到“飞机会被当作导弹使用”。然而，一位没有透露身份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向国会调查委员会报告说，2001年8月29日，即“9·11”事件发生的两周前，他的上司否定了他提出的拘留米达尔的要求，尽管恐怖袭击发生的18个月前，当米达尔前往马来西亚参加“基地”组织会议时，中央情报局已对其实施监视。米达尔是劫持美国航空公司AA77航班飞机撞向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之一。[83]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都掌握此人情况，他的名字出现在乘客名单中。[84]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也同样掌握另一名劫机犯哈兹米的情况。[85]在跟踪这些恐怖分子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有大量机会可就他们进入美国的可能性提醒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当局，埃利诺·希尔认为它没有这样做。[86]英国军情五处前主任斯特拉·里明顿（Stella Rimington）在回忆录中写道，当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构了解到大量伊斯兰学生在美国的航空学校学习的情况后，应重新审视国内机场的保安措施。[87]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安全、基础设施保护和反恐协调员的

理查德·克拉克断然指出："我们能制止'9·11'袭击吗？肯定的回答应该很容易做出。"[88]他尤其指责小布什在9月11日之前国家面临"基地"组织威胁并被反复提醒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89]

在美国媒体透露代号为"凤凰"的联邦调查局成员克纳斯·威廉姆斯在2001年7月10日的备忘录中就恐怖分子可能发动袭击和"基地"组织成员正在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警告美国政府之前，德国前国防部长（1976年）、曾在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政府中担任研究和技术部长（1980—1982年）并作为议员负责监督联邦德国情报局[90]活动的社民党人安德烈亚斯·布洛（Andreas von Bülow）曾公开表示，他对美国情报机构在得到法国情报机构国土警戒局和摩萨德[91]提醒的情况下未为避免恐怖袭击采取任何措施，并在48小时后即把袭击事件归咎于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做法感到惊讶。

曾担任共和党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助理的旧金山律师斯坦利·希尔顿（Stanley Hilton）代表14个"9·11"恐怖袭击受害人家庭，向法院提出了对小布什、切尼、赖斯、拉姆斯菲尔德和交通部长诺曼·米内塔（Norman Mineta）的控告，指控他们不仅没有阻止恐怖袭击的发生，反而利用类似"珍珠港事件"的伪装，策划并下达了实施恐怖袭击的命令，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建立独裁政权。他认为，劫机者是接受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经费对在美国的阿拉伯人采取间谍活动的双重人员，他们受人摆布。希尔顿声称，"小布什亲自签署命令，批准了袭击"。他要求政府向14个家庭赔偿70亿美元。他还称，"小布什犯有叛国罪和屠杀民众罪"[92]。

这一指责看起来有点夸张，但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亚历山德拉·理查德（Alexandra Richard）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央情报局的一位代表曾前往迪拜（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之一）的一家美军医院拜访本·拉登。据说，2001年7月4—14日，也就是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袭两个月前，他住在那家医院接受肾脏治疗。[93]该报暗示，本·拉登很可能就将要进行的恐怖袭击向中央情报局作了某种暗示。法国国家广播电台提供了更多细节，包括会晤时间（7月12日）和中央情报局代表的名字。此人名为拉利·马歇尔（Larry Mitchell），是一位熟知阿拉伯世界的专家，其名片上的身份为"领事人员"。美军医院领导显然不承认本·拉登在那里住院接受肾脏治疗。中央情报局称会晤说法"极为荒唐"，但医院泌尿科主任拒绝回答有关此事的询问。

那些假设即使显得荒唐或确实荒唐，但事实是，尽管美国政府每年在情报方面投入300亿美元，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它未能使一个筹划了将近

四年时间的阴谋流产，最终导致2001年“9·11”恐怖袭击成为事实。根据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特、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Robert S. Mueller Ⅲ）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空军中将海登向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所作的报告，“9·11”袭击的策划始于1998年美国在东非使馆遭袭之后。[94]检察官凯·聂姆（Kay Nehm）在审理28岁的摩洛哥人莫尼尔·莫塔萨德克（Mounir al-Motassadeq）案时证实了这一点。莫塔萨德克被指控与驾驶飞机撞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三名劫机者穆罕默德·阿塔、马尔万·谢西和奇亚德·贾拉（Ziad Jarrah）同属一个组织，并为他们提供帮助。[95]

因此，尽管小布什政府获得了大量情报却未下令逮捕公认的恐怖分子而致使恐怖袭击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为了实施秘密行动并推动美国的民族利益，没有比中央情报局炮制“肮脏伎俩”更正常的事情了。1965年，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处前处长理查德·比斯尔（Richard Bissel）在电视上承认，其手下执行的行动在很多情况下违背道德规范。[96]有一次，中央情报局被告知有人准备劫持一架飞机，但他们却未试图阻止劫机的发生。两位美国情报人员在《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一书中写道，1969年10月初，中央情报局接到巴西一个激进团体正策划劫持一架飞机逃亡古巴的情报，这一情报被附上“最高机密”批注后转发给国务卿基辛格及白宫和国防部高层官员。10月8日，一些已被中央情报局核实身份的激进分子实施了劫机行动，被劫飞机上共有49人，劫机者强迫飞行员在圭亚那加油后把飞机开往哈瓦那。尽管尼克松总统宣扬的美国官方政策是使用各种手段打击空中海盗行为，但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避免劫机事件的发生。当被国务院问及为何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时，中央情报局拖了一个多月才作出答复。1969年11月4日巴西革命领导人卡洛斯·马里格拉（Carlos Marighela）被暗杀后，中央情报局才非正式地告知国务院，他们没有阻止劫机行为的原因是，假如采取行动，他们打入巴西国家解放联盟的情报人员就会暴露身份，摧毁该组织的机会就会因此减小。[97]维克托·马尔凯蒂（Victor Marchetti）和约翰·马克斯（John D. Marks）评论说：“对于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人员来说，消灭巴西激进运动这一结果表面上能解释其做法，他们因此就允许劫机事件发生，毫无必要地将49条无辜生命置于危险境地。”[98]

欧洲情报部门专家将小布什的“反恐战争”视为一种蒙骗行为，他们通过美国入侵阿富汗看清了“现实政治”。在参与“9·11”袭击的劫机者生活和学习的德国，自2001年7月起，阿富汗计划已在讨论之中。情报专

家一直不相信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没有得到某国情报部门的支持。德国国内情报部门联邦宪法保卫局[99]前局长埃克哈特·韦特巴赫（Eckehardt Werthebach）对《美国自由言论报》说，“致命的精确”和“策划的规模”清楚地表明，“9·11”恐怖袭击需要多年的准备，并需要某一国情报部门固定组织形式的支持，而这是穆罕默德·阿塔所在的这种恐怖组织所不拥有的。曾担任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总理办公室主任（1969—1972年）并作为特殊使命部长协调德国情报系统的霍斯特·埃姆克[100]（Horst Ehmke）从电视上看到“9·11”袭击图像时说，它们好像“好莱坞大片”。他认为，假如不拥有某个情报机构的支持，恐怖分子不可能劫持四架飞机实施这样的行动。[101]

情报机构人员和恐怖分子往往掺杂在一起，很多时候扮演双重角色。安德烈亚斯·布洛所指的敌友混淆往往成为打击恐怖主义本身的一个难题。[102]所有迹象表明，美国的某些利益集团允许并（或）希望“9·11”恐怖袭击的发生。法国记者蒂埃里·梅桑（Thierry Meyssan）在《惊天大骗局》一书中提出了本·拉登组织只不过是“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手段炮制出来的一个幌子”的假设[103]，这一假设并非完全不可能。1962年，为了给军事干涉古巴找到理由，五角大楼炮制了一系列借口，包括制造“能够确凿地表明古巴飞机进攻并击落一架从美国飞往牙买加、危地马拉、巴拿马或委内瑞拉民用包机的事件”，而实际情况是中央情报局负责通过无线电控制引爆载有“一群去度假的学生或任何有共同包乘一个非固定航班意愿人员”的飞机。[104]代号为“诺斯伍德计划”或“猫鼬计划”的一系列阴谋活动，目的是为干预古巴找到借口，以便将古巴政府塑造成一个“鲁莽且不负责任并对西半球和平构成令人恐惧和不堪设想威胁”的国际形象，这就是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的企图。正如詹姆斯·班福德（James Bamford）所指出的，有可能爆发一场“很多爱国的美国人和无辜的古巴人毫无意义地死去”的战争。[105]

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一样长期从事“隐蔽行动”，它通过心理战和肮脏行动操纵民意，使美国和（或）以色列得以实施其政策。[106]安德烈亚斯·布洛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承认，摩萨德可能在幕后支持了“9·11”恐怖袭击，目的是煽动世界舆论反对阿拉伯人，因为，在西方没有其他方式比把伊斯兰教当作新敌人，即“文明的冲突”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2001年6月26日，一名记者写信给《公共事务杂志》称，如果对塔利班政权的制裁不能使其屈服，印度和伊朗有可能为美国和俄罗斯提供对塔利班采取“有限军事行动”的计划。[107]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记者吉姆·米克拉斯泽维斯基（Jim Miklaszewski）5月16日透露，在袭击世贸

中心和五角大楼恐怖事件发生两天前，小布什就准备签署带有详细计划的国家安全总统指令——《从地球上消灭“基地”组织行动计划》，以启动打击“基地”组织的战争。[108]这一计划已交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其中还包括一份要求塔利班交出本·拉登的最后通牒，并以动武相威胁。[109]

据《亚历山大油气通讯》2002年2月21日透露，对阿富汗开战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袭前就已确定，消灭塔利班的计划在“9·11”事件几个月前就已成为外交和非外交国际论坛的议题。2001年5月，国务院官员与伊朗、德国和意大利代表在日内瓦进行会晤，主要讨论了推翻塔利班政权的战略，考虑用1973年被废黜后流亡罗马的查希尔·沙阿（Muhammad Sahir Shah）国王领导的具有更广泛基础的联合政府取而代之。[110]2001年7月，此事成为“八国集团”日内瓦会议的议事日程。[111]小布什政府的确希望发生某个事件，尽管可能没有想到“9·11”恐怖袭击的规模。事实是，他在掌握情报的前提下丝毫未加以阻止。[112]恐怖主义被用于发动对伊拉克和其他国家战争的借口，消灭塔利班并占领阿富汗则成为切入点。美国对此蓄谋已久，其动机是里海地区的石油和经过那里的油气管道的建设。[113]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指出：“占领阿富汗与本·拉登没有丝毫关系，而是以一个相对稳定政府取代塔利班的简单借口，这一政府会允许优尼科公司铺设能为切尼、小布什集团等带来利润的管道。”[114]

【注解】

[1] New World Coming: American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Major Themes and Implications. The Phase 1 Report on the Emerging Global Security for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21st Century. September 15, 1999. U. 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21st Century. http://www.fas.org/man/docs/nwc/nwc.htm.

[2] The 9/11 Co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3]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

[4] Woodward, 2002, p. 37.

[5] Id., ibid., p. 45. Suskind, 2004, p. 184.

[6] Lebert, Stepahn & Thomma, Norbert. “Da sind Spuren wie von einer trampelnden Elefantenherde Der erste Verdacht kam ihm, da saßer im Bundestag. Geheimdienste wurden sein Thema. Andreas von Bülow traut ihnen Schlimmstes zu: eine Verwicklung in die New Yorker Anschläge”. *Der Tagesspiegel*—Sonntag, Berlin, 13/

01/2002—Seit S1. 据透露，其中一位自杀式恐怖袭击者穆罕默德·阿塔（Muhammad Atta）接受了巴基斯坦情报局的指导和资金支持，而巴基斯坦情报局则从中央情报局获得大量资金，以便供养在巴基斯坦的这类组织成员。

[7] Huntington，1997，pp. 256-258e262-265.

[8] Id.，ibid.，p. 209.

[9] Id.，ibid.，pp. 311-312.

[10] Woodward，2002，p. 60.

[11]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Latin America Overview—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2000. Released by th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ounterterrorism. April 30，2001.

[12] Ibid. Ingram，Dexter. *Facts and Figures About Terrorism*. WebMemo # 36. September 14，2001.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Policy Research & Analysis. Research—National Security. http://www. heritage. org/Research/NationalSecurity/WM36. cfm.

[13] 由卡特尔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阿拉伯电视台。

[14] Transcript. Tome：2001 12/27 19-38 GMT. Ref：Afghanistan：Part 1 of 8：Al-Jazirah TV Broadcast Bin Ladin—Recorded Statement Statement 27 Dec（2）GMP20011227000227 Doha Al-Jazirah Satellite Chanel Television Arabic 1835 GTM 27 Dec. 01.

[15] Ibid.

[16] Ibid.

[17]《梦魇般的权力》节目于2005年1月18—20日连续三个晚上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二台播出，播出时间为格尼威治时间23时20分。Broadcast—BBC 2—27/10/2004—Written and produced by Adam Curtis. BBC News UK Edition—Last Updated：Friday，14 January，2005，12：07 GMT.

[18]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http://www. newamericancentury. org/.

[19] Clarke，2004，pp. 30-31.

[20] Id.，ibid.，pp. 32-33.

[21] CBS News. “Plans for Iraq Attack Began on 9/11”. Washington，Sept. 4，2002. http://www. cbsnews. com/stories/2002/09/04/september11/printable520830. shtml. Vide também Krugman，Paul. “Pattern of Corruption”. *The New York Times*，15/7/2003.

[22] Daalder & Lindsay，2003，p. 54.

[23] Woodward，2002，p. 49.

[24] Id.，ibid.，pp. 8，35-37e40-41.

[25] Clarke，2004，p. 31.

[26] Woodward，2004，pp. 60-61.

[27] Id., ibid., p. 84.

[28] Id., ibid., pp. 43-49.

[29] Clarke, 2004, p. 32.

[30] Suskind, 2004, pp. 96-97.

[31] Woodward, 2002, p. 63.

[32] President Bush's Radio Address to the Nation, October 6, 2001 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October 6, 2001.

[33] President Bush Announces Military Strikes In Afghanistan—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October 7, 2001.

[34] Ahmed, 2002, pp. 17 e 249.

[35]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during March of Dimes Volunteer Leadership Conference—The Omni Shoreham Hotel Washington, D. C. —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October 12, 2001.

[36] Cohen, Eliot A. "World War IV".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1/2001.

[37] Milbank, Dana. "Conservatives Dispute Bush Portrayal of Islam as Peaceful—Critics, Including Some Policy Advisers, Call Stance Political." *Washington Post*, 30/11/2002; p. A04.

[38] Wood, 2003, p. 146.

[39] 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USA Patriot Act) Act of 2001—HR 3162 RDS—107th Congress—1st Session—H. R. 3162—In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ctober 24, 2001.

[40] The 9/11 Co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p. 328.

[41]《爱国法案》在参议院以 98 票支持、1 票反对获通过，在众议院的表决为 357 票对 66 票。

[42] Ahmed, 2002, pp. 266-269.

[43] Canzian, Fernando. "Novas decisões, tomadas em nome da segurança, facilitam prisão de imigrantes; alvos são principalmente islâmicos—Estados Unidos limitam ainda mais os direitos civis", *Folha de S. Paulo*, 4/5/2003.

[44] Safire, William. "From the Right—Seizing Dictatorial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15/11/2001.

[45] Clarke, 2004, pp. 256e286.

[46] Mahle, 2004, pp. 147-150.

[47] Phillips, 2004, p. 274.

[48] Mahle, 2004, p. 123.

[49] Id., ibid., pp. 97, 147, 153.

[50] Ahmed, 2002, pp. 82-83.

[51] Id., ibid., pp. 82-91. Mahle, 2004, p. 247.

[52] Ahmed, 2002, pp. 83-84.

[53] Id., ibid., p. 84.

[54] Mahle, 2004, p. 248.

[55] Shenon, Philip. "F. B. I. Knew for Years About Terror Pilot Training". *The New York Times*, 18/5/2002.

[56] Risen, James & Lichtblau, Eric. "C. I. A. Was Given Data on Hijacker Long Before 9/11". *The New York Times*, 24/2/2004.

[57] *The 9/11 Co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p. 273.

[58] Ibid., p. 273.

[59] Ibid., p. 273. Von Bülow, 2003, pp. 47-60.

[60] Rising, David. "Key Suspect Had Been Under German Surveillance." *Associated Press*, 29/9/2001.

[61] Ahmed, 2002, p. 95.

[62]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Knowledge of the September 11 Hijackers Prior to September 11, 2001". Eleanor Hill, Staff Director, Joint Inquiry Staff—Congressional Intelligence Committee, September 20, 2002—http://intelligence.senate.gov/0209hrg/020920/witness.htm.

[63] Ahmed, 2002, pp. 88-89.

[64] The Associated Press. "Airlines Warned of Terrorist Threats". *The New York Times*, 19/5/2002.

[65] *The 9/11 Co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p. 254.

[66] Woodward, 2002, pp. 24-25.

[67] Sanger, David E. "Bush Was Warned Bin Ladin Wanted to Hijack Planes". *The New York Times*, 16/5/2002. *The New York Times*, 18/5/2002. *La Nacion*, Buenos Aires, 19/5/2002.

[68] Miller, Bill & Eggen, Dan. "FBI—Memo Author Did Not Envision Sept. 11". *The Washington Post*, 23/5/2002.

[69] Woodward, Bob & Eggen, Dan. "Aug. Memo Focused on Attacks in U. S.". *The Washington Post*, 19/5/2002, p. A01. 小布什政府批准的"总统每日绝密简令备忘"于2004年4月10日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被解密。其内容如下：

外国政府和媒体报道表明，自1997年起，本·拉登就有意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本·拉登在1997年和1998年接受美国电视台的采访时暗示，他的追随者将效仿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制造者拉姆兹·尤素夫，"把战斗带到美国"。

据……（此部分被编辑过）……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1998年，美国对他在阿富汗的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后，本·拉登对他的随从说，他将报复华盛顿。与此同时，埃

及“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一位密探告诉一个……（此部分被编辑过）……情报机构，本·拉登正计划安排密探打入美国，以便在那里实施恐怖袭击。

1999年发生在加拿大的千禧阴谋可能是本·拉登试图在美国实施恐怖袭击的首个重要步骤的组成部分。被证明有罪的阴谋策划者阿迈德·莱萨姆（*Ahmed Ressam*）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袭击洛杉矶国际机场是他本人的主意，但本·拉登的助手阿布·祖贝达（*Abu Zubaydah*）怂恿了他，并为他采取行动提供了便利。莱萨姆还表示，阿布·祖贝达本人曾在1998年策划对美国的袭击。

莱萨姆说，本·拉登了解洛杉矶行动。

尽管本·拉登未能得手，但1998年他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袭击表明，他在多年前就着手准备行动，而且并未被挫折所吓倒。早在1993年，本·拉登的同伙就在监视我们在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内罗毕分支组织的一些成员在策划爆炸案过程中被抓获并于1997年被驱逐出境。

包括一些美国公民在内的“基地”组织成员已于数年前来到美国或定居下来。从表面看，这一小组拥有了为袭击提供帮助的支持结构。在袭击我们在东非大使馆的爆炸阴谋中，被证明有罪的基地组织成员中，有两名是美国公民，另一位“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资深成员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

一个来源保密的信息表明，1998年，本·拉登的一个分支组织在纽约招募美国穆斯林青年，以便发动恐怖袭击。

我们无法确证一些更为敏感的威胁报告，譬如来自……（此部分被编辑过）……情报机构的信息称，本·拉登企图劫持一架美国飞机以便迫使美国释放“盲人谢克”奥马尔·拉赫曼和美国关押的其他极端分子。

尽管如此，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那时起获得的情报表明，在我们国家进行着一些与劫机或其他袭击准备相符的可疑行动，包括最近对纽约联邦大楼的监视。

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全美进行着大约70项被认为与本·拉登有关的全面实地调查。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一个今年5月打给我们驻阿联酋大使馆的电话。该电话称，在美国的一个支持本·拉登的组织正在策划爆炸案。

“Text：President's Daily Brief on Aug. 6，2001”，in The 9/11 Co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pp. 261-262. Vide também *The Washington Post*，10/04/2004；7:24 PM.

[70] *The 9/11 Co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p. 275.

[71] Ibid.，pp. 273-274.

[72] Panossian，Joe. “Egypt Leader Says He Warned America”. Associated Press，December 7，2001，12:56 PM. http://dailynews. yahoo. com/h/ap/20011207/wl/attacks_mubarak_1. html.

[73] Doran，James. “Bin Ladin's trail Rushdie's air ban”. *The Times*，27/9/2001.

[74] Hirsh，Michael. “We have hit the targets”. *Newsweek*，13/9/2001. Thom-

as, Evan & Hosenball Mark. "Bush: 'We're At War' As the deadliest attack on American soil in history opens a scary new kind of conflict, the manhunt begins". *Newsweek*, 24/9/2001.

[75] Ibid. Vide também Ahmed, 2002, p. 124.

[76] Sanger, David E. & Bumiller, Elisabeth. "No Hint of Sept. 11 in Report in August, White House Says, But Congress Seeks Inquiry". *The New York Times*, 16/5/2002.

[77] Woodward, 2004, pp. 214-215.

[78] Risen, James. "U. S. Failed to Act on Warnings in, 98 of a Plane Attack", *The New York Times*, 19/9/2002; Priest, Dana (*The Washington Post*), "U. S. received warnings of 'airplanes as weapon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8/9/2002.

[79] Bodansky, 1993, pp. 10-17. Cuddy, 2002, pp. 9-10.

[80] Bodansky, 1993, p. 14.

[81] Warrick, Jobby & Stephens, Joe. "Before Attack, U. S. Expected Different Hit. Chemical, Germ Agents Focus of Preparations". *Washington Post*, 2/10/2001, p. A01.

[82] Apud Cuddy, 2002, pp. 9-10.

[83] "FBI Agent Urged Search For Hijacker—Request Was Turned Down Before Attacks, Panel Is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21/9/2002.

[84] Von Bülow, 2003, pp. 56-76 e 222.

[85] Id., ibid., pp. 56-107.

[86] Ibid.

[87] Rimington, 2002, pp. xvii-xix.

[88] Clarke, 2004, p. 238.

[89] Id., ibid., p. x.

[90] 德国联邦情报局。

[91] 摩萨德的总部设在特拉维夫。20 世纪 90 年代末，它共拥有 35 000 名成员，其活动遍布全世界，其中 20 000 名成员处于活动状态，其余的 15 000 人处于深度潜伏状态。

[92] Kiefer, David. "S. F. Attorney: Bush Allowed 9/11". *San Francisco Examiner*, 11/06/2002. http://www.ratical.org/ratville/CAH/Hilton.html.

[93] Richard, Alexandra. "La CIA aurait rencontré Ben Laden en juillet". *Le Figaro*, 31/1/2001, p. 2.

[94] Risen, James. "The hearings—al' Qaeda Attack Was in Works for 3 Years, Officials Say". *The New York Times*, 19/6/2002.

[95] "11. September—Erste Anklag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0/8/2002.

[96] Marchetti & Marks, 1974, pp. 250-251.

[97]Id., ibid., p. 252.

[98] Id., ibid., p. 251.

[99] 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

[100] 荷斯特·耶姆克（Horst Ehmke）在小说《天空火把》（Frankfurt: Verlag Eichborn, 2001）中预见了一起类似恐怖袭击。他描述的是土耳其极端分子劫持飞机袭击柏林。

[101] Bollyn, Christopher. "European Spooks Say Mideast Terrorists Needed State Support", American Free Press—http://www. americanfreepress. net/Mideast/Fox_News_Special_Report_Confir/fox_news_special_report_confir. html. Wer sind die Masterminds?, http://www. ceiberweiber. at/wahl1/9dezember. htm.

[102] Von Bülow, Andreas. *In Namen des Staates: CIA, BND und de kriminellen Menchenschaften der Geheimdienste*, Munique, 2002, p. 267.

[103] Meyssan, 2002, pp. 118-119.

[104] Top Secret Special Handling,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13/3/1962; Subject: Justification for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Cuba (TS), L. L. Lemnitzer, Chairman, Joint Chief of Staff. 1 Enclosure—Memo for the Chief of Operations, Cuba Project.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http://www. gwu. edu/~nsarchiv/news/20010430/docl. pdf.

[105] Bamford, 2002, pp. 79-83.

[106] Von Bülow, 2003, p. 214.

[107] *Public Affairs Magazine*. News Insight. http://www. indiareacts. com. Cuddy, 2002, p. 6.

[108] Id., ibid., p. 7. Jim Miklaszewski—NBC News May 16, 2002. http://www. msnbc. msn. com/id/4587368.

[109] Ibid. Brisard & Dasquié, 2001, pp. 68-79。

[110] Id., ibid., pp. 78-79.

[111] "Pipelineistan: The Rules of the Game". *Alexander's Gas & Oil Connections*, vol. 7, issue #4—Thursday, February 21, 2002.

[112] "周四将公布的一份国会报告称，'9·11'袭击本来可以预防，但由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沟通不充分，阴谋未被发现。两机构之间没有共享与两起劫机事件有关的情报。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合委员会情报小组的报告发现，在'9·11'袭击事件近两年前，中央情报局就了解到卡立·阿尔米达（Khalid al-Midhar）和纳瓦·阿哈兹米（Nawaf al-Hazmi）之间有关恐怖活动的联系。他们于2000年移居圣迭戈，频繁出入美国联邦调查局已打入其中的穆斯林圈。看到这份报告的一些人说，这份报告的要点是，假如情报机构能共享它们的情报，假如美国联邦调查局能更大胆地使用情报，阿尔米达先生和阿哈兹米先生在圣迭戈的出现就是'粉碎"9·11"阴谋的最好机会'。" David Johnston. "9/11 Study Faults F. B. I. -C. I. A. Lapses". *The New*

York Times，24/7/2003.

[113] Vidal，2002，pp. 16-18 e 30-33. “[……] 现在我们被一群石油商和五角大楼的人所统治。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自石油行业，如布什父子、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等人。他们掌握着权力，这是他们为了给自己牟利所采取的最后一次大行动。我相信他们足够爱国，人们可以放心，他们会给美国带来好处：美国能够通过多条输油管进入到中亚石油蕴藏量巨大的源头。[……] 我们以前和现在一直在绝望地建造一条跨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通往卡拉奇并到达印度洋的输油管。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在与塔利班打交道。但这些人已变得疯狂，失去了理智，使得我们无法再与他们打交道。于是，我们就进入那个国家，努力稳定那里的局势，使优尼科（美国能源公司）得以在那里建造一条输油管。”摘自戈尔·维达尔致加里·神谷（Gary Kamiya）的信。这位美国作家认为，美国国会应该调查政府是否预知对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维达尔称：“石油导致了阿富汗战争。” *Folha de S. Paulo*，12/05/2002.

[114] Vidal，2002，p. 40.

第三十三章

侵占阿富汗　“邪恶轴心”　对国际法的损害　关塔那摩集中营　委内瑞拉未遂政变　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多边组织的侵犯　“路线图”与巴勒斯坦　“先发制人”战略　国防开支的提高　海湾战争综合征

在发动打击塔利班的战争之前，小布什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与阿富汗接壤的国家的支持，包括如中亚各国，如中国（76 公里）、伊朗（936 公里）、巴基斯坦（2 430 公里）、塔吉克斯坦（1 206 公里）、土库曼斯坦（744 公里）和乌兹别克斯坦（137 公里）。这些国家大都希望遏制已成为政治传播工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甚至已蔓延到俄罗斯联邦南部。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试图镇压车臣的民族主义反叛运动。车臣主要领导人沙米尔·巴萨耶夫（Shamil Basayev）和阿尔-哈塔布（Al-Khattab）80 年代初在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情报局设在阿富汗霍斯特省的阿米尔·穆阿维阿营地接受过强化游击战训练。由美国发起的广泛反恐国际联盟于 2001 年 12 月在彼得斯堡（德国波恩附近）召开的会议上形成，会议的目的是为在阿富汗成立一个由多种族组成的临时政府确立基础，以便消除以军阀争战为特点的政治恶习。这些军阀代表着不同种族——普什图（38%）、塔吉克（25%）、哈扎拉（19%）。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民族，如艾马克、土库曼、巴鲁克（这三个民族的人口相加占总人口的 12%）和乌兹别克（6%）。选择曾作为“圣战者”抗击苏联军队的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担任阿富汗临时政府总理既不是因为他在普什图-杜兰尼族中的领导地位，也并非由于他与前国王查希尔·沙阿（Zahir Shah）同属一个氏族，而是因为他曾担任优尼科石油公司顾问，并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和巴基斯坦情报局关系密切。

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行动所引发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广度

和深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它不仅仅局限于入侵阿富汗，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取代塔利班，以便为优尼科建设输油管提供方便。“新保守派”操纵“9·11”灾难的目的是打击美国国内和国际司法结构，以便让他们所服务的大公司能够建立起对全球金融资本的独裁。切尼、小布什集团依靠《美国爱国法案》为在美国建立带有类似纳粹法西斯特点的警察和军事国家打造了模型。五角大楼违反1878年的《民兵团法案》关于不允许军队在未经国会或总统批准情况下参与国内政治活动的规定，而把注意力转向被称为“民众动乱状态”的国内政治活动。它以军队能更好地应对恐怖威胁并阻止化学、生物和核武器进入美国领土为由建立了北方司令部。司令部设在皮特森空军基地（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辖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古巴。但不管是加拿大还是墨西哥，对于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管辖均未被征询意见，古巴就更不用说了。

小布什于2002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表明，他企图使世界处于一种持久战争状态，并实施美国的全球性独裁。在阐述对外政策时，他对伊拉克、伊朗和朝鲜进行了指责，称“这些国家及其恐怖主义同盟构成了图谋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1]。这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演说，他对一系列主权国家发出威胁，并有意模仿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的里根，其目的是制造恐慌气氛，以证明无休止战争的必要性，理由是那些国家正试图生产化学、生物和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小布什称，“成千上万的危险杀手学会了杀人方法，他们往往得到无法无天政权的支持”。然而，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之间并不存在联系，它们与“9·11”恐怖袭击也毫不相干。美国实行全球专制意图以及毫不尊重国际公约和以避免单边行动为宗旨的国际机构的做法说明，它是唯一无法无天行事的国家。

小布什政府还通过阿富汗战争破坏脆弱的国际法结构。它违反《日内瓦公约》，引入“非法战斗人员”或“非法非战斗人员”概念，拒绝给予被抓获并在无证据情况下被无限期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监狱的塔利班分子最基本的辩护权利。而把他们关押在关塔那摩的目的就是不给他们在美国求助司法的权利。2002年6月19日，人权观察组织执行官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小布什政府把在阿富汗抓获的囚犯抛弃在一个“法律黑洞”中。[2]五角大楼代表以拉姆斯菲尔德的名义在联邦上诉法院第四巡回审判厅做出以下规定：

> 军人有权抓捕和拘留被确定为与我们国家正在打击的敌对势力有牵连的敌方战士，包括声称是美国公民的敌方战士。此外，这些战士

无权通过辩护人对关押他们提出挑战。[3]

这一决定无异于确立一个国际军事独裁政权，如同在美国帮助下拉美和其他地区所建立的各种独裁政权。小布什政府与以往几乎所有民主党或共和党政府一样，极端藐视民主政体，这一事实在委内瑞拉暴露无遗。美国通过国会设立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为包括委内瑞拉劳工联盟在内的反对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总统的美国和委内瑞拉组织筹得数十万美元资金。国会把用于委内瑞拉的预算提高到877 000美元。[4]当加拉加斯局势恶化后，这一资金增加了四倍。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5]人员与委内瑞拉军人、委最主要企业组织工业商业协会联合会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联手，把一次小规模罢工演变成一场反对由查韦斯任命的委国营石油公司领导成员的抗议行动，致使石油生产陷于瘫痪，其目的是动摇政府的统治。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额占全国总出口额的80%，在美国石油进口量中，委内瑞拉占15%。

美国不仅支持一些军人在2002年4月11晚至12日发动推翻查韦斯的政变，还向他们提供了资金。美国军人为行动的实施提供了直接帮助，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武官罗纳德·麦卡门（Ronald MacCammon）及其助手詹姆斯·罗杰斯（James Rogers）中校在委首都主要军事机构蒂乌纳堡陆军司令部为那些不服从查韦斯的将军们出谋划策，这些将军解除了查韦斯的总统职务。[6]美国的卷入很快暴露。3月9日上任的美驻加拉加斯大使查尔斯·夏皮罗（Charles Shapiro）以拜会出任委内瑞拉总统的工业商业协会联合会主席佩德罗·卡莫纳（Pedro Carmona）的形式，默认了新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很快于4月12日宣布，如果有必要，它愿提供资金帮助委内瑞拉。白宫新闻发言人弗莱舍向新闻界表示，细节尚不清楚，但“我们知道，查韦斯政府支持的行动导致了这场危机”，因为它试图镇压一场和平示威。[7]他不仅没有对推翻一位民选总统的行动进行谴责，反而否认在委内瑞拉发生了军事政变，坚持认为查韦斯应该对自己的下台负责任。[8]但弗莱舍无法否认，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与数位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进行了会晤。他极力开脱，称那些会晤是“外交官正常业务的一部分”[9]。五角大楼的一个消息源也证实，就连拒绝派遣坦克保护观花宫①并宣布查韦斯辞职的委内瑞拉陆军参谋长卢卡斯·林孔（Lucas Romero Rincón）将军也曾于2001年12月18日与美国国防部长副助理罗杰·莫勒（Roger

① 委内瑞拉总统府。——译者注

Pardo-Maurer）会晤。莫勒告诉他，美国“明确”不会接受“政变或违宪行动”[10]。4月12日当日，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奥托·赖克（Otto J. Reich）打电话给卡莫纳，向他表明小布什政府希望他“尽早和迅速”取代查韦斯和“表面上保持民主延续”的意愿。[11]因此，政变必须保持在宪法范围内。正因为如此，委内瑞拉才制造了查韦斯辞职的假象，以便使“巧言否认”成为可能，即令人信服地否认美国的同谋。小布什政府官员很快把查韦斯辞去委内瑞拉总统职位的消息通知了国会。议员们非但没有谴责该事件对宪法秩序的破坏，相反却将其当作民主的胜利。

美籍古巴人赖克肯定在背后操纵了这一“肮脏阴谋”[12]。但由于美洲国家组织所接受的《美洲民主宪章》谴责以任何形式破坏法律，因此，美国国务院官员菲力普·契克拉（Phillip Chicola）4月12日要求政变分子根据宪法章程实行过渡，议会和最高法院必须批准查韦斯的辞职[13]，由卡莫纳取而代之，并在合理日期内，在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监督下进行新的选举。[14]但是，在海军少将卡洛斯·塔马约（Carlos Molina Tamayo）和亿万富翁伊萨克·莱高[15]（Isaac Peréz Recau）为代表的主业会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影响下，卡莫纳签署了一项法令，为自己保留了罢免通过选举产生的省长和市长的权力，并废除了2000年12月全民公决通过的宪法。他还解散议会，承诺在一年内举行“自由和民主”选举。此外，他在执政的很短时间内，还废除了查韦斯政府合法批准的经济和社会法律，并中止向古巴供应石油。他所采取的最后一项措施是为了满足赖克的利益。赖克班子由居住在迈阿密的美籍古巴极端分子组成。[16]在得知议会、最高法院和选举法院被关闭等措施后，赖克指示夏皮罗大使向卡莫纳表达他对这些带明显政变特点的“违宪行动”的担忧。[17]他还亲自给卡莫纳打电话，劝告他不要解散议会，因为那将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并将招致怨言。[18]

卡莫纳在反对查韦斯的最极端分子怂恿下采取了草率行动，他撕掉了美国试图掩盖政变的法律外衣。这一激进做法使下令扣押查韦斯的武装部队司令埃弗拉因·瓦斯克斯（Efraín Vásquez）感到恐慌，他撤销了军队对政变的支持。他对前内政和司法部长路易斯·米基莱纳（Luis Miquilena）说：“我退出游戏。”他承认，让自己被一个要把国家引向流血冲突的人所左右是一个错误。[19]卡莫纳采取的各种措施并未征求委内瑞拉劳工联盟的意见。该组织感到卡莫纳背叛了他们，其秘书长卡洛斯·奥尔特加（Carlos Ortega）声称，这些做法侵犯“工人运动的权利和自由”。于是，劳工联盟与工业商业协会联合会的同盟关系破裂。支持查韦斯的贫困民众占领了加拉加斯大街并哄抢商店，动荡向瓜雷纳斯、洛斯特克斯、科洛和

马拉凯等地蔓延。与此同时，由劳尔·鲍德尔（Raúl Baudel）将军统率的伞兵旅等部队起而反对卡莫纳的“事实”政府。议会领袖威廉·拉腊（William Lara）在观花宫宣布，在查韦斯返回前，副总统迪奥斯达多·卡维略（Diosdado Cabello）将代理总统。

企业家和军人之间的同盟难以支撑卡莫纳政府，因为，假如它代表企业界，就难以迎合武装部队。2002 年 4 月 11 日发生的是仅仅得到中产阶层和最富有阶层支持的政变，它未取得成功还因为，尽管它得到美国支持，但国际社会强烈反对承认政变领导人。由拉美国家组成的里约集团成员国主席当时正在哥斯达黎加开会，该组织立即对委内瑞拉破坏宪政秩序的行为予以谴责，要求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塞萨尔·加维里亚（César Gavíria）大使根据 2001 年 9 月 11 日全会通过的作为对 1991 年 1080 号决议[20]补充的《美洲民主宪章》第 20 条[21]紧急召集常设理事会会议。各成员国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委内瑞拉宪政秩序的改变”。只是在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内的本地区所有国家作出反应情况下，美国代表团才被迫签署谴责委内瑞拉发生的违反法律和破坏宪政秩序做法的动议。直到 4 月 13 日它才这样做，当时，民众示威游行已迫使卡莫纳辞职，查韦斯重掌政权。[22]

美国尽管支持了委内瑞拉军事政变，但它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条件使其合法化。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查韦斯总统的返回让华盛顿显得十分愚蠢”。加拉加斯政变失败使小布什政府甚至失掉了荒唐的概念。赖斯恬不知耻地警告查韦斯应该尊重宪法程序并接受人民传递给他的信息，即“他自己的警察不是在为委内瑞拉人民服务，却以高压手段对付他们”[23]。她的意思是，流产政变对查韦斯来说应该是一个警告，因为他的政策令美国感到不快。几天后，小布什本人也宣称，查韦斯应该学习一下民主课程[24]，也就是说，民主仅仅只是美国所认可的东西。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拉美专家赖尔登·罗特（Riordan Roett）教授对小布什及其政府的态度予以抨击：“美国不能对它所要支持的和不支持的民主进行选择。”他认为，“要么你就支持民主，要么就不支持”。《纽约时报》记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指出，这一事件中最负面的成分是对美国民主原则的背叛。因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概念不应该带有“只需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的限定词。[25]美国对拉美的政策从来不曾与它所声称的民主原则相一致，民主原则往往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仅仅是为了修辞效果。对委内瑞拉政变心照不宣的支持再次表明，华盛顿仅仅承认和尊重拉美国家中那些对其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有利的民主政权。

美国放弃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查韦斯的企图很可能是因为担心委内瑞拉发生内战。委内瑞拉是美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国之一。在准备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之际，使局势恶化，影响石油生产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假如这两个国家都发生武装冲突，国际石油价格就会暴涨，这将影响到美国消费者。当时，阿富汗一半领土已处于由反塔利班部落组成的北方联盟和美军控制之下。拥有大量美元并在库尔德人中拥有内线的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突击队已在伊拉克开展行动。与此同时，美国空军使用冷战时期研制的 B-2 和 B-1 轰炸机，在雷达探测范围外飞行，协同英国战机进行精确打击，其目的是摧毁伊拉克军事设施，削弱“禁飞区”沿线的航空和通信体系。小布什政府在媒体支持下，继续操纵舆论妖魔化萨达姆，以便为发动蓄谋已久的伊拉克战争营造一个有利气氛。

小布什的借口是，萨达姆拥有化学和生物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未按照安理会决议允许联合国检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进行突击性核查，该委员会是因为 1998 年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中有大量中央情报局间谍而被从伊拉克驱逐后设立的。但是，当禁止化学武器组织[26]主席巴西大使若泽·布斯塔尼（José Maurício Bustani）为打破僵局，试图说服伊拉克加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并让其接受一个独立核查小组时，华盛顿指责他对联合国和伊拉克之间的谈判进行了不恰当干预，并无视美国在一个关于“9·11”恐怖袭击文件中的合作。美国在征得巴西外长塞尔索·拉费尔（Celso Lafer）同意后，非法免去了布斯塔尼的职务。2000 年获得连任的布斯塔尼，任期尚余大半。

联合国检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执行主席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认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拥有“大批有经验的化学武器核查人员，没有其他国际组织在生物武器和导弹领域培训过如此经验丰富的核查人员”[27]。但很显然，在伊拉克进行认真核查或通过外交途径打破与萨达姆的僵局并非小布什政府所愿意看到的，因为那将消除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主要借口。20 世纪 90 年代，美英两国非法对伊拉克进行不断轰炸，侵犯其领空多达 15 万次。[28]解除布斯塔尼职务是小布什政府侵犯多边组织的一部分，目的是对其实行控制，使其失去自主权而成为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一个简单机构。美国宣布将废除与俄罗斯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撤销美国在建立用于审判战争罪的国际刑事法庭条约中的签字，并将废除《京都议定书》。小布什政府还反对科学家罗伯特·沃特森（Robert Watson）继续担任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气象组织建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

会主席。该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负责评估对理解气候变化来说较重要的科技和社会经济信息、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以及适应和减缓它的各种选择。在迫使布斯塔尼下台三天前，为满足埃克森美孚的要求，美国于4月19日强行让印度经济学家拉津德·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取代沃特森。[29]此前，小布什拒绝了沃特森得出的结论。沃特森认为，人类是地球变暖的罪魁祸首。2002年9月13日，美国支持提名巴西人塞尔吉奥·梅洛（Sérgio Vieira de Mello）取代玛丽·鲁宾逊夫人（Mary Robinson）担任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一职，原因是她对被关押在关塔那摩集中营的战争囚犯的状况提出了批评。

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署和其他多边机构的侵犯，是美国为强加其意愿和巩固其霸权所发动攻势的一部分，反映了其国际政策中潜在的单边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在苏联解体后日趋明显。美国认为，在一个单极体系中，需要的已不再是同盟，而是服从者。克林顿用“肯定性多边主义”外衣加以掩盖。小布什在“新保守派”必胜信念的左右下，选择了“肯定性民族主义”，即全球性单边主义。[30]他认为，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应该单独承担和行使国际决定权。“新美国世纪计划”发起人和参与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研究员和“美国领导精英”项目负责人罗伯特·卡根承认，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欧洲相反，在对待世界其他地区态度上变得更加单边化，而欧洲则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国际法律体系，其目的恰恰是为了遏制单边主义。[31]卡根承认，“‘9·11’没有使美国发生改变，它只是变得更加自我”[32]。

事实上，“9·11”悲剧催化了切尼和赖斯的“肯定性民族主义”、沃尔福威茨和珀尔所代表的福音教右翼新保守主义和犹太原教旨主义。他们认为，在扫清苏联这一障碍后，美国应凭借武力向所有国家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强加其经济和政治生活方式。2002年9月，德国前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harping）（社民党）表示，小布什准备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取悦于“强大，也许是非常强大的犹太院外活动集团”[33]，他这么说并非出于反犹太主义。《纽约时报》重要撰稿人莫琳·多德（Maureen Dowd）写道，小布什认为，把伊拉克从萨达姆手中解放出来“将是走向中东和平路线图的第一步，同样还能为以色列带来更大安全”[34]。这一理解是正确的。强烈要求开战的沃尔福威茨和珀尔是犹太院外活动集团的代表，反映了以色列的利益，该院外活动集团一直将伊拉克视为威胁其在中东主导地位的首要敌人。利库德集团沙龙将军当选以色列总理密切了特拉维夫与华盛顿的关系。面对巴勒斯坦人通过“人肉炸弹”发动新的起

义，他积极支持反恐战争，将恐怖行动当作残酷镇压的理由。小布什同样支持沙龙，他反感阿拉法特，称其“无足轻重”。小布什和沙龙结成了联合阵线。但华盛顿已对“和平路线图”做出承诺。该计划包括为实现和平和建立巴勒斯坦国将要进行的不同阶段谈判，以及巴勒斯坦当局和以色列所要采取的措施，它由以“四方”著称的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提出。夏兰斯基请求沙龙予以拒绝[35]，理由是这一计划与小布什的立场对立。2002 年 6 月 24 日，小布什指责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支持恐怖主义，劝告“巴勒斯坦人民选举不向恐怖妥协的新领导人”，并“建立一个基于包容和自由基础的实用民主”[36]。夏兰斯基写道：“‘路线图’是小布什之声，却出自奥斯陆之手。”[37]但与工党结成全国团结联盟的沙龙内阁认为，没有理由就初步方案与小布什政府引发紧张气氛，因为“路线图”可能会自行死亡。[38]事实上，不管是以夏兰斯基作为主要代表的以色列极右翼，还是哈马斯这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都无意达成任何会促使双方做出让步的协议。正如莫琳·多德所言，“路线图”被推翻了，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协议仍遥不可及。美国在忽略阿拉法特的存在长达一年多后，开始悲凄地呼吁他使用手中权力支持谈判。[39]

由“新保守派”提出并被小布什采纳的方针基于《防务计划指南》而作出，它表明了美国的傲慢和帝国主义霸权，使植根于过去的政策极端化。这一政策的历史根源可至少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当时，美国入侵墨西哥并占据其一半领土。美国无法容忍任何全球性或地区性对手的出现，它有权抢先用军事手段消灭任何可能对其构成危险的国家（“先发制人”）。只有美国的主权是神圣的，不受国际法约束，而其他任何国家的主权都要承受美国“先发制人”的危险。[40]小布什没有克林顿那样的教养，是一个粗俗之徒，他毫无顾忌地藐视或公然违反国际法规章和公约。[41]他身上带着西部文化的烙印，在那里，使用手枪和猎枪解决争斗深深植根于当地的法理学中。与其父亲相比，他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得克萨斯人。他毫不犹豫地把美国引向“流氓超级大国”的境地[42]，即一个游离于法律之外、不负责任的超帝国主义国家。2002 年 6 月 1 日，他在西点军校向学员发表讲话时，宣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由“先发制人”取代“遏制和威慑”，即提前实施打击，如有必要，就对恐怖主义组织或被视为威胁的国家采取单边行动。

这一方针推翻了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基石。国际法规定，武力只能用来自卫，所面临的必须是真正的而不是潜在的威胁，武力不能作为预防性和提前行动。小布什宣称，“不可能以防御姿态赢得反恐战争”[43]。这表明

他希望发动一场持久的战争，其目的是维持、扩大和巩固美国对所有地区的霸权，实行“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并鼓励“各大陆自由、开放的社会”[44]。他毫不含糊地表示，“自由的要求完全适用于非洲、拉美和整个伊斯兰世界”[45]。

这样，美国在被称为“肯定性民族主义者”或“民主帝国主义者”的“新保守派”政府领导下，决定单方面废除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的国家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出于为企图发动的战争找到理由的目的，小布什在2002年9月17日公布的长达33页的文件《美利坚合众国的国际安全战略》[46]中正式批准了“先发制人”战略。

小布什宣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让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人都感到吃惊。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卡根所言不无道理。他说，小布什仅仅是重申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奉行的以推广民主为目的的政策，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等其他总统也同样对此大肆宣扬。[47]宣扬美国作为具有统治力的国家，并强大到其他任何国家不敢挑战其霸权的意图，只是其国防预算和军事能力战略规划中没有明说的一个先决条件的公开表述。卡根认为，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政策不管好坏，都是基于美国是“不可或缺国家”的共同假设。[48]美国人试图捍卫“自由的国际秩序”，但美国人能够想象的“唯一稳定和成功的秩序”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卡根写道：“美国人无法想象一个不是被权力尤其是美国权力所捍卫的国际秩序。”他还进一步说：“如果说这就是傲慢，至少它不是新的傲慢。”[49]

这一傲慢确实不是新的，美国的意图也并非新的。伍德罗·威尔逊要“让民主感到安全”，并教导中美洲人民要推举“好人”。其他总统如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里根也说过同样的话。与此同时，他们却推行战争、“隐蔽行动”和国家恐怖主义，并在第三世界建立和支持军事独裁政府。尽管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把军事力量用于防御而是进攻、不用于守卫本国疆界而是向各个大陆扩张的国家，但没有任何一位总统胆敢宣称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建立全球独裁，使自己成为超帝国主义，也没有一位总统胆敢提出“先发制人”的战略，以免让苏联也有理由认为拥有相同权力。在那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演变为肯尼迪提出的“遏制和威慑”政策。肯尼迪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决定不轰炸古巴，是因为那样做肯定会破坏大西洋联盟，而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对是否一定能摧毁那里的所有报复性力量并没有把握。古巴岛上只要还剩一枚火箭，就能够向美国发射，进而引发核战争。[50]肯尼迪不愿承担这一风险，哪怕是再小

的风险，美国也难以承受，因为，那将意味着社会的彻底毁灭，进而导致文明的毁灭。[51]

小布什利用基于“先发制人”方针的国家安全战略使美国对世界的“全方位主导”合理化，其目的是克服资本主义国际化或全球化的根本矛盾，也就是克服自身经济的世界性规模与各民族国家对特定领土拥有主权这一严格地缘限制之间的矛盾。在整个20世纪中，美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通过以石油为主的进出口链（其日消耗石油的50%依靠进口）与美国国内生产过程和保持社会福利所依赖的世界市场交织在一起。美国贸易长期赤字，高达约4 000亿美元，它只能依靠金融流，也就是通过外国资金的流入以及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所汇回的利润、特许权使用费和债务偿还等获得资金。在这种情况下，由小布什执掌的极右翼政府企图使美国成为一个无疆界的全球性国家，实施世界独裁，即“全方位主导”，以便塑造和统治一个包括一些不可信任的“流氓国家”在内的众多国家组成的体系，并保证没有一个国家能上升为全球或地区性强国而胆敢挑战它的实力。这一超帝国主义战略造就了被称为“无限正义行动”的“反恐战争”理论，即一场无时间和无目的限制的战争[52]，也就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称的“永久战争”。他称之为“一个全人类的普遍倾向，那就是永不停息地追逐权力的愿望，直至死亡”[53]。

永久战争状态，即无止境战争，是美国的根本需要，不仅是经济需要，也是政治需要。美国经济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工产品和电子、数字等高技术工业。美国政府是最大消费者。通过飞机、导弹、坦克、大炮、步枪、冲锋枪、炸弹和其他军需品或两用产品订单的更新，巨额国防预算被用来维持这些公司的运营。因此，战争来自美国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能帮助其实现新陈代谢，并向众多国家出口武器，以保证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主导地位，进而建立保护国。这些附庸国有可能成为部队供应者，这样就能保全美国“男孩”的性命。与承诺不派本国士兵去国外参战的罗斯福和约翰逊一样，小布什也在2002年3月11日宣称：“我们不会派遣美国部队去参加每一场战役，但美国将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应对未来战役。”[54]

小布什利用“9·11”恐怖袭击所造成的创伤向国会施压，以便进一步提高五角大楼的预算。在起始于2002年10月1日的2003财政年度中，五角大楼预算从前一年的3 310亿美元提高到3 786亿美元。每个月的反恐支出就高达18亿美元。但军费并不仅仅限于五角大楼，另有164亿美元被拨给了能源部的核武器计划，14亿被用于与其他机构有关的军事活动，还

有 38 亿为对外军援和在其他国家进行的培训开支。这使得军费开支总额达 4 002 亿美元，相当于 2003 年提出的 2.1 万亿美元总预算的 19%。

2003 财政年度国防预算 单位：亿美元

国防部	3 786
能源部（核武器计划）	164
与其他机构有关的军事活动	14
对外军援和培训	38
合计	4 002

资料来源：Departamento de Defesa。

这样，不考虑对外军援费用，国防开支逐步从 2000 年的 3 299 亿美元提高到 2001 年的 3 464 亿、2002 年的 3 585 亿和 2003 年的 3 968 亿。小布什要求的 2003 财政年度军费预算大约为二战期间总费用的 75%。[55]

美国所参与的一些战争的费用[56]

越南战争	1 215 亿美元
内战	80 亿美元
独立战争	1 240 亿美元
朝鲜战争	700 亿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	660 亿美元

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军工集团向政府施加不恰当影响的警告是完全有道理的。他指出，权力错位灾难性增加的趋势一直存在，而且仍将继续存在。他劝告美国人不能让军事和工业两者的结合威胁自由和民主进程。[57]但他的警告没有产生任何效应，商人和投机分子充斥了国防部。美国把战争当作治愈不良经济的药方，20 世纪 30 年代罗斯福和希特勒用来摆脱经济危机的模式被进一步深化。似乎认为美国整体军事实力还不够，五角大楼还制定了针对至少七个国家的预防性使用核武器应急计划，它们是中国、俄罗斯、伊拉克、朝鲜、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58]，其中五国并不拥有核武器。[59]《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假如其他任何国家计划发展新的核武器并有可能对一系列非核国家进行预防性打击，华盛顿肯定会将其定性为“危险的流氓国家”[60]。正因为如此，核时代和平基金会主席戴维·克里格（David Krieger）警告说，人类的未来和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所有国家和人民起来制止这一“流氓超级大国”[61]。

小布什和鹰派“新保守派”集团成为亨廷顿所称的“流氓超级大国”的最好范例[62]，或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超级大国”，它违反各种国际法规。根据能源与环境协会和核政策律师委员会 2002 年 4 月发

表的研究报告，这一趋势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呈上升趋势，小布什上台后更明显加速。它不遵守各种协定，包括《核武器不扩散条约》[63]，并在阿富汗使用特定公约禁止的致命武器，如足以灭绝区域内所有生物的 1 000 磅超级炸弹、贫铀弹和其他能够穿透岩洞并对环境造成巨大危害的炸弹。[64]

尽力避免本国部队伤亡并不是出于对士兵生命的关爱，更主要是担心人员伤亡会在美国国内导致诸如越战期间所发生的舆论喧哗。并不只是成千上万的外国平民，美国本国士兵也深受贫铀弹之害，其放射性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参加 1991 年海湾战争的 580 400 名美国士兵中，有 11 000 人受贫铀辐射陆续死亡。永久伤残士兵数目至 2000 年已达 325 000，占总人数的 56%，而二战和越战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5%和 10%。

纽约“老兵宪法”组织执行主任阿瑟·贝恩克劳（Arthur N. Bernklau）在《预防性精神病电子杂志》第 169 期中指出，著名科学家雷乌伦·莫雷（Leuren Moret）认为，美国军队所使用的贫铀弹是“海湾战争综合征”的决定性原因。他指出，使成千上万士兵患病并导致许多人死亡的疾病已得到确认并公之于众。[65]美国军队使用这种弹药的罪恶行动还对环境的化学放射性影响和诱导有机体突变的水平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66]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和 2003 年再次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美国投放贫铀炸弹所产生的放射性危害可与一场核战争相提并论。小布什重启核试验、研制以“手术式”使用为目的的新一代小型炸弹并把非核国家作为攻击目标的态度，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他所领导的美国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

【注解】

[1]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Washington.

[2] Roth Kenneth. “America's Guilt: the Prisoners in a Legal”. *The Times*, 21/11/2003.

[3] No. 02-6895.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ourth Circuit Yaser Esam Hamdi, et al., Petitioners-Appellees v. Donald Rumsfeld, et al., Respondents-Appellants. On Appeal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Virginia—Brief for Respondents-Appellants Paul J. McNulty, United States Attorney; Paul D. Clement, Deputy Solicitor General; Alice S. Fisher,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Gregory G. Garre, Assistant to the Solicitor General; Lawrence R. Leonard, Managing 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950 Pennsylvania Avenue, N. W. Washington, D. C. 205300001. Vide também Johnson, 2004, p. 293.

[4] Marquis, Christopher. "U. S. Bankrolling Is Under Scrutiny for Ties to Chávez Ouster". *The New York Times*, 25/04/2002. Mahajan, 2003, pp. 70–71.

[5] 国防情报局为美国陆军情报机构。

[6] "Denúncia liga EUA a golpistas—Adido acusado de articulação anti-Chávez". *Jornal do Brasil*, Rio de Janeiro, 19/4/2002. "La crisis en Venezuela: revelaciónes en Caracas implican a oficiales de EE. UU. en el golpe contra Chávez". *La Nación*, Buenos Aires, 23/4/2002. Campbell, Duncan. "Amer ican navy 'helped Venezuelan coup'", *The Guardian*, Londres, 29/4/2002.

[7] Forero, Juan . "Venezuela's Chief Forced to Resign; Civilian Installed". *The New York Times*, 13/4/2002.

[8] "*We explicitly told opposition leader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support a coup. Many of these conversations took place at repeated numbers of levels throughout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NSC, as well in conversations that newly appointed Ambassador Charles Shapiro and former Ambassador Hrinak had with officials in Venezuela.*"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racas, Venezuela—Public Affairs Office—Press Release—White House Report: Venezuela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Ari Fleischer briefed midday), 16 April 2002. "对查韦斯越来越反民主政权的长期不满导致数十万人于4月11日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进行和平示威。"——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新闻文化处新闻公报。"一些高级官员称，美国对委内瑞拉危机的反应是适当的(最初反应是基于所拥有的最佳信息)。"——新闻社编辑劳伦·蒙森(Lauren Monsen) 2002年4月19日发自华盛顿。

[9] DeYoung, Karen. "U. S. Details Talks with Opposition—Administration Insists It Did Not Encourage a Coup". *The Washington Post*, 17/4/2002.

[10] Ibid.

[11] Marquis, Christopher. "U. S. Cautioned Leader of Plot Against Chávez". *The New York Times*, 17/04/2002.

[12]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is Restored" —Analysis by Alex Volberding and Larry Birns, COHA research group.

[13] 4月12日(周五)当天，国务院律师们在研究委内瑞拉宪法后意识到，共和国总统辞职只有在国会批准后才能生效，国会有权任命新的政府首脑。

[14] Dossier Documental Crisis en Venezuela—El Golpe Que No Tumbó A Chávez—http://www. elpais. es/temas/dossieres/crisisvenezuela/posturaeeuu. html.

[15] 种种迹象表明，32岁的亿万富翁伊萨克·莱高是幕后操纵者，他向卡莫纳提交了所有部长的名字。他们都是从Venoco的经理和主业会成员中选出的，另有一位他参股的企业的代表。莱高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创始人之一胡安·阿方索(Juan Pablo Pérez Alfonso)的侄子。阿方索还是石化公司Venoco的最大股东。查韦斯1999年上台后，该公司丢掉了多项合同。

[16] 被小布什任命为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赖克成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主

要协调人。1983—1986年间，这位流亡美国并加入美国籍的古巴人出任拉美和加勒比公共外交局局长。该机构负责执行里根政府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推翻桑地诺政权的秘密项目，并从事了大量违法行为。1989—1994年，在老布什政府期间，赖克被任命为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他一直与那里保持密切联系。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里诺·古铁雷斯（Lino Gutierrez）是另一位美籍古巴人，曾任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埃米里奥·冈萨雷斯（Também Emílio González）也是美籍古巴人，负责包括古巴在内的加勒比问题。另一位美籍古巴人何塞·卡尔德纳斯（José Cardenas）被指派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共和党小组中处理拉美事务。此前，他曾作为古美全国基金会成员为该委员会工作，其任务是就保持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向委员会施压。国防部长助理罗赫里奥·帕尔多-毛莱尔（Rogelio Pardo-Maurer）曾作为查莫罗政府代表出任尼加拉瓜驻华盛顿大使。1986—1989年，他领导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小组从事推翻桑地诺政权的游击战。里根政府向其提供了秘密资金。

[17] DeYoung, Karen. "Bush Officials Defend Their Actions on Venezuela". *The Washington Post*, 18/4/2002.

[18] Marquis, Christopher. "U. S. Cautioned Leader of Plot Against Chávez". *The New York Times*, 17/4/2002.

[19] Aznárez, Juan Jesús. "Crisis en Venezuela: por qué fracasó el golpe". *El País*, Madri, 18/4/2002.

[20] 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2000年1月21日举行的特别会议纪要。美洲国家组织通过AG/RES. 1080（XXI-O/91）决议，建立了一个帮助代表性民主中断的地区恢复民主的机制。该决议在1991年6月5日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五次全会上通过。

[21]《美洲民主宪章》第20条规定，"当一个国家发生的宪政秩序改变严重影响其民主秩序时，任何成员国或秘书长都可要求立即召集常设理事会对形式进行集体评估并做出适当决定"。

[22] Marquis, Christopher. "U. S. Cautioned Leader of Plot Against Chávez". *The New York Times*, 17/4/2002.

[23] Thompson, Ginger & Forero, Juan. "Ardent Populists Reinstate Leader to Run Venezuela". *The New York Times*, 15/4/2002.

[24] 小布什称，对查韦斯来说，接受那些机构非常重要，它们对民主关系重要。他同样应接受新闻自由和反对派表达自由。DeYoung, Karen. "Chavez Must 'Embrace' Democracy, Bush Says". *The Washington Post*, 19/4/2002.

[25] "的确，这一事件中最负面的成分是对我们民主原则的背叛。'民有、民治、民享'不应被期望为'只需符合美国的利益'。" Krugman, Paul. "Losing Latin America". *The New York Times*, 16/4/2002.

[26]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是一个1997年创建的国际组织，隶属联合国，其目的是实施《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但其职责分工并不对称，美国这样的军事大国在裁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和防止其扩散方面所承担的义务与其他国家一样。该机构总部设在海牙。禁止化

学武器组织对145个公约签署国进行定期核查，检查各国的化学品工厂是否用于和平目的。但美国以保护工业秘密为由，不允许该组织核查人员进入一些特定生产领域。当布斯塔尼大使要求对这些领域进行核查时，就产生了与美国人的分歧。

[27] United Nations—UNMOVIC—United Nations Monitoring, Verifications and Inspections Commission. Introduction of the draft UNMOVIC Work Programme, 19 March 2003. Executive Chairman Dr. Hans Blix. Security Council 19 March 2003.

[28] Woodward, 2004, p. 10.

[29] "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达成了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的一个因素的共识。但小布什政府对此并不认同。埃克森美孚公司在一份被泄露的备忘录中事先询问过白宫：'美国能否现在就要求撤换沃特森?'该备忘录还要求小布什政府'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对美国的参会人数做出调整，以保证没有一位克林顿和戈尔政府的支持者参与任何决策'。从表面看，政府注意到了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提议。帕乔里本人把选择他担任委员会主席归因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但环境非政府组织则认为，这是美国院外活动的结果。"由埃克森美孚顾问阿瑟·伦多尔(Arthur G. Randon III)签署的备忘录被交给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的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这一文件是基于《自由信息法案》于2001年获得的，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将其公开。该备忘录提议由一位更亲近该公司的人士取代沃特森。"Why do they hate Exxon?". *The Daily Telegraph*, 19/5/2002. BBC News—Friday, 19 April, 2002, 16:36 GMT 17:36 UK.. Vide também Williams, Ian. "The U. S. Hit List at the United Nation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Global Affairs Commentary—April 30, 2002. Bennis, 2003, p. 198.

[30] Kupchan, 2002, pp. 15-16.

[31] Kagan, 2003, pp. 14-16.

[32] Id., ibid., p. 85.

[33] Safire, William. "The German Problem". *The New York Times*, 19/9/2002.

[34] Dowd, Maureen. "Empire of Novices". *The New York Times*, 3/3/2003.

[35] Sharansky, 2004, pp. 242-241.

[36] President Bush Calls for New Palestinian Leadership. The Rose Garden, 3:47 P. M. For Immediate Relea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une 24, 2002.

[37] Sharansky, 2004, pp. 252-253.

[38] Id., ibid., p. 252.

[39] Dowd, Maureen. "Empire of Novices". *The New York Times*, 3/3/2003.

[40] Soros, George. "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anuary 2004. http://www.ciaonet.org/wps/sog01/.

[41] Batista Jr., Paulo Nogueira. "Tempestade de Aço". *Folha de S. Paulo*, 20/3/2003.

[42] "America as Nuclear Rogue". *The New York Times*, 12/3/2002.

[43] Allen, Mike & DeYoung, Karen. "Bush: U. S. Will Strike First at Ene-

mies". *The Washington Post*, 2/6/2002.

[44] Ibid.

[45] Ibid.

[46] The White House—President George W. Bus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 September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47] Kagan, 2003, p. 3.

[48] Id., ibid., pp. 93-94.

[49] Id., ibid., p. 94.

[50] May & Zelikow, 1997, pp. 196, 205-206, 230, 261-262. Moniz Bandeira, 1998, pp. 453-456.

[51] Kissinger, 1994, p. 586.

[52] 关于这一主题，可参阅 Wood, 2003, pp. 159-163。

[53] Hobbes, 2002, pp. 70, 149. A ortografia é mantida como no original, o inglês do século XVII.

[54] Apud Jonson, 2004, p. 133.

[55] National Defense Budget Estimates for FY 2003.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omptroller), March 2002. http://www.defenselink.mil/comptroller/defbudget/fy2003/fy2003_greenbook.pdf.

[56] 上表中未包含美西战争（1898 年）和菲律宾战争（1898—1906 年）的开支。

[57]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Farewell Address, January 17, 1961.

[58] Schweid, Barry. "Pentagon Details Nuclear Plans". *Los Angeles Times*, 9/3/2002.

[59] "Bush Developing Military Policy Of Striking First—New Doctrine Addresses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Post*, 10/6/2002.

[60] "America as Nuclear Rogue". *The New York Times*, 12/3/2002, Late Edition—Final, seção A, p. 26, Coluna 1.

[61] Krieger, David. "Stopping a Rogue Superpower: Time Is Running Out" — Nuclear Age Peace Foundation. http://www.wagingpeace.org/articles/02.03/0315kriegerstopping.htm.

[62] Huntington, Samuel.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 apud Chomsky, 2000, p. 47.

[63] Deller, Nicolle; Arjuns, Makhijani & Burroughs, John. "Rule of Power or the Rule of Law? An Assessment of U. S. Polices and Actions Regarding Security-Related Treaties",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the Lawyers' Committee on Nuclear Policy. April 4, 2002. html http://www.ieer.org/reports/treaties/fullrpt.pdf.

[64] "在先前的伊拉克和南斯拉夫，也有可能令人回想起，北约的战机可能将手

无寸铁的贫民视为等同于工厂、广播中心和桥梁的目标，以便打击整个国家民众的士气和对手的抵抗能力。针对南斯拉夫所使用的以摧毁电力输送为目的的最新研制的石墨炸弹，根据国际法也绝对值得商榷。" Macieira, Flávio Helmold. "The ro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following events: The terrorist attacks of 11th September; The current War in Afghanistan; and Ireland's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Manuscript.

[65] Nichols, Bob. "11,000 US Soldiers Now Dead From DU Poisoning Heads roll at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Mushrooming depleted uranium (DU) scandal blamed". Project Censored Award Winner—SF Bay View Global Research. ca 2-28-5 http://www.rense.com/general63/11.htm.

[66] Ibid.

第三十四章

朝鲜对小布什威胁所作的反应　对伊战争的目的　媒体和对舆论的操纵　联合国的反应和小布什的舞弊行为　全世界对伊拉克战争的厌恶　占领巴格达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未被发现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

被小布什指责为与伊拉克和伊朗共同组成“邪恶轴心”的朝鲜自然感到威胁，于是就决定发展核武器计划，以便拥有一种威慑手段对付美国可能发动的进攻。据来自华盛顿的信息，平壤政府“高级官员”在私下谈话中透露，朝鲜将重启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计划。小布什趁机中止了1994年在卡特调停下达成的美朝协议，该协议的签署使克林顿得以通过外交手段促使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中止其核计划。作为交换条件，美国答应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铀，并帮助它建设两个用于和平目的的轻水核反应堆，但诺言未被履行。[1]当时，朝鲜已依靠宁边的一个5兆瓦反应堆实现了首批冷铀的装载。假如拥有首批燃料棒，它就将具备制造一枚或二枚核弹的条件。[2]小布什中止克林顿政府达成的协议使该地区的紧张气氛加重，朝鲜和韩国的和平进程中断。此前，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和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平壤实现了历史性会晤，两个政权关系趋近。双方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使离散家庭团聚，投资和开通跨界公路和铁路项目成为可能，这为逐步实现统一开辟了前景。

为回击小布什的行动，平壤政府以生产电力需要为由，正式宣布重启位于平壤以北100公里的宁边核设施，该设施自1994年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3]据2001年6月10日出版的《纽约时报》透露，老布什不得不出面干预“过度”受五角大楼影响的总统儿子的行为，要求他采取温和做法，并重启与朝鲜的对话。[4]爆发战争的可能会导致该地区经济不稳定，威胁到凯雷集团在韩国约1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该集团控制着韩美银行

(KorAm Bank) 及生产机械元件和汽车配件的万都机械株式会社 (Mando Machinery Corporation)。[5]美国对朝鲜采取的强硬态度损害了金大中政府，进而也损害了美国利益。[6]但《纽约时报》2001 年 7 月报道说，老布什曾在电话中对沙特王储阿卜杜勒亲王说，他的儿子是明智的，“会做正确的事情”[7]。

对伊拉克开战的准备已进入后期。“新美国世纪计划”集团在《重建美国防务：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文件中提出的“改变政权”的目的是推翻萨达姆，把伊拉克当作一个试验品，使其具有民主表象，但可通过控制选举程序轻易地对其进行操纵。这样，一个稳定、富裕的伊拉克将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真正样板。小布什政府的目的是重新确定中东战略蓝图，包括控制伊拉克石油，防止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国际交易中弃用美元标准而改用欧元标准。2002 年 11 月，萨达姆政府已采取这一做法，当时，1 欧元相当于 80 美分。因此，当 2002 年美元相对欧盟共同货币贬值约 15% 时，伊拉克未遭受损失。叙利亚将效仿伊拉克做法，伊朗[8]和利比亚会紧随其后。这些都是美国考虑要以某种方式进行干预的国家，干预的动机是巩固它在伊斯兰世界的主导地位，为以色列提供更多安全，并为美国公司招揽大宗生意。为了给打击萨达姆政权找到理由并使这一行动合法化，小布什于 9 月 12 日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并在会上指责萨达姆企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表示：

> 伊拉克政权的行为是对联合国权威和和平的威胁。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伊拉克用违抗来回应联合国的要求。现在，整个世界都面临考验，联合国正经历一个困难和决定性时刻。安理会决议究竟是会得到履行和实施，还是被不顾后果地抛弃？联合国究竟是为其成立的宗旨服务，还是将变得无足轻重？[9]

小布什采取弄虚作假和蒙骗手段，他以傲慢态度向安理会施压，迫使其支持对伊拉克开战，目的是让联合国威信扫地，使它变得无足轻重，这样，美国就能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他威胁说，假如安理会不能通过另外一项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美国将单方面采取行动。这一态度反映了美国极右翼认为安理会是“真正多边秩序勉强到来”的思想。[10]他们藐视联合国，将其看作是一个脆弱、目的不一致和致力于缓和而非消除对和平和安全威胁的机构。[11]在“新保守派”看来，“美国人唯一能够想象的稳定秩序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12]。

约一个月后，2002 年 10 月 10 日，在媒体和政府共同操控的舆论的影响下，美国国会批准了第 114 号决议，以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威胁和平为由，批准“美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13]。小布什在国会宣称，“如果你想保持和平，就必须拥有使用武力的许可”。对他来说，借口是否在理并不重要。他大概与希特勒想法一致，“人们不会在赢得胜利后去追问胜者他是否说了真话”。2002 年 9 月，德国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政府司法部长赫塔·多伊布勒-格梅林（Herta Däuber-Gmelin）将小布什采取的手段与 20 世纪 30 年代二战爆发前希特勒所使用的方法相提并论并非没有道理。虽然二者背景明显不同，用词也不一样，但本质却并无不同。与批准轰炸越南的决定一样，美国国会又一次“并非基于事实的全面展示”就批准了一项决议。虽然，基辛格在备忘录中承认，使决议获得批准的方法“换成今天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民主已得到完善”[14]。

面对美国以萨达姆企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准备入侵伊拉克，金正日推断，朝鲜作为“邪恶轴心”的一部分，将会是下一个牺牲品。他认为，即使销毁武器，放弃生产核武器项目，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也难以避免战争。美国并不是一个可以相信的国家，因为它就连国际公约也不遵守。于是，他就向华盛顿发起挑战，并通过具体行动使冲突升级。2003 年 1—3 月，金正日退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随后又驱逐国际核查人员，拆除国际原子能机构安装的摄像机和其他监视设备。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朝鲜人民军威胁说，假如美国继续在该地区集结武器，如关岛基地的 B-1 和 B-2 轰炸机，并在韩国以东、朝鲜半岛与日本海之间海域试验地对海导弹，它将放弃 1953 年达成的停战协议。金正日准备用“全面战争”这一华盛顿政府唯一能理解的方式保卫自己，朝鲜与美国之间的紧张气氛骤然上升。这一局面令韩国总统金大中倍感恐慌，他转而求助欧盟，希望由它来填平小布什在朝鲜和平进程中所挖的沟壑。据说，接替他的卢武铉总统曾对小布什说过，他宁可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共存，也不愿与美国一起卷入另一场战争。[15]韩国舆论对朝鲜已发生极大变化。在韩国人看来，要是美国不招惹朝鲜，它已不再令人恐惧。韩国民众一直受美国军人在长达 50 年占领中所制造麻烦的困扰，他们不想让自己创造的财富被一个远在白宫的霸道者的狂妄所摧毁。

小布什显然无法接受金正日的傲慢。但他没有选择用军事手段对付朝鲜还有别的重要理由，否则，凯雷集团在韩国的利益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此外，与他清楚地知道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不同，军事手段显然不是对付朝鲜的最好选择。拉姆斯菲尔德的高级军事助理、核潜

艇舰长埃德蒙德·吉巴斯提尼（Edmund P. Giambastiani）中将在提交5027号作战计划这份绝密文件时对他说，在外交和全面战争之间没有中间解决方案，美国可能不得不把保障体系和能力转移到亚洲或中东，并需要保持很长时间。[16]五角大楼还了解到，朝鲜拥有6枚左右核弹头、175～200枚射程达1 300公里并足以打到日本的“劳动”导弹和650～800枚中程“飞毛腿”导弹。这些导弹存放在地下仓库中。[17]朝鲜除了有可能动用核武器来回击美国进攻外，还拥有100万军队和大量大炮拥有1 080万人口的首尔处于这些大炮的射程内。朝鲜自1993—1994年起就威胁说，一旦遭到攻击，它就会把韩国和日本变成一片“火海”。[18]美国在韩国拥有乌山、群山空军基地和龙山陆军基地等101个军事基地、37 605名士兵、2 875名服务于军队的文职人员和7 027名当地雇员。此外，它还在冲绳和日本多个城市拥有38个基地。[19]但朝鲜的军事实力使美国不敢贸然对其发动进攻，战争没有发生是因为金正日拥有自卫手段和条件，尽管采用那些手段可能会让他付出失去政权的代价。小布什别无选择，只能表示，他相信依然存在通过外交手段打破僵局的方案[20]，朝鲜问题已成为一个地区性问题，通过多边论坛、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该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好解决，应该由中国去说服平壤放弃原子弹计划。

与此同时，由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操控的美国媒体继续对萨达姆进行妖魔化，欺骗民众，以便让人们相信他与“9·11”恐怖袭击有牵连。3月17日，小布什在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声称：

> 本政府和别国政府所获得的情报确切地表明，伊拉克政权继续拥有和隐瞒一些最新的致命武器，它已针对伊拉克邻国和伊拉克人民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1]

小布什表示，萨达姆政权“支持、训练和庇护包括‘基地’组织成员在内的恐怖分子”。紧接着，他给美国人民制造了更大恐慌。他声称，恐怖分子会使用“在伊拉克帮助下获得的”化学和生物武器或未来可能获得的核武器，杀死成千上万无辜美国民众，以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一危险显而易见。他还表示，美国拥有“动用武力保证自己国家安全的主权权威”。既然“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履行其责任，我们就应该站出来”。他向伊拉克发出最后通牒：

> 数十年的欺骗和暴行如今该终结了。萨达姆和他的儿子们必须在

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如他们拒绝这样做，将会招致军事打击。我们会确定行动的发起时间。包括记者和核查人员在内的所有外国人应该立即离开伊拉克，以保证自身安全。

他还坚持说：

假如萨达姆试图抓住权力不放，他将始终成为我们的死敌。他和恐怖集团在绝望之中可能会针对美国人民和我们的朋友采取恐怖袭击，袭击并非难以避免，但仍可能发生。正是这一千真万确的事实说明，我们不能生活在受勒索的威胁下。萨达姆被解除武装之时，恐怖分子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就会减少。（……）恐怖分子和恐怖国家不会在正式声明中清楚地说明其威胁，在他们发动第一波袭击后才对这种敌人进行反击并非自卫，而是自杀。维护世界的安全要求现在就解除萨达姆的武装。[22]

小布什的话纯属蛊惑人心的谎言，他用来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战略基于在萨达姆和“9·11”恐怖袭击之间建立一个臆想的关联。[23]美国政府与媒体沆瀣一气，进行了“大规模信息误导”。詹姆斯·班福德评论说：“这就是谎言的力量”。[24]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没有关系，后者是一个宗教组织，属“瓦哈比”极端主义，它也抵制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非宗教政权，视萨达姆为叛教者。参与“9·11”恐怖袭击的主要是沙特人，还有几个埃及人。尽管切尼、拉姆斯菲尔德、道格拉斯·费思（Douglas J. Feith）和珀尔为了给打击萨达姆找到理由，试图把伊拉克与“9·11”事件联系起来，但中央情报局始终不认可，它不认为伊拉克这一非宗教政权会与“基地”组织有任何关系，也不相信萨达姆会向恐怖分子提供支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恐怖主义问题助理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表示，尽管可能会有一些接触，但“基地”组织与拒绝伊斯兰教教法的萨达姆民族主义政权之间不存在合作。本·拉登是萨达姆的天敌，他憎恨萨达姆，视其为“叛逆者”，因为，萨达姆不接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伦敦发行的《阿拉伯耶路撒冷报》编辑巴利·阿特万（Bari Atwan）也持相同观点。[25]只有像小布什这种愚昧无知、居心叵测的人才会那样说。

萨达姆显然也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用来对付美国军队。小布什那

样做仅仅是为发动作为长期反恐战争组成部分的伊拉克战争给本国人民找一个“可用作宣传的理由”，并在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各大洲建立“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即听命并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政权。但不管是德国、法国还是西欧其他各国都清楚小布什在撒谎。这些国家认为，伊拉克并不构成政治和军事威胁。德国社民党政府首脑施罗德和保守的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结成了反战同盟。面对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拉姆斯菲尔德十分傲慢地向记者们宣称：“你们认为欧洲就是德国和法国。我不这么认为，那是从前的欧洲。”[26]拉姆斯菲尔德眼中的新欧洲是那些从苏联集团中分离出来的国家，如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他的这番话使双方分歧变得更为严重。假如美国认为在一个具有封建特征的单极国际秩序中不再需要盟友，而只需要附庸国，那么，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从另一方面削弱了西方工业国卡特尔的凝聚力，它不用再惧怕曾经以合法或非法形式存在于各国的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国家所组成的共产主义阵营。所谓的“国际恐怖主义”并不令德国和法国感到害怕，在这两个国家中生活着数百万穆斯林。它是美国在中东令人窒息的存在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支持以色列所导致的一个现象。美国与欧盟两个主要国家之间原有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小布什所采取的单边、挑衅性政策导致了双方的矛盾，他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并收回了在审判战争罪和其他侵犯人权罪的国际刑事法庭条约中的签字。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冒险甚至未得到北约的支持。

约64%的欧洲人对这一战争予以谴责。土耳其抵御了金钱诱惑，没有允许美国部队在其领土驻扎。虽然在许多国家首都和世界各大城市发生了反战游行，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表示强烈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并未批准，北约内部也没有达成共识，但美国依然和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以及一些依赖于美国并被其收买的东欧小国一起，于2003年3月19日对巴格达发动了空袭。美国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理事会成员、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一位主要助手珀尔[27]发表了一篇题为“为联合国死亡感谢上帝”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萨达姆恐怖政权濒临灭亡，“但它不是独自灭亡，作为临终的讽刺，将捎上联合国”[28]。布利克斯把绰号为“黑暗王子”的珀尔称为“外来超级鹰”。他是犹太院外活动集团的代表，与以色列和美国军工集团利益关系密切。根据他写给武器商阿德南·哈肖吉[29]（Adnan Khashoggi）的函，他是战舰公司（Trireme Partners L. P.）的股东，该公司于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不久在德拉维尔注册，投资方向是与国防有关的技术、产品和

服务。他也是专营情报设备的奥托诺尼公司（Autonomy Corporation）的股东。在撰文就联合国随萨达姆政权垮台而死亡感谢上帝几天后，他因卷入一桩丑闻被迫辞去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职务。环球电信公司向法庭提供的文件显示，该公司曾向珀尔承诺，假如他能从五角大楼得到公司在亚洲寻求投资者的许可，就能获得725 000 美元的佣金。他未能如愿，因为这桩生意将交给与中国大陆有密切联系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30]

与“黑暗王子”的预言相反，联合国没有因为美国未经安理会批准对伊拉克开战的决定而消亡，也没有因此受到削弱，反而是美国在经历了十年胜利后首次遭受政治和道义上的沉重失败。此前，它的所有政策都在未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反对的情况下获得通过。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失败表明，小布什的军事冒险行动得不到世界各国的支持。各种事件进程证明，美国拥有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军事手段，但他并不拥有推行其试图借助武力实施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计划的政治条件。缺乏教养的小布什并不知道拿破仑的外交部长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曾警告过，“你不能用刺刀做的一件事就是坐在刺刀上面”。小布什能够使用精确制导导弹为所欲为，唯独不能坐在它们上面。

4 月 9 日，美军在猛烈空袭之后占领巴格达。它在空袭中使用的制导导弹和贫铀弹造成数千平民丧生，并造成环境和古迹的破坏。在美军打击伊拉克期间，系统呈现在美国社会面前的是一个由媒体制造的人为现实，读者和电视观众所了解到的是官方提供的片面和带有欺骗性的事实，也就是出自五角大楼和在伊拉克的军事指挥官之手的内容。除一些较为独立的撰稿人之外，美国的平面媒体和电视网与越战时期相反，普遍与政府沆瀣一气，掩盖事实，欺骗舆论，其职能不是为民众提供信息，而是让他们得不到真实信息。2003 年 5 月 1 日，身着军装的小布什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和我们的盟友赢得了胜利”。

美军在伊拉克迅速推进并只用 21 天时间就占领巴格达的事实清楚地说明，在联合国安理会实施长达十年的制裁以及战前美英对其防空设施持续非法轰炸后，伊拉克已变得十分脆弱。仅仅在一年时间中（2002 年），美英飞机上万次侵犯伊拉克领空，轰炸其军事基地。在轰炸行动中，美英军队未损失一名飞行员。[31]为满足 2002 年 11 月返回巴格达的联合国、核查委员会主席布利克斯的要求，萨达姆甚至已经从 3 月 3 日开始销毁萨姆导弹。[32]战争所揭示的事实是，伊拉克并不拥有小布什所称的化学和生物武器，否则，它们可被用来抗击美军。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穆罕默德·巴拉

迪（Mohame ElBaradei）之前曾表示，没有发现“可信的迹象”表明伊拉克重启了核计划。[33]

事实上，被小布什用作打击伊拉克的“可用作宣传的理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来未被发现，因为根本就不复存在。助理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本人也在2003年5月28日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承认，因为“官僚政治的原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被选定为入侵伊拉克的理由，因为这是唯一美国国内外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由。[34]当然还有其他的利益和原因。美国只对伊拉克实施了打击，因为知道它不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3年3月3日，也就是小布什下令对伊拉克开战16天前，《新闻周刊》透露，1995年逃亡到约旦的萨达姆女婿卡麦尔·马基德（Hussein Kamel Hassan al-Maji）已告诉中央情报局和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官员，他本人作为该项目负责人，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不久就下令销毁了所有化学、生物武器和导弹。[35]事实上，美英军队占领伊拉克三个月后，由凯斯·代顿（Keith Dayton）上将统率的伊拉克调查小组1 200名核查人员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3年10月，主要核查员戴维·凯（David Kay）将这一信息报告了美国国会各委员会。[36]他后来承认，萨达姆即使在战争之前也不拥有那些武器。“我们所进行的搜查是为了找到真相，并不是去寻找武器。”他在2004年1月25日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周末版》节目中这样表示。他还称：“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发现的事实是，那些武器并不存在。我们必须面对这一差别并弄清原因。”[37]鲍威尔本人也在同一时间被迫承认，战争爆发时，萨达姆并不拥有那些武器。[38]

2004年10月6日，受中央情报局领导的由1 200名核查人员组成的伊拉克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查尔斯·迪尤费尔（Charles Duelfer）公布的报告同样证实，伊拉克已不再拥有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不管是化学武器、细菌武器还是核武器。这份报告是萨达姆被推翻后经过15个月的详尽调查才得出的。[39]那些武器从来未被找到以及所有调查都得出它们根本不存在的同样结论，充分说明小布什撒了谎并伪造了信息。追随他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也采取了同样做法。这样，美国政府在国际上仅剩的一点信誉荡然无存。[40]根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联合进行的调查，即使在美国国内，大多数人也开始认为小布什撒谎或有意夸大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信息，以便证明战争的必要性。[41]记者莫琳·多德指责小布什及其班子把提供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虚假信息的责任推给中央情报局的做法，认为他们在撒谎。她写道：“总统和康迪·赖斯可以推卸责任，将其归咎于乔治·特纳特，但这看上去像是谎言。”

她还指出，除了无数伊拉克人死伤，还有200名美国人死亡（至2003年7月初）和1 000余人受伤。因此，用预防性打击的说法进行欺骗是一种病态做法。[42]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特则进行搪塞，避讳谈及责任。他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所作的报告中表示，分析家们对是否存在化学、生物或核武器有不同看法，“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威胁迫在眉睫”。小布什为了证明战争的必要性曾这样说过。[43]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揭露说，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系统地捏造信息以达到欺骗国会议员和舆论的情况。担当此任的是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费思在五角大楼内部秘密设立的战略影响办公室，该机构以服务美国的事业为借口，散布虚假信息，推行“心理战行动”，与“第三帝国”时期戈培尔执掌的国民宣传和教育部的目的完全相同。美国主要报纸和电视网变成了白宫的战争宣传机构，它们支持被克鲁格曼教授称为“美国政治史上最大丑闻”的闹剧。

众议院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在四个月中审查了包括小布什用作对伊开战的《国家情报评估》在内的19卷官方秘密文件后得出结论：情报机构收集资料的方法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它把没有迹象能证明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其发展计划已被销毁作为这些武器继续存在的证据。议员们认为，美国情报部门用大量过时、“与特定条件有关”和“残缺不全”并有“太多不确定”的信息来判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与“基地”组织的关系。[44]小布什、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都被迫公开承认这一事实。[45]和“9·11”恐怖袭击案一样，美国国会再次选择了包庇手段，试图掩盖小布什用来蛊惑美国人民的欺诈行为，把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责任归咎于情报机构的失误。事实上，正如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参议员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所揭露的，被用来对伊拉克开战的理由纯属一个“得克萨斯制造的骗局”[46]。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欺诈行为得到证实似乎还不够。如果说国际社会对小布什政府尚存一丝尊重的话，那么，关塔那摩和伊拉克阿布格莱布所关押的囚犯遭残酷虐待事实被揭露后，仅存的那一点尊重也荡然无存。在阿富汗被占领两年多后，在那里抓获的来自42个国家的约680名囚犯（其中有150名沙特人、80名也门人、50名巴基斯坦人[47]）依然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德尔塔营地。他们未被正式指控和审判，不享有任何权利，也无权接受探监和法律援助，只是泛泛地被界定为“敌方战斗人员”[48]。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少年，还有一名105岁的老人，但美国军人称后者“只有”95岁。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变成了集中营，因为它不被认定为美国领土，囚犯们不能按美国法律受审。因不具备战犯“身份”，

他们也不能被移交国际法庭，只能接受助理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的摆布。他们受到肉体和心理的摧残，并在审讯前被强迫接受药物注射和吞服药片。[49]与人权观察组织执行官罗斯一样，国际大赦美国分部主任本·杰罗斯（Ben Jealous）也指责华盛顿政府在多个军事基地尤其是在伊拉克和关塔那摩制造人权领域的“黑洞”。[50]至2003年9月，美国在伊拉克关押了数千名囚犯。

美国士兵残酷虐待和侮辱被密密麻麻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囚犯，该监狱位于巴格达以西20英里处。这一事实被美国最严肃和最独立的记者塞缪尔·赫什所揭露[51]，越战时期的美莱村大屠杀也是他揭露的。他得到了安东尼奥·塔古巴（Antonio M. Taguba）将军2004年2月写就的一份53页秘密文件。根据该文件的描述，2003年10—12月，伊拉克囚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系统地接受第372军警连士兵和美国情报部门人员“残酷、明目张胆和肆意的”虐待，酷刑包括打碎灯泡后将液态磷洒在犯人身上，把他们泡在冰水中，用扫帚把和椅子打砸他们，威胁强奸他们，用军犬恐吓甚至咬他们。

2003年3月23日，小布什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时曾表示：“我们希望他们（战俘）能得到人道的对待，就像我们人道地对待被我们抓获的任何俘虏一样。否则，那些虐待俘虏者将会被视为战争犯。”[52]拉姆斯菲尔德还警告说，根据《日内瓦公约》，“不允许对战俘拍照、进行刁难或羞辱。如果他们是被俘虏的美国或盟军地面部队人员，《日内瓦公约》明确了应如何对待他们”[53]。公布的淫秽照片和录像证实，在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授意下，伊拉克囚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与关塔那摩基地的囚犯别无两样）遭受了酷刑和性侮辱等虐待和侵犯人权行为。这些行为违反《日内瓦公约》，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的道德沦丧。德国《明星》周刊在2004年5月19日出版的刊物封面上把“道德沦丧”作为标题压在小布什头像上。[54]

那些违反《日内瓦公约》的酷刑（“压力与强迫”）[55]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亲自批准的，小布什也并非不知情。[56]塞缪尔·赫什揭露说，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的虐待和酷刑并非美军中少数士兵的犯罪倾向所致，而是拉姆斯菲尔德批准的一个方案，目的是从囚犯身上获得更多关于“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反叛组织的信息。[57]司法部也在2002年8月递交白宫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在国外对“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施以酷刑“可被视为正当”。反对酷刑的国际法律如果在小布什宣称的反恐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审讯中被应用“可能是违宪的”，而自卫的需要“能够提供消除任何罪责的理由”[58]。种种迹象表明，正是因为料到要使用那些手段，小布什政府才撤销了在建立国际

刑事法庭条约上的签字，该法庭用以审判战争罪和侵犯人权罪。美国政府还积极活动，不断向其他国家施压，并采取讹诈手段，避免美国士兵接受该法庭的审判。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试图获得这一特权。在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所使用的酷刑与1963年7月为越南制定的《反间谍审讯指南》和另一本名为“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手册”的内容相似，《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手册》被用来教授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的安全人员从那些从事颠覆活动的嫌犯身上获取情报。[59]1983—1987年间，这一手册被中央情报局和“绿色贝雷帽”用作在众多拉美国家进行教学的工具。由于美国人所训练的洪都拉斯军人胡作非为、侵犯人权，1988年，该手册受到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批评。1992年3月，五角大楼内部经过对南方司令部带有“令人反感”内容的反间谍审讯指南手册在拉美地区的使用情况进行的九个月调查后，向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递交了一份报告。调查人员在报告中描述了各种酷刑教学的由来，这些酷刑包括殴打、幽禁、模拟枪决、使用血清，甚至包括陆军国外情报机构一些部门60年代所实施的Project X项目。1966—1976年就读美洲学校的拉美军官曾按照该项目进行训练。Project X项目是“把越南所学的反暴动技术提供给拉美国家的一揽子训练项目”。由于美国国会调查委员会进行的调查以及卡特政府对侵犯人权的担忧，这一训练项目被迫中止，但里根政府于1982年又予以恢复。[60]

面对阿布格莱布丑闻所造成的极负面效应，中央情报局宣布中止白宫重新批准的“强迫和胁迫”审讯技术[61]，即导致囚犯死亡的酷刑。[62]这一丑闻被采用掩盖手段所捂住，只有几名士兵被处以轻微判罚，主要策划者却安然无事。负责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詹尼斯·卡宾斯基（Janis Karpinski）将军在离职后对英国广播公司称，她曾听军事情报指挥官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说过，囚犯应该被“像狗”一样对待。她认为，她和她的士兵们成了别人下令实施的过分行动的替罪羊。[63]她证实，拉姆斯菲尔德亲自批准了酷刑。不管在关塔那摩还是在阿布格莱布以及囚犯在保密状态下被押送前往的其他国家军营，他们依然在没有任何指控和审判情况下被关押着，就连红十字会人员的进入也受到限制。

根据最新消息，中央情报局在泰国、卡塔尔和阿富汗等国均设有监狱，并向红十字会隐瞒了数百名囚犯。这些都是拉姆斯菲尔德亲自下达的命令。[64]总检察长阿尔贝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z）在听证会上证实，只要是在国外，中央情报局就被允许使用酷刑和其他任何非人道手段。根据白宫批准的“投降”计划，很多囚犯被交给埃及、叙利亚、沙特、约旦和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以便对他们施以酷刑，中央情报局能因此获得更多情

报。纽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家、纽约市律师工会成员斯科特·霍顿（Scott Horton）教授估计，自2001年起，约有150人被转往其他国家接受酷刑。国土安全特别委员会成员埃德·马基（Ed Markey）众议员（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称，他们无法获取更精确数字，因为中央情报局拒绝提供。[65]小布什政府既不遵守美国1994年批准的《反酷刑公约》，也违反美国本国法律。

【注解】

[1] Clinton，2004，pp. 602-604，624-625. Mahajan，2003，p. 139.

[2] Clark，2003，p. 112.

[3] 据估计，平壤核设施拥有2 000名工作人员，该设施包括一个用于研究的5兆瓦反应堆、一个正在建设的50兆瓦反应堆和一个钚再处理工厂。此外，还拥有实验室、放射化学研究所和核燃料储存库。

[4] Briody，2003，pp. 115-117.

[5] 2000年，凯雷集团以4.5亿美元购入韩美银行47.7%的股份。

[6] Id.，ibid.，pp. 116-117.

[7] Id.，ibid.，pp. 118-119.

[8] Daalder & Lindsay，2003，pp. 173-187.

[9]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New York，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September 12，2002. The White House—President George W. Bush.

[10] Kagan，2003，p. 40.

[11] Clark，2003，pp. 23-24.

[12] Kagan，2003，p. 94.

[13] 107th Congress HJ. Res. 114—To authorize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Iraq.

[14] Kissinger，1994，pp. 657-658.

[15] Johnson，2004，p. 93.

[16] Woodward，204，pp. 31-33.

[17] Johnson，2004，p. 91.

[18] Daalder & Lindsay，2003，pp. 180-182. Johnson，2004，pp. 89-91.

[19] Id.，ibid.，p. 91-92.

[20] King，John. "U. S.：N. Korea 'reckless' but diplomacy still best option. Fighters flew within 50 feet of Air Force surveillance jet." CNN Tuesday，March 4，2003. Posted：11:02 AM EST（1602 GMT）.

[21] "President Says Saddam Hussein Must Leave Iraq Within 48 Hours".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for Immediate Relea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March 17，2003 The Cross Hall 8:01 PM. EST.

[22] "President Says Saddam Hussein Must Leave Iraq Within 48 Hours".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for Immediate Relea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March 17, 2003. The Cross Hall 8:01 P. M. EST.

[23] Halpen, 2004, p. 192.

[24] Bamford, 2004, pp. 240-241.

[25] CBS News— "Experts doubt Iraq, Al-Qaeda terror link" —Last Updated Fri, Nov 1st 2002, 22: 16:17.

[26] BBC—Outrage at 'old Europe' remarks. Thursday, 23 January, 2003, 18: 15 GMT. CNN. com. /World. 'Old Europe' hits back at Rumsfeld. Friday, January 24, 2003 Posted: 1:12 PM EST (1812 GMT).

[27] 当德国政府首脑施罗德2002年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时，珀尔向德国《商报》表示"德国总理最好提出辞职"。但他忘了施罗德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代表的是德国人民的愿望。珀尔后来受到司法部审查，经查，他曾违反美国法律向以色列提供秘密情报。

[28] Perle, Richard. "Thank God for the death of the UN". Londres, *The Guardian*, 21/3/2003.

[29] Hersh, Seymour M. "Lunch with the Chairman". *The New Yorker*, 17/3/2003.

[30] 750亿美元的预算和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伊拉克重建计划能使组成防御咨询委员会的"鹰派"通过替各家公司进行院外活动获得巨大好处。珀尔和防御咨询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成立了战舰公司，它是一家合资公司，主要在防务和国内安全领域的公司中进行投资。非营利机构公共诚信中心主席查尔斯·刘易斯（Charles Lewis）评论说："我们在进行战争，但在这些机构中供职的一些人却在从中谋利。""Richard Perle is Not Alone". *Business Week*, 7/4/2003.

[31] Woodward, 2004, 10.

[32] Blix, 2005, pp. 188-190.

[33] Id., ibid., pp. 228, 234-236.

[34] Id., ibid., p. 266.

[35] Barry, John. "Exclusive: The Defector's Secrets". *Newsweek*, 3/3/2003Mahajan, 2003, p. 119.

[36] Statement by David Kay on The Interim Progress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Iraq Survey Group (Isg) before the 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Subcommittee on Defense, and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October 2, 2003.

[37] Pfleger, Katherine. "Kay Says Iraq Likely Had No Banned Arms". Associated Press. 25/1/2004. Risen, James. "Ex-Inspector Says CIA Missed Disarray in Iraqi Arms Program". *The New York Times*, 26/1/2004.

[38] Slevin, Peter. "Powell Voices Doubts About Iraqi Weapons". *The Washing-*

ton Post, 25/1/2004, p. A14.

[39] Comprehensive Report of the Special Advisor to the DCI on Iraq's WMD—30 September 2004. http://www.cia.gov/cia/reports/iraq_wmd_2004/.

[40] Kessler, Glenn. "Arms Issue Seen as Hurting U.S. Credibility Abroad". *Washington Post*, 19/1/2004, p. A01.

[41] Morin, Richard & Milbank, Dana. "Most Think Truth Was Stretched to Justify Iraq War". *The Washington Post*, 13/2/2004, p. A01.

[42] Dowd, Maureen. "National House of Waffles". *The New York Times*, 13/7/2003.

[43] Pfleger, Katherine. "CIA Boss: Iraq Not Called Imminent Threat". *Associated Press*, 2/5/2004; *The Washington Post*, 5/2/2004.

[44] *La Tercera*, Santiago de Chile, 28/9/2003. Priest, Dana "House Probes Conclude Iraq War Data Was Weak". *The Washington Post*, 28/9/2003.

[45] Clarke, 2004, pp. 268-269.

[46] LeBlanc, Steve. "Kennedy Says Case for War Built on 'Fraud'". *Associated Press*. *The Washington Post*, 19/9/2003, p. A02.

[47] Campbell, Duncan. "Isolated, strictly supervised and deprived of rights: how Camp Delta treats inmates—Depress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are reported from Guantanamo Bay". *The Guardian*, 5/7/2003.

[48] Ibid.

[49]"他们说，在最初几个月中，他们被关押在狭窄的铁丝网牢笼中，每个牢笼的大小约为 6.5 英尺×8 英尺，每组 10 个或 20 个。牢笼的顶部是木头，但周边是开放的。沙赫先生说，'我们睡觉、吃饭、祈祷和上厕所都在那个狭小的空间中'。每人有两条毯子和一个祈祷垫，睡觉和吃饭都在地上。囚徒每周只被带去洗一次一分钟的淋浴。他说，'四个半月后，我们大家都抱怨，一些人开始绝食。这样，他们答应让我们每周的淋浴时间延长到五分钟，并可以放一次风'。后来，囚徒们可以每周放风 10 分钟，即在一个 30 英尺长的笼子里来回走动。获释数周后在家中接受采访时，他和另一名获释的巴基斯坦人对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了强烈愤慨。他们是被无限期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大约 680 名囚徒中的两人。

"'我一直试图自杀。'这位名为沙赫·穆罕默德的 20 岁巴基斯坦人说。2001 年 11 月，他在阿富汗被抓后被交给了美国士兵。2002 年 1 月被带往关塔那摩。'我曾四度试图自杀，因为我痛恨我的生活，虽然自杀行为有悖伊斯兰的教义。''但那里的生活实在太难了，很多人都那样做。他们像对待罪犯一样对待我，但我是无辜的。'" Gall, Carlotta & Lewis, Neil A. "Inmates Released from Guantánamo Tell Tales of Despair". *The New York Times*, 17/6/2003.

[50] "'Para muitos, este não é um país livre', diz Anistia". *Folha de São Paulo*, 4/5/2003.

[51] Hersh, Seymour M. "Torture at Abu Ghraib. American soldiers brutalized

Iraqis. How far up does the responsibility go?". *The New Yorker*, 10/5/2004.

[52] President Buch Discusses Military Operation. White House. 23 March 2003.

[53] Entrevista de Rumsfeld a Bob Schieffer e David Martin, CBS Face The Nation, 23/3/2003.

[54] Stern, nº. 22, 19/5/2004.

[55]"人权观察组织执行官肯尼斯·罗斯称，'自"9·11"以来，国防部已公开采用压力与强迫技术'，'我们已从陆军那里学到了五角大楼用来指导审讯员的72种压力基本点，它被用来指导进行各种形式的强迫行动，从不同程度的睡眠剥夺和观感剥夺到感官超负荷，剥光囚徒的衣服，将他们以各种姿势捆绑起来——我们在那些照片上看到的一切，几近性侮辱'。" Vedantam, Shankar. "The Psychology of Torture—Past Incidents Show Abusers Think Ends Justify the Means". *The Washington Post*, 11/5/2004.

[56]"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几个月中，阿拉伯人极易受性侮辱伤害的概念成为华盛顿主战的保守派内部的一个话题。" Hersh, Seymour M. "The Gray Zone. How a secret Pentagon program came to Abu Ghraib". *The New Yorker*, 16/5/2004. Barry, John; Hirsh, Michael & Isikoff, Michael, "The Roots of Torture. The road to Abu Ghraib began after 9/11, when Washington wrote new rules to fight a new kind of war". *Newsweek*, 16/5/2004. Jehl, Douglas & Schmitt, Eric. "Dogs and Other Harsh Tactics Linked 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New York Times*, 22/5/2004.

[57] Hersh, Seymour M. "The Gray Zone. How a secret Pentagon program came to Abu Ghraib". *The New Yorker*, 24/5/2004.

[58] Priest, Dana & Smith, Jeffrey. "Memo Offered Justification for Use of Torture Justice Dept. Gave Advice in 2002". *The Washington Post*, 8/6/2004.

[59] Cohn, Gary; Thompson, Ginger & Matthews, Mark. "Torture was taught by CIA; Declassified manual details the methods used in Honduras; Agency denials refuted". *The Baltimore Sun*, 27/1/1997, Final Edition.

[60] Blanton, Thomas & Kornbluh, *Peter. Prisoner Abuse: Patterns from the Past—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122*. Cold War U. S. Interrogation Manuals Counseled "Coercive Techniques". Cheney Informed of "Objectionable" Interrogation Guides in 1992 "Inconsistent with U. S. Government Polic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Posts CIA Training Manuals from 60s, 80s, and Investigative memos on earlier controversy on human rights abuse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22/#kubark.

[61] Priest, Dana. "CIA Puts Harsh Tactics On Hold Memo on Methods Of Interrogation Had Wide Review". *The Washington Post*, 27/6/2004, p. A01.

[62] 受虐待者之一马纳德尔·贾马迪（Manadel al Jamadi）出现在照片上。此人在接受中央情报局非常规手段"巴勒斯坦力量"审讯时死亡。据美联社获得的资料，

犯人被双手反绑吊起，这样，身体拉直后导致他窒息。

[63] Lawless Jill. "Abu Ghraib General Says She's a Scapegoat". Associated Press Jun 15, 9: 30 AM. "General dos EUA diz que ordens eram para tratar presos iraquianos 'como cães'". Reuters. *O Globo*, 15/6/2004.

[64] Mayer, Jane. "Outsourcing Torture.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 s 'extraordinary rendition, program". *The New Yorker*, 14/2/2005.

[65] Ibid. Jehl, Douglas & Johnston, David. "Rule Change Lets C. I. A. Freely Send Suspects Abroad to Jails". *The New York Times*, 6/3/2005.

第三十五章

伊拉克战争给大公司带来的生意　石油地缘政治　与小布什关系密切企业的金融丑闻　军事职能外包　五角大楼项目承包企业聘用雇佣兵　哥伦比亚战争私营化　美军在伊拉克遭遇抵抗

美国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的道德沦丧达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当美国士兵就像照片和录像所显示的那样对囚犯进行残酷虐待之时，哈里伯顿、鲁格-布朗-鲁特（KBR）、柏克德集团和 MCI 通信等与小布什、切尼及其团伙有利益关系的军工和石油公司却在那个被美国军队摧毁的国家的重建工程中大发横财。金融界巨富、以股票投机闻名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把小布什政府企图实施美国主导的行动定性为“泡沫”。他警告说，“大生意和军方之间的关系会使两者都堕落”。他揭露说，在“新保守派”和货币利益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双向自反联系”[1]。伊拉克战争对小布什和“新保守派”其他成员以及与他们有利益关系的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合同商、项目承包商及供应商来说，确实是一笔极好生意，它使大量公共资金通过服务合同、工程实施和军事物资更新项目转至美国公司手中。乔治·华盛顿大学军事问题专家戈登·亚当斯（Gordon Adams）指出，看似失败的伊拉克重建努力在“西部狂野气氛”中进行。小布什政府副总统切尼自 1993 年离开国防部到 2000 年，一直担任哈里伯顿公司总裁，该公司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 186 亿美元的巨额合同。它还获得了一项修复石油设施的 12 亿美元项目合同，该项目是其子公司 KBR 实施项目的后续部分，KBR 公司此前已获得一项 22 亿美元的合同。[2]哈里伯顿还在从科威特进口后倒卖给驻扎在伊拉克的陆军工程兵团的汽油费用中虚报了 6 100 万美元，它所收取的 2.64 美元/加仑（折合 0.7 美元/升）的价格大大高于当地市场价。该公司一名职员收受了 630 万美元

的贿赂。司法部还不得不调查它为获得在尼日利亚建造一个天然气工厂合同而采取的欺诈行为，当时，切尼还未卸去公司总裁一职。[3]

在伊拉克的合资公司帕萨德纳-帕森斯（帕森斯能源和化学集团公司）同样获得了一份 8 亿美元的合同。[4]柏克德集团从美国国际开发署得到了一份 3 460 万美元的合同，其金额有可能提高到 6.8 亿美元，合同内容包括重建电力设施、网络和机场等。与此同时，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2000 年小布什竞选班子负责人、与布什家族和小布什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的艾尔巴（J. M. Allbaugh）与一批商人创建了一个新桥策略顾问公司（New Bridge Strategies），其目的是帮助其他公司获得用公共资金资助伊拉克重建和其他服务项目合同。当国会批准用于伊拉克的 203 亿美元重建资金以及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 870 亿美元一揽子军费开支中的一部分时，新桥策略顾问公司在其网页中写道：

> 今天在伊拉克的发展机会从性质和范围来看都是空前的，而现有其他公司中没有一家具备既能在华盛顿特区也能在伊拉克土地上有所作为的必要能力和经验。[5]

该公司副总裁爱德华·罗杰斯（Edward M. Rogers Jr.）和董事兰尼·格里福斯（Lanny Griffith）都是院外活动团体成员。他们在老布什任总统期间曾给予其支持，现在又重新密切了与白宫的关系。[6]“透明国际”组织通过在伦敦向新闻界发布的 2005 年度《全球腐败报告》警告说，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免使伊拉克重建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腐败”[7]。中东问题分析家雷诺德·伦德斯（Reinoud Leenders）和“喜庆伊拉克”组织（Jubilee Iraq）领导人贾斯汀·亚历山大（Justin Alexander）所进行的研究揭露，“在伊拉克的许多美国合同商挥霍无度，他们攫取了在许多人看来是过度的利润”[8]。

不管是在伊拉克还是在阿富汗，小布什政府都让凯雷集团在其中有投资的军工、石油公司和其他依靠美国纳税人交纳的公共资金从事巨额生意的公司挣足了钱。2003 年 9 月 19 日，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美国大使保罗·布雷默（L. Paul Bremer III）发布第 39 号命令，把伊拉克 200 家国有公司出售给私人，规定外国公司可拥有银行、矿井和工厂 100%的产权，还可以将 100%的利润转移到国外。这明显违反得到美国批准的 1907 年的《海牙章程》和 1949 年的《日内瓦公约》以及美国本身的军事条令。伊拉克的所有财富都被私有化并交给了美国公司。与此同时，伊拉克石油部长易卜

拉欣·乌卢姆（Ibrahim Bahr al-Uloum）宣布将给予美国公司优先权，“如有可能，欧洲公司”也将获此待遇。而俄罗斯公司在履行与萨达姆政府签订的合同时将会遇到困难。[9]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到华盛顿参加会议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成员罗伯特·埃贝尔（Robert Ebel）向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台透露，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新保守派”就制定了一项对伊拉克石油公司实行私有化的计划，将石油产量提高到限额之上，以瓦解石油输出国组织。[10]但“大石油公司执行官们”担心俄罗斯石油企业私有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在伊拉克重演，因而没有批准这一计划，而选择了建立一个处于美国石油企业控制下的国有公司。设在得克萨斯州的詹姆斯·贝克研究所基于《信息自由法案》负责制定这些新计划。英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栏目获得了这些计划。[11]

在私人和公共利益一直交织而企业生意成为国家理性的美国，腐败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根源。随着肆无忌惮的小布什执掌政权，地方性腐败达到了阵发性地步。与其父一样，小布什与军工企业、尖端技术和数字技术企业、石化企业以及金融资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把国内和国际政治当作简单的生意问题加以处理，使公共利益从属于私人行动和市场[12]，其政府强调石油地缘政治，对优尼科、雪佛龙、柏克德、哈里伯顿和安然等大公司的利益照顾有加。2001年，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倒闭案。安然公司破产是该公司在账目中弄虚作假的做法被揭露所引发的。它通过一个广泛而庞大的腐败体系掩盖债务，放大利润，使大量领取养老金者和小投资者遭到损害。小布什在很长时间里掩盖了他与安然公司的关系。丑闻爆发几天前，他还表明了放宽针对发电厂污染方面法律的意愿，并在此后宣布，将继续推进把放射性垃圾存放在内华达州这一颇具争议的计划。每一个此类决定对由少数人组成的商人集团来说都意味着数十亿美元的进账，这些人对小布什和政府其他成员具有很大影响力。小布什及其同伙极力根据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法律作出改变。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热衷于大肆炒作丑闻的媒体却在“9·11”恐怖袭击后默不作声，按克鲁格曼教授的说法，转而成为“政府尊严的强大保护伞”[13]。国会也不例外，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没有一个美国政治人物胆敢对小布什政府所从事的生意和舞弊行为进行认真调查，因为，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更依赖于作为竞选活动主要赞助者的军工和石油集团。

与小布什一直保持密切关系的安然公司之倒闭并非发生在其执政之初且难以掩盖的唯一丑闻，曾寻求与安然合并的戴那基电力公司（Dynegy）也因涉嫌人为提高收入和交易量的虚假操作成为多项联邦调查的目标。负

责安然公司账务的安达信会计公司（Andersen）因妨碍调查而被判罚。电话公司世界电信（WorldCom）做了 38.5 亿美元的假账，使得它在 2001 年报出了 13.8 亿美元的净利润。环球电信公司（Global Crossing）以放大收入为目的而做假账，并卷入与其他电信公司的网络能力交换，因而遭联邦调查局和市场监管机构的调查。可信能源公司（Reliant Resources）通过虚假操作，抹去了 1999—2002 年间的 79 亿美元收入，以便放大其电力交易量和收入。施乐公司（Xerox）为了欺骗投资者，通过法律外协议解决了联邦部门对它“账目造假”的指控，并宣布将对五年的经营结果进行修正，以便对 60 多亿美元收入重新分类。泰科国际公司（Tyco International）也因其高管涉嫌用公司基金购买不动产和艺术品逃避 100 万美元税款而遭调查。美国最大的股票经纪公司美林集团（Merrill Lynch）为了结一个调查案支付了 1 亿美元的罚款，它被指控操纵股票推荐信息，以便为其投资公司赢得客户。组合国际电脑公司（Computer Associates）也采取了同样做法，为了结司法部对它提前宣布将购进铂金技术公司（Platinum Technology）而违反公司兼并规则的调查支付了 638 000 美元的罚款。默克集团（Merck）中提供健康服务的美可保健公司（Medco）的账目中记录了公司从未获得的 140 亿美元收入，这一虚假账目被揭露后对世界外汇和股票市场造成了严重打击。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对英克隆公司（Imclone Systems）展开调查，以便查清这一生物技术公司是否确切地把当局拒绝向它提供一种抗癌药物试验许可的信息告诉投资者，该公司前执行总裁塞缪尔·沃克萨尔（Samuel Waksal）因使用专有信息不当而遭拘捕。

尽管各大公司采取种种欺诈手段，小布什政府依然加快了对军事和情报职能的私有化。[14]由雇佣兵组成的“私人军事公司”[15]在伊拉克承担了广泛职能，占向军人提供的主要服务的 20%～30%，它们活跃在全国各地。这一私有化军事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直接任务型”，负责提供直接支持，包括从训练项目到前线的指挥项目在内的军事策略支持；“顾问型”，如专业军事资源公司，以退役军官为主体，根据合同提供战略和管理培训；“支持型”，如布朗-鲁特公司，向武装部队提供后勤和保障服务。哈里伯顿的规模是被纳入“私人军事公司”行列 12 家公司中的其余公司所难以比拟的。这些公司负责提供军事技术服务，包括通信和情报、后勤支持以及训练和战场规划。[16]哈里伯顿集团经营石油业务的布朗-鲁特公司真正成为美国在中东军事力量的一部分。[17]《企业武士》一书的作者、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皮特·辛格（P. W. Singer）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不管美军在何地采取军事干涉，布朗-鲁特、克鲁格

和其他“私人军事公司”总是形影相随[18]，这使美国得以大幅减少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正规军人数。[19]

不仅五角大楼越来越多地把军事职能交给私人公司，情报机构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除了属于中央情报局编制内的 4 000 名分析员外，美国政府还雇用私人情报公司，这些公司共有 40 000 名分析师[20]，其中有几家为凯雷集团所控制，包括美国调查服务公司（U. S. Investigations Services）、维纳尔公司（Vinnell）和联邦数据公司（Federal Data Corporation）。军事和情报职能外包在克林顿执政期间进一步加强，成为使军事活动避开公众和国会监督并推行毫无约束对外政策的手段。[21]使用雇佣兵意在逃避责任且无须顾及后果。为了绕过国会的限制，五角大楼自 90 年代初起就把在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与巴西交界地区进行的打击贩毒行动的大部分工作交给私人军事和安全公司。这些美国跨国公司采取了聘用雇佣兵的做法[22]，因为，美国国会批准的规定除限制在哥伦比亚的美国士兵不能超过 500 名外（后来提高到 800 名），还禁止他们参加战斗，而这些限制不适用于私人军事公司[23]，它们可以不受法律约束。[24]《美国王朝》一书的作者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指出，“通过使用追求利润的‘士兵’，政府部门能够避开国会对兵力的限制”[25]。聘用雇佣兵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是“前”军人——“前绿色贝雷帽、前准军事人员和前将军”[26]。辛格认为，聘用他们“作为官方行动的一种替代成了目前官方兵力缺乏这一‘巧言否认’的掩护”[27]。私人军事公司在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广泛活动在小布什执政时期进一步扩大。

自 1997 年起，哥伦比亚战争的私人化进一步加强。美国国会对此毫不知情，更谈不上批准。五角大楼的合同商、承包商和供应商承担了通信系统和雷达的操纵、古柯作物的销毁以及对人员和武器流动的调查，甚至还包括情报收集任务。在南美得到合同最多的戴阳公司（DynCorp）向哥伦比亚运送了 80 名飞行员、机械师和 50 架直升机，还向秘鲁的普卡利帕基地调运了 22 名飞行员和 14 架直升机，用以控制瓦亚加和阿普瑞马克山谷。其他私人军事公司也开始在亚马逊地区作业，其中包括设立在巴西和秘鲁交界处的由前飞行员组成的航空发展公司、专门用赛斯纳 337“空中霸王”进行夜间飞行的佛罗里达州罗克利奇“空中扫描”公司和从军事专业资源集团分离出来的亚历山德里亚的军事专业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后者从事秘密警察培训和组织哥伦比亚军队突击队。私人军事公司卷入的目的是避开美国国会的相关规定，但很可能因为它们的卷入，哥伦比亚政府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双方在冲突中的立场会变得更加激进。

尽管南美洲并非小布什政府优先考虑的地区，但根据巴西陆军情报中心（CIE）进行的研究，2001—2002 年，有 6 300 名美国军人（自然没有包括雇佣兵）驻扎在亚马逊地区或在这一地区作业。2002 年进行的三项调查表明，美国军人在巴拉圭和玻利维亚靠近巴西边境的城市建设了飞机跑道，在秘鲁 9 个地点设立了雷达和空军基地，在南美大陆多个国家设立了特别行动组，并接收了当地数十名士兵，对其进行森林作战和打击贩毒的专业培训。[28]在玻利维亚的多个雷达和通信设施是南方司令部指挥和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被用来跟踪秘密飞行的飞机，并协调打击贩毒活动。私人军事公司的任务则是维护这些系统。[29]

2002 年是美国军人在南美洲人数最多的一年，当时，玻利维亚政府与太平洋液化天然气公司这一国际财团达成了一个向美国出口天然气的协议，金额达 60 亿美元。根据巴西陆军情报中心的报告，那一年，至少有 5 000 名美国军人在玻利维亚参与各种行动。美国驻该国大使馆约有 900 名工作人员。美国特别行动部队试图在以种植古柯的查帕雷和央格斯为中心的地区找到可能对打击贩毒行动构成抵抗的武装团伙根据地。尽管这样宣称，但美国人真正担心的是可能发生的一场由埃沃·莫拉雷斯（Evo Morales）领导的印第安人起义。2003 年 2 月，起义终于爆发，农民在矿工和玻利维亚劳工总会的支持下封锁了道路，以抗议天然气出口。贡萨罗·德洛萨达（Gonzalo Sanchez de Lozada）总统被迫中止天然气出口，并在出现血腥冲突而又无力制止骚乱的情况下宣布辞职。自 1999 年起，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已训练了 6 000 多名玻利维亚军人。美国有意怂恿圣克鲁斯地区的分裂主义情绪，那是一片十分富饶的土地，处于南美洲水网之中，是玻利维亚的经济命脉。玻政治人士认为，当时爆发的要求该地区自治的运动并非由长期存在的传统分裂主义情绪造成，而是在涉及天然气和石油的新《碳氢化合物法》通过后由各石油公司精心策划的行动所致，该法在 2004 年的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当时正待卡洛斯·梅萨（Carlos Mesa）政府批准。

2003 年 8 月，在玻利维亚局势恶化之际，小布什政府的注意力正集中在中东。在那里，不仅巴勒斯坦形势变得更为复杂，保持对伊拉克的占领也变得更为艰难。尽管小布什政府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战争并未结束，也未取得胜利。他认为，把在关塔那摩所用的虐囚术复制到阿布格莱布就能消除抵抗，但事实上，保持对伊拉克占领的代价已变得越来越大，困难越来越多。遭到严重破坏的巴格达、纳西里耶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情况十分糟糕，基础设施被毁，基本服务中断，输油管常常因破坏而中断，抢劫和

盗窃活动不断。美英军队继续遭受游击队的袭击，且日益频繁。抵抗活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上升态势。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也参与其中，国家处于彻底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状态。美国驻约旦大使馆也发生了爆炸。2003 年 8 月 19 日，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炸毁了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处所在的大楼，炸死 43 人，其中包括联合国驻伊代表塞尔吉奥·梅洛（Sérgio Vieira de Mello）。曾承诺为伊拉克重建提供帮助的联合国不得不撤出该国。[30]

美国不能坐在导弹上。被有意蒙蔽公众的美国报纸和电视蓄意指称为“叛乱”的抵抗运动不断升级，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人员损失与日俱增。多位将军早就预计到，维持伊拉克的秩序和法律要比简单地清除萨达姆艰难得多。城市游击战十分可怕，死伤人数会持续上升。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均未重视他们的观点。从 2003 年 3 月 20 日至小布什哗众取宠地宣布主要战斗结束的 5 月 1 日共 42 天的战争中，由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共损失 172 名士兵，其中 132 名为美国士兵。但这一数字在接下去的几个月中翻了一倍。到 12 月（245 天），共有 406 名多国部队士兵丧生（346 名美国人），平均每天有 1～2 人死亡。[31] 2003 年 11 月初，小布什被简称为阿德沃夫（Ardwolf）的中央情报局巴格达站站长那里得到一份令人沮丧的评估报告。该报告称，大多数伊拉克居民相信伊拉克人能够战胜占领者，他们越来越多地支持抵抗运动。[32] 此外，没有政治机构或领导者表现出能够掌控国家、保障选举和制定宪法草案的能力。支持对萨达姆政权发动战争的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也私下提醒美国副总统切尼，认为“美国在伊拉克遭到了失败”。他向美国记者赫什透露说，他告诉切尼，以色列已明白没有什么方法能使军事占领取得胜利这一道理。他还表示，唯一的问题“是你选择遭羞辱的程度大小”。切尼对此未予以回应。[33]

萨达姆的儿子乌代和库赛在摩索尔死亡（7 月）后，他本人于 2003 年 12 月在其家乡提克里特附近被美军抓获，但抵抗运动有增无减。在离纳杰夫（伊拉克中部）11 公里的库法和萨德尔城，美军士兵与由什叶派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阿亚特·萨德尔阿訇之子）领导的迈赫迪民兵发生了残酷战斗。萨德尔城是巴格达的一个什叶派区，之前被称为萨达姆城和革命城，相对自治。暴动有可能席卷整个伊拉克和中东，美英军队却无力制止。迈赫迪民兵拥有 AK 卡拉什尼柯夫冲锋枪、榴弹和导弹等武器。虽然因大阿亚图拉阿里·希斯塔尼（Ali al-Sistani）出面达成了以停火作为占领军不抓捕迈赫迪民兵组织成员和不对其实施报复的交换条件，但该组织并没有交出所有武器。在世界范围内，美国也面临

新的困难。2004 年 3 月 11 日，马德里附近的火车和车站发生系列爆炸，炸死二百多人，数百人受伤。爆炸事件发生后，美国失去了一个同盟。这一行动是对何赛·阿斯纳尔（José Maria Aznar）领导的保守政府支持小布什的报复，它对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候选人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赢得 3 月 14 日大选起了决定性作用。萨帕特罗很快宣布，将在 6 月前从伊拉克撤出约 1 300 名西班牙士兵。

袭击、绑架和谋害外国人事件持续不断。伊拉克人杀死并肢解了承包商雇用的一些美国工人，并将其尸体在位于巴格达西部作为逊尼派三角区（巴格达-费卢杰-拉马迪）组成部分的费卢杰市游街示众。由神职人员萨德尔领导的什叶派民兵有步骤地在库法、卡尔巴拉、纳杰夫、库特和萨德尔城发动了一系列袭击行动。联军临时当局 2004 年 5 月所进行的调查表明，92%的伊拉克人把美军视为占领者，只有 3%和 2%的人分别把他们视为“维和者”和解放者。小布什在难以有效控制局面的情况下接受了联合国提议，试着向伊拉克归还主权。在制定一部临时宪法并正式宣布该宪法将于 7 月 1 日生效后，一个由包括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和基督教徒在内的 33 名伊拉克人组成的政府临时委员会于 2004 年 6 月 28 日成立，由逊尼派人士加齐·亚瓦尔（Ghazi Mashal Ajil al-Yawer）担任主席，什叶派神经外科医生伊亚德·阿拉维（Iyad Allawi）出任总理[34]，后者将负责在 2005 年 1 月 30 日前组织新政府的选举。他原先是中央情报局情报员，还曾为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情报局效力，参与了清除流亡伦敦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异己分子的行动。紧接着，美国驻伊最高行政长官布雷默解散了联军临时当局。据美国进步中心统计，该机构在其存在的 14 个月中花掉了伊拉克出口石油所获得的约 22.6 亿美元中的 85%，这些资金被用于支付在未竞标情况下给予美国公司的合同，约 16.6 亿美元给了哈里伯顿的子公司 KBR。该公司还从五角大楼得到了一个包括为占领军提供各种服务的 70 亿美元合同，其中包括按每人每天 28 美元的标准向美军和盟军的 11 万士兵提供用餐服务。[35]

血腥战斗在多个城市爆发，包括纳西里耶和费卢杰，这两座城市几乎被美国为消灭抵抗而发动的空袭所摧毁，学校和医院也未能幸免。据拉弗尔·伊萨维医院院长向“伊拉克罹难人数统计”组织提供的数字，除 700 多名反叛者丧生外，另有 600 多名伊拉克无辜平民在轰炸中死亡，大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36]据设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在伊拉克进行的一项调查，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 10 万名伊拉克人死于英美军队发动的空袭，其中一半是妇女和儿童。该调查在莱斯·罗伯

茨（Les Roberts）的领导下进行，发表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2004年10月29日出版的伦敦《卫报》对此进行了报道。[37]美军司令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将军在被问及此事时回答说："我们不清点尸体。"除空袭造成的大量死亡外，城市中大批儿童死于痢疾、呼吸道感染等疾病，他们只能喝到不干净的水；由于没有冷冻设备，只能吃变质食品；医院缺乏基本药物和血液。[38]与此同时，盟军伤亡人数成倍增加。在2004年的366天中，共有906名士兵丧生，其中848名为美国人，相当于每天死亡2～3人。[39]同期，还有约207名在哈里伯顿、KBR和戴阳等工程承包公司工作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平民被杀或在恐怖袭击中丧生。[40]据估计，自战争之初至2005年2月，除在战斗中受伤外，另有12 000名美国士兵因疾病和非战斗受伤住院，还有一些人因伊拉克的气候尤其是沙暴而患病。[41]

美国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42]

（2003年3月19日—2005年2月8日）

日期	合计	战斗减员
美国死亡人数		
自战争爆炸起（2003年3月19日）	1 650	1 295
自"使命结束"起（2003年5月1日）	1 513	1 186
自萨达姆被抓获起（2003年12月13日）	1 183	990
自政权移交起（2004年6月29日）	784	662
美国受伤人数	218	189
	官方数字	估计数字
受伤总人数	12 350	15 000～38 000

为避免更多伤亡，与在越南一样，美国极力凭借"空中实力"实施空中恐怖主义，轰炸巴格达各区和其他城市以镇压抵抗，以便实现和平。被炸死人数相对较少表明，美、英、意和波兰等国军队要控制伊拉克局势并非易事。与此同时，"圣战者"开始用自杀式袭击杀害美国招募的用以组建伊拉克国民卫队的当地人。美国政府把恐怖袭击升级归咎于被怀疑是本·拉登同伙的约旦人阿布·扎拉维（Abu Musab al-Zarqawi），就好像他一个人实施了所有抵抗运动一样。这是就伊拉克真实情况欺骗舆论的另一种方式。

这些并非是使占领变得日益艰难仅有的困难，可能遭遇的袭击使美国军队的后勤供应不及时变得十分严重。美军的供应全部来自伊拉克邻国，

尽管有军用车队护送，但五角大楼聘用的负责运送供应物资的承包商和供应商很难找到愿意与占领军合作的人。始于约旦亚喀巴港的旅行在进入伊拉克后毫无安全可言，抵抗组织经常伏击车队，尤其是在安曼境内通往巴格达公路的安巴尔地区。在位于巴格达以北 290 公里的基尔库克，“圣战者”活动十分频繁。由于没有合适的配件和装备来维护军车，美军开始抱怨并感受到小布什把美国拖入战争泥潭的深度。

【注解】

[1] Soros，2004，pp. 179－180.

[2] Krugman，Paul. “Patriots and Profits”. *The New York Times*，16/12/2003.

Spinner，Jacke. “Halliburton Gets More Iraq Work”. *The Washington Post*，17/1/2004，p. E01. Janofsky，Michael. “Halliburton Turns Over $6.3 Million to Government”. *The New York Times*，2/1/2004.

[3] “Another Halliburton Probe”. *Newsweek*，4/2/2004.

[4] Janofsky，Michael. “Halliburton Turns Over $6.3 Million to Government”. *The New York Times*，2/1/2004.

[5] “新桥策略顾问公司是一家独特的公司，在由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为帮助顾客评估和利用在中东的商机而专门成立的。其行动意在加速伊拉克自由和公平市场的建立，并帮助伊拉克经济在与美国政府的政策相一致的前提下获得重新增长。我们创立的新桥策略公司拥有在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超过 25 年经验的美国商界专业人员的知识以及华盛顿和伦敦的一批最成功的政府和政坛专业人士的政治经历，能提供一揽子商务服务：帮助参与美国政府项目的公司开拓战后机会；寻找市场机会和潜在的合作伙伴；提供在伊拉克的地面支持；为项目提供法律、技术、文化和可能的资金支持。” www. newbridgestrategies. com

[6] Jehl，Douglas. “Washington Insiders’ New Firm Consults on Contracts in Iraq”. *The New York Times*，30/9/2003.

[7] Iraq Reconstruction “Rife with Corruption”. Agence France Presse March 16，2005. http://www. globalpolicy. org/security/issues/iraq/reconstruct/2005/0316corruption. htm.

[8] Ibid.

[9] Pelham，Nicolas. “Iraqi Minister Sees Oil Privatization Obstacles”. *Financial Times*，5/9/2003.

[10] Palast，Greg. “Secret US plans for Iraq’s oil”. BBC News—World Edition—Last Updated：Thursday，17 March，2005，15：41 GMT-http://news. bbc. co. uk/2/hi/programmes/newsnight/4354269. stm.

[11] Ibid.

[12] Birnbaum，Norman. “Aux racines du nationalisme américain”. *Le Monde Diplomatique*，Octobre 2002.

[13] Krugman, Paul. "Pattern of Corruption". *The New York Times*, 15/7/2003.

[14] Phillips, 2004, p. 176.

[15] 私人军事体系分三种。一种是直接任务型公司，负责提供包括从训练项目到前线的指挥项目在内的直接军事策略支持；第二种是顾问型公司，如专业军事资源公司，以退役军官为主体，根据合同提供战略和管理培训；第三种为支持型公司，如布朗-鲁特公司，向武装部队提供后勤和保障服务。

[16] Phillips, 2004, pp. 172-173.

[17] *Business Week*, 15/9/2003.

[18] Ibid. Singer, 2004, pp. 138-139.

[19] Id., ibid., pp. 145-146.

[20] Phillips, 2004, pp. 274-275.

[21] Singer, 2003, pp. 213-215.

[22] Bütner, 2003, pp. 13-14.

[23] Singer, 2004, p. 208.

[24] Id., ibid., pp. 41-42.

[25] Phillips, 2004, p. 173.

[26] Singer, 2003, p. 76.

[27] Id., ibid., pp. 109-211.

[28] 巴西情报中心报告的相关章节和资料（其中一份报告名为"美国在南美洲的存在"）是步兵团若泽·阿布雷乌（José Alberto da Costa Abreu）上校撰写的研究报告的基础。2002 年 11 月，他在里约热内卢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政治、战略和高级军事管理专业结业时提交了该报告。阿布雷乌上校认为，"美军在南美大量出现对巴西的最主要影响包括：巴西在地区范围内扩大影响的能力下降；在巴西边境尤其是亚马逊地区出现了一个美国军事设施带"。Apud Valente, Rubens. "Brasil pierde capacidade de projectar poder na região, diz relatório. Estudo do Exército detecta 'cinturão' militar dos Estados Unidos". *Folha de S. Paulo*, 2/1/2005.

[29] Ibid.

[30] 塞尔吉奥·梅洛并非巴西外交官，而是联合国职员，他长期在联合国供职。

[31] Fonte: http://www.icasualties.org.

[32] Landay, Jonathan S. "CIA: Iraq outlook bleak. Leaked Report Warns U. S. Must Change Track". *Mercury News*, 12/11/2003

[33] Hersh, Seymour M. "Plan B. As June 30th approaches, Israel looks to the Kurds". *The New Yorker*, 28/6/2004.

[34] Hersh, Seymour M. Plan B. "As June 30th approaches, Israel looks to the Kurds". *The New Yorker*, 28/6/2004.

[35]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site/pp.asp? c=biJRJ8OVF&b=130039.

[36] Iraq Body Count Falluja Archive. http://www.iraqbodycount.net/resources/falluja.

[37] "War raised Iraqi death rate by 100,000". Staff and agencies. The Guardian, 28/10/2004. Boseley, Sarah. "100.000 Iraqi civilians dead, says study", *The Guardian*, 29/10/2004. 人道主义组织"伊拉克尸体清点"组织只根据媒体报道统计了16 121～18 393具尸体。它不作估计，也不进行预测。Iraq Body Count Press Releases. PR10: Monday November 7th 2004. IBC response to The Lancet study estimating "100,000" Iraqi deaths. http://www.iraqbodycount.net/press/index.php#pr9.

[38] Sachs, Jeffrey D. "Iraq's civilian dead get no h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Daily Star*, 2/12/2004. Id. "Iraq's silent death". *BusinessWorld Internet Edition*. 3/1/2005.

[39] Hersh, Seymour M. "Plan B. As June 30th approaches, Israel looks to the Kurds". *The New Yorker*, 28/6/2004.

[40] AntiWar. Com. http://www.antiwar.com/casualties.

[41] Ibid.

[42] Editado por Michael Ewens. AntiWar. Com. http://www.antiwar.com/casualties/.

第三十六章

伊拉克战争的非法性　恐怖主义加剧　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败　阿富汗被视为毒品国家　毒品产量增加　福音派与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联合和小布什连任　激进右翼　美国外债和双重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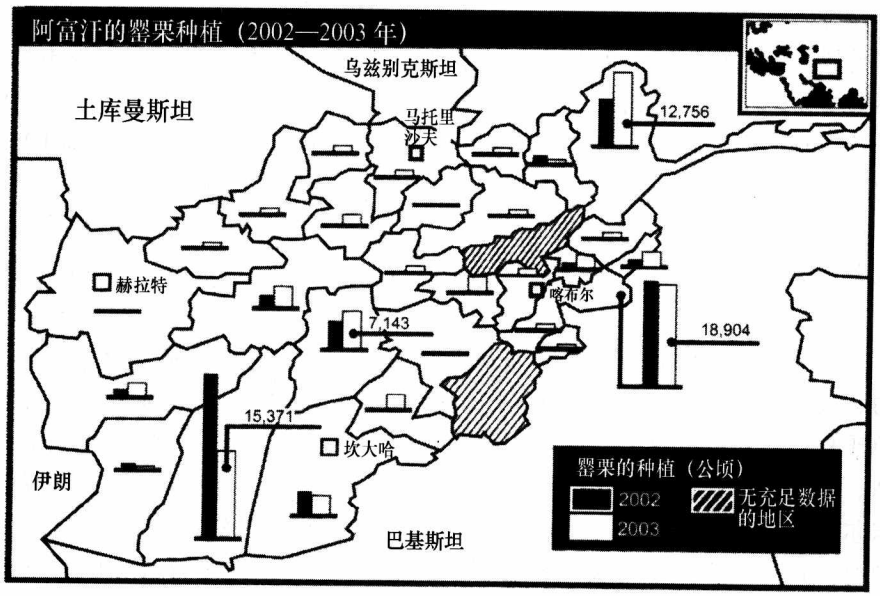
前中央情报局成员马勒认为，小布什把占领伊拉克作为反恐战争组成部分是一个“严重错误”。这验证了阿拉伯人对美国企图推行新帝国主义的疑虑，从长期来看，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使激进伊斯兰组织地位得到加强。[1]在对英国政府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工作的乔纳森·斯蒂文森（Jonathan Stevenson）也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破坏了反恐战争，不仅没有削弱“基地”组织，反而使其得到了加强。他指出，“2003 年 4 月 9 日迎接巴格达解放的无法无天和抢劫行为被全面犯罪、暴力和动荡所取代”。他还表示，在入侵一年后，美军面对的是一场阻碍国家重建和向民主、稳定方向发展的暴动。[2]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在伊拉克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推翻萨达姆政权为目的的战争是“非法的”。他向英国独立电视台表示：“当你看到我们周围的暴力，当你环视你周围，看到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当你看到正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我不能说世界是安全的。”[3]安南的话是对小布什政策的严厉批评。当时，小布什正与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参议员在总统大选中进行紧张角逐。后来，中央情报局局长波特·戈斯（Porter J. Goss）亲口向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表示，“伊拉克冲突并非因极端主义而起，却成了极端分子的理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利用冲突招募新的“圣战者”以对付美国。[4]国防情报局局长洛厄尔·雅格比（Lowell E. Jacoby）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也声称，“我们的中东政策助长了伊斯兰的怨恨”。他指出，摩洛哥、约旦和沙特的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对阿拉伯世界所采取的政策是消极的。

阿富汗的形势也不平静，并不像小布什所描绘的那样美好。卡尔扎伊在美国的支持下赢得了2004年10月9日举行的大选。他于2004年10月宣布，“塔利班已不复存在”[5]。这是十足的谎言，阿富汗战争并未结束，自2003年年中起，形势变得更为严峻，美国军队仍在与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协会”民兵作战。这些组织被重新整合起来，在全国各地展开游击战，如在赫拉特、喀布尔和库纳尔等城市对政府部门、警察和先遣部队进行大规模袭击。[6]根据美国进步中心罗伯特·波廷斯（Robert O. Boortins）和米纳斯·加利克（Minas Galic）撰写的报告，袭击事件不断加剧。军阀们仍统治着几乎整个国家。根据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数据，超过21%的阿富汗人食品短缺，一半人长期营养不良。[7]人权研究和倡导联盟揭露说，阿富汗人仍遭受各武装派别的种种侮辱，全国处于法律真空状态，犯罪不受惩处情况比比皆是。

各通讯社和其他媒体对阿富汗战事报道很少或根本未予重视，部分原因是战斗发生在山区。但与伊拉克相似的景象在这里重演。塔利班声称，不管是外国士兵、平民还是阿富汗人，只要与卡尔扎伊政府合作，就将成为袭击和绑架的目标。由2万名士兵组成的美国部队和组成多国部队的其他国家军队中已有171人丧生，其中有153人来自美国。卡尔扎伊要求国际社会支持其打击“外国恐怖分子”，即进入阿富汗并加入塔利班的“圣战者”。[8]在喀布尔以外，卡尔扎伊几乎不拥有任何权威。因安全原因，他几乎一直待在政府大楼中。他甚至已成为一起未遂恐怖袭击的目标。军阀控制的民兵对他构成的威胁比塔利班更大。[9]卡尔扎伊政府自身也滥用权力、胡作非为，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各军事派别领导人在其他地区进行的镇压行动使政府从政治上受益。比起塔利班，人们更惧怕逐渐控制包括军队、警察和情报机构在内的政府机构的军阀。[10]为了避免一场公开内战，卡尔扎伊让其中的一些人在政府中任职。大支尔格国民议会（阿富汗国民议会）别无选择，只好认可他们的影响力。[11]尽管随着数百名囚犯被释放，人权状况有所好转，但阿富汗监狱的状况依然极为糟糕，甚至还比不上集中营。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的数据，在塔利班政府垮台后，阿富汗重新成为作为海洛因基本原料的鸦片的世界最大生产国。罂粟种植增加是因为权力的真空，卡尔扎伊政府实际仅控制首都喀布尔。为保护阿富汗政府，北约司令部在那里驻扎了5 000名士兵。[12]2001年，阿富汗罂粟产量仅为185吨，因为这一活动被塔利班视为违背伊斯兰法而受到打击。2003年，罂粟产量提高到3 600吨，其中大部分来自北方联盟控制

的阿富汗东北部地区。2001 年，美国军队入侵阿富汗时与其结成同盟。[13] 2003 年 11 月，俄罗斯联邦杜马成员维克托·沃伊藤科（Victor Voytenko）向北约议会经济和安全委员会通报说，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自 2001 年以来已增加约 47%，北部地区尤为明显。在与阿富汗接壤的塔吉克斯坦的邻近几个省份，罂粟种植面积也大大增加。阿富汗境内共有 400 多个提取毒品的实验室在运作，其中 70%的鸦片和 100%的海洛因通过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被走私到欧洲[14]，涉及资金数十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2002 年为 13 亿美元，2003 年上升到 23 亿美元。[15]预计罂粟产量将达 3 600 吨或 4 000 吨，创 1999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6]美国驻喀布尔大使扎勒米·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曾警告说，阿富汗正在变成一个“毒品国家”，毒品男爵们比政府拥有更大权力。有组织犯罪根深蒂固，使得鸦片的生产发展到海洛因。[17]



由于难以凭借武力并通过举行自由度令人质疑的选举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府，进而实施建立一个民主表象的政治计划，因此，人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看到的是美国的政治失败。美国在战略上已输掉了小布什所称的反恐战争。不过，尽管小布什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并对其他国家进行恫吓，使世界处于不安宁和愤怒之中，但他依然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参议员。他得到了 29 个州 274 张选举人票和 52%选民票的支持。这表明，美国选民不仅仅由于伊拉克战争，还因为道德和宗教问题而彻底两极分化。在一个总人口为 2.9 亿而其中 1 亿人将自己视为福音教徒的国

家，小布什获胜并不令人惊奇。[18]尽管美国拥有一批头脑清醒、信息灵通、知识渊博的学术和文化精英，尽管美国的科技领先于世界各国，但宗教依然与科学相对立，一部分民众反对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学校的教学内容。根据盖洛普研究所进行的调查，34%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该完全相信《圣经》内容，48%的人认为《圣经》的启示是神圣的，但不应总是全信，只有15%的人认为《圣经》是一本寓言集，3%的人未发表意见。[19]小布什利用美国人的恐惧心理，通过频繁发布可能的恐怖袭击预警（黄色和红色），制造一种不安全气氛。他借助道德和宗教价值击败了克里。小布什宣扬福音派原教旨主义，就好像自己是上帝选定的，即国家的化身，比其他任何人更能代表美国。他继续煽动具有帝国主义目的的民族主义。[20]

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纳托尔·列文（Anatol Lieven）指出，“原教旨主义的虔诚已经成为美国右翼变得激进并把政治对手妖魔化为上帝的叛徒、美国的敌人的组成部分”[21]。他认为，这一现象发生的最根本因素是“与从前的白人南部密切相连的基督教右翼和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或至少是其强硬派利库德集团之间”与日俱增的同盟关系。[22]《旧约》就规劝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同情犹太教，千年学说对于支持以色列势力的形成同样重要，因为它被视为世界末日到来和基督教及其圣徒赢得胜利的必要前奏。列文认为，怀有同样仇恨的事实可能是促使犹太复国主义强硬路线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右翼联合的原因。后者部分立足于民族主义思想，出于对世界将被假耶稣统治的荒唐担忧，它始终仇视联合国。[23]曾担任肯尼迪助理的记者比尔·默耶斯（Bill Moyers）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指出，福音原教旨主义者构成了共和党的“强大势力”和作为华盛顿权力垄断者联盟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一联盟在一代人时间中迅速转向得到各大公司资助的右翼及其各种变体。默耶斯称，“我不清楚小布什总统如何看待原教旨主义狂热的宗教学者，但如果没有他们，他就无法成为总统”[24]。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主任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J. Bacevich）也得出同样结论。他认为，作为宗教右翼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与以色列持强硬路线者有很大一致性，他们都认同以色列制定和使用武力方式的战略风格。巴切维奇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在正义战争传统中制造了漏洞”[25]。小布什被选定为本·拉登在福音派中的对立面，在2005年1月20日开始新任期时发表的21分钟演讲中，他在49处使用了“自由”一词。他说，“所有生活在专制下并看不到希望的人们应该懂得，美国不会无视你们所遭受的压迫或原谅你们的压迫者”。他就像在做“登山宝训”一样声称，“当你们为自由而奋斗之时，我们将与你们站在一

起”[26]。作为精神引路人和导师给予他启发的是极右翼俄罗斯犹太人夏兰斯基，此人任以色列不管部部长，是沙龙内阁的二号人物。夏兰斯基认为，“任何地方的自由都会使全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由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应在全球推广民主中发挥重要作用”[27]。这一观点显然符合“新美国世纪计划”的主张。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美国将与自由的盟国一起支持“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民主运动，“以达到在全世界消灭专制政权的终极目标”。他还恬不知耻地声称，“美国没有权利、愿望和意图把自己的政府形式强加给任何人”，而这是美国与美国敌人的最主要不同之处。接着，小布什指责叙利亚允许恐怖分子利用其领土和黎巴嫩部分地区来达到破坏该地区和平的目的。这样，美国国会就批准了《叙利亚责任法案》[28]，对其采取了一系列制裁。他还指责伊朗作为“世界上支持恐怖活动的主要国家”，在剥夺人民所追求的和应享受的自由的同时，始终寻求发展核武器。他再次以“救世主”身份直接劝告伊朗人民，让他们揭竿而起反对什叶派政权：“今晚，我要告诉伊朗人民，当你们在为自己的自由奋斗之时，美国将与你们站在一起。”[29]在重申“推动几代人所致力的自由尤其是中东地区自由”后，小布什表示，伊拉克已成为反恐战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沿阵地”，美国士兵在那里打击恐怖分子为的是不必“在家门口”对付他们。他认为，推动自由的承诺正在伊拉克得到履行和考验。

小布什把2005年1月30日在伊拉克举行的选举当作其通过武力输出民主工程的胜利加以庆贺。尽管伊拉克局势并不稳定，但他坚持不改变选举日期，这不仅是因为来自什叶派的压力，也因为他希望通过选举使战争和占领合法化。举行选举显然对什叶派有利，因为他们占伊拉克人口的多数，这样，他们就能在逊尼派统治伊拉克几十年后重掌政府。在1 420万名登记选民中，有8 456 266人（约占59%）参加了投票，这意味着放弃投票者的比例相当高。由出生在伊朗的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Sayyid Ali Husaini Sistani）支持的伊拉克统一联盟以48.1%的选票赢得了立法选举，库尔德爱国联盟和库尔德民主党联合组成的库尔德联盟以25.4%的选票位居第二，得到美国支持的什叶派总理阿拉维获得总票数的13.8%，临时总统加亚瓦尔仅得到1.7%的票数。选举结果并非如华盛顿所愿，尽管这一结果在预料之中，因为什叶派占总人口的60%。美国除了接受选举结果并无其他选择。开罗的《金字塔周刊》认为，不管如何，这些选举既不合法，也不可信，更不民主，因为它们是在侵略者控制下进行的，没有任何国际观察员的监督。[30]在18个省中，3个逊尼派占多数的省份（萨拉赫丁、摩苏尔省和安巴尔省），由于伊斯兰党的抵制，前往票站

投票的选民很少。在摩苏尔和库尔德地区，存在严重的舞弊现象。君主立宪运动领导人谢里夫·侯赛因声称，“不幸的是，选举既非公正，也非自由”[31]。

在一个极端两极分化社会中，可预见的是，选举结果将进一步加剧中东的动荡，其后果难于预料。[32]美国企图强行实施的非宗教民主似乎十分困难，它与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所构想的教士政治格格不入。西斯塔尼是什叶派最高宗教机构位于纳杰夫的哈瓦扎神学院至高无上的领袖。[33]领导武装组织抵抗占领军的什叶派年轻阿訇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反对联合国的介入，他一直希望在伊拉克制定一部伊斯兰宪法。正是因为阿亚图拉西斯塔尼从中斡旋，他才中止了抵抗运动。《金字塔周刊》推测，假如萨德尔能建立足够的民众支持基础，并获得对纳杰夫的哈瓦扎神学院的领导，进而建立一个与伊朗结盟的伊斯兰共和国，那么就不能排除伊拉克“黎巴嫩化”的可能。[34]袭击和流血事件并没有在选举后停息，伊拉克的前途依然很不确定，但能确定的是美国推行的“国家重建”政策再次遭到失败。美国本该在越南就吸取教训，高新技术和尖端武器并非成功的保证。北卡罗来纳大学拉斯·舒尔茨（Lars Schoultz）教授认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军事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但反而变得几乎毫无用处。它能够进行摧毁，却难以达到目的，除非是格林纳达这种处于其前沿阵地且微不足道的小国。[35]舒尔茨在1987年就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希望领导西方的国家能承载欺负邻居的恶霸和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野蛮国家形象”。他还说，“兰博只是一部电影，而不是对外政策”[36]。

曾在约翰·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在《对外政策》杂志中发表的一篇题为“不久的启示录”的文章中，预见了一场核灾难的可能。他告诫美国放弃冷战风格，不要把核武器当作对外政策工具。他写道：“美国当前的核武器政策过于简单化且具挑衅性，我将其定性为不道德、不合法、军事上毫无必要并有令人恐惧的危险。”他指出，一枚核弹可能被意外或不经意发射的风险很高，这令人无法接受。小布什政府通过保持核武器库作为其军事实力主要依托的做法，违反禁止在50年内扩散核武器和核燃料的国际公约。[37]麦克纳马拉认为，向同样也拥有核武器的敌人使用核武器是一种自杀性行为，用核武器打击不拥有这类武器的敌人，“军事上毫无必要，道德上无法接受，政治上站不住脚”。他根据自身经历意识到，美国的核武器政策正在给其他国家和美国自身制造风险。[38]

小布什以核讹诈为手段的“兰博式”国际政策确实令其他国家感到恐惧，这些国家开始确定自身的民族利益。朝鲜和伊朗等国也试图获得制造

核弹头的能力。另外一些国家则拒绝美国的单边领导地位，反美情绪在世界各地呈上升势头。如果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和约旦举行真正民主选举，那么可能当选者如果不是本·拉登本人，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埃及，美国国务卿赖斯曾向穆巴拉克总统施压，要求举行他本人不是唯一候选人的选举。那里的原教旨主义组织“穆斯林教友会”一直是政府的对立面。巴基斯坦的情况也类似，本·拉登支持者可能会赢得选举，核武器库可能会落入他们手中。1997 年，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总统泽鲁阿勒（Lamine Zéroual）将军在原教旨主义者候选人获胜在望情况下取消了选举，从而引发了大量袭击事件，造成约 1 850 人死亡。民族主义、反美和反全球化情绪在所有穆斯林国家人民中成为主导思潮，伊拉克战争后变得尤为明显。许多人支持“基地”组织和其他被美国定性为恐怖主义的组织。人们对小布什的反感极为强烈，以至于他在进行国际旅行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他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 16 个小时，从机场进城的时间不能多于 30 分钟。他在国际旅行中不再接受记者采访，不与民众有任何接触。[39]

人肉炸弹不可原谅还是情有可原？

巴勒斯坦人针对伊朗人实施的袭击		
国家	不可原谅（%）	情有可原（%）
土耳其	67	24
巴基斯坦	36	47
摩洛哥	22	74
约旦	12	86

针对在伊拉克的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实施的袭击		
国家	不可原谅（%）	情有可原（%）
土耳其	59	31
巴基斯坦	36	46
摩洛哥	27	66
约旦	24	70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2004 年年初，在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范畴内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本·拉登是最受印尼、约旦、摩洛哥、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信任并被认为能在世界问题上正确行事的三位领导人之一。他在各国受支持率很高，在巴基斯坦、约旦和摩洛哥分别为 65%、55%和 45%，即使在土耳其，也有约 31%的人认为，针对在伊拉克的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的袭击情有可原。[40]这四个伊斯兰国家的大部分人对反恐战争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认为美国意在控制中东石油，进而统治全世界。在欧洲，入侵伊拉克

一年后，人们对美国及其政策的不满有增无减。在法国、德国甚至英国，人们对美国的看法和对伊拉克战争的结论都是负面的。根据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在欧洲和穆斯林国家，人们普遍感受到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伊拉克战争败坏了美国在海外的信誉”。在科索沃战争中担任北约最高指挥官的克拉克将军对此深有体会。人们所不满的并非美国的价值及其生活方式，而是美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41]他认为，人们对反恐战争隐含的意图疑虑重重，相当高比例的欧洲人指望建立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安全协议，希望欧盟成为一个军事集团。[42]与前一年所做调查一样，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沟壑并未缩小。

美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来自其他任何国家，也不是来自恐怖分子，而是因为其经济和金融变得日益脆弱。1999 年起所做的估算表明，美国的外债已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998 年为约 1.72 万亿美元，1999 年将增至 2.02 万亿美元，2000 年将达到 2.34 万亿美元，2005 年将跃升至 4.36 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36.4%。[43]……2002 年，高盛集团经济学家预计，到 2006 年年底，美国的净负债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46%。[44]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03 年 6 月 30 日，外国政府、中央银行、私人银行和其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外债为 6.357 万亿美元，相当于该国 10.893 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 58.8%。同年 12 月 31 日，该数值增至 6.946 万亿。至 2004 年 9 月，外债已高达 7.869 万亿美元。[45]

2004 年 9 月 30 日美国毛外债状况

毛外债货币构成（百万美元）

外国货币		
	短期	91 890
	长期	560 350
	合计	652 241
本国货币（美元）		
	短期	2 692 131
	长期	3 433 234
	合计	6 125 365
未知[46]		1 091 020
毛外债		7 868 626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Treasur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ww.treas.gov/tic/debt904.html。

7.8 万亿美元的高额外债使美国只能依赖于外来投资。但由于美元的走弱以及预算和外贸赤字的增加，外国投资呈下降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了美国经济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所面临的威胁，这一不平衡已处于“战后几乎从未在工业国家出现过”的水平[47]，而这可能导致汇率的突然调整，使投资者感到恐慌。许多投资者已对美国经济失去信心，并正把此前用美元投资的基金转为欧元。2004 年 1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度发出警告，公开承认“美国的大量财政赤字已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巨大风险”，“财政和经常性项目的双重困难更令人担忧”[4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未来几年内，美国将增加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20%的外债，并认为这将是“一个工业大国前所未有的外债水平”[49]。外贸逆差也从 2003 年的 4 965 亿美元增至 2004 年创纪录的 6 170 亿美元，其中仅与中国的逆差就高达 1 620 亿美元。[50]这一逆差损害了美国经济及其生产和服务能力，与财政赤字相对应。在至 9 月结束的 2004 财政年度，美国的财政赤字攀升至 4 120 亿美元，这还未包括用于占领和重建伊拉克的数百亿美元。

国际收支经常性项目和外贸收支　　单位：十亿美元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经常性项目	−136	−210	−297	−413	−386	−474	−531	−556
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6	−2.4	−3.2	−4.2	−3.8	−4.5	−4.8	−4.7
外贸收支	−108.178	−164.868	−263.252	−378.344	−362.692	−421.735	−496.508	−617.725

资料来源：Fundo Monetário Internacional e U. S. Census Bureau，Foreign Trade Division。[51]

时至今日，美国在提高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双重赤字）和外债方面所拥有的便利，使得国家、私人部门和家庭这三个经济角色能够在相对长的时间内维持高于实际能力的生活水平，进行超出收入的消费。同时，政府在尖端技术研究领域投入巨额资金，以便使美国在工业、通信和信息领域的发展保持领先地位，这是社会不平等环境下军工集团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必需的。2003 年，美国有 3 59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比 2002 年增加约 130 万。[52]美国拥有双重赤字和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2/3 的外债，但却没有破产，是因为美元是世界流通和储备货币，多数石油交易用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它是世界市场 67%的其他交易的基础。用欧元进行的交易仅占 13%，其余（20%）用英镑和日元等货币进行。

鉴于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经济体系，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各国经济的相加，因此，对外国政府、各国中央银行和私人银行等大多数债权人来说，美国经济崩溃也同样会使它们受到损害，包括债权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将会受到不同形式的沉重打击，美国市场和产品供应国市场的需求会出现

巨大萎缩，通胀将会侵蚀世界经济。这是投资者依然对美国保持信任的主要因素，但这一信任越来越受到美国双重赤字和外债增长的削弱。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中央银行开始把原先的美元储备替换为欧元或其他货币。美元不断贬值导致石油价格上升，石油涨价又使美国的外贸逆差进一步扩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形势每况愈下。

未来的前景是，美国内外平衡成分结构上的不均衡以及面对赤字增长的政治感觉和市场敏感性，最终将爆发出葬送它的力量。正因为如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4年11月19日对欧洲各国央行行长发表讲话时表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本身并不一定是问题，问题是逆差的累计，它将会导致国际净投资水平的下降，正如美国所发生的那样。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性项目逆差已达约6 000亿美元，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53]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格林斯潘发出了警告，但白宫依然宣布，2005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将达4 270亿美元，超过2004年度4 120亿美元这一创纪录水平。这一数字还未包括小布什所要求的用于伊拉克战争的800亿美元。[54]国会预算办公室注意到，如果小布什能让国会批准作为其政府优先点的持续减税法案，那么，赤字将在此后的10年内达到2万亿美元。即使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开支逐步减少，赤字仍将维持在约6 000亿美元水平。[55]2005年3月2日，格林斯潘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宣称，统一预算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2%，根据政府和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除非采取大的削减赤字行动，否则，我们的预算水平在未来几年中不会有实质性提高”[56]。格林斯潘强调，在2004财政年度，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的支出总额为国内生产总值的8%。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估计，这一比例到2015年将增至9.5%，2030年将达到13%左右。他警告说，这些开支的增长速度依然高于整个经济的增长，向这些计划提供附加资金将给预算带来压力，“它似乎越来越使现行的财政政策难以为继”[57]。统一预算赤字不断升级的可能令人十分担忧，因为，它将无情地夺走私人资本形成的日益增长的实际资金量，并将给“生活水平的提高投下更大阴影”[58]。

然而，问题不仅仅或主要是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2005年9月开始的2006财政年度，五角大楼的预算为4 19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以下费用：能源部用于生产核弹头的费用；与国务院防务相关的活动，如资助外国军队；通过退伍老兵事务管理局向老兵提供的补助；与国内安全部防务相关的活动，如海岸警卫队的防务活动；与多个其他联邦机构防务相关的各种活动；通过贷款预支的军事活动费用的利息。这

样，与军队和防务有关的总费用估计将达约 8 400 亿美元，相当于预计 2.57 万亿总预算的 1/3。[59]

国防预算 单位：十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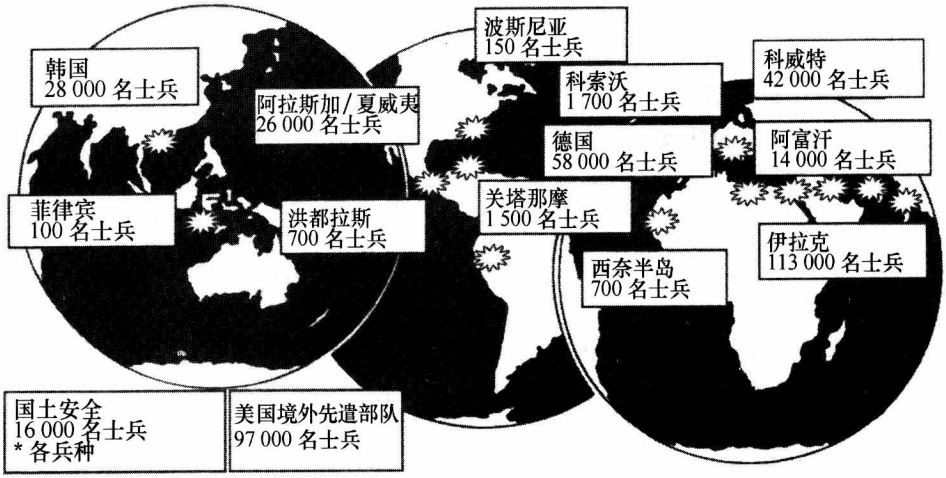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国防预算	271.7	270.2	275.5	295	306.1	348.9	404.9	454
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3.3	3.1	3	3	3	3.4	3.8	3.9

资料来源：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美国财政状况前景十分黯淡。尽管美国藐视联合国，拉姆斯菲尔德狂妄地称法国和德国是“旧欧洲”，但如果说小布什有所感悟的话，他表面上明白了美国单边主义的局限性。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成本，不管是资金还是人员，都要远远高出他和“新保守派”的想象，美国陷入了伊拉克泥潭。尽管围绕伊拉克选举做了大量宣传，但难以看到真正使其实现稳定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小布什一方面呼吁联合国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在开始第二任期后不久，访问了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寻求与那些国家和解，让它们捐弃前嫌。但他并未如愿，小布什与施罗德和希拉克“合影时刻”的微笑和握手无法抹去双方的分歧。

虽然五角大楼极力通过媒体掩盖事实，但由于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失败，美国无力针对伊朗和（或）叙利亚发动新的战争冒险行动，尽管它拥有巨大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优势。驻扎在伊拉克的部队相当于美国可供调动兵力的一半以上。[60]除了在伊拉克和科威特部署的 153 000 名士兵外，美国还在阿富汗、韩国、巴尔干、西奈半岛和其他各国驻扎了部队。约 64 万名现役军人中有 315 000 名左右驻扎在海外 120 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以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战争舞台（见下图）的行动。另外还有一支得到合同商（雇佣兵和私人军事公司）支持的由约 25 万人组成的非军事人员队伍，用来调动、使用和维持国内外的军事行动。[61]

陆军部长弗朗西斯·哈维（Francis J. Harvey）在向参议院和众议院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大规模战斗和维稳行动“对我们的装备和士兵提出了极高要求”[63]。美国人民可能难以接受招募预备役人员。自伊拉克战争开始到 2005 年 2 月，已有约 8 000 名士兵开了小差，许多人移居加拿大。2005 年 2 月，美国陆军招募现役士兵人数下降 27%，在近五年内首次未完成征兵指标，只招募到 5 144 人，比所需的 7 050 人少 1 936 人。2005 年年底前招募 80 000 名新兵的目标估计也难以实现。位于诺克斯堡（肯塔基州）的美国陆军征兵司令部发言人道格·史密



美国在本土外的兵力（2005 年 2 月）

资料来源：Office of the Chief of Staff，U. S. Army，Executive Office of the Headquarters Staff Group。[62]

斯（Doug Smith）把这一问题部分归结于正在好转的经济形势和父母对自己孩子可能在伊拉克死伤的担忧。[64]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两年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理查德·梅耶斯（Richard B. Myers）在国会表示，由于美国卷入伊拉克战争且为这一战争付出了比预想更多的生命和资金，美国军队正面临难以恰当地执行使命并战胜海外敌人的“巨大风险”[65]。

与朝鲜的摩擦被悄悄从议事日程中删去。虽然小布什指责伊朗是世界上“恐怖主义的最主要支持者”，但由于会在经济和军事上给美国带来麻烦，因此，围绕伊朗铀浓缩的冲突很难演变为一场战争。除了能对驻扎在伊拉克和两伊边境的美国军队发动袭击外，伊朗还威胁将以石油作为武器。伊朗国家安全最高委员会主席哈桑·罗哈尼（Hassan Rowhani）警告说，美国在玩火，如果小布什政府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采取制裁，中东将变得更不稳定。他说：“首先感受危机后果的将是美国。”这里他指的是石油价格上涨将对西方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冲击。[66]

不同于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美国所领导的西方并没有就小布什政府所指的恐怖主义的内涵取得一致，德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感到来自伊朗或叙利亚的威胁，它们同样也没有感到朝鲜或伊拉克的威胁。美国在世界舆论中日益孤立，缺乏可信度，也无道德可言，其好战政策导致了人们对它的反感。它正在丧失工业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并由此丧失行使霸权的条件。冷战时期，面对苏联实行的专制统治，美国所提倡的捍卫民

主的口号至少对西欧国家人民而言具有内涵和一定意义。而小布什所宣扬的内容却难以令人信服，他在夏兰斯基怂恿下提出的反对专制的言论显得空洞、虚伪和荒唐。美国政府本身就不遵守国际公约，而且还通过《爱国法案 I》和《爱国法案 II》限制民众自由。此外，它还设立了诸如古巴关塔那摩这样的集中营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央情报局还把囚犯交给其他国家，以便对他们施以酷刑。“权力的真实关系”使美国得以如此滥用权力，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国家能与其抗衡。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将过度强大视为罗马帝国衰落的自然和难以避免的结果。这说明美国也会得到同样下场。正如罗马帝国所经历的那样，富裕使衰落的要素趋于成熟。“毁灭的因素随着征服范围的扩大而成倍增加，一旦意外事件使人为支柱受到破坏，巨大的穹顶将会倾塌并压在自己身上。”[67]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承认，未公开宣称的美帝国的衰败可能发生，但并非由于来到其家门口的恐怖分子，或者那些支持他们的“流氓政权”，而是“由自身福利状况的财政危机所引发”[68]。毫无疑问，美国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困难等因素让帝国再维持几十年已变得越来越困难。[69]美国已变成一个极易受伤的超级大国，它不仅在能源和石油供应上依赖他国，也指望外国资本为其赤字和外债买单。根据预测，到 2020 年，按购买力计算，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将有可能被中国取代。[70]估计它的衰落将与它上升为世界唯一霸权国家、超帝国主义同盟体系首领和引导者一样迅猛，该同盟体系自伊拉克战争后开始出现明显瓦解趋势。曾制定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对外政策的基辛格国务卿 2001 年警告说，不管美国如何看待自己的目的，但“明确坚持霸权”将使世界逐渐结成反对它的联盟，这有可能促使它走向孤立和毁灭。[71]

【注解】

[1] Mahle, 2004, p. 350.

[2] Sengupta, Ki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IISS). “Iraq Occupation Made World Less Safe, Pro-War Institute Says Studies”. *The Independent*, 26/5/2004.

[3] ABC News-http://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id=178561.

[4] Priest, Dana & White, Josh. “War Helps Recruit Terrorists, Hill Told Intelligence Officials Talk Of Growing Insurgency”. *The Washington Post*, 17/2/2005, p. A01.

[5] Boorstin, Robert & Galic, Mina. “Afghanistan in Crisis—Facts and Figure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October 4, 2004.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site/pp.asp?c=biJRJ8OVF&b=202861&printmode=1.

[6] Clark, 2003, p. 153.

[7] Boorstin, Robert & Galic, Mina. "Afghanistan in Crisis—Facts and Figure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October 4, 2004.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site/pp.asp? c=biJRJ8OVF&b=202861&printmode=1.

[8] AntiWar. Com. http://www.antiwar.com/casualties/.

[9] Gall, Carlotta & Rohde, David. "Afghan President Describes Militias as the Top Threat". *The New York Times*, 12/7/2004. Late Edition-Final, Section A, p. 1.

[10] "The Rule of the Gun.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the Runup to Afghanist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 Human Right Watch Briefing Paper*. September 2004.

[11] Ibid.

[12] Clark, 2003, p. 152.

[13] BBC News. "The drugs threat to Afghanistan". Last Updated: Tuesday, 10 February, 2004, 16: 11 GMT.

[14] Pravda Online. http://english.pravda.ru/main/2002/10/29/38853_.html. Opium Production Soars in Post-Taleban Afghanistan. NATO Parliamentary Assembly Press Release.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news/2003/11/mil-031109-nato-pa02.htm

[15] BBC News. "The drugs threat to Afghanistan". Last Updated: Tuesday, 10 February, 2004, 16: 11 GMT. McGirk, Tim (Kabul). "Terrorism's Harvest. How Al-Qaeda is tapping into the opium trade to finance its operations and destabilize Afghanistan". *Time Asia*. 9/8/2004, vol. 164. nº 6A.

[16] Ibid.

[17] Burnett, Victoria (Kabul). "Crackdown on Afghanistan's cash crop looms". *Boston Globe*, 18/9/2004.

[18] Bacevich, 2005, p. 123.

[19]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 "Public view of creationism and evolution unchanged, says Gallup". http://www.ncseweb.org/resources/news/2004/US/724_public_view_of_creationism_and_11_19_2004.asp.

[20] Lieven, 2004, p. 20.

[21] Id., ibid., p. 20.

[22] Lieven, Anatol. "The Push for War".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24 nº 19, 3/11/2002.

[23] Ibid.

[24] Moyers, Bill. "Welcome to Doomsday".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2, nº 5, 24/3/2005.

[25] Bacevich, 2005, pp. 132–134.

[26] White House—President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Sworn-In to Second Term

For Immediate Relea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anuary 20, 2005. Baker, Peter & Fletcher, Michael A. "Bush Pledges to Spread Freedom Global Focus On Rights Would Be a Shift in Policy". *The Washington Post*, 21/1/2005.

[27] Sharansky, 2004, p. 17.

[28] 108th Congress 1st Session. S. 982. Syria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03. 阻止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结束其对黎巴嫩的占领，停止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止从伊拉克非法进口石油，使其在中东扮演负责任的角色等目的。In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1, 2003.

[29] White House—President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Sworn-In to Second Term For Immediate Relea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anuary 20, 2005.

[30] "Empty promises: Caught between a political process of questionable legitimacy and a dire security situation, Iraqis go to the polls on Sunday." *Al-Ahram Weekly*, 28/1/2005.

[31] "Post-election doldrums". *Al-Ahram Weekley*. 24/2—2/3/2005, nº 731.

[32] Kepel, 2004, p. 274.

[33] Id., ibid., p. 278.

[34] "Lebanonising Iraq". *Al-Ahram Weekley*. 29/1—4/2/2004, nº 75.

[35] Schoultz, 1987, p. 289.

[36] Id., ibid., pp. 323-324.

[37] McNamara, Robert. *Apocalypse Soon*.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5. http://www.foreignpolicy.com.

[38] Ibid.

[39] Halpen, 2004, p. 311.

[40] Pew Research Center. "A Year After Iraq War Mistrust of America in Europe Ever Higher, Muslim Anger Persists". Released: March 16, 2004.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display.php3? ReportID=206.

[41] Clark, 2003, p. 179.

[42] Pew Research Center. "A Year After Iraq War Mistrust of America in Europe Ever Higher, Muslim Anger Persists". Released: March 16, 2004.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display.php3? ReportID=206.

[43] Blecker, Robert A. "The Ticking Debt Bomb. Why the U. 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Position Is Not Sustainable". June 1999. *Briefing Paper*.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44] Coy, Peter. "Deeper Debt For Uncle Sam". *Business Week*, 18/3/2002.

[45] U. 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 S. External Debt Treasury International Capital System. http://www.treas.gov/tic/external-debt.html. "US gross external debt more than $6 trillion-Trsy". Reuters, 10/8/2003, 7:40 PM ET. Forbes. Com http://www.forbes.com/home_asia/newswire/2003/10/08/

rtr1103708. html.

[46] 在直接投资范围内的贷款、政府其他债务和向其他领域的小额贷款构成不详。

[4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pter II. Essays on Trade and Finance, p. 66. http://www. imf. org/external/pubs/ft/weo/2002/02/pdf/chapter2. pdf.

[4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U. S. Fiscal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for Long-Run Sustainability". Martin Mühleisen and Christopher Towe, editors. January 7, 2004.

[49] Ibid.

[50] U. 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U. 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Highlights February 10, 2005.

[51] United States: 2004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Staff Report; Staff Supplement; and Public Information Notice on the Executive Board Discussion July 30, 2004.

[52] U. S. Census Bureau.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3.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Issued August 2004, by Carmen DaNava-Walt, Bernadette D. Proctor & Robert J. Mils. http://www. census. gov/hhes/poverty/poverty03/pov03hi. html. U. 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2003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http://www. census. gov/hhes/www/poverty. html.

[53] Federal Reserve Board. "Remarks by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At the European Banking Congress 2004, Frankfurt, Germany", November 19, 2004. Panel discussion: Euro in Wider Circles.

[54] Andrews, Edmund L. "Bush Aides Say Budget Deficit Will Rise Again". *The New York Times*, 26/1/2005. Weisman, Jonathan. "Record '05 Deficit Forecast. War Costs to Raise Total to $427 Billion". *The Washington Post*, 26/1/2005, p. A01.

[55] Ibid.

[56] Statement of Alan Greenspan, Chairman of Board of Governo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the Budget.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arch 2, 2005.

[57] Ibid.

[58] Ibid.

[59] Department of Defense Budget for FY 2006.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omptroller), February, 2005. National Defense Budget Estimates for FY 2005.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omptroller). March, 2004.

[60] Clark, 2003, p. 162.

[61] United States Senate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irst Session, 109th

Congress.《陆军势态报告》属非机密文件，是一份关于陆军的角色、使命、成就、计划和方案的摘要，用以加强陆军部长和陆军司令的地位，说明陆军的势态，并被用来作为从国会获得预算的证词。对广大民众来说，《陆军势态报告》是陆军状态的一个基本描述。Office of the Chief of Staff, U. S. Army,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Headquarters Staff Group. www. army. mil/aps.

[62] Defense Subcommittee Hearing on FY 2006 Army Budget Overview: A Statement on the Posture of the Army (The Honorable Francis J. Harvey and General Peter J. Schoomaker). www. army. mil/aps.

[63] Ibid.

[64] Moniz, Dave. "Army misses recruiting goal". *USA Today*. 2/3/2005.

[65] Mazzetti, Mark. "Military at Risk, Congress Warned". *Los Angeles Times*, 3/5/2005. Tyson, Ann Scott. "Two Years Later, Iraq War Drains Military. Heavy Demands Offset Combat Experience". *Washington Post*, 19/3/2005.

[66] Siamdoust, Nahid. "Iran Says It Will Resume Enrichment if EU Talks Fail". *Los Angeles Times*, 6/3/2005.

[67] Gibbon, 1994, vol. 2, p. 509.

[68] Ferguson, 2004, p. 279.

[69] Trubowitz, 1998, p. 244.

[70] Eland, 2004, p. 109.

[71] Kissinger, 2001, p. 468.

结　语

在一切公众自由的敌人中，战争或许是最令人恐惧的，因为它包含和造就了其他每一个敌人，它是军队之源。（……）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持续战争中保存自由。

詹姆斯·麦迪逊，1795[1]

（……）过分庞大的军事机构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之下都不利于自由，应被视为对共和政体自由的严重危害。

乔治·华盛顿，1796[2]

1893年，恩格斯在写给丹尼尔森（N. F. Danielson）的信中驳斥了关于资本主义恶果在俄国要比在美国更容易消除的理论。经济学家斯特鲁韦（J. P. Struve，1870—1944）赞同这一理论。他忘了恩格斯曾经说过，由于自身的起源，美国是一个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它由逃离欧洲封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所建立，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3]。俄国则存在一个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基础，一个文明之前的氏族社会[4]，尽管正处于灭亡之中，却成为资本主义革命（而实际上是一场社会革命）发生和实现的物质基础。美国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实行了货币经济[5]，在俄国，自然经济几乎毫无例外地在所有地区占据主导。[6]恩格斯因此提出“在俄国，这种变动一定比美国强烈得多，尖锐得多，遭受的痛苦更大得无比”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7]

组成美国的13个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是1648年英国革命在美洲的继续。移居北美的群体中包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军队的激进分子、清教徒、英格兰的贵格会成员、德国南部和瑞士的摩拉维亚人、士文克斐特派成员、灵感论者、门诺会成员、荷兰的加尔文派教徒、拉巴底（Jean de Labadie）的弟子、福音派教徒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为躲避宗教战争的难民。美国独立战争标志着封建主义的终结和资产阶级的崛起。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识》一书中写道：“旧世界的每个地方都充斥着压迫，自由在全世界被扼杀，亚洲和非洲早就将其逐出”。他还指出，“欧洲认为它古怪，应该对它下驱逐令。哦！请接受逃犯，及时为

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8]。潘恩认为，美国的独立如果没有政府准则和行为的革命相伴随，而仅仅被看作从英国分裂出去的一个行为，那它并无太大重要性。[9]美国不仅为其自身也为世界奠定了一个基础，它看到了比其所能获得的好处更多的东西。[10]通过民主革命传播自由的愿望在潘恩的话中被清晰地表露。

1776—1783年的独立战争所代表的美国革命随着南北战争（1861—1865年）而告终。约60万美国人在那场战争中丧生，联邦权力得到壮大和巩固，这使得北方工业化州能够把从事农业为主并遭受战争破坏的南方融入其经济体系之中，并在废除奴隶制的同时，铲除前资本主义关系和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法规。通过建立此前因棉花种植园主利益而难以实现的保护性关税，美国的工业和城市化水平得到巨大发展。铁路的建造始终伴随着对土地的投机，国会议员常常分不清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通过投机，他们根据用益权占有了所建立的企业，人民悲哀地见证了名誉和道德的沦丧。[11]1860年，美国共有铁路5万公里，主要集中在北方，到1870年增加到8.5万公里，1880年更猛增至15万公里。[12]这不仅使运输成本降低，而且使商品流通更加便利。1865—1895年间，美国的铁路网总长度增加了4～5倍。到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已越来越多地为自身建设提供必要设备。

1902年，马克思的继承者、社会国际主要理论家考茨基指出，美国是所有文明国家中最重要和最令人感兴趣的国家。他认为，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拥有其发展的特有模式，一个国家能为另一个国家指明前途，那么，为德国指明前途的不是英国，而是美国。他认为，资本主义已在美国取得巨大发展，“以极端无限制的野蛮”主宰那里，其趋势是把因竞争而加剧的阶级对抗推向极致。[13]这一野蛮竞争进而向世界延伸。美国的主要对手并非英国而是德国。德国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与其相对狭窄的经济空间发生碰撞，再加上国内社会和政治的紧张状况，随之引发了1914—1918年的战争，这就是鲁道夫·希法亭所预言的暴力解决方式。[14]

考茨基在1914年预言，工业国家和市场中的企业一样，最终将联合起来结成某种卡特尔，它们不再为武器而竞争。为消耗军工产品而发动的战争将局限于发达国家与资本主义体系边缘不发达国家之间或仅仅发生在不发达国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由于法国和英国经济的衰落，美国开始以霸权国家的姿态呈现。随着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美国巩固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它以《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关贸总协定》所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作为护身符，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原则

构建了国际经济体系。罗斯福总统努力创建的联合国是国际联盟的翻版，但却更为成功，它是消除美苏间矛盾的工具。

美国创立者为之奋斗以及潘恩所极力捍卫的自由，在冷战期间越来越类似消费资本主义，即“自由企业”。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里克·福纳认为，“自由企业”成了美国的最大自由和“美国生活方式”定义的组成部分。[15]“自由世界”就是“自由企业”、“自由市场”的世界。美国极力宣扬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如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自由汇率和多边贸易。在各个历史阶段，军国主义始终伴随其经济和贸易扩张以及不仅仅局限于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领土扩充。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1861—1865 年）曾说过，国家的安全并非基于军舰、军队或堡垒，而是将自由作为任何地方人们的遗产加以崇尚的精神。他告诫美国人在专制种子没有被播种在家门口的前提下不要破坏这一精神。专制种子就在“帝国式总统职权”之中，林肯本人就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他对战争与和平所拥有的权力。[16]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成员的美国法学家本杰明·柯蒂斯（Benjamin R. Curtis）指责林肯在南北战争（1860—1864 年）期间建立了“军事专制”。按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的说法，其行为更像“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君”。林肯藐视国会，滥用权力，在内战期间，他未经宣布就在战争后方实施了戒严令，在没有司法批准的情况下，下令逮捕人员，没收财产。他还采取了其他专断措施，其行政命令侵入了此前尚属于立法机构的领域。自南北战争起的整个 19 世纪下半叶，军国主义明显抬头，战争成为变卖经济剩余的理想场所和大工业企业的一种需要。国家对军工产品的需求为工业企业提供了市场。1898 年，在威廉·麦金利担任总统期间（1897—1901 年），美国已能与欧洲强国比肩，具备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条件。它以捍卫古巴独立为借口发动了与西班牙的战争，其真正目的是想把西班牙在加勒比和太平洋的殖民地据为己有。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应由国会来宣布战争，武装和维护军队、装备和舰队，批准条约和控制预算。但与独立战争时期（1776—1783 年）英国依然存在的君主立宪[17]模式一致，宪法不仅把行政权力赋予美国总统，而且还任命他为陆军和海军总司令（第二条第二款）。美国总统拥有和国王同样的权力，尽管他由选举产生，且有一定任期。1789—1791 年任参议员的宾夕法尼亚州政治家威廉·麦科莱（William Maclay，1737—1804）在美国颁布宪法后不久就在日记中写道，乔治·华盛顿的追随者们具有君主制倾向。副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希望称他

（华盛顿）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殿下及其权利的保护者”[18]。据麦科莱得到的信息，亚当斯试图在参议院保留一把专门的椅子，供华盛顿去那里时坐。他声称：“它应被称为王座，一点不假，我们应该在那把坐椅后面寻求保护”[19]。乔治·华盛顿本人喜欢用“帝国”一词，他以英帝国为骄傲。[20]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贵族做派变成了国王做派。他根本不与别人握手，只是轻微点头以示问候。[21]林肯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的威廉·苏厄德（William H. Seward）对一位英国记者称：“我们选择了一位任期四年的国王，并给予他某些限制下的绝对权力。至于那些限制，归根结蒂，由他自己做出理解”[22]。美国政治学家亨利·福特（Henry Jones Ford）教授1898年写道，“美国民主恢复了人类最古老的政体，它是由选举产生的王权”，拥有总统制的共和，相对君主议会制来说是一种落后政体。英国自1832年起开始向君主议会制转变。[2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美国革命的历史遗产是一个“有限君主制”。她认为，一场革命被它所推翻的政府类型所预先确定是最自然不过的了。[24]共和制是君主制所创造的作为对自身否定的新型政府类型，有与君主制相同的东西。因此，基于18世纪英格兰尚存的君主立宪模式所构想的总统制共和，在北美建立的是一个被雷蒙德·阿隆称为“帝国式共和制”的政体，政府首脑所行使的是小阿瑟·施莱辛格所称的“帝国式总统职权”。曾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并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顾问的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精辟地指出，“美国每四年选出一个国王，但选出的不仅仅是国王，还是高级牧师和预言家”[25]。

> 他是国王，象征意义的国王——我们权利和命运的决定性焦点。他是预言家——作为我们民族自我理解最重要代言人意义的预言家，他将确定民族话语的内容。他是牧师——成为我们的自由形象、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的愿望等意义之上的牧师。他通过选择或回避每一个行动来表达它们。[26]

因此就有了对美国总统不良和非法行为的掩盖，譬如肯尼迪与黑手党之间所存在的危险关系。因此就总是把珍珠港遭轰炸和“9·11”恐怖袭击这类事件的责任归咎于情报部门的失误。因此就总是设法维护“政府尊严”。虽然根据潘恩的说法，“美国宪法相对于自由就如同语法相对于语言”，因为它确定句子的各个成分和句法。[27]但事实上，宪法常常被历任总统绕开或违反，尤其是涉及发动战争的问题和美国的对外政策。法律不再是潘恩所声称的“国王”[28]。1798年，被视为美国创始人之一的托马

斯·杰弗逊指出，行政权是“对战争最感兴趣和最有癖好”的权力分支。[29]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1809—1817年）称，“处理对外关系时最容易滥用人们对政府的所有信任”[30]。他认为国会有权判断美国是否应被迫对外宣战。《联邦党人文集》主要作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则认为，对外政策是行政当局的职责。国会从一开始就为其提供资金，以建立和经营情报部门。为了创造条件证明战争的合理性并促使国会批准宣战，自19世纪起，挑衅行为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家常便饭。

以占据加利福尼亚告终的美墨战争（1846—1848年）的借口由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 Polk）总统（1845—1849年）一手编造。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尤里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假如美国出现在所争夺土地的边缘而远离墨西哥人居住点，就不足以挑起争端。他指出：

> 我们被派去挑起一场战争，但让墨西哥人首先宣战极为重要。国会是否会宣战十分令人怀疑。而一旦墨西哥攻击我们的军队，政府就能够宣告，“其实战争行为已经存在”，并可以极力推进战争。战事一旦开始，很少有公众人士会有勇气再去反对它。经验证明，阻碍国家正在进行的战争的人，不管他正确与否，在生活和历史中都不再会获得令人羡慕的地位。从个人角度看，宣扬“战争、瘟疫和饥饿”胜过成为已开始战争的阻碍者。[31]

这样，为了激怒墨西哥，詹姆斯·波尔克总统命令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将军越过得克萨斯的努伊瑟斯河侵入墨西哥领土。美国军队无视墨西哥政府让其撤军的要求，继续朝格兰德河方向一直推进到马塔莫拉斯附近，并在那里开始建造布朗堡垒。当墨西哥骑兵抓获一支侵入其领土的美军分遣部队时，战争爆发。在帕洛奥多和雷萨卡·德拉帕尔马战役后，波尔克致函国会，要求向墨西哥开战，理由是墨西哥“侵入了我们领土，让美国人的血洒在了美国土地上”。曾担任国务卿和总统的美国伟大政治家约翰·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作为国会议员强烈反对这一侵略政策。亚伯拉罕·林肯也在国会演说中揭露，“与墨西哥进行的是一场由（詹姆斯·波尔克）总统发动的毫无必要和违反宪法的战争”[32]。格兰特将军则毫不犹豫地指出，“墨西哥战争是一场政治战争，政府发动这场战争是想从中渔利”[33]。他还指出，波尔克政府有一个“棘手的问

题”需要解决，因为，他正从事“一场征服战争”，他必须赢得胜利，否则就难以达到政治目的。[34]

1849年，鉴于墨西哥所发生的一切，巴西驻华盛顿全权公使塞尔吉奥·马塞多（Sérgio Teixeira de Macedo）提醒巴西外交部长保利诺·苏译（Paulino José Soares de Sousa）称，美国提出的开放亚马逊河航行的要求“将会为美国定居点的形成和大批美国移民的到来打开大门，其结果将会为类似霸占得克萨斯的行动扫清道路”。他担心美国针对巴西采取“导致战争的行动，以便获得占据马拉若岛的权力，或者其他会使北部省份陷入混乱局面的行动，使其脱离巴西，并在那里建立类似尼加拉瓜的共和国。这样，美国就可以从那里获取一切想得到的东西”。马塞多不相信“还有其他文明国家会像美国那样有如此广泛的挑衅和战争思想”[35]。在他看来，对自身发展引以为傲的“民主”一心只想征服、干涉和对外发动战争。它一方面准备兼并整个北美，另一方面准备对南美施加混同于宗主权的影响政策。

1893年，美国军队占领夏威夷，借口是“保证美国人生命和财产安全”，尽管街上没有任何骚乱，也没有出现对美国公民生命和财产的任何威胁。1898年，美国国会虽存在反对意见，但最终批准将其作为“大美国的第一个海外据点”予以正式兼并。同年，毫无必要地被派往哈瓦那港的“缅因号”战舰爆炸是另一挑衅行为，其目的是使美国得以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进而夺取该殖民帝国尚余部分。正因为如此，请求批准干涉古巴的文书直到1898年4月11日才被提交国会。此前两天，马德里政府几乎满足了美国的所有要求，并中止了所有敌对行为。从那时起，美国除了为数不多的殖民地外，开始建立一个非公开宣称的帝国[36]，将其统治范围从加勒比的古巴和波多黎各拓展到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的图图伊拉和关岛。为此，美国根据阿尔弗雷德·马汗舰长的理论，在广袤的岛屿链中建立了为轮船提供补给的基地和煤库。马汗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取决于其海外贸易，贸易取决于海上力量，而海上力量则取决于殖民地的多少。

与福斯特·杜勒斯所预计的相反，美国领土向亚洲沿海的延伸并不是对外政策与其过去的“戏剧性决裂”，更非一个新的、令人吃惊的起始点[37]，这一进程自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后时断时续。1819年向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后，美国通过军事手段占领佛罗里达，迫使西班牙将其拱手相让。其扩张的“昭昭天命”随着1846—1848年对得克萨斯的兼并和对加利福尼亚的征服得以继续。[38]1860年，诗人沃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为庆祝首位日本使节抵达纽约而创作的《百老汇大街上一支壮丽的行列》，

揭示了在太平洋上建立美帝国的构想：

> 我歌唱这空前强大的新帝国，它仿佛在梦幻中向我走来
> 我歌唱作为霸主的美国，我歌唱一个更加伟大的最高权威
> 我歌唱那些规划好了的、届时还要在成群的海岛上像鲜花般盛开的无数城市
> 我的帆船和汽船把这些群岛串联，
> 我的星条旗在迎风飘展
> 贸易开放了，历史的沉睡已完成使命，民族再生了……[39]

19世纪90年代形成扩张动力并在夏威夷、关岛、萨摩亚和菲律宾插上星条旗的“公正帝国主义”，通过“昭昭天命”在另一历史时期面向亚洲突飞猛进。宗教报纸尤其是长老会报纸赋予它思想上的合理性，强调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扩展宗教和非宗教自由区域”的责任[40]，尽管林肯曾警告说，白人统治自己属自我统治，当白人既统治自己，同时又统治其他种族时，就不再是自我统治，而是专制统治。[41]

美国的总统们往往不屑寻找借口让国会批准其所采取的国际军事行动。他们不提宣战或对外派遣军队的请求，是为了避免在国会面前“做解释”。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829—1937年）未经国会批准就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佛罗里达并将其兼并。1900年，麦金利总统未经国会批准，派遣5 000名军人前往中国，帮助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镇压义和团运动。[42] 1911年，美国第26任总统狄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炫耀说：“我已占据运河区（巴拿马），让国会去讨论吧。当讨论进行之时，运河已在开凿之中。”[43]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1年）同样希望能在国际事务中毫无约束。他于1907年声称，总统所采取的毫无约束的国际行动“实际上是对自己权力的绝对掌控”[44]。基于这一观念，他于1919年俄国内战时期派兵前往西伯利亚。他还签署了后来遭到参议院否决的《凡尔赛和约》。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年）则把美国推向了与德国的战争，未经国会批准就与英国达成了用驱逐舰交换海军基地的协议，这一做法实际上等同于宣战。同时，他还对日本进行挑衅。已公之于众的文献可以证明，他是挑起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当罗斯福随之决定断绝与“轴心国”的关系并强迫拉美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时，希特勒采取了向美国宣战的冒失行动。林登·约翰逊总统也同样寻找借口，促使与北越的战争升级，进而对海防和河内

等城市进行轰炸。正因为如此，其助手威廉·邦迪在1964年5月25日，即所谓的“东京湾事件”发生数月前，就起草了请求国会批准实施对北越轰炸的决议草稿。[45]小布什要求国会做出决议前就发布了没有任何修正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仅仅是发动蓄谋已久的伊拉克战争的借口。[46]

美国不仅使用各种借口来为宣战和实施其他军事行动寻找理由，而且还通过各种托词在与其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策划、资助和支持政变及恐怖主义行动。杜鲁门于1947年建立的用以取代战略情报局的中央情报局并非仅限于搜集情报，其更主要的职能是借助作为美国对外政策工具的“隐蔽行动”发展颠覆技术，并完善了多种名为PP或KUKAGE的心理和准军事战争行动。那些行动从来不该属于它和美国政府的职责，而应由其他人或机构来执行。[47]前中央情报局成员菲利普·阿吉在《内部的故事——美国中情局日记》一书中承认，那些行动风险很大，因为往往意味着干涉他国，采取的技术主要是通过“渗透”[48]，在内部反对派和军方寻找合作者，对其进行策反并向其提供资助，以达到通过隐蔽手段影响该国内外政策的目的。因此，在这类行动执行过程中，最重要的规则始终是要有进行“巧言否认”的可能，也就是令人信服地否认美国在政变或其他恐怖行动中的责任和共谋行为。因为，一旦美国所提供的支持败露，外交方面的后果将十分严重。以避免被指责干涉他国内部事务为目的的“巧言否认”因此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它确凿地印证了被德国人视为“虚伪”的美国德行。[49]

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一手推动的，目的是能够生产大量携带核弹头的导弹，以保持对战争和石油依赖性极强的国内经济发展。那些导弹依然留在地面，除非发生一场世界大战，否则可能永远也用不上。而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它可能会在24小时内导致1.6亿～1.8亿人丧生，甚或使整个文明遭到毁灭。[50]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也承认，美国是在堆积可能永远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安全的武器。[51]苏联和共产主义威胁的加剧使得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性凸显，并可能在制定和实施美国对外政策时与国务院发生冲突。美国怂恿和支持政变、暗杀、破坏及各种恐怖主义活动[52]，介于外交和军事行动之间的“隐蔽行动”成为美国实现其战术和战略目的的主要工具。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从一开始便进行操纵，以便使与苏联进行的冷战建基于“欺骗和谎言”之上。1963年，当杜鲁门总统意识到恶魔已被养大时感到十分不安。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已偏离了搜集情报的职能，有时成了“政府制定政策的武器”，这令人反

感，并会给多个部门造成困难。[53]他还表示，他从来没有想到中央情报局会卷入“和平时代的间谍行动”，使得其角色被理解为“邪恶和神秘外来阴谋的象征及冷战对手宣传的一个主题”[54]。他指出：

> 针对共产党指名道姓宣传攻击中将西方称为“美帝国主义”、“剥削资本主义”、“好战分子”、“垄断者”这种胡言乱语，我们最需要的是查清中央情报局从事的类似向其他国家人民施加颠覆性影响的事情。（……）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已经成长起来，并因为我们的自由机构和维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而受人尊敬。中央情报局的行事方式正在给我们的历史地位抹黑，我认为必须加以纠正。[55]

杜鲁门忘了，“间谍行动”在他执政期间就已存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将其用作干涉他国的主要工具，要想控制恶魔为时已晚。

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大承包公司及军火供应商、金融资本和它所维持的媒体已成为权力的真正因素，即主宰美国的“真正权力关系”，按照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e）的概念，它是“真正宪法”。1791 年 12 月 15 日颁布的宪法是对领导阶级的格局和利益的写照，军工集团已成为事实的权力主体，而“人民最高权力原则”实际上已失效，托克维尔所描写的美国不复存在，人民已不再像托克维尔所说的上帝主宰宇宙那样主宰美国政治世界[56]，人民已不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目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已成为历史[57]，军工集团各大公司已取而代之。人民确实参与了投票，但投票对象是真正权力主体事先选中的并得到其资助的候选人。在这一两党制选举体系中，选民没有更多选择。美国革命所追求的自由之所以丧失，最直接原因是造就了一个由富人和与军工集团有关系的军事首领们所组成的统治阶级。本来只属于人民的国家领导权落入了他们手中，尽管 20 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许多像马丁·路德·金那样试图在美国所处的“麻烦时代”“拯救美国灵魂”并重新找回“美国梦”的人士。

二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一段时间里成为由美国领导并以北约作为其军事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卡特尔的对立面。尽管苏联达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社会主义阵营却难以维持，原因是它仍处于依照资本主义法则建立的全球市场经济之中，即使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概念，其崩溃也在预料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力本身发展的结果。尽管苏联实现了与东欧国家的经济接轨并建立了“经互会”这一经济体系，但世界范围的

劳动分工、苏联工业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其生产力对外来原材料的依赖等因素，使得苏联作为自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历一段时间后就难以为继。

斯大林在终结列宁自1922年起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并开展“五年计划”后，试图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努力，反映了斯特鲁韦和特卡乔夫这类民粹派人士的理论。他们认为俄国具有从农村和公社所有制的经济体制跨越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并不需要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1894年，恩格斯重申了1875年4月16日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论俄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的观点。[58]他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难以生存于俄国公社所有制的低水平方式之中，它将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最后一个产品[59]。

伊万·艾兰（Ivan Eland）指出，“苏联威胁”被美国外交机器夸大，目的是为了赢得支持，并使它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实施的政治和军事干涉及所谓的防御获得过高军事预算的事实合理化。[60]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由于不再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有能力挑战美国并威胁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61]，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极力寻找恐怖主义和贩毒这类新威胁，以维持至那时为止一直拨给军工集团的巨额资金。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将“里根年代”称为一个“不负责任的阶段”。他告诫说，美国正试图从一个灾难性时期从走出来，并结束先前政治和经济均趋于军事化的倾向。[62]他指出：

> 爱国主义氛围会使讨论中止：假如你不是全身心地“捍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捍卫虚报价格、过于先进的技术和有时根本就不需要的武器系统的立场，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63]

富布赖特以一贯的睿智指出，美国经济已变得军事化，依靠美国进行全球性军事干涉而成倍增长的军工集团已成为使军备竞赛变得永久化的强大力量，并从中牟取暴利。他揭露说：“暴力已成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工业。”[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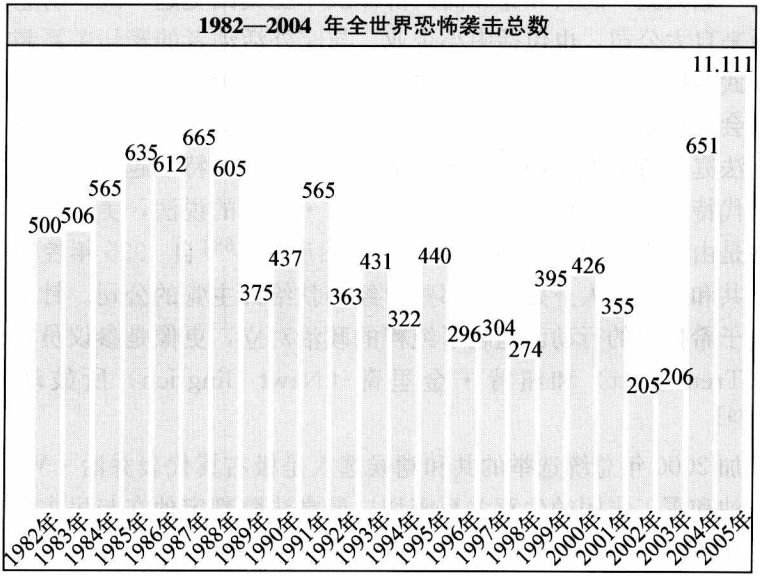
富布赖特警告说，经济的军事化正从内部损害美国，因为武器是非生产性的。[65]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发出同样警告。他指出，把大量“制造能力”用于“非生产性的武器”，使美国正在冒民族经济基础动摇之险，尤其是相比那些把更多收入用于长期生产性投资的国家。[66]克林顿政府试图扭转经济日益军事化的趋势，但未能

如愿，他被指责为肢解国防体系。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科技新发展，促使军工企业和五角大楼之间保持的超出“自由市场”规则的关系更为紧密。别名为“老大党”的共和党和商人群体及军工集团更趋一致。对它的资金支持既来自大公司，也包括中小企业。与院外活动者的密切关系越来越影响它在武器控制、环境保护和健康保险方面的政策。与此同时，共和党大部分国会议员受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影响，开始对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法庭等持抵触立场。[67]美国激进资本主义的特性越来越多地从共和党的当代特征中反映出来。按照阿纳托尔·列文的说法，美国资本主义这一特性是由于未曾遭受过度所导致的可怕后果。[68]自1995年控制国会两院后，共和党领导人开始惩罚那些曾经捐款给民主党的公司。针对克林顿及其妻子希拉里的行动已超越了纯粹的政治对立，更像是参议员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和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所鼓动的个人仇恨。[69]

参加2000年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是极右翼代表乔治·W·布什，他与石油和军工集团的生意关系密切。最高法院判定他在与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争夺中获胜是一个司法阴谋。稳定观念胜过了任何对民主的担忧。[70]它并非司法裁决，而是詹姆斯·贝克赢得的一个政治决定。贝克自1993年卸去老布什总统办公室主任一职后，就一直担任凯雷集团高级顾问。克林顿班子的记者西德尼·布卢门撒尔（Sidney Blumenthal）评论说，贝克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的出现清楚地表明，共和党“不会对民主细节感到犹豫或担忧”，将会赢得彻底胜利。他进一步指出：“小布什通过唯一统计的（最高法院）选票当上了总统，他并不是选出来的，而是被安排的。”[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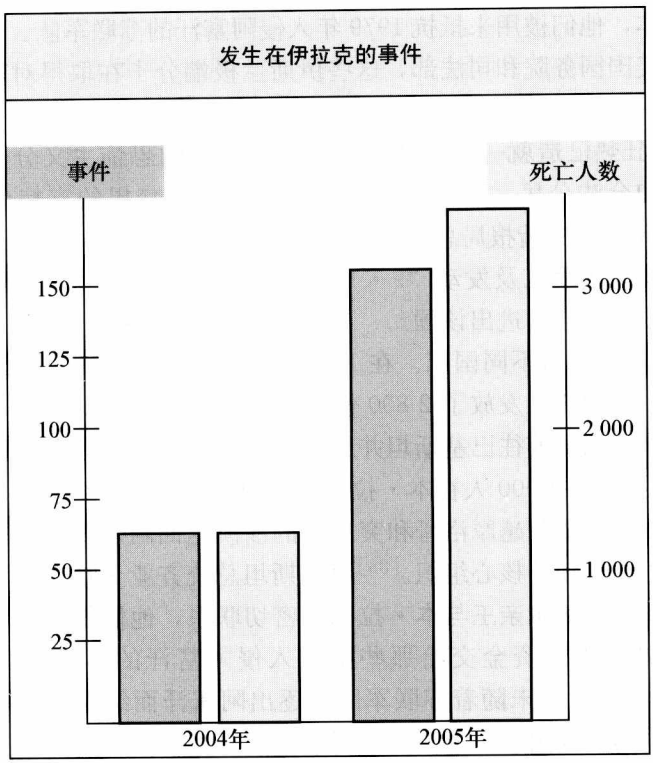
选择小布什来领导美国清楚地证实了乔治敦大学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教授的观点，他认为“美国民主（……）在近几十年中已失去其势头和方向”[72]。小布什当上总统后极力满足军工集团、石油集团和为其竞选运动捐款的保守派的利益。[73]安德鲁·巴切维奇教授认为，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并非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只是加速了美国一直就存在的趋势。小布什“必然作为台词朗诵者登场，而不是创作一个全新剧本的剧作家”[74]。他作为“新保守派”的傀儡操纵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将该事件以“可用作宣传的理由”被用来宣扬善恶之间展开的战争，这是一场在时空上无穷尽的战争。2006年年中，在“9·11”事件过去五年后，就该事件指责小布什政府的美国人比例从原先的1/3上升到了近乎一半。[75]事实上，这一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

战争是不合时宜的、过时的，因为国际恐怖主义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1987年达到巅峰（见下图），并自那时起开始下降。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State e U. S.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77]

2003年3月发动入侵伊拉克行动后，呈下降势态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重新抬头。美国恐怖威胁协调中心和隶属于中央情报局的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在国会压力下被迫透露，2004年在全世界发生的恐怖袭击和死亡人数比上年增加了三倍。当年共发生651起恐怖袭击，而2003年仅为206起。[76]2004年发生的恐怖袭击共造成1 907人丧生、6 704人受伤，2003年的死伤人数则分别为625人和3 646人。最大增幅出现在伊拉克，那里发生的袭击事件从2003年的22起增至2004年的198起，使该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第二危险地区。2004年，在印巴边境共发生250起袭击事件，但强度相对较小。为了不让美国公众了解实情，这些数字中没有包括针对美国士兵的袭击。布伦南的解释是，统计的仅仅是针对非战斗人员的袭击。[78]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批评说，“袭击数量的增加是实实在在的，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学手段来解释或低估”[79]。根据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反恐中心提供的数字，2005年，全世界发生的恐怖事件达11 111起，在其中的8 016起事件中，至少有一人死亡、受伤或被绑架。[80]在伊拉克，恐怖袭击次数和受害者人数如下图所示增加了一倍以上。



资料来源：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小阿瑟·施莱辛格教授认为，小布什针对萨达姆所取得的胜利不仅未能打击恐怖主义，反而“催生出新一代恐怖分子”[81]。他言之有理。

2006 年 9 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就反恐战争对恐怖主义所造成影响进行的评估，这使小布什关于入侵伊拉克是为了使世界变得更安全的言论显得苍白无力。题为“全球恐怖主义的趋势：对美国的影响”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这场战争催生了新一代激进穆斯林，恐怖威胁自 2001 年“9·11”袭击以来有增无减。此外，报告把伊拉克战争视为汇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主要载体，伊斯兰激进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发生了蜕变，并蔓延到全世界。[82]美国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的罪魁祸首，巴基斯坦和沙特则是美国的帮凶，“基地”组织已渗透到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之中。[83]自 1979 年起，阿富汗成为外国政治和军事观点的实验室，但人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国家的现实。[84]中央情报局不仅怂恿和资助以苏联军队为攻击目标的恐怖主义，还招徕中东和北非的原教旨主义者和游手好闲之徒，这些所谓的“自由战士”实际上是狂热分子、地痞流氓和雇佣兵组

成的混杂体，他们被用来抵抗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队。恐怖领域专家曾提醒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取得对苏联的胜利后，已在一个新的狂热目标下联合起来[85]，阿富汗仅仅是一个开端。对“圣战”的狂热已造就一种新的并可能是最危险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是社会成员和合法公民。从表面上看，他们是美国梦想的支持者。[86]事实上，1993年在中央情报局总部门前杀害该组织成员并于同年制造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凶手以及发动“9·11”恐怖袭击的“圣战者”都生活在美国，并（或）能自由进出该国。

“圣战者”来自不同国家。在1986—1989年，巴基斯坦驻阿尔及尔大使馆向阿尔及利亚人发放了2 800份签证，其中许多人受泛伊斯兰组织塔布里·扎马特招募前往巴基斯坦并最终进入阿富汗。[87]在这些原教旨主义者中，有约600～1 000人在本·拉登和其他“圣战”组织支持下，堂而皇之地前往阿富汗或跨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沙漠返回阿尔及利亚，并在那里建立恐怖主义运动的核心组织。[88]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和沙特情报局局长图尔基·费萨尔亲王与本·拉登有密切联系，他们作为中间方负责把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资金交给那些抵抗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队的“圣战者”。[89]“圣战”并未随着苏联军队被逐出阿富汗而结束，而是蔓延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中央情报局豢养了恶魔，但之后却无力遏制和控制它。

据曾任中央情报局安哥拉特别行动小组组长的约翰·斯托克维尔（John Stockwell）估计，自1947年中央情报局建立至1990年，不包括阿富汗的死亡人数，全世界至少有600万人因为它所采取的“隐蔽行动”而死亡。中央情报局针对安哥拉人民解放阵线所采取的手段令斯托克维尔感到失望，他于1976年离职。中央情报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分别造成100万人和200万人死亡；在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分别有80万人和100万人丧生；安哥拉（斯托克维尔亲自参与）和尼加拉瓜战争分别夺去了20 000人和22 000人的生命。[90]斯托克维尔表示：“假如美国纳税人的钱没有被中央情报局拿去用于煽动紧张局势、支持隐蔽的政治和经济行动并造成社会动荡，这些人就不会丧生。”[91]冷战结束后，像苏联那样有意识形态动机且与美国利益相悖的超级大国的制约已不复存在，美国也不再受其他任何国家或任何其他事务的制约。1999年，德国《明镜周刊》评论说，自克林顿政府起，美国开始无“解释责任”地采取行动，就如同它本身在其“麦当劳世界”中拥有空白支票一样。[92]或者换句话说，美国企图使世界“麦当劳化”。尽管美国为联合国的建立发挥了

决定性作用，但它始终凌驾于联合国决定之上，在很多情况下选择了单边行动，毫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为了使自己采取的军事行动合法化，美国往往要求其他国家予以支持，包括提供资金和派遣军队。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1年以报复“9·11”袭击为借口采取的打击阿富汗行动中，它就采取了这一做法。有时它甚至并不在意为军事干涉的合法性寻找外衣。不管是约翰逊、里根还是老布什都没有为入侵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和巴拿马寻求联合国的批准。他们仅仅是为了炫耀武力而打击没有任何抵御能力的弱小国家。

小布什和极右翼团伙（“新保守派”）、强硬民族主义者或民主帝国主义者与希特勒和纳粹集团在德国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极大地助长了这一美国行为中潜在的倾向，使军国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致使对战争的崇拜和暴力文化成为习惯。蓄谋已久的入侵阿富汗行动并非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而是有着更广泛目的。美国的主要图谋是获得和巩固其地缘战略地位，以便控制能源和起始于里海湾的输油走廊，插入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并占领太平洋沿岸国家潜在的市场。中央情报局分析员迈克尔·朔伊尔（Michael Scheuer）指出，对伊拉克的入侵甚至都不能被算作“先发制人”。朔伊尔认为，和对墨西哥发动的战争（1846—1848年）一样，这是一场“贪婪的、有预谋的无端战争”，它所针对的敌人并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但将其挫败确实会带来经济上的好处”[93]。

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要避免俄罗斯、欧盟、日本尤其是中国开采伊拉克所拥有的石油，以保证对自己的供给。美国和英国只有通过军事占领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它们企图对石油储量仅次于俄罗斯和沙特的伊拉克（巴西石油公司探明了其中一部分油层）重新实行殖民化。鉴于美国领土的大陆部分、阿拉斯加、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北海的石油趋于枯竭，得到英国协助的美国渴望得到伊拉克的石油。美国必须阻止随着经济加速发展而对能源需求与日俱增的中国，它难以通过“自由的市场”轻易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国已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参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盘踞在五角大楼的“新美国世纪工程的‘新保守派’”可能意识到，必须预防性使用武力来控制石油产地，并通过实施一种新殖民模式来扭曲未来市场的“游戏”。

从表面看，萨达姆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石油货币的做法也是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一个因素。按照克林顿的说法，在小布什政府中，包括沃尔福威茨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对伊战争结束后，中东的一切问题就将迎刃而解。他认为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因为，在过去50年中，美国发动和参与

的所有战争都以自己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的失败而告终[94]，这是确凿的事实。尽管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争中声称“除了胜利，别无选择”，但美国未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它输掉了与古巴的战争，因为，1961 年入侵猪湾是在中央情报局和训练古巴流亡者的美国人一手策划和指挥下进行的，美国还为入侵提供了武器和各种装备。对古巴的封锁未能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在长达 45 年的时间里始终掌握着政权。在越南，美军尽管拥有各种先进武器，但美国士兵在遭受失败后被迫逃离。就连 1991—1992 年的海湾战争美国也未能取得胜利，虽然驱逐了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但老布什意识到军事力量的政治局限性，没有继续向巴格达推进。小阿瑟·施莱辛格就此认为老布什是一位未明显伤害共和政体的温和总统。[95]

小布什通过反恐战争实现美国对外政策军事化的目的是实施基于“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理论，避免任何国家挑战其霸主地位，并对各民族国家加以控制，那些没有顺从其意图的国家就被定性为“流氓国家”。这一做法似乎是全球经济秩序安全的需要，尤其是因为美国正在走下坡路，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资源（石油、原材料和资金），因此也就更依赖军事力量来保证这些资源。用“先发制人”相威胁的国家安全理论以 1992 年的《防务计划指南》和 2000 年的“重建美国防务：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计划为基础来实现“新美国世纪工程”，目的是克服全球化的资本经济规模与民族国家地域狭窄之间的根本矛盾，并赋予美国作为一个超帝国主义国家的角色，使其拥有“世界警察”的职能，不仅仅限于在拉美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挥舞“大棒”。这就需要发动一场持久、无止境和拥有无限目标的战争，并需要营造一个持久紧张和恫吓的气氛，以便控制一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系统，使所有国家都接受由美国公司主导的全球性市场规则。埃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精辟地指出，“无疆界统治全球经济和管理众多国家就要求采取在目的和时间上均无限制的军事行动”[96]。

以发动永久战争为目的的国家安全理论在《2005 年国家防务战略》报告中得到了重申，这份五角大楼于 2005 年 3 月公布的文件开篇就指出，“美国是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97]。它是一个在与“受意识形态驱使的极端分子的复杂网络”交战的超级大国，也就是说，它面对的是一个分散且不确定的敌人和“来自相对弱小国家和无政府地区”的威胁。根据《国家防务战略》报告的说法，这一持久战争是“为了在全世界保护和延伸和平、自由和富裕”[98]。这一基于战争和以战争威胁作为保护和平、自由和富裕手段的安全战略十分荒唐、可悲和邪恶。反恐战争用战争恐怖主

义威胁人类文明，使陆地、海上和整个世界陷入恐慌，而华盛顿政府则编造借口和谎言，以便对任何一个美国在其中有某种经济利益的国家发动进攻，伊拉克便是其中一例。美国的经济利益包括石油和（或）为五角大楼的承包公司和军火供应商提供用公共资金从事大宗生意的可能。由拉姆斯菲尔德签署的《2005 年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厚颜无耻地声称，由美国领导的在伊拉克进行的努力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这一“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99]、支持恐怖主义、恐吓本国民众并威胁邻国的专制政权”[100]。另一份文件《2004 年国家军事战略》则称，“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在国外”。该文件还指出，世界上存在一个从西半球经过非洲和中东一直延伸到亚洲的“动荡弧”。[101]《2005 年国家防务战略》和《2004 年国家军事战略》均强调美国独立采取单边行动的意图，以便通过预防性方式对被列为“流氓国家”的敌对政权行使自卫权利，把威胁消灭在境外。这样，美国作为一个“超越法律的强权国家”把国际暴力的垄断权据为己有。

能够摧毁一切并使美国得以在 2003 年的数周内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强大军事力量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再次显示无效。在整个 20 世纪，美国发动了 200 多起军事干涉，其中 16 起（8%）为按美国人意愿强行推行民主体制而采取的“国家重建”行动。[102]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政治学家裴敏欣（Minxin Pei）和萨拉·卡斯帕（Sara Kasper）认为，美国决定改变或维持外国政权的首要目的是捍卫本身的经济、战略和安全利益，而并非民主的建立。[103]美国推行的“国家重建”努力始终未能成功，只是在格林纳达和巴拿马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口要比阿富汗和伊拉克少得多。裴敏欣和卡斯帕指出，“在‘国家重建’中，培植临时替代政权最显著的一点是它所创下的彻底失败纪录”。他们认为，这种对其他国家的干涉“会对其民众造成灾难性后果”。他们警告说：

> 在伊拉克重犯这些错误，尤其是小布什总统发布美国人决心在那里建立民主的声明后，对伊拉克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同时也是对美国民主思想的嘲弄。[104]

1980 年在纳杰夫领导起义后被萨达姆政府处决的阿亚图拉赛义德·萨德尔（Sayyid Muhammad Bagir al-Sadr）曾说过，伊斯兰难以接受西方构建的世界。[105]占领军强加给阿富汗和伊拉克这类伊斯兰国家的法律无法改变深深扎根于当地民众文化的传统。这些国家的民众以部落、宗教派别和族群划分，对他们来说，法律来自真主，体现在《古兰经》和《伊斯兰

教法》中，人们不能对其进行任意更改。虽然伊拉克拥有一个非宗教知识阶层，但伊斯兰国家人民永远不可能接受政教分离。阿拉伯民众的反美情绪使美国政府很难在中东实施一项长期一贯的政策。[106] 2004 年上半年就已清楚地显示，美国虽然摧毁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阿拉伯的民族复兴党并抓获萨达姆，却未能赢得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相反，从战略上看，它输掉了战争。美国难以在那里实现和平，也无法控制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局势并使其趋于稳定。抵抗组织在那里通过游击战和恐怖手段，继续日复一日地杀死美国士兵和美国在当地的支持者，不断破坏输油管道。抵抗运动虽然不可能取得胜利，却能阻止美国达到其目的。1996—1999 年间曾担任反恐中心主任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迈克尔·朔伊尔认为，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仍处于童年期”，而在伊拉克的战争则“刚刚开始”[107]。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05 年国际毒品控制战略》报告，阿富汗的毒品贩卖状况仍在继续恶化。长达 25 年之久的战争对国家和人民的正常生活造成的巨大破坏、合法收入流通不畅以及卡尔扎伊政府有限的打击能力，使得 2004 年罂粟的种植面积再创纪录，达到 206 700 公顷，为 2003 年的三倍多。鸦片膏产量达 4 950 公吨，是缅甸的 17 倍，缅甸年产鸦片膏 292 公吨，位居世界第二。[108] 国务院的报告称，阿富汗的鸦片（海洛因）生产已构成对“世界稳定的巨大威胁”。该报告进一步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 40%～60%依赖于毒品，它已“处于成为毒品国家的边缘”[109]。

中央情报局局长波特·高斯（Porter J. Goss）向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承认，卡尔扎伊政府正面临一个“低水平的暴动”，暴动者的目的是使国家处于不稳定状态，增加重建成本，进而迫使多国部队撤离。他认为，“基地”组织仅仅是逊尼派发动的广泛“圣战”的冰山一角，“伊拉克冲突并非由极端主义引发，却成为极端主义者的一个理由”[110]。他还表示，抵抗活动使伊拉克的重建努力迟迟难以付诸现实。它的自决取决于正在组织的以保障安全为目的的伊拉克军队的能力。事实上，正如波士顿大学安德鲁·巴萨维奇教授 2005 年 2 月所指出的：“今天小布什政府的目标并非要赢得胜利，而是要洗脱对这场已经开始却难以收场的战争的责任。”[111] 美国安全领域讨论的焦点已不再是技术的应用或赢得战争的新策略，而是如何摆脱这场已经开始却难以终结的战争，并使其劳顿不堪的部队得以在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前撤出伊拉克。[112]

所谓的反恐战同样遭受了失败。布热津斯基当初的警告不无道理，他

说，打击恐怖主义的胜利永远不可能以一个正式投降仪式被记录下来，任何针对美国人的袭击都将成为尚未赢得战争胜利的痛苦记忆。[113]正如布热津斯基所预料，小布什所奉行的“半宗教化”好战政策把美国引到一个“危险的孤立”境地，一个“孤立的美国”就必须面对“对美国所犯暴行心存报复思想的恐怖主义者”[114]。布热津斯基在接受德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谈到小布什时指出，“一个向看不见和难以确定的幽灵（指恐怖主义）宣战的人，就会走入一种彻头彻尾地进行危险的夸大和歪曲事实的精神状态”[115]。他认为，寻求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的胜利无异于寻找“亚瑟王故事”。[116]问题在于美国不愿意弄清2001年“9·11”袭击的政治根源，它没有意识到其所真正面临的是一场广泛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一场广泛的“圣战”，这一战争恰恰就是因为美国干涉别国尤其是中东国家内部事务而引发。美国军队在中东特别是在沙特的存在被穆斯林视为对圣地的亵渎。“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本·拉登颁布了一项“法特瓦”（伊斯兰教教法决议），他以真主的名义发誓，当安全成为巴勒斯坦人的现实和异教徒军队离开穆罕默德的土地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不会得到安宁。[117]在小布什战胜约翰·克里参议员的2004年选举前，本·拉登通过半岛电视台再次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他警告说，除非是一个“哑巴贼”，任何人都不能将别人的安全作为玩物，并认为这样就能使自己获得安全。他告诫美国人民，“当灾难发生时，善于思考者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探寻其原因，以免灾难重演”。他指出，“9·11”事件已过去近四年，但小布什仍热衷于“歪曲、欺骗和向你们掩盖事实真相，这就是为何已发生事件会重演的原因”[118]。本·拉登称，“当美国和以色列共同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进行的压迫和专横”变得难以承受之时，他开始考虑对世贸中心的双子楼发动袭击。1982年，美国允许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在萨布拉和夏蒂拉屠杀中，美国第六舰队配合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巴勒斯坦营地。本·拉登奉劝美国人民反思赋予白宫对弱者采取侵略性政策权力的错误。他说，“你们的安全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个放弃玩弄我们安全的国家就能自动保障自己的安全”[119]。

如果说小布什不尊重其他国家人民的安全，发动侵略并煽动持久的战争状态，那么美国的安全确实未能得到保障，也不可能得到保障。以维持未公然宣称的“美帝国”为目的的干涉主义是恐怖主义的主因，它对美国造成的危害要大于任何其他工业国家。[120]在中东、中亚和其他地区接连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实际上是多个国家发起的一项广泛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只要美国不调整其政策，恐怖袭击就不可能停息和消失。众多与控制

能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军事和战略因素使由极右翼执政的美国难以做到这一点。小布什的主导性和好战性只能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从高斯在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就能推断出这一点。他指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正继续损害美国在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利益。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一个衍生组织“伊斯兰圣战联盟”已对美国利益和当地政府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欧洲地区，“伊斯兰祈祷团”和阿布·萨耶夫组织同样也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高斯认为，即使将本·拉登及其副手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抓获，也不可能使问题消除。“圣战者”利用伊拉克的冲突招募新成员。这些积累了城市恐怖主义经验的“圣战者”成为“在沙特、约旦等国建立跨国恐怖主义组织、集团和网络的潜在资源”[121]。根据中央情报局下属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一份长达 119 页的报告，伊拉克已取代阿富汗，成为“下一代职业恐怖分子”训练营。[122]

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使美国的政治和道德权威受到极大损害。除了以基于“先发制人”的安全理论藐视国际法原则以及别国的自决权和主权外，美国公然将侵犯人权和使用酷刑作为其国家政策，这在古巴关塔那摩集中营和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的丑闻中暴露无遗。然而，国务院于 2005 年 2 月 28 日提交国会的《2004 年人权报告》却作出这样的表述：“《世界人权宣言》包括‘（……）免于酷刑或其他残忍、非人道或卑鄙的做法或惩罚，免于无罪状的长时间拘禁、免于失踪或秘密扣押，免于其他对生活权、自由和人身安全的公然侵犯’。”[123]美国军人和情报机构官员在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监狱中所侵犯的恰恰就是这些权利，而这一切都得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授意和小布什本人的首肯。此外，他们还采用“非法引渡”和酷刑外包，即把囚犯转交埃及、沙特、科威特和约旦等国，在那里对他们施以酷刑。2005 年大赦国际的报告十分客观地指出，尽管全世界对美国人所犯下的战争罪以及对囚犯的虐待表达了越来越强烈的愤慨，但美国仍在“借助恐怖的战争”以安全名义破坏人权。报告还指出，美国对人权和国际人道方面法律的粗暴践踏继续成为“对小布什总统所声称的美国是全球人权之冠言论的嘲讽”[124]。

小布什以萨达姆未遵守联合国决议、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是一位侵犯人权的暴君来证明其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合理性。然而，藐视联合国的恰恰是小布什本人，他单方面对伊拉克采取进攻行动并编织谎言，因为那里并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与“基地”组织也并无关联。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集中营中有悖《日内瓦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虐

囚事件曝光，使打击伊拉克是为了将该国人民从萨达姆暴政中解放出来的借口也难以站住脚。萨达姆的确是一位暴君，但他是一位地方性暴君，而以实施“新美国世纪工程”为目的小布什则蔑视多边机构，一直企图建立一个全球专制政权，在这一政权中，只有美国才能决定法律和条约执行与否。同时，美国将其管辖权延伸到其他国家，向别国政府发号施令，毫不考虑各国自身的文化、信仰、愿望或民族利益。小布什政府甚至炮制了“敌方战斗人员”的概念，以便撇开司法，无期限关押在关塔那摩的520名囚犯和在伊拉克的数千名犯人，这些人无法享受最基本的人权，只能接受秘密设立的军事法庭的审判。

由小布什执政的美国想要达到的目的并非19世纪基于潘恩思想所构想的“自由帝国”，而是要强加“帝国自由”，也就是建立一个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全球性独裁政权。这一“自由”意味着没有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概念中的来自外部阻碍其行动的对立面。[125]小布什执政的美国远非潘恩所理想的国度，而恰恰是他所批判的对象。他指出，“所有君主政府都是军事政府，战争是其生意，掠夺和攫取财富是其目的”[126]。这一状况就可以使人们想象，他的政府“不管如何，都会立即堕落为一个军事民主，即一种政治怪物，其结局总是吞没那些创造它的人们”。这就能佐证埃德蒙德·伯克1790年针对法国大革命所表明的观点。[127]这一设想成为现实不足为奇，因为美国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极端排斥异己的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和深刻的民主自由意识共存，民主自由思想存在于许多阶层民众中，尤其是在纽约这种大城市的艺术家、知识分子阶层和学术圈中。1904年，约瑟夫·帕德维（Joseph Patouillet）在第戎大学法律系的论文答辩中指出，当共和党的威廉·麦金利总统[128]1900年获得连任时，美国民主人士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期保留共和国和帝国并存的体系。对外推行的帝国主义将迅速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内的专制统治”[129]。

曾担任克林顿总统顾问的西德尼·布卢门撒尔发表在伦敦《卫报》的文章中透露，2004年年初，查尔斯·邓拉普（Charles Dunlap）中校于1990年写的一篇题为“2012年美国军事政变之根源”的小说在美国军事战略家中间流传。[130]这一政论小说获得了1992年国家战争学院的“战略征文比赛奖”，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将军到场颁奖。该小说描写了美国2012年的状况，一位虚构的托马斯·布鲁特斯（Thomas E. T. Brutus）将军在总统死亡后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他自封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作为军事全权代表入主白宫。尽管出现了一些局部混乱现象，但

国会最终通过了一个《公民投票法案》，核准了他的这一地位。一些人因为反叛被抓，一位被简称为222305759号犯人的高级军官因反对政变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被处决前，他偷偷将一篇题为“2012年美国军事政变之根源”的文章交给他在战争学院上学时的一位同学。他在文章中写道，军事政变是自1992年起过度上升的一些明显趋势所造成的，这一现象的主因是军队被民用和军事集团的孤立。他在信的结尾处警告：“在我们视线之内的灾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没有公开反对我们明知是错误的政策。对我来说，一切已为时已晚，而对你们来说却并不晚。”[131]

在美国发生一场军事政变虽然不能说不可能，但却很难发生，因为，传统上民主文化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然而，民众有时会被类似1692年的巫师审判事件和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所领导的对共产党人的追杀这类歇斯底里的癫狂所控制。1692年的事件发生在萨勒姆镇附近，数百人被以使用巫术的罪名抓捕和审判，其中有14名妇女和5名男子被处以绞刑。2001年的“9·11”事件也导致了类似反应。追杀恐怖主义者与追杀巫师和共产党人交替进行，美国的政治环境继续受到污染。阿纳托尔·列文将美国政治体制称为“不完善的民主”[132]。推选总统的选举进程被大公司财力所腐蚀和控制。受小布什政府官员们挑动的恐怖主义，反过来又赋予他们扩大国家警察权力的借口，其代价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削弱，而他们则拥有坚持行使“战争时期”的特权。詹姆斯·麦迪逊总统1795年就曾警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持续战争中保存自由”[133]。麦迪逊认为：

> 一个过于庞大政府中的一支常设军队不会是自由的安全伙伴。防御外来危险的手段总是成为对内实行专制的工具。在古罗马人当中，不管何时抓到暴乱者，挑起战争始终是行为准则。纵观整个欧洲，以防御为借口维持的军队却被用来奴役人民。

美国出现的威胁恰恰是一个得到军工集团支持的独裁政府，它不断散布和制造恐慌，并操纵永久的战争状态和无止境的反恐战争，将其作为在宪法范围内不断限制自由和民权的理由。《美国爱国法案》的建立就是这一做法的开始。希特勒就是以相同方式操纵恐怖主义，通过“国会纵火案”，在未对《魏玛宪法》作任何修改的情况下建立了“第三帝国”。能与这一极端残酷专制政权相提并论的只有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独裁。

2004—2005年冬，于圣莱昂（德国）

【注解】

[1] James Madison, "Political observation", April 20, 1795, apud Bacevich, 2005, p. 7. 詹姆斯·麦迪逊是第四任美国总统，与约翰·杰伊（John Jay）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起创作《联邦党人文集》，被视为美国宪法之父。

[2] George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1796.

[3] "……美国最初就是一个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它由逃离欧洲封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所建立。" Engels an Nicolai Fanzewitsch Danielson, Londres, 17 de outubro de 1893, in Marx & Engels, Band 39, 1978, pp. 148-150.

[4] 异教社会。

[5] 货币经济。

[6] Engels an Nicolai Fanzewitsch Danielson, London, 17 Oktober 1893, in Marx & Engels, Band 39, 1978, pp. 148-150.

[7] Id., ibid., pp. 148-150.

[8] Paine, 1997, p. 13.

[9] Paine, 1996, p. 117.

[10] Id., ibid., p. 117.

[11] Taussig, 1890, p. 164. Vide também Luxemburg, 1990, pp. 346-347.

[12] Luxemburg, 1990, Band 5, p. 371.

[13] Kautsky, "Bauernagitation in Amerika". *Die Neue Zeit*, Vol. XX, nº 2 (1902), pp. 453, e seg.

[14] Hilferding, 1974, Band II, p. 452.

[15] Foner, 1998, pp. 262-263.

[16] Schlesinger, 1973, p. 285.

[17] 英国通过1832年的权力改革（《选举法》修正法案）从国王执掌行政权的君主立宪制改为首相统领政府的君主议会制。

[18] Maclay, 1927, pp. 20-21, 80, 120.

[19] Id., ibid., p. 20.

[20] Johnson, 2002, p. 128.

[21] Id., ibid., p. 134.

[22] Apud Novak, 1974, p. 23.

[23] Id., ibid., p. 19.

[24] Arendt, 1990, p. 155.

[25] Novak, 1974, p. 3.

[26] Id., ibid., p. 52.

[27] Paine, 1996, p. 58.

[28] "……在美国，法律是国王，就好比在集权政府中，国王是法律。在自由的国度，法律应成为国王，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Paine, 1997, pp. 31-32.

[29] Apud Schlesinger, 1973, p. 5.

[30] Id. , ibid. , p. 15.

[31] Grant, 1995, pp. 21-22. Vide também McFeely, 1981, pp. 30-31.

[32] Lincoln, 1953, vol. 1, pp. 431-442.

[33] Grant, 1995, p. 41. Vide também McFeely, 1981, pp. 30-31.

[34] Grant, 1995, p. 42.

[35] "*Política externa dos Estados Unidos e o perigo que ela representa para o Brasil*", Ofícios, Sérgio Teixeira de Macedo ao visconde de Olinda, Washington, 6/8/1849. Arquivo Histórico do Itamaraty—233/3/5.

[36] Ferguson, 2004, p. 12.

[37] Dulles, 1965, p. 203.

[38] Vide Moniz Bandeira, 1998, pp. 13-40.

[39] Whitman, s/d, pp. 198-201.

[40] Dulles, 1965, p. 191.

[41] Apud Patouillet, 1904, p. 272.

[42] Eland, 2004, p. 4.

[43] LaFeber, Walter. *The Panama Canal*. Nova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1, apud Drapper, 1991, p. 589.

[44] Wilson, Woodrow.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ates*. Nova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7, Apud Drapper, 1991.

[45] Pentagon Papers, 1971, p. 249.

[46] Bamford, 2004, p. 360.

[47] Agee, 1975, pp. 69-70.

[48] Marchetti & Marks, 1974, pp. 36-37.

[49] Weber, 1988, vol. 1, p. 35

[50] Hoyng, Hans e Mascolo, Georg. "Sieg wäre eine Fata Morgana", entrevista com Ibigniew Brzezinski *Der Spiegel*, especial, 6/2006-07. Setembro de 2006.

[51] Memorandum,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26/195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5—57, apud Gaddis, 1997, p. 221.

[52] Agee, 1975, pp. 69-86.

[53] Truman, Harry. "Limit CIA Role to Intelligence". *The Washington Post*, 22/12/1963.

[54] Ibid. Vide também Schlesinger, 1973, p. 317.

[55] Truman, Harry. "Limit CIA Role to Intelligence". *The Washington Post*, 22/12/1963.

[56] Tocqueville, 1968, pp. 53-56.

[57]Id. , ibid. , p. 56.

[58] Engels, F. "Soziales aus Rußland", in Marx & Engels. Band 18, 1976, pp. 556-557.

[59] Engels, F. Nachwort (1894) [zu "Soziales aus Rußland"], in Marx & Engels, Band 22, 1977, pp. 421-435.

[60] Eland, 2004, p. 14.

[61] Guimarães, Samuel Pinheiro. "Esperanças e ameaças: notas preliminares", 23/10/1995. Manuscrito. Rio de Janeiro.

[62] Fulbright, 1989, p. 131.

[63] Id., ibid., p. 131.

[64] Id., ibid., pp. 136-137.

[65] Id., ibid., p. 137.

[66] Kennedy, 1987, pp. 442-444, 539.

[67] Gould, 2003, pp. 456-457.

[68] Lieven, 2004, p. 31.

[69] Gould, 2003. pp. 458-462. Blumenthal, 2003, pp. 124-136.

[70] Id., ibid., pp. 764-767.

[71] Id., ibid., pp. 767-771.

[72] Kupchan, 2002, p. 320.

[73] Id., ibid., p. 326.

[74] Bacevich, 2005, pp. 4-5.

[75] CNN. com— "Poll: More Americans blame Bush for 9-11". Posted 9:31 p. m. EDT, September 11, 2006.

[76] http://www. state. gov/s/ct/rls/pgtrpt/2003/33777. htm.

[77] U. S. National Counter terrorism Center. A Chronology of Significant Internacional Terrorism for 2004. 29 April 2005. http://counterterror. typepad. com/the_counterterrorism_ blog/files/NCTC% 20Chronology% 202004. pdf. *Nación*, Buenos Aires, 28/04/2005.

[78] 为了掩盖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恐怖袭击大量增加的信息，国务院改变了每年呈交国会报告的重点，报告名称从《全球恐怖主义格局》改为《恐怖主义国家报告：就恐怖组织协助各国并提供信息》，将其余部分交由从不承担这一责任的国家反恐中心负责。而且，由于民主党的压力，报告仅显示了2004年的资料，未将针对美国士兵的恐怖行动列入其中。*Remarks on Release of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for* 2004. Philip Zelikow, Counselor of the Department; John Brennan,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Interim Director. Washington, DC. April 27, 2005. 关于恐怖袭击数量参阅 *A Chronology of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for* 2004. 29 April 2005. http://counterterror. typepad. com/the _ counterterrorism _ blog/files/NCTC% 20Chronology% 202004. pdf。

[79] *La Nación*, Buenos Aires, 28/4/2005. http://counterterror. typepad. com/the_counterterrorism_blog/files/NCTC%20Chronology%202004. pdf.

[80] NCTC Fact Sheet and Observation Related to 2005 Terrorist Incidents, Coun-

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05, Statistical Amex.

[81] Schlesinger Jr., 2004, p. 31.

[82] Mazzetti, Mark. "Spy Agencies Say Iraq War Worsens Terror Threat". *The New York Times*, 24/9/2006. DeYoung, Karen. "Spy Agencies Say Iraq War Hurting U. S. Terror Fight". *The Washington Post*, 24/9/2006, p. A01. Miller, Greg. "Spy Agencies Say Iraq War Fuels Terror. The conflict spreads extremism and serves as a laboratory for deadly tactics, says a bleak analysis by 16 U. S. intelligence units". *Los Angeles Times*, 24/9/2006.

[83] Coll, 2004, p. 571.

[84] Id., ibid., p. 569.

[85] Dwyer, Kocieniewski & Tyre, 1994, p. 245.

[86] Id., ibid., p. 245.

[87] Cooley, 2000, p. 203.

[88] Id., ibid., p. 203.

[89] Id., ibid., pp. 225-226.

[90] Stockwell, 1991, p. 81.

[91] Id., ibid., p. 81.

[92] Schumann, Harald. "Die Globalisierung. Revolution des Kapitals, Das Jahrhundert des Kapitalismus: Harald Schumann über die Auswirkungen der Globalisierung". *Der Spiegel*, Nr. 25, 19. Juni 1999.

[93] Anônimo, 2004, pp. xvi-xvii.

[94] *El País*, Madri, 28/1/2003.

[95] Schlesinger Jr., 2004, p. 31.

[96] Wood, 2003.

[97]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arch 2005.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Mar2005/d20050318nds1.pdf.

[98] Ibid.

[99] World Mass Destruction.

[100]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arch 2005.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Mar2005/d20050318nds1.pdf.

[101]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 Strategy for Today; a Vision for Tomorrow. Joint Chiefs of Staff.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Mar2005/d20050318nms.pdf.

[102] Pei, Minxin & Kasper, Sara. "Lessons from the Past: The American Record on Nation Building". *Policy Brief*, nº 24, May 2003.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03] Ibid.

[104] Ibid.

[105] Apud Bodansky, 1993, pp. 1-2.

[106] Kennedy, 1987, p. 516.

[107] Anônimo 2004, pp. 181-183.

[108]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Strategy Report—2005. Released by the 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and Law Enforcement Affairs. March 2005. http://www.state.gov/g/inl/rls/nrcrpt/2005/vol1/html/42366.htm.

[109] Ibid.

[110] U. S. Senate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Statement—Porter J. Goss,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n Current and Projected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o the United States, 10:00 a.m., Tuesday, February 16, 2005. http://intelligence.senate.gov/0502hrg/050216/witness.htm.

[111] Bacevich, Andrew J. "We Aren't Fighting to Win Anymore; U. S. troops in Iraq are only trying to buy time". *Los Angeles Times*. 20/2/2005. p. M. 5.

[112] Ibid.

[113] Brzezinski, Zbigniew. "Confronting Anti-American Grievances". *The New York Times*, 1/9/2002.

[114] Ibid.

[115] Hoyng, Hornsu e Mascolo, Georg. "Sieg wäre eine Fata Morgana", entrevista com Ibignien Brzezinski, *Der Spiegel*, special 6/2006-07. Setembro de 2006.

[116] Ibid.

[117] "The Winds of Faith", October 2, 2001, in Bin-Ladin, 2005, pp. 105.

[118] Full transcript of bin Ladin's speech Saturday 30 October 2004 11:28 AM GMT http://english.aljazeera.net/NR/exeres/79C6AF22-98FB-4A1C-B21F-2BC36E87F61F.htm.

[119] Ibid.

[120] Eland, 2004, p. 200.

[121] U. S. Senate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Statement—Porter J. Goss,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n Current and Projected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o the United States, 10:00 a.m., Tuesday, February 16, 2005. http://intelligence.senate.gov/0502hrg/050216/witness.htm.

[122] Priest, Dana & White, Josh. "War Helps Recruit Terrorists, Hill Told Intelligence Officials Talk Of Growing Insurgency". *The Washington Post*, 17/2/2005, p. A01. Priest, Dana. "Iraq New Terror Breeding Ground War Created Haven, CIA Advisers Report". *The Washington Post*, 14/1/2005, p. A01.

[123] Department of Stat. Overview and Acknowledgements.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2004. Released by the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February 28, 2005.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4/.

[124]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005, http://web.amnesty.org/web/web.nsf/print/36F832815378

BDCCC1256FDB003713A4.

[125] Hobbes，1996，p. 145.

[126] Paine，1996，p. 119.

[127] Burke，1986，pp. 332-333.

[128] 1901 年，威廉·麦金利总统在第二任期初遭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枪杀。

[129] Patouillet，1904，p. 272.

[130] Blumenthal，Sidney. "America's military coup Donald Rumsfeld has a new war on his hands—the US officer corps has turned on the government". *The Guardian*，13/5/2004.

[131] Dunlap，Jr.，Charles J.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Coup of 2012". Parameters，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 The United States Army's Senior Professional Journal. Winter 1992—93，pp. 2-20. http://carlisle-www. army. mil/usawc/Parameters/1992/dunlap. htm.

[132] Lieven，2004，p. 3.

[133] Bacevich，2005，pp. 175-176.

参考文献

ABENDROTH, Wolfgang. *A história social do movimento trabalhista europeu*. Rio de Janeiro: Paz e Terra, 1977.

AGEE, Philip. *Inside the Company*: CIA diary. Londres: Allen Lane/ Penguin Books, 1975.

AGEE, Philip & WOLF, Louis (orgs.). *Dirty Work*: *the CIA in Western Europe*. Londres: Zed Books, 1978.

AHMED, Nafeez Mosaddeq. *The War on Freedom. How and Why America was Attacked September 11, 2001*. Londres: Media Messenger Book/Media Monitors Network, 2002.

ALBRIGHT, Madeleine. *Madam Secretary*. A memoir. Nova York: Miramax, 2003.

ALEXANDER, Yonah.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Nova York: Ames Press, Inc., 1976.

ALI, Tariq. *Bush in Babylon*. The Recolonization of Iraq. Londres/Nova York: Verso, 2003.

——. *Confrontos de fundamentalismos. Cruzadas, Jihads e Modernidade*. Rio de Janeiro: Record, 2002.

ALLEMANN, Fritz René. *Macht und Ohnmacht der Guerrilla* München: Piper Verlag, 1974.

ALLEN, Mike. "O'Neill: Plan to Hit Iraq Began Pre-9/11". *The Washington Post*, 11/1/ 2004, p. A13.

ALLEN, Mike e DeYOUNG, Karen. "Bush: U. S. Will Strike First at Enemies". *The Washington Post*, 2/6/2002.

ALLISON, Graham & TREVERTON, Gregory (orgs.).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Beyond Cold War to New Order Global*. Nova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AI-QATHAFI, Muammar. *O Livro Verde*. Trípoli (Líbia): Empresa Pública de Edição, s. d.

ALTERMAN, Eric. *When Presidents Lie*. Nova York: Viking, 2004.

ALVAREZ, David. *Secret Messages: Codebreaking and American Diplomacy*, 1930- 1945. Lawrence (Ka.):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0.

AMBROSE, Stephen 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 Nova York: Penguin Books, 1985.

AMERICAN imperialism's intervention in Vietnam. Hanoi: Foreign Language Publ. House, 1955. [Discurso do ministr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do Vietnã do Norte na Conferência de Genebra.]

ANDERSON, Frederick (org.). *A Pen Warmed-up in Hell: Mark Twain in protest*. Nova York: Harper & Row, 1973.

ANDERSON, Jack. *The Anderson Papers*. Nova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4.

ANDREW, Christopher & DILKS, David (orgs.). *The Missing Dimension: governments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4.

ANDREW, Christopher & GORDIEVSKY, Oleg. *KGB: the inside story*. Nova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ANONIMOUS (Michael Scheuer). *Imperial Hubris. Why the West is Losing the War on Terror*. Washington, D. C.: Brassey's Inc., 2004.

APTHEKER, Herbert. *Uma nova história dos Estados Unidos. A era colonial*.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67.

——. *Uma nova história dos Estados Unidos. A Revolução Americana*.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69.

ARAKIE, Margaret. *The Broken Sword of Justice: America, Israel and the Palestine tragedy*. Londres: Quartet Books, 1973.

ARENDT, Hannah. *On Revolution*. Londres: Penguin Books, 1990.

ARON, Raymond. *Republique Imperiale: les Etats-Unis dans le monde*. Paris: Calman-Lévy, 1973.

AUST, Stefan. *Der Baader Meinbof Komplex*. München: Goldman Verlag, 1998.

AUTORENKELLEKTIV Der Zweite Weltkrieg, 1939- 1945: Kurze Geschichte. Berlim: Dietz Verlag, 1985.

BACEVICH, Andrew J. "We Aren't Fighting to Win Anymore; U. S. troops in Iraq are only trying to buy time". *Los Angeles Times*. 20/2/2005.

——.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 Oxford/Nova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BAER, Robert. *See no Evil. The True Story of a Ground Soldier in the CIA War on Terrorism*. Nova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02.

——. *Sleeping with the Devil. How Washington Sold Our Soul for the Saudi Crude*. Nova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03.

BAINERMAN, Joel. *Inside the Covert Operations of the CIA & Israel's Mossad. Undercover with the Spymasters of America & Israel*. Nova York: S. P. I. Books/Shapolsky Publishers, Inc., 1994.

BAKER, Peter & FLETCHER, Michael A. "Bush Pledges to Spread Freedom Global Focus On Rights Would Be a Shift in Policy". *The Washington Post*, 21/1/2005.

BAMFORD, James. *A Pretext for War*. 9/11, Iraq, and the Abuse of America's Intelligence Agencies. Nova York: Doubleday, 2004.

——. *Body of Secrets: anatomy of the ultra-secret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ova York: Anchor Books, 2002.

BARBOSA, Ruy. *O divórcio e o anarquismo*. Rio de Janeiro: Guanabara [s. d.].

BARNES, Harry Elmer. *Pearl Harbor aft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Torrance (Ca.):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 1968.

BARNETT, Thomas P. M. *The Pentagon's New Map*. War and Pea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va York: G. E Putnam's Sons, 2004.

BARRY, John "Exclusive: The Defector's Secrets". *Newsweek*, 3/3/2003.

BARRY, John; HIRSH, Michael & ISIKOFF, Michael. "The Roots of Torture. The road to Abu Ghraib began after 9/11, when Washington Wrote new rules to fight a new kind of war". *Newsweek*, 16/5/2004.

BARTLETT, C. J. *The Global Conflict: the international rivalry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res: Longman, 1984.

BAUER, Bruno; MARX, KarL *La questione ebraica* (a cura di Massimiliano Tomba). Roma: Manifesto Libri/Instituto Italiano per gii Studi Filosofia (Napoli), 2004.

BAUTISTA, Veltisezar. *The Filipino American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Naperville (Ill.): Bookhaus, 1998.

BEARD, Charles A.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41：*a study in appearances and realitie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8.

BEEVOR，Anthony. *Stalingrad*：*fateful siege*，*1942－1943*. Londres：Penguin Books，1999.

——. *Berlim 1945*，*A queda*. *Rio de Janeiro*：*Record*，2004，

BELL，Roger J. *Last among Equals*：*Hawaiian Statehood and American Politics*. Honolut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4.

BELLO，Walden. *Dilemmas of Domination*，“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Empire，Nova York：Metropolitan Books/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5.

BENJAMIN，Daniel & SIMON，Steven. *The Age of Sacred Terror*. Nova York：Random House，2002.

BEN-MENASHE，Ari. *Profits of War*：*Inside the Secret U. S. -Israeli Arms Network*. Nova York：Sheridan Square Press，1992.

BESCHLOSS，Michael. *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 Nova York：Simon & Schuster，2002.

——. *Kennedy v. Khrushchev*：*the crisis years*，*1960－1963*. Londres：Faber & Faber，1991.

——.（org.）. *Taking Charge*：*the Johnson White House tapes*，*1963－1964*. Nova York：Simon & Schuster，1997.

BIN LADEN，Osama. *Messages to the world*. Statements of Osama Bin Lade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Bruce Lawrence. Londres/Nova York：Verso，2005.

BIRNBAUM，Norman. “Aux racines du nationalisme américain”. *Le Monde Diplomatique*，outubro de 2002.

BLAKER，James R. *United States Overseas Basing*. *An Anatomy of the Dilemma*. Nova York：Praeger Publisher，1990.

BLAKEY，G. Robert & BILLINGS，Richard N. *The Plot to Kill the President*. *Organized Crime Assassinated J. F. K*. Nova York：Quad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1981.

BLASIER，Cole. *The Giant's Rival*：*the URSS and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7.

——. *The Hovering Giant*：*U. S*，*responses to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1910-1989*.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BLECHMAN, Barry & FKIED, Edward R. *Controlling the Defense Budget*. *Foreign Affairs*, Nova York, jan. 1976.

BLECKER, Robert A. "The Ticking Debt Bomb. Why the U. 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Position Is Not Sustainable". Junho 1999 Briefing Paper.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LIGHT, James G. & KORNBLUH, Peter. *Politics of Illusion: the Bay of Pigs reexamined*. Londres: L. Rienner, 1998.

BLIX, Hans. *Disarming Iraq*. The Search for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Updated with a New Chapter). Londres: Bloomsbury, 2005.

BLUM, William. *Killing Hope*.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5.

——. Rogue State. *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Londres: Zed Books, 2001.

BLUMENTHAL, Sidney. *The Clinton Wars*. Nova York: A Plume Books (Penguin Group), 2003.

——. "America's military coup. Donald Rumsfeld has a new war on his hands—the US officer corps has turned on the government." *The Guardian*, 13/5/2004.

BLUSTEIN, Paul. *Vexame*. Rio de Janeiro: Record, 2002.

BOCCIA PAZ, Alfredo et alii. *En los sótanos de los generales: los documentos ocultos del Operativo Condor*. Assunção: Expolibro-Servilibro, 2002.

BODANSKY, Yossef. *Target America*. *Terrorism in the U. S. Today*. Nova York: S. P. I Books/Shapolsky Publishers, 1993.

BONN, M. J. & PALYI, M. (org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nach dem Kriege: Festgabe für Lujo Brentano zum 80 Geburstag*.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25, vol. 2.

BONNET, Gabriel. *Guerrilhas e revoluções*.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63.

BONNER, Bill & WIGGIN, Addison. *Empire of Debt*. The Rise of and Epic Financial Crisis.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6.

BOORSTIN, Robert & GALIC, Mina. *Afghanistan in Crisis—Facts and*

Figures. 04 de outubro de 2004.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site/pp.asp? c=b iJRJ8OVF&b = 202861 &printmode= 1.

BORG, Dorothy & SHUMPEI, Okamoto (eds.). *Pearl Harbor as History: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31-1941*. Nova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BORKIN, Joseph.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I.G. Farben: startling account of the unholy alliance of Adolf Hitler and Germany's great chemical combine*. Londres: Free Press, 1978.

BOSELEY, Sarah. "100.000 Iraqi civilians dead, says study". *The Guardian*, 29/10/2004.

BOUKHARINE, N. *L'économie mondiale et l'impérialisme*. Paris: Ed.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 1928.

BOUTROS-GHALI, Boutros. *Unvanquished. A U.S.— U.N. Saga*. Nova York: Random House, 1999.

BOYARD, James. *Terrorismo y Tiranía. Limitar la libertad, cercenar la justicia y alterar la paz... ¿para liberar el mundo del mal?*. Buenos Aires: Editorial El Ateneo, 2003.

BRESSER-PEREIRA, Luiz Carlos. "O Plano Brady". *IstoÉ-Senhor*, 22/3/1989.

BRIODY, Dan. *The Iron Triangl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Carlyle Group*. New Jersey: John Wiley Sons, 2003.

BRISARD, Jean-Charles & DAQUIÉ, Guillaume. *Ben Laden. La Vérité Interdite*. Paris: Éditions Denoel, 2001.

BRODER, David S. *Democracy Derailed*. Initiative Campaigns and the Power of Money. San Diego/Nova York/Londres: Harcourt Inc., 2000.

BRUNN, Gerhard. *Deutschland und Brasilien: 1889 - 1914*. Köll: Bölau Verlag, 1971.

BRZEZINSKI, Zbigniew. *Game Plan: how to conduct the US—Soviet contest*. Nova York: Atlantic Monthly, 1986.

——.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ova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 "Confronting Anti-American Grievances". *The New York Times*,

1/9/2002.

BUDIANSKY, Stephen. *Battle of Wits: the complete story of codebreaking in World War II*. Nova York: Free Press, 2000.

BÜLOW, Andreas von. *Im Namen des Staates: CIA, BND und die kriminellen Manchenschften der Geheimdienste*. München: Piper, 2002.

——. *Die CIA und der 11. September. Internationaler Terror und Die Rolle der Geheimdienste*. München: Piper, 2003.

BUNDY, William. *A Tangled Web: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presidency*. Nova York: Hill and Wang/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8.

BURKE, 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Londres: Penguin Books, 1986.

BURNETT, Victoria. "Crackdown on Afghanistan's cash crop looms". *Boston Globe*, 18/9/2004.

BURR, William.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 reader*. Nova York: New Press, 1999.

BUTLER, Richard. *The Greatest Threat*. Iraq,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the Growing Crisis of Global Security. Nova York: Public Affairs, 2000.

BÜTTNER, Annette. *Private Security Corporations al Sicherheitspolitische Akteure in Entwicklungsländer: Risiken uns Chancen des Einsatzes privat Sicherheitsunternehmen*. Nr. 111/2003. Sankt Augustin: Konrad-Adenauer-Stiftung, Juni 2003.

BYRON, Lord George Gordon. *Poems*. Londres: J. M. Dent, 1948, vol. 3.

CAMACHO, Santiago. *Las cloacas del imperio. Lo que Estados Unidos oculta al mundo*. Buenos Aires: Editorial El Ateneo, 2004.

CAMPBELL, Duncan. "American navy 'helped Venezuelan coup'". *The Guardian*, Londres, 29/4/2002.

CAMPOS, Roberto. *A lanterna na popa: memórias*. Rio de Janeiro: Topbooks, 1994.

CANZIAN, Fernando. "Novas decisões, tomadas em nome da segurança,

facilitam pri-são de imigrantes; alvos sao principalmente islâmicos—Estados Unidos limitam ainda mais os direitos civis". *Folha de S. Paulo*, 4/5/2003.

CARDOSO, Oscar Raul & KIRSCHBAUM, Eduardo Van der Kooy. *Malvinas: la trama secreta*.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Planeta, 1983.

CAREY, Meter & BENTLEY, G. Cater (eds.). *East Timor at the Crossroads. The Forging of a Nation*. Hi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CARLOS, Newton. *Bush e a doutrina das guerras sem fim*. Rio de Janeiro: Revan, 2003.

——. "Definindo o papel dos EUA na crise". *Folha de S. Paulo*, São Paulo, 7/5/1982.

CARONE, Edward. *Socialismo e anarquismo no início do século*. Petrópolis: Vozes, 1996.

CARRÈRE D'ENCAUSSE, Hélène. *L'Empire éclaté. La révoltes des nations en URSS*. Paris: Flammarion, 1978.

CARVALHO, Delgado de. *História diplomática do Brasil*. São Paulo: Editora Nacional, 1959.

CASTRO, Fidel. *Misiles en el Caribe. Entrevista por Maria Shriver*. Habana: Ed. Política, 1993.

CASTRO, Fidel; DORTICÓS, Oswaldo; ROA, Raúl. *Así se derrotó al imperialismo*. 2ª ed. México: Siglo XXI, 1981.

CATTON, Philip E. *Diem's Final Failure: prelude to America's war in Vietnam*. Lawrence (Ka.):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2.

CERVO, Amado Luiz & BUENO, Clodoaldo. *História da política exterior do Brasil*. Brasíli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Instituto Brasileiro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2002.

CHANG, Laurence & KORNBLUH, Peter (ed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s reader*. Nova York: New Press, 1992.

CHILCOTE, Ronald H. *The Brazilian Communist Party.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1922–1972*. Nova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CHOMSKY, Noam.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Nova York: Owl Book Edition/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4.

——. *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 Cambridge (Canadá): South End Press, 2000.

——. *Hegemonía o supervivencia. El dominio mundial de EE.UU.* Buenos Aires: Editorial Norma, 2003.

——. 9-11. *Nova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2.

CHOMSKY, Noam & HERMAN, Edward S. *The Washington Connection and the Third World Fasc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I.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

CHURCHILL, Sir Winston Spencer. *Memórias da Segunda Guerra*. Rio de Janeiro: Nova Fronteira, 1995.

——.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rand alliance*. Londres: Guild Publishing, 1987, vol. 3.

CLARK, General Wesley K. *¿Qué ha fallado en Irak?* . *La Guerra, el Terrorismo y el Imperio Americano*. Barcelona: Crítica, 2003.

CLARKE, Richard. *Against all Enemies. 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 Nova York: Free Press, 2004.

CLUTTERBUCK, Richard. *Terrorismus ohne Chance. Analyse und Bakämpfung eines internationalem Phänomens*. Stuttgart: Seewald Verlag, 1975.

COCKBURN, Andrew & COCKBURN, Patrick. *Out of the Ashes. The Resurrection of Saddam Hutssein*. Nova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9.

COHEN, Eliot A. "World War IV".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1/2001.

COHEN, Warren I. & TUCKER, Nancy Bernkopf.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OHN, Gary; THOMPSON, Ginger & MATTHEWS, Mark. "Torture was taught by CIA; Declassified manual details the methods used in Honduras; Agency denials refuted". *The Baltimore Sun*, 27/1/1997, Final Edition.

COLBY, William. *Honorable Men: my life in the CIA*. NovaYork: Simon & Schuster, 1978.

COLE, G. H. D. *História del pensamiento socialista: Marxismo y Anarquismo—1850-1890*. México/Buenos Aires: Fondo de Cuhura Económica, 1958, vol. II.

COLL, Steve.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 Nova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CONETTA, Carl & KNIGHT, Charles. "Inventing Threats". *Bullen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vol. 54, nº 2. Março/Abril 1998. http://www.thebulletin.org/.

CONNELL-SMITH, Gordon.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COOK, Fred J. O *estado militarista*.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64.

COOLEY, John K. *Unholy Wars. Afghanistan, 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Londres: Pluto Press, 2000.

COPELAND, Miles. *The Game Player: confessions of the CIA's original political operative*. Londres: Aurum Press, 1989.

CORSON, William R. *The Betrayal*. Nova York: W. W Norton, 1968.

COTTAM, Martha L. *Images and Intervention: U. S.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4.

CROCE, Benedetto. *La historia como hazana de la libertad*.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42.

CUDDY, Denis Laurence. *September 12 Prior Knowledge. Waiting for the next shoe to drop*. Oklahoma City: Hearthstone Publishing, 2002.

CURRENT, Richard N.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DAALDER, Ivo H. & LINDSAY, James M.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DALLEK, Robert. *J. E Kennedy, Una vida inacabada*. Barcelona: Ediciones Península, 2003.

DANNER, Mark. *Torture and Truth*. America, Abu Ghraib and the War on Terror. Londres: Granta Books, 2004.

D'ARAÚJO, Mara Celina & CASTRO, Celso. *Ernesto Geisel*. 5ª ed. Rio de Janeiro: FGV, 1998.

DARWISH, Adel & ALEXANDER, Gregory. *Unholy Babyl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Saddam's War*. Nova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DAVIS, Nathaniel. *The Last Two Years of Salvador Allen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DEAN, John W. *Worse than Watergate*. The Secret Presidency & George W. Bush. Nova York/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2004.

DENNIS, Mik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res: Pinter Publishing, 1988.

DEUTSCHER, I. *Trotski: o profeta desarmado*.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68.

DeYOUNG, Karen. "U. S. Details Talks With Opposition—Administration Insists It Did Not Encourage a Coup". *The Washington Post*, 17/4/2002.

——. "Bush Officials Defend Their Actions on Venezuela". *The Washington Post*, 18/4/2002.

DI EUGENIO, James & PEASE, Lisa (eds.). *The Assassinations: Probe Magazine on JFK, MLK, RFK and Malcolm X*. Los Angeles: Feral House, 2002.

DIMITROFF, Georgi. *Reichstagsbrandproceß*. Berlim: Verlag Newer Weg, 1946.

DINGES, John. *The Condor Years. How Pinochet and His Allies Brought Terrorism to Three Continents*. Nova York/Londres: The New Press, 2004.

DOBRYNIN, Anatole.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1962－1986. Nova York: Times Books/Random House, 1995.

DOWD, Maureen. "National House of Waffles". *The New York Times*, 13/7/2003.

——. "Empire of Novices". *The New York Times*, 3/9/2003.

——. *Bush World*. Enter at your own risk. Nova York: Berkley Books, 2004.

DRAGO, Tito. *Chile, un doble secuestro*. Madri: Complutense, 1993.

DRAKE, Richard. *The Revolutionary Mystique and Terrorism in Con-*

temporary Italy.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DRAPPER, Theodore. *A Very Thin Line. The Iran-Contra Affairs*. Nova York: Hill and Wang, 1991.

DREW, Elizabeth. *The Corrup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What Went Wrong and Why*. Nova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2000.

DUCROT, Victor Ego. *Bush & ben Laden S. A. La primera guerra global de las corporaciones financiera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Norma, 2001.

DULLES, Foster Rhea. *Prelude to World Power*. An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1860–1900. Nova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65.

DUNLAP Jr., Charles J.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Coup of 2012". Parameters, 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 The United States Army's Senior Professional Journal. Winter 1992–93, pp. 2–20. 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wc/ Parameters/1992/dunlap.htm.

DWYER, Jim; KOCIENIEWSKI, David; MURPHY, Deidre & TYRE, Peg. *Two Seconds Under the World. Terror Comes to America—The Conspiracy Behind the World Trade Center Bombing*. Nova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4.

EHMKE, Horst. *Himmelsfackeln*. Frankfurt/M.: Eichborn, 2001.

EISENHOWER, Dwight D. *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 Nova York: Doubleday, 1963.

ELAND, Ivan. "Protecting the Homeland: The Best Defense is to Give no Offense". Cato Policy Analysis n°306. May 5, 1998. http://www.cato.org/pubs/pas/pa-306.html.

ELAND, Ivan. *The Empire Has No Clothes*. U.S. Foreign Policy Exposed. Oakland (Califórnia):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2004.

ELLSBERG, Daniel. *Papers of the War*. Nova York: Pocket Books, 1972.

ENGELBRECHT, H. C.; HANIGHEN, F. C. *Merchant of Death*. Nova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34.

ERHARD, Ludwig. *Gedanken aus fünf Jahrzehnten*: Reden und Schriften von Karl Hohmann. Düsseldorf: Econ Verlag, 1988.

ESCALANTE FON, Fabian. *Cuba: la guerra secreta de la CIA*. Havan-

a: Ed. Capitán San Luis, 1993.

FALCÃO, João. *O partido comunista que eu conheci: 20 anos de clandestinidade*.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88.

FALIN, Valentin. *Politische Erinnerungen*. Munique: Knaur, 1995.

——. *Konflikte im Kreml. Zur Vorgeschichrte der deutschen Einheit und Auflösung der Sowjetunion*. Munique: Siedler, 1999.

FALL, Bernard B. *Anatomy of a Crisis: the Laotian crisis of* 1960-1961. Nova York: Doubleday, 1969.

FAYA, Ana Julia; RODRÍGUEZ, Pedro Pablo. *El despliegue de un conflicto: la política norteamericana hacia Cuba*, 1959-1961. Havana: Ed. de Ciencias Sociales, 1996.

FERGUSON, Niall. *Colossus: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 Nova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FEST, Joachim C.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Londres: Penguin Books, 1979.

——. *Hitler*. Londres: Penguin Books, 1974.

FIDLER, Stephen & HUBAND, Mark. "Bush foreign policy is creating risks for US companies". *Financial Times*, 11/11/2003.

FIRESTONE, David. "Dizzying Dive to Red Ink Poses Stark Choices for Washington".

The New York Times, 14/9/2003.

FISCHER, Louis. *A vida de Lenin*.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67, 2 vols.

FLEMING, Thomas. *New Dealers' War: FDR and the war within World War II*. Nova York: Basic Books, 2002.

FLYNN, John T. *The Final Secret of Pearl Harbor*. 2ª ed. rev. Nova York: The Devin-Adair Co., 1945.

FONER, Eric.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Nova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FONER, Philip S. *A History of Cuba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ova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1963.

——. *Mark Twain: social critic*. 2ª ed. Nova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1966.

FORERO, Juan. "Venezuela's Chief Forced to Resign; Civilian In-

stalled". *The New York Times*, 13/4/2002.

FREY, Eric. *Schwarzbuch USA*. Frankfurt: Eichborn, 2004.

FRIEDRICH, Jörg. *Der Brand: Deutschland im Bombenkrieg*, 1940－1945. Munique: Propyläen Verlag, 2002.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res: Penguin Books, 1992.

FULBRIGHT, J. William. *La arrogancia del poder*.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2.

FULBRIGHT, J. W & TILLMAN, S. P. *The Price of Empire*. Nova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FUNKE, Manfred. *Terrorismus. Untersuchungen zur Strategie und Struktur revolutionärer Gewaltpolitik*.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sche Bildung, 1977.

FURET, François. *Le passé d'une illusion: 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XXe siècle*. Paris: R. Laffont/Calmann-Lévy, 1995.

FURSENKO, Aleksandr & NAFTALI, Timothy.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chev, Castro and Kennedy*, 1958－1964. NovaYork: W. W. Norton, 1997.

GADDIS, John Lew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GALL, Carlotta & LEWIS, Neil A. "Inmates Released from Guantánamo Tell Tales of Despair". *The New York Times*, 17/6/2003.

GALL, Carlotta & ROHDE, David. "Afghan President Describes Militias as the Top Threat". *The New York Times*, 12/7/2004.

GARCIA LUPO, Rogelio. *Diplomacia secreta y rendición incondicional*. Buenos Aires: Legasa, 1983.

GARCIA, Eugênio Vargas. *O Brasil e a Liga das Nações*: 1919－1926. Porto Alegre/Brasília: UFRGS/Fundação Alexandre de Gusmõo, 2000.

——. *Cronologia das relaçoes internacionais do Brasil*. São Paulo: Alfa-Omega, 2000.

GARTHOFF, Raymond L. *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9.

GATES, Robert M. *From the Shadows. The Ultimate I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 Nova York: Touchstone Edi-

ton/Simon & Schuster, 1997.

GEBHARDT, Hermann. *Guerrillas: Schicksals-frage für den Westen. Die lateina-merikanische Revolutionsbewegung*. Stuttgart: Seewald Verlag, 1971.

GEISMAR, Maxwell. *Mark Twain*: an American Prophe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0.

GELLMAN, Barton. "Keeping the U. S. First: Pentagon Would Preclude a Rival Superpower". *The Washington Post*, 11/3/1992.

GERLACH, Jeffrey R. *Pentagon Myths And Global Realities: The* 1993 *Military Budget*. Policy Analysis No. 171—May 24, 1992. Cato Institute. http://www. cato. org/pubs/ pas/pa-171. html.

GERSON, Joseph & BIRCHARD, Bruce (eds.). *The Sun Never Sets: confronting the network of foreign US military bas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1.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erlim: VEB Deus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81.

GESCHICHTE der Sowjetischen Außenpolink. Berlim: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69－1971, 2 vols. (vols. 1: 1917－1945; vols. 2: 1945－1970).

GEYER, Georgie Anne. *Guerrilla Prince: the unfold story of Fidel Castro*. *Kansas City*: Andrews & McMeel, 1995.

GIANCANA, Sam & GIANCANA, Chuck. *Doble Cross: the explosive inside story of the mobster who controlled America*. Nova York: Warner Books, 1992.

GIBBON, Edward. *Declinio e queda do Império Romano*. Edição abreviada. São Paulo: Companhia das Letras, 1989.

——.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res: Penguin Books, 3 vols., 1994.

GILBERT, Isidoro. *El oro de Moscú: história secreta de las relaciones argentino-soviéticas*. Buenos Aires: Planeta, 1994.

GILLES, Kepel. *Fitna. Guerre au coer d'Islam*. Paris: Gallimard, 2004.

——. *Jihad. Expansion et Déclin de l'Islamisme*. Paris: Gallimard, 2000.

GIRAULT, René. *Diplomatie européenne: nations et impérialismes, 1871－1914*. Paris: A. Colin, 1997.

GISEVIUS, Hans B. *To the Bitter End*. Boston/Cambridge: H. Mifflin/Riverside Press, 1947.

GLEIJESES, Piero. *Conflicting Missions: Havana, Washington and Africa*, 1959-19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 *Shatered Hope: the Guatemalan revol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4-1954*.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GOKHALE, Jagadeesh, & SMETTERS, Kent. *Fiscal and Generational Imbalances. New Budget Measures for New Budget Priorities*. Washington: The AEI Press, Publisher for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03.

GOLDNER, Loren. *Ubu Saved From Drowning: worker insurgency and statist containment in Portugal and Spain, 1974-1977*. Cambridge: Queequeg Publ., 2000.

GOMPERT, David. "How to Defeat Serbia".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4.

GORBACHEV, Mikhail. *On My Country and the World*. Nova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Perestroika: novas ideias para o meu país e o mundo*. São Paulo: Best Seller, 1987.

GORODETSKY, Gabriel. *Grand Delusion: 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GOULD, Lewis L. *Grand Old Party*. A History of Republicans. Nova York: Random House, 2003.

GOULDEN, Joseph C. *Truth is the First Casualty: the Gulf of Tonkin affair, illusion and reality*. Chicago: R. McNally, 1969.

GOUTHIER, Hugo. *Presença*. Rio de Janeiro: Record, 1982.

GOWAN, Peter. *US—UN. New Left Review*. Londres, nov.-dez., 2003.

GRANT, Ulysses S. *Personal Memoirs of U. S. Grant*. Edited by James M. McPherson. Nova York: Viking Penguin, 1999.

——. *Personal Memoirs of U. S. Grant*. Nova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95.

GRIFFIN, David Ray. *The New Pearl Harbor*. Disturbing Questions

abou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9/11.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Olive Branch Press, 2004.

GRIFFIN, David Ray et al.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Commonweath of god*. A political, economical, religions statement. Lowisville/Londres: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GROMYKO, Andrei. *Memoirs*. Nova York: Doubleday, 1989.

GUÉRIN, Daniel & MANDEL, Ernst. *La concentración económica en Estados Unidos*. Buenos Aires: Amorrortu Editores, 1973.

GUEVARA, Ernesto Che. *Obras escogidas: 1957-1967*. Havana: Ed. de Ciencias Sociales, 1991. 2 vols.

HARCKER, Jacob e PIERSON, Paul. *Off Center*.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and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Londr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HAFFNER, Sebastian. *Von Bismarck zu Hitler*. Munique: Knaur, 1989.

HAIG JR., Alexander M.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ova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 *Inner Circles. How America Changed the World. A Memoir*. Nova York: Warner Books, 1992.

HAINES, Gerald K. *The Americanization of Brazil: a study of US cold war diplomacy in the Third World, 1945-1954*.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 1989.

HALBERSTAM, David. *War in a Time of Peace. Bush, Clinton and the Generals*. Londres: Bloomsbury, 2003.

HALL, John Whitney. *Das japanische Kaiserreich*. Frankfu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7.

HALLIN, Daniel C.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HALPER, Stefan & CLARKE, Jonathan. *America Alone*.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AMILTON, Nigel. *Bill Clinton*. An American Journey. Great Expectations. Londres: Arrow Books, 2004.

HANAHOE, Tom. *America Rules: U. S. foreign policy, globalization*

and corporate USA. Dublin: Brandon, 2003.

HANSEN, Joseph. *Dynamic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a Marxist appreciation*. Nova York: Pathfinder, 1994.

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Suhrkamp, 1986.

——.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Band 1 (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 Hamburgo: Felix Mainer Verlag, 1994.

HEITZER, Heinz. *DDR—Geschichtlicher Uberblick*. Berlim: Dietz Verlag, 1987.

HERSH, Seymour M. *The Dark Side of Camelot*. Boston: Little, Brown, 1997.

——. *The Samson Option. Israel's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va York: Random House, 1991.

——.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 Nova York: Summit Books, 1983.

——. "A Case Not Closed". *The New Yorker* 1/11/1993.

——. "Plan B—As June 30th approaches, Israel looks to the Kurds". *The New Yorker*, 28/6/2004.

——. "Torture at Abu Ghraib. American Soldiers Brutalized Iraqis. How far up does the responsibility go?". *The New Yorker*, 10/5/2004.

——. "The Gray Zone. How a secret Pentagon program came to Abu Ghraib." *The New Yorker*, 24/5/2004.

——. "Lunch with the Chairman". *The New Yorker*, 17/3/2003.

HERTSGAARD, Mark "The Secret Life of Henry Kissinger; minutes of a 1975 meeting with Lawrence Eagleburger". *The Nation*, 29/10/1990.

HICKS, John D. *A Short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Riverside Press, 1943.

HIGGS, Robert (ed.). *Arms, Politics, and the Economy: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Nova York: Holmes & Meier, 1990.

HILFERDING, Rudolf. *Das Finanzkapital*.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anstalt, 1968. 2 vols.

HILTON, Stanley E. *O Brasil e as grandes potências: os aspectos políticos da rivalidade comercial*.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77.

HINCKLE, Warren; TURNER, William. *Deadly Secrets: the CIA-Mafia war against Castro and the assassination of JFR*. Nova York: Thunder's, 1992.

——. *Der großdeutsche Freiheitskampf, 1943: reden Adolf Hitler vom 16 März 1941 bis 15 März 1942*. Munique: Zentralverlag der NSDAP, 1943.

HIRO, Dilip. *Iraq. A Report from Inside*. Londres: Granta Books, 2002.

HIRSH, Michael. "We have hit the targets". *Newsweek*, 13/9/2001.

HITLER, Adolf. *Mein Kampf* (zwei Bände in einem Band); 1. Eine Abrechnung; 2.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wegung. Munique: Eher, 1941.

——. *My Battle* (*Mein Kampf*).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3.

HOANG, Van Chi. *From Colonialism to Communism. A Case History of North Vietnam*. Londres: Pall Mall Press, 1964.

HOBBES, Thomas. *Leviat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HOBSON, J. A. *Imperialism: a study*. Nova York: Gordon Press, 1975.

HOBSBAWM, Eric J.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res: Abacus, 1996.

——. *A era dos impérios, 1875–1914*. Rio de Janeiro: Paz e Terra, 1988.

HOFFMAN, Bruce. *Inside Terrorism*. Nova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HOMBERG, Octave.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 Paris: Librairie Plon, 1929.

HONEGGER, Barbara. *October Surprise. Did the Reagan-Bush election campaign sabotage President Carter's attempts to free the American hostages in Iran?*. Nova York/Los Angeles: Tudor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HORNE, Alistair. *Return to Power: a report on the new Germany*. Nova York: F. A. Praeger, 1956.

HOURANI, Albert.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 Nova York: Warner

Books, 1992.

HUBERMAN, Leo & SWEEZY, Paul. *Capitalismo e Imperialismo Norteamericano*. Buenos Aires: Merayo Editor, 1973.

HUDSON, Michael.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 S. world dominance*. Londres: Pluto Press, 2003.

HULL, Cordell. *The memoirs*. 2ª ed. Nova York: Macmillan, 1948.

HUNT, Michael H. *Crises in US Foreign Policy: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a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ova York: Touchstone/Simon & Schuster, 1997.

HUSSEIN, Solomon. *Towards the 21 st Century: a new global security agenda*?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Defence Policy, 1996. (Occasional Paper, 6.)

IAKOVLEV, Aleksandr. *Ce que nous voulons faire de l'Union Soviétique: entretien avec Lilly Marcou*. Paris: Seuil, 1991.

——. *Socialismo: do sonho à realidade*. Moscou: Novosti, 1990. (Intervenção durante o encontro realizado na Universidade Lomonóssov de Moscou, a 12 de fevereiro de 1990).

IMMERMAN, Richard H. *The CIA in Guatemala: 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INGRAM, Dexter. *Facts and Figures About Terrorism*. WebMemo # 36. September 14, 2001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Policy Research & Analysis. Research—National Security.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NationalSecurity/WM36.cfm.

ISAACSON, Walter. *Kissinger: a biography*. Nova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JAMES, Lawrence. *The Golden Warrior: the life and legend of Lawrence of Arabia*. Londres: Little, Brown, 1995.

JANOFSKY, Michael. "Halliburton Turns Over $ 6.3 Million to Government". *The New York Times*, 2/1/2004.

JEHL, Douglas. "Washington Insiders' New Firm Consults on Contracts in Iraq". *The New York Times*, 30/9/2003.

JEHL, Douglas & SCHMITT, Eric. "Dogs and Other Harsh Tactics Linked 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New York Times*, 22/05/2004.

JEHL, Douglas & JOHNSTON, David. "Rule Change Lets C. I. A. Freely Send Suspects Abroad to Jails". *The New York Times*, 6/3/2005.

JENKS, Leland Hamilton. *Our Cuban Colony: a study in sugar; studies in American imperialism*. Nova York: Vanguard Press, 1928.

JOHNSON, Loch K. *Secret Agencies: U. S. intelligence in a hostil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HNSON, Lyndon Baines. *The Vantage Point: perspectives of the presidency, 1963 - 1969*. Nova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1.

JOHNSON, Paul. *Estados Unidos. La historia*. Buenos Aires: Javier Vergara Editor, 2002.

——. *History of the Jews*. Nova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88.

JOHNSON, Chalmers.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ova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2001.

——. *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ova York: Metropolitan Books/Henry Holt & Company, 2004.

KAGAN, Robert. *Paradise &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res: Atlantic Books, 2003.

KAGARLITSKY, Boris. *A desintegração do monolito*. São Paulo: Editora da Unesp, 1993.

KAHN, David. *The Codebreakers*. Nova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KAKAR, M. Hassan.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the Afghan response, 1979 - 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KAPLAN, Lawrence F. &KRISTOL, William. *The War over Iraq: Saddam's tyranny and America's mission*. São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3.

KAUTSKY, Karl. *Bauernagitation in Amerika*.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vol. 20, n. 2, 1902.

——. *Le bolchevisme dans l'impasse*. Paris: F. Alcan, 1931.

——.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Berlim: Dietz Verlag, 1990, vol. 1.

——. *Der Imperialismus*.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vol. 2, pp. 909-922, Sept. 11, 1914.

——. *Nationalstaat: imperialistischer Staat und Staatbund*. Nuremberg: Fräntischen Verlagsanstalt & Buchdruckerei 1915.

——.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Berlim: Dietz Verlag, 1990, vol. 1.

——. *Von der Demokratie zur Staatssklaverei*. Berlim: Dietz Verlag, 1990, vol. 2.

——. *Zwei Schriften zum Umlerne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vol. 2, pp. 33-42, 71-80, 107-116, Apr. 9-30, 1914.

——. *Der Ursprung des Christientums*. Sttugart: J. H. M Dietz Nachfolger, Zwölfe Auflage, 1908.

KELF-COHEN, R. *Twenty Years of Nationalization: the Britsh experience*. Londres: Macmillan, 1971.

KELLENBENZ, Hermann. "Os mercadores alemães de Lisboa pot volta de 1530". *Re-vista Portuguesa de História*, Coimbra, vol. 4, 1961.

KENNAN, George F. *The Cloud Danger*. Current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7.

——.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va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1966.

——. *The Decision to Intervene*. The Prelude to Allied Intervention i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KENNEDY, John F. *Strategy of Peace*. Nova York: Harper, 1960.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ova York: Random House, 1987.

KENNEDY, Robert F. *Thirteen Days: a memoir of the Cuban crisis*. Nova York: Mentor Books, 1969.

KENNETH, Roth. "America's Guilt: the Prisoners in a Legal Black Hole." *The Times*, 21/11/2003.

KEPEL, Gilles. *Jihad. Expansion et Déclin de L'Islamisme*. Paris: Gallimard, 2000.

——. *Fitna. La Guerre au Cœur d'Islam*. Paris: Gallimard, 2004.

KESSLER, Glenn. "Arms Issue Seen as Hurting U. S. Credibility Abroad". *The Washington Post*, 19/1/2004, p. A01.

KHOMEINI, Imam. *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Berkeley: Mizam Press, 1981.

KHRUCHTCHEV, Nikita S. *As fitas da Glasnost: memórias*. São Paulo: Siciliano, 1991.

KIEFER, David. "S. F. Attorney: Bush Allowed 9/11". *San Francisco Examiner*, 11/6/ 2002, http://www. ratical, org/ratville/CAH/Hilton, html.

KILPATRICK, Carroll. "President refuses to turn over tapes; Ervin committee, Cox issue subpoenas".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24/7/ 1973.

KIMCHE, David. *The Last Option: After Nasser, Arafat, and Saddam Hussein. The quest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Nova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91.

KINDLEBERG, Charles. *Marshall Plan Days*.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KISSINGER, Henry. *Diplomacy*. Nova York: Touchstone, 1994.

——.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ova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 *White House Years*. Nova York: Little, Brown, 1979.

——. *Years of Upheaval*. Londres: Wedenfeld, Nicholson, M. Joseph, 1982.

KNIGHT, Amy. *Beria. Olugar-tentente de Stalin*. Rio de Janeiro: Record, 1997.

KNOWLTON, Brian. "U. S. Cites Array of Rights Abuses by the Iraqi Government in 2004". *The New York Times*, 1/3/2005.

KOENEN, Gerd. *Das rote Jahrzehnt. Unsere kleine deutsche Kuhurrevolution—1967－1977*. Frankfurt/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KOLKO, Gabriel. *The Age of War*. The United States confronts the world. Londr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6.

KORNBLUH, Peter & BYRNE, Malcolm. *The Iran-Contra Scandal: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Nova York: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s Reader, 1993.

——. (ed.). *The Pinochet File: 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 Nova York/Londres: The New Press, 2003.

KORRY, Edward M. "Confronting our Past in Chile". *Los Angeles Times*, Los Angeles, 8/3/1981, p. 5.

KRIPPENDORFF, Ekkehart. *Internationale Politik: Geschichte und Theorie*.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1987.

KROPOTKIN, Pedro. *A Grande Revolução (1789-1793)*. 2 vols. Salvador: Livraria Pro-gresso Editora, 1955.

KRUGMAN, Paul. "Pattern of Corruption". *The New York Times*, 15/7/2003.

——. "Losing Latin America". *The New York Times*, 16/4/2002.

——. "Pattern of Corruption". *The New York Times*, 15/7/2003.

——. "Patriots and Profits". *The New York Times*, 16/12/2003.

KUBITSCHEK, Juscelino. *50 anos em 5: meu caminho para Brasília*. Rio de Janeiro: Bloch, 1978, vol. 3.

KUPCHAN, Charles A.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va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KUTLER, Stanley (ed.). *Abuse of Power: the Nixon tapes*. Nova York: Free Press, 1997.

LANGGUTH, A. J. *Hidden Terrors: the truth about U. S. police operations in Latin America* Nova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LARDNER JR., George & PINCUS, Walter. *"Watergate burglars broke into Chilean embassy as cover, tapes show"*.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26/2/1999.

LAWRENCE, T. E. *Os sete pilares da sabedoria*. 3ª ed. Rio de Janeiro: Record [s. d.].

LEARY, William M. (e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istory and documents*.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5.

LeBLANC, Steve. "Kennedy Says Case for War Built on 'Fraud'". *Associated Press/Washington Post*, 19/9/2003, p. A02.

LECHUGA, Carlos. *Eye of the Storm: Castro, Khrushchev, Kennedy and the missile crisis*. Melbourne: Ocean Press, 1995.

LEDEEN, Michal A. *Perilous Statecraft*. 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Iran-Contra Affair. Nova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8.

LEDERER, William J. & BURDICK, Eugene. *A Nation of Sheep*. Nova

York: W. W. Norton, 1961.

LENIN, V. I. *Obras escogidas*. Moscou: Lenguas Extranjeras, 1948, vols. 1-2.

LENS, Sidney. *The Forging of the American Empire from the Revolution to Vietnam: a history of U. S. imperialism*. Londres/Chicago: Pluto Press/Haymarket Books, 2003.

LERNER, Mitchell B. *The Pueblo Incident: a spy ship 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dern war studies*.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3.

LÉVESQUE, Jacques. *The USSR and the Cuban Revolution: Soviet ideological and strategical perspectives, 1959-1977*. Nova York: Praeger Publishing, 1978.

LEWIS, Charles &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Buying of the President 2000. The Authoritative Guide to the Big-Money Interests Behind this Year's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Nova York: Avon Books, 2000.

LEWIS, Neil A. "Geneva Conventions—Justice Memos Explained How to Skip Prisoner Rights". *The New York Times*, 21/5/2004.

LICHTENSZTEIN, Samuel. *Capital financiero, deuda externa y políticas económicas en América Latina*. Montevidéu: Ediciones de la Banda Oriental, 1985.

LIEBKNECHT, Karl. *Militarism and Anti-militarism*. Cambridge: Rivers Press, 1973.

LIEVEN, Anatol. *America Right or Wrong: 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The Push for War".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24, nº 19, dated 3 October 2002.

LIMA, Hermes. *Travessia: memória*. Rio de Janeiro: José Olympio, 1974.

LINCOLN, Abraha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vol. 1, edited by Roy P. Basler. New Brunswich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3.

LLOYD, Henry Demarest. *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 Nova York: Prentice-Hall, Inc., 1963.

LORENZ, Marita. *Lieber Fidel mein Leben, meine Liebe, mein Verrat*.

Munique: E. Ullstein, 2001.

LORENZ, Marita. SCHWARZ, Ted. *Zwischen Liebe und Spionage: die geliebte Castro und agentin Kennedy berichtet aus ihrem schillernden Leben*. Munique: Goldmann, 1990.

LUDENDORFF, Erich. *Meine Kriegserinnerungen, 1914 - 1918*. Berlim: E. S. Mitt-ler 1919.

LUXEMBURG, Rosa. *La cuestión nacional y la autonomia*. México, DF: Pasado y Presente, 1979.

——. *Gesammelte Werke*. Berlim: Dietz Verlag, 1990, vol. 5: August 1914 bis Januar 1919.

MACHIAVELLI, Niccolò *Il Principe* (*Der Fürst*).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1986.

MACIEIRA, Flávio Helmold. "The ro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following events: The terrorist attacks of 11th September; The current War in Afghanistan; and Ireland's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riginal.

MACKAY, Neil. "Bush planned Iraq 'regime change' before becoming President". *Sunday. Herald*, 15/9/2002.

MACKEY, Chris & MILLER, Greg. *Interrogator's War*. Inside the Secret War against al Qaeda. Londres: John Murray Publishers, 2004.

MACLAY, William. *Journal of William Maclay—1789 - 1791*. Nova York: Albert & Charles Boni, 1927.

MAGALHÃES, Juracy. *Minhas memórias provisórias: depoimento prestado ao CPDOC*.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82.

MAGDOFF, Harry. "I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 Nova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MAHAJAN, Rahul. *Full Spectrum Dominance. U. S. Power in Iraq and Beyond*. Nova York/Toronto: 2003.

MAHLE, Melissa Boyle. *Denial and Deception. An Insider's View of the CIA from Iran-Contra to 9/11*. Nova York: Nation Books, 2004.

MALAPARTE, Curzio. *Tecnica del colpo di stato*. Roma: O. Mondadori, 2002.

MANCHESTER, William. *The Arms of Krupp: 1587 - 1968*. Boston: Little, Brown, 1968.

MANDEL, Ernst. *El Mercado Común Europeo y la Competencia Europa-Estados Uni-dos*. Havana: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1970.

MANDELBAUM, Michael. *The Case for Goliath*. How America acts as the world's govern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Nova York: Public Affairs, 2005.

MANELI, Mieczyslaw. *War of the Vanquished*. Nova York: Harper & Row, 1971.

MANN, Golo.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Londres: Penguin Books, 1990.

MANN, Michael. *O império da incoerência*. Rio de Janeiro: Record, 2006.

MARCHETTI, Victor & MARKS, John. D.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Nova York: A. A. Knopf, 1974.

MARQUIS, Christopher. "U. S. Bankrolling Is Under Scrutiny for Ties to Chávez Ouster". *The New York Times*, Nova York, 25/4/2002.

——. "U. S. Cautioned Leader of Plot Against Chávez". *The New York Times*, 17/4/2002.

MARX, Karl & ENGELS, Friedrich. *Werke*. Berlim: Dietz Verlag, 1974, 1976, 1980, 1981, 1982, 1978, vols. 1, 4, 13, 18, 21, 23-25, 29-31, 33, 34, 39.

MASER, Werner.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Geschichte-Auszüge-Kommentare*. Esslingen: Bechtle Verlag, 1981.

MATHEW, K. S. *Indo-Portuguese Trade and the Fuggers of Germans: sixteenth century*. Nova Délhi: Manohar Publishers, 1997.

MAUROIS, André *História da Inglaterra*. Rio de Janeiro: Pongetti [s. d.].

MAY, Ernest & ZELIKOW, Philip D.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d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ondres: 1997.

MAY, Ernest; ZELIKOW, Philip D.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d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YER, Arno. "Untimely Reflections". *Theory & Event*, vol. 5, issue 4, 2002.

MAYER, Jane. "Outsourcing Torture.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extraordinary rendition' program". *The New Yorker*, 14/2/2005.

MCCARTY, Nolan; POOLE, Keith T. e ROSENTHAL, Howard.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6.

McCAULEY, Martin. *Marxism-leninism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the Socialist Unit Party (SED)*. Londres: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1979.

McCLINTOCK, Michael. *Instruments of Statecraft: US guerilla warfare, counter. insurgency, counter-terrorism, 1949 - 1990*. Nova York: Random House/Pantheon Books, 1992.

McFAKLANE, Robert C. & SMARDZ, Zofia. *Special Trust*. Nova York: Cadell & Davies, 1994.

McFEELY, William. *Grant*. A Biography. Nova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McGIRK, Tim (Kabul). "Terrorism's Harvest. How Al-Qaeda is tapping into the opium trade to finance its operations and destabilize Afghanistan." *Time Asia*. 9/8/2004, vol. 164, nº 6.

McMILLAN, James & HARRIS, Bernard. *A invasão econômica americana*. Rio de Janeiro: Editora Expressão e Cultura, 1968.

McNAMARA, Robert S.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Nova York: Vintage Books, 1996.

McNAMARA, Robert. "Apocalypse Soon".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5. http://www.foreignpolicy.com.

MCPHERSON, Alan. *Yankee NO!* Aati-americanism in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MEHRING, Karl.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Berlim: Dietz Verlag, 1985.

MELANSON, Philip H. *The Robert F. Kennedy Assassination: new revelations on the conspiracy and cover-up, 1968 - 1991*, Nova York: Shapolsky, 1991.

MELO FRANCO, Afonso Arinos de. *Planalto: memórias*. Rio de Janeiro: José Olympio, 1968.

MELVILLE, Herman. *White-Jacket or the World in a Man-of-War*. Boston: L. C. Page & Company publishers, 1950.

MEYSSAN, Thierry. *11 septembre 2001. L'effroyable imposture*. Paris: Editions Carnot, 2002.

MILBANK, Dana. "Conservatives Dispute Bush Portrayal of Islam as Peaceful-Critics, Include Some Policy Advisers, Call Stance Political". *Washington Post*, 30/11/2002.

MILLER, Bill & EGGEN, Dan. "FBI—Memo Author Did Not Envision Sept. 11". *The Washington Post*, 23/5/2002.

MIRANDA BRAVO, Olga. *Cuba/USA: nacionalizaciones y bloqueo*. Havana: Ed. de Ciencias Sociales, 1996.

MITCHELL, Peter R. & SCHOEFFEL, John (eds.). *Understanding Power: The Indispensable Chomsky*. Nova York: The New Press, 2002.

MONBIOT, Georg. "A discreet deal in the pipeline. Nato mocked those who claimed there was a plan for Caspian oil". Londres: *The Guardian*, 15/2/2001.

MONIZ BANDEIRA, Luiz Alberto. *De Marti a Fidel: a revolução cubana e a América Latina*.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98.

——. *O governo João Goulart: as lutas sociais no Brasil, 1961-1964*. 7ª ed. Rio de Janeiro/Brasília: Revan/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2001.

——. *O milagre alemão e o desenvolvimento do Brasil: as relações da Alemanha com o Brasil e a América Latina*, 1949-1994. São Paulo: Ensaio, 1994.

——. *A reunificação da Alemanha: do ideal socialista ao socialismo real*. 2ª ed. rev. e aum. São Paulo/Brasília: Global/Editora da UnB, 2001.

MONIZ DE ARAGÃO, Antônio Ferrão. *Classificação methodica e encyclopedica dos conhecimentos humanos. Introdução ao catalogo de obras da Biblioteca Pública*. s/e, 1878.

——. *Elementos de Mathemáticas*. Bahia: Typ. e Livraria Pedroza, 1858.

MONTOYA, Roberto. *El imperio global. George W. Bush, de Presidente dudosamente electo a aspirante a César del Siglo XXI*. Buenos Aires: El Ateneo, 2003.

MORGAN, Rowland e HENSHALL, Ian. *9/11 Revealed*. The Unan-

swered Questions. Nova York: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2005.

MORIN, Richard & MILBANK, Dana. "Most Think Truth Was Stretched to Justify Iraq War". *The Washington Post*, 13/2/2004, p. A01.

MORRIS, Richard B. *Documentos básicos da história dos Estados Unidos*. Rio de Janei-ro: Fundo de Cultura, 1964.

MOYERS, Bill. "Welcome to Doomsday".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2, nº 5, March 24, 2005.

MÜNKLER, Herfried. *Imperien: Die Logik der weltherrschaft—vom alten rom bis zu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Berlim: Rorvohlt, 2005.

MUSICANT, Ivan. *The Banana Wars: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Latin America from the Spanish war to the invasion of Panama*. Nova York: MacMillan, 1990.

NAIMARK, Norman M.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occupation*, 1945 – 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NASH, Philip. *The Other Missiles of October: Eisenhower, Kennedy and the Jupiters*, 1957–196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NEEDLER, Martin C.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NEVINS, Allan & COMMAGER, Henry Steele. *Breve história dos Estados Unidos*. São Paulo: Alfa-Ômega, 1986.

NIEMAYER, Waldir. *O Brasil e seu mercado interno*. [S. l., s. n., s. d.] Apêndice: Brasil-EUA.

NIETO, Clara. *Masters of War*. Latin America and U. S. Agression. Nova York/Toronto: Seven Stories Press, 2003.

NIXON, Richard M. *Memoirs*. Nova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 *The memoirs*. Nova York: Warner Books, 1979. 2 vols.

NORTE-SUR: un programa para la sobrevivencia. Informe de la Comisión Independiente sobre Problemas Internacionales del Desarrollo, presidida pot Willy Brandt. Bogotá: Pluma, 1980.

NOVAK, Michael. *Choosing our King. Powerful Symbols in Presidential Politics*. Nova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74.

OGILVY, David. *Blood, Brains & Beer: autobiography*. Nova York:

Atheneum, 1978.

PAINE, Thomas. *Right of Man*. Chatham (Kent): Wordsworth Editions, 1996.

——. *Common Sense*. Mineola/Nova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97.

PAPE, Robert A.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Nova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6.

PARKER, Frederick D. *Pearl Harbor revisited: United States Navy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1924 – 1941*. Washington: Center for Cryptologic History/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1994.

PARRY, Robert. *Trick or Treason: The October Surprise Mystery*. Nova York: Sheridan Square Press, 1993.

PATOUILLET, Joseph.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 These pour le Doctorat. Dijon: Imprimerie du Petit Gourguignon, 1904.

PAYNE, Stanley G.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1945. Londres: UCL Press, 1995.

PEI, Minxin & KASPER, Sara. "Lessons from the Past: The American Record on Nation Building". Policy Brief , n°24, May 2003.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ELHAM, Nicolas. "Iraqi Minister Sees Oil Privatization Obstacles". *Financial Times*, 5/9/2003.

PEPPER, William. *Orders to Kill: the truth about the murder of Martin Luther King*. Nova York: Avalon Publishing, 1995.

PERALVA, Oswaldo. *O retrato*. Belo Horizonte: Itatiaia, 1960.

PEREIRA, Osny Duarte. "*Antinomia do acordo militar Brasil-Estados Unidos*". Conferência pronunciada na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Imprensa, Rio de Janeiro, em 15 de abril de 1953 (s/ed. , s/d.)

PERKINS, Dexter.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3.

PERKINS, John.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São Francisco: Berret-Koehler Publishers, Inc. , 2004.

PERLE, Richard. "Thank God for the death of the UN". Londres, *The Guardian*, 21/3/2003.

PETERSON, Harold F. *La Argentina y los EUA: 1819–1960*. Buenos

Aires: Editorial Universitária, 1970.

PFLEGER, Katherine. "Kay Says Iraq Likely Had No Banned Arms". *Associated Press*, 25/1/2004.

PHILLIPS, Kevin. *American Dynasty: Aristocracy, Fortune, and the Politics of Deceit in the House of Bush*. Nova York: Viking Press, 2004.

PINHEIRO GUIMARÃES, Samuel. *Quinhentos anos de periferia*. Porto Alegre/Rio de Janeiro: UFRGS/Contraponto, 1999.

——. Market access in a ALCA. COLLOQUIUM OF THE PROJECT IDB/ECLAC, 5—Support to the Process of Hemispheric Trade Liberalization. Washington, 28-29/9/1992.

——. "Esperanças e Ameaças: notas preliminares". Rio de Janeiro, 23/10/1995. Original. POWELL, Colin. *L. The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OWER, Samanta. A *Problem from Hell*.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 Londres: Flamingo, 2002.

POWERS, Thomas. *The Man Who Kept the Secrets: Richard Helms and the CIA*. Nova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

PRADO, Eduardo. *A ilusão americana*. 6ª ed, São Paulo: Alfa-Ômega, 2001.

PRADOS, John.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Actions since World War Second*. Nova York: W. Morrow, 1986.

—— (ed.). *White House Tapes: eavesdropping on the president*. Nova York: New Press, 2003.

PRATT, Julius W.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Nova Jersey: Prentice-Hall, 1955.

PRIEST, Dana. "House Probers Conclude Iraq War Data Was Weak". *The Washington Post*, 28/9/2003.

——. "CIA Puts Harsh Tactics On Hold. Memo on Methods Of Interrogation Had Wide Review". *The Washington Post*, 27/6/2004, p. A01.

——. "Iraq New Terror Breeding Ground War Created Haven, CIA Advisers Report".

The Washington Post, 14/1/2005.

PRIEST, Dana & SMITH, Jeffrey R. "Memo Offered Justification for Use

of Torture Justice Dept. Gave Advice in 2002". *The Washington Post*, 8/6/2004.

PRIEST, Dana & WHITE, Josh. "War Helps Recruit Terrorists, Hill Told Intelligence Officials Talk Of Growing Insurgency". *The Washington Post*, 17/2/2005, p. A01.

PULIDO, João Paulo Nunes Garcia & FONSECA, Pedro Miguel Moreira da. *O Petróleo e Portugal. O mundo do petróleo e o seu impacto no nosso país*. Lisboa: Tribuna da História, 2004.

RABE, Stephen G. *The Most Dangerous Area in the World. John F. Kennedy Confronts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Chapel Hill Londr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RAGANO. Frank & RAAB. Selwvn. *Mob Lawyer*. Nova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RANGELL, Leo. *The Mind of Watergate: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mpromise of integrity*. Nova York: Norton, 1980.

RAPHAEL, Ray. *Mitos sobre a fundação dos Estados Unidos*.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2006.

RASHID, Ahmed. *Jinad. The Rise of Militant Islam in Central Asia*. Londres: Yale Nota Bene, 2003.

——. *Taliban. The Story of the Afghan Warlords*. Chatham (Kent): Pan Books, 2000.

RATNER, Michael & SMITH, Michael Stevens. *Che Guevara and the FBI: the U. S. political police dossier on the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ova York: Ocean Press, 1997.

RAY, Ellen & SCHAAP, William H. (eds.). *Covert Action*. The Roots of Terrorism. Melbourne/Nova York: Ocean Press, 2003.

READ, Anthony & FISHER, David. *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 Stalin and the Nazi Soviet pact, 1939–1941*. Nova York: W. W. Norton, 1988.

——*The Fall of Berlin*. Nova York: Capo Press, 1995.

REAGAN, Ronald. *An American Life*. The Autobiography. Nova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 *The Quest for Peace, The Cause of Freedom*. Selected Speeches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ashington, D. C.: The U. S. Information

Agency, 1988.

REED, Terry & CUMMINGS, John. *Compromised: Clinton, Bush and the CIA*. Kew Gardens (NY): Clandestine Publishing, 1995.

RENOUVIN, Pierre & DUROSELLE, Jean-Baptist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va York: F. A. Praeger, 1967.

REXIN, Manfred. *Die Jahre 1945-1946*. Hannover: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Zeitgeschehen. 1962.

RIBEIRO, Darcy. *As Américas e a civilização*. Rio de Janeiro: Civilizção Brasileira, 1970.

RICHARD, Alexandra. "La CIA aurait rencontré Ben Laden en juillet". Paris, *Le Figaro*, 31/1/2001.

RIMINGTON, Stella. *Open Secr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MI5*. Londres: Arrow Books, 2002.

RISEN, James. *"Secrets of History: the CIA in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16/4/2000.

——. "Ex-Inspector Says C. I. A. Missed Disarray in Iraqi Arms Program". *The New York Times*, 26/1/2004.

RISEN, James & LICHTBLAU, Eric. "C. I. A. Was Given Data on Hijacker Long Before 9/11". *The New York Times*, 24/2/2004.

RITTER, Scott. *Endgame: Solving the Iraq Crisis*. Nova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RITTER, Scott & PITT, William Rivers. *War on Iraq. What Team Bush Doesn't Want You to Know*. Londres: Profile Books, 2002.

ROBERTSON, Pat. *The New World Order*. Dallas: World Publishing, 1991.

ROBINSON, Greg. *By Order of the President: FDR and the Internment of Japanese Americ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BINSON, Joan. *Economía de la competencia perfecta*. Barcelona: Martínez Roca, 1969.

ROOSEVELT, Kermit. *Countercoup: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Iran*. Nova York: McGrawHill, 1979.

ROOSEVELT, Theodore. *An Autobiography*. Nova York: Da Capo Paperback, 1985.

ROTHKOPF, David. *Running the World*. Inside 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Architects of American Power. Nova York: PublicAffairs, 2005.

ROVAN, Joseph. *Histoire de l'AIlemagne: des origenes à nos jours*. Paris: Seuil, 1994.

RUPPERT, Michael C.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t the Age of Oil. Gabila Island (Canadá):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4.

RUSSO, Gus. *Live by Sword: the secret war against Castro and the death of JFK*. Baltimore: Bancroft Press, 1998.

RYMOND, Jack. *O poder do Pentágono*. Rio de Janeiro: Saga, 1965.

SAAR, Erik & NOVAK, Viveca. *Inside the Wire*. 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oldier's Eyewitness Account of Life at Guantanamo. Nova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SÁENZ QUESADA, Maria. *Isabel Perón*. Buenos Aires: Planeta, 2003.

——. *La Argentina. Historia del País y de Su Gente*. 3ª ed.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2004.

SAFIRE, William. "From the Right—Seizing Dictatorial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15/11/2001.

SANGER, David E. "Bush Was Warned Bin-Ladin Wanted to Hijack Planes" *The New York Times*, 16/5/2002. *The New York Times*, 18/5/2002. *La Nacion*, Buenos Aires, 19/5/2002.

SARDAR, Ziauddin & DAVIES, Merry Wyn. *Pourquoi le monde déteste-t-il l'Amérique?* Paris: Fayard, 2002.

SCENNA, Miguel Angel. *Como fueron las relaciones argentino-norte-americanas*. Buenos Aires: Plus Ultra, 1970.

SCHIRER, William 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Nova York: Fawcett Crest, 1992.

SCHIRMER, Daniel B. *Republic or Empire American: resistance to the Philippine war*. Boston: Schenkman, 1972.

SCHLESINGER, Arthur M.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SCHLESINGER JR., Arthur M. *War and the American Presi-*

dency. Nova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SCHMIDT-EENBOOM, Erich. *Schnüffler ohne Nase: Der BND die unheimliche Macht im Staate*. Düsseldorf: Econ Verlag, 1993.

SCHMIED, Jürgen Peter. *Hitlers Amerikabild vor der Machtergreifung.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Stuttgart, vol. 3, n° 12, p. 714 - 724, dez. 2002. SCHOULTZ, Lars. *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y of U. 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National Security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Nova Jersey: Princen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SCHULZE-GAEVERNITZ, Gerhardt von. "Amerikas Überimperialismus". In: BONN, M. J. & PALYI, M. (org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nach dem Kriege*: Festgabe für Lujo Brentano zum 80 Geburstag. Munique: Duncker & Humblot, 1925, vol. 1.

SCHULZINGER, Robert D.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CHWARTZ, Stephen I. (ed.). *Atomic Audit: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U. S. Nuclear Weapons since 1940*.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SCHWEID, Barry. "Pentagon Details Nuclear Plans". *Los Angeles Times*, 9/3/2002.

SENGUPTA, Ki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IISS). Iraq Occupation Made World Less Safe, Pro-War Institute Says Studies". *The Independent* (UK), 26/5/2004.

SERGUÉEV, Fiodor. *La CIA sin máscara*. Moscou: Progreso, 1983.

SHAKESPEARE, William. *Complete works*. Nova York: Gramercy Books, 1990.

SHARANSKY, Natan & DERMER, Ron. *The Case for Democracy. The Power of Freedom to Overcome Tyranny & Terror*. Nova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SHEEHAN, Smith & KENWORTHY, Butterfield. *The Pentagon Papers*. Nova York: Bantam Books, 1971.

SHENON, Philip. "F. B. I. Knew for Years About Terror Pilot Training". *The New York Times*, 18/5/2002.

SIAMDOUST, Nahid. "Iran Says It Will Resume Enrichment if EU Talks Fail". *Los Angeles Times*, 6/3/2005.

SICK, Gary G. *October Surprise: America's Hostages in Iran and the Election of Ronald Reagan*. Nova York: Times Books/Random House, 1991.

SINGER, Peter Warren. *Corporate Wariors: rise of the privatized military industry*. Nova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SKED, Alan & COOK, Chris. *Post-war Britain: a political history*.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9.

SLEVIN, Peter. "Powell Voices Doubts About Iraqi Weapons". *The Washington Post*, 25/1/2004, p. A14.

SMITH, Joseph. *The Cold War: 1945 - 1992*. 2ª ed. Oxford: Blackwell, 1998.

SMYSER, W. 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Nova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SNOW, Nancy. *Information War*. American Propaganda, Tree Speech and Opinion Control since 9/11. Nova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3.

SOARES, Mário. *Portugal, que revolução? Diálogo com Dominique Pouchin*. Lisboa: Perspectivas & Realidades, 1976.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 *Commentary on the Green Book*. Tripoli: World Center for Researches and Studies of the Green Book, vol. 1.

SOLOMON, Rober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1945 - 1976: an insider's view*. Nova York: Harper & Row, 1977.

SOROS, George. "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aneiro 2004. http://www.ciaonet.org/wps/sog01/.

SOROS, George. *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 Londres: Phoenix, 2004.

SOUSA LARA, Antônio. *A subversão do Estado*. Lisboa: Universidade Técnica de Lisboa/Instituto Superior de Ciências Sociais e Políticas, 1987.

——. *Imperialismo, Descolonização, Subversao e Independência*. Lisboa: Universidade Ténica de Lisboa/Instituto Superior de Ciências So-

ciais e Política, 2002.

SPINNER, Jackie. "Halliburton Gets More Iraq Work". *The Washington Post*, 17/1/2004, p. E01.

STETTINIUS Jr., Edward.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 the Yalta Conference. Nova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49.

——. *The Diaries of Edward R. Stettinius Jr., 1943-1946*. Edited by Thomas Campbell & George C. Herring. Nova York: New Viewpoints, 1975.

STEVENSON, Richard W. "Bush Sought to Oust Hussein From Start, Ex-Official Says", *The New York Times*, 12/1/2004.

STIGLITZ, Joseph. *Globalization and its Descontents*. Londres: Penguin Books, 2002.

STINNETT, Robert B. *Day of Deceit*: *the truth about FDR and Pearl Harbor*. Nova York: The Free Press, 2000.

STOCKWELL, John R. *The Praetorian Guard*: The US Rol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outh End Press, 1990.

——. *In Search of Enemies*. A CIA Story. Nova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78.

SUDOPLATOV, Pavel & SUDAPLATOV, Anatoli. *Special Tasks*: *the memoirs of an unwanted witness*; *a Soviet spymast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95.

SUSKIND, Ron. *The Price of Loyalty*: *George W. Bus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 Nova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SWEEDLER, Alan. "U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 cold-war era". Seminário do Núcleo de Estudos Estratégicos da Universidade Federal Fluminense. Niterói, maio de 1992.

SZULC, Tad. *Fidel*: *um retrato crítico*. 3ª ed. São Paulo: Best Seller, 1986.

SZYLIOWICZ, Joseph & O'NEIL, Bard (eds.) *The Energy Crisis and the U. S. Foreign Policy*. Nova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5.

TARPLEY, Webster G. *9/11 Synthetic Terror Made in USA*. Califórnia: Progressive Press, 2006.

TARPLEY, Webster G.; CHAITKIN, Antin; WERTZ, Marianna

(orgs.) *George Bush: The unanthorized biography*. Washington, D. C.: Intelligence Review, 1992.

TAUSSIG, F. W. *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ova York/Londres: G. P Putnam's Sons, 1890.

THE ASSOCIATED PRESS. "Airlines Warned of Terrorist Threats". *The New York Times*, 19/5/2002.

THEOBALD, Robert A. *The Final Secret of Pearl Harbor: the Washington contribution to the Japanese attack*. Nova York: Devin-Adair, 1954.

THOMAS, Gordon. *The Gideon's Spie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ssed*. Nova York: T. Dunne, 1999.

THOMAS, Hugh S.; FAURIOL, Georges A. & WEIS, Juan Carlos. *The Cuban Revolution: 25 years later*. Londres: Westview Press, 1984.

THOMPSON, Ginger & FORERO, Juan. "Ardent Populists Reinstate Leader to Run Venezuela". *The New York Times*, 15/4/2002.

THOMPSON, Robert Smith. *The Missiles of October*. Nova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THORNTON, Richard C. *The Falklands Sting: Reagan, Tatcher, and Argentina's bomb*. Washington: Brassey, 1998.

TIBI, Bassam. *Kreuzzug und Djihad. Der Islam und de cristiliche Welt*. Munique: Wilhelm Goldman Verlag, 1999.

TIRMAN, John. *Spoils of War: the human cost of America's trade arms*. Nova York: Free Press/Simon & Shuster, 1997.

TOCQUEVILLE, Alexis.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68.

TODD, Emmanuel. *Après l'empire: essai sur la décomposition du système américain*. Paris: Gallimard, 2002.

TOLAND, John. *Infamy: Pearl Harbor and its aftermath*. Nova York: Berkley Books, 1983. TOURANE, Alain. "La hegemonía de EE. UU y la guerra islamista". *El País*, Madri, 13/7/2001.

TOYNBEE, Arnold J. *America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 Londr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TRENTO, Joseph J. *The Secret History of CIA*. Califórnia: Forum/Prima, 2001.

TREVOR-ROPER, Hugh.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6ª *e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TROTSKY, Leon. *Europe et Amérique*. Paris: Librairie de l'Humanité, 1926.

——. *A história da revolução russa*. 2ª *ed*. Rio de Janeiro: Paz e Terra, 1977, 3 vols.

——. *Revolução e contra-revolução na Alemanha*. São Paulo: Ciências Humanas, 1979.

——. *A revolução permanente*. São Paulo: Ed. Ciências Humanas, 1979.

——. *La révolution trahie*. Paris: B. Grasset, 1936.

——. *Contra el terrorismo*. Bogotá: Editorial Pluma Ltda., 1978.

TRUBOWITZ, Peter.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TRUMAN, Harry S. Memoirs. *Years of Decision*. Nova York: Doubleday, 1955.

——. *Memoirs.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Nova York: Doubleday, 1955–1956, 2 vols.

TURNER JR., Henry Ashby. *German Big Business & the Rise of Hit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TWAIN, Mark (Samuel L. Clemens e Charles Dudley Warner). *Gilded Age*. 2 vols. Nova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77.

TYLER, Patrick E. "Lone Superpower Plan: Ammunition for Cr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10/3/1992.

TYSON, Brady. *O sistema interamericano depois de São Domingos. Política Externa Independente*. Rio de Janeiro, vol. 1, nº 3, p. 83–108, jan. 1966.

UNGER, Craig. *Los Bush y los Saud. La relación secreta entre la dos dinastías más poderosas del mundo*.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ial Planeta, 2004.

VALENTE, Rubens. "Brasil perde capacidade de projetar poder na regiáo, diz relatório Estudo do Exército detecta 'cinturão' militar dos EUA". *Folha de S. Paulo*, 2/1/2000.

VAN CHI, Hoang. *From Colonialism to Communism: a case history of North Vietnam*. Londres: Pall Mall Press, 1964.

VARGAS, Getúlio. *A politica trabalhista no Brasil*. Rio de Janeiro: Livraria José Olympio Editora, 1950.

VAUCHER, Robert. *L'enfer bolchevik*. Paris: Librairie Perrin, 1920.

VEDANTAM, Shankar. "The Psychology of Torture—Past Incidents Show Abusers Think Ends Justify the Means". *The Washington Post*, 11/5/2004.

VERBITSKY, Horacio. *Civiles y Militares: memoria secreta de la transición*. Buenos Aires: Planeta, 2003.

VIDAL, Gore. *Dreaming War: blood for oil and the Cheney-Bush junta*. Nova York: Nation Books, 2002.

——. *The Golden Age*. Nova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0.

VLADIMIROV, L. *A diplomacia do dólar*. Rio de Janeiro: Vitória, 1960.

VOLKOGONOV, Dmitri. *Lenin: a new biography*. 4ª ed. Nova York: Free Press, 1994.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political leaders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Londres: Harper-Collins, 1999.

——.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Rocklin (Ca.): Prima Publishing. Forum, 1996.

WALSH, Lawrence E. *Fin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 for Iran/Contra Matters*. Volume I: Investigations and Prosecutions. Lawrence E. Walsh, Independent Counsel,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Washington, 1993.

——. *Fin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 for Iran/Contra Matters*. Vol. II: Indictments, Plea Agreements, Interim Reports to the Congress, and Administrative Matters. U. 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Washington, 1993.

——. *Firewall The Iran-Contra Conspiracy and Cover-Up*. Nova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Incorporated, 1997.

WALTERS, Vernon A. *Silent Missions*. Nova York: Doubleday, 1978.

WALTON, Richard J. *Cold War and Counter-revoluti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J. E Kennedy*. Nova York: Viking Press, 1972.

WARRICK, Joby & STEPHENS, Joe. "Before Attack, U. S. Expected

Different Hit. Chemical, Germ Agents Focus of Preparations". *Washington Post*, 2/10/2001.

WATERGATE: chronology of a crisis.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ly, 1973.

WEBER, Max. *Gesammelte Au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übingen: J. C. B. Mohr Verlag, 1988, vol. 1.

WEDEMEYER, 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4ª ed. Nova York: H. Holt, 1958.

WEHLER, Hans-Ulrich. *The German Empire: 1871 – 1918*. 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93.

WEINBERG, Albert K.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3.

WEINBERGER, Eliot. 12 *de septiembre. Cartas de Nueava York*. Chicago: Ediciones Era, 2003.

WEINER, Tim. *In tapes, Nixon Talks of Plans for Foreign Embassy Break-ins*. *New York Times*, Nova York, Feb. 2, 1999. Late ed., sec. A, p. 13.

WEIS, W. Michael. *Cold Warriors & Coup d'Etat. Brazilian-American Relations, 1954–1964*.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1993.

WEISMAN, Jonathan. "Budget Deficit May Surpass $ 450 Billion". *The Washington Post*, 15/7/2003, p. A01.

WELCH JR., Richard E. *Response to R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ban revolution, 1959 – 196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WESTPHAL, Wilfrie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olonien*. Bindlach: Gondrom Verlag, 1991.

WHEATCROFT, Andrew. *Infidels. The Conflict between Christendom and Islam (638–2002)*. Londres: Viking/Penguin Books, 2003.

WHITE, Mark J.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Londres: Macmillan, 1996.

WHITE, Stephen et al. *Developments in Soviet Politics*. Londres: MacMillan, 1990.

WHITMAN, Walt. *Leaves of Grass*. Nova York: Modern Library, s/d.

WIARDA, Howard J. *Foreign Policy Without Illusion*. Glenview (Illinois) /Londres: Scott, Foresman/Little, Brown Higher Education,

1990.

WILLIAM, William Applema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ova York: Delta Books, 1972.

WILLIAMS, Eric D. *The Puzzle of 9/11*.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vents of September 11, 2001 and why the pieces don't fit together. Williamsquire Ltd, 2004.

WILLIAMSON, John. *The Progress of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aneiro de 1990.

WISE, David. *The American Police State: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people*. Nova York: Random House, 1976.

WISE, David & ROSS, Thomas. *O governo invisível*.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65.

WOHLSTETTER, Roberta. *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WOOD, Ellen Meikins. *Empire of Capital*. Londres: Verso, 2003.

WOODWARD, Bob. Veil: *as guerras secretas da CIA, 1981–1987*. São Paulo: Best Seller, 1987.

——. *Bush at War*. Nova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 *Plan of Attack*. Nova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 *State of Denial*. Nova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 "Break-in Memo Sent to Ehrlichman". *Washington Post*, 13/6/1973.

——. "Bug suspect got campaign funds". *Washington Post*, 1/8/1972.

——. "Dean alleges Nixon knew of cover-up plan". *Washington Post*, 10/10/1973.

——. "FBI finds Nixon aides sabotaged democrats," *Washington Post*, 10/10/1982.

——. "GOP security aids among five arrested in bugging affair" *Washington Post*, 19/6/1972.

——. "Mitchell controlled secret GOP fund". *Washington Post*, 29/9/1972.

WOODWARD, Bob & BERNSTEIN, Carl. *All the President's Men*. Nova York: Simon& Schuster, 1974.

X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Nova York, vol. 25, pp. 566–582, July 1947.

YERGIN, Daniel. *O petróleo. Uma história de ganância, dinheiro e poder*. São Paulo: Scritta Editorial/Página Aberta, 1993.

ZIMMERMANN, Warren. *First Great Triumph: how five Americans made their country a world power*. Nova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

ZUBOK, Vladislav & PLESHAKOV, Constantine.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Fontes impressas

ARGENTINA. Comisión Nacional por la Desaparición de Personas. Nunca más. 6ª ed Buenos Aires: Eudeba, 2003.

BRASIL.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A política exterior da revolução brasileira: discursos. Brasília, DF, 1968.

CHILE. Secretaria General del Gobierno. Documentos secretos de la ITT. Santiago: Ed. Nacional Quimantu, 1972. Traducción de los originales en inglés.

ESTADOS UNIDO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documents. Washington: Brassey, 1994.

——. The 9/11 Co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Authorized Edition. Nova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st Edition, 2004.

——. Congress (83th. 2nd. session: 1954).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lect Committee on Communist Aggression in Latin America.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ommunist Aggression in Latin America: under authority of H. Res. 346 and H. Res. 348.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 Congress (1987).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lect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overt Arms Transactions.

——.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Secret Military Assistance to Iran and the Nicaraguan Opposition.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with supplemental, minority, and additional views, 13/1/1987. Committed to the 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nd ordered to be printed, 17/11/1987.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 (94th. 1st. session: 1975).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 an interim report; US Senate together with additional, supplemental, and separate views, legislative day, 18/11/1975.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 Covert act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vol. 7-4-5/12/1975.

——. Covert action in Chile, 1963-1973: staff report.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vol. 7-18/12/1975.

——. Detailed staff reports on foreign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 Final report.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vol. 4.

——.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vol. 6-18-19/11/1975, 2-3, 9-11/12/1975.

——.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Senate resolution 21; unauthorized storage of toxic agent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vol. 1-16-18/9/1975.

——.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Kennedy. In: ——. Final report.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vol. 5-23/3, under authority of the order of 14/4/1975.

——. Mail opening.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vol. 4-21-22, 24/10/1975.

——.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nd the fourth amendment right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vol. 5-October 29, November 6, 1975.

——. Supplementary detailed staff reports on foreign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 Final repor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vol. 4.

——. Supplementary detailed staff reports o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nd the rights of Americans. In: —. Final report.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vol. 3.

——. Supplementary reports o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In: —. Final repor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v. 6.

——. Senate. The BCCI Affair. A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by Senator John Kerry and Senator Hank Brown. December 1992 102d Congress 2d Session Senate Print 102-140.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vol. 8— The American republics.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 - 1957.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vol. 6—American republics multilateral, Mexico, Caribbean.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 - 1960.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vol. 5—American republics; vol. 6—Cuba.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 - 1963.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 1997, vol. 2—American republics; vol. 6—Kennedy— Khrushchev exchanges; vol. 10—Cuba, 1961 - 1962; vol. 11—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ftermath.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 - 1968.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 1998, vol. 1—Vietnā, 1964; vol. 4—Vietnā, 1966; vol. 5—Vietnā, 1967; vol. 11—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1976.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 3—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69 - 197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1969 - 1972.

——.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9/11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Authorized ed. Nova York: W. W. Norton, 2004.

——. Government.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The evolving drug threat in Colombia and other South American source zone Nations: statement by General Barry R. McCaffrey, Director,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Reform, Subcommittee on Criminal Justice, Drug Policy, and Human Resources. Washington, 6/8/1999.

——.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with Minority Views—Abridged Edition. Daniel K. Inouye,

Charmain/Senate Select Committee. Lee H. Hamilton, Chairman/House Select Committee—13/11/1987.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e Brinkley and Stephen Engelber. Nova York: Times Books, 1988.

——. President John Kennedy. A compendium of speeches, statements, remarks delivered during his service in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8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Senate documents, 79).

——.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e 1° de janeiro a 31 de dezembro de 1962.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 President (1977－1981: Carter).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1982.

——. President (1981－1989: Reaga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 de janeiro a 2 de julho de 1982.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janeiro 2000.

——.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1997 Summer Study Task Force on DoD Responses to Transnational Threats. Vol. 1, Final Report.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 & Technology. Washington, D. C. 20301—3140. Washington, outubro 1997.

——.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1997 Summer Study Task Force on DoD Responses to Transnational Threats. Vol. Ⅲ. Supporting Reports. February 1998.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 &Technology. Washington, 20301—3140.

——.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of State designate Madeleine K. Albright: prepared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as realesed by the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Washington, 8/1/1997. Disponível em: http://www. secretary. state. gov. statements/970108a. html.

——.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Strategy Re-

port—2005. Released by the 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and Law Enforcement Affairs. March 2005. http://www.state.gov/g/inl/rls/nrcrpt/2005/voll/html/42366.htm.

——. Department of State, 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2003. http://www.state.gov/s/ct/rls/pgtrpt/2003/33777.htm.

——. Report of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Information Warfare—Defense (IW-D). January 8, 1997.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 Technology. Washington, D.C. 20301—3140.

——. Remarks by President Bill Clinton to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99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Bank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6 de outubro de 1998.

——. Remarks by President Bush and President Cardoso of Brazil in photo opportunity: 30 de março de 2001, 2:15 P.M, EST-2:23 P.M. EST.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The Oval Office, 2001. Disponfvel em: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 releases/2001/03/20010330-5.html.

——. Senate. 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USA patriot act; Act of 2001—HR 3162 RDS —107th Congress 1st Session—H.R. 3162. Washington, 24 de outubro de 2001.

——. Senate. 1998 Congressional Hearings Special Weapons Nuclear,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Missile. Statement of Scott Ritter, 3 de setembro de 1998 at United States Senate. Joint Legislative Hearing of the Committees on Armed Services and Foreign Affairs—216 Hart Office Building, Washington.

——. Senate. Oversight Hearing on "The Treasury Department's Report to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Exchange Rate Policy." Prepared Statement of Mr. Ernest H. Preeg, Senior Fellow in Trade and Productivity, Manufacturers Alliance/MAPI Inc. 9:30 a.m., Wednesday, 1° de maio de 2002.

——. Senate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irst Session, 109th Congress The annual Army Posture Statement is an unclassified summary of Army roles, missions, accomplishments, plans and programs. Designed to reinforce the Secretary of the Army and Chief of Staff, Army's pos-

ture and budget testimony before Congress, the Army Posture Statement serves a broad audience as a basic re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Chief of Staff, U. S. Army,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Headquarters Staff Group, www. army. mil/aps.

——. Trade Representatives. Charlene Barshefsky statement before House Trade Panel: US Information and Texts nº 011—Z12481 B,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20 de março de 1997.

——. Charlene Barshefsky testimony to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US Information and Texts nº 005 —Z12481 B.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5 de fevereiro de 1997.

——. The Pentagon Papers as publish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based o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by Neil Sheehan. Written by Neil Sheehan, Hedrick Smith, E. W. Kenworthy and Fox Butterfield. Articles and documents edited by Gerald Gold, Allan M. Sieagal and Samuel Abt. Nova York: Bantam Books, 1971.

——. The Iran-Contra Scandal: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Edited by Peter Kornbluh and Malcolm Byrne.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s Reader. Nova York: New York Press, 1993.

——. Prisoner Abuse: Patterns from the Past—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º. 122. Cold War U. S. Interrogation Manuals Counseled "Coercive Te chniques". Cheney Informed of "Objectionable" Interrogation Guides in 1992 "Inconsistent with U. S. Government Polic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Posts CIA Training Manuals from 60s, 80s, and Investigative memos on earlier controversy on human rights abuse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lanton, Thomas & Kornbluh, Peter (ed.). http://www. gwu. edu/~ nsarchiv/NSAEBB/NSAEBB122/#kubark.

——. White House. Reliable, Affordable, and Environmentally Sound Energy for America's Futur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Group, 2001.

——.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tatement by General Barry R. McCaffrey, Director,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Reform, Subcommittee on Criminal Justice,

Drug Policy, and Human Resources—The Evolving Drug Threat in Colombia and other South American Source Zone Nations, 6 de agosto de 1999.

——. White House. National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Group. National Energy Report. Maio de 2001.

——. The White House—President George W. Bus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 de setembro de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 "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A Report of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setembro de 2000.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RebuildingAmericasDefenses.pdf.

——. Strategic Energy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Sponsored by the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and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dward L. Morse, Chair Amy Myers Jaffe, Project Director. http://www.informationclearinghouse.info/article3535.htm.

——. New World Coming: American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Major Themes and Implications. The Phase 1 Report on the Emerging Global Security for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21st Century. September 15, 1999. U.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21st Century. http://www.fas.org/man/docs/nwc/nwc.htm.

——. CRR Report of the Congress.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Developing Nations—1993 - 2000. 16 de agosto de 2001. By Richard F. Grimmet, specialist in 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Affairs, Defense and Trade Divis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 Statement by David Kay on The Interim Progress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Iraq Survey Group (ISG) before the 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Subcommittee on Defense, and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2 de outubro de 2003.

——. Comprehensive Report of the Special Advisor to the DCI on Iraq's WMD—30 de setembro de 2004. http://www.cia.gov/cia/reports/iraq_

wmd _ 2004/.

——.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2004. Released by the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28 de fevereiro de 2005.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4/index.htm.

FEDERAL RESERVE BOARD. "Remarks by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at the European Banking Congress 2004". Frankfurt, Germany, 19 de novembro de 2004. Panel discussion: Euro in Wider Circl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U. S. Fiscal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for Long Run Sustainability—Martin Mühleisen & Christopher Towe, editors. January 7, 2004.

ORGANIZAÇÃO DAS NAÇÕES UNIDAS. General Assembly (A/364, 2nd. session: 1947). Official records. Nova York, 1947, vol. 1. Supplement 11—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 reports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3 de setembro de 1947.

REINO UNIDO. The white paper of 1922: the Churchill white paper; British white paper, junho de 1922.

NORTE-SUR. Un programa para la supervivencia. Informe de la Comisión Independiente sobre Problemas Internacionales del Desarrollo presidida por Wylly Brandt.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Bogotá: Editorial Pluma, 1980.

HUMAN RIGHTS WATCH. "The Rule of the Gun.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the Run-up to Afghanist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 Human Rights Watch Briefing Paper. Setembro de 2004.